

收藏本

深翻

【美国】韩丁著
（深翻）译校组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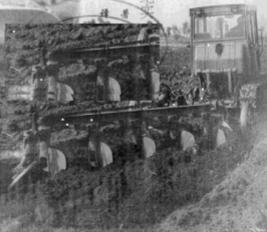
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香港)
The Tri-City Press (USA)

1712.55
H072

——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

【美国】韩丁著
《深翻》译校组译

深翻



1712.55
H072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香港)
The Tri-City Press USA (美国)

Shenfan

Copyright © 1983 by William Hinton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enfan

Published in United States 2008 by

Tri-City Press, LLC.

38-24 217th Street, Bayside, N.Y. 16361 USA

ISBN 978-0-9792764-2-2 90000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are available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in Hong Kong 200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K)

FLAT/RM 611 RICKY CENTRE 36 CHONG

YIP EAST KWUN TONG KL

香港公共圖書館 CIP 數據預行編目資料

深翻 / (美) 威廉·韓丁 著 《深翻》翻譯校訂組 譯

第一版：香港：國際文化圖書，2008.5.

ISBN 978-988-17300-7-7 (DO30852)

開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張：49

版次：2008年5月出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書名：深 翻

社長：汪森雷

總編輯：劉乙潔

裝幀：石 竹

出版：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K)

印制：國家文化傳播集團發行有限公司

代理：國家文化傳播集團發行有限公司

地址：FLAT/RM 611 RICKY CENTRE 36 CHONG

YIP EAST KWUN TONG KL

電話：(852) 23892981

傳真：(852) 35702333

網址：www.cicphk.com

電郵：gjwhcb@yahoo.com.hk

定價：RMB 76.00 元整

HK\$ 85.00 元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DG

出版说明（英文版）

1971年，威廉·韩丁又来到了张庄，这个他在革命后的土改时曾住过数月的中国农村，也是他在《翻身》中所记录和反映的地方。他回来的目的是想通过和20多年前曾与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张庄农民们交谈，来了解他昔日的梦想是否已变成了现实。在此之后，他写出了《深翻》。靠对中国一些地区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这些地区有些对西方人并非正式开放了的），通过与相识已久的人们的推心置腹的交谈，韩丁先生的《深翻》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又告诉了我们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深翻》的价值更在于，它没有从国家和地方领导阶层或从人们自己以后的报道中寻得现成的材料，而主要靠韩丁对当时中国细心的、卓越的观察和认识。

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跃进”全面推动的新面貌，通过如何激发农民起来互助的使人信服的描述，通过农村地区的整顿，全面了解中国，洞察毛泽东的策略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深翻》的价值更在于，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的回忆中，苏联撤走专家后一对青年伴侣的失望中，一位语言被用来为“革命”服务的人的迷惑中。

在书中，他还为我们展示了美丽的景色，尽管我们不是旅游者，但我们却与他一起步行30里到了暴风雨肆虐后的张庄，我们坐在黎明前的薄雾中喝茶、聊天，互相拥抱。我们与当年相识时还是孩童的青年男女一起，在自由市场吃甩饼、吃拉面，我们赶猪、抚摸丰收的粮食。

《深翻》意为深深地刨，把地再翻一遍，到地球的深处去翻出更肥沃、更能丰产的土来。这便是韩丁这本书最准确的主题。

张庄，前后近30来次。成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通过采访，他记录了张庄的合作化和文革的全部过程，写下了《深翻》这本书。

此外，他还帮助张庄人民大搞农业机械化，成为张庄人民爱戴的荣誉社员，长治市第一位荣誉市民。

在中国劳动人民成为弱势群体的近30年中，韩丁不断的为他们的命运呐喊，写下了《大逆转》和最近刚出版的《透过墨镜看中国》(Through A Glass Darkly) 等书。韩丁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对中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通过这些书保留了下来。他为后人研究中国劳动人民的近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阳和平

(现为外经贸大学教授)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张庄老乡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热情接待。感谢他们那样耐心地给我讲解、说明、回忆张庄曲折的历史，并感谢他们教我学会了使用中国的锄头。

同时，我要衷心感谢马厂公社、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和山西省委的领导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根本不可能在张庄进行调查，了解周围及其老百姓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在中央，周恩来总理在别的国家领导人认为《翻身》是一部很有争议的著作的时候，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邀请我到中国来。他把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看成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不愧是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我还要感谢大无畏的邢降为我们安排长途旅行。周总理逝世后，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及其主席王炳南，欢迎我继续多次地回到晋东南进行我的旅行和调查。张学亮和郭子佩为我们作了出色的向导和翻译，尤其使我们感到舒心的是他们对农民及农民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关心和尊重。坐落在北京饭店对面拐角处的对外友好协会总部是一个疲倦了的旅行者感到放松的好地方。

在美国，我要感谢兰登出版社对我多年的耐心支持，即使在这本书好像写不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耐心地给我以支持。托妮·莫里森，一位最富有同情心和奉献精神的编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才使我能埋头完成这件似乎没完没了的工作。没有她对文章各章节的顺序和合理性安排的帮助和指点，我也许早就放弃这件工作了。

我还要感谢兰登出版社的艾琳·阿和思和宾夕法尼亚州道坡顿出版社的道缇·西黛尔。她们把我难以辨认的、重复修改的草稿变成了清晰的著作。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我女儿卡玛的谢意，她陪我两次在张庄长期逗留，一直在为我做翻译。而且还自己深入了解、熟悉了张庄生活

的一些侧面，一些我通常没法进入的侧面。她对中国生活深入的、直观的理解加上她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掌握，为我打开了许多方便之门，帮我避免了许多方面的差错。卡玛和高富贵拍摄了数千张张庄人物及景物的照片。从他们丰硕的成果中我选择了一部分最有助于说明本书内容的照片。

我还要衷心感谢现在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念书、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吴宏，是他向我建议把“深翻”作为本书的书名，并道出该词的层层含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全家十几年来对我由于写作的艰辛而常常情绪反常而表现出来的耐心，和由于写作时间过长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的资金紧张和生活艰苦而表现出来的宽容。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我放下了农场的活计，推辞了各种讲座。虽然我们从未担心过下一顿会饿肚子，但却常常担心能否交得起取暖的抽费，能否按时交税，担心债台高筑。不过，我希望韩娜、韩迈克、韩莉和雷州安会觉得这些是值得的。

韩丁



致 谢

韩丁通过叙述山西长治张庄土改后 20 多年的发展，来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变迁的著作《深翻》，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为此我十分高兴。

这是继《翻身》之后，韩丁再次长期在张庄蹲点，通过参加当时农村的整风、学大寨，和走访众多群众、干部所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和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年辛勤的写作，多次重访张庄核实记录资料，完成了这部反映山西农村从合作化到文革中期社会变革的纪实文学著作。

这本书的中译版出版来之不易。自从英文原著 1983 年在美国出版后，韩丁在张庄大队结识的终身好友王金红书记，就开始组织长治当地人士李春、李书祥共同翻译该书。90 年代初，韩丁和长治的同志们就认真地校对了翻译初稿，而且韩丁还专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了前言，纠正了他原著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但是他们希望该书早日在中国出版的愿望未能实现。

去年，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海内外一批研究社会学、历史和农村问题的学者，重新校阅、校订，甚至逐段地重新翻译了全书，并付之出版。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由集体奋力 20 多年的精神产品。

为此，我代表我哥哥韩丁诚挚地感谢这些长期以来致力于翻译和研读《深翻》的中国朋友们。是你们反复钻研、坚持不懈，终于实现了韩丁的遗愿，使得该书得以在中国读者中发行。

同时，我要借《深翻》的中文版出版之机，代表我哥哥诚挚地感谢上党地区的人民群众，感谢长治市政府和郊区政府，感谢长治的父老乡亲给予韩丁深入中国人民、考察长治农村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创作的土壤。

我还要在此特别的感谢山西长治市委宣传部及范丽霞部长，感谢

长治市郊区党委及孙宏波书记，感谢长治市郊区人大常委及陈世和主任。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是难以和中国读者见面的。

Joan Hinton 孙宏波

2008年5月7日于北京



献给王金红 张文英

在这两位张庄农民的身上体现着那么多中国人长期发扬下来的优秀品质——艰苦、朴素、坚韧、顽强、勤劳、善良、热情、勇敢，富于好奇、善于思考、富于幻想、勇于创造。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两种新的，在世界其它地方少见的，对农民兄弟的信心和合作精神。只要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相信，鼓励王金红那样的男人和像张文英那样的女人，中国就一定能繁荣昌盛。

我想起马克·吐温说过的一句话：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农民也是人。在许多方面像我们一样的人。我还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发现自己也是人，然后，我想，他们会站起来要求被当人看。到那个时候，麻烦可就来了。

韩 丁



自序

没有什么事情比领导开创一个新的事物的秩序更难以着手，进行起来更具有风险，和更没有成功的把握的了。

尼·马基雅维利

为了写张庄当代的历史，我收集了各种有关的原始材料。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历时很长，还必须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了取得某些材料，得进行一二场战斗；为了保有这些材料，又得进行一二场战斗。我慢慢地消化这些材料，更加慢慢地把这些材料捏成现在这样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张庄的历史，以其不断展现的复杂性，要求作者作出回应。一条笔记一条笔记，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一页一页，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写作计划，让我欲罢不能，终至成为毕生的工作，这确实是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

从我在张庄所作的最初的那几页笔记开始到《翻身》一书问世为止，一共经历了18年时间。从《翻身》出版到《深翻》即将问世，又经过了17年时间。最后一卷《立春》可能又要花两年的时间。我的写作计划一拖再拖，原因可以说一言难尽，在此我只想说明，几次最长久的拖延，都是出于我个人不能控制的原因。我1948年离开张庄，其后五年时间都用于教中国农民，帮助他们学习农业机械技术，因此没有时间写作。我于1953年回美国，美国海关把我所做的笔记没收了，交给了伊斯特兰参议员主持的国内安全委员会。我打了一场漫长而昂贵的官司，才最终在1958年赢回了这些被没收的笔记。手上有了笔记，我花了6年时间写书，又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一个敢于出这本书的出版社：斯威奇和何波曼主持的每月评论出版社。他们在1966年出版了《翻身》。

在我写完《翻身》之前好几年，我就打定主意要回张庄去看一看，了解土改之后对那里的村民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惜当时我做

不到。美国政府禁止我旅行。因为我在1949年之后留在了中国，回美国以后又发表了赞扬中国革命的言论，国务院的西普丽女士拒绝发护照给我。长达15年之久，除了美国公民不需要护照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之外，我不能离开美国国门半步。

美国最高法院于1958年做出了标志性的决定，国务院不能因公民的政治信仰或结社而拒发护照，1964年就阿普特克一案所做的裁决确认了，即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这样的美国公民，也享有出国旅行的自由。然而这两个判例，却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国务院的护照司绕过法律，利用行政规定作藉口进行刁难，拒发护照，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去中国，而中国仍在受限制的国家名单之上。

1967年，我终于忍无可忍，扬言要控告国务院狄恩·腊斯克。护照司才有所软化，发了护照给我、我的妻子和我两岁的女儿。但是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印上了“中国旅行无效”的字样。如果我们不管它，照样去中国，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用了一个方便的作法，即入境时在另外一张纸上、而不再护照上盖印。技术上而言，美国人出入境时不需要用护照。放心了，我们于1968年初乘飞机去伦敦，通过那里的中国大使馆，要求允许我们去北京和上海。

我们一连好几个星期等待中国的答复。终于表示遗憾的答复来了：“此时不方便接待你们。”我们的感觉是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要回美国才真是不方便呢，但我们别无选择。一直到几年后我们才知道，长治市发生了武斗，就连解放军的士兵要去张庄，也得冒生命的危险。

1970年武斗平息了，全国各地包括偏远地区，都重新建立了稳定的地方政府，中国也恢复了接待外宾的能力。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决定打破中国在上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危险情况，开始恢复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接触。他们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三位美国作家联系，这三位作家是斯诺，杰克·巴尔登和我，都写过比较深刻描述中国革命的著作。他们在1970年请了斯诺，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的生平事迹的撰述者。中国政府表示欢迎我和家人去中国访问，而且想留多久就多久、想去哪就去哪。当我接到这个讯息时，斯诺人已在北京，再次对毛泽东进行访问。1971年4月，正在我们着手打理在美国的事务、安排去中国的旅行时，乒乓外交震动了世界。我们4月23日抵达北

京，在中国停留了7个月。我们本来会停留得更久，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小孩回到宾州库兹唐镇小学成绩跟不上而回国。在这7个月当中，我的女儿卡玛一直陪着我们，她在北京出生，在中国生长、受教育，英文也很过得去，在她帮助之下，我们得以一层一层的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如果这本书道出了真实的一些复杂纤细的纹理，主要应归因于她的参与。

在这7个月内，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周恩来总理到处为我们开方便之门：在北京二七车辆厂，我们留了5个星期，我还在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清华大学，我们停留了18天时间，访问对立的两派学生；在山西中部的大寨，我们赶上了7月份最热的日子，在那里下田劳动、爬山，和大寨大队书记陈永贵多次会谈；最后在张庄村，我们伴随着负责整风的工作组，一直到秋收结束、为准备明年种植庄稼进行深翻为止。

我们此行看到的、听到的，实在不可能全部吸收。光是思考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足以占用睡眠以外的全部时间了。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段非比寻常的动荡岁月，而同时我们还要对1949年以来这一整段历史进行补课。离开时，我带回来十个厚厚的大本子，每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笔记，我还带回来一个脑袋，塞得满满的，都是所见所闻的种种印象，其中有很多是互相矛盾的。回家之后我写了《百日武斗》，描述了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历程。

我还把五次访问周恩来的记录汇编成一个小集子，名为《与美国人的谈话》，但关于张庄的材料，却比较难以转化为成品。我们听当地官员的介绍讲的一套一套的，但与我们看到的实况，和在别处听到的说法却似乎有差距。文革的争论几乎总是导致对语句的意思的完整性的严重削弱，导致广泛的概念上的弄虚作假。人们胡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语，往往仅仅是为了拿它们作为公然背叛原则的遮羞布。“无产阶级”一词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们，不用说，已经堕落成为“帮”了。“搞革命”的意思就是由我夺权；如果你夺了权，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谁当权，似乎总是能用最革命的词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过一阵，人头全变了，但庄严承诺、信誓旦旦的口吻，却一成不变，包装其说法的理论外壳似乎总是滴水不漏。这些当事人

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他们知道选哪些词句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发现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来评价所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找到一个适当的讲述这个故事的形式。我着手写了几章，讲的是紧接着土改后的一段时期，后来就给自己的词句绊住，再也写不下去了。

1975年我有幸再访中国，这次是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理事的名义去的，行程为期一个月。虽然这次没有机会去张庄，但我在北京碰到了两位张庄大队的干部，谈了好几个小时。1977年我又去了张庄，在那里住了两个半月；1978年在张庄两星期；1980年又是两星期；1982年10天。这几次访问，带给我新的视角和领悟，再回来看1971年的材料，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了。此时中国的党和人民已经开始重新评价所谓“失去的十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讨论帮助我界定了一系列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复杂的文革阶段，就似乎不是那么神秘费解了，即便对于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矛盾还不一定能一下子就搞清楚真相。到了1978年，有利于冷静分析的气氛取代了早几年的狂热，有的人开始有勇气实事求是，闹剧就说是闹剧，栽赃就说是栽赃，谋杀就说是谋杀。虽然政治的钟摆不久又摆过了头，流行的种种极右观点，也没有多少客观性可言。但摆动本身就有利于通过反思形成新的视角，帮助人们看问题更加全面一些。

1973年之后张庄人民富起来了，这样的变化对于认识问题也是有帮助的。生产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人们更愿意畅谈过去的事情，作总结时也比较少带偏见。不需要因为事情搞糟了找一个替罪羊作为批判的对象，人们学会了放松，甚至在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不幸的事情，本人自己也会笑起来。也有些人由于担心再度引爆派系矛盾，不肯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语言只能撕裂开旧时的创伤。

《深翻》继续讲述《翻身》所开始的山西省的张庄村的故事。《翻身》讲的是这个村子从日本占领到解放进行土改，推翻几千年来地主的剥削统治。《深翻》讲的是中国农村分田以后，农民进行合作社运动的故事。

土改是急剧重新分配财产的一次风暴，它为村民自治铺平了道路，而合作化运动则与此大不相同，它是被当作“百年大事”来进行的，它的向前发展是非连续性的，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在混乱中倒退，甚至陷于停顿，接着又恢复前进，势不可挡，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例如有的生产队，甚至在一个县的范围，1952年以来产量增加了十倍，全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优劣截然不同，发展不平衡，时而跃进，时而陷于停滞甚至说垮就垮，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最近几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单位成绩不错，但另外约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或者领导犹如封建土皇帝，或者大搞平均主义，或者就是不懂管理、瞎指挥，以致长期落后，其中不乏每年靠吃国家的贷款、补贴过日子的。尽管困难重重，多年以来，国家领导人，至少是在表面上，还是能维持坚定决心，致力于克服主客观所存在的一切阻碍农业发展的的问题，培养出一个极其庞大的农村干部、积极分子的队伍，其中很多人为了确保集体所有制的运转，终年孜孜不息地献身工作。本书中描述了一个个男男女女的故事，其中大多数都是这个庞大队伍中的积极分子。

《深翻》描述了张庄的劳动者，如何从开始不协调的互助，逐渐学会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农具集中起来，创建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又如何和别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称为公社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张庄村民在全村都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如何尝试了一个跃进。他们开始用本地的矿石炼铁；用自己的双手修筑水坝、水库和铁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纪录的高产。结果却是大旱烤焦了田地，庄稼歉收，副业破产，生产单位太大、太集中，难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

接下去，《深翻》描述了60年代初，自集体向个体的倒退，其后重新大干合作社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张庄的农民动员起来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全力投身于改变这个世界；运动造成了村民分裂，形成了铁杆的两派，为了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积极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内战。它还描述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如何地强行维持一个扭曲的和平；而党员们又是如何地尝试团结群众和干部，恢复基层正常的生活；和重新推动抓生产的运动，然而他们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最后，《深翻》描述了1971年秋天当地和全国范围的深刻的危机。文革半途而废，毛泽东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越来越坏；林彪死了，周恩来遭到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的攻击。张庄的派别斗争趋于平息，但分歧还将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警钟还在鼓动新的对抗，老百姓却热烈不起来，步履维艰地迈入新的十年。

到了1980年，所有这些问题都严峻到了必须正视的地步，其中一些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第三本书《立春》将描述张庄的村民如何重新组织起来，新、老积极分子如何团结村民分析生产搞不上去的原因，领导集体在农耕、农机、小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张庄，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爱闹分裂的、偏远落后的农村，转变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大队。《翻身》、《深翻》，和《立春》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中国北方的小村子从1945到今天的一部纪实历史。

张庄历经30年的时间，发展到今天这样有生命力的形式，与此同时，也从过去的“东亚病夫”转变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崭新力量，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美国不仅必须和他交往，还必须寻求共同的立场，否则就会轮到我们美国人在世界上处于危险孤立的地位了。这也是有必要出版《深翻》这本书的原因。寻求共同的立场，首先要求一定的了解。我研究和描述张庄的主要目的，还是和当年写《翻身》一书的初衷一样，通过解剖一个小村，显示仍在继续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实质。人们不禁会问，张庄的小天地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国革命的实质吗？张庄的发展所体现的是普遍的还是独特的经验？就像当年土改时期一样，政治的经验既有普遍性也有独特性。

1945年的张庄，从地主到雇农，都和大多中国农村一样，具有相同的阶级结构，也因此面临典型的、严重的土地租佃的问题。而同时不同于一般农村的是，它是一个有很多天主教徒的村子，又是一个为日本所占领的村子，此外它还是一个一夜之间从外国占领和地主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村子，转变如此之快，让谁都感觉措手不及。这些特点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村所没有的应变能力。在后土改时期，这三个特点对当地的发展的影响，很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代之而起的是后果复杂的工业化和城镇范围扩大的问题。张庄离长治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地。四周农村地区有储量极大的煤矿和储量不小的铁矿。1949年之后，省里领导人决定把长治发展成工业城市。他们重新划分县界，让市政府能控制几个主要的煤矿，并拥有建设轻、重工业用的平坦的空地，再加上与外地连接的公路和铁路。从那时起至今，长治市的工业产量已经翻了数十番。原本属于山西潞城县的张庄，基本上位于长治的新工业区之中，因此工业区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张庄村民生活的每一方面。张庄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土地，但也得到了很多有利

的条件：产业工人的粪便、厨房倾倒的垃圾，一个近在咫尺的市场，它可以容纳张庄生产的全部的砖头和蔬菜，搬运、交通、工厂雇佣合同工等等，提供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多年以来村民的非农业收入一直远远超过耕作的收入。

如果说1948年的张庄可以被认为是偏远隔绝的中国农村的典型的话，今天的张庄就可以被称为中国城市四周迅速发展的工业郊区的典型。而这特点就比朴素原始的农村更能贴切地反映整个中国变化的实质。如果说土改，作为一个农村的运动，为当年的张庄定了调子，今天的张庄就正在饱受中国现代工业迅速增长带来的各种复杂的潮流的冲击。文革就是最令人震惊的演示。从北京的大学开始，扩散到各地城市的大、中学，然后冲进各地的工厂，等运动到达农村时，往往就失去了势头和能量。在张庄却绝非如此，因为它已和城郊相连，因为一间中学已经迁入村中心地带（就在原天主教的孤儿院的旧址），中国首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张庄的运动就爆发了，而且在今后多年的张庄生活中，文革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当长治的产业工人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张庄的农民就加入雇佣他们干合同工的矿、厂中的掌权的派别，矿、厂一旦产生了对立的派别，他们立即就把矛盾带回村里。村子成为工人、学生用手枪、步枪和手榴弹等热武器进行武斗的战场。光是自卫的需要，也就足以使得很多村民自己动手制造武器。

一般的规律是市郊的农民比偏远农村的农民更加持续地、积极地参与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张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让人们看到为时代打上中世纪烙印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承诺和怎样一种冲突。

今天的张庄肯定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它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村，是一个农民组成的共同体，以家庭为中心，受传统的约束，然而也极富创造力，热情洋溢的寻求改变。我不能不对当年那一个历史性的偶然感到欣慰，因为它把我送到张庄，而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我选择了它，因为它是一个距离北方大学最近的基地村（即工作组的驻地）。我可以步行，早上去村里开会，下午走回校园教课。几个星期之后，我到了张庄，才发现大学已经搬到数百英里之外。我就留下来了，留下的时间长得足以让我看到土改运动的全面掀起，也足以让我深深的喜爱上了这个地方。从此，我关注张庄人民的命运，密切的程度一如我关注在老

家最亲近的朋友和邻居的情况。另外，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农业的农民，我为张庄农民所渴望的农业技术的变革，作出了一些贡献。我们在一起制造了粮食烘干机、灌溉设备、新式的耕作工具和种玉米用的整套农机设备。1981年那次去张庄，我给支部书记带去了一个小型的缆吊装置，我们在美国称之为“跟着走”。经过40次的实验之后，张庄的农机手解决了当地制造的技术问题，开始为上市销售而生产。他们在全国打广告，为他们称之为“斑马牌起重器”产品促销。由于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双向的，我们的交流年复一年，越来越深刻，人们对我打开家门和心灵的窗户，我也不仅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外表形态，而且还能了解一些从内部塑造那些形态的感情的源泉。我与张庄的特殊关系，构成了编织本书的经线，但也造成了一些它特有的问题。社会研究似乎也有某种类似海森堡原理的规律性。根据该原理，我们无法同时测量一个基本粒子的速度和质量。正如在物理学中，观测一个粒子必然会影响到原子的运动，在社会科学中，研究一个群体也必然会引起它的改变。在张庄这一个案例中，改变主要出于来自上面的干预。

自从村子因《翻身》而知名以后，山西省和晋东南地区就特别关注张庄，一次又一次派工作组，企图打破60年代和70年代初张庄所处的政治和生产的困境。在我们1971年访问之前，他们突然撤换了村里主要领导，把全村动员起来，从铁路工地取回煤渣，铺在遇雨即泥泞不堪的路上，粉刷民居的围墙。他们还说服几十户农民买猪回来养。他们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模范的社区，但除了有几条比较坚实的路，十几二十面新粉刷的墙，新添一两头猪之外，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见到成效。张庄的人一如既往地、快快活活地过他们的日子，干活也许不那么起劲，但在本村戏院上台唱戏，可真有声有色。从外面派来的干部，没有足够的实用知识，来分析、判断真正造成生产停滞的因素，更不用说去克服它们了。外来的工作组所能做到的，是让村民都有机会发牢骚、吐苦水，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心态。当张庄人齐心协力行动起来时，动力是来自内部，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资源，他们采取了创造性的办法解决问题，这是上面的领导不可能想到的。如果说上面来的干预从长期而言，并没有使张庄转变成一个样板，但的确还是对这个村子在很多方面产生了不易估测的影响。如果《翻身》这本书没有问世，我不敢说作为我们调查研究

对象的这个村子，会和今天的张庄基本相同，而有鉴于干预的必然发生，我也不能说本书中任我自由地研究观察的个人，没有因之受到影响。闲话传的很远，往往会在所及之地带来原不应有的却令人尴尬的影响。书中很多人，我不得已替他们用了假名。只有那些老一辈的男女人物，人们从《翻身》中已经读到过他们，还有一些他们的子女，由于他们的长辈对本书的叙述比较重要，我们使用了真名。所有其他的人，所有在最近几年起了带头作用的年轻人，我们都一概使用假名。有些在文革中派别对抗中影响较大的高层次的活跃分子，我们也使用了假名。由于有关文革这个不寻常的时期的所有的报导，都可能带有偏见，我极不愿意因为把一些个人和一些极端的事件联系起来而影响他们的事业和前途。至于那些争议性比较小的公社、市、地、省一级的人物，就让他们以真名实姓出现。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争议性，都很难采用匿名的办法。何况本书也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别处没有公布的独家报道，我因此决定该报道的还是报道。

我认为，不能因为有上面来的特别的投入和其他的特殊情况就做出结论，判定张庄不是一个很适于研究中国农民生活变化发展或至少是城郊农村变化的地方。当然，人们还是能质疑，仅仅通过访谈、观察和偶尔参与社区生活和工作，究竟能否深刻描绘出这个社区的真实图像。在《翻身》一书的序言中我写道，书中所描述的历史的细节不一定全部真实的话，它的主要的内容和所反映的精神还是包含了真理的。至于《深翻》的内容是否也是如此，就比较难说了。我在这里最终汇集成书的肯定不能算是有关张庄的一部一言九鼎的历史巨作，它毋宁只是将人们的回忆汇集起来的口述历史，大多数提供回忆的人，都是基层的小人物，他们参与了1949年之后的农村重建的工作，亲历了此动荡的年代。由于每一个提供材料的人都是陈述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他们的说法有时难免互相矛盾。由于本书的故事跨越很长一段时期，也就不免留下许多有待补齐的空白。由于我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也不能补足所有的空白，书中的故事有时会给人不连续的感觉，然而每一节都反映了所回忆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几个原因使我认为，这些章节所描述的故事，综合在一起，也许不能像土改时期所汇集的材料那样比较全面的反映真实的情况。首先，《深翻》一书的背景，就远不是《翻身》的背景所可以比拟的。为了说明白张庄村内的

政治，就必须描述张庄四周地带、市、地乃至省里的有关情况。视角越广，就越可能发生扭曲和失误。讲地区的情况，就不可能像讲村里的事情那么细致和全面，更不用说讲省里的事情了。

此外《深翻》的时间跨度也远比《翻身》长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风向改变了，人们对于所经历的事情的态度也改变了，至少是他们愿意提供的说法改变了。当党推行一个政策时，人们拥护它，等到党开始批判这个政策了，也就不再那么热烈地拥护它了。互相抵触的故事不仅可能来自不同的个人，而且也可能反映了同一个人先后不同的态度和说法。

之所以前后态度变化如此之大，一个原因乃是由于对土改之后应走的道路缺乏全国性的共识。这和当年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历时超过一个世纪，推翻了封建主义，粉碎了外国干预，过程中涌现了一系列的杰出的领袖，最终出了个毛泽东。他们为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各阶层亿万人民参与了这个统一战线，因为他们一方面痛恨地租、剥削，反对腐败的地主、乡绅；另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的统治。虽然在干部执行时，也会因左右摇摆而造成政策的扭曲（在一个层次上《翻身》主要就是一份关于左右摇摆影响政策过程的报告），谁是需要打击的敌人，谁是必须争取的朋友，那些封建财产必须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需要保护，根除何等封建文化、创建何等民主文化，这些问题是十分明确的。任何人想要总结内战之后土改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都能借助同一个理论镜片聚焦观察共同经验所累积的知识。我不必为《翻身》打造一个周知自治的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通过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它的确能反映我所经验的现实。

1949年之后，还没有人能打造一个类似的政治共识。新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立即进入一个新的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显然他并没有能说服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同意他为这个阶段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或为它指定了适当的纲领。看起来，他也没有得到足够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同意。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农民打心里拥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但是有证据显示除了北方老解放区以外（那里早在1948年就进行土改，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而合

作化是靠显示优越性一步一步扩大的), 人民群众的反应并不坚固, 有时则流于空洞。整个南方地区大量南下干部涌入, 他们搞合作化运动, 往往太急、太快、太死板, 过于强求群众的接受和运动持续的成长。

1949年以来, 缺乏战略共识, 对于中国的建设, 影响至为巨大。后土改时期, 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 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 但是由于没有共识, 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 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 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 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 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 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 客观而言, 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

1949年之后, 非原则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左右摆动。和1949年以前相比, 斗争的性质改变了, 不再是为了领导革命运动的权利, 而是为了争夺统治国家的权力, 这个差别使得个人和集团间的冲突变得格外尖锐, 不久就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了。随着政府机关越来越具有传统官僚体制的所有特点, 中央集权、权力不受制约、只对同僚长官负责等等, 这样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发生。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 有野心的个人, 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 下面就不管好坏, 统统解散, 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 下面就大搞粮食, 林、渔、牧、副统统不管, 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

本来是旨在小幅度纠偏的措施, 到了村子里执行政策时, 就变成刮台风, 路过之处, 所向披靡。当上面又来采取补救的措施, 即便原意很好, 下面台风过境的灾区, 不免又要刮起一场反向的风暴。在中国, 这叫“一刀切”。刀落之处, 即便是最基层的生产队的干部, 也往往不得不争相搞攀比。难怪农民都得到一个结论: 要想“客观”, 首先必须摸清风向。

今天中国的政论家们指责说, 过去政策失误的根源, 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里, 特别是党的领导人还有太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他

们说之所以有这些落后的思想，是由于他们“农民”的出身。但对一个局外的观察者而言，显而易见的应该是：鲜活的、体制性的封建主义仍在以各种明的或暗的形式，时时刻刻强化“封建思想”。这里首先必须正视的是庞大的政府机关在对待问题时，几乎和历史上各朝代的官府的反应一模一样。巩固政权和维持领导的特权和威信，总是最优先的。甚至可以说今天中国种种对抗冲突的根源在于政府机关本身的性质和形式，它是士大夫统治制度的现代版，为民做主，所有的事物无一不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个理论，对于历经革命动荡的一代人，实在太不堪设想了。还是将落后与停滞怪罪于农民，怪罪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带进来的农民思想，设想用现代教育来治疗愚昧，这样的思路让人舒服得多。

毛泽东的倾向显而易见的是把责怪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他这种观点引出了一整套理论难题，涉及范围太广，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审视的。

我的意思是，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认识上还存在着混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策，尖锐的冲突将继续存在。冲突不仅涉及策略手段问题，更还涉及基本的战略问题：中国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国现今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劳动人民应该和什么阶级、阶层结盟？是否还有敌对的阶级或阶层？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谁？

要为过去30年写一部能做出定论的历史，就必须要从思想的混乱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必须发展出一套理论，足以全面的解释事实，所有的事实。很明显，提这样高明的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也许还需要整整一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学者们的努力，才能厘清这30年历程真实的意义。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细心的聆听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尽可能避免来自过去的经验的偏见和干扰，然后把看起来最有意思的部分写下来。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抛砖引玉。如果这本书，这个肯定有不少谬误，甚至会被中国人视为不自量力的关于张庄的报告，能引起中国的某个人，写出一本关于某一个村社的编年史，而且理所当然的是由本村的村民写出来的，作者和村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意识到复杂的关系网中每一个细微的因素，前进（也可能是再一次的倒退）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妙的转折和

扭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将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我很关心合作化运动的前途和众多村民的命运。在目前，一些个别的村落，包括张庄，搞得比较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总的来说，这个运动，因为受命令主义、消极停滞之害，正处于涣散、溃退的形势之中。大寨大队多年以来一直是自力更生、为公精神的典范，现在却遭到了基于可疑证据的批判，说它受到上面的补贴，成绩都是假的。人们过去把合作看成通向解放的道路，现在却指责它是共同贫穷，是“吃大锅饭”。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梦想被一个老旧的法则所取代了：必须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个法则，过去曾经让亿万人民吃尽了苦头。

在土改结束的时候，我写出了我确信为真实的看法：农民逐渐学到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道理，“任何个人，只能通过参与共同的斗争，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通向一个人的翻身的道路，存在于通向所有人翻身的道路之中。”最初是中国北方的几户农民开始，自发地靠“三条驴腿”或“五条冲垮的沟渠”等组织合作生产，30年后的今天，国家的领导人抓住内地农村的落后、停滞做文章，质疑合作劳动的基本理念。他们正在大力推行新的生产制，把物质刺激说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正在鼓吹让个体承包土地、牲口和农具，盈利、亏损一概由个体负责。将近30%的农民，都在当地搞了土地承包制以后，不得不离开土地，搞家庭手工业，或者沦为路边卖东西的小贩，一旦到处都挤满了小贩时，乞丐还会远吗？

我的写作过程开始于许多年之前，当时的初衷，是想描述与土地密不可分的人们，逐渐学会以合作代替竞争，寄信心于群体的行动，和发扬先公后私的精神。在官方的优先秩序突然逆转之后，《深翻》和《立春》可能将被证明不是原来所设想那样的挑战性的史诗，反倒有可能，被证明是一部会让读者感到不安的纪实，因为他们记录了合作之梦由兴起到没落的过程，因为它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社会变革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故事。

韩丁

1983年于美国宾州弗利特坞

序

我非常高兴《深翻》的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由山西人翻译的《深翻》出版了。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大。一个作者很难想象他的作品主题和故事的主人翁反过来又一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重新创造的文化正是本书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别的什么，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别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笔、录音机或计算机。开始为后代记录他们自己个人的、家庭的和和社会的历史，告诉他们那些丰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惊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跃的、无法预言的，然而却是值得记忆的复杂的事情。

山西人民，你们的生活跨越了当代历史中最关键的、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在你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整个世界去学习的地方，你们不去记录、捕捉你们的过去，还有谁？

从字面上讲“深翻”的意思是深深地翻土，没有别的意思。但我用这个词去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和公社的建设者们所进行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伟大的和深刻的重建。

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时间，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和获得收获的季节的间隔时间太长，以致在任何基础上都失去了刺激，而个体责任制则不是。合作者们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联系。由于缺乏刺激，导致了质量不高的工作，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

委婉的说法，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数额。至今为止，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

现在，无论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大锅饭”。现今大家一种时髦的说法，好像是长官——如果不是通过武力就是通过命令把农业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从互助组开始，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的，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

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描述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过程中的经验。《深翻》清楚地告诉人们：是个人刺激，而不是否定个人刺激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水平上，各家各户在同等的交换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每家每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拉别人一把。

实际上，使彼此的义务都一样有时是很困难的，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也会与标准不符，对人力的估价也有某些主观因素。但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它的名字所表示的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就更明显了。

后来，农民们一旦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建立了更高级的合作社，他们分配集体的收入就要按工分——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自从村里实行了小队核算，由50—60户组成的生产队就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锄多少垄地，拉多少车粪，犁多少地，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的满工作量可得10分。因为工作不能作为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打分，所以小队根据

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对所得分进行了划定，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小队会计有帐，等到分红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这样被分配的总数并不是除了包括各种税款在内的支出的全部收入，而是除了留存的公积金和包括福利、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帮助款在内的公益金以后剩下的部分。

这样，虽然象张庄这样的村对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了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

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财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力，对病人和老人都得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领导不力的大队的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够生存下来的食物。这时，福利就以口粮的形式按人首先付出，而满足这种最低要求往往要花掉所有打下的粮食和所有挣来的现金，所以，根本没有剩余去奖励出色的人和从事技术的工作人员，这样在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同时，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平均的一份的懒汉们没有一点惩罚。士气呈螺旋形下降，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事情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他们的很好理由。合作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物质刺激的基础上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可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公社和小队重新组织起来，走由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拔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克服困难，组织起全村人，集体改造自然，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使家乡改变面貌，继而全县也变了。

离大寨虽然很远，但也受到了影响的张庄，是一个试点。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的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慧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农业三十年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的研究总结到：30%的大队搞得很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农民起码能保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讲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一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二亿四千万搞得不好，似乎很明显，原因并不是合作化与农业相结合有错，而是领导得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是任何可以使农民对其必要性和正确性予以信服的农民生活和农民经历。

由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些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完整的形式，向更高级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那么，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

正象毛主席预想和指出的那样，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危急中，靠老天空支配波动的市场的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

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毛主席的见解是辩证的，它规划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他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着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方向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 this 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的、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成了包括全县在内的大农场主了”。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无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互助，这种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轱的村，几户分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应实行劳动力和价值同等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地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但开始在一起劳动，困难的决定就来得多、来得快。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的大多数。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新的

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部分，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分配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最后，根据出色的劳动和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社员们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分配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投入转向平衡的反映。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并最终推翻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比例分配，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自己的财产，可能现在根本不劳动的人身上，这样，就形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也站在了耕畜集体化一边。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的互助阶段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对生产过程中关键环节牲畜个体所有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借给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它们借出去，就可换取大量的劳力交换，数量之大，以致他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这样，与“按劳分配”的原则相差甚远，这更像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集体喂养，集体管理。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

国家的最低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的不断的进步，给了农民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安全后盾，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在集体达到建立公社核算(是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体人民的富裕相距甚远)的必要的广泛的繁荣之前，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到那时，并没有任何地方具备公社核算的必要条件，更不用说全民核算了。实际上，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是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对一个集体给另一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他们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为无损于公社的任何部门的合并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象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所有土地，公社也不行，我们也许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这样说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给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更上一层楼施加了压力，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

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生产力、公积金、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的人的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毛主席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砍伐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毛的观点远不止一个方面,是很全面的,是综合性的,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大队中,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的一些搞了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也是绝大多数仍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像搞个体生产,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由于分开了耕地(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由于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由于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生产出售的食品间不合理的比例,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的更糟,两极分化只能加剧,经济萧条只能加深,“面条地农田”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深翻》澄清了一些当前歪曲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合法性和其历史的错误观点,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歧的性质上,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给出清晰答案的却很少。

“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本身

并没有什么问题，即使也没有。我在书的163页写道，“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否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采取什么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着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的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尖锐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到，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是因为，它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象党外一样的多面体的社会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与党共生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联合在了一起，随着1949年令人振奋的胜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实际上只是暂时由几十年分散的政治、军事战役联合起来的形形色色的阶级分子组成的联合体，由于未来目标的不同便分裂了。只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心的议事日程，并反对所有的攻击来保卫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的觉悟，为更进一步改造寻求新的办法。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阻力和对手。最初来自中央的一帮较保守的人，他们认为应该超出外部监督，自我整风，不必把自己置入人民的群众运动中。这帮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统治集团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和结果问题上，在一系列尖锐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到，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一般的教育和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被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目的在于从下面整顿党的党外人民群众运动。

毛关于“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的总结是令人吃惊的，前所未有的。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的、未知的、充满困难的、不能保证取胜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也只有很少人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较有政治觉悟的，象张庄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了个人以后，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我从不可能想象的一种变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外衣才一层一层地脱掉了，于是我开始明白毛所提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的探索，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尝试这个而反对那个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像一句“名言”的作者所善于朗诵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一种不关心政治的概念，并没有告诉要过哪条河），相反地，是一个逐步去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的完整计划的有意识的贯彻。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

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点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淹没它，然后取消与之有关的所有结构。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完整的一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内地改革为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即使是一条龙，也不能希望与海龙王夺珠而取胜。

拿出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见识，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评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同样，对于当前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主要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说法也会与从前看法大不相同，我会对毛在庐山的斗争，对毛与他的批评者间冲突的结果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同样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大事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偏见，他坚决地支持主要的内容，要推动大跃进。我还将更加积极地去评价文化大革命，更加积极地去评价毛的一生的工作，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晚年他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最大、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辩证法探索得最深。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已结束。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他给予中国的见解，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出现。毛主席有揭露不断前进中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核心内对抗性阶级斗争的洞察力和勇气。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人民群众这个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预见它的规律，为了让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毫不例外，先锋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

我希望《深翻》对这些观点已经讲的很清楚，很有说服力了。如果是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的

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会有机会把这搞些清楚。以前我说过第三部不再叫《立春》，而更名叫《分山》，它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

威廉·赫丁

一九九三年六月



导言：山西，牛皮灯笼之乡

门套门来关套关，里里外外是青山。

— 山西古谚语

古人云：“得上党（地处山西东南部的高原）者，得天下。”山西省以高山险阻为铜墙铁壁，宛如坚不可摧的堡垒，自古易守难攻。要想冲上崇山峻岭夺取制高点可谓难上加难，但要冲下山去直捣平原则是势如破竹。高山险阻赋予山西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使其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山西集险峻的关键和诱人的物产于一身，中部是盛产粮食的肥沃河谷，四周环绕着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地下则蕴藏着丰富的煤、铁和其它贵金属矿。历来群雄盘踞于此，安享天然屏障拱卫的独立王国。

不管是不是独立王国，山西都算得上是中国形状最规则的一个省。两条边平行相对，另两头向西南方呈同一角度倾斜，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样的一个形状，是由自华北大平原一直不间断延伸至西边的黄河大谷地的南北走向的、摩肩接踵的山脉所决定的。

整个影像与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系如出一辙。从新泽西北部的波科诺山脉开始，阿巴拉契亚山系向西划了一道大弧线进入宾州，再向南经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直至佐治亚。中国北方的山系也是一样的杰作，从山海关的海边升起，向西扫过北京，然后折向西南直至河南。这道弧线的东部和南部是低地，和大西洋海岸平原相仿；其西部和北部则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跨越宾州和阿巴拉契亚高地的山脉相仿。

但是，如果说两处山脉的地理相仿的话，山脉本身却长得不一样。

山西的高山，尤其是东部的太行山，样子和世界上大多数的山脉不同。他们仿佛中世纪的城堡。从底部升起的陡峭的崖壁，顶部变成被稀疏植被覆盖的岩石层，其上又再度升起新的峭壁。就这样层层峭壁向上突起形成一系列巨大的阶梯，直冲云霄，仿佛献给诸神的巨型婚庆蛋糕。世界上大多数山脉底部坡度较缓，到了高处坡度才逐渐变陡，比如阿巴拉契亚山脉就是这样。但太行山是垂直拔地而起，一层一层直到形如圆顶的最高峰。这些圆顶高峰看上去常比支撑它们的地基还要硕大。这种头重脚轻的外形超凡脱俗，仿佛更应长在月亮或火星上，而不是地球上。

把山西和河北分开的山墙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突兀感觉，更像丹佛以西的落矶山脉，而不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中国，平原和山脉之间的界别更慑人心魄。在科罗拉多，大陆坡要缓缓绵延几百英里才能升到海拔一英里的高度，随后巨大的山峰再耸起一英里。在华北，巨大的冲积平原直到与山脉相接时都还几乎与海平线持平，随后城堡式的山峰突然直冲云霄，高度达九千至一万英尺，形成一堵高墙，其气势胜过落矶山脉任一处地方。

在这堵高墙整个长度的西边，就是山西省。要从这堵由峭壁和高峰组成的边界上的高墙进入山西省，必须找到其仅有的几个缺口。这些峭壁和高峰只是较为平坦的高台的外围护栏而已。几条公路沿高山蜿蜒爬行，途经让人叹为观止的大峡谷，才能到达高台世界。这时，一英里高的山峰已经从视觉上转变成高原上隆起的小山丘了。

向西穿越山西至半，高台一分为二，其中一个下降并再度穿越让人叹为观止的大峡谷，到达汾河谷地。这条汾河把山西的低处分成多多少少面积相同的几块。汾河向西南流经富饶的农业谷地，终止于无法通行的黄河大峡谷。在汾河西边是比东部的太行山脉还要高大雄浑的吕梁山脉。汾河谷地于是形成一条肥沃的薄丝带，缠绕在山峦之间。这些山峦如果不是因为大半被黄土包裹的话，将成为荒无人烟的沙漠（黄土是从中亚沙漠吹来的土壤经无数世纪沉积而成。土层厚度从几英寸到几百英尺不等，只要有足够的降水，种子可以在这里发芽并成长）。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地处汾河上游地区，周边的山坡上是有灌溉设施的稻田、果园和酿酒园，地下则有数不尽的煤矿。在山西，条条

大路通太原，但从太原发散出去的公路能通到哪儿则没准儿。沿黄河向下游走，大峡谷阻住了向陕西高原的去路。向上游走是与内蒙古相接的芦芽山、五台山和馒头山。不管朝哪个方向走，要想抵达人口稠密的文明地区，都必须穿越无数的关口。

最近一位想要在山西建立独立王国的是一个姓阎的军阀，名叫锡山，听起来像是把“山西”倒过来念，但实际上的意思是“锡的山脉”。他统治山西省38年，先后将袁世凯、蒋介石和日本人拒之门外。当日本人把他赶出山西时，他还控制着南方数县，随后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英雄般还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农民战士，在无地、少地和仅拥有小块黄土地的农民的支持下，比任何军阀都更有效地利用了山西的山地优势，到1949年终于壮大到把阎锡山碾碎的程度。他逃到台湾，带走了几飞机的金条。飞机从河北冀县上空飞过，当时我正巧在和首批解放区拖拉机培训班的学生开垦荒地。当学生们看到飞机飞过时，一边乐得看到阎锡山终于滚蛋了，一边对他带走了本地区这么多的财富感到气愤。他们朝空中挥舞着拳头。

阎锡山离去后，山西转入共产党及其地区战略家薄一波领导下的贫农、中农、矿工和铁路工人等“老百姓”的手中。薄书记，根据批判他的人的说法，又把山西变成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

独立王国为文化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山墙之后的山西人民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甚至如有些人所说，像山西的地貌一样反常。

党委书记薄一波告诉杰克·贝尔登：“山西人民……被称作牛皮灯笼，意思是他们外面不亮里头亮。两千年以来，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节俭、勤奋和吃苦耐劳。从外表看，他们胆子并不大，而是软弱、畏缩和胆怯。过去，其它地方的中国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叫他们‘老西’。”

“但实际上，这些人一点也不胆小。他们做生意很在行，眼光也不是一般的长远。他们订的计划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辈子。”^①

这些牛皮灯笼们盖房子的方式反映出他们的长远眼光。他们盖的房子比其他地方盖的要大，要好，要更耐久。他们会不假思索地一辈

^①杰克·贝尔登著《中国震撼世界》，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49年，第49页。

子勤俭节约以便可以有积蓄用来修缮房屋或是最终盖上新房子。“如河北人手里多了一枚硬币，他们会用它来买点吃的。如果山西人手里多了一枚硬币，他们会把它存起来盖新房”，旧民谣如是说。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山西人不会在河北人住的那种低矮的土坯房里养猪。当然，在这里地形是个决定性的因素。洪水时刻威胁着河北平原，淹没甚至冲走人们所建造的任何建筑物。在山区，则是石头压着石头，很坚固。

许多山西的住宅高一层半。这个“半”层是一个可以让人站直身子的阁楼。在一些村子里，农民一直住在其他地方只有地主才能拥有的两层高的石屋里。在昔阳县，以大寨大队为榜样，农民靠手工把花岗岩砌成拱形的石洞屋。这些石洞，一层堆一层，耸立在山坡或山顶上，整个建筑好似现代的雅典卫城，既漂亮又坚固。当被问道这些彼此相接、层层相叠的拱形建筑物能用多长时间时，他们回答说，“两千年。”而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它们会坚持不了一万年。

出于对房屋的喜爱，山西人喜欢待在家里。但这种嗜好在实践中容易加深孤僻和古怪。有些山西习俗让人觉得怪异，有的则根本就是危险的。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到1971年时，中国有18个省份里只有山西的人口不超过两千万。这主要是因为生育的方法不当导致母婴一同死亡。从那时起，医疗队一直在劝说山区的妇女，坐着生孩子和产后十天只靠清汤补身子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在饮食习惯方面，也能让人注意到古怪之中蕴含着危险。山西人主要以小米和玉米面为生，但山西却被誉为面条之乡。他们喜爱面条，尤其是在节庆的时候。山西人已经发明出了一百多种做面条的方法。其中一种常被提及却很少被演示的方法，是把一个大面团放在头顶上，然后用快刀将其一丝一丝削入沸水中。拉面同样蔚为壮观。厨师用双手把面团拉成一根绳，然后把绳子中央以闪电般的速度掷向地面。就在面圈即将触地的一刹那，厨师两手相交，面圈的两端相交又变成了一条面绳。这一掷一拧就把面团弄成了有利于拉的形状，也就是说，甩出去，折回来，再甩出去，再折回来，直到变成可以相互分离的众多长条为止，然后扔进候在一旁的锅中。

当山西人吃厌了面条时，他们还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面饼。其中最奇妙的就是甩饼。做甩饼时，厨师用两头尖的木质擀面杖把擀好的

小面团挑在空中旋转，直到它变得像意大利比萨饼一样又大又薄，然后将其拍入炙热的平底煎锅中，熟了之后裹着驴肉吃。

在山西，没有人吃面条、面饼、驴肉或其它食品的时候不蘸很多醋吃的。这种醋黑得象机油，闻起来又象发了霉的干草，中国其它地方都搞不到。山西人外出的时候会带上一瓶醋，吃完了就结束旅程。他们觉得本地产的醋的香味难以抗拒。据民俗上讲，山西妇女难产的时候，只要有人在旁边把一瓶醋的塞子拔出，婴儿就会立马呱呱坠地了。

军阀阎锡山统率的晋军的士兵因其腰间配备的三样东西而臭名昭著——手榴弹、子弹带和醋瓶子。如此的配备令他们在战场上使人畏惧。如果夺走他们的醋瓶子，子弹脱靶，手榴弹击不中目标，那么他们开小差的几率就会灾难性地上升。

由于在中国“吃醋”有对配偶不忠的意思，山西人因而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但这丝毫没有对他们的饮食习惯产生任何影响。也没有证据证明山西的老婆比其它地方的老婆更不守妇道。

不管别人怎么说而坚持自己的光荣孤立，又被称作“站在山顶上”。这里就是一个严守“山头主义”的省份。

“高山是魔穴，峰顶是鬼巢。”于是，没有人会对山西的土霸王拒绝把尊位让给其它地方的恶霸感到吃惊。论荒谬和堕落，又有谁能盖过一边与情妇调情一边指使打手消灭对手的革命匪徒杨承效(Yang Ch'eng-hsiao)，或是那位一边和客人打乒乓球，一边煽动宗派主义陷害对手的最讲政治的参谋长李英奎(Li Ying-kuei)呢？

古时候臭名远扬的曹操曾在山西作战。在诸多率领雇佣军肢解汉帝国的诸侯当中，他是最具才能、最为成功的一个。据巴拉茨所述，这些诸侯在一代人之内，就把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国家几乎变成了一个坟场。《后汉书》的作者这样写到：“治世之恶匪，乱世之英雄”。

在民国时期，有一位来自山西省会太原的银行家孔祥熙。其人自称是孔子的嫡系后人，并炫耀自己是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二战期间，他的老婆垄断了盘尼西林市场，靠囤积药品发了大财，而无数士兵却死于败血症。

传说中还讲到，高山上还有像百花羞公主和哪吒三太子这样的好神仙，在很久以前帮助美猴王翻越喜马拉雅山。确实，山西最美好的

东西是无与伦比的。离张庄不远的微子镇的居民认为，杀身取义的比干就埋在他们的地下。在基督诞生一千多年以前，这位忠肝义胆的丞相就因直言不讳地批评商王暴虐的社会政策而激怒了他。“圣人之心有七窍，”纣王说，“那就让我们看看你的心有没有七窍吧。”他于是下令卫兵剖开比干的胸膛。但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有没有发现比干的心脏到底有多少窍。

在1947年的文水县云周西村，勇敢的农家女孩刘胡兰以较为惯常的方式英勇就义。她拒不说出有关她的地下党同志的信息。阎锡山的军队把她带到村广场的中央，那里有一副铡刀和两具已身首异处、血迹未干的同志的尸体。“难道你不为自己还没有活到15岁而后悔吗？”刽子手问。“我已经活了15岁，”刘胡兰答道。“如果你们杀了我，再过15年，我还会和现在一样大。”

铡刀一按，刘胡兰抛下了自己的头颅。

如要娱乐大众，山西也出过像张庄的申六勤(Shen Liu-chin)“申胡子”这样的小流氓。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诚实地干过一天的活。他精于算计，能够嗅出任何社会安排中的薄弱环节，并加以利用。在干部吃香的地方，他会装成干部的模样；在退伍军人吃香的地方，他会装成退伍军人的模样；在士兵吃香的地方，他会装成士兵的模样。为的就是骗吃骗喝，有时骗个缺心眼的黄花闺女，当然也时不时地会讨一顿打。

在山西，文革中的政治冲突演变成武斗比中国其它地方要早。以内战的形式爆发的武斗也比其它地方持续的时间要长。长治的武斗于1967年12月爆发，一直到1968年3月间才告一段落。介休县的武斗于1969年仲夏爆发，直到1970年初才结束。暴力，一经释放，会冲破所有的羁绊。而宗派主义者施加在彼此身上的伤口也会难以痊愈。

立即涌入脑海的一幅当地人描述的图景，就是农民活动家陈永贵和平遥古墙的残垣断壁边大声朝夜空中喊叫的样子。

一些地方干部担心陈的安危，说道，“我们帮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但陈永贵说道：“我才不会像狗一样。我要走的是阳关大道。”

说罢，他上到古墙的最高点，叫道：“我是中央派来制止武斗的。谁反对谁就朝我开枪。就朝我说话的地方开枪！”

全场的反应是鸦雀无声。

解放军派了3个连的兵力才把陈从平遥解救了出来。

山西本地的政治极端，有把从外地调来工作的人裹挟进来的倾向。没有什么比从河北来的令人尊敬的穆斯林刘格平，与从北京军区来的长征模范将军张日清之间的争执更激烈的了。本来是被委以统一山西的任务，他们却为谁当一把手吵了起来。每个人都组建了反对对方的阵营，而且拒绝与对方言和，哪怕北京发来了一系列最后通牒。最终，对其不再抱幻想的同事们把他们不光彩地一同赶出了山西。

在描写山西的时候，很难避免夸张。但夸张毕竟包含着真实的内核。山西是一片孕育着多样、对比和冲突的土地。这些特质赋予山西省一种特殊的活力、一种栩栩如生的创造性冲动，和一种对先例的漠视——这些都是值得发扬的品质。





韩丁于1945年10月11日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毛泽东主席飞返延安时为他拍摄的照片。



1971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韩丁及夫人雷州安、韩丁的妹妹韩春、妹夫阳早、韩丁的女儿卡玛和外甥阳和平。



1948年，韩丁在张庄。



1971年，韩丁一家参观了大寨，同陈永贵合影。



韩丁在解放区培训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



韩丁同村干部一起漫步在张庄街头

在韩丁的帮助下，张庄农民研制成了百米围型喷灌机。



韩丁在张庄水泥厂抡锤粉碎石料。

韩丁向张庄农民传授农业耕作技术。





韩丁在村里同老人们亲切交谈



韩丁把村里的老人当亲人



《翻身》里描述的主要人物郭真宽与韩丁几十年来亲如兄弟。



“老韩真好！”他在张庄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图为韩丁与乡亲们一起赶着马车去劳动。

文学 PDF



机械化带来了张庄村的粮食高产，韩丁高兴地步入田间与谷子比高低。



张庄村被山西省确定为农业机械化试点



韩丁和张
庄学校的学生
们一起听课



村里的孩子们成了韩丁的朋友



韩丁常常端着
饭碗与村民们一起
在街头吃饭

和

和

PDG



张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医疗



韩丁为张庄人设计制作的螺旋提升机

知

学

PDG



韩丁为合资兴办的山西长弓玛钢公司揭幕



韩丁和王金红在美国纽约郊外

PH

PDG

PDG



“为人求实，著文存真。”是对韩丁的客观写照。



在村里的庆祝会上，韩丁高兴地跳起了美国的一种佛蒙特州木履舞。



长治市委书记阎爱英亲切会见韩丁



在韩丁的带领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同张庄的孩子们一起联欢



原长治市外办主任任志常陪韩丁及林林、林夫在长治八一广场。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作者简介 / 2

致 谢 / 4

献给王金红 张文英 / 8

自序 / 9

序 / 22

导 言 / 34

第一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 / 1

第一部 回 归 / 3

- 一、重返上党 / 4
- 二、还记得我吗? / 13
- 三、意想不到的曲折 / 19
- 四、观光 / 26
- 五、统计资料 / 32
- 六、“黑帮” / 35
- 七、林东 / 41
- 八、宣传队 / 44
- 九、矛盾 / 49

- 三十三、幼儿园和公共食堂 / 207
- 三十四、共产风 / 212
- 三十五、万亩方 / 219
- 三十六、最大的受害者 / 224

第四部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 / 236

- 三十七、急救 / 237
- 三十八、丈夫与妻子 妻子与丈夫 / 243
- 三十九、信仰上帝 / 253
- 四十、退却 / 259
- 四十一、李来全捍卫自己的权力 / 269
- 四十二、本地人回来了 / 276
- 四十三、毛泽东的反攻 / 287
- 四十四、大寨的抗挣 / 292
- 四十五、“打老虎” / 299
- 四十六、私访桃园 / 306
- 四十七、洗澡 / 309
- 四十八、毛泽东的“二十三条” / 318
- 四十九、大四清 / 323
- 五十、曲折的路 / 332

第五部 整社 / 338

- 五十一、种小麦 / 339
- 五十二、拂晓下地，晚上开会 / 350
- 五十三、收集意见 / 355
- 五十四、一个队长的话 / 361
- 五十五、大队书记发言 / 369

- 五十六、普通社员轮流发言 / 376
- 五十七、乡村交易会 / 382
- 五十八、猪的问题 / 389
- 五十九、南征北战 / 400

第二卷 文化大革命 / 412

第六部 当今绝对正确 / 413

- 六十、捉贼 / 414
- 六十一、攻击受害者 / 425
- 六十二、对付“二宝” / 435
- 六十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441

第七部 炮打司令部 / 451

- 六十四、整顿 / 452
- 六十五、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 / 456
- 六十六、文化革命“十六条” / 463
- 六十七、从袖手旁观到赤膊上阵 / 471
- 六十八、夺权、反夺权 / 482
- 六十九、打、砸、抢 / 497
- 七十、张庄门前的惨案 / 506

第八部 全面内战 / 515

- 七十一、晋东南——玉米、煤炭、钢铁之乡 / 516
- 七十二、三圈两步 / 520
- 七十三、诬陷的剖析 / 532
- 七十四、“刘未老”接管山西 / 539
- 七十五、文攻武卫 / 551

- 七十六、“刘未老”出访 / 561
- 七十七、围城 / 569
- 七十八、部队强制 实现和平 / 580
- 七十九、刘、张的垮台 / 592

第九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606

- 八十、处理小申 / 607
- 八十一、天降新娘 / 619
- 八十二、集体利益见鬼去吧 / 628
- 八十三、沃土丰收 / 635
- 八十四、学大寨 / 646
- 八十五、“六六六”污染稀饭 / 655
- 八十六、鸡蛋变成鸡 / 667
- 八十七、范机灵改变方针 / 676
- 八十八、深翻、磨玉米、精彩戏剧和呼反昭雪 / 685
- 八十九、再见吧！张庄 / 702

附 录 / 721

后 记 / 740

新
平
知

知
平
新

PDG

第
一
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



第一部

回 归

我知道你想到张庄去，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安排你去。你看，我不知道那儿是哪个阶级在掌权。

——周恩来

新
平
知

如
覺

PDG

一 重返上党

到1971年，整个晋东南地区已经7年连续大旱了。人们仍记得1965年和1970年全区出现的干旱，烤得山上的庄稼无法生长，成千上万的人下河南去买红薯干。期间，偶尔也下些雨，但根本没有下透，远远满足不了土地的需水量。干旱的夏天一个接一个，生活在太行山谷的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试图把河滩地修建成粮田。他们先用大块结实的石头筑成堤，把不常流水的沟底和河底围起来，然后，用驴车、手推车和扁担等拉、推、担上土，垫在堤背面，要垫二三尺或更厚一些。这些从山上刮来的土（能有土的地方都刮了），被集中到坡沟里、河底，成百万次不计成本的人工付出，造出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一块大田。这新造的粮田，平展，渗水性强，易灌溉，长出了丰硕的庄稼。人们不惜力气、不惜牺牲，造出这样的农田为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

率先干起来的是平顺县，那儿的农民修造了3万亩新地。原先漳河的一个支流只是布满石块的荒地，现在被劳动改造成了一大片菜园样的粮田，像巨型梯阶一样地长着玉米、高粱、大豆、瓜类，在这些梯田中还有一些小果园，长出的水果比一两个拳头还大。在山谷的其它一些地方，人们还用双手在主要的河流上筑起了一些拦水的大坝，造就了一些深深的、绿色的水库。在晨曦微露的时候，薄雾像纱帐一样垂荡于山谷之间，正午时分水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由于要发展工业，接管了潞城县一部分的长治市已经组织了在漳河主要支流上修建大坝的工程。大坝跨过山谷有一公里多长，形成了一个约九公里长的人工湖，从远处望去，就像大海一样蓝光粼粼，西风刮起，湖水便会掀起两尺多高的浪，这样的湖是山区的人们做梦也没梦见过的。由于不懂水产技术，当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江苏平原地区请会繁殖鱼苗，懂捕鱼技术的人。

三年多时间内，水库的水从未灌满过，在干旱的7年中，水面从原先达到的四分之三水位急骤下降。水位的恢复极其缓慢，所以工程师们低估了洪水到来的可能性，也就没有抓紧时间在水库东面修筑溢

洪通道。到1971年，他们只完成了必不可少的紧急排洪工程的一半。

1971年8月15日，晋东南的天气骤变，从未见过的大暴雨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在这儿的广大地区落下75—150毫米的雨量。没有人料到这场洪灾，没有人有思想准备。但最没有准备的是那些被安排陪同我重返张庄的省里的干部们，他们正好安排于8月15日用吉普车送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南出太原，翻山越岭，前往23年前我徒步或坐驴车离她东去的上党盆地。

我们路过武乡，很高兴地发现，这儿正好有一个庙会。那天，来自周围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身穿普通的夏装，离家步行到城里去赶集，有的做买卖、有的看热闹，去庆祝夏收的成果。天气是赶集的人喜欢的：天空晴朗，无云，甚至有些热，蔚蓝的天空挂着一轮炫目的太阳。中午时分，有几片云飘过，一些悲观的人说可能要下雨，但是即使这样人们也并未加快步伐。如果下几滴雨，太阳会很快就把它晒干。

到了下午两点钟，大多数的乡下人已开始坐上牛车慢慢往家返了。因为载着他们在城里市场上买到的各种东西，再加上从县城出来都是上坡路，所以他们前进的速度相当慢。从县招待所出来，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就狂按车喇叭，试图叫那些准备出城回家的人群让出一条道来。这时候，天气突然变黑，雨落下来了。离树不远的人们赶快躲到了树下，而那些找不到遮蔽的人们则脱下外衣，遮在头上，继续赶路。雨急促地下了有一两分钟，便小了下来。太阳通过云团的缝隙露出了脸，给山谷撒下了一层金色的光辉，然而这只是灾难来临前的片刻假象。瞬间，云团封锁住了天空，黑沉沉，气势汹汹，一阵狂风刮过，大雨便又倾盆而降。一阵比一阵急，铺天盖地，整个山区好像被装入了一个雨的口袋。路面很快被冲坏了。我们的车蹒跚行进，滑进了路边早已溢满泥水的沟里。司机猛打方向盘，差点伤着一位掉进泥水中的农民。人们觉得躲在树下已无济于事，便跑出来加入了那支从未停止前进的人流里。大家几乎挤满了公路。此时，大部分步行的人都脱下布鞋举在头上来遮雨，但是鞋也不比树能遮雨，大雨很快就浸透了人们的夏衣，浸湿了他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宝贵东西。

当这支拖泥带水的队伍中最前面的一批人，开始翻过山向山下走去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武乡南边最高的地方，终于开始在一条空路上

行驶。这时，那些在干旱年头干涸的水沟、小河，蜿蜒曲折的水道都已变成了疯狂的洪流。因为掺杂着淤泥，洪流看上去不像是水，更像是油。泥浆拍打着岩石发出咕咕的声响，溅出黑色的泥团，而不是白色的浪花。在水道的每个急转弯处，充满泥浆的浪头猛烈地拍击着路边，高高跃过了我们行驶的路面，一次次地我们不得不上看而不是向下看，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淤泥给浪头以力量、速度和致命的杀伤力，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使新英格兰1938年那可怕的洪水和飓风也不敢与之相比。路一段段地在我们的身后消失，我们眼睁睁看着支流上的桥倒塌。泥流卷着猪、鸡、羊、草垛、肥料堆，并以可怕的速度把它们推进了山坳。

当我们接近低地、走近浪头一点点时，灾难的迹象就更多了。农田、村街道、农舍、院落已经浸泡在凶恶的棕色泥流里。所有的车辆都在一座古式拱形桥前停下来，本来是跨在溪流之上的古桥现在堵塞了泥流，导致一片大湖已经在上游形成。狂怒的泥浆于是以巨大的压力扑向了拱桥，挤出黑色的泥流从下向上像水柱一样喷射。当地干部临阵指挥，他们说：“这座拱桥经历了几个世纪，现在只能再坚持半小时了。”我们下了车，徒步跑过拱桥，然后心神不安地等着吉普车的司机冒着生命危险驾车驶过。

再往前，山里的公路已被淹没，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温和，但汽车仍然勉强可以涉过。接近五阳煤矿时，我们发现，由于当时在铁路路堤的中央只修了一个小的排水道，水不能及时排出去，这样整个山谷被路堤形成的湖封锁了，我们前面的路就在这个湖底下。一排排直立着的足有2米高的玉米都淹没在湖中，连缨头也露不出来。当我们准备停下时，右边的一个羊圈土墙倒塌了，惊慌失措的羊群向高处猛冲，它们站在刚刚淹死的同伴们的鼓胀的尸体上，战战兢兢地翕动着鼻子。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卡车、吉普、公共汽车、马车停在我们身后的公路上，排成了一条车的长龙，伸过山梁，看不到头。

雨还在倾盆而落。

到四点钟，暴雨缓了一些，随后渐渐停息了。傍晚，前面湖水降到我们可以趟过的高度。到达长治平原时，天已快黑了。我们加速南行，一排排低矮的小山坡拨响了我记忆的音弦，但柏油马路、排排大树，路边的排水沟都没法向我提示我们的大概位置。一直到了新建

的、对我是陌生的长治市中心的庄严的三层楼宾馆，人们才告诉我，我们已驶过了张庄。

“你没见到吗？”

“没有，一点没看见，只看到了那些小山……是在李村沟一带的小山吗？”

“是的。”

“真该死！”

就这样，在几十年中最大的自然灾害侵袭这一地区的时候，我返回了晋东南。暴雨给这里的人民造成的破坏压在了人们的心上。平顺建造的新田在几分钟内就消失了一半，那么多年挑土平土的辛勤劳动和前所未有的好庄稼都毁于一旦。别的地区损失还要大。地势较高的6个县的人们第二天流着泪走出家门，就像1948年雹灾后的张庄人一样震惊和沮丧。

对那些生活在地势较高地区的人们来说，至少最坏的危险是过去了。后面面临的是察看灾情、伤心流泪和准备灾后的恢复。但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危险仍在加剧，低地的水位还在上升。漳泽水库的大坝出现了裂缝。水泥塔、闸门和大坝下面能在一般情况下排除溢水的水道，现在远远不足以应付不断从山上泻下的洪水。洪水拍打着溢洪道上端已经修了一半的小围堰，小围堰在严重地渗漏，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无论大坝还是围堰坍塌，造成的灾难将一直波及天津——这个800公里以外的位于黄海之滨的城市，因为那是漳泽水唯一的流向。山区的任何洪灾都会给整个华北平原北部的各地造成威胁。

在洪水不停上涨的情况下，大坝表面的裂缝和渗透围堰的漏洞给下游的村庄和城镇造成很大危机，也给上游的长治市行政机关和晋东南地区首脑机关造成了危机。领导干部们一致认为，那天晚上不能睡觉，甚至以后的许多夜晚也不能高枕无忧。他们不得不动员部队和由普通农民组成的民兵轮流增援大坝，加高小围堰，如果可能的话，在被忽略的排洪道内打开一些渠道，这样可以控制洪水暴发。

似乎他们面临的这些问题还不够人心烦，我又提出要求麻烦他们：我想步行去张庄。不知怎么地，我多年来有个愿望，如果能有机会回张庄，我要像我第一次，以及后来许多次，也像我1948年8月最后一次步行离开张庄一样步行回去。我愿意慢慢地用双脚走在山西乡

间的路上，看看我所熟悉的景色，听听我所熟悉的声音，闻闻我所熟悉的气味，这些会帮我做好再次回到张庄的准备。

地区的领导不赞成我的建议，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听了我的建议都很紧张，只是竭力不把担心的心情表露出来。他们提出了许多反对步行的意见：到张庄已不再是泥土小路而是交通繁忙的柏油马路，走马路既危险又乏味，何况我们进城的时候就已经走过了这条路，再按原路步行回去还会有什么收获？他们又补充道，步行30里，等到了张庄我们就疲惫不堪，酷热难当，又饿又渴，花上半天时间去，休息恢复体力又得花去宝贵的半天，这样做有什么好？为什么不高兴兴坐上新吉普车去呢？

可我自己毫不动摇，离张庄越近，对我来说，双脚半半地扎在地上，一步一步地走进村子就越重要。李英奎司令员，这个个子不高，眼睛有点斜视，操着诙谐广州话的地革委会副主任终于同意了。那次，他直接分管接待我们的来访。

“好吧，你们可以步行，想几点出发？”

“8点。”

第二天早晨8点，我和我妻子及女儿走上了街头，我们的出现引起的公众骚动来得冲动和突然。我们在宾馆门口一出现，小孩子们就从远近各处跑了过来。跟着又来了许多人，抱小孩的妇女，抱小孩的男人，抱小孩的孩子，步行的工人，骑车的工人、战士、民兵、小商贩和学生。不一会儿，我们前后的街面便挤满了兴高采烈的、活泼的、好奇的人们。当我们走到南北大街时，很明显，长治所有的人都知道大白天街上走出了大鼻子美国人。大街像刚才我们出来时的侧街一样很快挤满了人，自行车、平车、马车和开过来的几辆轿车也涌进了这潮水般的人群，当人们想透过拥挤的人群看我们一眼时，骑自行车的人你推我挤撞在一起，小孩摔倒了，几乎被那些想挤过来看清楚一些的大孩子踩了。卡车司机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非常恼火地按着喇叭，但当发现是由于美国人造成的交通堵塞，他们便跳下车，车也不管了，加入了塞满大街跟着我们向北移动的欢乐的人流。

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如此喧嚣的欢迎，如此拥挤的人群，使我禁不住担心起来，我们在破坏全市的工作，我们在阻碍交通，我们在制造事故，我们在引起伤亡。我开始担心，我坚持要步行去张庄的做法

是不是太愚蠢了。人群的拥挤也许是李司令员和其他地委领导预料之中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为我们在挤压中的安全担心，同时还要顾及城市的法规和秩序，出于礼貌，他们并未讲这些，他们咽下了自己的意见，屈从了我们傲慢的建议。

一走上大街，再有别的想法也太晚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大步前进，希望不要出事。当人群膨胀到难以掌控的时候，警察动员所有可动员的人力，包括工人、学生代表，竭尽全力维持秩序。我们看见沿路一个又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妇女临时做紧急纠察，警告站在她周围的年轻人往后退，回去工作，让外国人安全通过。但这种努力根本无效，反而减慢了人群前进的速度，使危险更危险了。

区革委会和地委就在这条街的北头，大多数围观者以为我们要从宾馆到某个权力机关去，他们决心要跟我们一道走，津津有味地观赏我们出奇而短暂的公开亮相的每一刻。但是我们没有走进任何机关大门，而是加速向前继续走，人群中的一些人便散去了。到北关的时候，只剩下剩下的几千个青年人仍跟在我们身后。当人们看出我们要出城下乡去的时候，最后一批跟着我们欲追根寻底的热心人也散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美国人和四位陪同的中国同志，我们终于可以安心走路了。

我刚才一直忙于在人群中寻路，一直担心我们会闹出乱子，一直担心拥挤的人是否会散去，几乎没机会看长治一眼，只看见了树木成排的路边引人注目的三层或四层楼房，过去的痕迹不再有。旧城最显著的标志，那威严的、把城围了整一圈的砖面城墙，似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48年我所熟知的长治，是破败的县城，年久失修的衙门，成群的挤在一起的家庭，无人问津的庙宇，处处野草，破落不堪。可现在，这儿已成了繁荣拥挤的城市，宽敞的大路，现代化的建筑，具有与北京这样典型的都市一样的公共设施。对西方参观者来说，假如北京似乎仍然落后，仍有农村气息的话，这就是原因之一，新中国的财富不只是输入了几个大城市，来促进它们超常的、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而是或多或少地分到了全国，县城和地区也可以夸耀他们具有那些被中心城市引为自豪的市政设备，服务设施。很明显，使北京的发展速度减慢的因素，加快了长治的发展速度。

如果说长治似乎变得陌生了，那我们一路上走过的村庄就更加陌

生了。我几乎没有看到一样我能认出的东西。过去我常走的泥土小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双行道柏油公路，在我的记忆中月球般荒芜的平原，现在被公路边茂密的树木装点得很美，路旁两边苗条的树干长出的丰茂绿叶在空中交错，像在头顶上搭起了绿色的帐篷，远处成排的树木和小树林沿路可见。还可看到一些新的建筑物，公路左边有几个大工厂，右边有地区师专的教学楼，再往前走，在右边与我们并列的是长治飞机场，可以看到几架小型飞机起飞在空中盘旋，然后降落，一会儿，又重新起飞，好像是飞行员在训练。我们走过一个大灌渠，又穿过一条维护得很好的铁路，这条铁路的一条又道通向货运站，6轮大卡车在那儿装煤。

在革命的中国，你不难想象会看到新的建筑物、新的工厂、学校、公路、铁路甚至一个或两个飞机场，但是，我几乎不敢想象在去张庄的路上这一切就都有了。我也没想到沿路附近村庄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路边欢迎我们。一离开长治，我们要路过的消息就各村传开了，路边村庄的人们跑到路边上来，有的甚至要步行七八里。与我们刚离开的城里人不一样，这些农村人只是看看就满足了，他们不跟着走。从激动的、欢笑的人群旁走过，只剩我们几个了。几乎每个人群中都有几位认出了我，他们向同伴喊：

“看，老韩。”“那不是老韩？”

“他老了！”

“看，他的头发白了。”

“就是他，我在羊肉汤摊上和他说过话。”

很明显，在这平原的乡村里我仍有许多朋友。

与人们见面是一回事，要适应这一地区的变化是另一回事。在我们顺利地向北前进的过程中，我做出很大努力去适应这种变化，但对爬上李林沟的高地所看到的一切我简直毫无准备。在这儿，公路、铁路和村庄都挤在大岗山、二岗山之间一条狭长的深谷山沟里。

爬上山侧面的一片空地时，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这里既没有树木也没有高高的庄稼遮掩我们的视线，我站在一块梯田上，向北延伸的深谷的全貌尽收眼底，我站在那儿看了又看，没有一样我能认识的东西。

在我离开的这许多年中，特别是在写《翻身》的这些年间，我一

直以我自己的想象来重建张庄。渐渐地，这个头脑中的张庄对我来说比在中国的张庄更真实。我这会儿希望看到的是一幅与我的想象相一致的图画：张庄像一张在平原上延伸的地图，高耸、方角的天主教堂塔楼，这个外国干涉的纪念物占据在村中心，耸立在把村划成了东西两半的主街上，村里的建筑很明显地揭示了村里的阶级化分。贫雇农那泥草屋顶的土墙小屋总是和地富的瓦顶砖墙住宅形成鲜明的对比。土改前，地主家庭拥有整座院落，而穷人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残梁破壁处安身，他们的路径往往穿过几处倒塌的墙壁，违反了儒家心目中南北的正统。在1948年，尽管有土地革命的重新分配，这些景物都还看到。

但是那天我在大岗山侧面看到的一切无论如何与我记忆中的情景连不起来。我看到张庄座落的地方是一片绿色的树林，威严的天主教堂的钟楼不见了，是被高高的树林遮住了无法辨别，还是被拆毁了？树木也遮住了其它可能残存的旧建筑。眼前这一片无所区别的绿也许正象征了那几年土改运动和以后数年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平等。

社会平等最强烈地表现在树林四周围的土地上，张庄的土地不再显得像邮票一样一块一块的零散。中国农民自古以来耕种的就是这样的零散的小块土地，土改时强调每家都要分到一份地，强化了零散的特点，数不清的小块上种着五花八门的庄稼。眼前，大块的玉米地里套种着各种豆类，同样一些大块的谷子地里套种着土豆和红薯。

这是一场颠倒了四千多年历史的惊人的变革，正是这种变革使土地的使用达到了西方农业的水平，为机械化打好了基础。这种变化也正是我没来之前就期望的、想要证实的、想为之欢呼的。但也有一些变化是我未料及到的，毫无思想准备的，这种变化占据了我全部的视野，使包括树林、大块田地在内的任何东西相对来讲似乎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工业化，它以运输开始，然后通过电气化涉及到每个家庭、每个商店，像19世纪在欧美开始的工业革命中的任何事物一样，正粗放地、无所顾虑地、蓬勃地、一往无前地向煤炭和工厂扩展。

整个上午我们一直走的那条公路正好通过张庄村东路边，我们能看到的是从河南郑州过来的铁路，不久即可通往省城太原，然后到达北京。铁路边，在张庄东西街的对面，是地区主要的机务段，那儿像楼房、烟囱、水塔、叉道这些机务段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

似乎把以前的宁静还扰乱得不够，机务段和大岗山之间又建造了一个大型水泥厂。为了给厂里提供石灰石，一座山已被劈下了一大块。由于每日 24 小时的工作，粉碎和燃烧生石灰荡起的粉末，给附近玉米和豆类农作物的叶子穿上了一件石尘外套。

沿铁路望去，过了长北车站这个新城镇，可以看到黄碾方向有一个燃煤发电厂向空中释放黑烟。向西北，视线越过饱胀的漳泽水库就看到长治钢厂的高炉的模糊身影。在其之后的山上，挡住地平线的更大的煤矿建筑和烟囱告诉你，那是石圪节矿和王庄矿所在地。

这飞跃工业化的劲头冲击了我，使我不由想起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弥尔顿》：

英格兰绿色的古老的山林是否曾有那双脚走过？
英格兰舒适的牧场上是否有过上帝的羊羔出现？

神的面容有否照耀过我们积云的山谷？
这里造起的耶路撒冷是黑暗的魔鬼工厂？

1971 年我到张庄，想要看到的是 1948 年我离开的那个孤立的村庄，革命在这里引起社会变革的可以作为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缩影来跟踪和研究。当然，我这次想要了解的并不是土改运动，而是这里的、全体村民如何从个体走向集体农业生产。与从前一样，我期望张庄具有作为一个理想的、典型的村庄的条件。工业化还没有进入到我设想之中，所以现在它将我以前的设想都打乱了。

上党盆地发生着的事情比我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要承受这些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我都缺乏准备。我所回到的张庄世界变化程度之大让我一时觉得很陌生。我心里生出强烈的失望情绪，甚至是抱怨。但是我几乎很快就对我自己居然有这种隔膜情绪，居然滑落到这种对真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的排斥情绪里感到惊讶。在 40 年代初，它有不少的天主教徒、它经历了日本的占领和突然的解放，这些都使张庄成了华北地区一个独特的村庄。为什么现在它就非得典型了呢？此外，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乡村的孤立是现代中国的特色呢？也许张庄展示了一种更重要的更普遍的趋向：新旧冲突、工业

与农业的结合，乡村的城市化，不正是中国将来发展的趋向吗？都市化也许会使我的工作更复杂，却不会减弱这个工作的意味和意义。

我一边从山上下来，回到妻子、女儿和中国同伴的身边，一边在想，张庄是否也像它周围这一切一样陌生？那里还有我认识的或认识我的人吗？在相隔大约25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重续友谊吗？

像瑞普·凡·温克²一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山下走去。

二 还记得我吗？

在回张庄的路上我又加入了同伴们的行列。大家行进在去往张庄的下坡路上，突然，路来了个急转弯，转头向西，通过一座木桥（桥下有铁路），又转回正北，把我们右边的沟壑深处的铁路抛到了身后。因为一直是下坡路，没多久我们就接近了张庄。这时，我们看到马路上有一大群人在迅速地向我们这边移动。和人群会合后，我立即发现身边有许多我认识的人。六双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张兴发、王文则、胡雪贞、张贵才、郭真宽、张存喜、师才元*——1948年村里的主要领导几乎都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们不仅活着，而且都很健康，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从大洋彼岸返回。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根本没费劲儿就认出了他们几个。兴发几乎没变样，他以职业民兵特有的举止和姿态大步走到我身边，还是剃着发亮的光头，高大的身材配着英姿的外貌。23年过去了，他仍是一个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人，不论是在田里，还是建筑工地上，他都能撑得起。真宽也没什么变化，他总是显得比别人更老成、朴素、寡言、忧郁、顾及别人，在他看我的眼光里，这些特点都表现出来了。他握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流露出悲伤和长期受苦的神色，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侵蚀他的胸部，使他晚上睡不好觉的缘故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的反映？在所有的村干部中，他是最老实、最忠厚、最直率的，虽然接受新事物要慢点，可一旦认准了，是决不回头的。

其余的人看上去都变老了，其中就有胡雪贞。虽然她从来也不是

² [译者注]瑞普·凡·温克是美国文学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人物。此人喝了世外桃源的酒，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时发现人世已非。

*此处人名与《翻身》中人名一致。张兴发其实是张兴发，张贵才是赵贵才。

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她那宽阔的脸在漆黑的短发的衬托下曾无时不显示出她的健康和力量。可现在却是一副疲劳的样子，她的头发长了，拢在一起盘到了后颈，又别了把梳子，梳成了农村已婚妇女的那种标准的发髻，这种发式使她显得很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

张贵才看上去也老多了，他已缩成了一个瘦弱的老头儿，布满青筋的瘦脖子上顶着一颗向前伸出的脑袋，下巴也缩了回去，上顎几颗大牙很醒目地露在外面，成了他面部的重要特征，很像一只正在脱毛的矮脚公鸡。贵才一直有胃溃疡病，他常常不能吃饭，吃饭时经常吐血，但他却很坚强，有韧性、有决心，他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有病，他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位子使得他成了这么多年来村里的领导人物。

我们握手，我们拥抱，我们欢笑，我们擦去了眼泪。像过去一样，张庄的孩子们在我们身边蹦蹦跳跳。不一会儿，几百人的人群向我们涌来，他们中间，有些我不太熟悉，有的根本不认识，随后这支迅速扩大的、欢乐的、喧闹的、兴高采烈的大军开始往后涌，下了公路，向村子前进。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大步走到我面前，他把手掌放在面前，像是在祈祷，很快又手掌握紧变动手指，玩起一种手指游戏。虽然这个奇怪的举动使周围的一些人迷惑不解，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1948年常和我一起玩的那帮“小鬼”中的一个。那时，他们才六七岁，我教给了他们这个手指游戏，他们竟然还没忘掉。现在再玩这种游戏成了一个确定的记号，这个人是那帮小鬼中的一员。当时这些孩子们在会后常常围在我身边做游戏，当然我也积极参加，他们还把上学用的石板拿来让我修理，或用汉语单词和我交换英语单词。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会见了五六个已成年的“小鬼”，有男有女，每次他们用手指做花招，我都会无意识地回敬他们，看见的人都哄然大笑。这第一次的笑声最有感染力，传得最远。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还是用胳膊搂住他，和他一起走在街上。当走到一个有6尺高的土顶小屋前，他说：“我小的时候，你把我放在这个土屋顶上，我怎么也下不来。”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人们从四面挤来，回忆解放战争期间的东西，让我说出姓名，认出相貌，来测试我的记忆力。最后才知道，这个年

轻人现在是村里的医生，叫秦三姜。他的父亲早已去世，曾是一个兼卖草药的中医，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仍健在的母亲，也许是因为我从“基督教的美洲”来，尤其热情地向我招呼，仿佛我的到来让她和教会重新建立了宝贵的联系。

从东面进了村，走上村中南北走向的街，再往前右边就是以前传教所大院了。人们告诉我，我们就被安排住在这儿。因为许多年前，我就是住在这里的。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觉得是回家了。但是，看看大街，我已说不出这个大院位置在哪儿，一切都变了样。不过，不一会我就明白为什么了。教堂的整个钟楼已被拆除，钟楼后面的、在旧时看上去极为宽敞的大礼拜堂，现在比不上街对面的一个更庞大的建筑物。四处生长着的大树甚至遮住了最高的屋顶，一个建筑物在这条街上独领风骚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们朝北向传教所大院走去，刚走几步，一个裹脚老太太跨过街边的水沟，走到了我面前。

“不记得我吗？”她问。

她站在那儿，胳膊叉着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咧着大嘴有趣地微笑着，露出了两排没有牙齿的牙床。

我看了又看，这掉光了牙齿，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而稀少的老太太会是谁呢？她的肩膀耸起，她大胆、好斗……噢，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你是王老太。”

“是啊，老韩。”她说，双手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想你再也不会来了。四月底你到北京时，我们在报上看到了你的照片。大伙都说你要来，现在已过好几个月了。”

她用古怪的目光看着我，摇摇头：“老韩，你老了，头发也白了，老了，老了。”

“是呀，我老了。”我说：“可你，你仍年轻、健康。”

“我72岁了。”王老太骄傲地说：“我一辈子没得过病，一回也没有。从生下来的那天起，我就没吃过一颗药，没打过一次针。那是根宝。”她说，转过身来给我介绍她的儿子，一个四十来岁，身体不太好的瘦小的男人。“他是共产党员，大队党支部委员。新社会真好，真好。”她说，让她称奇的是她的儿子可以成为村里领导核心的成员。

“我还能劳动。”她又接着说，顾不上喘气，“我每年在地里能干150天，跟旁人挣的工分一样多。”

我们离开了王老太，请她留步在自己家门前，那是一个属于她的家。她以前是从河南逃荒来的，被王老汉当新娘买到这个村的。

我们继续沿街向前走，前往传教所大院。张庄的主街也不再是一条夏天每一场雨水洪水流淌的沟壑了。现在，村民们用从铁路段拉来的炉渣铺路，足有2~3尺厚，把它改造成了一条不怕刮风下雨，各种天气都好走的路。下雨时，水可以从路两边的水沟流走。他们还把往东通向公路的两条小路也用炉渣垫起来了。因为村西地势较高，不常积水，所以垫上炉渣，挖上水沟以后，整个村子就不那么泥泞了。社员们是1971年春天，也就是我们来的几个月前才做完的这些事。这个显著的改进，对应付前一天的暴雨无疑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铺路，我们现在就得趟水进村了。

在干部们陪同下走进传教所大院时，我们才发现地区雇的建筑队已经把大院扩建了。人群仍在我们身后的街上等着。一排排新建筑立在东面，包括一个大礼堂。这些刚开始是为地区管辖的潞安中学所用，后来是部队附属的一个卫校用，现在卫校仍在这里。

建筑队还把旧的教堂改建成了卫校的办公楼。他们不仅拆毁了钟楼，而且还把土改前令人称奇的塔楼洞穴结构从内部分成了两层，一层做教室，一层为办公室。此外，他们还拆除了所有与教堂有关的建筑。

新的建筑队又在最近改建的时候垒了一堵新墙，把大院与毗邻的村街隔开了。天主教神父们的住所现在成了接待贵宾的招待所。我、我的妻子、我的女儿，还有从北京和长治陪同我们来的干部以及所有为我们服务的人员，总共14个人都在这儿住下了。

干部们领我们到住处时，房间分配已经搞定了。我女儿卡玛被安排在1948年我和谢虹用的那间屋子里。我和妻子住东面一间较大的屋子——1948年这是工作队其他干部们住的地方，我们常在这儿开会，有时是工作队的会，有时是村干部的会。这个大院我虽然很熟悉，但现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队拆除或改建了院墙，在院里多加了以前没有的分隔，打扫了所有的地方，并把墙壁刷得雪白，窗户上安上了窗帘，就是当年神父的住处也没有这么豪华。更惊人的是，到处

都装上了电灯，每个房间、每个院落，甚至室外的大厕所。院里搭起了一个大棚做厨房，在我们的屋子和厨房之间，有一个水泥洗涤槽，机务段的水塔供给自来水。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村里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但全村只有二三个自来水龙头，大多数人吃的还是用桶从井里挑的水。

我们刚进入我们住宿的小院，接待人员就把两头的门都关上，并上了锁。这样，除非我们找到拿钥匙的保管，想出去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心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因为随着老韩和他的妻女从海外回来的消息传开来，人群就开始聚集在大街上，不只是张庄的人，还有附近所有村庄的人。就是说二三十里以外的人，他们或步行、或坐平板车、或骑自行车、或坐马车、或拄着拐杖，靠一双裹着的小脚蹒跚而来，抱着或背着孩子。他们顶着太阳来，冒着雨来，成百上千。只要来了，不看上我们一眼，是不肯离去的。我们是在雨季中期，几年中最大的暴雨之后到来的，尽管暴雨停止了，但老天几乎天天下雨，没有任何雨具的男人、女人、小孩的人群，在雨中从黎明站到天黑。他们友好，好奇，很有耐心，也非常固执，直到能看我们三个美国人一眼，他们才肯离去。顺应必然的形势，我们每天到街上两次（有时要多几次）和群众打招呼，作简短的谈话，互相提问，互相回答。这些“会见”满足了人们。大多数人对我们有了亲身见闻之后就回去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有些人两三次地来，又有些回到家后又和婶子、奶奶、来访的亲戚和邻居返回来，把外国人炫耀给更多的人。二十多年了，也许是1948年我走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海外旅游者的缘故，所以才涌现出特别的友好和好奇。荷兰神父在抗日战争开始就离开了这里，打那以后，很多人就再也没见过白人，那些在解放后出生的人当然根本没见过白人，我们中不仅有白人，还有一个黑人卓安。他们误以为卓安头上70年代时兴的蓬松的发型是一顶黑帽子，人们对她强烈的好奇简直使她受不了。看了张庄，见了当地的杰出人物和周围村庄大多数的农民，她计划尽早地返回北京。

她走了以后，至少有一个星期，仍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每天拥挤在古式传教所大院外面的街上，后来才逐渐减少。这样我们才可能自由自在地出去，除村里的几个孩子多看我们几眼和我们微笑以外，没有更多的人特别注意我们了。

回想到我们来长治以后引起的骚动（起初在公路上，后来在张庄），我觉得当初坚持步行到张庄是错误的，可张庄人不这样看。从各个方面我不只一次地听说，我们的步行深受他们的欢迎。我们到这儿以后，所有的人人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能看我们一眼。从地区宾馆到张庄步行30里使上万人看到了我们，或者和我们打了招呼，对此，他们都很感谢。要是我们坐在吉普车里冲进来冲出去，这对大家是一种不屑。他们的看法是我们的步行符合“群众路线”。

人们的反应迫使我做一些认真的思考。我事先并未考虑人们会对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看法，只是自己想通过在乡间长途的步行回忆过去，体验现实。我从未想到目前主要的现实是，数百甚至数千人急切地想见到或欢迎这个外国人并和他交流。这种步行在40年代相当普通，在70年代却显得相当不平凡，给上党人民留下极深的印象。几年以后，他们还在笑谈这次步行。人们尤其觉得好笑的是和我们一起步行的干部们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事后都休息了二三天才恢复。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步行到长治，一天内往返是理所当然的，可地区的干部们如今想也不敢想。至少农民们觉得，在我提出步行的建议时，最让干部们感到担心的不是人多和街上的混乱，而是他们几位陪同干部不得不亲自参加这次艰苦跋涉。

至于来看我的人之多，我不记得有什么先例。1948年，我就独自一人多次漫游潞城县四周，虽然也有一些人注意我，特别是小孩，但从来没有招来这么多人尾随。之所以如此，原因好像有两个：第一，过去，人们不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他们受外国侵略者的苦太多了，简直不可想象一个大鼻子的白人会是朋友。孩子们由于好奇会跟在我身后，可大人们总要保持一段距离，不知道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第二，那时候人们经济上的压力还很大，土改虽已完成，但农民们还得靠在得到的小片土地上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每个家庭都得靠自己的劳动生存，耽误一天或一小时就可能造成损失，尤其是在具有决定性的春夏两季。所以，即使人们有好奇心，也讲友谊，一般的农民也要再三考虑整天站在雨中看一个外国人值得不值得，因为有许多事情在等着去做。到了1971年，全区普遍实行集体经济，这就使农民有了一种基本的经济安全感。对一般的群众来说，他们的收入不只是看自己付出了多少劳动，也要看生产队或大队范围内的联合努力。某个人

某天出不出工都没有什么大关系，做为集体的一员，不管劳动如何都会得到一份粮食，他也许丢了今天的工分，但对全年的收入来讲，影响甚微，庄稼本身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别人会把那天该做的工作做完。新的集体经济体制给了一些人临时的空闲，使他们能去观看或欢迎一个外国人，不管多远的距离，不管多少时间，湿了衣服，步行多累也无所谓，他们决心要看到底。在我自己看来，我总觉得是回家了，虽然表面上我对不得不与这么多人见面，打招呼感到厌烦，但在内心，我感到了与群众持久的结合，我知道他们才是地球上的财富，是上党革命的推动力量，也正是我远道而来要学习和了解的力量。

三 意想不到的曲折

会见了张庄许多朋友之后，我首先想搞清楚的是那些在1948年未见结果的事儿。申仙娥离婚成功了吗？王文则“过关”了吗？陷害小全儿的凶手找到了吗？然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太出人意料了，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申仙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父亲在她还未满结婚年龄时就强迫她提前成亲。她的未婚夫王文则，1945年是张庄治安主任，他父亲叫王雨来，当时的农会副主席，他们有权却不守法。这两个党员父子威胁仙娥的父亲说，如果不同意赶快成亲，就说他是反革命，就告到县法院说他帮助孙神父逃跑（申仙娥的父亲是一个天主教徒）。仙娥到王家后，父子俩对她都不好，不仅强迫她长时间地干活，而且还经常打骂她。有传闻说她的公公企图调戏她，这个年轻的媳妇每次拒绝公公的调戏，就要遭到狠命的毒打。后来，仙娥说她要揭露这一切，他们就更狠命地打她。1948年8月间，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得站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的工作，仙娥于是终于鼓起勇气到“妇联”去请求帮助。她说，她愿意在公众面前控诉她的丈夫和公公，条件是政府准许她和王文则离婚，这样，她就能离开王家，躲避报复。

仙娥敢于面对村里这两个新恶霸的勇气和对王家的控诉，改变了全村人与这一对父子较量的形势。仙娥一上台，村里那些曾对王家父

子有怨恨的人也跟着有了说话的勇气。最后王文则和王雨来不得不在面前低下头，发誓要改邪归正。

但是，1948年8月我离开张庄时，县里的领导还没有对仙娥的离婚做出定论。他们把她的丈夫王文则送到了为一个为“过不了关”的党员而举办的特殊培训班去学习了。自从在群众大会上控诉了王家父子以后，仙娥一直住在娘家，在她看来，这并非长久之计。就算王文则成为一个改进了的共产党员、治安主任，她也不想继续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正当的离婚，她的社会身份就不清楚。一个长住在娘家的已婚女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会被人看重，甚至没有再婚的权力。尽管仙娥急于就这个问题达成法律的协议，但区公所却迟迟不做决定。在张庄，还从来没有一件以离婚而结束的婚姻，大多数人都原则上反对离婚，不问缘由。这些人当中就有那些虐待媳妇已习以为常的婆婆们，她们觉得一个年轻媳妇如出走、离婚，甚至还可以再结婚真是大逆不道。革命政府必须支持正义，必须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他们又不能太超前，需要考虑绝大部分群众的思想觉悟。对他们来说，在广大群众对离婚还不能接受的时候，政府的步伐就要放慢，多做耐心的说服和教育，直到多数人都能理解。这就叫“群众路线”。

这是仙娥离婚案拖延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1948年党的整风运动中的极“左”倾向歪曲了党的整风运动。地区领导发动全体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纠正一些工作中有不良作风和倾向的农村党员干部，但有些人却趁机发泄对当地干部所持有的敌意情绪。这些人要求土地和财产绝对平均分配，要求每一户贫农家庭都能得到足够的财产来保证自给自足。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从整体来讲，没有那么多的财产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因为他们提出的要求没法得到满足，这些人就把整个土改运动看成是失败的，把领导土改的积极分子说成是无能的，甚至把他们看成是贪污分子。他们把这些积极分子当作敌人来进行攻击，像对待地主、反革命一样对待他们。在这种气氛中，上级干部偏听偏信，对下级干部做了许多不公平的事。他们用撤职来惩处那些只应该受到批评的人，用拘留和审讯来对待那些只应该被免职的人。这股风一刮起，就没人能控制得了。一方面，由于老百姓在如何觉得干部的问题上毫无经验，他们不知道他们批评意见会被上级怎么处理。而且，由于害

怕受到打击报复，许多人认为，把这些基层干部撤掉比批评批评但仍保留其权力好得多，因为，如果这些干部仍然掌权，他们也许会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1948年夏天，在党开始纠正极“左”倾向带来的问题时，没有人急于处理仙娥的离婚案。领导们觉得至少需要全面了解情况。也许这位新娘反映的情况言过其实；也许这桩婚姻并非一无是处；也许王文则承认了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所犯的错误，并痛改前非后，还能得到仙娥的尊重，两人还能重归于好。因为王文则坚决反对离婚，认为这是对他严厉的惩罚，所以，领导们觉得最好还是慢慢来。整风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对基层干部的过分行爲，所以没有人想再雪上加霜，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矛盾必须根据其性质和特殊情况来处理，主要负责干部至少应该详细了解具体情况。

这便是拖延的第二个原因。最后，尽管王文则在干训班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以一个“过了关”的合格党员身份回到了张庄，仍担任治保主任，但政府还是批准了申仙娥离婚的申请。尽管王文则始终不同意，但他的妻子在法律上有权离婚。政府并不认为离婚是一种惩罚，而是王文则自己虐待新娘带来的后果。到此，这件事情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后来，仙娥又嫁给一个住在马厂的农民，他们生有三个孩子。因为我对仙娥的美丽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热情地描写过她的故事，一位公社干部对此产生了好奇心。能给一个外国朋友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他看到仙娥时，大失所望。对他来说，这位四十多岁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一点儿也不美丽，她和上党所有农民的妻子并无两样。显然，他对我的说法，即1948年的仙娥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新娘感到怀疑。

但这还不是张庄第一桩离婚案的全部故事。仙娥离婚后，又结了婚，不情愿离婚的王文则后来也再婚了。他选择的伴侣简直让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王文则竟然和胡雪贞结了婚，就是那个妇教会主席，那个负责动员仙娥在群众面前控诉王雨来和王文则，那个负责帮仙娥离婚的胡雪贞。当年正是因为她支持离婚，并说服了妇教会的大多数人，县里最后才批准了仙娥的离婚。

胡雪贞竟转过头来嫁给了治保主任王文则，这简直比故事还离

奇。这一对儿是怎么处到一起的呢？胡雪贞不是比王文则年龄大吗？她不是他的严厉批评者吗？再说，她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是的，胡雪贞是结过婚的，她的丈夫当时在“抗大”当医生，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后来抗大部分转移，他就随队走了，最后到了北京。进京后，他给胡雪贞写信，让她到北京去。但雪贞不想去，她不想离开张庄，不想离开家乡到千里以外的北京去当随军家属。

这样的决定似乎是违反常情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妇女，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机会离开家乡到北京去生活和工作的，还有成千上万在北京工作的男人不能把他们的妻子办到京城来。他们在北京工作，而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却不得不呆在他们出生、长大、成家的农村。假如不是国家控制得严，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会叫北京吃不消，那时，住房和商品的供应体系就会崩溃。

有这么多的人渴望到北京去，为什么胡雪贞却不愿意去呢？只是因为不愿意离开她一直生活的张庄吗？这也许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山西人是以恋家出名的，他们特别忠实于生育自己的家乡，他们不会轻易地被说服离开自己靠多年的积蓄、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才修起的房屋。不过，胡雪贞不想到北京去的真正原因好像是她对丈夫的性格有看法。她告诉我，他对她很好，为了让她晚上能开会，他甚至亲自做饭，但人们传说他是花心男人，用情不专，是善于“就地取材”的那种人，部队开到哪里，他的感情就移到哪里。所以，胡雪贞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像我在《翻身》中描写的那么理想。胡雪贞不愿到北京去继续他们的夫妻关系，于是提出离婚，并得到准许。

有了几千年强制的婚姻规定，今天，在张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女人离了婚。雪贞和文则都是共产党员，以党员干部的看法，为什么两个离了婚的党员不能结合呢？走这一步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干部们找雪贞和文则谈过之后，他俩都同意了，后来就结了婚。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俩的结婚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结合，但也没有人说过这是一场灾难。雪贞向我们保证说，文则从没打过她，文则也说雪贞是个很出色的家庭妇女，她对他照顾得很好。很难说，他俩之间是否有感情。1971年你还不能从外表上判断夫妻之间内在的感情。在表面上，他们好像谁也不怎么搭理谁，不过这是农民夫妻间的一种常见现象。后来，雪贞病了，好多年也不见好，所以也就完全退

出了村里的政治舞台。文则是第五生产队菜园的领导，这个菜园占地36亩多，为了管理和保护好他的菜地，他一般就吃住在地里搭建的一间小棚屋里，很少呆在家里，因此，两人争吵的机会很少，也许俩人都感到这样比较好。

比仙娥离婚的故事更离奇的是张全儿的事情。在《翻身》中我曾写道，1948年3月，几个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发现工作队干部张全儿手脚被绑，嘴被堵着，半昏迷地躺在张庄后街的一口井边。显然是被人偷袭，在他的嘴里塞了毛巾，绑住了他的手脚，然后被拖到井边，偷袭者企图把他扔到井里，但后来由于什么原因，把他扔在井边便逃跑了。这次我想知道的是，偷袭张全儿的人找到了吗？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更是稀奇古怪，可以说找到了，也可以说没有。

张全儿是露城县五区工作队的队员，他是那个区的积极分子，被派到张庄来帮助复查土改情况，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对土改干部的任何致命的袭击，都被认为是反革命罪行，按当时的情况，人们最怀疑的四名对象是：农会主任，控制着治安工作的王雨来；治保主任，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民兵队长李洪恩；副村长王喜友。县法院抓了这四名嫌疑犯，并在县监狱里关押了几个星期，但最后由于没有证据又把他们无罪释放了。6月他们四个人回到张庄，每个人都以不屑的神态阔步于街头，威胁那些提供他们犯罪证据的人，其中之一就是王文则的媳妇仙娥，因为她曾证实从张全儿口中取出的毛巾确实很像雨来家中的那条。

1948年8月，我离开张庄时，工作队宣布这四个人是无辜的，工作队没有解决全儿的问题，也没有再抓任何人。我个人怀疑那天晚上在井边发现全儿的天主教徒们，他们对雨来及他的亲信们有意见，急于收集他们犯罪的证据，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嫌疑犯。但无论是村里还是县里都没有找到他们犯罪的证据。这次回来我才知道，全儿的事情在四名村干部被从县监狱释放的前几天，也就是我离开张庄的几个月前就有了结果。结果出人意料！根本没有人攻击张全儿，是张全儿自己把自己绑了起来，往嘴里塞上毛巾，打了自己，然后又自己躺在井边上的。

县里通过张全儿自己的坦白了解了真相。但他们不想立即把事情真相公布于众，因为他们害怕这四位受了委屈的村干部做出什么不

合适的事情来，因为在井边发现了张全儿，没找到什么确凿证据，警察就抓了他们，关押了几个星期，还打了他们。

王文则当时对潞城县监狱的看守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但我决不会承认这个罪行，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干！”他的父亲王雨来和另外两名干部也都很坚决。真相大白后，县里释放了这四名无辜受害者。如果这四人发现根本没有人偷袭全儿，是他自己干的，谁敢保证能控制他们的怒火？谁敢保证能阻止他们的报复？

于是，县领导决定让这件事儿先冷一段，让这四名嫌疑人火气消一消，把大伙的记忆淡化一下，等他们把张全儿重新安排到别的地方以后，再告诉大家真相，并希望所有受牵连的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事实。

可是张全儿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回答很简单，他不愿作为工作队的队员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南下，到长江流域去开辟新的解放区。像胡雪贞一样，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不愿离开家。他还觉得，如果南下，到打仗的地方去，他可能会丧命，他的自我攻击是逃避的一种手段。假如他能在张庄假扮反革命的受害者，他也许能逃避在别的地方真的成为反革命的受害者。再说，他还可以摆出一付英雄的架子。李沟村的一名干部就是这样做的，他做为阶级斗争的受害者，平安无恙地呆在家里。

张全儿实现了他的最低目标——幸存下来，他没有被送到激战的南方去，或其它危险的地方去，但做一名英雄的梦却破灭了。他的所做所为毁坏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名誉，留党察看了好长时间，最后让他去干杂活了。

这次到张庄还有一件使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

年轻的干部张贵才在1948年退出了公共事务，因为他厌恶政策变得太“频繁”，也因为在内心里，他觉得自己有了地，有了一些农具，有了一头猪，娶了媳妇并生了孩子，革命对他来说到头了。可现在他却是张庄的党支部书记。

而1948年村里领头的党员张兴岁，也就是后来担任了许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兴发却不掌权了。40年代，他领导张庄经历了土改运动，50年代，他又领导土地合并、合作化运动，60年代，他却干起了投机买卖，他学着如何从房屋的买卖中得到好处，还被指控滥用公

款，后来被免了职，最后大队安排他去为集体养猪了。

这一切多么不寻常。曾经领导张庄经历了激烈的土改运动的人，最后去养猪，而曾“停止革命”，在家享清福，想过小日子的人却担负起这个复杂的大集体的重担。

又一次，真实生活看来比故事还离奇。谁能对这些角色的颠倒做出预言？

在当天和以后几天与张庄人的交谈中，大家为我写的土改故事做了补充，并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记录。当张贵才和张兴发知道了张天明在我的书中充当何等重要的角色时，他俩都笑了。我把张天明写成张庄的第一个党员，是解放后张庄第一届村政府的关键组织者，是动员百姓们起来控诉地主罪行的主要负责人。

“可天明并没起那么大的作用。”兴发说。

“他的确不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贵才坚决地说。

我说：“可他告诉我他是呀。”

“不，那不是真的。这是你偏听偏信。实际上师才元是第一个党员。但我们几个在建立村上第一个党支部，组织声讨会上都起了作用。天明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中间没有谁是‘翻身’的英雄。”

他们的话好像理由很充足，即便如此，事实还是难以抓住。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看重自己的作用而容易贬低别人。天明，在1945年到1948年期间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以后，又于1949年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没把村里的工作领导好，几乎和所有的村干部都不和，后来就下了台。再后来，他在长治的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于是大部分时间在长治度过。在厂里有了工作以后，他把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厂党支部，成了一名工人积极分子，不再是农民了。虽然家仍在张庄，家里的人仍住在张庄，但他自己却只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来。近30年以后，他退休回到了张庄，又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现在，他给第二生产队当政治指导员。

与此同时，张兴发、张贵才、郭真宽和其他张庄早期运动的领导人则带领张庄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几十年以后，他们又说天明没在土改运动中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如何证实这一点，这与回忆是有明显冲突的。

所有与我谈过的人，都对我在《翻身》中描述的另一件事有不同

的看法，这就是根宝的转变。根宝是一个对土改持有异议的农民，他谴责土改运动，伤害了村长张存喜，扭伤了他的拇指，并从村拘留所两次逃跑。我在书中说在1948年7月新村委会成立后的第二天，根宝接受了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批评，次日清晨乖乖地到一家军属的地里去干活了。为了改正他的陋习，村委会让他到一个在前线去打仗的年轻人家里干15天活儿。那天早晨，我看见根宝向地里走去，就以为他已经自觉接受了新选出的村委会的领导，并决心守法。

兴发、贵才、真宽和其他在场的人听到这儿都笑了起来。

“根宝心里并没有变，”兴发说：“他能那样乖乖地到地里去干活，是因为头天晚上存喜和王满喜‘收拾’了他一顿，狠狠地揍了他。因为他打过存喜，差点儿把他的拇指给折断，还因为他们把他锁起来以后，他不老老实实呆着，两次逃跑。他们忍无可忍，觉得说教没用，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后来，他是不想再挨揍了，才按他们的话去做。

“实际上，他们打他的时候，因为在大队办公室后面的旧孤儿院里，我就过去了，看见了里面发生的事儿。可我没有去阻止他们，只是说：‘小心点儿，别伤着骨头，千万别打死他！’”

显然，我过高估计了说服教育在1948年的张庄所具有的作用。张庄已经开始了民主的试验，人民已经参加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选出了勇于献身的人组成的联合体，他们既有威信，又有领导能力。但是，在理论上设立的民主程序与实际的管理村庄的过程是有差距的，特别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旧中国乡土长期存在的暴力不会轻易地让步于说服教育和正当的法律程序。令人悲哀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四 观光

走出被守卫的大院和紧锁的大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村里各处走走，然后再到村周围的田野去看看。前一天的洪水使村里受害不浅。传教所大院对面一个院子的院墙倒塌了，碰到了一间旧土屋的屋顶上。我们看到一个民兵急救队正手持铁锹把倒塌下来的土装上平车，拉到田里去做肥料。村里还有好几处屋顶和院墙倒塌了。假如老天继

续下下去，将会有更多的房屋倒塌。连续不断的大雨淹没了所有的地面，没给人脚下留下一块结实的地面。

假如再下下去，谁也不敢担保地里的庄稼能有收成。雨水在地面形成了许多齐踝深的水洼，如果水面继续上升，不久就会出现一片水塘。

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们很难集中思想去观赏村里的景观。不过，仍有一些变化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灾难，看到了成就。在日本侵略者碉堡的废墟上，村里盖起了能容纳400名学生的学校，有教师30名。在麻池的对面，也就是原来师才元开杂货铺的地方，盖起了一个比古教堂的中殿还要大的礼堂，一排大队办公室，一个理发店，一个卫生所，一个药房，还有一个配电室，周围修起了院墙，把这些机关圈在了一个大院里。大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是粮食加工厂，加工厂用电加工粮食，取代了传统的用石碾、靠人力加工粮食的办法。加工包括去皮、磨面和筛面。

大队办公室的南面是新修的合作商店，这是一个长长的平房建筑，干净而亮堂。通间的柜台把商店分成了前后两部分，沿着后墙，是下起地面、上至屋顶的一排货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商品，有各种颜色的棉布、棉线、缝纫用具、锅、勺子、暖壶、水果罐头、食油、饼干、自行车、车胎等等。繁荣的农村生活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1948年张庄的情况与现在简直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候，才元的杂货铺只有棉布、食油和几样硬饼子。那时候，除非等到一年一度的秋季，到每年张庄分红以后，村民们才能到长治市里去买上一根针或一个顶针，平时在张庄是买不到的。

比这些公共建筑更引人注目的是1948年以来村民们自己新盖的房屋。251户修了1015间新房（一间宽约10尺，也就是两根支撑屋顶的房梁之间的距离），这大约等于土改时期全村房屋的总数。新建的房屋都很大，都是一层半结构，砖基、木门、木窗架、玻璃窗户，所有露在外面显眼处的木头结构都漆成了耀眼的红色或者蓝色。这种宅子是过去地主和富农们一发财就盖的宅子。现在，所有的新建筑都达到了“乡绅”的水平。

无论是新宅还是老院都栽着各种花卉，五颜六色，把村子里原来不显眼的角落变成了系列花展。我不记得1948年在张庄看见过鲜花。

花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示人们的生活品质。树木也是这样的。

早在1953年，张庄就成立了林业小队，将部分农地变成专门的苗圃，林业队的队员们栽了几万株树苗。他们把这些树苗移栽到村街的两旁和大队的田边。这些树苗大多是白杨，长得很快，大部分已有3丈多高，繁茂的枝叶遮住了整个村庄，从而改变了旧上党典型的荒凉、风沙的景色。树木改进了解放前那种凄凉的、半荒的、受太阳烤晒的、受老天肆虐的土地，开辟了一个绿荫遮蔽的，街道、小径、庭院交错的村落，减轻了一年四季各种暴虐天气的袭击。

然而，树木和花卉只不过是村里所有植被的一小部分。除了花卉，每个值得自豪的大庭院里都是种有玉米、豆类、瓜、白菜的小型菜园。大雨过后，这些小菜园里的菜疯狂地生长，和墙一样高的玉米秆正好做豆类的爬杆，瓜秧爬了一地，遮住了地面，几乎把白菜也遮住了。

虽然许多家庭从小菜园里得到了重要的蔬菜补充，但这些菜园只是每家每户的几十平米院子里的空地而已，还不算在按集体章程分配给农民的自留地范围。人们的自留地分布在村子外头，但是大家早就把自留地联合起来集体耕种了，自留地的收成在集体账本上是单列的一笔。因为国家对自留地不征粮税，张庄人把这些免税、免交公粮的地看成很重要的福利。但就各家自己耕作自留地的问题，大家否决了这个做法。大多数人愿意把自留地和大田一样让他们的生产队集体种庄稼。

随后，我们离开村子的范围，往西向水库的方向走去，然后又向南穿过一片最好的庄稼地，在往李村沟的斜坡上的砖窑上停了下来。后来又重新沿着旧的马车道向北返，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村街的南端。

这次田野的行走使我们看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小块地不见了，都成了大田，一块大田约有10亩、15亩，甚至20亩，这些能适应机械化耕作的大田使我们感到吃惊。就像土地合并一样，人们把他们的打谷场也合并了起来。他们放弃了几十个靠村边的权作打谷场的小块硬地，修起了6个大打谷场，每个生产队一个，每个打谷场上都修有房子供社员存放农具和工具，还可以贮藏打过的粮食。除了这些新造的打谷场，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饲养院，队里的马、骡、牛、驴都圈养在这里。饲养院与打谷场不挨在一起，而是在村边的农家院子中间清理出来的空地上。

我们穿过农田，跨过了连接新水库和村里的灌溉河渠，它好像一个箭头指向正西，延伸了好几里，在附近我们发现了几条支渠，很多

水闸，还有一个大的抽水站。据说这儿是第二抽水站（第一抽水站在水库边），这个抽水站还在修建中，紧挨着它的是未平整的、未开渠的农田。“十年动乱”以后，这一失败里面有一个很长的、很复杂的故事，我们几个星期以后才搞清楚。然而，即使张庄人没有灌溉多少土地，他们却从大水库里把足够用的水引进了村，这不能不说是一条大新闻，这在1948年恐怕是不敢想象的。为什么张庄的土地仍然遭受严重的干旱？除非持续的干旱使水库干涸，我们找不到其它客观的原因。

在那些充满险情的日子里，干涸不可能是问题。黄昏时分返回村子时，我们看到一排解放军战士扛着铁锹和镐头向北小跑步而去。他们是要到水库去保住排洪道上的围堰，水库里的水位离水库最高处只有6寸了，驻地部队和附近动员起来的农民加高围堰的努力还是赶不上洪水的暴涨，解放军的救援部队正奔向现场增援大坝。整个华北地区笼罩着令人焦虑的气氛。

如果天不再下雨，大坝和围堰也许还能保住，但如果老天再下，大坝和围堰会怎么样呢？这个险情让人们的心每一刻都悬着。

地里的庄稼看上去倒满有希望，但比我们前天在晋中的大赛看到的庄稼差得远。张庄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玉米和高粱的种植密度太稀，以致每亩的产量不超过250斤，移植的豆类也很稀，连续的大雨，促进了一些庄稼的生长，当然水涝同时也阻碍了另一些庄稼的生长。在靠近公路的大田里，玉米和高粱直立在1~2尺深的雨水中，假如农民们不赶快想办法排掉这些地里的积水，他们就会丧失这里的一切庄稼。如果说玉米、高粱种植太稀，那么谷子也一样，虽然谷穗长得很好，但地里却是稀稀拉拉的。另外，我们还看到了种植密度很稀的红薯地。种植密度好像是张庄的主要技术难题，给我们带路的队长张贵才批评自己的第二生产队没给薯苗喷洒杀虫剂，第一季度苗全都得了病，而第二季度又种得太晚，正好赶上了春天的大旱。

我们估计，如果下一阶段的天气较好，整个生产队粮食也许能得亩产360斤，第一次达到国家制定的黄河以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指标。以前平均亩产最好记录只有273斤。

回村以前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村南的砖窑。砖窑的负责人是王满喜，王满喜是个使地主、富农们望而生畏的农民，是土改运动以后，

还打过许多普通农民的汉子。现在已到了中年，看上去已不再是当年那样威风凛凛、令人生畏了。过去比同伴们个子高出许多的满喜，现在比大多数工人的个儿都矮了，他的整个身体好像比从前抽缩了许多，脖子缩了回去，脑袋架在肩膀上，好像一颗放在案板上的圆白菜，只有两条特别长的胳膊能表明他仍是那个不可小觑的人。两条长胳膊、两只大耳朵与整个身子极不协调，一双小眼睛在像北京猿人一样浓浓的眉毛下眨巴着。

在性格上，满喜还像许多年前我在张庄时那样没有感情表露，一副没有文化的庄稼人的样子。时间并没有使他像张庄其他的农民共产党员一样变得老练、成熟。不久，我就听说他已不是党员了。20年前他没有丝毫缘由地强奸了一个青年妇女，党组织开除了他的党籍。在土改时期，被满喜糟蹋的女人包括人人都憎恨的乡绅的女人，“斗争对象”的女儿，和与敌人勾结的贫农中农的女人，这些人没有人愿为她们辩护。由于他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些女人身上，1948年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自己也答应改正，但在1952年他完全出了轨，强奸了邻家的一个女儿，这事儿震动了全村和党支部，他们认为对满喜来说批评已不起作用，便把他开除出党了。

然而，满喜仍然是有影响的人物，一些彪壮的年轻人追随他，赞赏他的壮实。他有指挥能力。在缺能人的情况下，他被派到砖窑负责。正像我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我们见到他的那天，他遇到了大麻烦。和其他人在这一周内遇到的麻烦一样，他的麻烦也是倒霉的天气带来的。8月15号的大雨，使他们不能再做砖了。在装窑之前，有许多已经脱好的、需要晒干的砖坯，但由于大雨这些砖坯根本没能干。其中有一部分已倒塌，像村子里被水浸透的土墙一样，倒塌的砖坯成了乱七八糟的泥堆。这些泥堆占去了日前托砖坯要用的地方，但是在砖窑干活的副业队的青年人为了挣工分不愿去清理地上的泥堆。

在满喜的直接命令下，大多数不服管的年轻人都开始清理倒塌的砖坯和泥堆。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还在一个劲地脱砖坯，他叫秦根寿。满喜看了大怒，他操起一根扁担就打根寿。这事儿很快就在整个大队里炸开了。我这次见到满喜时，他和1948年我在张庄时的情况一样，被村民四面围攻，脸上一副羞愧、受伤的表情。他不太明白，这些为了生产和工作、为了推动革命的行

动为什么却遭来了暴风雨般的批评和指责。

如果说满喜看上去伤心和垂头丧气，那么砖窑也都是这个情绪。洪水把砖窑淹了半拉，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和坑洼。倒塌的砖坯塌了一地，有一个窑还面临着倒塌的危险。所有的手，包括那个引起事端的年轻人，都在尽力保住那个即将倒塌的砖窑，他们的衣服上溅满了泥浆，脚泡在水里。确实，砖窑不是一个容易挣工分的地方。

我们走回村子，绕过洪水在村南形成的名副其实的水池，在街上碰见了郭元龙。我立刻就认出了他，高个子，瘦脸庞，永远是一副阴沉的样子，然而，他却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交谈了几句就继续往前走。我记得他是张庄村西南片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在1948年土改运动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曾帮助防守大门，反对向有错误的干部进行报复，推动了工作队的工作。可贵才说元龙也不好过，他在村里没什么地位了，也不是干部了，因为有人揭发他是“圣母军”的成员。“圣母军”是一个地下天主教组织，被指责为反革命。

满喜的麻烦和元龙的耻辱使我们对张庄各类问题的复杂性和持续性有些吃惊。但是那天我们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大队后面的粮食加工厂，使我们的精神就又振作了起来。

每家每户不时地需要新鲜加工的白面和玉米面。需要的时候，他们把要加工的粮食拿到加工厂去，数量时多时少，一星期好几次。加工厂有三名妇女日夜值班，随时可以把面磨好。这三名妇女的士气显然很好。领头的是大队新会计的妹妹。她很有魅力，丰满、健康、活泼、脸颊红扑扑的，工作时，两只眼睛里一副调皮的神情。她的两个伙伴胖乎乎的、长相平凡，但都有很精神、很风趣，完全弥补了魅力上的不足。她们的加工厂是一个天然的聚会场所，迟早都有人光顾，在此闲晃亦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很明显，每份粮食在加工好之前，粮食的主人都有理由在这儿逗留。

三个年轻妇女明白这个加工厂在社区活动上的功能。她们把加工厂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社区中心，在这儿，人们轻松地打趣，严肃地争论，相互恶作剧，给失恋的人、受伤的人、受鄙视的人以同情和忠告，什么都有，人们的谈笑声决不输给机器的轰鸣声。因为她们决心要把所有的粮食都加工完才关门，所以这个“加工俱乐部”的主人

们常常要开门到晚上11~12点，每个来人都可以指望有一群活泼的人作伴，有说有笑有听。太阳一落山，这里的欢笑声和街上的寂静便形成了鲜明的可喜的对比。

五 统计资料

我们返回了大队办公室去喝些茶。这茶是新泡的，先把几片茶叶放在杯底，然后把暖水瓶里的滚烫水冲进杯里。以前的大队会计。现在的大队副主任申起财给我们说一些反映张庄20年来变化的数字。他以严肃、平淡的口气给我们列举了这些数字，因为这些值得骄傲的数字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见证。毫无疑问，这些数字确实表明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如果根据1971年膨胀的人口数字来计算，这个进步似乎就是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进步。张庄的人均产量只仅仅维持了原来的水平。

1948年张庄有252户960口人，到1971年有398户1637人。人口增长了70%，户数增长了58%，这398户人家耕种着3405亩土地，比1948年减少耕地2220亩。耕地减少了39%，而人口则增长了70%，这样，人均占有耕地就从1948年的5.85亩减少到2亩，这样大幅度的减少使张庄的人均土地占有和华北其他地区大致趋同了。因为人们习惯了从剩余的土地上获得额外的收成，耕田占有量突然下降到了最低限度，这对张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

把张庄总共600多全劳力和部分劳力进行相加，劳力总数计算为532人（他们中有的人上了年纪，有的人有病，有的人年幼，都不能算全劳力）。这些人被分成了六个农业生产队，一个副业队，还有一个林业队。农业队的社员们在农业季节辛勤耕作，1971年粮食亩产约236斤，这个亩产量是1948年平均亩产量的2倍多，但如果考虑到增加的人口和减少的耕地，1948年人均均为586斤，而1971年却只有485斤，每个人少101斤。

如果没有菜园和副业的发展，人均粮食收入这样下降必定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两项的收入填补了空，明显地提高了人均收入，使之大大超过了土改时期。张庄的副业包括一个出售蔬菜的大菜

园，一个我们已看见的砖窑，一个由马车、小平车组成的公路运输队，还有的在当地工厂做合同工——在火车站装卸货、在钢铁厂锯钢管、在机械厂铸铁等。1971年这些项目的收入是102523元，大大超过了主要产品粮食的收入。假定每斤粮食平均价格为9分，张庄所有的麦子、玉米、谷子和高粱价值72322元，这样，粮食收入只占总收入41%，而副业收入（包括蔬菜）的收入占59%。

把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是174 845元，是1948年总收入的两倍。然而，如果按人头来算，人均收入只从1948年的91元增加到1971年的105.5元，只多了14.5元。很难说这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当考虑到人口急剧增长、耕地激烈减少的情况时，这16%的增长也就是一个明显的成就了。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反映土改后的所有成就，因为这些数字没有把许多家庭菜园和各种家庭手工业中所获得的个人收入算进去。对某些家庭来说，这笔收入是可观的，加上了这些收入，张庄的总收入可增加25%。

统计数字只表明了23年中人均收入的微小增长，而集体固定财产的大幅度增长表明人们生活水平的真实状况。不应该单凭上述统计数字来判断。每家每户都安上了电灯，约一半以上的人家装上了喇叭，村中的电线杆上还有一个大喇叭，大队办公室装上了电话，还有其它一切电器设备，包括3台变压器、38部电动机带动5个粮食加工厂、2个饲料厂、2个切草机、23个水泵、8个水车和1个大的抽水站，这些小水泵从在田里各处22眼井里抽水，灌溉1100亩土地。另外的700亩可以用连接漳泽水库的灌渠引来的水灌溉。

为了搞运输，大队买了2辆胶轮大车跑长途运输，另外还有65辆小车搞短途运输。胶轮大车至少要3头骡子才能配套，而平车只需要毛驴或人力就行。尽管车辆一直在增加，但牲口并没有增加。1971年有牲口88头，从前是75头，要按人均来算，是大大减少了。

现在张庄有羊250只，猪176头，其中有50头饲养在张兴发负责的集体猪场里。尽管猪羊从总数上讲大大增加了，但人均数却减少了。

农具，不论大小，总数增加到了3100件，其中，包括大量的镰头。这种工具已被使用了数千年，现在仍是种地的主要工具，像牲畜一样，农具的人均占有数也减少了。

以上的器具都算是生产资料类。还有一类叫个人财产。这一类的增加不仅绝对数字增多，而且人均数也增多了。大队社员自己共有自行车 148 辆，收音机 7 台，手表 13 只，缝纫机 37 台。1948 年，村里只有两辆自行车，根本没有半导体、手表和缝纫机。除了这些“硬件”，人均的“软件”也增多了。特别是盖的被子和铺的褥子。这些东西在 1947 年太少了，家里为了谁能盖上被子常常吵架，争吵的人有时把不止一条被子撕成两半。可现在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被子和褥子了。

如果你把张庄的成就和全区别的地方进行比较的话，这些成就就会给你留下极深的印象。从农业方面来看，张庄的每英亩产量大约是 1948 年的 3 倍，而全区的单位产量只增加了 60%。但是，如果把张庄的成就与它所在的马厂公社的其他大队相比，那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尽管土地平整，地块大，有充足的水灌溉，有大量的过剩劳力，然而张庄的亩产量却是全公社最低的。

马厂公社的 12 个大队已有 5 个“过了黄河”，就是说他们已达到了国家为黄河、长江之间的省份规定的亩产 500 斤的指标。这 5 个大队中有 2 个亩产达到了 683 斤，这样使得全公社的平均亩产仅低于 360 斤，这个数字也大大超过了张庄曾达到的最高水平。在张庄有些生产队亩产到了 360 斤或 360 多一点，但张庄整个大队从未达到过这个水平，还远远停留在国家规定的“黄河”纲要亩产 400 斤以下。

如果拿张庄不仅与马厂公社最好的大队做比较，而且与山西省最好的大队作比较的话，那结果会更糟。东边平顺县的西沟，南边长治县的南呈，北边昔阳县的大寨，尽管自然条件都很差，但平均亩产都在 910 斤以上，并且年年都创新纪录，力争达到或超过世界粮食亩产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产量已超过了解放前的 10 倍，一部分地块甚至是 20 倍。

当然，我们不能把农业生产作为衡量一个集体成就和进步的唯一标准，总的收入、副业的发展、充足的住房、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高、领导班子的巩固、领导班子所执行政策的情况都是评价一个大队进步和成就的因素。然而，当我们拿张庄和别的大队在这些方面比较时，结果却是令人吃惊的，在马厂公社，张庄是落后的，在山西省更是如此。

让我宽慰的是，我得知张庄并不是一直如此。在50年代中期，张庄干得很好，曾被树立为榜样，让别的大队学习。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张庄人迷了路，迷失了方向，没有集中精力搞生产，产量一直没有再超过10年前已达到的水平。

早在1963年，张庄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236斤，到1969年亩产达到273斤，但到1970年亩产又跌到了236斤。实际上，当年夏季作物麦子产量很低，大队不得不向国家粮站请示，要求拨回粮食1万斤，这样，农民们才能熬到秋天收获玉米和谷子的时候。

面对生产的萧条，可能再次发生的粮食亏空，上级机关决定派一个工作队到张庄来协助搞好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1948年的情况又回头了。1948年我到张庄时就有一个工作队正在检查土改情况，工作队派到这里来，不是因为张庄的工作搞得好，而是由于这里存在着许多未解决的问题。1971年的今天，又有一个工作队（这次的工作队叫宣传队）在张庄检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原因还是一样，宣传队被派到这里来不是因为张庄有什么让人家学习的好东西，而是因为这里存在着许多未解决的问题。1948年张庄就是闻名全区的“老、大、难”，1971年这里仍是一个“老、大、难”，像上次一样，我要在这里看看事情会怎么解决。

我们刚到张庄，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所有的人都深深地感到张庄的问题是如何“老、大、难”了。

六 “黑帮”

半夜，民兵郑国番沿着主街从北向南扯着嗓子唱《骂殿》。这出戏是写一千多年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即后来的皇帝太祖）死后，朝中发生的对抗的戏。戏的高潮发生在开封府的“早朝殿”里，已成了寡妇的贺皇后控诉她的小叔子赵匡义（即当时的皇帝），说他篡夺了本应由太祖的儿子，而不是弟弟继承的帝位。在召集的众大臣面前，赵匡义刚刚逼着合法的继承人、年轻的太子德昭自杀了。贺皇后得知，震惊之余，咒骂便滔滔不绝，她骂匡义比从前任何暴君都更加

狠毒，是别有用心、不知羞耻、臭名昭著的篡权者，她唾骂所有的上下臣官，要求把帝位还给她幸存的小儿子德芳。

这是中国戏剧中最著名的骂腔之一，也是山西赶车人最喜欢唱的一段，它集伤心、仇恨、尤其是大胆于一腔。皇帝当时只要动个手指，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命运就到头了，贺皇后毕竟冒犯了皇帝。匡义对她以死相威胁后，对她既痛快淋漓、又入木三分的咒骂，这位当朝皇帝就闭上眼睛装聋作哑了。既然皇帝这样了，满朝文武也都不吱声了。

一个张庄的农民知道这出戏的剧情并不奇怪，它已在地方史中扎下了根。上党人对贺后的丈夫——皇太祖并不陌生，他于961年篡夺后周的皇位登基后，山西的两个对头将军反对他的篡位，皇太祖便调集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打进山西，把他的对手赶出潞州（今长治地区），最后在泽州（今晋城）的一场大战中把他们消灭了。泽州就是民兵郑国番的出生地。

然而，一个张庄农民敢在1971年公开喊唱这个唱段却是很令人吃惊的。唱古戏本身就意味着反抗。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所有的传统剧目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被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倡导、发起的8个革命“样板戏”（其中5个现代京剧、2个芭蕾舞剧、1个交响乐）取而代之。以任何方式挑战“样板戏”，即便在街上小声哼一句旧调，在思想正确的人眼里都是反动的政治行为。

唱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唱段就更不对了，因为唱词有直接的政治意向，很明显，郑国番唱“骂殿”是在斥责张庄大队现在的掌权人。借古讽今是中国的老习惯。遍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争论开始的，海瑞被明朝的皇帝罢了官。1971年对《海瑞罢官》的官方看法是：该剧攻击毛泽东罢免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剧作者吴晗也被说成反革命拘留了起来。人们对郑国番这极相似的行为会置之不理吗？

这可是一个难题。就郑国番这个人来说，他没有什么份量。他毕竟不是什么北京的副市长，只是一个在张庄人所共知的流氓，在追求女色和与人吵架方面张庄没几个是他的对手。人们都说他脸上的麻子就能反映他的心里有多少窟窿。他看上去像过去的乡间恶棍，像过去地主雇用的那种带枪、打人、收租的狗腿子。只要加上一顶宽边礼帽，

那种可以把帽沿按下来遮住半个脸的礼帽，他的脸就使人不禁想起了恶霸和打手。在街头不时发生火拼的30年代，郑国番因为得了天花而变形的麻脸上还有几个痣，每个痣上长着一根毛，透过总是剃得很短的头发表可以看见满脑袋的疤痕，几小块不长毛的头皮，至少还有两个难看的疙瘩，更别提那个叫人惊乍的凹部，那是他小时候从秋千上跳下时摔伤留下的，有一个隆起长在颈部，像一个未割开的疤痕，使他颈部破了相。

他总穿着破烂的衣服，由于层层尘垢，分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尤其是领子和袖口。这完全是单身汉的穿着，自己顾自己，不在服饰的细节上花太多的工夫。他走起路来有点拐，左脚向外撇，总是呈八字形。除非他歪着脚走路，不然每走一步，左脚跟长出的骨头使他疼痛难忍。正因为他总是歪着脚走路，所以人们叫他“郑八字”。由于脚伤和罕见的步态，他比大部分男人都费鞋，所以，总是看见他穿着破鞋，一两根脚趾露在外面。

那天晚上，郑八字之所以唱那个带有挑衅意味的唱段，如果说不是喝醉了，至少也是有点醉。一般情况下，醉鬼说几句醉话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次却不同，那晚郑八字在一个叫李曾宝的青年家里喝酒，还有一个叫秦贵宝的青年人也在那儿，3个年轻人边喝边聊，“八字脚”回家时喝了一肚子酒，他已晕乎乎，不难想象，他唱这个唱段，不仅是他内心情感的泄露，而且也是他同伴们心声的泄露。

那么，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对3个月前自己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感到不满。那时，李曾宝（人们都叫他李快腿），已当了近5年的大队党支书，而秦贵宝（人们叫他秦快嘴，因为他说话速度快）当大队民兵营长已近8年。由于两人的名字都有个“宝”字，所以人们挖苦他们是“两宝”。宣传队进村几个月后，突然说他们没有搞好村里的工作，就撤换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撤职，一直跟随他们的年轻人的前途就有了问题，像郑国番、陈良丁、李守平，这些都是“二宝”的积极拥护者、忠实支持者，是民兵骨干，他们忠实地执行从大队办公室传出的每一道命令。

这些年轻人在“文革”中都属一派，他们的头子李快腿在斗争开始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他的哥哥陆晋中是支书。1967年，村南的被指责为地、富、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的一帮人组成了造反派，推翻了这两

个人的领导。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快腿召集一帮他的支持者又夺回了权，照他看来是为贫下中农挽救了革命。他把那个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都看作“受蒙蔽的群众”，原谅了他们，却把那次夺权的两个头子作为反革命抓了起来，毒打了他们以后，把他们赶出了张庄。一个年长的农民、共产党员和副业队的领导，由于支持造反派，重新上台的村干部就把他当成主要的靶子，把他打出了张庄。几个月后他又回来了，他们又打他，还叫民兵看管他，最后说他是反革命，把他开除出党。他作为第四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每天在地里老老实实干活，不敢乱说乱动，一直生活在耻辱中。

然而，这些重新掌权的年轻人，支书李快腿，民兵营长秦快嘴，工作做得也不怎么样，上级领导责备他俩花在镇压造反派上的时间太多，用在生产上的精力太少，还责备说，灌渠引来的水足够灌溉张庄的土地，可“两宝”没有领导社员把地整平，没有挖流水沟，所以水派不上用场，说他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副业队，放在为附近的工厂做合同工，放在牟取暴利上，他们未经许可就在河南以黑市的价格卖麻，再从河南买上红薯干卖到山西来。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也被指责，像1945年村子刚刚解放后那些年轻领导一样，滥用权力。据一些人指责，李快腿和8个妇女私通，他的妻子为此企图自杀，秦贵宝则和他的邻居、臭名昭著的“张庄百灵”师桂香相好。

这些负面的反映，有些可能是事实，有些仅是谣言，宣传队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调查和研究，最后决定把“两宝”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他们支持解放后第一任村长张贵才，忠厚老实、不为金钱所动的会计申起才和复员军人李广青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

1971年5月新上任的领导班子没有做出什么出色的成绩，尽管作了广泛的政治动员，生产仍然不景气。由于持续的干旱，整块整块的红薯地都没成活，雨水多了，玉米都染了“黑斑”病，“两宝”对他们被撤职的决定感到不满，悄悄跑到长治去向市委抗议去了。他们不服，随时准备反攻，准备捣乱。

他们公开为自己的班子辩护，拒绝承认错误，他们讽刺、嘲笑新的领导班子，很骄傲地接受了宣传队封给他们的“黑帮”绰号。李快腿的一个邻居问他实不实他家老母猪下的小猪仔儿，李不耐烦地说：

“我的小猪仔儿还不够我的‘黑帮’分呢，怎么会卖给你这样的人？”

村民几乎还没时间去考虑这些话的含义，郑八字就半夜三更在街上大唱他的“骂殿”了。这给宣传队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逼着宣传队在李快腿和他的“黑帮”的问题上作出一个定性结论。他们是一帮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只是对撤职感到不满，希望得到重新评价呢？还是一帮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张庄社会主义革命，使历史倒退到土改前？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离谱的问题。为什么年轻的农民要反对革命？但1971年的政治气候是，强调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每一场冲突都要检查一下它的阶级意义。毛泽东的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通过印刷、复写，一天要重复上百遍，还有“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还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任何一个使用这些语录的人，都特别强调把一个问题放在所有其它问题的首位，这就是阶级政权问题。无论到了哪里，干部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这里是哪个阶级掌权”？一伙人竭力推翻另一伙人时，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代表哪个阶级”？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干部们就得努力“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意思是说，就得找出一些坏分子，那些对所有问题承担责任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再跟他们“算帐”。

农业生产的不景气，财政上的不正当行为都说明隐藏的坏分子在活动。如果一个大队的工作没做好，那么阶级敌人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主要责任，一定是地、富、反、坏在群众中挑拨是非、在干扰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在干扰社会主义生产。

张庄的工作为什么一直没搞好？答案是明确的，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挖出长期隐藏的罪恶阴谋活动的时候了。宣传队的干部已经看出，郑八字大声唱“骂殿”就是“盖子”的缝儿。接下来就等着他们把盖子全面揭开，挖出敌人。现在足以推断敌人就是“两宝”和他们的“黑帮”。

把李快腿和他的同伴称为“黑帮”很容易，要找到他们反革命、搞破坏的事实可是另一码事儿，他们这几个人都具有无可挑剔的贫农

积极分子的资格。

被免职的支书李快腿，出生在荒年。母亲认为无法把他养大成人，生下他的那天就把他遗弃在野外。收养了他的养母不久就守了寡，他从12岁起就在地里劳动，维持家里的生活，扛在肩上的沉重的镢头压弯了他的背，迫使他的脖子向前倾，使他看上去有点驼背。

民兵营长秦贵宝也是贫农的儿子，他大多数时间在地里干活，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3年兵，之后又复员回张庄，担任民兵营长。

郑八字，5岁时逃难来到张庄。他的母亲是晋城人，以8升谷子把他卖给了一个人贩子，人贩子又把他卖给了张庄北庙一个最穷的看庙人。这个倒霉的男人和池老婆靠分得庙里的一小块地勉强维持生计。郑国番8岁时，这个男人去世了，本该上学的他只好到地里干活了。那时土地已合并，他作为第二生产队的一名小社员在队里劳动，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好社员，尽管后来他有了该到不到、老受缺席的名声。

怎么能说这样的三个年轻人是企图恢复封建制度的阴谋团伙呢？

指控他们的主要依据是秦贵宝和隔壁的师桂香私通。桂香是声名狼藉的师和发的侄女，师和发是天主教的神父，许多年一直是黄浦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被揭发是地下天主教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的头目，市里逮捕了他。法院说他参与煽动那年太原的天主教叛乱，定他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还说他的弟弟、师桂香的父亲是“圣母军”的成员，判他接受群众的监督。

桂香是嫁到张庄来的，她的丈夫叫裴启发，在水泥厂当工人，是二队队长裴良顺的异母弟弟，他的院子与他异母哥哥的院子并排。良顺是秦贵宝的另一个邻居。裴启发的新娘与一般的农村姑娘不同，她的穿着比普通村妇张扬，总是骑自行车上地干活，嘴里总哼着“上党梆子”（一种地方戏），唱腔娴熟、悦耳动听，就像专业演员，所以她是著名的“马厂百灵”。婚后，有些人叫她“张庄一枝花”。她一到张庄就引起了秦贵宝的注意，显然，贵宝也引起了她的注意，作为大队民兵营长，贵宝总觉得没有必要隐瞒他和桂香的关系，所以就公开地到她家去，一呆就是好长时间。谁敢批评？谁敢反对？

桂香的男人就不敢。到过桂香院子里的人都说总看见裴启发和秦贵宝一起吃饭、喝酒，桂香在一边陪着。即使启发对民兵营长和自己

的老婆勾勾搭搭有所不满，也不敢怎么样。这个人权力太大，他怎么敢惹？再说，干吗要惹他？无论从哪方面讲也不应该惹他呀！和这些掌权的人合作是会有好处的。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两宝”不再掌权了，民兵营长和反革命分子的侄女私通，肯定与天主教反革命集团有了联系，这使村民思想上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可问题是，这个诱人堕落的女人能把秦贵宝、李快腿拉下反革命的泥坑吗？这样的想法在村里人的心中像打了个冷颤，“两宝”的所作所为开始有了不祥之兆。

七 林东

“两宝”的情况勾起了林东的想象力。林东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外交部派的代表，为我们做必要的安排，帮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林东是一位成年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外交部一位官员的夫人，不过她拒绝透露她丈夫的姓名。她个子不高，很丰满、圆脸、精力很充沛。作为旅行的伴儿，她既惹人喜欢，又令人上火。令人喜欢的是她能那么高效地、热情地、不知疲倦地尽自己的力量做好每一处安排，能迅速果断地解决所有的问题；令人上火的是她那么教条、那么缺少耐心、那么傲慢。当然林东的优秀品质是主要的，她傲慢表面的后面是一颗温暖的心，她对中国的前途极其关心，并深深地、积极地涉身于她正在看到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事务中；她喜欢出行，不管有多么艰辛，多么令人枯燥，她总想法做一些使人预想不到的小安排，比如在沿路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安排一顿野餐，使旅途活跃而充满生气。为了安排这样的消遣活动，她准备了快餐袋，里面装有面包、饼干、煮鸡蛋、苹果和桔子汽水。在乘吉普车从太原到长治的旅途中，她选择了水岸边作为野餐的理想地点。走近了才发现这与想象的大相径庭。水位已经骤然下降，宽敞的坡状的泥岸，由高趋低，尽头是库中积存余的一洼浑浊不清的死水。林东勇敢地亲自去勘察现场，找到了一块不太差的空地，铺上一块白布，然后主持了一次适合于在温莎城堡举行的野餐。

林东喜欢美食，既喜欢吃也喜欢议论吃，所以议论食物常常成为

回避其它有争议话题的办法。她最喜欢吃鱼，只要一看到鱼，有关鱼的话语就多了起来，同时，她能把她盘中的东西一扫而光，包括鱼头、鱼眼和鱼脑。她对鱼头很有研究，知道怎样从鱼头里取出那块三点支撑的鱼骨，并把它高高举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是块幸运骨，把它从高处抛下来，如果三点着地，就预示着你的运气很好，但如果是翻过来的，那就是不幸了。

林东出生在一个沿海城市，在家乡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上到高中毕业。年轻时就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在危险的年代冒尽了风险。那时身份一旦暴露就意味着要受酷刑折磨，常常还意味着被处以极刑。与国民党警察斗智同样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她以惊人的勇气对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她的经历令人敬畏。

在教会学校，林东受到了良好的英语教育，她讲英语很流利，她的英文理解能力比陪同我们的翻译人员都强。但是，她不允许自己（只要她能做得到）被当作是一名翻译。她是外交官员，不是翻译人员，她讨厌别人认为她有做翻译的义务。

这种态度反映了她性格的另一面，那是一种令人上火的性格，即对等级和地位的重视。她总是很明确地表明她是从“中央”来的。她不是翻译，陪同外国客人到中国各地走走是她的临时工作，然而，这种对自己的形象和特权如此敏感的表现并没有使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感到吃惊，感到讨厌。“等级制度”是中国人生活组织的基础，并已延续了几千年。每一个公民，不管地位高低，都认为等级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大气层中的空气一样，不需要为其存在说明理由。即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在别人面前如此明显地展示自己作为上级的地位及形象。在林东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是最令人讨厌的一点。

林东身上对地位的重视（特别是对自己地位）和政治上的僵化连在一起。她像喜欢吃鱼一样喜欢教条主义，她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所持的态度都是绝对的。尽管她此时的观点可能与她彼时所持的观点有矛盾，或她此时的观点可能自相矛盾，这些她似乎都不在乎。她所不在乎的是她此时对党的路线有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解释，仿佛任何微不足道的调整或质疑都能挑战她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怀疑她表面上的坚决隐藏着内在的怀疑。她越没有把握的时候，越坚守教条主

义。人家这样说林东“她越怕出错就越出错”。当然，林东自己不会认可这种说法，哪怕自己对自己，她都不会承认。

依林东的观点来看，张庄的特征是落后。她很自然地把落后归结于政治上的不稳定。仅仅调查大队干部存在的普通错误和弱点，检查一下他们执行政策的方式，在林东看来无关痛痒。林东从来不会对政策和指示本身的正确性提出任何疑问，她认为重要的是挖出那些阻挠大队工作的坏分子，孤立他们，并加以处理，如果必要可以严肃处理。她认为只要这样做了，大队很快就会拧成一股劲儿，实现自己的目标。

林东非常肯定地认为经过一番努力，只需1-2个月时间，她自己就能揭开张庄阶级斗争的盖子。不管怎么说，好歹她是从北京来的，从“中央”来的，她一直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这一点。如果一个中央干部不能看透一个大队所存在的曲折和矛盾，不能很快地揭露犯罪分子而解决问题，那么还有谁能？所需要的就是精力和能力——调查能力。

林东不失时机地亲自去调查，同时还作了几个假设。第一，要支持新干部，因为他们是代表革命的。宣传队经过认真酝酿和讨论选出了来自群众中的一些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并在得到张庄大队、马厂公社和长治市委的同意后，于1971年6月宣布他们就职，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工人阶级的党，反对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在林东看来，既然党的决议是革命的，那么相反的、不同的意见就不能被当作是合理的另一种看法，而是反革命的挑战，这在张庄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有关权力，大队的行政权力。

这种权力的斗争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如果是阶级斗争，那么两个阶级就一定在斗争，哪些人代表哪个阶级？似乎毫无疑问，三级党的领导经过对阶级成份、过去表现和目前看法的调查，已经重新任命了新的大队干部，当然他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谁反对他们就一定代表别的阶级。因为张庄没有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别的阶级就一定被打倒了的封建残余，地主、富农和他们的走狗。因此“张庄百灵”师桂香就重要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出身贫农，只有她与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有瓜葛。林东的整套设想都建立在这个引人注目的、神秘的、富有挑逗性的瓜葛上。

八 宣传队

我们的到来使宣传队受到激励，他们又积极开展工作，不再是连续几个月的消极观望了。因为林东一门心思要挖出村里的阶级敌人，所以她增强了与她看法一致的那些人的力量。在我们到来之前，宣传队对张庄形势的原则评价就存在分歧，自称“激进派”的人坚持认为张庄有一个正在活动的阴谋团伙，“中间派”对问题没有一定的看法；还有一小部分“保守派”则认为即使张庄确实存在阶级敌人，他们也没有能力阻碍大队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这些不同意见实际上是村里存在的分歧，也就是说，是劳动人民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见和冲突，他们中间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称作敌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林东，她带着“中央”干部的威望，特别支持“激进派”。那个长治市市委办公厅的关键人物，我们称为“范机灵”的小伙子范文，也支持“激进派”，他时不时地到张庄来，因为市委办公厅安排他负责我们这些到张庄来参观的外国人。

范文是一个“直升飞机”式的干部。“文革”前，他是长治市粮食局的一名普通干部，这个局负责管理各个粮店和粮店的450多名职工。北京的大学生们开始写标语、贴大字报以后，范文在粮食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向当时局里执行的路线提出挑战。此后不久，他协助罢了粮食局党委书记的官，自己取而代之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随后，长治市革命委员会又把他调到了《长治日报》社当编辑，利用这个职务他组织了一个“新闻工作者造反小组”，这便成了他的“政治基础”，后来他又和长治的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一些从北京到长治来串联的学生建立了联系。尽管他那个“造反小组”的人员一直不多，但他却于1967年1月25日把他的小组合并到了长治市的夺权组织中，使自己成了替代前领导班子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在市党委谋到了一个位置，并把直属党总支的18个人组织成了一个“第二司令部”。经过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异乎寻常的动作，1968年长治为期3个月的派性斗争结束时，他站在胜利的一方，一下子爬到了长

治委办公厅秘书长的高位。这是一个相重要的职位，在长治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区就更是如此。到这时，他的“第二司令部”已发展到 32 人。

从一个只有 8 人团体的头头很快升为管辖 35 万人口的市级领导，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范文看上去很帅，饱而宽的前额是他脸部的显著特征，这告诉人们他的脑子又快又灵、很管用。通过他每天的精彩言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人们便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他的能耐。从行动上可以看出他付出了大量的脑力劳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正因为手里总夹着烟，右手的三根指头被熏得褐黄。

不间断的抽烟更使他散发出一种老练的倦怠。他的面部总是一副长期疲乏的样子，好像每晚彻夜不眠，与缭绕的烟雾做伴，但他总是不仅能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而且能控制整个局面。任何想得到范文好感的人都必须保持头脑特别清醒，因为，虽然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嘴微张着，但他却仍积极地思维、敏锐地分析、迅速地行动，范文也许是一个“直升飞机”式的干部，但并不是因为上面有人把他拉了上去，他是靠自己的努力爬到最高层的。他有足够的天才爬上去，也有足够的能力固守他的位置，至少当时是这样。只是后来，我们听说他患有癫痫病。

想保住高级领导职位的一个好办法是给林东一个好印象，并通过她给“中央”一个好印象。范文做这件事有计划、有行动。从第一天起，他就对她非常尊敬，向她提供了当地的内部情况，并花大量行动时间与她商量，征求她的意见。林东欣赏他对她的重视，也投之以李。她认为范文是很有前途的干部，他不仅能在澄清张庄的问题上起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在全国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俩常常谈到深夜，一起进行调查、分析，并合作写出了一篇“关于张庄大队阶级斗争发展”的长篇报告。

范文是否确实同意林东对张庄形势的看法，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实际上，在地区“文革”的派别中，他和李快腿同属一派。很难想象他把这个年轻的农民干部看成反革命敌人。然而，既然林东参与了这场斗争，既然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他发展个人与中央、与北京的政府和党的关系，那么支持她，与她好好相处是有利的。于是，范文便采纳了林东关于张庄阶级斗争的意见，并指示全大队社员搜集

与李快腿及其“黑帮”有关的反革命言论、串通和行为。

但范文并没有愚蠢到拿他全部的赌注押在一个宝上。在公开场合，他与林东站在一起，批判“两宝”，搞阶级斗争，但背地里却把李快腿叫到一边，告诉他不要太担心。虽然他协助打倒了大队支书，但等这阵风过后，事情平静下来，他会把他再扶起来，李快腿可以指望这一点。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之风仍在有力地刮着。范文和林东的联合大大加强了工作队里“激进派”的力量，这样“激进派”在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工作队的决策，确定了政治工作的调子。

1971年的宣传队像1948年的工作队一样，是晋东南社会的典型代表。几十年来，这一地区的人口有显著增加，社会也比原来复杂。相应于这种变化，工作队的规模也比原来大，成员们比前辈更富有经验，更多样化，从整体上看，成员们的年龄也大些。

这次来张庄的宣传队队长是高跻生，48岁，是一个中农出身的干部，长治北街人（长治城墙里的一个村，村里人靠耕种荒地谋生）。

1945年长治解放后，高跻生帮助领导土改运动，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任北街的副村长。后来，长治市的扩大漫过了城墙，北街村和长治合并，成了长治市的一个区，他成了区长。1948年他被调到长治市财政部工作，1951年又到长治市人民法院任审判长，一直干到1969年。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长治市专门为市里的干部们接受再教育成立了一个学校，叫“五七”干校，这是因纪念毛泽东“五月七日”发出特殊部门的干部要接受再教育，边学习、边劳动的号召而命名的。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期间，高跻生曾到附近的公社做组织工作，1970年9月，又被安排进了张庄宣传队。高跻生为人稳重、努力、性格温和，对工作是一百分的投入。他虽然缺少知识上的聪明才智，但却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头。如果说他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发言时无休止地拖延时间的习惯，他常常复述那些他的听众们早已熟悉的事情，解释那些人们早已熟知的政策，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很努力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

宣传队的副队长是李晋东，46岁，头发灰白，面容疲倦，说话时细声细语，他原是长治剧院的主任，1970年9月到宣传队。他不像一个领导倒像一个追随者，他没有给宣传队，给张庄，还是给我们留下

什么印象。

纪理德，这个高个儿扁脸、41岁的男人，性格比上面提到的两位都有力，但却不一定更有智慧。他是个回民，无党派民主人士，解放战争中曾在陈庚将军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服役，参加过晋南战役，1949年负重伤转业到晋城，在那儿分得了土地。1951年从一所行政干校毕业后，来长治工作。他干过许多工作。1962年在税务局工作，后来和高审判长一起进了“五七”干校，不过他没有在干校的地里劳动，也没有和干部们一起学习，却被安排到了驻黄碾的宣传队，因为他有当会计的经验，便被分配去调查一些包括贪污、腐化在内的特殊案件。作为特殊案件的调查人员，他于1971年来到张庄宣传队。

张庄宣传队还有一个48岁的复员军人，叫王京和，出生在长治南街。他于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参加了“八路军”，曾参加过日军投降后向东北的进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在黄永胜的第45军（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的一部）里担任连的指导员。在“平津战役”中，他头、臂、背部受重伤，于1949年回长治休养。他的左臂再也没能完全复原，所以不能做重体力活儿，作为重伤员他有国家的津贴。回家后，他在家乡工作了20年。他是一本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活百科全书，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但他上过4年小学，尽管在宣传队里学历不算高，却是连队里较有学识的人才之一。他说：“那个时候，哪怕你只上过一年学，也会被战友们称为‘老夫子’。”

张庄宣传队的第五位成员是王新茂，人们亲切地称他“王腊肉”。他是长治出身的、肉类加工业的工人。他的父母曾经经营过腌制驴肉，远近闻名。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王家的驴肉铺和别的肉铺合并了，后来又被市里的肉联业兼并了。这样，王腊肉就由一个个体屠夫变成了一个屠宰加工厂的工人。在张庄宣传队中，他的“文化水平”最低。中国人喜欢把读和写的能力叫做“文化水平”，也许这是一种最高的幽默。王腊肉那慢腾腾而诙谐的讲话、低沉而总是嘶哑的嗓音往往使我们哄堂大笑，他那又长又瘦，皮革一样，沟壑很深的脸与他的嗓音浑然一体，逗得我们常常喊他的外号“王腊肉”来起哄。

治安主任申安怀，34岁，是宣传队年轻队员之一。他是一个英俊、活泼的年轻人，出身贫农家庭，家住长治市南街，他除当了4年兵还当过警察。1955年到长治公安局当通讯员，195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1961年又回到了公安局当了干部，负责城区居民的户籍管理。“文革”前夕，市里把他调到马厂公社当特派员，兼任公社团委书记。这就意味着他得离开有固定工资的公安系统，成为拿工分的公社社员。

“文革”期间，公社里一帮领导造反的人选他当了头儿。1967年2月4日，他成了马厂革命造反夺权司令部的政委，夺了公社的权。最后，他和手下的一帮人成立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公社革委会的一名常委，还成了公社党委的成员。

申安怀不仅活动能力很强，而且能说会道，对张庄各种人物的怪僻、特征、缺点特别感兴趣，他比宣传队的其他队员在张庄呆的时间都长，甚至超过了以前没能解决张庄问题的两个工作队中的任何人。1970年6月他第一次来到张庄，作为公社核心小组的成员在这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同年9月离开张庄和公社的其他人员一起到大寨参观。10月又和市里组织的一个工作队一起来到张庄，后来由于工作队的工作陷于瘫痪，不能搞好内部团结，便于次年3月离开张庄，在市里学习了4天之后，他又和一个由15人组成的新的宣传队进了张庄，这便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宣传队。

宣传队的其他成员还有来自长治市建筑公司的技术员，43岁的曹富贵，3名来自“长钢”的工人，他们是31岁的管道维修装配工黄家焕，42岁的装配工郑怀新，30岁的会计裴厚川。裴和黄都在196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争”。

还有2名女队员，李圣黛和钱顺英，都是31岁，她俩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是一起到长治来的，在长治一中教书，一个教俄语，一个教数学。

年纪最大的队员是齐卫笔，55岁，中农出身，壶关县人。他1946年参军，1954年转业，回来后在长治市好几个建筑队和工厂工作过。他来张庄是有长期打算的，就是来插队的。他和他老婆已成了张庄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但宣传队在张庄期间，老齐也算宣传队的一员。

申安怀是宣传队里“激进派”的头儿，回民纪理德，装配工黄家焕和会计裴厚川是他手下的兵，审判长高跻生和剧院主任李晋东是“中间派”，他俩得到两个女教师和技术员曹富贵的拥护；而复员残废军人王京和与王腊肉则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人家说他俩是“保守派”。这种界限不能分得一清二楚，因为许多问题没有人能找出清楚的界

限，而有的问题宣传队的看法又是一致的，不过，对问题的两种看法总是存在的。治安主任申安怀反对这个，残废军人王京和则反对那个。林东和范文支持申安怀，所以王京和常常是孤立的。

九 矛盾

最集中的争论发生在宣传队每天早晨组织的1~2小时的学习中。一般情况下所有的队员到陆家院子里学习，特派员申安怀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大屋里，“王腊肉”和他住在一起。这是一个一层半的农家房舍，他俩的房子在西头，房子是砖基、土墙、泥顶，房子维修得很好，但由于8月的大雨院墙大部分已倒塌，紧靠院墙的几个小棚子和小屋子好像也要倒塌，院子西南角有一个厕所，这是一个在地下挖一个大坑，上面架上两块大石头，中间留出一个空，修成的中国农村常见的男女共用的厕所。人要解手时，一只脚踏一块石头，蹲下去就可以了。这个只有三面土墙的厕所曾很隐蔽，但现在这土墙也像院墙一样倒得不成样子了，厕所墙很低，有人在里面解手时，头和肩都能被人看得见。夏天倒没关系，因为一到夏天整个院子都种上了玉菱和葵花。这些植物长得很高，遮住了整个院子，并伸到了通进院子的路上，豆角、南瓜可以插种在玉菱和葵花之间，它们的藤蔓可以顺着玉菱、葵花的杆爬到高处，枝叶交错形成了一个不能透视的绿色屏帐，形状各异的叶子和叶荫完全遮住了厕所和院墙。

离房子的近处有一口井，井上有轱辘、井绳和桶。我们走进院子与宣传队的队员们相互打招呼时，一群村民来担水。显然，这口井不只为院子的主人陆家提供吃水，西边的墙上开了好几个豁口，那些自家没有水井的邻居们就从这豁口处过来担水。

早晨的空气冷得刺骨，低沉、飘动的雾遮住了太阳，将潮湿和寒冷带进申安怀和王腊肉住的房子。他俩睡的是炕，一种砖头搭起的床架。前几天的大雨使地下水位超出了平常的高度，地面和土墙明显下陷，屋子的砖基也变了颜色，整座房屋都有倒塌的危险。由于屋里的空气潮湿发霉，所以我们把文具、椅子和当凳子用的砖块搬到了院子里，然后耸起肩膀顶着晨雾开始了一天一次的学习。

为了避开潮湿的地面，离地面高一些，王腊肉不是坐在而是蹲在凳子上。他蹲在离地面一尺多高的凳子上看上去很好笑，膝盖顶住胸部，紧抱内臂，就像一只栖息在野外石头上的鸟，而不像一个正在学习的人。

这种情景使“王腊肉”想起了农村干部们第一次进城的所作所为。1948年，晋东南专署党委的办公室里配置了套着纯白布罩的沙发，一位农民干部坐下来发言，他先是把一只脚挪到了沙发上，后来可能觉得不得劲儿，又把另一只也挪了上去，重新操起了农村人习惯的蹲式，就这样他把上党的黄土色踩到纯白的沙发罩上，再也洗不下来了。

从隔壁的屋子里传出了陆家起床的声音。不一会儿，王玉梅就走了出来，开始做她早晨的家务活。王玉梅就是那个我们大家熟悉的在大队药房抓药的女人，也是张庄村地方戏演出队的明星。还没有编起的长发披在她的背后，又黑又亮，特别迷人。她先从井里打上水，再挑回家，看得出，挑着满满的两大桶水使她非常吃力。缸挑满后，她又到厨房去生火，准备做早饭了。这时，她丈夫的妹妹，一个十来岁的姑娘坐在门口梳头。

每天的学习，开始总是念一段文章，有时是《山西日报》上的一段，有时是当地政府的新指示，大部分时间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的一段。今天早晨，高队长从毛泽东的《矛盾论》中选了一段，由李老师念给大家听，因为她的文学水平是全队最高的。她刚念完，热烈的讨论就开始了，大家讨论了自己身边存在的矛盾，包括夫妻矛盾。

治安主任申安怀，由于住在这个院子里，所以有机会仔细观察房东家的一切活动，看见玉梅来挑第三担水，便说：“我有一个例子，王玉梅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她在婆婆家里受压迫、受欺负，却不敢反抗。”

“你为什么这样说？”高队长很吃惊，“她不是那个家里被统治的人。”

“老八路”王京和插话说：“也许她不受别人的统治，可你能说她统治着家里别的人吗？隔壁是谁掌权？很明显是那个老太婆。”

“可每个家庭总得有个当家的呀。”高队长说：“家里和社会工作一样，总不能每个人都当家。”

“是啊，”老八路回答道：“是应该有个当家的，但当家的也不应该是独裁者。王玉梅根本不敢反抗。”

这时，申安怀插言道：“妇联主任陆素云在她婆婆家也一样，她的家里也没有平等。”

这下，高队长可不让了：“在当今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申安怀接着说：“在理论上也许是平等的，但你能保证事实上也平等吗？素云和玉梅根本就没有什么平等！”

“玉梅自己挣钱自己花，穿着好衣服，他和家里其他人一样的饭，为什么说她不等？”

“为什么？因为她在不停地干活儿，这你能看得见。至于生活水准，这个家至少有两三个人挣钱，这样家庭中的女人一般都能吃得好、穿得好。你不能根据她的穿戴来判断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他们不会让媳妇穿得破破烂烂，她是一个出出进进的‘展览品’，是拿给人家看的。他们想让人们看到他家的儿媳妇穿得多好，可她仍得干家里所有的活儿。”

高队长被申安怀的反驳惹恼了，反问道：“难道她不应该干活吗？难道干活就是受压迫吗？”

“不！当然不是。”王腊肉也参加进来，说：“她应该做她那一份儿，可这并不是说她得每年365天不停地干活，而别人却从来不帮她一把。”

高队长说：“我想你还应该进一步调查一下，也许那个老太婆不能干活。”

“老太太身子还很结实，”申安怀解释道：“她那17岁的女儿更结实，可自从我们住在这儿，就没见她挑过一次水，这活儿全得玉梅干，王玉梅怕丈夫，而她的公公却是怕老婆。”

“这些事儿她们肯定在家里自己商量吧。”高队长不愿让步。

申安怀就住在玉梅隔壁，这个家里的事情他天天都听得到。“商量在他们家根本就是个形式。玉梅没有讲话的权利。如果她想讲，哪怕是一个字也要得到婆婆的同意。每次做饭，都必须先问婆婆该做什么，好像她是那老太婆的佣人。”

“可她看上去很幸福。”高队长抗议道。

申安怀脸上显出作呕的表情，他说：“你把这个叫做幸福，难道你认为能穿上一件新毛衣就是幸福？”

谈到这儿，宣传队里年轻的妈妈李老师插了进来：“幸福，高队长，您说什么是幸福？在下结论之前，您最好作一下调查了解！”

高队长反驳道：“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说她受压迫，因为没有足够的事实能证明这一点。我所看到的是，他们吃面条她也吃面条。”

“拉倒吧。”管道修理工黄家焕很气愤：“她公公每天吃两个鸡蛋，可她从来没尝过一个。”

高队长说：“那也许是老人的特殊需要吧。”

“可她也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呀，”申安怀憋不住了：“为什么她就不能得到一份儿？”

“我同意。”王京和说：“现在仍有许多封建思想存在，也有压迫。虽然你不能说这与封建压迫一模一样，可也是压迫。”

在玉梅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不统一，高队长就把话题转到了他们今天早晨要讨论的中心问题上来，这就是张庄大队的人与“两宝”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

申安怀对被免职的党支部李快腿——李曾宝批评得最厉害。“他不接受批评，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站对了队。但是，许多开始站对了队的同志后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看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看看山西的刘格平！”

这时，黄家焕说：“他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而且对在‘文革’中与他站在一边的人也不进行批评，他看自己是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谁要批评他，他就反咬一口，说这个犯了路线错误，那个是坏分子，他们怎么能批判我？但他自己却用两套方法看问题。他依靠的是什么人？都是一些有问题的怀疑对象。但由于他们支持，他就对他们宽大。这样，他组织了自己的一条阵线来反对批判他的人。”

“李快腿很狡猾，他先是顶你，然后就哭。”申安怀说。

“是的，昨天我们和他谈话时他就哭了。”从中央来的林东说：“我明确告诉他，你认为有人站在你一边，他们不会背叛你，可你怎么能依靠这些人？你的问题已捅上了天（中央），现在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就是做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评。”

她接着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一定要处理他。昨天是我第一次见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他流着泪，红着眼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在那些帮助过我的同志们面前，我真没脸见人？’简直是废话。很早以前，我就已经看透了这号人。”

高队长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给他扣太大的帽子。他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大。他是贫农出身，60年代中期入了党，是新一代青年中廉洁无私的青年干部。他是‘文革’中正确一派的头儿，拿了权，在他掌权的5年中村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认为自己的成绩不错，所以骄傲自大。他怎么会低头呢？”

王京和说：“依我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不解决就会转化成别的矛盾。”

“如果李快腿不作自我批评，继续和我们宣传队、大队、公社乃至市里领导作对，他就可能把这种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王腊肉说。

“确实是这样。”高队长说：“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认为批评他的人在挑起旧的派性，支持他的人才他真正的朋友。抱着只有敌人才会对他进行批评的想法，他就永远也不会自觉地改造自己，走上新的道路。”

他们的宽大给林东发出了警报。她说：“你们认为事情那么简单？也许事情会更复杂。我们对李快腿的好朋友，民兵营长秦贵宝了解多少？在他和师桂香的关系背后还隐藏着什么问题？她的亲戚都是反革命，她伯父参加过太原的‘天主教’暴动，秦的一家都是天主教徒，也许迷恋师桂香有什么政治背景，也许这不只是一个生活堕落问题。我们怎么敢肯定在这个女人的背后没有人指使她和张庄的村干部套近乎、拉他们下水呢？”

“对，如果看到这些，李快腿就有许多问题。”申安怀说：“在‘文革’中，李快腿一上任就和那些有问题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有关系的人勾勾搭搭，这是为什么？这些人一直想把干部们拉下水。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被师桂香拉下水的秦贵宝把李快腿拉下水的，而师桂香则是被一些有问题的势力拉下水的，可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这下，林东找到了她需要的突破口。

“依我看李快腿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就像‘5.16分子’一样。”她说，好像她立即就能指出谁是反革命，就像1945年王雨来觉得自己能百发百中一样，“他很会作样子。他说他不应该受到批评，所有的批评和责备应加在别人身上。可不是他是谁打了副主任？不是他又是谁在民兵营长秦贵宝家大吃大喝？不是他又是谁诱奸反革命分子吴国凡老汉的女儿？不是他又是谁总站出来保护秦贵宝？如果他自己不参与阴谋，又为什么要保护秦呢？”

由于林东的引导，宣传队的队员们决定对牵扯到“两宝”的其他人，其他事情进行彻底的调查。

宣传队在专心搞他们的调查。我决定回过头来，从1948年土改运动的结束开始，追寻一下张庄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奇怪的转折点的。首先，我想知道张庄是如何从一个只有许许多多的小块耕地，每家每户自耕自种的村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大面积农田，社员们共同劳动、共同收获的合作化的大队的。我还想知道，领导干部及他们执行的政策是如何引起如此深刻的影响，如此激烈的斗争的。



第二部

组织起来

只有在亲身体验以后，人们才会真正相信一种新事物。

——尼科劳·麦奇阿乌雷



十 四大自由

我们相聚在天主教会育婴堂古老的穹顶下，许多年前，土改工作队和村里的积极分子经常在这儿讨论问题直到深夜。当年，张贵才、张兴发、申天喜参加会议时还年轻的民兵，今天，他们也来了，不过都已步入中年，为人父母，有的还当了爷爷、姥爷。他们到这儿来是帮我回顾土改后张庄的情况，宣传队的王京和也跟他们一起来了。王京和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负过伤，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长治市政府农工部工作，所以张庄人回忆不起来的情况得由老王来补充，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所以能详细地回忆张庄的一切。

一有机会，我们就搬出椅子、凳子坐在院子里，不过在我刚到的那几天老下雨，我们只好躲在教堂阴潮的大厅里。

张兴发依然是三位村干部中最健谈的。他从1949年互助组刚成立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开始讲起：

互助组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很快结算债务。农户经常需要互相借用劳力、牲口，但是，如果有人拒绝偿还所欠的劳力，也不做其他补偿的话，要让农户自己去讨要可不容易，我们的互助组就有办法对付这种事。

有一个新组员，叫孙九发。我们帮他锄了好几次地，为他付出了劳动，可他就是不还。我们把他欠的工算成了谷子，可他说没有谷子。最后我们跟他摊牌了：“快还，要不滚出互助组！”就这也不能把他怎样。我们只好告到了区公所，当时区公所就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把孙九发拉来见朱书记。朱书记当时正忙着，就让他在后屋等一会儿。

朱书记一直忙到中午，完全忘了有人在等他，锁上门就出去吃饭了。那个闲置的后屋里满是跳蚤，孙九发在里面被咬得没处躲没处藏。想逃到屋外，却发现门已上锁。他想自己一定是被关起来了。跳蚤越咬越狠，像要把他咬死才算完。他急了，又捣墙又踢门，大喊救命，但没人听见。等朱书记吃完午饭回来，孙九发认输了，他愿意马上付给他欠互助组的债，只要能离开那个跳蚤窝。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有计划的，只是让他赶上了。

孙九发和跳蚤的故事把我们带回了张庄集体化的历史，而这历史正是这本书的主题。

在《翻身》一书的结尾，我曾对张庄在1948年土改后的情况作了总结：

“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接下来，他们要做出选择：是单干还是组织起来创业，单干是朝向资本主义，集体经营则是朝向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有一致的意见，大多数农民，除了最先进分子，还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判断，这个概括站得住脚。在1948年，不仅大多数农民，不论是不是党员，还从未考虑过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即使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由于内战烽烟正浓，党的政策是维持生产。在土改运动的巨大冲击下，保证田不抛荒，颗粒归仓。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在调离张庄之前对农民们说：“没人喜欢受穷。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得住我们，大家都要像李顺达（平顺县劳模）一样富裕。”

后来，这个观点被概括成一句撩动人心的口号：“发家致富”。当时华北农村的形势是，农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每家农户都必须依靠自己，他们没有“铁饭碗”，没有“口粮配给”，甚至没有任何应急的退路，因为那些过去借给他们种子的富农，除给他们一季口粮的地主已经被消灭了。土里刨食的农民只有靠土地与热情来迎接挑战了。

出于历史的必然，私有制为压倒性的产权制度，最狭隘意义上的自利被视为社会的驱动力。政府只能因势利导，保证创业的回报，谁出力谁受益。这些收入可以自由地用来改善个人生活或投入个人生产。

结果，党重申了新民主主义的“四大自由”，并彻底执行。“四大自由”是：

1. 租佃自由
2. 雇工自由
3. 借贷自由
4. 贸易自由

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让人们能调

动一切资源开展生产。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如果这一切有保障，那么这场战争就一定能打赢。

再者，即使在战争胜利后，也需要许多年来恢复国民经济，在整个社会开始重组之前，还需要若干年重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经济必将起支配作用，“四大自由”为革命的成功推进提供了一把钥匙。

然而，在重建阶段提倡“四大自由”并非意味着忽视私有生产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小规模生产，更不用提“发家致富”了。号召每个农业生产者都富裕起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矛盾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剥削者，因为他通过雇用别的劳动力致富，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通过雇工置地加息放贷和创办企业致富。

有人买地就一定有人卖地，有人雇用劳力就一定有人出卖劳力，有人放贷就一定有人借款，并得付利息，有人爬上经济的阶梯就一定有人被摔下来。

富不起来的人就必须寻找别的出路。毛泽东提倡的出路是“组织起来”。首先搞互助组，人们在劳力、工具、耕畜上互相帮助，但每家都有自己的收入，其次是搞合作社，土地、农具和耕畜共同利用，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搞副业，共同的粮食及其它收入共同分配。

“组织起来”，不论在哪个水平上，必须依照自愿的原则才能有生命力。由那些认识到好处的人自愿组织起来，以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从那些仍然按“四大自由”搞个体经营的单干户的汪洋里提炼出来。只有合作社成为主导形式，四大自由和私有生产才会受到挑战。

1943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把手中分散的生产资料、不充足的劳力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对自然环境，获得更大收成，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到了1948年，随着华北广大地区土改运动的完成，“组织起来”便成了向旧的生产方式挑战的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方式。“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一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而且是“中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决定中国未来社会性质的战争的第一场战役。



在中国，既然地主、买办及他们的海外后台都将灭亡，那么，中国社会斗争的标靶便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统治者，而是现代的资产阶级——虽然因为其多层结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民族救亡斗争中的同盟军。

在共产党动员、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生产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将要有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会比从前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更难把握。

国民党败退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把持的工业、商业被没收，土改运动遍及全国，此时的问题就不再是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而是在城市和农村约束和限制资产阶级企业发展，消灭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在农村，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这些组织能把劳动者召集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潜力，共同致富。

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就是加速两极分化，壮大富农。不用10年，中国就将面对苏联在1930年代所陷入的那种僵局。1917年10月革命后，由于土地的分配，富农经济发展强大，为了挽救贫农不致成为佃农，苏联被迫进行了近乎第二次内战的社会重组。在这场运动中，不仅富农，甚至有些中农也成了斗争的靶子，因此，苏联的城乡关系遭受了持久性伤害。

在中国，毛泽东警告说，阶级分化的条件仍然存在，如果党任其过快发展，那么严重的阶级对立在所难免。土改虽然对最重要的农村生产资料土地进行了平均分配，但是，在农村还没有消灭阶级。不论一个地方是否进行过土改，地主阶级都是土地革命首要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的堡垒。他们的财产已被全部没收。但从1949年起，对富农实施的依法充公只限于剩余财产，留给他们的财产，像一直受到保护的中农一样多。再往下，虽然大量的贫农得到了成为独立生产者必要的财产，但仍有为数不小的佃户和雇农很贫穷，因为再没有足够的财产分配给他们。尽管农民构成了劳动人民的绝大多数，但是在土改后的生死较量中，他们仍处于不利地位。

阶级分化根子还在，如果政府奉行无为而治，也就是继续推行“四大自由”，分化只会愈演愈烈。大量处于中间水平的家庭勉强维持，有一些开始向上发展，而另一些则迅速下滑，这种分化加速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最好的结果是富农统治，坏则是传统地主

体系的复辟。

以此来观察张庄，人们不禁要问：

1. 阶级真的存在吗？
2. 两极分化会产生新的阶级吗？如果能，将会是什么规模？
3. 分化对个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

十一 张庄的情况和数据

1946年—1948年（土改期间），张庄169户贫农和雇农家庭共605人分到了2077.7亩土地。这样，他们拥有了较原来多一倍的土地，人均5.8亩；76户中农341人拥有的土地减少了480亩，但人均仍有6亩；富农和地主原本拥有相当于中农水平2~3倍的土地，他们通过宗教和氏族控制了更多的土地。土改中他们失去了914亩私地，650亩的教堂、庙宇和氏族土地，最后每人只剩下4.6亩。

与土地情况相似，其它生产资料（如耕畜、马车、农具等）和其它私人财产，如房子、衣服、炊具和贮粮用的各种器皿都由农会重新分配。这样，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几乎相等的一份生产用具，住房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另外，农会还重新分配了水井和厕所，以便每家每户都可以从指定的水井中挑水，使用指定的厕所，并且分用农家肥。

尽管这是大规模的财产再分配，但不公道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仍有29户贫农82口人每人只分到土地5.1亩，比其他人的平均数少了10%，他们分配到的耕畜、马车和农具乃至住房也不足，这些户仍被划为贫农；相反地，140户分得稍多一点的家庭被划为新中农，他们人均土地5.8亩；比这些新中农再好过一些的家庭是70户旧中农，这些旧中农341口人，每人占有土地6亩，他们在耕畜、马车、农具和住房上情况也要好一些；从前的地主、富农户12口人现在占有的土地比任何层次都少，每人只有4.6亩，比平均数低20%。

党的领导很明确地指出，张庄农民自己的经验也证明，重新分配现有的财产不是合适的办法，它不能把这29户贫困户拉到平均水平线以上。供重新分配的财产只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中农家庭的财产，他们过去背着沉重的债务负担，积攒下一些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

财富，二是那些已经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和地主，他们现有的财产已大大少于村里的其他人，除非逼迫他们中的许多人去当乞丐，否则，在他们身上再找不到什么财产了。

如果这样，救济这些贫困户的担子就会落在那些从前靠租交利息，提供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劳动农民肩上。

可供重新分配的财产几乎没有，29户贫农只能维持贫困，想“发家致富”也没有条件。他们构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对合作起来比对个体经营更感兴趣。

下一步，我们必须对已经“翻身”的贫雇农进行一下分析。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认为合作化是一条路子。确实，以他们分到的土地和其它财产，也算得上新中农了，但是，他们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没有过家旺业旺的经验，也几乎没有人指望能在土改中分得的有限土地上解决生计问题。党的领导认为，在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中，这些人仍然是贫农。客观地讲，他们仍然有革命的要求，他们对私人财产看得不那么重，因此，切实可行的集体化道路能让他们动心。

本身是中农一部分的下中农与贫农一起并称贫下中农。下中农在旧社会总体上属于沉沦的群体，受越来越重的债务压迫，不断失去土地和耕畜，面临破产。不过，他们还有一些幻想，也许剩下的一部分财产可以保证将来的兴盛。在张庄，250户中就有209户、960人中就有786人是以上这种情况。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当时党中央称之为“贫下中农”，他们占农民的绝大多数，他们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把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209户贫下中农中，36户旧中农每人拥有的财产确实比以前多一点儿，4户以前的富农和1户地主平均每人的财产比现在最穷的贫农还要少。但张庄的阶级分化并不严重。

地委对张庄附近5个村庄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土改5年以后的情况大致如此，1951年新产生的和原有的中农占95.02%，富裕中农占2.22%，土改后发展起来的富农占0.6%，雇农占3.84%，其他占0.44%。

如果只把阶级成分理解为人与其占有的再生性资产之间的关系，将占有多少作为标准，那么，就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张庄和附近的村庄只有一个阶级，组成该阶级的所有成员的世界观应该是一致

的。实际上，这种结论是不成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以前的阶级成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显然，在张庄，那些过往的剥削者把夺回自己过去的财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辛勤劳动发展生产不是他们的计划；还有一些中农户，他们只希望像过去一样，靠单干致富，所以，这儿至少有两种人鉴于历史的经验不愿和大多数人合作。

第二，比阶级成分对人们的精神束缚更严重的，是两极分化过程本身。统计显示，对相当多的农户来说，分得土地和财产只是另一次分化的起点。家道或旺或衰，运动的方向比起点更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发了家的觉得单干很好，而那些走下坡路的会失落痛苦。

地委 1951 年的调查表明，土改 5 年以后，周围农村有 96 户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 284.11 亩耕地，有 99 户农民买入了耕地。卖地致贫的户数与发家置地的户数相当。党的分析家们估计单干户里遭遇严重困难的占 37.7%，但这些人中只有一半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并在逐步用合作的办法来进行自救。有 42.3% 的户情况稍好，他们还是愿意单干。

在这些仍愿意单干的人当中，有些正干得红火，新的事业和新的方式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小伙子们在地里播种各种新品种的庄稼；小媳妇们都把头剪成了短发，男女老少都憧憬着新的奇迹和欢乐。在晋东南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来赞美这充满乐趣的生活：

早晨“金皇后”
晌午“一六九”
晚上“剪发头”¹

地委书记王谦在他给中央的土改情况报告中引用了这段顺口溜，但他用“玉环秀”（一种新品种小米）代替了“剪发头”。这种改动也许适合报告的调子，但却失去了许多趣味。

这段顺口溜成了“新民主主义”思潮的象征。这是一种满足于土改后国家形势、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斗争和改造的想法。许多人包括许多党员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革命成功”论，认为土改结束了，革命

¹译者注：“金皇后”（良种玉米），“一六九”（良种小麦），就是说每天都能吃上玉米、小麦。土改前群众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完成了，以后的事情就是埋头生产、致富、享受。

张庄有3户农民在1948年以后埋头生产，日子过得很好。这3户农民中最富裕的是师家兄弟，老大师方元，是八路军退伍军人，张庄党支部领导成员，老二师福元，也是共产党员，1947年以后一直是区委干部，老三师二则，在家里种田。土改前，他们都是中农，但也受尽了压迫和剥削，都怀着仇恨和冤屈与张庄的地主进行了斗争和清算。方元和福元解放前都是张庄的积极分子，他们入党很早，一直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政治上的优势，他们在分配财产时分得了较多的财产，土改后他们有70亩土地、两头驴、两辆车。农忙时节，特别是秋收时，他们雇人干活。只要身体健康，肯吃苦，这哥仨就一定能发家致富。

张兴发，1948年的张庄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个致富典型。原来，他家赤贫，他自己干了半辈子雇工。土改中他分得15亩地，不久又分到了一头驴、一头骡子。兴发正值壮年，三口之家，每年都可望有余粮。

第三个富裕户是李全忠，大称“李胖子”。他很早就参加了民兵，当过小队长，1949年入党，老堆金死后，李胖子接替他当了村民委会主席。李全忠小时家里曾在灾荒时卖了一个儿子只换了几升粮食。他自己还把4亩地卖给了富农郭春旺，这地还是他来种，不过得给人家交租。1942年粮食灾荒，他交不了租，郭春旺便把他家的粮、布和其他物件统统拿走了。但是，在土改运动中李胖子的情形翻了个个儿，5口人分得了差不多30亩地、半头驴，正处壮年的他辛勤劳作，不久，他就攒钱从一个林县人那儿买了近6亩地，这个林县人卖了地要回老家。后来不久，李胖子又买了一头骡子，后来又把另外半头驴也买了过来，这样，他就有了两头耕畜。他为别人拉煤取暖，为街坊邻居犁地种田，许多人欠下了他的债，所以，在他地里需要帮忙时，那些欠他债的人总愿意来为他干活，以此抵债。他的办法是每次下雨后都叫8~10个人来为他干活，趁土地松软、野草易锄，24小时内就把地锄完了。他总是很快付给报酬，干一天活给3~4升谷子，人们在他地里干活时，总能吃饱吃好，因此，他要找人帮忙是没有问题的。他当了干部，威望和权力对他更有利。村民，特别是青年人发现很难拒绝干部们提出的任何要求。

李胖子有了新牲口、耕地，干得很出色，不久就有了买房子的能

力。他从一个农民手里买下了他院子里的6间房子，这个农民由于孩子太多不能维持生活，只得卖掉他在土改中分得的房子。李胖子的孩子们已长大该结婚了，他又逐个为他们买了新房，他想把他住的那个院子里的房子全买下来。买了这么多房子并没有用完他的积蓄，他常有剩余的粮食借给较穷的邻居们。据说，他借出去的东西从不收利息。如果真是这样，恐怕是因为党员不允许这样做。

起初，由于他的弟弟参加了解放军，得到帮助是因为他是军属，后来，他弟弟负伤返乡后，这种帮助更是增加了，他家里可以从政府得到每年两次90元的残废补助金，同时，村里每年还给他家拨150个工。

李胖子的伤残弟弟李太平雇了一个全劳力，并为他及他的全家提供了住房。这个人叫周增福，是个贫农，土改中分到了地，但他经营不好，作为单干户维持不了生计。

李胖子办起了一个磨坊，继续增加其收入。农忙季节他雇贫农申水生白天在磨坊干活。申水生家人口多，土改中分得的土地不够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出来当雇工，为了“老婆孩子吃得上小米成菜”。

很清楚，如果没有像周增福、申水生这样，光景不好，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就不可能有富裕和兴旺的人。还有一个日子不景气的人叫秦振海，他是老郭丑孩的外甥，丑孩老汉1948年斗保长王文则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振海的父亲在土改中分得20亩地、一间房、半头牛、半辆车。老人得病后不能再劳动的时候，振海只有14岁，还不算全劳力，在田里干不了重活，而且人还有点懒。最后不得不把一半地、房子、半头牛和半辆车卖给了他舅舅丑孩老汉。但仍不能维持生活，最后振海去了专署办的一家化肥厂去劳动了（这个厂在长治市郊区），他工倒是做得不错，挣钱也多，有了一些积蓄，还结了婚，后来又在张庄买了房子。这时，张庄已成了马厂公社的一个大队，振海作为一个全劳力又回到了张庄。

使得一些家庭兴盛而另一些家庭逐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耕畜的所有权。正如王京和指出的那样，一个拥有两头好耕畜的农民根本不用劳动就可以维持生活，他只需饲养和照料牲口，然后把它们租出去就可以从别人那儿换回足够的劳力来耕种他所有的土地。以上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牲口创造的价值相对要比人力创造的高一些。一个男全劳力劳动一天可以挣4升谷子，租一头牲口犁一亩地要

出5升谷子，两头牲口一起一天能犁8亩地，所以要出40升谷子，如果靠人力来犁地，不论是谁必须劳动8~10天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这样每收一季，光犁地就得花去全部收成的5%。

耕畜的所有者占的便宜还不止这些。由于耕畜相对不足，在春耕和秋收农忙季节他们还能从其它方式的交换中得到好处。

兴发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

一个人用镢头一天能翻一亩地，可这活儿是相当重的。如果可能，他宁愿租牲口来犁地，但牲口只能翻10厘米深，没有镢头翻得深。出租牲口的人翻自家地的时候要深些，在别人的地里就不那么卖力了。还有，他选择最合适的时机，也就是在一半湿半干时翻自己的地，不太湿又不太干，但给别人翻地时就只能就着他的时间了，也许土地又硬又干，也许还很湿，你得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翻地的交换，但你偿还的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不过只按天计算。你可以拉煤、间苗，也可以用独轮车或扁担运送做砖用的土，这些都是很重的活儿，比起赶牲口拉犁重得多。牲口的主人还有另一个好处，他不仅可以出卖牲口的劳动，而且还可以占有牲口粪，这些粪肥都上在了自家地里。

所以，没有牲口的农民每次都得讨人家的帮助，春天他不能按时给地上粪，秋天又不能按时把庄稼运回家。可牲口主的每件事儿都能按时完成，他首先干完自己的活儿，然后才去帮助别人，他的地整得又及时又齐整，每件事儿都已就绪，而那些没有牲口的人只好等着人家的“恩惠”。

没有牲口的人提前很早就得跟牲口主打招呼：“你有什么活要干呀，我来帮你”，“我求你用骡子时，你可得帮我。行吗？”

这些事儿提早就得办。总之，这些人必须和牲口主套近乎，如果人家满意了就会安排以后帮你犁地的事儿，他的庄稼该收了，就会叫那些有求于他的人马上来帮忙，不管他们有多忙，人手有多紧。这些人来了，利索地把活干了。牲口主的老婆为他们做好一顿饭，一顿很丰盛的饭，这下活儿干完了，也吃饱吃好了，大家都满意。但是，如果你敢说你很忙，下次再来，那么你就吃不上那顿丰盛的饭菜，等到下一次犁地的时候，他也不会用牲口帮你犁了。

农民和工人不一样，他们不挣钱，只是以劳力换劳力，但是劳力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交换要对等一直成问题，农忙时帮工和农闲时帮

工，重活和轻活，不同的季节工钱大不相同。这样，一个没有牲口的贫农，如果愿意付出劳动为人家犁地来挣固定的工钱，那他付出的将比得到的多很多，特别是当以小时计算时。

很明显，牲口干活的要价比人工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这是由于耕畜暂时的缺乏造成的，而缺乏又是因为战争。日本军队为了吃肉疯狂地宰杀牲畜，使牲畜数量大幅度减少，而社会动荡和粮食短缺又使它们的繁衍极为困难。

然而，即使牲口数量不断增加，繁育成本和牲口价格在逐渐下降，买一头牲口仍是一笔不小的投资。那些负担得起的家庭就能从他们的街坊邻居那儿占到便宜。在美国的乡村也一样，如果拥有大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你就可以通过代耕代收，从邻居那得到好处。

土改后一些人兴旺了，一些人衰败了。张庄有几个农民放弃了种田，干起了小买卖。纪贵生先是离家到一个国营商店当了店员，但后来他看到“四大自由”确实在经济中贯彻了，便返回张庄在村上开了一个小商店，后来，面对供销合作社的竞争，他又把小店卖了，到马厂的一个供销合作社的分社上班。

另一个人陈二京，从东北回到张庄开了一家商店；还有一个从河南林县新来的人金大全在张庄办起了一个磨坊。

1950年地委对15个村庄、3394户农民作的另一次调查表明，13.7%的农户卖了地，9.6%的人还在出卖劳力，这些新富农户大部分的收入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他们占全部人口的1%，这些新的剥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穷的农户，他们在土改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如何富起来。

第二次调查的是3个县农村的手工业，情况表明，开办小型家庭手工业的50户成了剥削者，他们共雇用工人工142名，每户不到3名，但足以说明他们靠雇工来赢得收入，而不是靠家庭的劳力。

十二 互助组一些例子

显然，蔡勤“家家户户当新富农”、“党不再爱穷人”、“发家致富”等口号的贯彻给张庄一些人带来了富裕，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人的破

产，大多数人维持现状，但是经济压力不断加大。有些较有眼光的人，开始按毛主席一直号召的那样，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的第一步就是互助组。愿意加入这种组织的街坊邻居们组织起来，分成互助组，合用劳力、耕畜和农具。人们愿意试一试互助这种形式的原因，不是由于哪一级领导的号召，而是由于经济利益。尽管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重新分配了，但还是没有足够的驴、牛、耩、车、甚至铁锄头分给大伙，所以这些东西只好被分成几份（驴的一条腿、车的一个轮），人们为了生产只好组织起来，一个家庭得到了一件东西，如驴，但却没有其它的东西，如车，他们必须合作。否则，就要受那些有实力的旧中农或那些开始崭露头角的新富农的摆布。

另外，除非你像那些新富农那样用畜力交换人工，不然你拥有的牲口和工具就都无法物尽其用和产生收益。

一头好骡子能耕种 120 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 120 亩地，只有极少数的有约 60 亩地。土改后，张庄所有的地块中最大的也只是一户 9 口之家的 66 亩地，但即使这样一个大户人家也不能充分利用一头骡子的生产力，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套大车、一张犁、一把耙、一副耩，那么成本合起来将会与这 60 亩地也不合比例。因此，一个有了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马车了，即使在农活之外，再用大车跑运输也还是不够成本。

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和农具分给大家，又由于有的土地面积小，任何设备都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所以，除了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最终只能组织起来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通过互帮互助来解决问题。

土改中和土改后迫使人们走向互助的经济压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种压力使人们在一定的自发的基础上进行互助，但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互助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也没有以任何一种哪怕是暂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具体化。当然生产者在土地和生产能力不均衡的情况下搞合作化也是很困难的，富农不愿和贫农交换劳力。富农雇用贫农，并可以从这种交换中得到剩余价值。在旧社会，那些有牛或有骡子的人可以利用这些耕畜从贫农那儿榨取无偿的劳动，所以他们不愿意和这些人搞互助。只是在土改以后，才出现了由几户大致平等的少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小集体，这些人共同拥有一头牛或一把

犁，这样，才使得合用劳动力、牲畜和农具成为可能。

引导人们搞互助组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那些成功的榜样。在山西有一个很出名的互助组，这就是由李顺达领导的西沟互助组。1943年，李顺达开始成立了一个由6户邻居组成的互助组，他们在一起拉套犁地，在平顺县没人耕种的深沟里开荒，在开出的地里留出一些来种棉花，李顺达的母亲砍了一棵树，做了一个纺车，教给互助组里的妇女们纺线。合作的力量换来了土地的丰收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1944年，李顺达参加了劳模大会，并被誉为了晋、冀、鲁、豫边区劳动英雄。从此，西沟这个小村庄在华北家喻户晓。

那时并不出名的大寨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后来妇孺皆知²。大寨是晋中昔阳县虎头山北界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只有荒置的黄土地和处于虎头山北坡的石头地。从地理状况上讲，这个地方就像美国的北卡罗莱纳、田纳西和西弗吉尼亚州内处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的沟谷地。当年陈永贵是坐在他父亲扁担挑的箩筐里逃荒到大寨的。这里七沟八岭，从虎头山顶向下望去，地势非常险峻、陡峭，600亩耕地由4700块小地块组成，大多数地块是在山岭上开出来的用石头围起来的狭窄梯田。

没有人填沟，因为田土容易被雨水冲走，60户极端贫困的农户耕种着这些薄地，他们还要给一户不在村里居住的地主和三户几乎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富农交租。那真是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地方。

大寨的许多人以前是乞丐，他们在虎头山住下来是因为那儿的土地没人要。然而，每当他们开造出一两块小梯田，已经忘记了这些土地的地主马上就会来写契约、收租子。大寨是一片荒地的时候没有人注意过它，但一旦有人在那儿种出了什么东西，所有的人都想来分一份。

人们说大寨是“三穷五多”，即人穷、地穷、村穷，羊倌多、雇农多、乞丐多、卖孩子的多、自杀的多。有时还要加“一多”——灾害多。老天少雨时，庄稼干枯在地里；老天下雨时，田土被冲进集水沟，带着庄稼、黄土和围栏梯田的石头一起冲进了下面的河沟。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出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形成了“三穷六多”的命运。

² 原书注：陈永贵与大寨现在正在受批判。依我看，这些批判出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是不公正的。

抗日战争胜利了，紧跟着进行土改。土改中农民们组织起来斗争，土改后他们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组织互助组时，村民认为“兵对兵，将对将”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具有同等劳动力的人应该组在一起，12个有青壮劳力的家庭组织起了“好汉组”，4个没有儿子的老人家庭和6个只有小孩子的寡妇家庭组成了“老少组”，其余的人单干。

陈永贵，这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下积极分子、土改运动的带头人加入了“好汉组”。但是，他心里不安。在抗日战争中，他有42名战友被日本人杀害了，还有20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去战斗了，战友们的双亲、老婆孩子组织了“老少组”，自己作为一个壮汉子怎么能加入最强壮、最好的互助组，而把死去的和在部队打仗的战友的家属撇下不管呢？

陈永贵说：“所有缺少劳力的家庭正处在困境之中，在这些家庭里，有妇女、儿童、老人、弱病人。”

这些人问道：“我们怎么办？”

“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听着他们的抱怨，我禁不住想，这些家庭的劳力都哪儿去了？有的被日本人杀害了，有的参加了解放军，现在该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庭？”

他们说：“我们已经翻了身，但什么都没变，我们还是无法生存，我们没有牲口，没有农具，没有劳力，土地对我们有啥用？黄土又不能吃。”

“我当时没有想到什么路线问题，我只想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是个贫农，他们在旧社会受尽了苦，我也是，他们的困难不就是我的困难吗？我们所走的路应该是为所有的人解决难题而不只是为少数人。”

“我从‘好汉组’退了出来，加入了‘老少组’，老人中年纪最轻的60岁，小孩儿中年纪最大的12岁。这些人中不管哪个人卖劲儿地干都会有损自己的健康，我成了这个组唯一的壮劳力。我不是夸口，我确实壮得像头牛。”

“孩子和老人们欢迎我，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来，他们没说我傻，倒是‘好汉组’的人说我傻，他们说，现在老陈有了不能骑马的老人和不能拉犁的小孩，真的是翻身了。”

有一个富农把陈永贵的妻子拉到一边说：“过去你们没吃没喝，到现在还是没吃没喝，和这些人一起干能得到什么好处？毛主席号召咱

们组织起来，可这是怎么组织的？”

但是，陈永贵对所有的人说：“老人有经验，小孩会长大，听了党的话，路就走不差。”

所以，陈永贵就和“老少组”在一起干了，他干那些老人孩子干不了的活儿，他编了两只大筐，用扁担挑起来，一次就能挑200斤，而4个小孩子一次只能抬100斤。日复一日他们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干，老人和孩子们不明白老陈是什么动机，他们在背后议论说，也许是他觉得对不起他们，他是一个好心人。可富农却讥讽“老少组”，说陈永贵是个大傻瓜，还说“这唱的是哪出戏？”后来，他们才明白过来，陈永贵是出于阶级感情，他站在穷人一边。

“渐渐地‘老少组’的人也明白了，他越来越支持我们看法，整天和我一起干活，一块收工。回到家里盛了饭就来我家和我边吃边唠，老老少少都是这样，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

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好汉组”感到吃惊的是，“老少组”的收成竟然比任何人的都好。

“为什么？刚开始第一年，我们怎么就会收那么多？我们劳力那么少，收成却超过了‘好汉组’，是因为我们团结，是因为我们决心走合作化的道路。”

“好汉组”春天聚在一起干活，夏天就解散了，秋天也都只顾自己收获，冬天又不在一起干活。实际上，他们的互助组只在一起互助一两个月，然后就“各自为政”，所以，平均亩产不到100斤（这个产量是大寨的传统产量）。

可“老少组”就不同了，他们组织得好，民主讨论每一个问题，集体决定事情，他们互帮互助，一起劳动，所以粮食大幅度增产。他们在一起干了7年，年年增产，他们还吸收新成员，到1953年已有49户，他们的亩产量是230斤，几乎等于从前虎头山上种地年收成的3倍。

成功的关键在于陈永贵推翻了互助组里通行的规矩——以工换工，他能付出自己的壮劳力而不要求孩子和老人给予相等的劳动交换。

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疯了，人家说他：“家有一斤粮，不当孩子‘王’”，但陈永贵的思想却没有那狭隘：“他们的问题不也是我的问题吗？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必须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一方面，他怜悯那些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儿的老人；他同情那些父亲、兄弟被

日寇杀害的人，同情那些在前线冒死打仗的战士的家属，穷人翻身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伟大的解放，翻身的意义不因为他们年岁、体力上的劣势而打折扣。另一方面，对合作化的作用他有自己的远见。有老人的经验，年轻人的热情，有团结一致的艰苦奋斗，有民主的公开讨论，难道还不能打开虎头山的宝藏，改变他们的命运吗？陈永贵坚信他们能。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心使他不同于成千上万只看到互助合作对自己或自己的邻居有短暂的好处的农民积极分子。而这些人却几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社会变革的道路。

陈永贵在当时可能不曾清楚地表达过上述观点，但他相信互助合作的路子是对的，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他没有像普通农民那样过分计较个人得失，在互助组发展的每个阶段他都坚持这种态度。

“当时，我们没有‘红宝书’，也还没听说过‘为人民服务’、‘人是最宝贵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到今天，我也记不住一条毛主席语录。但我有阶级感情，我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一起干，这样做的同时就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十三 张庄的第一步

在李顺达把他的西沟互助组壮大成全山沟的互助队，陈永贵把他的“老少组”发展成了全村规模的时候，张庄的农民也决心带头赶上，他们加强和扩大了在土改后的几个月里就组织起来的试验性的劳力交换组。

在这些小组里最成功的是杨忠盛小组，这个小组由22户组成，耕种着480亩土地。

由几个相互信任的朋友开始组建的杨忠盛组之所以兴盛起来，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互助合作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总结了成千上万互助组的成功经验得出的，有三条：一是自愿，二是以工换工，等价交换，三是实行民主。显然，这是比当年陈永贵自我要求低一层

的办法。杨忠盛互助组还避免了三个常见的缺点：什么都互助，互助组过大；组织太复杂。

正像在《翻身》中描写的那样，杨忠盛领导的22户农民“经常‘碰头’，详细讨论每一个问题，并作好详细的记录”，杨忠盛从来不命令组里的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碰头”时一起商量，只有大家同意了才去干。他们总是先耕种军属的地，要求的报酬仅仅是管饭吃，不要劳力的交换。没有劳力的农户要为他们的劳动支付工钱，但互助组不要求马上支付，那些没有粮食的家户可以等到秋收后再付给。他们选出了一个“四人委员会”，负责随时报告农具和劳力的付出、收入情况，还推举了一个能写会算的组员当会计，每次播种、中耕、收割结束以后，都要公布账目，进行结算，除了那些特殊情况需要缓期的人以外，每个组员都要补足欠额。这样做，每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因此，起到了巩固干劲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这个互助组每晚都碰头，计划第二天的工作，省得到天亮鸡叫的时候还得费劲商量。组里的人不用人喊就都自觉地到地里干活去了。如果地里不需要组员们的6头牲口，他们就赶着去搞运输，运输的活儿是他们自己揽自己干，换句话说，互助组并不要求组员的一切活动都得合伙来搞，如果一起干合适，他们就一起干，如果分开干合适，他们就分开干。为了增加冬季生产，他们还合办了一个豆腐坊。”

杨忠盛，当了地区劳模大会的代表以后，扩大了组里的生意，他们成立了一个木工合作社，有13名成员，他们开始时做桌子、椅子、大车身、大车轮，后来又做铁边车轮。为了保证充足的木材供给，他们到西山的富村买了树，用斧子砍倒，再运回来，锯开后再使用。

到1948年，这些共同的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其他家庭也要求加入这个互助组，忠盛很婉转地拒绝了，鼓励他们成立新的互助组，并把他自己领导的互助组稳定在20户的规模。

张庄互助组第二个成功的例子是由党支部书记张兴发领导的互助组。像从前描述的一样，兴发自己干得很好，但潞城县委要求村委会干部要带头组织起来搞生产，所以张兴发接受了这项任务。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党对他的信任，而不是他自己生产中出了问题。

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张兴发把张庄的几个好汉户组

织在了一起，这几户男人们正值壮年，劳力很强，并且有牛、骡子、车辆。这个组包括10户，杨丽生、郭泰山、杨玉锁、王贵宝、戴大宽、张启发（张兴发的弟弟）都在这个组，只有13岁的没有父亲的郭泰山不能顶全劳力。

张兴发回忆道：

“大部分活儿对他来说都太重，播种季节，他只能干把大粪往玉米坑里倒的活儿，我们确实负担了他好几年。这样做是因为这孩子没爹，他爹留下的地，他照顾不过来。杨玉锁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受尽了苦，出于对张泰山父亲的情义，我们把这个孩子吸收到组里。确实，这就是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家没有牲口，我们为他家拉煤、犁地，那时，郭泰山还扛不动一麻袋东西，我们就让他干他力所能及的活儿，到我们决定成立合作社时，他已经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孩子了。”

郭泰山在互助组里生活有了保障，与前面提到的年轻的秦振海无依无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振海年纪太小，没有能力在他生病的父亲分得的地里干活，也没有加入任何互助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卖掉了大部分地。

张兴发说：“说真的，我也是组里的一个负担。作为党支书我要参加许多会，但每次我去开会，他们都是先干我家的活儿，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担心了。我们组里实行民主，通过讨论决定每一件事情，大伙一起共度难关。杨丽生是我们的组长，我不在家时，他总是让大伙儿先在我家地里干，然后再到别人家去干，有了这样的好领导，组员之间的个人矛盾很少，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大的冲突。”

“杨丽生自己对每件事都作有记录——互助组为哪家干活啦、有谁参加啦、他们共干了多少活儿，等等。每收一季，我们都要进行结算，我们用谷子来付工钱，如果得到的数目大致公道，那就拉倒，如果有人干得活儿比别人多，那他得到的谷子就应该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就谷子的品质发生过争执，大部分谷子是一样的，如果因为这样的小事儿争吵，那我们早就散摊儿了。”

“如果有人还不了他欠的谷子数怎么办？”

“这种事儿在我们组从来没有发生过。”张兴发说：“我们大伙干得活儿差不多都一样，所以，所得谷子的数量也相差无几。我们组开

了一个小客栈作为副业，过往的运货马车可以来这儿吃饭、歇息。这个小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攒粪肥，我们可以把那些在此过夜的粪便收攒起来，供互助组种田使用，当然，也有一些现钱收入，我们把它叫‘车马店’。”

不久，第三个互助组成立了，由6个壮劳力户组成，为首的是师才元。像张兴发一样，师才元是一个有特殊身份和地位、较富裕的新富农，是党的号召的压力使他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放弃以劳力交换同等劳力的原则，他不接受鳏寡孤老户入组，他也不喜欢没有技术的人。他的组里有几个木匠干木工活计挣钱，别的组员种地，这是具有竞争力的劳力。木匠们挣的钱，有一部分用来补贴为木匠家种地的劳力，每家地里的收成归自己。

一些被以上三个互助组拒绝接受的鳏寡孤老户到农会主席郭真宽那儿求助，他们求他成立一个他们也能参加的互助组。郭真宽心肠软又乐于助人，于是他组织起了张庄第四个互助组，大伙都叫这个组是“盲残弱组”。

除了以上四个长年互助组，张庄至少还有10个季节性互助组，都被称为“犁地队”。犁套比较贵，一年中只是播种时用一回，所以很少人家置备。在农忙时，往往是一套犁具有8~10户等着用，也还有“粪罐车”，这种用来把茅坑里的大粪拉到地里的大木罐花钱比犁具更多，数量也更少，全村只有13个粪罐，农忙季节，这些粪罐只够13个交换劳力的互助组使用。

以自愿的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的互助组成立时，大伙交口称赞。共产党员申天喜赞成大家在一起干活儿，“在一起干活就干得多”，他说，“开会睡得晚了，早晨没有组长叫，我一睡就是大半晌。一个人去干活，看着一片地就发愁。跟大家一起干活，活干得就快。有说有笑，大伙都高高兴兴的。”

泰山娘（是个寡妇）同意天喜的看法：“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经常抬头看天，看是不是晌午了。可是，在一起干活，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很快就干活儿干完了。”

郭泰山也同样热情很高：“我是1950年加入互助组的，在这以前，我家的日子很艰难。我妈上岁数了，我还小，所以只能靠大家帮忙了。”

“自从加入了互助组，我母亲可以干一些轻省活儿。我是组里最

小的。我们轮流着互相帮忙，这样所有的土地都能种上，没有被荒废的。我在地里干活总是落后，和大伙一齐开始，但总要落在后面，每当这时兴发叔就鼓励我说：‘别着急，是因为你比他们小，等你长大了就好了。’然后，他总是走过来帮我完成。”

由于互助组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张庄，在晋东南以至在整个华北地区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发展到土改后已具备条件的全国各地。不过，互助组内部也存在许多矛盾。

从短期看，问题往往出在雨后应该先种谁家的地这类小问题上。一个好的组长会说：“最后种我的。”但有些组长就会摆出一副很抱歉的样子说：“我家的地最近，还是先种我家的吧。”等轮到最后一块地时，土已经全干了。种子在干泥块里是不易发芽的，这时，这块土地的不幸的主人就会要求全组给他的地里浇水。可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块土地上付出的劳动比第一块土地要多得多，因此，常常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就引起了争端，互助组因此而分裂，最终各人又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靠自己的劳动去耕作，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起从天亮干到天黑。

在大范围内，问题在于有些人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有些人只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些人则根本没有生产资料，而互助组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况，特别是耕畜的占有状况。那些有牲口的，特别是拥有整头牲口的人仍然可以利用其他人的劳动。李胖子就是一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不能出租牲口挣钱，这种出租作为一种剥削形式被禁止，共产党员不许剥削。但作为才元互助组的成员，他对牲口的所有权可以作为劳力和其他人的劳动对象交换。有了这种规定，李胖子的驴和骡子为他积累了大量的赊欠储备，他自己根本不为组员们干任何活计，但他们都得为他干大量的活来扯平赊欠。

出租牲口，不管是以公开的还是隐瞒的形式都换回了大量的劳动。但是，也不能认为这种事情总是十拿十稳的。如果赶牲口的人不是牲口的主人，在坡道上他就会用鞭子抽赶牲口，一天要干那么多的活儿，他只能这样。如果被牲口的主人看见了，他就会提出抗议：“他妈的！你打我的骡子干什么？你不花钱你不心疼噢。”

这种抗议引起的必定是一场争吵，这种争吵动摇了互助组的稳定。

然而，对于那些没有牲口的人来说，互助组确有好处，那些仍旧很穷的贫农加入了互助组后，日子总比不入互助组靠自己单干时好过了。

这是因为互助组有一个大家一致通过的公约：所有组员家里的活儿都得完成。大伙还约定，需要大量劳动的地块应该首先去干，不应考虑是谁家的，而且，劳力交换牲口的价格应预先订好，不能根据活计和季节的变换多收，还规定在互助组里干活，每天给4升谷子，丰收年不能数量升高几倍，而歉收年也不能一点不给，同样牲口劳动的价格也是固定的。互助组有控制生产各个环节的措施，这种控制措施是为了平等，而不是为了让那些拥有基本生产资料的人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平等包括及时的结算。但常常是那些收成好的农民拒绝付出他们应付的钱、粮，他们有能力付，却不愿付。

我已经讲过孙春发在区委书记，在办公室被跳蚤蚊子叮咬后才同意付出他应付的东西。然而，被锁在屋里挨跳蚤咬的教训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星期以后，又一次结算的日子到了，张兴发到孙家去收他该付的粮食，可是孙说没谷子，一粒也没有。孙有30亩地，他把互助组看作一个能为自己白付劳力的地方。

“如果没谷子，小麦也可以。”

“我也没有好小麦。”他说。

他揭开一个装满小麦的大缸，小麦表面上生了绿毛。

“我所有的粮食全在这儿，你看见了，不能吃了。”

“倒出来，”张兴发说：“也许下面有好的。”

“没用，”老孙说：“上下一个样。”

但张兴发不相信他的话，他把缸倒了过来，果然，倒出来的麦子大部分很好。于是，他拿走了孙欠的麦子，一个劳动日5升。

“后来，”张兴发说：“我们开会讨论孙春发的问题。大伙决定把他开除出互助组，因为他的问题吵吵闹闹太浪费时间，我们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跟他生气上，除了开除他，别无选择。”

十四 争吵和犹豫

“确实，用开除来吓唬往往就能解决问题。”申天喜说。

他是一个大高个儿，浑身是劲。在1948年土改的节骨眼上，他这个民兵冲锋在前。也就是在那期间，申天喜的右眼挨过拳头，受到了

永久的伤害。不幸的是，这一拳使他变成了斜眼。衣服下面藏不住健壮的肌肉，右眼半闭着，左眼大瞪着，又黑又硬的胡茬遮住了他的面颊让他看上去很凶。但他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师家三兄弟的幽默故事。才元、福元和二则哥仨作为一户，是天喜互助组的成员。

有一年春天，组里决定挖一口井，取水浇地。前三天，进展很快，到第四天轮到师二则下井干活儿了，他下去以后，一直没有给往上吊土筐的人发信号，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到井下一直没动静，最后，张贵才受不了这种磨洋功就发火了，他开始骂师二则。

“你好，你怎么不下来挖？”师二则在井底反驳着，说着他自己坐在筐子里让上面的人把他拉上来。

上来后他说：“真倒霉，我再也不想和你们一起干了。”

申天喜说：“好，不想和我们一起干，滚！”

小师大步去了，但他没有走远，朝村里走了几步就在一个小土堆上坐下了。组里其他人继续挖井，他光在那儿沉思。后来，他大哥才元走到他身边，批评他不该因这么点小事发脾气。

最后，师二则回心转意了。

他说：“我错了。”

然后，他朝井下顶替他工作的贵才喊：“你上来吧，我下去，我不想离开咱们组，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干。”

由于个人的转变并不容易，互助组对一些人不适合。尽管县委一再号召共产党员在组织起来搞生产中要起带头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加了互助组。

在张庄就有一件声名狼藉的事情。这事涉及到戴三才，这是一个“翻了身”的壮汉子，他父亲戴家贵是从河南林县逃荒来的贫农，刚来张庄时，一无所有。1945年时虽然有了两亩半薄地，但没有房子住。在土改运动中，家贵表现很积极，当了农会小组长，儿子戴三才参加了民兵。因为父子俩一个是小干部，一个当了民兵，再加上他们自己拼命争取，所以，在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时，他们比别人分得多一点：20亩好地，8间房子（其中5间是一层半结构），还有一头牛。

这头牛又壮又大，能拉1200斤货物。别的牛拉货一天挣3斗谷子，戴家的牛一天能挣6斗。如果加入了互助组，这头能挣钱的壮牛就会被拴住，就得为互助组里的人干地里的活儿，就会耽误搞运输，耽误

挣钱，所以，戴三才不愿加入互助组，他要靠自己干点别的事儿，挣更多的钱。

申天喜再三动员他人组：“看看你周围，除了你的地，每块地里都有8-10个人一起劳动，就你和你父亲单干。难道你们不感到孤独？如果和大伙儿一起干，士气会更高。”

但戴三才觉得自个儿单干好，想干什么事可以自己决定。最后，由于党员干部们一再做工作，他加入了互助组，不过，只是在名义上，只是在自己有空、自己觉得合适时才到组里来一下，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行动。

在戴三才异常顽固的背后藏着一个棘手的个人问题。尽管日子过得不错，可他没能讨到老婆。他不修边幅，大大咧咧。而且非常自私，没人能和他处得来，所以，找不到愿意嫁给他的女人不奇怪。他到处找对象，但没有找到。马厂天主教会的人听说了他的事儿。有一天，一个媒婆到他家，要和他谈一笔交易：有一家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但他得付20石谷子，还得入教。

没有更好的办法，戴三才只好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但要收获，积攒20石谷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戴三才靠在公路上跑运输，攒够了20石谷子。他在县里领了结婚证，在马厂的教堂里办了婚礼。从此，他与那儿的牧师来往越来越密切。作为一个经常在张庄站岗的民兵，他可以告诉教父什么时候出入张庄最安全。握枪站岗，是为保护村农，但是戴三才实际上是在保护天主教父，让他们放手去组织“圣母军”。

从戴三才的例子看，并不是一般的自私自利，而是对自己要光棍一辈子的恐惧，把他推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一些日子过得不错的成了家的农民也反对互助。杨进顺的父亲，一个旧中农说：“张庄没有一个能把家管好，那么多家凑在一块怎么能管好？”

苏宏业，这个为国民党官员藏了3000块银圆，后来由于一封信不慎暴露的人，冷笑着说：“我倒要看看，互助组能办成个啥。”

“你对毛主席的号召不满意？”他的邻居张贵才问。

“我说错了什么吗？”苏压低嗓门悄悄地问。

从那以后，他不敢公开攻击互助组，但却在全村散布下面的话：

“合伙，什么都合伙，老婆也要合伙？”

这几句话加重了人们的担心，合作化一旦开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党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大伙都要在一个大锅里吃饭？

就在互助组在摸索中前进、更稳定的合作化形式还没有人敢尝试的时候。苏联专家突然来到长治帮助建设“集体农庄”。这在当时算是很超前的大胆试验，给已经开始令人不安的揣测添油加醋。

主要的标准在技术方面。专家们要求大面积的、平整的、适合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工作的土地。市政府选中了北门外飞机场以南的一大片平地。以前村为中心，加上周围的7个村市政府称之为“中苏友好农庄”，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关村集体农庄”。

第一步，这几个村的农民从各自的互助组来参加这个较先进的合作组织。这个组织开始由五六十个农田小队组成。他们从一个管理部门得到指示，这个部门后来负责整个集体农庄人员的安排，领导是被市委任命的主席和副主席。国家（以晋东南专署的名义）提供进口拖拉机、联合机、拖拉机犁具和其它大型农具，还有60辆马车。有了庞大的组织和高水平机械化，创造高产记录指日可待。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集体农庄”的一切与自力更生、自愿参加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不过，既然国家开始了这个“大跃进”，所有的人看到那些昂贵的设备，他们想，我们只需坐在这儿就可以发财。人们从几里以外来看机器工作，联合收割机在地里遗留下了很多的庄稼，中耕机过后，地里仍立着许多杂草，没有哪种机器能为谷子间苗。苏联专家只呆了几星期就回去了。

不懂技术，缺乏有经验的领导，又没有强有力的管理，当地人发现庄稼收成肯定达不到预期，便要求并得到了国家的救济。长治市的领导确曾安排机关干部、中学生和驻地部队的战士们到地里去间苗、除草、收割，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保证正常的收成，更不用说丰收了。地区和长治市农工部的领导面对失败打了退堂鼓，当地干部出来收拾残局承担责任，然而，“集体农庄”的尝试眼看着黄了。

正如王京和所说：“在这儿，我们有组织没思想，有机械没意识，这些苏联大手大脚的办法不好使，我们的人没有经验，国家投了那么多钱把人都养懒了。”

然而长治市却从来没有公开宣布取消了这个集体农庄。6年以后，整个晋东南都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南垂公社把关村作为一个大队吸收了进来。这样减轻了关村的负担，因为关村大队下属的生产小队不用再付上面管理干部的工资了，管理工作由新的公社领导接管，他们领国家的工资。

在“关村集体农庄”无果而终的时候，附近的山区出现了另一个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尝试，几个村庄，用国家贷款建立起的一个国营林场，在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也开始陷入困境，6年后，这个林场也悄悄地解散了，变成了当地公社的一个大队。

在内战取得全国胜利，新政府在北京成立的欢欣鼓舞的日子里，人们对机械化抱有很大的希望。机器不仅使集体农庄、国营林场成为可能，而且还将改进大众化农业。然而，朝着机械化的努力，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和机器也像大规模的工程一样，遭到了失败。有的干部热情地支持创新，但村民的回应却很迟缓。

王京和讲述了水车是怎样引入长治及周围地区的。这种水车实际上是种链子泵，原理是用链子上的橡胶片，把水通过一个管子被从井里拉上来，但需要一头驴或几个人绕着井口推动水车。用这种办法提上来的水流量大大超过了任何一种靠肌肉的力量提上来的水流量，可以利用这种水车进行农田灌溉，但当工作队第一次把水车运到农村时，人们都不买，工作队感到灰心丧气，便想方设法迫使他们去买。

“我们在西边戏台上召集农民们开会，给他们介绍这种水车，但没人愿买。我说：‘如果不买就不许走’。会议进行到深夜，天快亮时。有几户农民答应买，我们便答应让他们离开，其他人一直被我们留到天亮。后来我又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我们在黄河塔呆了一夜’，这是三国故事里的典故。刘备援兵不动，就呆在黄河塔里不出去。”

“那天晚上之所以僵持那么久，是因为没有几家拥有很大的地块可以使用水车的。用这种水车，一眼井可以浇灌周围的几亩土地。除非你有大块土地，或者别人同意与你分担费用，一起买下水车，否则安装这种设备没什么好处，一小块地的主人参与就可能破坏全局，只有互助组把人们聚在一起，这种水车才能派上用场。”

那时，互助组的成员可以到国家银行用低息贷款来买这种水车。

为了买水车，张庄人总共贷款 8000 元，这笔钱再也没有能还给国家，国家银行勾销了这笔欠款。这样，实际上是国家为张庄人和别的许多大队的人提供了水车。

不久，研究单位和联合工厂又生产出了一批新型农具，其中有单把犁、小型气体发动机，这种发动机靠沼气工作。虽然新型的农具在不断大量地生产出来，并在不断更新，但却没有得到农民的认可，他们说：

小气泵、单把犁，
两种机具都自杀，
不知现在在哪里。

之后不久，马拉双铧犁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走到村子南边，都能看见一具被丢弃的双铧犁，半截埋在土里，露出地面的另外半截生了锈。一首顺口溜道：

买机器，书记挂帅，
买回来，风吹日晒，
过几年，废铁一块。

上面的命令不能使农业实现机械化，也不能使互助组恢复活力。在长治市农工部有一位有名的干部，叫刘发则，他是一个鲁莽却很有工作能力的老农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但是，他一点也不受“文盲”的影响，可以作长篇讲话，安排文化活动，还能组织生产。

有一天，一群农民不听他的报告，拒绝成立互助组，他就叫他们“山药蛋”。

一个农民抗议道：“老刘，你这不是骂人吗？”

“谁骂人了？难道你们不像山药蛋？把你们放到坡上，都滚不到一块。”

“噢，我们是山药蛋，你是什么？”他们问。

后来，有一次，另一个村想演节目，老刘就把每个节目都限制在一小时，不许多也不许少。人们提出抗议：“有些节目只能演半个小时，如果是唱戏的话得超过一小时。”

“那我不管，”老刘说：“短的必须拉长。”

“那长的怎么办？”

“必须改短。”

他就这样做了。

如果一个节目演了一小时还不下台，他就上去把他们的鼓踢掉。可轮到他自己讲话时，就没有时间的限制了，因为他是个文盲，从来不预先写讲稿或列提纲，一旦开了头，他常常忘记他已讲过的，一再重复。

在一次会议上他是这样开头的，“我不想说什么，让别人讲吧。”好，这对在场的人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等两个人都讲完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说他想最后总结几句。开始，他把两只手插在衣袋里，然后把右手拿出来讲第一点，又把左手拿出来讲第二点，发现前面有一把椅子，他把右脚踏上去讲第三点，手和脚都用完，他的讲话还在进行，都半夜了，老刘还在讲。没有人敢站起来离开，因为他正好站在门口，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开始数他讲的点，用五划“正”字记录，最后数到60点，一直到东方发白，天亮了，有些人早睡着了，那些还清醒的人非常生气。

刘讲话的主题是毛泽东的两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老刘从各个角度分析，讲的这几句话，讲了又讲，没完没了。

最后，屋子的各面响起了气愤的喊声。

“我们散会吧，已经长了一尺了，更不用说长一寸了。”

地委开始招收人员要派到南方去工作时，刘发则的干部生涯就结束了。地委决定测验干部的文化素质，老刘文盲还拒绝去上学补习。最后打起行李，回老家去了。结果他的大队里多了一个木匠，市政府里少了一位干部。

刘发则体现了中国人所谓的“小农意识”，然而，等见识了后来那些独断专横、官僚教条的干部以后，刘的那些缺点似乎又成了优点。

十五 五村调查

尽管在组织起来搞生产中有困难，有争论、有犹豫，但，1945—1951年间的经济却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农民很快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的亩产粮食水平，有的地方超过了多达25%。他们还修复和重建了在战争年代的被弃置或毁坏的建筑，并恢复了被破坏的农具和因大量宰杀而减

少的牲畜的数量。由于经济的恢复，农民在购买力量上升，1951年地方合作社比1949年多售出棉布155%、棉花881%、盐142%、煤油43%、碱215%。

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事业。1951年地委党组对张庄附近的5个村进行了社会进步的调查。在这些村庄，82%的学龄儿童入了学，这个数超过了战前任何时候。许多儿童包括女孩都准备到长治和其它较大的贸易中心（镇、乡）的学校去读书，有的甚至到中学去当住校学生，这在战前是从未听说过的。成人自愿者通过“人民学校”接受成人教育，也可通过读报队、村图书馆、图片或幻灯片接受教育，83%的青年人上了“人民学校”，29%的成人认识200个字，13%以上的人认识500个字，18%的人认识900~1000字。假定认识900字就是一个识字的人，据统计成人识字率已达28%。

青年人特别愿意思字，小伙子们说：“如果识了字，想干啥就干啥。”姑娘们说：“如果我们在文化上不落后，以后就能找一个有文化的丈夫。”父子、母女、夫妻识字运动日渐兴起，并迅速发展。当时写日记、做笔记、做练习已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读报成了一种活泼的业余活动，5个村的各种组织订有30份报纸，召集读者20~30人，轮流朗读。虽然只有一个村有阅览室，存书320本，每天有70人到此阅览，但巡回图片展览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像战前一样，最大众化的娱乐形式是中国戏曲。不管哪个村唱戏，四面邻村的人都来看，把能站的地方挤满了。除了古戏，农民还自编自演新戏。每个村都有20~30个自己的男女演员，3~5个编导。新戏虽不像古戏那样招揽观众，但他们的知名度在不断提高。农闲季节，每个村都要收钱购买戏装、聘请师傅、编排新戏。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说书、幻灯、扭秧歌、踩高跷等节目，“八音会”也热闹非凡，引人入胜。最普遍的游戏是象棋、扑克，最普遍的体育活动是乒乓球、武术和高跷。由于新式娱乐活动的发展，过去的赌博已经看不到了。

环境卫生和卫生保健事业发展也很快。据调查，土改前在附近一个村有39%的家庭从来不洗锅碗，35%的家庭不扫房间。到1951年

只有4户不洗不扫了。在贾村，洗衣服晒被子成了所有农户的习惯。三分之一的家庭主妇已经开始使用从供销合作社买来的香皂，有的男人也开始使用。贾村每个月组织两次全村大扫除。

月经期，妇女们开始用干净的布块代替旧袜子和破布衬。贾村的年轻妇女们扯上新布做月经带，用后好好洗净以备再用，这种办法保护了妇女的生育能力，因此婴儿出生成活率大大提高。有了国家训练的助产士帮助，脐风发病率大大降低，卫生人员每年为3个村的儿童进行天花预防接种，打预防针。贾庄还和当地医院建立了联系，定期为全村农民进行体检，参加体检的人每年要交点保健费，到1957年有42%的家庭签约。

经济的发展，新婚姻法的颁布大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土改以来，她们也有了自己的一份土地，她们也参加田间劳动，这样，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但在过去，妇女只有5种“武器”来进行反抗：哭、骂、装睡、不吃饭、自杀，现在她们有了离婚的权利。新婚姻法颁布后，5个村已有79人次提出离婚。同时，有274对结了婚，其中48%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或在同一个互助组干活，或在同一个读报队学习，或一起参加文艺活动，不需要别人介绍他们就可以接触、相爱、结婚。

青年男女相互通信，姑娘为心爱的小伙儿缝洗衣服，丈母娘为女婿做好饭吃，这种过去闻所未闻的事儿也开始被人们接受和认可。结婚前的一对恋人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起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批评，并敢在公众面前就他们不同的观点展开争论。

在婚姻问题上自由选择的可能改善了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改善了夫妻关系。战前342人存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通奸、卖淫、强奸等。现在不正常率下降了74%，有些年纪大一些的人仍有通奸现象，但年轻人都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平。小伙子说：“过去，人们难以维持生活，像我们这样的人讨不到老婆，所以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儿。现在婚姻自由了，我们觉得很好，再做那些丑事，我们觉得丢脸，没有人愿意一个坏名声。尤其是尚未结婚的人，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寻找合适伴侣的机会。”当然，年轻人仍然得为婚姻的自由而斗争，那些对自己能否讨到老婆有疑问的人抱怨说：“过去，只要有钱就能讨到老婆，现在我却找不上了。”另一些人说：“你们把女人抬得太高了，

没有人敢惹她们，否则，她们就闹离婚。”但，妇女们很高兴，她们说：“既然可以离婚，就没有必要去死了。”

新的土地政策，新的婚姻法，婚姻自由和离婚的权利大大改善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5个村的105对婆媳中，绝大多数关系和睦，只有24%的有争吵现象，2%的媳妇仍受婆婆虐待。开明的婆婆们说：“现在好了，年轻人开会明事理，她们不仅编织、纺纱，还在地里劳动，她们比我们有能耐，没有我们的管束，她们会干得更好。”这样，许多老一点的妇女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她们拒绝放弃“权力”，媳妇就会说：“我也想吃、想穿、想劳动，你不应该压迫我。”“婆婆放屁，媳妇受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各种迹象都对妇女有利。没有人再溺死女婴，父母们送女儿上小学，甚至中学，这在从前可是没见过的。不过，他们还是偏爱男孩。在家里男孩总是吃最好的饭菜，总是优先得到上学的机会，如果没有男孩就会认为“断了后”，但是，如果家里没有男孩，女孩同样享有继承权，这种事以前也是没有的。

夫妻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被调查的311对夫妻中，73%的夫妻平等分担家务；90%的妇女在家里当家，只有17.7%的家庭完全是靠丈夫养活，只有一个妇女仍挨丈夫的打。

父亲们也开始更信任自己的儿子，过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父亲活着儿不当家”，现在，父亲们常常把家庭事务交给儿子管理，父子常常一起决定家庭的收入和开支。许多父亲鼓励儿子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很少有像过去一样打儿子的父亲。

农民比较了过去和现在后说：“过去，是抽鸦片的大烟鬼、赌徒、小偷多，现在是劳动模范多，过去光棍、淫妇多，现在有儿有女的模范夫妻多，过去给地主干活的雇农多，现在有文化的干部、学生多，过去既没吃又没穿，现在吃的是白面，穿的是洋布，过去我们有当票，现在我们有现金。”

土改后的社会进步已经达到了地委报告中所报告的水平，对此怀疑的人可能有，但谁也不能否认，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尚未确定，在互助组发展的同时，两极分化也在加剧。由于投机和自由市场，诚实的生意做不过非法的。

十六 试办合作社

农民们还记得 1952-1953 年那个自由市场的黄金时代。那时，如果你问一个父亲或母亲他们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女婿，工人？当兵的？还是干部？回答只有一个：商人。人们认为嫁一个投机商很光彩，一点也不耻辱。因为这样的人聪明、知道怎样赚钱，不用靠死劳动过活。搞投机是褒义词。投机商有才干，每个家庭都希望找个投机商女婿。

那时候，仍有一些财产的地主和富农坐在门口吃面条，并故意用筷子把面条挑起来向别人炫耀自己：“看我们，我们是单干户。看我们有多富裕，只有单干才是致富之路。”

他们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是田里的辛勤劳动使他们有面条吃，但实际上是靠投机挣了钱他们才有了面条吃，这影响到了中农，使他们在两条道路的选择上拿不定主意，是单干？还是加入合作社？等等看，许多人想看看哪条道路能成功。

大寨陈永贵就谈到过这种风气：

地主、富农和一些普通农民都认为，干一些其它事情会比在地里干活更快地致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经商、搞投机倒把。你可以从河北买上棉花到山西来卖，然后再从山西买上别的东西到河北去卖，富农们带了这个头。地主和富农在土改前许多人就做过这种买卖，他们不在田里辛勤耕作，总是找机会出去做些小生意。有些党员支持他们这样做。当时，虽然我认为这不是一条正道，但我也没去反对。

大寨有一个富农在河北邢台开了一个货栈，他在那儿采购商品，然后用驴驮回山西。如果采购的东西够一次装运了，他就会通知村里，于是，我们就会派人和驴去运货回来。有一次派 6 个人、12 头驴去，贫农贾九深和我负责拉运。早晨我们赶到邢台时，太阳已老高老高了，可这个富农还在当地的一个小客店里睡觉，我们走了一夜，现在太阳都晒着屁股了，他还在睡觉。

贾九深去敲门，“嘭、嘭”一直敲，还大声喊：“三爷爷，三爷爷（他俩是同一个家族的，按辈数贾九深叫他‘三爷爷’，这是一种很礼

貌的称呼)”他又喊又敲，足有十几分钟，这个老家伙才醒来开了门。

我感到很气愤：地主和富农在里面睡大觉，贫农却站在外面喊“三爷爷”，这是解放前的事儿，为什么现在还有这种事儿？

那富农终于开了门，我们才进了屋。好闷气！盖着缎被子，铺着毡褥子，屋里确实很排场。看到这些，我们都很气愤，感到厌恶。在这儿，他比解放前还舒服，可我们却得连夜走那坑坑凹凹、泥泞坎坷的路。当时，我自己就琢磨，这到底是谁领导谁？

我们装上货，把棉花运回了山西，驮到了大寨的供销社，每头驴能驮120斤，所以我们总共运回大约1440斤棉花。我们刚把棉花堆在供销社的院子里，就有一些人开始往上洒水，目的是为了增加棉花的重量。第二天，约有40个人在村上沿街叫卖，许多人相互转告，也到供销社去买上棉花，下山去卖了。他们用棉花换瓜子，然后再把瓜子拉到河北去卖，他们卖棉花时，先是称好瓜子装进布袋，然后再给人家称棉花，当买主发现棉花里有水，大吃一惊，开始喊叫时，已经晚了，卖棉花的人已经走了。他喊他的“棉花里有水，棉花里有水……”那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就想，为什么现在仍有这种事儿？

我找不出什么理论根据来说明农民放弃种田搞买卖是条不正确的道儿，可我认为，我们是农民，是种田人，我们应该把精力花在地里，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儿？我们到底是农民、工人、还是商人？干这种事儿，我们成了什么人？

1951年12月，党中央在总结了几百万个互助组（队）和已经成立的5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主要是号召开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运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以示范的形式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决议”发布以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就出现了1.3万个合作社。

在晋东南的合作社有劳模李顺达成立的西沟合作社，长治市城区六个自然村有宋家庄和紫坊两个村成立起的合作社。张庄宣传队的王京和曾是负责这六个村的乡党委书记。在成立这两个合作社（个人单干大海中的两个集体小岛）的过程中，王京和遇到了许多具体难题，但是这些与他后来带领大家在合作社的头一年里的艰苦奋斗比起来就

算不了什么了。

成立合作社的第一步就是合并土地。他动员所有的党员带头，但并非所有的党员都乐意，一些人有自己的小算盘，一些人不能说服家里人的人，有时，两种情况都有。

王京和说：“有一个党员不愿加入合作社，但他知道党员必须带头，于是说：‘我很愿意加入合作社，可我老婆不同意，我父亲也不同意。’等大家相信他的话，他又接着说，‘我自己决心已定，无论如何我是要参加的。我要和老婆离婚，和父亲断绝关系，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儿’。”

“领导只好说‘别，别，别，你最好别这样’，这样就太过了。既然你不能说服家里人，最好暂时先别参加了。”于是他被从计划中拿掉了。当然，这正是他所期望的。”

“另一种人是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有这么一个党员想两边都得好处。他把家里的东西分成了两份，把最好的土地、农具和耕畜留给了弟弟，把剩下的三等地、一头不能干活的老驴入了合作社。他算计着，一旦合作社不行了，他还可以从弟弟那儿得到一份，以重整旗鼓。”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家庭的压力确也起着相反的作用。”

有时，孩子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孩子们喜欢合作社，因为有这么多人一起出去劳动，小朋友们可以经常在地里玩耍、嬉闹。治安主任申安怀小的时候就迫切希望他家人入社，因为他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玩。后来，孩子们的希望和要求也成了一种成立合作社的驱动力。一股入社风刮了起来，那些反对入社的人觉得丢了面子，迫于孩子们的压力，他们妥协了，也加入了入社的行列。

为了鼓励人们入社，领导干部们对个人的需要和要求也作了一些让步。只有少数新社员对说出个人利益感到为难，这种思想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农中是普遍的，没什么可奇怪的，没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入社后，如果一个中农的收入比单干时少了，有时，其他社员会同意给他们一些补助，这样，他的利益就不会因入社而受损失。

这样做是为了反击那些单干户。这些人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逆流，他们竭力炫耀自己生活的优越，他们也仿效地主和富农，经常坐在门

外显眼的地方吃面条。”我说，老张，看看咱这面条。咱什么时候想去地里就去，不想去就呆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然而，单干户对合作社的收成却特别关心。如果他们自己地里的收成比合作社的少，他们就会散布谣言，说合作社的产量是假的。

王京和说：“这纯粹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私自利在他们的脑子里像水泥一样顽固。”

合作社之所以对中农作出让步，是因为没有他们，种地就有困难，他们有最好的农具，最好的牲畜，合作社还尽量让中农进入领导班子。党的政策要求领导权实行“三三制”，强调贫农、中农、党员一起分担合作社的领导权，当时提出的分配比例是土地占60%，劳力只占40%。

村民一人社就开始挣工分，但是，他们却不真正了解工分的含义，不知道工分对他们的分红意味着什么，所以都很担心。他们只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有些合作社，除了在记工簿上划记号外，还做了一种纸条，他们把它叫做“工票”。每天参加劳动的人可以得到一张上面写着工分的纸条“工票”。秋收后，他们把这些纸条交上来，根据纸条上的数字分红。

但在分配之前，这些纸条并不能彻底解决思想上的顾虑，人们不知道这些纸条是作啥用的，不知道这纸条是否真能换成粮食。有些人认为，只有粮食和土地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他们抱怨说：“既然现在土地归了合作社，这些小纸条有啥用？”

后来，社员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

辛苦一天四肢劳，天黑收工纸一条。

屁股朝天脸朝地，到头死了烧纸条。

对纸条“工票”失去了信心的人纷纷要求退社。宋家庄合作社只剩下6户，其中还有3户也想退社。

王京和说：“我们派郭全德和另两名干部到那儿去做工作，给他们的指示是，把红旗举得高高的，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合作社都不能解散。老郭有精力，也有决心，他说：‘谁把合作社搞垮就开除谁的党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两户，今天做这一户的工作，明天做那一户的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底！’”

在纸坊菜场的“先锋社”，有一个叫杨环宇的人，既是合作社的

副社长，又是村上的党支部副书记。他就是一个“动摇派”。在土改中，他分了好地，娶了媳妇。因为他正值壮年，正是靠自己致富的好年华。合作社遇到了困难，他就想退社。他觉得退了社自己可以在自由市场干赚大钱的买卖。

因为不敢公开说，他便悄悄四处活动，动员别人退社，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合作社搞垮，他到处播种怀疑，让人们们对合作社失去信任。但王京和有力地反击了他，并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使杨环宇处于孤立。看到合作社不会垮台，杨最后说他自己想退社。

“可你是党的副书记，”王京和说：“你不能就这样退出。”

“我能，”杨说：“党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互助合作是自愿的。”

王京和把杨退社的问题看得很重要。如果他退了社，许多别的“动摇派”也会跟着他退社，“先锋合作社”的未来就悬了。他试探了别的党员，结果发现大部分人愿意留在社里，于是，决定开一个大会来决定杨环宇的退社问题，他让杨拉上他的骡子也来开会。

在全村大会上，王京和就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一笔一划描绘了社会主义未来的美丽图画。最后，他说，任何一个要跟毛泽东路线背道而驰的人都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儿。

王京和觉得杨环宇当着全村人的面不敢按原计划提出退社，因为这将意味着丢脸、败兴。

可是，杨环宇很执拗，他跳上讲台说：“合作是自愿的，我能加入也能退，现在我想退。”

高个子，穿戴整齐，头上系一条白毛巾，杨环宇骄傲地大声朗读起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他的举动激怒了王京和。

“好，好，好，退，退，退，可如果你退了社就不许再当我们的副书记，拉上你的骡子，滚吧！”

“滚！走！拉上骡子回家吧！”马上有几个人齐声喊道。

杨环宇的脸沉了下来，拉着缰绳准备走。

合作社的社员们惊愕地、失望地站在那儿，那些活跃分子鼓倒掌，“欢呼”、挖苦杨环宇、取笑他，用嘲弄的喊声欢呼他的离开。这时，从前的地主和富农，站在边上等着，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几个党员对王京和说：“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他的党籍怎么办？”

王京和马上让大家投票表决。

所有在场的党员都同意：开除杨环宇的党籍。

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政策，但王做了一个应急的决定：“我代表乡党委宣布：免去杨环宇村党支部副书记、合作社副社长、党支部委员等职，明年根据他表现可作重新考虑。重新申请，但只能当预备党员。”

好大一会儿，杨环宇一直把头埋在白毛巾里，然后把白毛巾往肩上一甩，拉着骡子独自走出了人群。

地主和富农们挤眉弄眼，互相示意着，笑了，“咱们等着看吧，看看别的人会不会跟着走，看合作社解散吧。”

王京和早有准备，他动员尽可能多的党员和群众站出来支持合作社，他信心十足地大声说：“杨环宇退社了。因为他是党员，又是干部，我们不会再要他了。可你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以走可以留，谁愿意走现在就走，谁愿意留我们欢迎。杨英成，你怎么样？愿走还是愿留？”

杨英成说：“我愿意留下，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留。”

所有的党团员轮流表了态，有三分之二的普通社员也表示愿意留在合作社，另外还拿不定主意，最后才表示留下。

人群中有人激动地说：“我们订个计划，让大家有个奔头。”

那些盼着群众退社的人非常失望，地主和富农们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王京和果断而迅速的行动完全击败了杨环宇。但这并非意味着“先锋合作社”所有问题的解决。这个村分成两个姓，在公共厕所以东是一个家族，以西又是一个家族，厕所马路对面是村公所，位于两个家族的分界线上。

新年快到了，村领导计划搞一个灯会，但每一家族都有自己的打算，不久，就为哪一家族的灯会方案更好发生了争吵。几个鲁莽的村民还动起了手，发展成了全村范围的斗殴。这时，杨环宇又活跃起来了，他鼓吹合作社分开办。

王京和认为分开合作社将是合作社垮台的第一步。他第二次公开批判了杨环宇，虽然从情绪上稳定了合作社，但从那以后，每隔几天

就有新问题发生，矛盾就像菜地里的野草一样不断生长出来。市里和乡里的领导都不想到“先锋合作社”来，他们说，合作社开始容易巩固。人们就工分争吵不是因为问题难以解决，而是因为双方根本不愿意一起共事。许多人认为，秋收以后最好解散了合作社。气候也不配合，有一部分合作社的地看上去没有附近私人的地块长得好。

决心干到底的杨英成来找王京和，“毛主席一定想出了办法”，他说：“他不能看着我们有这样的问题不管。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自愿的原则，让他们自由入社，但一旦入了社，我们就告诉他们不许退社。这样，也许事情会好办一些。”

“不能这样，”王京和说：“自愿的原则是党中央制定的，我们不能擅自更改。”

王京和想不出什么使杨英成感到满意的办法来。

“别着急，”王京和说：“毛主席会给我们想办法的，他会想出办法的，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一定会有的。”

王京和的预言得到了证实。1953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正像维安妮·舒解释的那样，因为这是限制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唯一最有效的步骤，它很清楚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支配权，特别是有效地控制了粮食市场。土改运动很快就限制了土地出租；互助组的成立限制了雇用劳动力；同时，信用合作社和政府的低息贷款给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带来了困难。现在，粮食的统购统销又使那些试图通过粮食的投机倒把赚大钱的企图变得不可能了。

“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出产品。统购统销断了个人发财的路，参加集体组织没有什么牺牲，除了参加集体，别无选择。从农村政治的观点来看，统购有助于重建阶级团结和与富农阶级对抗的基础。它以这种形式为迅速的集体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者。”

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各项工作的就绪，合作社的所有优越性都显示出来了，单干变得越来越困难，谈到这一点，干部们总是说：“挡资本主义的路，堵资本主义的洞。”

“可是怎样堵这个洞呢？”王京和问：“用我们那点粮食去堵这个洞是无稽之谈。但，国家一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人们就成群结

队地来问我‘什么时候让我们入社？’”。

“我们乡的6个村都成立了合作社，整个形势全变了，连人们走亲戚时谈论的话题都与合作社有关。”

“你入社了没有？”

“你呢？”

“黄碾的合作社比我们的还大！”

“就连落后的贾村也成立了合作社。”

80%以上的人都入了社，只剩下了从前的地主和富农，他们也派代表去问他们能不能入社，有些人同意他们入社试用，有些人则说：“让他们自己单干吧。”

“单干”成了一种惩罚手段，因为靠搞投机致富再也不可能了。到这时，如果你还没有入社，那肯定是成分有问题。

在要求入社的人当中还有杨环宇。他的地太多，一个人种不过来，又不能雇人去种，因为他的邻居们不是入了社，就是忙着种自己的地。他的粮食歉收，但所交税款和卖给国家的粮食定额却不能少。

“我虽然被免了职，”他说：“但我要一切从头开始。”

可人们喊“别让他入社！不许他入！”一些人确实是不想让他入社，而另一些人是专门起哄，刺激他，让他不舒服。

最后，领导们决定让他回到社里来，但只是试用。“试用”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因为对地主和富农也是这样的。王京和建议把他当作正式社员欢迎他重返社，可群众不同意，“让他继续背着他的处分吧，他不是要拉上他的骡子和其它东西自由自在地搞单干吗？让他回来吧，试试看，观后效！”

“形势变得多快呀！”王京和说：“现在如果你不是合作社社员就是一种耻辱，被迫搞单干就意味着你有问题。”

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负责全国的粮食收购，在全国还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以保证所有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这是一项对中国未来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措施。因为，实际上，它所完成的是把中国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有供应本，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年景都能保证他们领到一定数量、固定价格的粮食；另一部分没有供应本，他们要靠自己种粮来养活自己。

第一类人包括所有城市居民（工人、技术人员、国家干部）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范围内的资本家及其雇员几年内也会被国营企业所吞并。第二类是农村的农民，他们要靠自己给自己提供生活必需品。

与此同时，国家还建立了户口制度，它是以全国范围内发放户口簿开始的。这种适应于城乡两种人的户口簿制度已经建立，城市户口簿发给住在城市里的人，他们可以用这种户口簿领到粮食供应本，从国家粮食局买粮。农村户口限制农民在城市的居住权，不发给供应本，要靠自给自足。

农民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首先要得到当地领导（当地农村党委书记和某一城市党组织的书记）的一致同意，方可离开，这一单位必须保证移居人的职业，还要申请当地公安局发给供应本，这样，才能永久移居城市。

这一影响深远的措施把中国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城市居民，有职业和口粮的保证，也就是著名的“铁饭碗”；另一类是农村农民，他们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靠自己的能力谋生，且一般不能离开农村。

这两类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可以有一些移动的自由。城市的工作人员可以当工人，也可以干技术工作，这由他们的领导决定（他们所属单位党的书记），他们可以在城市范围内变换工作。这种机动范围虽然很小，但是特别是当你有关系、有影响，也就是说有“后门”时，机动还是有可能的。“走后门”从远古至今一直是中国行政管理的顽症。

农村居民在他们的区域内可以从一个村迁居到另一个村，不过，任何人迁移都必须得到居民现住地和居民迁往地党的书记的一致同意，这些规章一旦生效，人们搬到新地方寻求新生活就不会或者很难再发生了。因为，以后的每一次迁移都必须是经过计划的，不仅那些要迁移的人，而且那些迁移涉及到的村都得做出计划。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条件和要求，还是有许多人计划迁移。不过，这总是因为有亲戚为他们说话，在迁出地与迁入地都做通了领导的工作。

在农村的迁移不被认为是“走后门”，因为，人们不认为从一个村迁到另一个村会有多大好处，再说也不会因此得到供应本，找到工作，只不过是换一个新地方去种地、去劳动罢了。当然，有些地方的土地和别的条件会比另一些地方好点儿，有的村庄具有明显的优势，

如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方便，还有一些其它方面招人羡慕的优势，他们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大门打开，让其他人也来共享这份优势。因此，要想迁到这样的村庄比迁到一些普通的村庄就难得多。

然而，设立在村与村之间的关卡却不能与设立在城乡之间的关卡相比，没有双方的同意要想越过这个关卡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能了解的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北京找到活计的农村建筑队），要想迈开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步，必须先搞到供应本，但如果没有城市居民户口簿，供应本是得不到的，没有供应本就买不到粮食。因此，一个人离家时间长了就无法生存。

当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年都有几百万农民充实工业战线、加入工厂，帮助搞建设，许多人通过合理的渠道转成了城市户口。但那些被城镇接收的人员数量与到城市来干活的农民数量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在农村有巨大的压力，主要是经济的压力，迫使人们离开农村，但如果这些规章一旦生效，就会抑制那些压力。总之，人们必须呆在原地，最有效地利用农村提供给他们资源，不管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工业资源。

限制人们迁移的政策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讲，它使得那些没有希望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在城里却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使生活得到改善的人无法流出乡村定居城市。人口从乡村涌出在主要城市和主要工业区的周围形成了“棚户区”。这种“棚户区”、“贫民区”在亚洲其他地区，在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是屡见不鲜的。

由于中国农民在1953年以后不允许自由离开土地，“棚户区”才没有形成。只有那些确实找到了固定工作的人才能离开农村，或多或少地按计划他们被接受进城市或大的工业建筑工地。

因为只有找到工作的人才能进城，所以，城镇化的过程就成了计划的主题。从理论上讲，至少必须预先为新的城市居民准备好住房、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必要条件，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贫民区”、“棚户区”。在中国，许多原始水平的房屋看上去与“贫民区”没什么两样，但是，根据职业、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教育、保健等方面的条件判断，这些地方不是“贫民区”。

因为大多数农民不得不留在农村种地，因此，他们就被迫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智力开发农村资源，加上受到西沟和大寨精神的鼓舞，这

一类事情处处可见。如果允许农民离开老家，那么，这些荒芜的土地，贫困的山村也许早已被人们遗弃了，现在既然不允许离开，当地的人们就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繁衍生息的地方搞好，而且有许多地方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在10年前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没有明显的资源，没有像大寨一样成堆的黄土，没有像西沟一样可以造林的山坡，又找不到新的资源去开发，只能靠庄稼的微薄收入过日子，每年冬季来临时，他们便成群结队地离家外出要饭。

从消极方面来讲，这些规定把中国人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无忧无虑，享有特权的城市类；一个人数要多得多的农村类，他们仍靠大自然和老天爷的恩惠过活，没有任何特权，从收入、食品、服装、保健、教育、文化生活等标准来看，农村要比城市差，但农民一般来说住房要比城市工人的大。

农村居民不能离开农村这个事实，使得封建主义的一个方面得以发展。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实际上中国农民已经被束缚了几千年，在新的政策下，这种束缚更加严重了，甚至比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还严重，因为中国农民传统上没有做过受封建庄园或城堡管束的农奴，束缚他们的只有地租，如果更逻辑性地分类的话，他们是佃农而不是农奴。

但在旧制度下这种佃农制度是不完全的、不规则的、不固定的，数百万农民可以按自己的志愿来去自由，可以走遍中国大地去要饭或当流动短工，到处找活干，甚至那些被地租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有时也可以通过逃跑来逃避地租，因为社会秩序那样混乱，地主找到他们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在1953年以后，每个农村人都被束缚在了土地上，束缚在了他或她出生或出嫁的那个村庄，结果，只要粮食长得好，他们保证了一定水平的生活，但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迁移的权利和寻找更好生活的自由。

这种体制一开始，就遇到了中国新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问题。从整体上看，无论城镇还是乡村，人们都希望社会治安稳定，但是，长期以来，新的国家机构确实也遇到了旧的封建官僚主义者一直力求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完全控制和掌握所有的民众，特别是农村的农民。这种政策促进了使农村停滞向前的倾向，并且与那些中层工作岗位的官僚们不约而同，这些人“没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坚持走老路，极易墨

守成规，常常耽擱事情……有些干部，每天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对自己很满意，得过且过，在他们的干部职位上虚度年华”。

不允许农民离家的规定意味着，可以不用太关心农村的问题，官僚主义机构可以混日子，一混几十年，对农村的危机概不过问。与此同时，农民们在土地上，除了暴动，没有别的办法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在我看来，锁定农民不仅影响了在中层的那些办事拖沓的干部，而且影响了那些在权力塔尖上、本来是有能力有追求的领导干部的思想。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农民稳定，天下就太平。即使农民的人均粮食产量比两千多年前的汉朝祖先还少，他们还是坚持这个想法。

国家统购统销粮食，凭证供给城市居民粮食的规定从1953年开始是有道理的。几乎所有人（专业投机商除外）都拥护这个决定，有了它才有可能出现后来有序的、可观的经济发展。这一特殊政策的真正内涵直到现在才被普遍认识。

十七 张庄成立了合作社

张庄人是在1953年秋天开始筹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正是党中央建立粮食专营机构的时候。全国农村对投机跑买卖的态度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看法都在迅速改变。在华北老解放区，土改运动已至少完成了四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大型的、马拉松式的会议，号召先进分子带头成立示范合作社。在蹇城县，曾成功领导土改的县委副书记王定模，也召开了一个持续一个半月的会议，动员全县的积极分子带头成立合作社。

王定模个子不高，所以每次讲话时都要踩在凳子上，这样后面的听众才能看见他。他个子小，讲话声音不大，想听到他的讲话一定要伸长脖子，使劲儿听。他不讲大话、举例说理，能抓住观众并最终说服他们。

这次，王定模抨击了自私自利以及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各种资本主义倾向，还有利用好地好牲口“尽快致富”的思想，这是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那一年的冬天。

张庄的一批党员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妇女会主任胡雪贞、支书张兴发、师才元和李胖子。说来似乎有点可笑，这三位都是张庄知名的新富农，要他们带头搞土地合并，带头成立合作社，可真是给他们出了难题。

“既然县委做出了决定，”张兴发说：“我们别无选择。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带头。我认为我自己没什么问题。我能损失什么？我所有的就是15亩耕地和三分之一头驴。我只有两样财产——老婆和女儿。所以，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可才元和李胖子就不一定能睡好了。他们的确在为自己的自由担心。才元家地多，而且都是好地，他还有一匹马和一头驴。他为什么要和那些只有几亩荒地、没有牲口的人搞合作？对他来说合作意味着损失。他家有12张嘴，如果允许雇工的话，他能养活这么多口人。可如果加入了合作社，他就只能靠劳动挣工分。因为才元当时不了解土地和牲口入社后的分配情况，所以他认为入了合作社，他的牲口、土地加上自己的劳动恐怕只能顶两个劳动力，也就是说只能得到两个人工劳动力的分红，这对他将是一种灾难。由于福元在外面工作，他和二则必须维持12口人的生活，妇女又不算劳动力，因为按当时的习惯，女人是不参加田里的生产劳动的。因此，按他的估计只有他和二则能分得一份劳动收入。”

“李胖子情况也一样，他发家所需的条件应有尽有，只是人手不足。他自己是供销社的主任，弟弟太平是丧失劳动力的残废，所以他长年雇用周增富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小弟弟继顺身体最好，但也只是个半劳动力，他自己种了几亩地，所得足够自己吃，但如果入了合作社靠挣工分吃饭，他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在合作社里，李胖子只能算一个劳动力，挣一份工分。这怎么会有他在公路上赶车搞运输挣得多？李家兄弟认为如果他们靠挣工分过日子，那就要受苦了。”

“那天晚上，李胖子和才元几乎没有合眼，合作社的好处和坏处在他们脑子里盘旋，但总是回到一个想法上，‘我们是党员，党员要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我们不带头，谁来带头？最后，回到张庄后，他们把自己互助组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合作社，一开始就有20户。”

以上是张兴发的叙述，农会主席、第五生产队队长郭真宽听到这

儿，笑着说：

“兴发说他加入合作社没问题，这不是真的。”

“他不是一个人只有几亩地，三分之一头驴的贫农，他是张庄4户知名的新富农之一，县委会上让带头人成立合作社的那天晚上，他也没有睡好。他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党号召要成立合作社，这是一项革命任务，村里党的干部必须领导合作化运动，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干部，兴发最后决定照党的指示办。”

“对李家兄弟来说就更难，但最后他们还是带头人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因为李胖子是党员他不仅自己入社，还拉别人入社，他放弃了对自己更有利的决策，把全家都拉进了合作社。”

胡雪贞也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我同意马上就入社，毛主席让我们走合作化的道路，我认为我们应该跟着走，所以，我想马上入社。文则说‘等等看看，着什么急？’他想等一等看合作社的第一步怎么走。可我反对这样，有许多牵挂的人都入了社，咱家只有三口人，有什么好怕的？我说‘以前，我们总是跟着毛主席走，这次不会走错的。’”

张兴发的互助组只有两户入了合作社。杨玉锁，这个1948年曾在张庄的党员“过关”会上为贫农代表讲话的人，决定等一阵，他说：“我要看看合作社怎么个搞法。”

王贵保，1948年被贫农团第一个划为贫农，人们对他的贫穷毫无疑问，一致同意“他穷了一辈子，现在仍是贫农”，但就是这样一个“穷了一辈子”的人，现在对加入合作社也犹豫了。他有一台织布机，每天不分昼夜地织布，10尺土布在市场上能换5升谷子，贵保一天能织20—30尺，所以能挣15升谷子，这比种地的收入要多一些。贵保犹豫不决时，组里别的成员没有强迫他，虽然人们认为他织布是资本主义尾巴，他的体力还能干得了重农活，但从整体上看，他的土地实在太糟了，所以，也就不勉强他人入社了。

就算原互助组中有两户不入社，新加入的10户新成员还是把合作社的总户数增加到了20户。

许多人社户带来了他们的耕畜。陆太平牵来一头牛，张贵才也牵来一头牛，杨晋顺拉来一头驴，李胖子一头骡子，王文则一头驴，这样，合作社一成立就有了五头驴、两头牛、一匹马、一头骡子，并且都很壮

实。每一头耕畜都配有一辆车——老式的马车，木轮子、铁箍。这些人还贡献出了四张铁犁，那些没有耕畜和犁具的人拉来了他们的锄头。

值得一提的是，组里还有两个粪罐车，一个是才元的，另一个是兴发的弟弟启发的。

入了合作社的这20户有80块地，每户4块，纪寿喜一家就入了5块地，分别是4亩、4亩、2亩、15亩和5.5亩。

张庄成立的这第一个合作社包括占很大比例的村干部。张兴发、李胖子、才元开完县委会议回村后，就在党支部内就成立合作社的所有问题进行了讨论，支部干部们最后决定：开始时规模小一点，干得好一点，逐步为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他们希望所有的党员都能加入合作社，都能起带头作用，尽管其中有些人对失去自由有顾虑，对自己领导合作社的能力有担忧，但大家都一致认为，“如果我们想继续革命，就不能落后，我们必须走在前头，带好头，干到底”。

同时担任村里行政职务的大多数党支部干部都入了社。本来是张庄党支部的师才元担任了合作社的书记，村委会主席张兴发担任了合作社社长，村里的会计郭福书改任了合作社的会计，纪寿喜负责公共事务，王文则负责治安保卫，陆水漳担任民兵队长。他们虽然都加入了合作社，并在合作社里有了新的职务，但仍担任村里的原有职务。党支部还决定，申天喜暂不入社，专门负责那些未入社人员的生产工作，但天喜不太乐意，他到区委去抗议，要求把自己算成合作社社员，后来，区里答应了他的要求。

结果，社员中70%是干部，合作社成了“老虎社”——全是将没有兵。谁也不怕谁，他们如何相处，又如何工作呢？

“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都吵架。”张兴发说。

不过，如果全面地看问题，合作社应该干得不差。社里贫农和中农大体相当，党员和有经验的干部也不少，合作社能指挥和调动社员的牲口、平车、粪罐车、大农具和好地，这个合作社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似乎为了表示决心，社员为它取名“前进社”。

在可能的范围内，为了保证它的前进作用在一开始就得到发挥，县里来了一个工作队住下来帮助他们。工作队队长名叫申双富，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会计。他学习了别的地方已成立了的示范合作社的章程，对合作社开始遇到的各种问题非常熟悉，他要帮助张庄一步一步

地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1953年冬和1954年春，县里派出许多像这样由一两个人组成的工作队，目的是为了帮助各村掀起农业生产合作运动。

十八 合作社章程草案

申双富带来了一份《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这是一份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文件共12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社员；第三章，土地；第四章，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第五章，股份基金；第六章，生产；第七章，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第八章，劳动的报酬；第九章，财务管理和分配；第十章，政治工作和文化福利事业；第十一章，管理机构；第十二章，附则。

总则包括10条，它不仅总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为什么要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组织，要经过哪些阶段，怎样完善等问题。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统一地使用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并且逐步地把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化；它组织社员进行共同的劳动，统一地分配社员的共同劳动成果。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目的，是要逐步地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这就是说，要逐步地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逐步地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代替小生产，使农业高度发展起来，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使社会对于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

第二条 农业合作化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贫穷和剥削的唯一的光明道路。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逐步地吸收全体农民入社，使

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得到完全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达到这个目的，决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应该用劝说的方法，并且做出榜样，使没有入社的农民认识到入社只有好处，不会吃亏，因而自愿入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劳动农民互相有利的联合，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互相有利的联合。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民自愿地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原则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不损害任何贫农的利益，也不损害任何中农的利益。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高级阶段，主要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农民已经共同富裕起来，那时候将没有贫农和中农的区别。

第三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初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个阶段，合作社已经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对于社员交来统一使用的土地和别的生产资料，在一定的期间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土地逐步地取消报酬，对于社员交来的统一使用的别的生产资料，按照本身的需要，得到社员的同意，用付给代价的办法或者别的互利办法，陆续地转为全社公有，也就是全体社员集体所有。这样，合作社就由初级阶段逐步地过渡到高级阶段。

高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完全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种合作社里，社员的土地和合作社所需要的别的生产资料，都已经公有化了。

无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或者高级阶段，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小块园地、零星树木、家禽、家畜、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都不实行公有化。

第四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提高社员的劳动效率和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要有计划。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和产品销售计划要根据本身的具体条件，同时要适应国家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统一使用土地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地使用进步的农业生产工具，不断地改进农业技术，逐步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帮助下，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采取各种办法，充分地发挥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优越性，开展劳动竞赛，鼓励和要求每一个社员积极地劳动，努力创造公共的和归社员个人所得的财产。

第五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劳动报酬，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第六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许进行任何剥削，不许雇佣长工、出租土地、放债取利、进行商业剥削，也不许社员带雇工入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雇请技术人员；在生产紧急需要的时候，也可以雇请少数短工帮忙。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被雇请的人以合理的待遇。

第七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处理社内一切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使国家的利益、全社的利益和社员个人的利益得到正确的结合。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模范地尽它对国家的义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质量和时间交纳农业税，按照国家的统购计划交售农产品，按照同国家采购机关所订的预约合同出卖农产品。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分配劳动成果的时候，应该给全社留下为发展生产和发展公共文化福利事业所必须的资金，同时使每个社员得到应得的报酬。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八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部生活，应该遵守民主的原则、团结的原则和不断进步的原则。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合作社的一切工作人员应该同社员密切结合，遇事充分协商，依靠群众办好合作社，不得滥用职权，压制民主。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不断地加强社内的团结，发展社员之间的同志友爱。任何社员都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社员、外来户社员和女社员。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不断地提高社员的政治觉悟，在社员中间经常地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保证社员遵守国家法律，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领导社员向社会

主义社会前进。

第九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同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且要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和农村的国营经济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便互相协助来实现各自的经济计划，共同努力来实现国家的经济计划。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努力团结社外的劳动农民（包括加入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积极地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和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第十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开展对富农和别的剥削分子的斗争，使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受到限制，逐步消灭。

章程的第二章谈的是社员问题。这是一个影响将来发展的严肃问题。党把社员问题看作是一个阶级问题，合作社将为哪个阶级和阶级的利益服务呢？

凡是年满16岁的男女劳动农民，自愿申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过社员大会通过，就成为社员。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吸收社员的时候，要遵守以下的规定：

（一）不许限制贫农入社，也不许排斥中农入社。

（二）要积极吸收复员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和外来移民入社，并且要有计划地吸收参加辅助劳动的老弱孤寡入社。

（三）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几年内，不接受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入社，章程提出了特殊的办法，接受已经按照上级的规定改变了成分的地主和富农入社。

（四）不接受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入社。

下面就以上四点作一些分析：

第一点对贫农和中农的人社问题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不许限制贫农入社的同时，提出不许排斥中农入社，这反映了示范章程最基本的政治观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也就是说“要所有的贫农入社，为所有愿意入社的中农敞开大门”。

第二点强调指出，要吸收各种不同劳动力入社。在提到的9种人当中，只有复员军人和外来移民算是有能力的劳动力，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家属、老弱孤寡都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

有困难的人，他们只可以参加合作社的辅助劳动。从狭隘的、短期的观点来看，全劳力负担这类人有些吃亏，但从长远来看，所有的人开始都是孩子，都很弱，但他们会长大，会强壮，会变老，会重新变弱。一个人可能死去，丢下孩子和寡妇，有可能参军，在战场上牺牲，有可能被政府抽调。所以，照顾这些人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你为朋友和邻居做点好事，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这样对待你的。

第三点论述了一个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的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的问题。乡绅——地主和富农长期统治着教育、文化和政府机构，甚至统治着工商业，所以，他们比贫农和中农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多的社会经验，较强的管理能力。他们的统治权威虽然被剥夺了，但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就可能企图混进新的组织，特别是村级政府和合作社，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或者是利用自己在合作社的地位和权力发家致富；或者为复辟他们失去的特权而竭力破坏革命，干扰破坏革命事业。

因此，必须限制给地主富农任何权力。但是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改造的。所以第三条又指出：

“在合作社已经巩固，并且本县和本乡的劳动农民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参加了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已经依照法律改变了成分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多年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才可以经过社员大会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他们入社。”

换句话说，就是在合作社已经成立、并且已经巩固的时候，可以有条件地接收一些地主富农入社。

像张庄这样的村庄，有许多地主和富农从村里逃跑了，开始村里感到很高兴，可到后来，许多逃跑的地主富农在城里挣工资过活，他们在工厂找到了工作，当了工人，隐瞒了自己的阶级成分，于是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像大寨这样的先进村，下决心把逃跑的地主富农找回来，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村里去，接受村里的监督，使他们不能搞破坏。这些回来的地主富农成了合作社的劳动成员，但却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第十三条 每个社员在社里都有以下的权利：

- (一)参加社内的劳动，取得应得的报酬。
- (二)参加社务活动，提出有关社务的建议和批评，对社务进行监

督。选举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和被选为合作社的领导人员。担任合作社的职务。

(三)在不妨碍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

(四)享受合作社举办的各项公共事业的利益。

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

第十四条 每个社员在社内都有以下的义务：

(一)遵守社章，执行社员大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二)遵守合作社的劳动纪律，按时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

(三)爱护国家的财产，全社会有的财产和属于社员私有但已经交给合作社公用的财产。

(四)巩固全社的团结，同一切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第十五条保证了社员的退社自由，规定合并的土地和卖给合作社的财产要归还给个人。

第十六条制定了处罚的条件，最严重的是开除，但同样指出合并的土地和财产要归还给个人。

生产者合作的一个中心特征当然是合并土地，共同耕种。因为土改后不同的个人和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同，提到合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克服这些差别，共同分享合作的好处，使那些投入了大量财产和那些只提供劳动的人都不吃亏。

章程草案用股息的办法重新解决了提供土地的不平等问题。这个规定允许留出一定比例的年收入作土地的收益，剩下的作为劳动力的报酬。

因为合作社的收入是由社员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由社员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所以章程草案又一次指出，所付土地股息的总数要低于所付农业劳动的总数。但同时，这些股息不能订得太低而使那些相对来讲财产较多或那些有大量土地而劳力不多的人失去信心。

这些条例规定股息数字是固定的，如果由产按平均定额定数，而不是以实际收入来定，随着生产力和收入的提高，这些股息作为总收入的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会相对减少，这时合作社就能留出总收入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来支付所付出的劳动或公共财产的投资。

在人们发现固定股息难以确定的地方，章程草案重新提出了一个百分比。这样总收入中一定的百分比就可以留出来支付土地股息，而剩下的部分可以用来支付劳动。张庄使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开始社员们一致同意土地报酬占40%，劳动报酬占60%，可是不久，他们又把土地报酬订成了20%，劳动报酬80%，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高级阶段时，他们就完全取消了土地报酬。

如果说土地合并是合作社的主要方面，那么生产资料的合并也是很重要的。

章程草案指出，合作社要逐渐接管土地以外的所有主要的生产资料，包括耕畜、车、大农具等，有效地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租用它们。因为一开始，这些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归社员个人所有，草案允许合作社租雇。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谈到耕畜时指出：

社员的耕畜还是由社员私有，并由他自己喂养，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正常租价租用，这种私有私养公用的办法，一般适用于初办的合作社。所有者在合作社不使用时可以使用他们的耕畜，他们还可以把耕畜租出去或借给他人使用，但没有合作社的允许不能卖掉。

张庄最初就使用了这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耕畜仍归社员所有，但由合作社喂养和照顾，如使用要给耕畜主一定的报酬。

第三种办法是合作社从所有者那里买回耕畜，转为全社公用。

张庄后来用了第三种办法，这样，把生产合作社从较低级阶段发展到了较高级阶段。

为了支付每一季度农业生产的开支，为了获得如大型农具、车和耕畜这样的私有财产，章程草案指出了两种股份基金：一是生产费股份基金；二是公有化股份基金，也可以分别叫做流动基金和固定基金。

这两种股份基金都由社员按照入社的土地分摊，只合并了少量或根本没有土地入社交付股份基金的社员，部分或全部地用劳动来预付，贫苦的社员交不清股份基金的可以向银行申请国家贷款，这种款项叫贫农合作基金。

一般情况下，流动基金的数字应该和花在种庄稼上的开支平衡，如种子、肥料、草料。社员们在入社时要付清现钱。

固定基金的数字应该与合作社用来向社员购买必要的生产资料的开支平衡，如耕畜、车和大农具。合作社根据社员在固定基金中的股份确定他们卖给合作社生产资料的价值，如果他们卖出财产的价值高于他们的股份，合作社就以现金补齐差额，或以物代钱，如果财产的价值少于他们的股份，合作社就以借款记下差额，以后几年付清。

一般规定，合作社付清生产资料、社员们补齐他们在固定基金中的股份期限都是三年，如果不能按时付清，要按信用社的规定支付利息。

正像草案通过土地股息的手段解决了土地财产的不平等一样，它又通过股份基金，用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调整了入股财产的不平等。

没有这样的手段，大批的农民把他们的财产和劳动合并起来，实现草案第二条指出的“劳动农民的互利联合，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互利联合”是不可能的。只有合作社承认差额，并给予物质的调整，没有人会因为合并而得到或损失太多，合作才会真正有进展。

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合并，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生产。

本条例在“生产”一章中号召合作社及其社员通过以下办法发展生产：合理使用耕地、灌溉工程、改进农具、饲养照料好耕畜、改良作物品种、积肥、深耕细作、控制水土流失、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发展水产，所有这些应该和副业合理地联合起来，合作社应该动员所有的社员参加劳动，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和伤病，鼓励他们学习知识，掌握技巧，最后，还应该计划生产，订出每季、每年和长期的计划。

本章所转述的这些规定都在农民可以理解的常识范围，都是没有争议和可预见的。但是，它仍然照顾到了中国农民在生产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规定同时动员农民团结起来集中利用生产资源谋求全面的发展，这是以前在个人单干的情况下不可能办到的。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合并问题很复杂，但是一旦定下来就不再耗费人们的精力。为了建立和巩固合作社，却需要处理不断产生的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问题。

章程草案指出，要以生产队为单位，以全年劳动为基础分配劳力、组织劳动，并要指定专人担任会计、技术员、饲养员、保管员等。每个生产队负责一定地块的耕地和一定数量的耕畜、设备，要求每个生产队明确分工，对完成的任务和每人每天所得工分做出详细的记录。

草案还详细制定了四条劳动纪律：1. 不得旷工；2. 听从指挥；

3. 出工出力，4. 爱护公物。

草案还规定，对于违反劳动纪律的社员，可进行批评、罚款、扣减劳动日工分、赔偿损失、撤销职务以至开除出社。

第八章劳动报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后来合作社运动中大部分的矛盾都出在这个上面。

50年代初颁布的这个示范章程草案是仿照苏联的样子制定的，根据工分多少实行较复杂的计件制，总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并要无条件地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草案要求社员们订出每一种工作的标准，并以工分计算，一个劳动日等于十个工分。“合作社必须正确地评定完成每一项工作一个社员所需要的劳动日。完成各项工作所需劳动日存在差别，所对应的工分也会产生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一方面要防止平均主义，不使担任繁重工作的社员吃亏；另一方面也不要使一部分工作报酬标准过高，大家抢着做，一部分工作报酬标准太低，没有人愿意做。”

第五十一条介绍了一种叫“死定活评”的办法，供先期没有经验时试行，以便未来规定更合理的工作和报酬标准。“按照每个社员劳动能力强弱和技术水平高低评定工分，再根据他每天劳动的实际状况进行评议，好的加分，不好的减分，作为他当天劳动所得的工分。但是，这种办法既费时间，又不能按照每个社员的实际劳动正确地计算报酬，因此，合作社必须尽快地规定各种工作的定额和报酬标准，以便克服劳动报酬上的混乱现象，避免生产上的损失。”

第五十五条把计件制同特殊任务的责任制结合了起来，这样，如果把一项任务安排给了某一个生产队，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劳动日数量就要预先算好，不管这个生产队实际用了多少时间，他只能挣预先定好的工分；如果生产队的工作质量差，或者工作时间延长了，就会损失工分。

第五十六条规定了短工(小包工)和常年工(大包工)的责任，它要求一定的地块要收获一定数量的庄稼，消耗一定的投入，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对超额完成了计划的生产队应多给劳动日(工分)，对产量不到计划数的90%的生产队要扣减劳动日(工分)。

这一条还指出，对超额完成产量标准，工作出色，有革新的社员

要进行奖励和表彰。“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领导得好，超额完成了全社的生产计划的时候，经常负责社务的工作人员也应得到适当的奖励。”

一个劳动日对于挣得了它的劳动者来说究竟值多少，要根据全社全年的收入来决定。“一般地说，全社全年在生产中得到的实物和现金，在扣除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土地报酬以后，用全社全年劳动日的总数去除，除出来的就是每个劳动日所应该分到的。”

“这样，全社全年收入越多，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越多；全社全年的收入少了，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就少了。因此，每一个社员为了多得收入，既要自己积极劳动，以便多得劳动日，又要努力促进全社的整个收入增加，使每一个劳动日所能够分到的东西跟着增加，这样，就使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得到了正确的结合。”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一个分配原则，即合作社社员在做了一切必要的扣除以后，参与合作社总收入的分红。分红根据每人所挣的工分数，一个社员完成一件任务能挣多少工分是由这项任务的分配标准来决定的，看他是不是按质按量完成了这个标准，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样，示范章程建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计件制”为基础的直接物质刺激的制度。然而，中国农业的问题是劳动多样化和劳动条件的多样化，根据不同条件制定出的标准差别很大，很难形成一个统一指标来判断这些标准是否已经实现，很难做出合适的记录。所以，从一开始，工分制就成了整个合作化建立、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仍是这样。

然而，有一点这个章程讲得很清楚：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统一使用，并不是要社员放弃个人的利益，并不是要大家吃一锅饭，盖一条被。从一开始，中国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就严格地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对社员出色、超额的劳动进行奖励，评议、记分、奖励等各项工作，都没有从理论上背离“多劳多得”的原则，尽管实践中，不同形式的“平均主义”现象确实存在。

在以上的总结中，我还没有提到分配原则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是对领导干部的分配，对那些虽然不能经常、每天参加生产劳动，但却在合作社里起着重要作用的工作人员的分配问题。

第五十三条就讲了这个问题。

“合作社内因为参加社务工作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人员，可以每年由社员大会议定，根据他所负担的工作的多少和工作成绩的好坏，补贴他适当数目的劳动日。”

“合作社主任所得的补贴，加上他自己参加生产劳动所得的劳动日，一般应该高于全社中等劳动力所得的劳动日的平均数。会计和规模很大的合作社的主任等工作人员，如果必须脱离生产劳动，他们所得的报酬也由社员大会决定；这种报酬一般也应该相当于或高于中等劳动力所得的劳动日的平均数。”

章程草案其它几章讲了一些补充问题。

第十二章讲了财务管理上的各种问题——预算、管理费用、出纳、账目监督、资金分配，如农业税、各种生产费用资金、公积金、公益金、土地报酬(股金)和预支社员的资金。这一章的最后一条，第六十八条规定，不允许任何退社的社员分走合作社所积累的任何公共财产。

第十章规定了政治教育，特别是集体意识和精神的教育，学习读写和科学文化的计划，保安、卫生保健、幼儿园，还要对妊娠妇女和其他有特殊需要人员的帮助。

第十一章讲的是合作社的管理和组织机构，其最高管理机构是社员大会。社员大会一年选举一次管理委员会，一般由5~15个委员组成，还有一个监察委员会，一般由3~9个委员、一个主任组成。

这一章列出了社员大会的八项职权，最主要的是：1.通过和修改社章；2.选举和罢免合作社主任、各委员会委员；3.决定生产资料入社的报酬、股份基金的征集、全年收入的分配；4.审查、批准生产计划、预算各种工作的定额和应得的工分，对外签订重要合同；5.接受新社员，决定对社员的惩罚、开除。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重述“章程草案”的主要原则，对这个草案的第十二章八十二条继续进行讨论，是因为它在当时、后来直到当前一直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业提供了框架，是骨骼和肌腱。“章程草案”条目很多，考虑周全，规定既有灵活性又很民主，为解决农村各个层次农民的各种复杂的利益问题和矛盾给出了办法，这样，他们才能把劳力和资本联合起来，才能比任何个人和任何分散的组织更有效地改造自然。虽然经历了许多动荡、联合和变更后，全国按照“草案”的要求成立起了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但

是，草案的原则决定了社会契约的实质，它将把农民家庭聚拢在一个合作社里，这个集体在几十年里一直是几亿农民从生到死、生产生活的寄托。

十九 问题与修正

合作起来，土地联片，去掉田畔地界和多余的田间道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积(许多材料说明可以增加5%)。

合作起来，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壤，变旱地为水地，把瘠薄的土地和废弃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廖鲁言《关于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

申双富第一次召集张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预备成员讨论示范章程草案时，强调了两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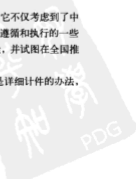
第一，个人的土地不会丧失，尽管大家的土地联合起来了，大家一起劳动，但各家的土地界碑仍然存在。再说入了社的土地本身也会通过股份基金获得收入，这种股份基金将与每户入社的土地成正比，入社的土地越多，挣得的股金就越大。

第二，他强调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他用各种方式，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道：“如果你生产的多就卖得多，就存的多，就能吃得多。”他反复强调这“四多”——产得多、卖得多、存得多、吃得多是合作社的基本目标，也是合作社与社员个人之间关系的范例，关心了合作社集体的利益，就等于关心了社员自己的利益。

他说：“这些政策不会变，合作社由小变大，即使全村的人都入了社，基本原则也是不会变的。”

这些示范规章考虑得很周到、很全面。显然，它不仅考虑到了中国自己的经验，而且借鉴了苏联集体农庄长期以来遵循和执行的一些原则和规章。50年代初，中国积极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试图在全国推广苏联“老大哥”的经验。

然而，从一开始工分制就出现了问题。工分是详细计件的办法，



用数字来客观表示一个社员的工作量，与之相关的是苏联专家推荐的会计制度，用来计算生产过程各环节的真实成本。工分制所引起的长期困扰，将在后面的章节讲到，而苏式会计制度在试行中就发现了问题，很快就被淘汰了。

张兴发说，一开始，我们试用苏联的经验，苏联专家来到晋东南，举办了一个成本会计培训学校。这简直是一团糟。他们给所有的东西都定了价格，然后又根据一套计算法则算它们的折旧，我们的会计人员都觉得很难算、不会用。因为苏联专家的威信那么高，所以每个人都努力学习他们的办法，但实际上，这些办法对我们根本不适用。

从潞城县来帮助我们工作的申双富也不懂，他一个普通干部，问题提得直截了当：“你怎么算一棵树的折旧？”

苏联专家说：“一棵树有它的寿命，这就是固定资产，根据它的估计寿命来算它的折旧。每棵树终究都是要死的。”

申双富认为这简直是谬论，他用一种古老的说法回击道：“千年松树万年柏，不如老槐歇一歇。”

他的意思是说，判断一棵树的价值，寿命不是惟一的标准。再说，树木如此之长，人怎能算出合理的折旧呢？

用苏联专家的成本会计法计算，就没有人挖得起井，一口井的成本比用它灌溉的农田产的粮更要贵，他们的数字说挖井不值得。

用苏联专家的成本会计法计算，甚至堆肥都不合算。如果估算粮食的成本，那么玉米芯、玉米秆，每一样可做肥料的东西都得定个价，它们在堆肥中，在庄稼的生产中都算一笔开支，如果用这个办法去算，那使用堆肥就像使用猪粪一样贵了。再说，整个过程太复杂了，晋东南地区的会计们不能接受，他们掌握不了这种方法所涉及的那么多繁琐的数学公式，很明显，它束缚了人们的手脚。

农民们放弃了苏联的会计法，但他们并未放弃“按件计酬制”，他们严格要求晋东南所有的地方制定标准，做好记录、搞清楚对150多种农活社员应得的确切工分数。

张庄的社员们生动地回忆了建社几个月后一次关于工分的争吵。这次争吵差点使合作社散伙。因为在张庄固定标准尚未定出，张兴发领导的20户的合作社暂时使用了“死定活评”的办法。

张兴发回忆说：

“我们每天下地劳动，记工分，可每天的劳动值多少工分要根据我们干活的多少来定。师二则负责记录。有一天，他哥师傅元干活落后了几步，那天晚上记工分时有几个人说：‘别计较了，给他记一样的工分吧。’可二则不同意，他坚持减掉福元的工分。他说，落后了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能轻易放过，‘要是我们放过了这种事，以后大家都会偷懒。他出工迟，一整天也没赶上其他人，必须给他少记几分。’开始是二则和小组成员意见不统一，最后发展成了二则和才元兄弟俩的争吵。村党支部的师才元憋不住了：‘拉倒吧！’他说：‘散伙、散伙，要是老这样，我可受不了。’”

听到这话我说：“你是支书，如果你敢搞垮我们的合作社，我也敢！”说完，我大步走开了。

其实，我并不想搞垮合作社，出来后，我就去找队长杨丽生，让他像往常一样安排生产，然后又到各户去告诉他们明天按丽生的安排干活，随后我又到乡办公室找县里来的申双富。

“他们吵架了，”我说：“我再也干不下去了。”

双富马上警觉起来。

在那个时候要搞垮一个合作社简直太容易了。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所有的财产都统一使用、统一经营，都合在一起了，谁也找不到一块自己的地。那时候，任何人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拉上自己的牛，离开合作社，回家种自己的地去。

“不，不。”他说：“你决不能让合作社垮掉。”

他立即给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乡政府把才元叫了去。我就知道他一回来就会来找我，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一直缩在被窝里，没有起床。果然，才元来了，冲我直喊：“起来，起来，我们不能垮了合作社。要是合作社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该死，我是头号罪人，你是第二号。”

“不关我的事儿，”我在炕上应道：“你不要给我乱加罪名。”

“起来，起来！”才元又大声喊。

“走吧！”我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与我无关。”

他只好丧气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区委书记来了，我这才起了床。他走进门，身后跟着才元。

他俩进门就问：“社员都哪儿去了？怎么一个也找不到？”

“找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在地里。你们希望他们在哪儿？”

“我以为你真的甩手不干了，以为你今天没有安排工作。”

“谁说的？”我说：“工作我早就安排好了。”

才元感到极大的宽慰，心放下了，也想吃东西，于是我们一起吃了点东西。

区委书记说：“才元，要是把合作社搞垮了，你就完了，我也完了。”

“看看，”我说：“才元，就因为你的兄弟吵架，你拿不出办法，就摧毁了合作社，你是什么态度？”

“好，好，好，我错了，”才元说：“都别提了，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行不行？”

“不行！”我说：“今晚我们必须开个社员会议，你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会。

区委书记张全保参加了会议，我们都批评了才元。

张书记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贫农和下中农是一条，中农是另一条。中农(比如才元)总觉得自己入社吃了亏，因为他们本来土地和农具都很齐全，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和穷人合作，所以一遇到问题就想退社，想返回去重新搞个人生产。

“才元，”张说：“你必须坚持到底，你是党支书，只许把工作搞好，不许搞坏，如果失败了，我撤你的职。毛主席号召我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如果你背道而驰，走阶级分化的路，那你可要当心你党内的职务。”

一整天，我们一直在批评才元，他道了歉，作了自我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说，以后我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这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变成了一场官司，惊动了上级领导，也只有上级领导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定了一条规矩，每10天碰一次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换工作意见。自从有了这条规矩，我们及时纠正了一些小的错误，生产也好搞了。

兴发还回忆了另一次有师家兄弟在内的争吵，不过，这次不是为了工分。

有一天晚上，福元和二则问他们的队长杨丽生第二天的工作怎么

安排，丽生眼睛朝天，想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没有安排好呢。”

师家兄弟认为他这是目中无人。

“你以为你是谁？才当了几天队长就又威风起来了，你当你又骑大马当狗警察了？”

他们是在重提杨丽生曾在日本人手下干过伪警察的事。

“住口！等一下，”兴发说，“你们是不是不服，想推翻他？”

老大才元这下火了，与他的两个弟弟站在了一起。

于是，我们又开了一个长会解决这个问题。

兴发说：“既然，我们都选了丽生当队长，为什么现在又提伪警察的事儿？我们选他时就知道他过去干过警察，可我们还是选了他，因为他生产上是把好手。既然选了他，我们就得听他的，按他说的做，不听他的，我们听谁的？”

最后，才元向丽生道了歉，问题解决了。

合作社社员们常常争吵，但大伙都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伙都希望合作社能成。然而，村里有些人的反应则大不相同。每当合作社发生争执、争吵，他们就显得特别高兴，其中之一是老上中农李宏仁，他叫“前进社”是“吵架社”，他说：“那么多干部在一块是工头见工头，谁也不怕谁。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我要服从你？既然谁也不听谁的，那还不乱套？穷鬼们到一块能干出点啥名堂？”

这个老李头不愿入社，他有一大块地共40亩，还有一块菜园，就在他房子的旁边，他可以坐在门口看住自己的地，他还有一匹马、一辆车，合作社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他是全村最后一个人入社的，对交出自己的地怕得要死。入社后，他总是扛着锄头，一步一步慢慢腾腾来上工，脑子里总想着那几句顺口溜：

屁股朝天脸朝地，到头死了烧纸条。

兴发说：“我经常路过他家门口，发现他总盯着他过去的那块地。”

“你不该老这样瞅了，”我总是对他说：“现在这地归合作社了，每人都有了一份儿。”

“嗨，”他拍着大腿，“别跟我说这些好不好？”

我的话刺伤了他，他也许在那儿做白日梦，回忆他梦想的富有，突然间“每人有一份”这句话会让他浑身战栗。

他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直为自己失去的地而痛苦。

老李头没有加入合作社之前，就和合作社争高低，玉米开始发芽时，他地里的苗看上去很不错。

“看，”他说：“我的苗比你们的好。”

但合作社的人还有别的招儿，他们给所有的地都上了一遍茅粪。秋收时，他们的产量高出老李头一大块，这位上中农又一次气得拍大腿：“完了，完了。”

老李宏仁一直就是张庄有名的小气鬼。解放前，他就有“骗子”的臭名。那时，他们家族的老当家号召各家捐粮修庙，他总是往谷子里掺上沙子以添份量。

解放后，他的自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有一个小儿子，他的弟弟也有一个小儿子。有一天，两个孩子正在地里玩，突然来了一只狼，叼走了其中一个孩子。当人们跑来告诉李宏仁时，他不慌不忙地问：“叼走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如果是他的儿子他也许会做点什么，但如果是他弟弟的儿子，他就不打算管了。

“先别问是哪一个，”兴发说：“快去帮助找一下。”

人们只找到了狼吃剩下的一堆骨头。这可怜的孩子不是李宏仁的儿子，是他的侄儿。

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有合作精神？解放前，他虽然只是中农，但从来不劳动。他在家是男孩中的老大，但家里别人干活，他却坐在那儿下棋。土改后，他没有参加过互助组，他是在如果不入社就不可能继续种地的情况下加入合作社的。后来，在1956年秋收后分粮时，他疯了，从那以后，人们不能按正常人待他。就在张庄人把他们的几个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大的集体加入马厂公社的前夕，他死了。

李宏仁的小弟弟李长治，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他曾当过伪警察，守卫过南垂碉堡。有一天晚上，八路军袭击了这个碉堡，撤退时留下一名伤员，他们以为他牺牲了。李长治发现这位伤员还活着，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并缴了他一支手枪、两发子弹。后来，解放军攻打南垂时，李长治又参加了反动武装（阎锡山的晋绥军）。战后，他返回了张庄，把枪交给了区政府，政府决定不再追究他的问题了，可村民们却不能轻易地忘记他的过去，他们认为，这一家全是反动的。

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富农对于合作化运动取得的成功并非无动

于衷。像老李头一样，他们总不肯死心。1954年，大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大丰收，平均亩产270斤，比互助组时的最高亩产还要多30%。社员们在一个过去的富裕中农家窗外的打谷场上分粮食，当会计喊出每人所分的粮食数目时，这位富裕中农李恩和仔细听着，并记下这些数字。后来，在庆祝丰收时，他逢人就说：“什么亩产270斤，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地亩产是300斤。”

合作社社长陈永贵不相信，就想出了一个揭穿他谎言的办法。因为当时国家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开始贯彻执行，每家每户都要报告他们一年所需要的消费，除去储备和投资，他们已答应把剩下的全部卖给国家。

“好，”陈永贵对这个富裕中农说：“你的300斤定了，除留下你需要的，把剩下的全卖给国家。”

这对李恩和来说太多了，于是他开始抽自己的耳光，承认他撒了谎，目的是希望能有人退出合作社去为他干。即使把地里所有的草、秆都加上也不可能有300斤。后来，才搞清楚，他的亩产只有150斤。如果他按300斤这个数卖给国家，他自己就颗粒无存了。

李恩和、李宏仁的情况虽然是特殊的，但不仅是他们，所有的农民对合作化运动都有过思想斗争。

事实上，合作社成立以后，农民私人土地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土地仍给他们带来收入。从这点来讲，合作社没有要求农民们放弃他们梦寐以求并为之付出艰苦奋斗的土地的自主权，但却要求他们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是对土地使用的决定权，和对土地产量的独占权。在张庄，朝向合作化迈出第一步的过程表明，这些东西确实很难放弃。

在旧社会一直给地主当雇农的老汉纪盛茂，有一天见地里没有其他人就对贵才说：

“我跟你问个事。”

“问吧。”

“我们合作社到底计划干些啥？”

“啥？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

“可是，”老纪说：“我好像翻身又翻回了旧社会，自己的地没了，我的驴为所有人干活。在合作社里，我跟过去一样，只在地里干活，什么也没有。”

合作社是冬天成立起来的，在这年的秋天，像其他人一样，老纪收割了自己的庄稼，积了一大堆肥。现在春天来了，却要把他的肥上在别人家的地里。

“在村里，我积的肥最好，可现在全上到了人家的地里。我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后来，毛主席给了我房子，给了我地。可是合作社一成立，我又双手空空了。没有地，没有粪，我还能干什么？”

贵才说：“等到秋天你就明白了。我们都会分到比以前多的粮食。你不要担心，大伙一起劳动，我们都会干得很好，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老纪还是想不通。他已经快70岁了，在他的脑子里很难绕过这个弯来。后来他生了一场病，腿脚也不好使了。

因为像老纪这样的担心，干部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他们认为需要有特殊的措施来安定人心。他们决定马上把已收获的豆子和南瓜分给大伙儿，不再等所有的东西一块分了。这样，社员们每天都能带一些东西回家，用具体的实物表示他们劳动的收获，不再是工票纸条了。如果有人有落后思想，散布小道消息，干部们就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顾虑。

二十 问题与修正的继续

合作起来，就有可能把男、女、全、半劳动力和能做轻微劳动的人们都充分地利用起来，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实行多种经营。

合作起来，就有可能统一经营，因地种植，并且能够用更多的劳动动力进行土地加工，精耕细作，进一步改进栽培方法，改善耕作制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廖鲁言

《关于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

尽管对合作社存在许多疑问，贫农杨都生还是早早地入了合作社。正值秋收时节，有一天他和合作社副主任张贵才往小麦地里送粪，他看见合作社的庄稼有的还在地里没有收割完，已经收割的有很

多还没有脱粒，脱了粒的都还没有去糠。可有的单干户已经收割并打完了地里的庄稼，正忙着往家里运，杨都生坐在路边哭了起来。

“人家都往家里运粮食，可咱们还啥也没干完。”

“你向前看呀，别往后看，”贵才说：“看看咱们的庄稼长得多好，等我们收割打晒完后，你想想我们能分到多少粮食啊，你会比以前分得多。别哭了，你应该笑，应该唱。”

可都生仍然担心。

“你觉得我们能打多少？能分多少？”

“每人至少400斤。”贵才充满信心地说。

“不会有那么多吧？”

“你等着瞧，你会看到的，至少这么多。”

杨都生不哭了，可他仍然将信将疑。

张庄的民兵队长、党员、贫农陆水长也很担心。他看见单干户已经在磨新玉米面，有的甚至晚饭已吃上煮老玉米了。

“他妈的，”他骂道：“我还连一颗玉米都没给孩子们吃呢。人家都吃到嘴里了。可我们还什么也没分。”

回到家里，他骂老婆打孩子也消不了心中的闷气。

合作社的社员们收割完了庄稼，打完了粮食，他们把粮食堆在村子的戏台上（这是一个上面有顶的戏台，以前的老北庙就剩下了这个戏台），然后开始分粮，每人400斤。400斤只是他们的劳动报酬，如果加上土地报酬和耕畜的报酬，平均每人能分到700斤。杨都生和他父亲得知他们总共挣了900个劳动日，这样换算出来分得的粮食足足能堆成一座小山。分红后，光玉米就几乎装满了他家整个院子，就连都生老婆，一个对什么都悲观失望的人，也直夸合作社好。

陆水长也很高兴，他原来自己单干时打的粮食每人从来没超出过350斤，可他还得交农业税。这回不算自己地里的，他光在合作社每人就分了600斤，这几乎是他的两倍。不知道那么多的粮食要占多大地方，陆水长开始发愁了，他愁家里所有的缸也盛不完那么多的粮食，看到所有的缸、罐、盆都装满了，还有剩余的粮食，他突然兴奋地拍起手来。

“社员们是最讲实际的，最现实的，”张兴发说：“庄稼没分到手时，他们担心忧虑，可一旦粮食装满了他们的粮缸和粮囤（一种用席子

囤起来的贮藏粮食的囤子)，他们就信服了，就放心了。”

第一年庄稼的收成确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当社员们按合作社的指示把粮食堆在老北庙的戏台上时，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打下的粮食，当粮堆在增高，当装满粮食的沉重的大车穿过狭窄的小巷，路过村中的池塘时，一路上的单干户都在伸长脖子张望，他们从车上拽下一个饱满的玉米穗，发现穗子比他们自己地里任何一个都大得多，于是他们喊道：“我们也入社行不行？”

粮食的大丰收不仅使合作社的20户社员感到心满意足，而且还有25000多斤卖给了国家，每户平均1250斤。社员们有了缸充圆满的粮食，足够吃过第二年春天了。

然而，有的单干户还没等到过年就没粮吃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救济。造成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原因是新的税收政策。

单干户和合作社上交的农业税是以土地的估计平均产量计算的，并不按实际收成纳税。因为合作社很容易增加产量，所以用于交税后粮食百分比常常减少。遇上灾荒年，粮食歉收，国家就会改变计算方法，要求合作社降低实际收获粮食的纳税百分比。这是因为合作社的产量是公开的，大伙都知道，很难提出什么疑问。而单干户却仍得按估计产量交税，因为政府没有办法检查他的实际产量。由于这个原因，单干户所缴纳的税一般是不变的，大家粮食都歉收，税务部门同意减少整个地区的税款的情况例外。对于歉收的单干户，交税确实负担重了，交税以后，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粮食过冬，而离家要饭。

让人吃惊的是，用秤称粮食重量也引起了一部分普通农民的疑问。不论是未入社的还是入了社的人，以前从未真正用秤称过自己的粮食，所以，他们过去是用石、斗、升来计算粮食的数量，而不是斤。在合作社主席告诉他们“我们至少能收450斤”时，像陆水长这样的农民，根本不知道450斤是多大一堆，虽然庄稼仍长在自己地里，但自己本应该非常了解的庄稼已不再属于自己一人所有，很难想象总产量会是多少。因此，他们有一种被人从过去的经验中连根拔起的感觉，无根无底。先期分到手的那一小份早熟的豆子和南瓜很难使人充满信心。

1954年的大丰收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那些认为单干有利而尚未入社的人，突然埋怨起合作社不许他们入社来，“你们这些合作起来的

人一点也不关心我们，”他们说：“现在你们的收成那么好，更不会要我们了。”

他们突然吵着闹着要入社。这样，充实合作社就变得容易多了。合作社很快由20户壮大到了90户，老社员们都成了内行，他们为才入社的新社员介绍他们是如何那么快就提高了粮食产量的。

“我们劳动有分工，所以每个人都有活干，我们在一起劳动，互相检查、互相监督、互相比较。因为每个人都要脸皮，所以干起活来都很卖力。单干的人没这么高的目标，所以干活也没有我们卖力。我们有一部分人抽出来搞副业，大多数人在地里锄地、间苗、上粪，我们给庄稼上的粪比以前又多又勤。可是，在单干户家里，如果劳力出去搞副业了，那地里的活就肯定要受影响，这样，地里的活就会被耽搁了。”

“常言说得好：‘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在“前进社”社大到90户的同时，以杨忠盛的20户互助组为基础的第二个合作社“解放社”也成立了。这个合作社一成立就有40户入了社，户数是“前进社”开始时的两倍，实际上有50户要求入社，但杨忠盛以各种理由拒绝了10户。

合作社突然变化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是“前进社”粮食的大丰收。作为一种深刻的认识和进一步的理解，一股亲合作社之风开始刮进乡村。到这里，张庄一直对合作社持怀疑态度的三个老人也开始帮助煽“合作风”。这三个老人是王国凡、杨得新、申元珍。由于上了年纪，不能劳动，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蹲在村街上拉闲话。他们到哪儿，哪就聚一大群人，只要见到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他们在议论村里发生的重要事情，而且，他们总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是不管听到什么他们都传，好的传，坏的也传。当才元威胁说要退社时，他们传合作社要解散了的谣言，他们到处传播中农李宏仁的话，说：“合作社的干部是工头见工头，谁也不怕谁，怎么也处不好。”并叫“前进社”是“吵架社”。

但在合作社粮食大丰收以后，他们完全改变了腔调，又开始把合作社捧上了天，“反正，合作化道路好”。他们对那些愿意听他们拉闲话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入社。”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宣传这个看法，他们的话比任何人的都管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话。

行动比语言更响亮。在才元和兴发的动员下，三个老人都入了社，再也不动摇了。如果有人有困难面前犹豫了，他们会一起与之展开强烈的争论，“只要我们前面有一辆车，哪怕只有一辆，我们也要跟着走”。他们的语言和行动着实影响了一大批人。

以后几个月的经验证明，“一群头”是一笔财富，而不是一群祸害。“前进社”几乎吸收了张庄所有的干部为社员，而“解放社”只有一个张天明。“前进社”工作搞得很顺利，不断有新的办法、新的想法出台，解决问题效率也很高。

在“前进社”只有20户时，就形成了个习惯，社员们每晚都要开碰头会，评价一天的工作，登每个人的工分。当合作社由20户发展到了90户时，社员们觉得，干部们和会计碰头就足够了，他们在一起登记一下大伙的工分，白天晚上都可以。后来，根据积累的经验，他们有时每一周，有时每5天开一次碰头会，因此，大大缩减了花在登记工分上的时间。

“前进社”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便开办了一个面粉加工厂。有一天，厂里的主任发现丢了一些麦麸，社里的领导作了调查，很快在王化南家里找到了。王化南是中农，土改时被没收了财产，当时，他帮助哥哥王少南埋藏了一个地主的许多银子。所以有人认为王化南偷麦麸是要搞垮合作社，是对土改时人们批斗过他进行报复。王化南承认是他拿了厂里的麦麸。社里开大会时对他进行了批评，这件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处理了。

秋收的时候，生产队长李树槐蹲在那儿挑玉米穗，然后，把挑出来的又大又饱的玉米穗堆在了一起，大伙都以为他在选明年的玉米种，可当轮到给他家分粮时，他却把这些挑选出来的玉米穗放在了秤上，原来，他是在给自家挑大的，几十个社员马上冲上来抗议。

“你凭什么这样做？”

“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资格搞特殊？”

“谁说他可以挑大的？”

张兴发，作为合作社主任走上前来，把李挑出来的满满一大筐大玉米穗倒回了大堆上。

“他可以挑出来，”张兴发说：“但也别想拿回家，如果他这样干，就再也不许参加我们的生产劳动。”

这件事处理得也很得人心。大家说：“说到做到，干部是好样的。”
张庄三位爱拉闲话的老人，编了下面的顺口溜：

干部带头，合作社红火，

没有干部，合作社散伙。

杨忠盛当然有同感，他发现靠张天明一个干部来管理“解放社”很困难。张天明脾气犟，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勇敢无畏，但是管理合作社就有些简单粗暴了。他总认为自己知道得多，总想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注意团结大伙。干部的问题影响了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社”工分问题上“扯皮”花了大量时间，最终，收成也比“前进社”少。所以，社员们强烈要求两个社合并起来。

同时，那些在两社之外或者被拒绝入社的人也开始要求入社。但在这些人中，有的是有政治问题，有的是不能把工作搞好，所以两个合作社都不愿意谈他们入社的问题。

在1945年的“打叛徒”运动中，有些农民曾是斗争对象，直到现在，人们仍然认为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冲击。就拿郭宏喜来说吧，他爹郭富贵是日本占领时张庄的伪村长，郭富贵已经死了，郭宏喜和他老婆、老娘一起生活，靠种地过活，一直没敢要求入社。

对王少南儿子的歧视就难以让人理解了。王少南为北市的地主藏过银子(这个地主是他的小舅子)，在追查这批银子的过程中，王被打死了。党的领导干部后来承认追查行动是错误的，向他的弟弟王化南道了歉，并退赔了所有被没收的东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少南的儿子视为斗争对象，不许他入社。

由于更不值得一提的原因，金少恒也被拒绝入社。1947年，农会把他定为富农并没收了他的财产，1948年他又被重新化为中农，村里归还了他所有被没收的财产。然而在1954年却没有人同意他入社，因为人们仍然认为他是斗争对象。

兴发和贵才都公开表示，他们不愿意区分什么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斗争对象，不管对还是错。他们所主张的是，这些人过去曾经是斗争对象，那么现在就仍然是斗争对象，他们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与费城红班的警察是相似的。

“别打我，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反共产党的。”被打的人哭喊着。

“我不管你是哪一种共产党。”警察说：“你被捕了。”

按张庄干部的道理，他们肯定会认为那些在土改的第一次洪流中被剥夺了财产的绝大部分中农，实际上都是与日本侵略者有勾结的人。从划成分来说，也许他们不应该被剥夺财产，但是兴发、贵才和村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叛徒，是罪犯，他们罪有应得。

土改后开始重建时，作为土改基础的阶级成分的划分造成了大量的、有时是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王京和所说，地主分子和地主成分就有区别。地主分子是指地主本人；他的儿子只是地主成分，但他的儿子能否逃脱“地主分子”的称号又主要取决于他家被没收财产时他当时的年龄，如果当时他已满了干活的年龄，那他就又被称为地主分子，因为他也过着剥削生活，否则，他就只是地主成分。

这一切似乎都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多大就够了干活年龄的问题。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划分阶级的尺度可不容易，如果倒回去三代去找地主，就会有几百万破产了的地主的子孙后代也能算“地主分子”的称号。1948年，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地区解放以前3年用作审查所有家庭阶级成分的基础阶段。这项工作引出了这样奇怪的颠倒现象：一个农民为一个地主当了10年雇工，1948年划成分时，这个地主被划成了贫农，而这个雇工却被划成了中农。因为，在土改前3年中，这个地主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破落了；而这个雇工朴实勤快，置买了一些土地，因此，被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剥削者反而比被剥削者的成分低了。

“我想不通，”这个新中农说，“我为这个王八蛋干了10年的活，现在他倒成了贫农。”

还有几户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被合作社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缺少劳力。其中一户是矿工杨个森家。他在家种了10亩地作为每天下班回来后的副业，因为每天要到矿上去上班，所以大伙觉得他不会全心全意搞好集体生产，申云鹏的地很不好，而且人也特别懒。没人愿意要他入社；贾正兰是个没劳力的寡妇，她和婆婆一起生活，有20亩地，可大部分都长了杂草，有一些小块地倒是勉强种上了，可谷穗长得还没有小梅指大，贾正兰在农忙时想雇人来帮忙，但那时大家都正忙着，所以她地里的活总是干得很迟。

“我们害怕要了这些人会把合作社拖垮，”“解放社”的会计说，“因

为我们希望合作社能办好，所以不敢背太多包袱。再说，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买，我们只想吸收那些有一定财产的人入社。”

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歧视都违背了党的政策。因为共产党对合作社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示范章程草案特别强调，“不许限制贫农入社，”“不许排斥中农入社”，并进一步指出“要有计划地吸收参加辅助劳动的老弱孤寡人社”。

这些政策虽然众所周知，但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给合作社的压力太大了，他们说合作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县里的领导知道，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合作社是兴盛还是失败，对他们来说，关系重大。他们之所以吸收中农入社，是因为中农有种田的经验、有土地、耕畜、劳力，而且很少找麻烦、出乱子。地主和富农好管理，他们被没收财产以后，都变得胆小怕事、唯命是从，而贫农，除了麻烦和问题，什么好处也带不来，他们缺这少那，而且还不听话。因为，现在是贫农掌权。

如果合作社搞不好，人家会说县里的干部没能耐，还有，万一合作社垮了，再重新搞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为什么不稳一点？只有拒绝接受那些只会把合作社拖垮的贫农入社，挑选有好地、好农具、好劳力的农户入社，才能把合作社搞好。因此，实事求是地讲，在头一两年，上百的干部常常以对社有利的借口违背党的基本阶级政策。

幸运的是，正是早期合作社的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随着合作社的壮大和合并，不久便把全村的农户，有长处的、没长处的、有劳力的、没劳力的、有好农具的、没好农具的全都吸收了进来。大的集体一成立，就不会再后退了，所有的人都得一起跳一起游，老弱孤寡、斗争对象，过去的地主和富农等问题不再仅仅是村上干部的问题，变成了合作社的问题。因为两个合作社合并起来了，所以，在两社之间不再存在什么差别了。

张庄大规模的合作是在1955年秋天，夏收以后进行的。首先是杨忠盛领导的“解放社”与张兴发领导的“前进社”的合并，随后，原先被排斥入社和不愿入社的人都被邀请入社。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应邀入了社，即使最顽固的人看到运动的规模之大也入了社，所有的土地都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劳动。个人单干会是一个什么前景呢？没有工可雇，没有地可卖，没有

地方搞投资，没有办法搞发展，因此，他们必将会低头，放弃单干也来参加合作社。

但如果把合作社看成一个大集体，一个小社会，从组织上看，它仍是初级阶段，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它的内部像在互助组内部一样仍然存在剥削现象。合作社把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合并了起来，根据耕畜和主要农具的使用来分配劳动日，这样，即使所有的社员都在一起干一种活，他们的收入也会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土地的股份基金不同。事实上，在初级合作社阶段，一个人不劳动就可以生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他的土地股金很高，或如果他有两头好牲口，他完全可以不劳而获。

其他地方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在大寨，成立了合作社的贫下中农们抱怨说，一旦合作社发展到了全村规模，他们还会受那些土地大户的剥削。大队在付了土地股金、耕畜租金、马车费、农具费等费用以后，剩下来的供劳力分配的已经很少了，那些土地少、农具少、没有耕畜的社员看着自己的邻居依仗他们的“铁饭碗”变得越来越富了，而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就像剥了皮的高粱秆——光剩下芯了。

一些人在土地入社合并时对自己土地过分的期望更加重了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的土地只收了20袋粮食，可他却报了40袋，合作社为他的高产多付了股金，为他的牲口和农具都多分了红，他得到了那么多的粮食，不仅装满了家里的粮囤，剩下的只能堆在地上。入社后，他分了4000斤粮食，这么多的粮食比单干时的任何一年都多，他自己承认，干活并没有太卖力。另一个农民叫贾长元，情况正相反，他入社的土地少，并报了实情，结果辛苦了一年，所挣的粮食还不够全家糊口，这样，两个人都对合作社不满——小贾不满是因为他的劳动所得太少了；另一个人不满意是因为在合作社里他不能为所欲为，他把自己的地看成是最好的地，他的收入多是由于他从前的地好，他想，如果自己单干，说不定会收得更多。

看到这些情况，陈永贵带头减低了土地股金。大伙都知道，他的地每年收32袋粮食，可他要报成18袋，会计贾振江表示反对，“谁也不许随便改动账簿。”可陈永贵说：“给我笔，不会出错，我不是要加，而是要减低我的土地股金。你反对是因为你害怕自己也得这么做吧。”

就这样，陈永贵在他自己名下土地一栏里写了18袋，贾振江不好意思了，也减低了他的粮食收成数。示范作用下，许多党员都减少了自己的数字，由于数字的缩小，他们所得的股金也就少了。但并非所有社员都同意这么做，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了，等来年秋后分红时，党员干部们就要吃亏。比如小章元，他们就觉得他是光杆司令——只有芯。由于分配上的不公平，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自己把股金减少的人，都愿意把合作社发展到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高级合作社，土地不再计算股金，所有的耕畜，大农具及其它主要生产资料都已陆续被合作社买去了，只根据工分计算分红。

许多地方在劳动日和生产资料股金在分成时应占的比重也出了问题。为了调动中农入社的积极性，许多初级合作社不得不按股金60%、工分40%的比例来分配。但是，这样的分配比例让那些付出大部分劳动的社员不满。随着产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创造高产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地和农具而是积极肯干的人，那些出劳力的社员对把收成的大部分分给土地和农具的主人感到不满，到了年底，社员们重新协商分配方案，决定了五五开，有的地方四六开，一两年以后又成了二八开。

在张庄，分配比例的问题没有他们经常碰到的其它问题尖锐，因为土改以后，村里每人占有的土地数几乎相等，土地合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土地上的特殊收入。相比较而言，这个问题比别的地方发生的较晚一些。那是在国家接管了粮食市场以后，在劳动和土地分配比例问题上，其它地方已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以后，张庄的合作社才做出决定，开始，土地与劳动的分配比例是四六开，后来又改成了二八开，因此，张庄没有人抱怨因为土地股金占的比例太大造成社员两极分化的。

不幸的是，对耕畜的主人可不是这样对待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张庄争论的焦点。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更高一级的合作社迈进。一旦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土地、耕畜和其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成了集体所有，社员只凭付出的劳动分红。

在张庄，“前进社”和“解放社”合并，并吸收了全村所有的农户入社不久，就开始向更高一级迈进了。他们在1955年秋季向高级合作社迈进时，学习了邱村的经验。邱村在张庄附近，也是长治市郊区的一个大队。

二十一 向更高级迈进

赵根则有一头不仅在邱村，在长治市整个地区也算是最好的牲口，他的骡子皮毛油黑，浑身油光发亮，这头骡子一只蹄踩在一块砖上，然后让孩子从它的肚下钻来钻去，它能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多好的骡子！在长治，以前从未见过，赵根则说它值1200元。

给这头骡子一个公平合理的估价是所有人都头疼的事儿，大多数人认为合作社好是好，可像这样估价出钱的问题确实令人烦恼。如果邱村计划发展成更高级的合作社，耕畜就好像土地一样入社，在这之前，所有的耕畜都得估价。很清楚，邱村所有耕畜估价的高低全要看最好的耕畜，这就是赵根则的骡子，这头骡子值七八头毛驴。如果这头骡子估价高了，其它的牛和驴作价相应也要高一些，如果它作价低了，那其它的牛、驴的价格就会跌下来，这个问题涉及到所有的人。那些有耕畜的人，不管是旧中农还是新中农都希望这头骡子的价高一些，而那些没有耕畜的人则希望这头骡子的价格低一点，因为价格高了会减少他们集体的资金比例。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既有中农也有贫农，他们的比例是40%比60%。赵根则要价1200元，中农们支持他，而贫农却坚决反对，他们说他要的价太高了。

赵根则慷慨地让了步。“我让200元”，他说，“我只要1000元，总行吧。”

但贫农们还是不满意。许多次会后双方还是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要么一方一发言，大伙就吵得一句也听不清，要么，双方都一声不吭。最后一位贫农说：“我们不要再吵了，咱们到牲口市去找一个内行，让他给估个价，这样，我们都听他的。行不行？”

到这时，赵根则骡子的价格已成了全地区农民议论的话题，当然包括张庄。赵根则是邱村合作社的社长，他的弟弟赵迎则是副社长，他俩共同拥有这头骡子。如果他们能带头作一个公平的价格，他们的榜样将不仅会影响邱村其它179头耕畜，而且会影响长治郊区其它所有耕畜的价格，进而影响整个晋东南地区。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成

了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关键的转折点。这是一个考验，将决定财产入社作价时中农的态度。有些中农已经有了不满情绪，他们写了一副既简单又直率的对联：

合作社贫农沾光，合作社中农受伤。

中心问题是股份基金问题。最初的设计是均等付出，以保证财产多的人不会通过入股蒙受损失，而没有多少财产的则可以通过入社最终也拥有自己的一份财产。正如章程草案第26条所指出的一样，所有入股的社员的耕畜及其它生产资料，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正常价格收买，收买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资金必须由所有入社的劳动力分摊，每家每户必须交纳公有化股份基金以使任何提供耕畜、马车、犁具等生产资料的家庭都能得到现金价款，而那些没有任何财产入社的人则必须付出现金来购买股份。

正是入股财产的规定使定价问题特别重要，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想要高价，而没有财产的人想出低价。显然，那些没有财产可入股的社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问题一出现，中农们动不动就问“你的股份基金在哪里？”贫农们哪里有钱交纳股金？他们只可透过两种来源挣得一点钱，一是合作社给的劳动日所得，一是从国家银行贷款。很明显，用劳动挣来的一点钱交股金一年内不能交清，时间必定要延长。经过多次讨论，许多合作社像章程草案建议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股份基金三年付清”的制度，社员欠合作社的款要3年付清，同样，合作社欠社员私人的款也要3年付清。

这样，在引起争论的价格问题上又加上了一个时间问题。有财产要入社的中农不仅害怕价格太低，而且害怕付钱的时间太长，或者到时候根本不付给。这等于要他们按市价的三分之一把牲口卖出，其余的三分之二以后才能付给。大多数中农认为到手的现金比许诺更靠得住，谁能保证合作社能存在三年？所以，当一些人突然以较低的价格私下卖掉了牲口和农具时，没有人感到吃惊。

在中农看来，合作社这样做对贫农有利，他们从入股的第一天起就有了牲口的使用权，并且可以三年付清欠款。有什么能保证这些欠款一定能付清？如果贫农从银行贷款，中农是把钱收回来了，可是银行什么时候能收回贷款就很难说了。银行从不强迫他们还贷。许多贫农就真的再也没有归还贷款，最后，是国家银行免去了他们的欠款。

因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补贴了高级合作社的建立。

耕畜和大农具的定价在整个股份基金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定价太低会使中农（旧的和新的）处于补助贫农的位置；定价太高会增加贫农的欠债负担，这种负担只有靠国家来减轻。

在这种关系中，赵根则骡子的价格就显得更加重要。长治市的领导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整个运动就会顺利发展。所以，一方面他们找来赵根则和他弟弟赵连则，给他们讲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会见了牙行（市场上享有公认权威的估价行家），要求他谨慎、公平地处理估价问题，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协助牙行工作。委员会由一个农工部的干部，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还有一个群众代表组成。

这一天，邱村的主街简直成了一个大牲口市场，村里所有的牲口都被拉在这儿供大家参观评论。为了保证定价时没有偏袒，牲口的主人要呆在离牲口很远的地方，每头牲口都没有被标明是谁家的，只是挂着一个号，在号码牌上留着一个空档，用来写估价，还留着一个大空让写最后的定价。全村的人都来了，焦躁不安的户主，他的老婆孩子，所有人都来看热闹。他们屏住呼吸，等待着赵根则骡子的第一个估价。

委员会有成员说：“1000元”，牙行说“900元”，最后，赵根则自己站在人群前说：“我要800元。”

有些人欢呼起来，而有些人则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赵根则砍下了所有在场牲口的价格。他的叔伯弟弟赵继则有一头骡子，自己以为能值600元，可现在根则的才800元，他那头恐怕超不过400元了。

“赵根则毁了这出好戏，”赵继则抱怨道，“他才得了那么点儿，我能得多少？唉……”

委员们感到了这种压力，说：“给他900元”，牙行又重复了他刚才的估价：“900元”。

但是赵根则坚持不变。市里的领导曾提醒过他，要他必须带好这个头，所以他只要800元，而且决不多要。赵根则的800元写在了本子上，这就迫使其他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价格。当时，这看上去是合作化运动的一个胜利，但有些人却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结果并不

是太好的。低价使中农们心烦意乱，并使他们丧失了信心。

赵根则骡子的价格影响了全区牲口的价格。当张庄的农民们在一起估价时，明显地感觉到要把价格压低压力很大。在这之前，党支部成员李龙壁就把他的牛和车拉到离张庄很远的一个市场卖了现钱。这样做他至少比入股合作社少挣15元，他不赞成三年内付清的办法，他不敢确信张庄的合作社能否持续三年，也不敢肯定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货币是否会贬值，使他高兴的只有到手的现金。因为当时张庄还没有开始估价，牲畜还没有开始入股，所以很难说李龙壁的所作所为是否破坏了合作化运动，出卖牲口的事时有发生。

从邱村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张庄的干部们组织了一个由各队选出的代表组组成的评估委员会，还从潞城县的市场请来了曾在邱村任委员会成员的牙行，也参加了委员会。这个人一直在牙行干，从事牲畜价格和牲畜市场情况的研究，解放前，他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公正的仲裁人，不管是卖主还是买主都这样认为。解放后，他在市政府商业局工作，负责市场商品价格，制定自由市场价格的公道范围。

在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同时，张庄的干部们还召集了一次全村大会，动员积极分子通报政策，警告人们不许擅自出卖牲畜，并劝告那些有牲畜的人接受公道的价格。他们还特别注意那些有牲口、马车和大农具的共产党员，他们认为只要党员能带好头，普通的社员就会跟着走，那么整个运动就会顺利前进。

终于，估价的一天来到了，这是11月上旬的一天，合作社社长在喇叭上通知把所有的牲畜、马车和大农具都拿到村里池塘旁边的空地上去，所有的社员都到那儿集合开会，东西和耕畜拿来了，人们也集合好了，党支部书记才元宣布，今后，张庄要成立一个高级合作社，第一步，合作社的社员要给所有的牲畜和农具定价，然后就把这些财产作为股份基金转入合作社，合作社要给那些入股超出标准的人付现金。

“我们会公平合理的，”才元说，“我们要根据每件东西的价值予以估价，好的东西我们出高价，中等的出价要低一些，不好的东西出的价就更低。”

首先是申天喜的马，这是一匹“四岁口”好马，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它是天喜卖了一头老驴又添了一些钱几个月前才买回来的，他本

想在以前的合作社里多挣一些牲口的报酬，现在，牙行给他的马估价224元，这个价并不高，但与邱村那头骡子的价格相比，算是公道了。

申天喜什么也没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能有意见吗？

下一个牲口是老保的。人们都说张老保总倒霉，就像一块烂毛巾，谁都拿他擦手，老保为此很没好气。老保的马没有天喜的马好，当委员会出价200元时，张老保勃然大怒，他坚持说他的马无论从哪方面讲也和刚才拉走的那匹一样好。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不能劝他平静下来。吵闹声传遍了整个村子，但牙行仍坚持他的估价，老保坚决反对，看来这次会议要败在这匹马上。最后，牙行评估人让了步，他们决定再给老保加4块，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老保居然接受了，这样，他的马定价204块。

下一个轮到李洪恩了。他是从前的民兵队长，张庄著名的花花公子，他在1948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威胁过许多人。虽然，其他党员竭力劝他要有合作精神，但他就是不答应给他的驴和平车出价120元，他要150元，当委员会拒绝出150元时，他拿起鞭子，赶着驴和车回家了。

“你不能卖到别处去只能卖到这儿？”人群中有人喊，“你要卖到别处去，我们就赶你出社！”

但洪恩连头都不回，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这下使会场开了锅。人们就尚未决定的价格开始争吵。多年的好朋友、好邻居吵得翻了脸，互不说话了。才元只好先让会场安静下来，终于他找到了办法，他开始骂所有在场的人：“你们怎么那么看重这几头驴、几匹马、几头牛、几辆车？等咱们的高级合作社成立起来，所有的人都会富裕起来，我们会比现在强，强得多。大伙不要为了几块钱吵得丧失了目标。牲口与牲口之间的价格公道合理，这还不够吗？”

这一顿责骂争取了大部分的人，估价会议又一次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与此同时，李九祥受了李洪恩的影响，赶着他的骡子和马车离开张庄向他的老家西山去了。1948年来张庄时，他说自己是贫农，实际上他在西山是富农。这次他说要回老家去收拾一些私人家什。可第二天，他步行着回来了。很清楚，他“回家收拾家什”是为溜走找借口，

他卖掉了骡子和马车。

大队干部们又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对李九祥进行了批判。大伙都说，如果不是李洪恩无视委员会把驴赶回家，李九祥也不敢卖骡子。到傍晚时，李九祥站在众人面前，一声不吭，他不能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时李洪恩突然出现了，赶着他的驴车，他说，他和他父亲商量的，愿意接受 120 元。

所有人都认为把牲口入股给合作社是整个合作社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那些拥有一头好牲口和一辆马车的户认为这是“半拉子家当”，这是因为能用他们搞运输为家里挣钱，如果其它方面有了亏空，运输挣的钱可以补上。人们从感情上也很珍惜这些牲畜，他们通常把牲口喂在外间，自己住在里间，通过长期频繁的接触，他们已开始把牲口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员了。

解放前张庄的赤贫钱九林，1947 年买了一头小牛犊，在自己的外间把它养成了一头大牛。11 月的那个下午他把牛卖给了合作社。后来，有一天，这头牛干活时折断了一只角。听说牛受了伤，钱的老婆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了一些碎布去给她的牛宝贝儿包扎，她担心伤口不会愈合，担心会感染。“总有一天这头老牛还得还给咱们。”她说。她喂大了这头牛，在她的心里，它一直是家里的一员。

陆补芳对他的驴也是这样，小驴一生下来他就喂上了。开始时，他用一块布浸上来粥喂小驴，精心地喂养，小驴长大了，完全能干活了，他才舍得偶尔打它几下为了让它听话，但从来没有让它拉过超重的东西，他的平车上装的东西从来没有超过 500 斤，他自己从来不往车辕上坐。在估价的那一天，他都快哭了，他心爱的毛驴只挣了一个平均价，然后便被拉走了，在别人看来这是正常的，可陆补芳却很伤心。

从那以后，只要有听到人喊：“把补芳的驴拉出来，”他就赶快缩回家去了。“他们走了，又套上了我的驴，”他自言自语道，“如果它回来受了伤或累坏了，它就不再是我的那头好驴了。”最使他感到恼火的是，看到车上装着满满的，足有 800 斤的粪肥、石头或煤，而且赶车人还自在她坐在左边的车辕上。由于牲口原主人的抗议，合作社决定，农闲季节牲口的老主人可以把他们已卖给合作社的牲口借回去使用。1956 年，补芳想送他老婆回娘家过年，所以他借回了他心爱的

毛驴，让老婆骑着，他跟着回娘家了。回来后，要把毛驴还给合作社时，他到处划拉，想找一样好东西，“送给我心爱的毛驴。”

李顺老汉在把牲口卖给合作社后就一病不起。他本是张庄的赤贫，土改后，他攒了好几年钱想买牲口，就在高级合作社成立的6个月前，他终于使一生的梦变成了现实，他们买了一头牛、一辆车，并立即开始搞运输挣钱。他没有参加过互助组，只在最后时刻才入了初级合作社。几周内，合作社就给他的牛和车估了价，归了社里所有，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他病倒了，很快就死了。人们都说他是伤心过度，因为失去了牛和车。

然而，大多数人在卖了牲口以后不久就不难过了。事实上，几个月以后，他们便开始享受没有牲口的生活，外间没有牲口了，他们用不着喂食喂水，打扫卫生了。高级合作社一开始，他们的收入很快就增加了，用多挣的这部分钱，他们买了自行车、缝纫机，合作社还买了电磨，为他们加工粮食。有了自行车，他们不用再骑牲口，可以很快地去拜望住在远处的亲戚；有了粮食加工厂，他们不必再用牲口拉磨磨面了，加工厂加工各家需要的粮食。80%的社员日子过得比从前好，有没有牲口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了，人们开始记起了才元的话，“高级合作社一成立起来，我们都会富裕起来……不要因为几块钱而丧失了目标。”

向高级合作社迈进除了得把牲口卖给合作社，还意味着取消了土地的私人占有权，搬掉土地的界石。过去，每块地都有一块约3尺长的石块，把它的一头埋在地下2尺多深，以分地界。土改后，农民们精心照看着这些界石，种地时，谁也不敢在地界线上播种。初级合作社成立后，庄稼种满了地界线，但没有人挪动那些界石，总之，土地仍是私人财产。但现在，社员们计划把土地永远合并在一起，他们要让拖拉机进地，在合并了的大块土地上犁地就不用分什么方向了，所以他们必须搬掉界石，解放土地。

合作社决定每家每户都把自己地里的界石搬掉，大部分社员照着做了，他们搬起界石，扔掉了。可有不少人由于对合作社的未来缺乏信心，到地里后没有把界石扔掉，而是深深地埋在了地角，将来，万一合作社垮台了，他还可以证明这块地是他的。

“兴发，在你搬掉界石的头一天晚上，你是怎样跟老婆说的？”我问。

“怎么说的？你问的真是奇怪的问题，我是干部，一般情况下我很少跟别人谈我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如果我计划对谁说，那也是最后一个才跟我老婆说。”

“那，你现在怎么想？”

“1956年已经那么做了，谁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地了，每件东西都在大田里，连地垄的方向都不一样，都超出了地界线，但即使这样，有时当我路过那口井时，也总要四下走走，看看南边再看看北边，一切都是那样熟悉，突然，我才意识到这块地原来是我的那块。”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兴发耸耸肩，显然他不十分留恋他从前的土地，但仍然……

“有人觉得很难适应。”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接着说，“土地合并几个月以后，我们就不叫它‘我的地’了，牲口和农具也是这样，过去我们总是说‘我去洪思的地’，‘我去套老王的车’，‘备上天喜的马’，因为我们习惯这样说了。我确实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取掉了‘我的’这个词，但最少是在一年以后，或许更长。”

二十二 按劳分配

天气一直很晴朗的十月，有一天，天空好像遮上了一层面纱，把整个地区盖了进去，远处环绕上党盆地的山脉也显得模糊不清了。天空和山脉好像连在了一起，就是有妇女正在劳动的田野也给人一种错觉，整个地显得灰蒙蒙的，很大很长，似乎干一整天也很难从这头干到那头儿。成熟的玉米已被割倒，头朝南根朝北很整齐地放在地上，每一行有两个妇女负责从秆上掰下玉米穗，并把它们堆成小堆儿，大多数干活的妇女相距不远，一对暂时领先，另一对很快就赶上去了。但有两个妇女却拉下了很长一段距离，她俩发现自己被大队伍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俩人一个是李天虎的老婆，一个是杨贵林的老婆，她俩有唠不完的话，一个劲儿说长道短，所以让人家给甩下了。太阳快要落山了，大山去和太阳相会，大地留下了大山的影子，终于在天黑之前，礼堂顶上的喇叭放起了“东方红”乐曲，这是告诉人们该收工了。这时排成长队的妇女们已干到了地的另一头，她们慢慢直起腰来，伸伸

胳膊，整理一下衣服，用手提提裤子开始收工往家走。天虎和贵林的老婆虽然落后了四五十米，没有干到头，也和大伙一起收工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队长天虎臭骂这两个没干完活的妇女。

“怎么别人都干完，你们就没有？要没本事干完就跟我一说呀，怎么能这样就走了。”

“我们那一行玉米比别人的密，”天虎老婆说：“实际上我俩干得和她们一样多”

“别吵了，”一个伙伴说，“咱们快去干活吧。”

可是天虎的脾气已经上来了，他不会就此罢休。

“你妈的，臭娘们儿，给我滚一边去！”

他本不应该这样对妇女们讲话，当然也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婆，可他要对生产负责，对生产定额和工分负责，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发起了脾气，他哪里管你什么这一行比那一行稠呢？谁有时间去调查那个！也许是她们只顾聊天忘了干活，为什么她们不多干一会儿，待像别人一样完成了任务再收工？这样干就没什么可吵的了？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

合作社接管了所有的工作以后，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分上，怎样定、怎样评、怎样记，对人们挣的工分怎样给等等。几年来，他们试行了许多办法，但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就像在美国，没有一种工资制、一种定额制、一种日工资制能确实令人满意一样。

在西方工资制的深层矛盾是剥削，投资方能得到多少剩余价值、工人们能带回家多少真实工资。在一个中国的合作社里，这种直接的剥削已不存在，然而，有些人却总认为工分制对他们不公平，而那些负责实施工分制的人觉得施行起来困难重重。¹

张庄合作社试行的工分制最初起源于苏联，是由农工部的申双富介绍给他们的，申称之为“死分活评”，这种办法是建立在按件计酬制之上的，运用这种办法，合作社领导在每个社员正常劳动能力的基础上定了“死分”，干完一天的工作量能挣10分，完成了10分的工作

¹原书注，尽管没有个人能从运转良好的合作社里抽走财富，但是由于整体来说财富是在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并不能说这里没有剥削。城乡间的这个转移并不是像解放前那样通过税费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进行，农产品低于市场价，工业品高于市场价，由此农民承担了更多的发展成本。

就挣10分，干得工作多可以挣11或12分，干得不好的挣9分、8分或7分；“活评”就是根据每天人们所干的活是否符合标准来评议。队长，有时加上委员会的几个成员检查工作并进行评议，加分还是减分都根据他们所看到的劳动的实际状况来定。

为了执行好这个制度，社员们还制定了一个时间表，他们把一天划分为5段，从天亮到吃早饭时为一段，从早饭到午饭为两段，从午休（一般是从最热时到下午3点）到天黑又是两段，要想挣满分就得干够这5段的活。

干部们根据一个全劳力（成年男子），在这些时间段里应该完成的劳动量来评分，他们用较简单的方法作计算。拿锄地为例，以亩计算，一天的标准是1.5亩玉米或1.2亩谷子，他们还计算了一下1.5亩玉米或1.2亩谷子地里共有多少垄，这样一天的劳动标准不仅可以按亩计算，而且可以以垄计算。评定其它活计，比如犁地就要复杂一些了，因为土质不同，对较硬的土质就必须予以考虑。因此，社员们把土地的土质从软到硬分成了三等，同时他们还考虑到了牲口的质量，于是把牲口也分成了三等。用一等的牲口犁一等的地，他们定的标准是每天5亩，用二等牲口每天4.5亩，用三等牲口每天4亩。再说耙地，用一等牲口拉双耙，每天的标准是15亩。

合作社的干部们发现，最难的标准是往地里送粪。地有远、中、近的不同，牲口的质量和车的大小也不一样。他们定了这样的标准：用标准平车和健康的毛驴往近距离的地里送粪，一天应送25车，每车10筐，中距离18车，每车也是10筐，远距离15车，每车10筐。如果用扁担挑，一个人一次只能挑2筐，这只相当于一辆毛驴车的载重的五分之一，所以，没有人用扁担来挣这种劳动的工分。

开始时，社员们为各种不同的农活定了70多种标准，但这还是不够，到50年代末，他们定的标准达到了160多种。他们按照常规又为一些劳动定出了最后的标准，因为当时已经有了许多已被大伙接受的标准。合作社的干部们常常去体验各种劳动，去完成各种任务，去亲身尝试新定的标准是否合理，他们虽然要打几次中歇，但干活的时候还都是很卖力的。这样，他们掌握了每户社员完成工作的数字，为合作社评分会议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在社员充分讨论了所有的意见和建议，得出了一致意见以后，他们才又定出了新的标准。

标准一确定，人们便开始工作，队长检查工作完成情况，记分员用记号把情况记录下来，不仅记下劳动的时间，而且记下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为了减轻队长的负担，每个队还选出了一个“检查、评审组”，对社员的劳动情况阶段性地进行检查和评审。除了这些，每个队还召开社员大会，比较已完成的工作，评选劳动模范，批评懒汉，批评邋遢工作。那些当选了劳模的人不仅可以得到荣誉，而且可以得到物质鼓励，如一把新斧头，一把新锄头，或一把新镰刀，名字还可以登在市报的光荣榜上；而那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人则感到矮人一截。另外，队长还有让那些干活不达标的人，重新返工的机会，不过返工不给计工分。

一般情况下，勤快的社员对这些标准感到很满意，而懒汉则总是抱怨标准定得太高了，要挣到一天的满分太难了等等。他们找队长吵，找记分员闹，不过得到的总是一顿批评，“你们跟人家一样高，一样壮，吃得只比人家多不比人家少，为什么人家都能干而你们就不能？”

不必说，懒汉们很不高兴。

总的来说，工分制执行得还算顺利，在50年代人们不知道别的办法，只是不断地完善“死分活评”办法，希望能以此解决工分问题引起的各种矛盾。然而，关于工作标准和质量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息过，“如果咱们的工分制没有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吵？”张兴发问，“问题就在于，工作标准定得再合理，标准本身并不能反映实际中的复杂情况。”

例如，为了评定检查的工分，人们把地分成了远、中、近三类，可一片地，一块地的这头和那头如何分远近？粪堆有的在村口，有的离村口却很远，这个远近怎么算？一片地块来回的距离大不相同，但在这一片干活挣的工分却是一样的，委员会也曾对这些地决定过不同的工分，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太武断了。

再说，如果委员会把往返25次定为一天的标准，有的人就加劲干要达到30次，这些多干了活的人就要多挣工分，而那些只完成了定数的人就只能挣一天的工分。领导会表扬那个达到30次的人，可实际上，或许他累坏了牲口，或许他每趟装车都少一些，即使他没有这样做，别人也会怀疑他这样做了。他们又开始争吵了，于是问题又来了。

为了多挣工分，有些人过分加重牲口的负担，致使母马不能发情，再不怀孕，因此再也不能繁殖生育了，或者既使发情怀了胎也要流产。那些关心集体，精心照料牲口的人挣得工分少，而那些根本不顾牲口死活只想露脸多挣钱的人却挣得工分多。

不管合作社如何周密精心地制定标准，人们一有可以在两件活计中选择一样的机会，就挑轻的去干，不愿干重的，挑近的不愿干远的。总会有一些活计挣起工分来比另一些容易点儿，队长总是劝人们拣重活干，但这种劝告往往引起不和。

张庄的干部们对“死分活评”的办法有了多年的经验之后，总结出了以下8点不足：

1. 这个办法把工分而不是政治觉悟放在首位，人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目标。

2. 这个办法只奖励体力劳动的完成，日工作量的完成，不奖励创造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化思想，而这些正是今后提高产量的潜力所在。

3. 因为最初的标准只考虑数量，不考虑质量，人们只为挣工分，所以只注意表面工作，不注意实际效果，最终没把活干好。

4. 为了工分人们加重牲口的负担，从长远来看，这样对生产很不利。

5. 因为牲口和农具都是集体所有，人们不注意管理、爱护、瞎糟踏。

6. 制定标准，检查工作，调解纠纷占用合作社干部的时间太多，有些实际上靠政治觉悟就可能解决的问题，白天黑夜地拴着干部，到头来大家都不高兴。

7. 不管标准制定得有多周到，总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8. 记工分的工作太复杂，普通人干不了这份工作，因为记分员必须懂算术和会打算盘。

张兴发也评论了工分制：

我们看到了工分制存在的问题，我们想废掉它，换上其它的试试，可不知该换什么。工分挂帅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是消极的，被动的，每天队长要到家里甚至炕头去叫去喊，人们才出工，到了地里，为了挣得一天的工分他们经常为怎么干，干多少而争吵，快到晌午时他们

花很长时间去听从采石场传来的爆破声，因为这声音，告诉人们快12点了。

水泥厂的采石工人一上午都在打炮眼，到晌午时他们才清理现场进行爆破，下午他们才要把炸下的石头运走。下面这几句顺口溜，50年代在张庄一带很流行。

7点8点队长叫，9点10点在吵闹，11点12点等放炮。

为什么每次整风运动群众对干部都有那么多意见？是因为工分制把干部和群众变成了对立面，当然双方都有难处，干部有干部们的难处，群众经常骂他们工作作风坏，是工分制迫使当“恶人”，遇到懒汉他们只能用标准来威胁，不按标准做就不给记工分，这就是“管、卡、压”，可没有别的办法。

那些年我们都觉得当干部太难了。春天你是“大红人”，上面的领导下面的群众都在看着你如何组织、领导这一年的工作。

到了夏天庄稼熟了，该收夏了，人们就开始批评你，一直到秋收前，他们又指责你是“笨蛋”、“饭桶”，只会鼓动、检查、记录、报告；骂你是“废物”，一年没有干成一件事。

到冬天，你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靶子，你成了一个有说不完道不清的错误的、无用的人，如果把这些错误写在纸上，足有一路膊长。

以上情况似乎表明是你没有抓住中心问题，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是你没有发现他们的革命觉悟，没有发现他们改造世界的热情，而是用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一方面给他们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用物质刺激引诱他们。由于你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由于你忽视了政治教育，尽管你想把工作搞好，但却没有搞好，你自己拼命干，但大伙对你还是不满意，这就叫“出力不讨好”。

你就像老公公背儿媳过河——出力不讨好。为什么？因为你企图背儿媳，存心不良，儿媳认为这个老家伙太放肆了，儿子认为他的老爹想夺走自己的婆娘。

这就是合作社干部们的遭遇。他努力工作、组织生产，检查工作、调解纠纷、解决问题，他起早贪黑，一个会接一个会，到头来人们还骂他自私自利，逃避生产劳动，官僚主义、骄傲自大，没完没了的罪名都加在了干部们身上。我们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辛辛苦苦一年过，秋收到来没法活。

上面领导找毛病，下面群众找罪过。

灰心丧气回到家，老婆话也不跟说。

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也反映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领导张庄走过五十年代的艰辛，从1948年到1958年的10年中，张庄9次更换了7位党支部书记，在任何一个革命村庄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7位支书都觉得干这个职务很难。有几位是自动下台的，因为他们既不能使上面满意，也不能使下面满意，还有几位被调到别处去干更重要的工作，或换到村上别的领导岗位去了，他们总希望重新调整能有利于顺利地开展工作。

我1948年离开张庄时，张兴发是党支部书记，他是接替了张天明的位置。因为1947年张天明被调到区里工作了。1949年村里又选张天明当了支书。1952年复员军人孙九祥替换了他，后来因为孙在抗日战争中曾出卖过一名革命战士，有人控告了他，县委调查了他的经历，发现他确实有罪，便免了他的职，并开除了他的党籍。

1953年张兴发又当了支书，干了差不多一年，合作社就成立了。合作社成立后张兴发当了合作社社长，师才元当了支书，他也是复员军人，是张庄第一个参加抗战的农民。

1956年，师才元被调去当马厂供销合作社的主任，王文则接任支书，但由于王文则工作作风有问题，爱发脾气，办事鲁莽，党员们1957年底请他下了台，换上了农会主席郭真宽当支书，由于郭真宽太老实、太直率，不久又和上级有了隔阂，所以1958年公社领导又让张兴发代替了郭真宽。

张兴发第三次上任只干了10天，因为他发现经常要给公社领导报告他们要求的产量数据、贮藏数据、销售数据等各种数据，对自己来说太难了，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辞了职，推荐了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陆晋书当了支书，这位新支书一直干到1967年一群造反派在张庄夺权把他赶下来为止。

通过上面的频繁改选可以看出，张庄掌握领导权的关键人物是张兴发。他从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下来又当了合作社的领导，合作社发展到全村规模时，他仍是合作社社长，因此也就是村主席。直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从长治市来的一个工作队发现了他在财务上的违规做法，从领导岗位上把他撤了下来，到那时，他已经在村上当

了近20年的领导干部。1973年，张庄村又一次选张兴发当了干部，直到今天，他还是张庄大队委员会的委员。

二十三 争论与斗争

张庄的合作化从小规模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全村规模包括7个小队的大队(6个小队搞农业，1个小队搞副业)，相对而言，发展还是较平稳的。村里的合作化从小到大平稳发展，每达到一个新水平，生产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到50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几乎是上党盆地传统亩产量的2倍，住房、教育、文化、保健、商业、私人财产和储蓄一年比一年发展。人们回顾一下过去，对10年来的进步感到满意。但从整个国家来看，合作化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解放后的10年，尤其是从1953年到1957年，在高级合作社的要求和发展速度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和斗争。毛泽东一再催促加快合作社的建立和由低级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其他领导人，最著名的有刘少奇和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却多次强调要放慢速度，暂停下来巩固一下已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把一些较弱的社砍掉，因为运动超出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群众的支持程度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数单干的贫下中农的贫穷上，他相信，合作社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警告说，除非共产党帮助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然他们就会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这种信心的丧失会破坏工农联盟(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政治支柱)。而刘少奇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有较多土地和财产的中农身上，在合作化的优越性尚未显示出来之前，他们会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这样会从另一方面破坏工农联盟。

毛泽东很清楚这个问题，他不仅反对硬拉中农入社，而且一再告诫要给他们一段考虑的时间，让他们自愿入社。但同时，他又怀疑他们的政治立场，因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经营的富裕中农，无论如何也不会高兴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样也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除非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强烈要求合作社要“上马”，大胆

向前奔；刘少奇则极力主张要小心、谨慎，有些合作社应“下马”，至少是暂时“下马”，免得摔跤。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毛泽东说，“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1953年，中国有近14000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有些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以不稳定、不巩固为借口解散了几百个合作社。据说，大批的社员是在压力下入社的，现在想退社。1955年，各级党委组织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又一次遭到了大幅度“坚决收缩”的厄运，人们按照上面的指示解散了几万个新成立的合作社。

1955年7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坚决收缩”的方针，“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来临。”他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可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毛泽东批评党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强烈要求党的干部要迎头赶上，带好头，通过建立合作社，来学会怎么建立合作社，不要解散它们。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大多数农民有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的愿望，他强调指出，党有能力领导这样一个运动走向胜利，运动过程中的错误、困难、疑问和退却都不是问题的主流，不是主要的方面。确实，这些问题不容忽视，应该逐个加以解决，但不能把它们当作眼下工作的中心内容。

为了增强大家的信心，指出前进的道路，毛泽东亲自从全国各地收集和整理了许多关于合作社(包括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如何成功地组织起来的报告，这些报告中有积极的和反面的例子，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主要讲了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还有那些干得很出色的合作社所得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对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评论，可以说是所有报告的典型例子。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上那里参观的不少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

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有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回避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在遇到合作社的复杂问题时新做出的反应。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毛泽东写道“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合作社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

“坚决收缩”没有影响到张庄。潞城县的领导从来没有派干部下来要求解散以张兴发为领导的合作社，但长治市委却动员在市农工部工作的王京和解散掉他帮助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当他1971年回忆起这件事时，仍感到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上面要求建立合作社时，我们都决心好好干，努力做好工作；上面要求解散合作社时，虽然心情十分沉重，但我们还是遵照领导的指示去做了。如果有人提出疑问，我们总是回答说：“难道领导不如你懂？”只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党的任务，我们就会自觉地尽力去完成。”

解散合作社是“反冒进”运动的结果，现在要我们去告诉那些当年被我们动员要带头成立合作社的党员要带头解散合作社，市委要当年充满热情在宋家庄成立合作社的郭全德负责解散那个合作社，郭全德拒绝了，他说：“我不能一张嘴说两路话。成立合作社时，我们没日没夜地给人们讲合作社如何如何好，现在又要我去告诉人家解散合作社，我不去，我不能这样做！”

由于郭拒绝了，市委又决定派肖权去。肖权是个会随机应变的人，总是迎合上级领导的喜欢，领导要求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是，使市委领导感到吃惊的是，肖权也拒绝了，“谁成立起来的，谁去解散。”他说。但因为老郭不想去，市委站在他这边儿，肖权只好去了。他硬着头皮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去做解散宋家庄合作社的准备工作。回来以后，他汇报说所有必要的工作都做完了。但事实上，合作社的社员们拒绝了他，他们保留了生产的公积金，这是合作社的心脉。表面上他们解散了合作社，可实际上仍保留着。

平顺县委也给劳模李顺达的西沟合作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们把合作社分散开，分成较小的规模，李顺达的合作社1955年已经发展到了包括南寨在内的那么大的规模了。省里派来的一个工作队要求他们重新组织，李顺达不在家(到北京开会去了)，工作队就给当地的干部施加压力，但西沟的干部和群众都拒绝放弃他们已经成立起来的大规模的合作社，“我们是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说，“如果分开也得自愿，谁也不能强迫我们。”

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李顺达从北京回来了，他带回了毛主席7月的报告，报告要求发展而不是减缩合作社。西沟和南寨的社员没有解散而把他们的合作社从较低的水平变成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集体。

在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规模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关系到整个革命进程的最根本斗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国革命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见就不统一。刘少奇认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在解放区发展起来的，1949年以来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长期的阶段，甚至要10年，也许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集中力量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他预见，公有的混合经济、公私合营、集体和个人所有制还会存在许多年。由于这个原因，为了使中国摆脱封建主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政治联盟已经形成。他设计了一幅在新民主主义框架里迅速振兴经济的蓝图——国家的工业化和机械化。一旦实现了工业化，公有和私有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在城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就会成熟，这将是一个建立在新技术稳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是刘少奇著名的观点，至少对于农业来说要“先机械化再合作化”。

新民主主义将在解放后长期存在的认识，在政治上好像没有什么分歧。1949年以后的4年中，我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国，但从未听说有人质疑过。但经过这段时间后，毛泽东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打败国民党的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9年军事上的胜利彻底解决了这些矛盾，毛泽东说，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告结束，现在一个新的矛盾占了主要矛盾的位置，这个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直是第二类矛盾，这就是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出于必然，允许搞一段时间“四大自由”，允许私人企业家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但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一定要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将开始买进资本家的部分集团企业，最终将全部买进，吸收他们为国家所有的国营经济。在农村，尽管土改后个人生产占统治地位，国家允许农民发家致富，但是很快国家就必须发动群众运动以使农业经济集体化。这样，不仅有可能使现在仍在受穷的70%或者更多的农村富起来，而且还会保证生产发展保证粮食市场有更多更充足的粮食，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小生产者，如店员、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他们也要搞合营，这样才能完成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发展一段时期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将有能力为农业更新提供技术和机械，这样就可能开始农村的第三次革命——机械化。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观点，“先合作化再机械化”。

这两种观点强烈分歧，它们反映为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落实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这里所讨论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意见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几十年后，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前者。

直到最近，党的文件在提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历史时，还说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将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斗争。文件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说这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一场决战，还说这两股阶级势力已经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件还说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号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演讲，而毛泽东要求迅速变革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号召，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篇章。

毛泽东死后，毛的夫人和她的合作者（即所谓的“四人帮”）被捕以后，在对以上问题的重新评价中，党的文件开始对毛、刘两人分歧的阶级性提出疑问。当然，所有的人都承认，1949年中国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个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一旦分了土地，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允许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在乡村一级得到很快的发展，最终占统治地位。如果中央派出精明强干的人员，逐渐地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介绍给人民，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也可能在中国开花结果。

在这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号召搞资本主义，有的人现在仍坚持认为刘少奇提出的，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得以延长、混合经济得以发展，也许会比毛泽东提出迅速完成的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有利于振兴生产力，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从长远的观点看，农民必须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但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许并不像毛泽东和那些紧跟他的人认为的那样，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必须马上就社会主义合作化，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现在的批评家说，毛的政策强调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对农村来讲毫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在农村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而忽视了有关封建主义的问题。封建制度统治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该怎样从行政管理、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根除封建制度？土改运动在乡村一级摧毁了封建的经济关系，但仍有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怎样保障农村各级组织的自治，如何运用市场的力量去刺激生产，如何保证民主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国内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在自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敌人变成了资本主义，但经过近30年“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仍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异常膨胀的搞瞎指挥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家长作风还有等级、特权等。“文革”中在造反派的影响下，这些因循守旧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官僚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民主”，即中国人民的“公民自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

只是一种萌芽，非常脆弱的嫩芽，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公民自由”开花结果，使人民的创造性能量得以释放。

所以，应该研究一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需要延长的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问题上，也许并不是更有效的办法。在中国的变革过程实际发生的、迅速把目标转向社会主义，把中央的计划和权力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的作法是积极的，即使因此产生过一些副作用。

对于这些问题，今天中国新的领导人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四大自由，放宽富农经济，家庭承包和物质刺激在过渡阶段有积极作用。由于大量的棘手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农业粮食生产人均产量仍维持在30年前的水平，这些领导人已经在很多方面将国家政策带回到过去的起点，并正忙于对合作化进行“坚决的收缩”。

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你就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对的。土改运动给了互助和合作化巨大的推动力，使过去的贫农和雇农得以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新的集体生产关系。毛泽东抓住历史机遇完成了这场运动，如果他不这样做，农村就注定要出现又一次猖獗起来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现在的领导人曾预言，单干一段时间以后，富裕起来的农民还会重新选择合作化，但已经下马的合作化很难恢复起来。打碎的瓷器无法复原，集体农业也是同样。

五十年代中期对合作化前途及价值的怀疑并没有使人们的热情衰退。毛泽东1955年7月的讲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表以后合作社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毛的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刘少奇“收缩”、“清理”了20万个合作社，但1955年又有55万个新的合作社相继成立，到年中就达到了65万个，到1956年发展到130万个，虽然1958年报道只有74万个，但合作社的规模从平均几十户发展到平均160户，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的汉族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合作化运动起步较晚），选择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到1958年这些合作社中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半社会主义的、土地合股协作的合作社了，而成了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合作社，所有土地、牲畜和大农具归集体所有，所有收入按劳分配。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一场规模

最大的革命。在1953年到1958年短短的5年中，几亿农民放弃了他们古老的个体生产方式，参加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总的来说，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没有任何财产遭到重大破坏，而且从未停止过生产。

农村的集体化与小企业、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等行业的大规模的迅速集体化是同步的。到1958年，除了少数偏僻地区以外，在中国已很少有私营经济和个人生产，正是这种特殊的、迅速的、成功的但仍然不太巩固的社会主义变革，为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大跃进”作了准备。

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了解了以上的情况，正当我们计划了解张庄解放后第二个10年的发展情况时，长治市要召开一个全市干部会议，我们中断采访，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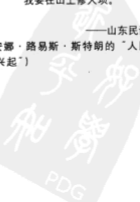
第三部

大跃进——大摔跤

头枕铁镐，脚蹬乱石，
土地当床，天当被子。
北风刮来唤醒了，我，
翻过身来我对它说：
“刮吧，朝着月亮尽情刮，
但是不要朝我刮，
我要在山上修大坝。”

——山东民谣

（选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民公社的兴起”）



二十四 泛滥的洪水和封建主义

我与张庄的农民干部座谈，试图用几天时间了解张庄几十年的历史情况，此时天一直下着雨，雨水灌满了低洼地，漳泽水库大坝的危机加重了。如果你到村东的公路上，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你都会看到小股的军人，两人一列向北急行而去，增援已经派到大坝上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在大坝工地上，试图修补大坝蓄水堤的裂缝，他们正在加固尚未完工的溢洪道上的小围堰。

我问李司令，我们是否能去看一下出毛病的现场，他很快就批准了，并在一个天空布满阴云的下午亲自派了一辆北京吉普来陪同我们。大坝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很高很长，有一里多长，并且很直。它把整个山谷分成了两个世界，南边是水的世界，阴沉灰暗，满是淤泥，到处可见破碎的船只和被水冲上来的杂物，北边的世界有低地田、果园、鱼塘和采沙场，山谷笼罩在云雾中，被雨水冲刷着。透过云雾我们朦朦胧胧地看到水库里的水离大坝顶部只有1-2尺，距离为保护溢洪边岸，在水库东北角上用土和沙袋设置的障碍物顶部只有几寸了。在那儿，一些解放军战士、民兵和老百姓正臂挽着臂排在一起，另一些则正扛着新装的沙袋向前跑去，去加固处在危机中的围堰，他们跑得虽然很快，但从整体来看却比一般的大工程混乱。

几周以前，我就在海沙下游的地方看过人们挖土，他们把土从河沟搬到河岸，站在公路大桥上我可以把30万人一揽眼底，我看到了不同走向的稳健而平缓移动着的手推车和人们肩挑着的扁担，来来往往，前前后后，编织成了一台广大无边的有秩序的舞蹈表演，这种舞蹈也只有亚洲的大平原上才能构思出来。现在，我却看到了紊乱的没有计划的行为，人们以为水涨一尺围堰不加高一尺，就会带来空前的灾难。

“能保住吗？”我问李司令。

“看来今晚情况好一些，”他说，“我已接到通知老天不再下了，要是今晚不下或下小点，我们的大坝就保住了。”

在回张庄的路上，我们径直穿过了一路上被洪水淹没的村庄，泥

水中的土路变得难以行走，泥泞不堪，马厂变成了一个周围满是雨水的小岛。我们从北边过来接近马厂时，看到一群人已开始加深排水沟，这样，能把这里的水引到大坝下面的河里去。

这一切有多奇怪，上党这个华北的高原，干旱的故乡，现在却遇到了洪灾。这样一个地方遭了洪灾从习惯上讲似乎是矛盾的，可我们周围全是水，无边无际的水，无法预料的充满危机的水。十年以后谁来承担没有完成溢洪边的责任？那天晚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完工的溢洪边岸是一个充满罪恶的疏忽，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

李英奎说：“我们的错误就是忘了给水留一条出路，我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常说，要给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阶级敌人一条出路，即使是地主也应该让他们有地种，有机会劳动，不要逼任何人走投无路，可我们却忘了给水一条出路。”

这种思想勾起了司令员一段内战末期的异乎寻常的回忆，他大声笑了起来。当我们问他为什么笑时，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关于“出路”的故事。

有一个年轻的营长叫谢铁蛋，只有23岁，他在一次精心指挥的夜袭中包围了敌人，并与之展开了英勇的战斗，打败了国军一个营，俘虏了敌人并缴获了全部的枪支弹药、炊具等用具，在被俘虏的人员中有一个国军指挥官，也很年轻、很傲慢。

这个指挥官抗议说铁蛋用的战术不公平，趁天黑搞偷袭算什么本事？公平的战斗应该是白天拉开阵势，明火执仗，如果这样交战也能赢，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这番话激怒了铁蛋：“你的意思是说白天头并头打仗我赢不了你？我肯定能赢。”

为了证明他的本事，他把那位被俘虏的军官，连同他的军队和武器放了回去，然后双方在光天化日下又一次交战，最后铁蛋又赢了，他又一次打败了敌人，活捉了那位军官。但是，在战斗中他手下的士兵却多人受伤，还有几位牺牲了。为了一个指挥官的傲慢，战士们负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个故事像一道闪电，照亮了现实。在一场残酷的阶级战役中，两位贵族骑士参加了决斗。

骑士精神万岁！

最后我们上了公路，在两排密集的加拿大杨树之间驱车南行。我们看到路两边的排水沟都受到了洪水的威胁，这时天黑了下來。司机打开了车灯，趁着车灯的光亮我们看到了闪光的兩点。上帝教教我们吧！上帝教教华北吧！我发出了内心的祈祷，可雨又开始密密实实地下了起來。

当返回张庄时，我们发现宣传队的干部们正坐在屋里闲聊。这天晚上的话题大部分是有关应该早已根除了的封建主义的。

“人们常说，要是你崇拜孔圣人，你就能学会读书，”王腊肉说，“可我崇拜了孔老夫子好长时间，一个词也没学会，根本不管用。”

“那你是小学毕业？”王京和问。

“谁？我？不，我小学都没毕业。”王腊肉说。

“我在学校那会儿，”王京和若有所思地说：“我老师教我打算盘，要我背那么多口诀，什么‘二一添作五’这一类的东西。我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老师回答说：‘笨蛋，难道还二一能添作四吗？’他从来不讲道理，光是骂，让我死记。”

“那么多班没一个孩子愿意学习，纪律太严了，我们都烦死了。为什么？就是上厕所也得得到‘牌子’（一块木头牌子，有了这块牌子就可以出教室，就像一张通行证）。当然，拿到‘牌子’的孩子常常把它‘掉’到茅坑里，然后，另外那个孩子就得去帮他把它捞上来，这常常得用好长时间。这是逃避上课的最好的理由。”

“那些先生根本没有奉献精神，他们尽可能少做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老师让我们在午饭前背一篇范文，然后就到教室后面去抽大烟了。太阳照到头顶时，他走到前面让大家背诵，那些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的学生要受罚，老师拿一头宽一头窄的戒尺打他们的手。”

“这是教育上的教条主义，最容易助长先验论。”

“先验论”对他们来说很熟悉，因为他们正在学习哲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

“说到先验论，”高队长说，“过去我们总认为天才是有的，是上帝给的。有的人好像确实有天才。就拿现在正在张庄修纪念碑的老木匠来说吧，他是个文盲，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但他却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决定修这个纪念碑后，只去长治看了一眼旧建筑的纪念碑，回来后就修成了这个像一座小庙式的纪念碑。如果说有什么不足

的地方，那就是顶角不算太翘，还有，碑应该立在一个平台上，应该再立高一点，好让人不用附在上面就能看清上面的名字。不过，这不算什么大毛病。总的来说，他干得很漂亮。”

“是大队干部们把事情搞乱了。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都刻在了石碑上，就像古时的绅士，为了纪念12位烈士，他们加上了二十多个干部的名字，谁也不想被落下，所以问题出来了——该记念谁呀？”

“过去像这样的庙是供奉‘老爷’的”，王腊肉说：“从我小的时候就记得，每件东西都有‘老爷’，城里有‘城隍爷’，村里有‘土地爷’，道路穿过村中央的地方有‘五道庙’，每个院都有‘门神’，院里有‘天地爷’，屋里有‘灶王爷’负责炉、火、锅与炊事有关的事情。”

“每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所有的神都要到天上去向玉皇大帝汇报每个家庭一年中的所作所为，为了保证让他上天不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就做祭灶糖。如果他们吃掉了这种东西，嘴巴就会被糊起来，这样，他们就不能说我们的坏话了。”

“小孩总想知道天离我们有多远，大人们说‘算一算，神仙初九上天，十五回来’。所以我们便开始数，上天一趟来回只需要7天，就是说单程只需3天半，当然，再除去汇报的时间，就只需3天时间。”

我不禁想象起了这个“天”很像过去的皇都，也像现在的北京的古皇都，还有北京多像这个“天”。地方上的干部每年向最高层汇报工作时从较远的地方坐火车到北京也得2~3天，这儿有人们常说的“天”。所以才有了“天高皇帝远”的说法。

这些故事使王京和想起了他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我参加解放军时才13岁。当时党支部吸收党员是秘密的。有一天，我在司令员门口站岗，透过门缝我看见有几个人站在一盏油灯前，墙上有一面旗，旗上有一个弯弯的图案(因为中国的镰刀是直的，没有弯，所以旗上的镰刀图案对这个农民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旗的旁边是一张毛泽东画像。”

“我跑去问炊事员，‘那些人站在弯弯旗前面举着拳头干什么？’他们是在给什么老爷烧香吗？”

“炊事员问我，‘你在哪儿看见的？’”

“我说，‘从门缝看见的’。”

“后来司令员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共产党员。”

“我说‘没有’。”

“‘共产党很可怕’，他警告我说，‘他们是青面獠牙’。他想让我忘掉看到的一切，‘记住，以后不要再从门缝往里看了。’”

“所以，我再也不敢偷看过。”

“当然后来我了解了共产党，可是有好长时间，它是非常神秘的。”

张庄的共产党走出地下是在1948年。这年6个月前，刘伯承的部队胜利地穿过河南向新的根据地大别山挺进，迫使国民党走上了防御阶段。不再害怕国民党军事反攻太行，党才从地下转为公开，以便接受人民的监督。对干部们的公开批评削弱了封建思想的基础，但党的领导们发现很难动员人们讲实话。因为，只要当官的一掌权就要对批评过他的人进行报复，谁能保证将来的事情？1971年进驻村庄的宣传队又一次着手解除这些顾虑。再没有人相信共产党是青面了，至于有没有獠牙，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十五 全市干部会

从大坝参加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得知长治市委通知宣传队，包括领导和队员到市里去开会，回忆总结过去的工作。当时宣传队正为党的群众整风运动作准备，这次会议就是要检查近来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对下几周的工作进行安排。

这是一次与1948年我参加过的潞城县土改工作会议类似的集会，在这样一次由来自全县和市级行政部门的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能了解到全市各方面的情况，能听到许多公社的经验总结，能搞清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很想去参加。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不仅要参加听报告，更主要的是要住在会上，吃在会上，要参加会上的娱乐活动和自由讨论。所以我会问，我是否可以像1948年一样作为正式代表从头至尾参加这次会议。开始没有得到同意，范文告诉我说，我们要住在地区宾馆，不过可以参加会议。由于开会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得上下午来回跑，我们虽不愿意这样，但又觉得能参加总比不参加好，所以准备接受这个条件。然而，到最后，地委领导突然改变了主意，当我们正要离开张庄驱车去长治

时，范文说我们可以住在会场从头至尾参加会议，和宣传队的队员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活动在一起。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这个消息使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参加的会议，其次是后来我们在张庄度过的那个秋天，原来作为客人从外往里看，现在成了运动的参加者，可以亲身体验了。当我们有了可以参加会议的一切活动的资格并享受正式代表的待遇后，宣传队在回到张庄的所有活动中都主动地把我们包括进来了，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参加大队的群众大会、小队会、干部会和党员会，而且可以参加宣传队自己的所有会议，不论是学习会还是讨论会，是正式会还是非正式会我们都能参加。

我不知道在会上想了解点什么。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是1948年在一半已被破坏的潞城县召开的那次干部会议。把几个被遗弃的破庙的地板上铺上些干草，干部们就睡在这草铺上，每天吃两顿用露天的大铁锅做的小米饭。会议就在一个大空庙里召开，同时，小会在庙外长满野草的角落里召开，这样他们反而感到很随便。我设想这次恐怕又要睡在地板上，这八月的大热天，他们恐怕也会在露天支一口大锅吧。然而，我的想法完全错了，我们住在一幢高层建筑里，有客房、食堂，所有开会的干部也住不满这幢楼，这个地方叫长治市委招待所。

这是一幢新建筑，用灰砖筑成，非常漂亮，在其入口处上方，一排小阳台从墙壁伸出3—4尺，环绕楼房的四角。阳台的围栏是混凝土结构，再现了一种复杂的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与农民们在他们的黄土窑上安装的格子窗的构造十分相似。大楼里的布置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是中国政府机构典型的布置模式，赤裸裸的水泥地板，空荡荡的白墙，无装饰的窗户上没有窗帘、没有帷幕，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一幢没有吵闹声的建筑，严肃的设计，庄重的布置，到处光秃秃的，即使在夏天也感到阴冷、潮湿，然而它却又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因为它是那样的宏伟。

在楼房的第一层有厨房和一个大餐厅，饭吃完以后，餐厅也可当会场。上面两层是睡觉的宿舍，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放8—10张床，小的只能放1—2张，床都准备好了，不是光木板，上面有弹簧床垫，还有枕头，干部们得自己带被子。不过招待所为我和卡玛准备好了公家的被子，被子罩着干净的棉布被罩。宿舍里每张床旁边都有一张小

桌子，屋子中间还有一张大桌子，桌子四周摆着椅子供大家用。在一间改造过的屋子里有一张乒乓球台和两个大的洗漱间，男女各一间，每一层都有洗漱间，每个洗漱间沿墙有一个水泥地，可以在这儿洗手刷牙。厕所修在地板下，厕所的废物流进了下水道。我们之所以留心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太平常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过去艰苦的住宿条件，也大大超过了人们在家里所能享受到的任何住宿条件。

我被安排在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跟张庄宣传队的其他7名干部住在一起。从我们的北窗户望出去是交通大楼，这座大楼1968年在武斗围攻长治时曾被一帮“联字号”的人控制过。站在最高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物上留下的大炮的弹痕，沿街向上是第四运输公司的大院，1968年1月20号在一条无名小巷的伏击中，“红字号”抓住了26名地区革委会的人，就把他们关在这里。看到这些，我非常希望了解“文革”中的一些事情，但既然党的整风是当务之急，那我们首先应该搞整风。

作为会场的市委招待所不像1948年潞城县那次会议的会场那样浪漫和异乎寻常，与会者也不像那次由农民和学生组成的与会者那样丰富多样和类别齐全。这里聚集了约250名深入到各工厂、各煤矿、各工会、各区、各城郊大队和市府管辖的各个农村地区的宣传队员，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农民打扮，相反地都穿着整齐，上身有干部服、夹克衫，裤子有现时流行的蓝色、草绿色和淡蓝色，不过以蓝色居多。由于天气炎热，有的人脱掉了外衣，所以到处可看到穿白衬衣的人，没有一个人按山西农民的装束在头上围条白毛巾，只有几个人戴着帽子。吃饭、娱乐、开会时人们都摘掉了帽子，可以看出人们的头发都修剪得很整齐，为了凉快有的人还剃成了光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妇女，妇女人数不到总数的5%

拿这次与会的男女与1948年那次会议的男女与会者相比，还可以发现较明显的差别。总的来说，这次与会者的年龄比那次土改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普遍大，足足能大20岁，土改那场伟大的革命距今天已有23年。他们不仅年龄大而且文化高，几乎每位代表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胸前的口袋里都装着1~2支笔，听报告、开会、讨论时他们总要做笔记，发言时也常常照着笔记本念。

然而你不能从这些表面现象上断定他们都是来自市委市政府各个部门的专门的政治、行政干部，他们中有许多这样的干部，也有许多来自钢铁厂、运输公司和食品厂的工人，还有几位来自高等院校、师范院校的教师。从外表上看，由于或多或少的标准化装束，他们好像出自一个模式，然而，实际上，正是这种似像非像的现象，反映着晋东南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体现着像这一地区各种不同的人一样的各种不同的经历。

张庄宣传队就是这样一个由年龄、背景、兴趣都不同的人组成的典型的例子。他们中有一个回民，一个复员残废军人，一个卖驴肉的，一个办公室干部，一个剧院主任，一个检察长，两个钢铁工人，一个会计，两个高中教师，还有一个旧中农。

到这儿的那天早晨，发给我们几张印好的毛主席语录作为学习的内容，所有的语录都是有关党的整风运动的，大部分选自“红宝书”和《毛泽东选集》，但有一些新的，没有出版的能引起极大兴趣的段落是一段关于可教育好的人转变的论述，这个材料是在1964年“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提出的关于革命接班人的第三个条件。但在我们的传单中是首次印刷的毛的原文的全文。

一个人应该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你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山头”，不要记恨在心。我们不能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策。我们的经验告诫我们，没有正确地团结政策，我们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搞阴谋诡计的人。如：在中央机关就有像高、饶、彭、黄的人物，所有的现象都符合一分为二的原则。但有些人就是要搞阴谋诡计，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办呢？现在仍有一些人继续搞阴谋。阴谋诡计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决不以我们喜欢不喜欢来决定。一切事物都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我们有五根手指，但有一根跟其他四根作对，正是因为它的作对，我们才能握住东西。没有绝对纯洁的事物，但许多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是不纯构成了自然和社会，如果只有纯粹的纯洁，自然和社会都不可能创造，那样将违背辩证法。不纯是绝对的，纯洁是相对的——这反映了对立统一。以扫地为例，你可以不分昼夜扫24小时，但地上还会有灰尘。以我们党的历史为例，有哪个时候，哪一年绝对纯洁过？没有。但

我们没有垮台，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都没有搞垮我们。解放后，又出现了高、饶、彭、黄，他们能搞垮我们吗？不能，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我们的历史经验。

人会变，但也有少数人不会变，他们吃饱了肚子还要骂人。这种人每个省都有，不过只占少数。让他们那样吧，让他们尽情地骂吧，同时，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我们应该劝他们改好，也就是说，帮助他们自我改正，只要他们是真心诚意地改，我们就不应该无休止地批评他们。要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团结那些来自别的山头的人，甚至反对过我们并且已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

这里确实有些东西值得深思。显然，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8个小时的学习几乎没有时间交换对毛主席语录的看法，楼道里就传来了集中听报告的喊声。我们都集中到餐厅，餐厅里的桌子已摆成了一长溜，一直排到右上角讲话人的桌子处。在那儿，我们被介绍给了崔胜和同志，他是一个解放军驻军司令员，长治市革委会副主任，长治市委副书记。

崔胜和同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很直率，很随和，经常在大会上讲话。他发言时不仅常引用中国革命的一些词汇，而且常引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词汇，有人说他是滥用词汇。政治术语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舌头上蹦出来，而且速度极快，使卡玛觉得不容易翻译，同时也使她感到厌烦没兴趣。

“这次党的整风会议在毛主席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开幕了！”，“在党的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市内外形势正按着地区的计划顺利发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政治挂帅，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把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在地委、市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政治放在了首位，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工作。我们还要通过批斗进行文化大革命。”

“紧跟毛主席战略布署，在划清阶级阵线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两冬一春）的整风，已经基本完成了初步的整风任务。我们的成绩是大的，形势是喜人的……”

透过夸夸其谈的云雾露出了一些事实。

已经有21个单位党委、11个公社党委、47个党总支、711个基层党支部确定了新的领导人，开除了110名党员(占总数的0.9%)，吸收了805名新党员(占总数的6.7%)。有了这样一支纯洁的、受过教育的党员队伍，有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全区今年比1970年的工业计划超出11.1%，尽管有许多自然灾害——风灾、旱灾、涝灾和病虫害，农业计划还比1970年超出1.5%~2%，各公社的平均产量达到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每亩400斤。

随后，崔胜和同志对今后的工作作了五条指示：

1. 把意识形态的革命放在首位。
2. 坚持群众路线。
3. 选好领导班子。
4. 吐故纳新。
5. 搞好宣传队的自身革命。

关于第一条，他强调要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并强调了毛泽东的“要纠正组织上的弱点必须首先通过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来纠正意识形态的弱点”的观点，在这儿他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姿态，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了从组织上整顿，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为了搞好意识形态的教育，崔同志列出了五条办法，即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忆苦思甜，揭露问题，批判错误倾向，批判坏人。

在这段讲话中，他回忆了党员的学习情况。七个月的时间，所有的党员一直在学习讨论这几个题目，即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理论，林彪的“九大”报告，新党章，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史(元旦社论)。作为反面教材党员还学习了刘少奇的6篇黑理论，刘

少奇和王明先验论哲学，反动的唯生产力理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还有腐败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它否认阶级斗争）。他们还讨论了在农村政策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为了个人的权力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在“文革”中变得更加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现象。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先进榜样，他们还学习了大寨的历史。

“所有这些”，崔胜和说：“都提高了广大党员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崔胜和从抽象到具体地讲述了这次南垂公社百河大队党支部进行教育的情况。运动前，这里的23名党员中有9名想退党，35名干部中有32名想辞职当老百姓。当地的宣传队对大队的7任支书作了详细的评价，这些人带领自己的大队走过了23年的风风雨雨。最该受到批评的是第五任支书，他忽视粮食这个纲，强调物质刺激，注重副业，致使1964年的粮食亩产只有80斤左右。

1965年一位姓贾的当选新支书，他调转方向，一心一意学大寨，一心一意抓农业，使这一年的粮食亩产达到了300斤。但是，成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放松了，骄傲了，因而忽视了阶级斗争，不批评落后，也不表扬先进，结果到1969年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党动员群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贾书记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思想”在作怪。这种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概念，随着土改运动的完成这场革命已基本结束，在以后的阶段中，即使你没有掌握和理解社会主义革命是怎么回事儿，只要你忠诚、老实、勤劳就足够了。贾书记想，虽然我们的粮食产量比先进大队低，但却比落后大队高，所以他也满足了。他为自己开脱道：“虽然我没有为革命做出什么大贡献，但每年总做了点小贡献吧。”因此，他的大队总是停滞不前，而处于同样自然环境中相邻的大队粮食亩产几乎等于他们的两倍。

批判了错误路线和思想以后，贾书记在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在整风运动中，那9名想退党的党员，32名想辞职的干部都改变了主意，决心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自己的一生。

崔胜和强调说：“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路线斗争的觉悟。”

讲到群众路线，崔胜和指出需要搞“开门整风”，把群众请进来，对党员和干部提出批评，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说：“这不仅是一

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是否真正掌握路线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登门征求了大队60户社员对他工作的意见之后作了彻底的自我批评，这样，尽管他以前犯过严重的错误，但社员们又选他当了支书。

关于第三条选好领导人的问题，崔指出这是评定宣传队工作的主要依据——他们是否帮助所在单位选定了有较强工作能力的、有较高路线觉悟的领导干部。他说，有极少数干部确实很坏，古城公社古城大队的李业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投机商，一个赌徒，一个相信迷信，搞派性的坏分子，所以被免了职。有问题的人当中较典型的是兴村公社史家镇大队的赵干则。

“他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老好人’，他的问题主要是工作不力。他睁着两眼却看不见方向，长着鼻子却分不出香臭，有权不用，遇到问题‘和稀泥’，能躲就躲，他对人民不爱，对敌人不恨，不打击坏事也不表扬好事。”

就是这样一个人，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又当选了党支书。

崔继续讲，除了选拔原则性强的干部以外，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也是非常必要的。

到6月1日止，在建立起来的700个党支部中，老年干部约占10%，中年干部约占70%，青年干部约占20%，这个比例是较合适的。

崔胜和对以下几个新建的出色的党组织提出了表扬：长治运输公司党委，电池厂党支部，新垂、南舍、大辛庄三个农村大队党支部，长治百货大楼党支部。

关于第四条“吐故纳新”崔胜和论述了开除和吸收党员的问题。他说，我们当然要把阶级敌人、叛徒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开除出党，我们还要劝那些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场，不能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人退党。在110名被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后面这种情况。他们确实不想继续当党员了，讲明情况后退出了党组织。崔胜和指出对这种人要谨慎对待，不要给他们带来痛苦，不要给他们将来的工作和进步罩上阴影。党在开除和惩罚党员时，要尽一切努力让被开除或受到惩罚的人明白原因，避免对其未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崔胜和说：“消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总结这一点时，崔胜和强调说：“要注意政策，做好意识形态的工作，划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以免政策太宽或太严。我们不应该近友而避嫌，不应该喜新而厌旧，也不应该有即不吐故又不纳新的政策。”

崔胜和的第五点讲宣传队的自身革命了。“没有这一点要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他高度赞扬了马厂公社黄碾大队的宣传队，说他们把自身革命放在了首位，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们说：“工作就是斗争。”这个宣传队的政治主任赵小管和副主任张长富负责每天的学习，他们不仅在会上讲而且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寒冷的冬天，他们带头跳进水里修筑能灌溉400亩农田的水坝，向支平带病冒着风雪整天整日地干，大地上冻之前，宣传队的全体队员一直和农民们一起劳动，4000亩地都深翻了一尺多深。正是在这黄土地上，在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中，他们摒弃了不好的工作作风和坏思想。领导作用的改进推动了全队和全村工作的进步，群众说：“在这样的干部领导下干活，10个月就像只有一天，心情愉快了，时间也过得飞快。”

同时，崔胜和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批评的现象。他说：“一分为二地说，这个宣传队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有的人想离开宣传队，因为有些宣传队还得再呆一年，所以他们要求回去，他们害怕以后回到原单位技术上落伍了，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也许他们会吃亏，会失去回家的机会，所以就出现了怕艰苦，怕到新地方，怕担任新的政治工作的现象。”

崔胜和批评了几个人，说他们骄傲自大，主观主义，不注意政策，纪律松懈，比如，回家不请假，不参加学习，不服从上级安排等。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

崔胜和继续讲，这些问题的根本是没有认识到整风工作的持久性。首先仍有一些单位没有确立好的领导，其次在大多数已经确立并已经巩固了领导的单位，也不能说任务已经完成，因为教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要继续搞下去。既然结果参差不齐，那么还得做大量的工作，所以干部们必须作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崔胜和在报告中好几次提到了张庄，在讲到强有力的领导人的重要性时，他提到了张庄前任党支部书记李正宝（李快腿），说他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好人。他上台后，强调副业和做买卖为主的生财之道，在他

的领导下张庄的粮食亩产3年内从270斤降到250斤，又降到237斤，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苦。崔胜和说：“他丧失了阶级立场，重用有政治问题的人，忽视田间劳动。但他的阶级背景是好的，在‘文革’中站对了队，并注意政策。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有错误的好人。张庄宣传队应抓紧对他的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作彻底的自我批评，然后帮助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可是至今他什么也不承认。”

支书李快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且没有任何愿意改正的表示。至于从前的民兵队长秦贵宝，由于他的问题事实不清楚，上级不能下结论，所以尚未决定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崔胜和说，张庄新的领导班子缺乏力量，虽然新支书张贵才很有能力，但二三把手却不怎么得力。

二十六 目标——李快腿

我自始至终听了崔胜和的报告，总觉得有些含含糊糊。依我的看法，他的报告有些华而不实，一般性概念较多，缺乏对长治市和所管辖的区域存在问题的具体分析，简直不能与1948年潞城县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相比。那次，所有与会者听完报告后脑子里对全县的形势、成绩、问题、矛盾及解决的结果都有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崔胜和自己对报告也觉得不太满意，因为报告的最后是这样总结的：“这只是一个大概、粗略的总结。我们还应该有较具体的事实和数据。我只是想抛砖引玉，以此来引导大家一起总结。生动的事实和具体的数据将来自广大干部中间。我们不能以罗列整风运动的原则为满足，原则必须体现在具体的事实上。”

崔胜和的报告一完，大家就把桌子重新摆了，把椅子放在了桌子四周，这样又把会堂变成了餐厅。食堂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有茄子、白菜、猪肉大烩菜，最后还有小米粥，粥盛在几口大锅里，自己可以随便到锅里去舀，干部们和宣传队员们围着桌子吃得很香甜。吃饱以后，大家就开始闲聊，不一会儿，整个餐厅就充满了说话声和笑声。

饭后，大家都回到了楼上宿舍，往干净整洁的床上一躺，胳膊腿一伸，开始睡午觉，一直睡到下午3点。这种午睡是中国农民、学生和政府干部普遍的习惯，只有工厂不同，上班的工人午饭后要接着上班，所以不能睡午觉。当然，在最忙的收割季节农民们也经常是一干一整天，没有时间睡午觉，干部们如遇上急事当然也就不睡午觉了。但在一般情况下，像墨西哥和西班牙人的传统一样，午觉已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固定部分。

下午三点钟，张庄宣传队在一个宿舍集中起来学习、讨论。床上的被子卷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床上找一个位置坐下或靠着，为一整下午的学习和讨论做好准备。

开始，总是先由一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一谈听了报告以后的感想。张庄人是否在运动中提高了认识？他们是否能积极参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大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所负责的队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对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怎么看？你对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怎么看？

有些人毫无目的地瞎扯，听的人有的闭着眼，好像在打瞌睡了，有的则在没完没了地做笔记，当然，整整一下午，卡玛一直在不知疲倦地为我翻译，在她的帮助下，我也在没完没了地做笔记。

大家都认为张庄是一个“老、大、难”大队，这里的政治工作很复杂。由于村里的居民来自整个华北地区——13个省23个县，所以，每个人的阶级成分并非都是一清二楚的，在这个大队，不寻常的婚姻关系也搞混了阶级阵线。在大多数普通的村子里，只有一到两种姓氏，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都有某种血缘关系，所以必须和外村人结婚，本村的姑娘要嫁到外村去，嫁到本村的大部分都是外村姑娘。然而在张庄，因为人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本村就可以找到没有任何近亲关系的合适对象，邻居、对门都可以，这样一个连接地主和农民、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过去的革命战士、流氓分子和受人尊敬的长辈的亲戚关系网就越织越大，正像申安怀所说，谁也不能说自己的出身是干净的。如果你想在当地干部的政治表现上找弱点，往往总会挖出来有问题的三姑、二姨、四叔、五舅、大嫂子、小姑子、小叔子、大舅爷，这样你该靠谁？党的整风运动、生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又该依靠哪些基本群众呢？

申安怀说：“我们第一次到张庄就是走了一条曲折的路，我们不敢依靠任何人，每次我们选一些人与我们一起工作，另一些人就会翻出一大堆这些人的不光彩的历史，什么这个人从前是天主教徒了，那个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了，这个人好乱搞男女关系了等等。我们吃惊了、后退了，不知道该到哪去找积极分子。我们动员群众给领导班子提意见，几百条意见都来了，可我们不知道哪些人能相信，怎样才能鉴别，我们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去区别他们。”

“靳富全看上去老实忠厚，可人们说他是个‘运动分子’，每次新的运动来临，他开始都很积极，然后就沉默寡言，什么也不干了，一直到下一次新的运动来了，他又积极起来，我们怎么能依靠他？但又依靠谁呢？”

“可事实是这样的，靳富全去年冬天退出是因为他老婆生病，所有的家务活都落在他身上，他3月份从宣传队离开，他老婆病好了，所以他马上又站出来坚持原则，反对坏人坏事。因此，你对人们的话也不能全信。”

“在张庄总有整风和逆流，谁积极就攻击谁已成了习惯，这也影响到宣传队，他们对积极分子的诚实表示担心。”

王京和表示同意申的看法，他说：“在张庄每个人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他是他的侄子，她是他的儿媳。再说谁也免不了有不光彩的方面，我们想依靠兴安，可人们说他曾当过土匪，我们便犹豫了。实际上在农村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毛病的人根本没有，即使最好的积极分子也不是一贯就好的，他也许这方面积极，而那方面就不积极，所以究竟怎么样很难判断。”

“还有”，王京和继续说：“宣传队中有些人不注意人民内部矛盾，老是在寻找阶级敌人，他们不是尽力解决内部矛盾，而是在寻找国民党的代理人去打倒。”

这就是那天早晨大家学习毛泽东关于纯洁（一个人必须接受现实存在的世界和现实存在的人，不能把空想的革命的纯洁作为团结和行动的条件）阶级队伍指示的原因，它揭露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宣传队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另一个问题是张庄存在着的一帮像郑国番、申胡子、李玉根及儿子李寿平和陈亮天这样的流氓、无用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申胡子一个人的恶作剧就能写一本书；郑八字和陈亮

天则有意诬陷和他们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崔进则，他俩偷了队里的玉米藏在草垛里，却硬说是崔干的，就这样把崔赶出了生产队。

村民说李玉根的老婆是他生气时打死的，他的女儿淹死在一个无人知道的水池里，村民也认为是李玉根把她推下去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家伙。吃喝嫖赌，加上小偷小摸无所不为。

村民对这种人并不感到吃惊，在农村没有理由对这种人感到吃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帮令人讨厌的家伙却是李快腿和秦贵宝的好朋友。在“两宝”掌权时，他们的关系就很好，现在仍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对第三个市委工作队（即现在的宣传队）三月份来到张庄，“两宝”就丧失了权力和威信表示深深的同情。

据说李快腿利用这些人去偷听宣传队的会议，并怂恿他们在整风积极分子天黑回家时向他们扔砖头，在所有这一切仍无法阻止宣传队调查时，李快腿又贴出了大字报，以批判坏人坏事为借口，煽动村民反对工作队和与工作队合作的积极分子，这招也失败了，于是他们又翻出了两件过去一直引不起争议的旧事，一个是“装小四事件”，另一个是“翻土改的案件”，企图以此把村民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引开。村民说，这是李的领导艺术，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掌权的5年中所推行的政治路线。

第三种办法很有效。由于“二宝”策划的对10年前自杀的装小四和24年前由于王少南的死被他们说成反对土改的事件，所以宣传队不得不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各个方面调查了解这两件事，结果，他们得出了两件事都不值得重视的结论。搬出的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使宣传队的工作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以后，调查又回到了主要问题上：“两宝”利用手中的权力干了些什么？

在这个时候，李快腿和秦贵宝放弃了令人讨厌的、翻腾老账的小聪明，迅速撤退了。半夜里，他们叫上郑八字和王文则这两个整风运动的二号靶子，一起步行到长治去了。

接到宣传队的报告，公社马上派人出动找这四个逃兵。他们首先检查了汽车站，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可能会乘车去太原。但车站没人见过从张庄来的人。第二天，他们又到市委去找，那儿也没人见过张庄的人，正当他们计划空车回去时，四位上楼来了。

范文和崔胜和接待了他们，并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只抓副业，

不抓粮食，不学大寨，致使粮食产量下降，却仗着坏人的支持，丧失了阶级立场，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抗拒整风运动。

据说这四个人不能回答所提出的责难，站着不吭声，最后崔胜和说服他们回张庄了。几天以后，市委领导决定撤“两宝”的职，重新选举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旧的领导班子就这样结束了。

在宾馆楼上的宿舍里长时间的学习讨论过程中，干部们又把注意力移到了张庄新的领导班子上。党的整风运动的中心目标是发展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必须是一个能带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满足于现状，不违章搞资本主义的核心。崔胜和很清楚地指出，这是判断一个宣传队工作做得好坏最基本的条件。讨论结果表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对选出的领导班子十分满意。

“我不太满意新的领导班子，”高队长说，“这个班子不太理想。实际上张贵才、申继才和李广庆才是我们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他们再找不到什么好干部和积极分子了，他们勤劳、朴实，而且在群众中有威信，还有谁能比得过他们？”

“贵才总是坚决维护贫农的利益，”申安怀说，“他一点也不自私，从来不谋求个人私利，可是他文化水平低，学习上总是落后，接受新事物也慢。”

“也许贵才主要的问题是目光短浅，”王京和说，“他的‘新民主主义意识’时时表现出来，他认为只要我们不偷盗、不贪污、不投机，这有什么可怕的？谁能找出我们的毛病？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觉悟低，因为现在路线问题才是主要问题。即使不偷盗，不贪污、不投机，如果你抓不住路线问题，就可能犯更严重的错误，把全村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还有，贵才总爱自作主张。他不考虑形势和政策，不跟别人商量，老是独自作决定。一个大队的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建议，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坚决贯彻执行这些决定。但他对事情总欠考虑，甚至自己正确时，也总是说不出为什么，不能以此赢得人心。他和别的干部商量不够，当问题反映到别的干部那儿时，他们总是说：‘问贵才去’，这样，我们成了‘一言堂’。”

“贵才常用一些土改时简单粗暴的现成方法解决问题，”高队长补充道：“遇到难题的人，他总是说，‘只要美美揍一顿他就老实了’。当

我们讨论到有一个人不作自我批评，不回答问题，不帮助澄清事实时，他说：‘把他给我，我一个晚上就能解决问题’，意思是说，要打他，教训他，使他老实。这是农民的现实主义，非常实际！但这并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人家都认为是极“左”倾向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结果证明，贵才的大部分决定都太极端。

张庄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包括劳动纪律、粮食分配和社员的权利。这些规章中有些还有问题，其中有一条要求，凡是不能出满工又要分口粮的社员每缺工一天交2元钱的罚金，这条规定不可能执行，也没有执行，因为它带有十足的物质刺激的味道，且结果适得其反。偷懒的问题必须通过思想工作来解决，只靠奖励或惩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另一条要求，嫁到外村的妇女要把户口迁到丈夫家所在地。意思是他们的口粮要在别村分，这样就减轻了张庄这个长期缺粮村的负担。

“但是，”王京和说：“这违反了‘婚姻法’，侵犯了妇女的权益。你不能说这是‘新民主主义’思想，这是封建主义思想，妇女不一定非得把户口迁到丈夫家去，是不是迁走她自己有权决定。”

这条规定是，用不分给仍呆在张庄的已婚妇女第二个孩子口粮，挣得工分不够不给分口粮的办法迫使已婚到外村的妇女迁走。

“但即使这样也可以说服，不必强迫，”王说：“一个女人一结婚，村上的人就想让她马上离开，因为在张庄每人只有两亩地，可你也不能因为她们有了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不分给口粮呀，这样做会逼她们饿死。”

高队长说：“这样的规定不只涉及到一个人、一家一户，而是涉及到全村甚至路线问题。不是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生存问题，而是靠往外赶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全面观察，搞清楚基本政策。但贵才和他的一班人只是孤立地看问题，他们制定的规章是违背社会主义改造精神了。”

1971年大家都说，大寨是贯彻社会主义改造精神的榜样。张庄的干部们虽然也曾两次到大寨参观取经，但并没有学到这个先进大队真正的经验。

学大寨，就是要政治挂帅——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

用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也就是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自己，改造社会。也就是要关心集体，关心国家，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关心集体就是要关心集体财产、集体积累、集体投资；关心国家就是要照章如数纳税，支援国家建设，要积极上交公粮，为城市人民提供粮食。

但在张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是“欺骗集体，欺骗国家”，“做败家子”，也就是把祖辈们的财产积累吃光花尽。李晋东副队长说。

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不关心集体农具。春天，播种完毕，人们就把队里的粪罐扔在地里了，秋天，粮食收割完毕，公社的拖拉机犁地时就从这些被扔在地里的粪罐上开过去，与田土一起被翻过去了，人们毁坏、扔掉、丢失农具，那么多的农具不见了，于是干部们开会讨论他们的情况为何与大寨不同。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真正理解大寨精神，所以才好几次参观了大寨，但这几次参观并没有把大寨精神带回来。

“学大寨”仍是唱空调，没有人真正掌握大寨的精华所在。张庄的干部们第一次带回的是大寨的工分制，大寨人对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的判断，每年一到两次才定出了给每人的工分制，为每一个劳动日制定了固定的工分。工分制规定不论你一天实际干多少活都得到你的固定的工分。在它的影响下，张庄的干部们废除了他们旧的笨拙的计算工分制，采用了大寨的办法，但却发现新的工分制实行后，人们每天干得活比从前还要少。

他们第二次到大寨，看到了坚固的石窑，于是决定要盖房子，不久房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盖了起来，但粮食产量却下降了。

他们没有学到手的是大寨的政治路线，是怎样以粮食为主，兼顾其他农作物和副业的发展，是怎样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靠集体的力量获得多、快、好、省的经济效益。

学习大寨，一个集体就必须有一个能率领领导班子搞好工作的稳固的领导核心。但在张庄，实际情况是，在干部的提升和使用中，极“左”思想显示出了最大的危害，而这也正是使张庄长期处于困扰之中的原因。大队仍旧不让中农出身的党员当生产队治安主任和队长，只有过去的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可以担任，那么，团结中农的政策又体现在哪里呢？

张庄还频繁地撤换有错误的干部，哪怕错误不太严重。共产党的政策是教育和改造人民，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可张庄的实际情况却好像是一概撤掉有错误的干部，换上别的人，可被换上来的缺乏经验的干部不久又犯了同样的或者更严重的错误。陆晋中比张兴发干得好吗？李快腿比陆晋中干得好吗？问题就是最好的答案。张庄没有发展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没有培养一个有觉悟的干部，相反，在23年时间里就换了12次领导，这对张庄有明显的影

响。“只要一犯错误就被撤下来，”申安怀说：“可是无论什么人都会犯错误的，特别是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更容易犯错误，如果你马上把他撤下来就会影响其他人，他们不再敢担任这份工作，年复一年就这样发展下去，每年都换领导。春天他们领导播种，秋天领导收割，冬天他们便引火烧身了。”在张庄的历史上一年一度的工作队和一年一度的大队干部太多了，因此，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春天是红人，秋天是忙人，冬天是罪人。”

“党的整风运动的结果是大多数小队干部和大队干部都不想干了，形左实右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依然存在。”

实际上，许多宣传队员也不想干了，当讨论到宣传队自身的革命化时，每个队员都是满腹牢骚，一腔抱怨。

治安主任申安怀在张庄时间最长，并在三个工作队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说，1971年3月又被派回张庄时，他并不高兴，“我们工作这么辛苦，这么长时间，可最终得到的评价仍是“老大难”。

另一方面，当新队员得知长治市委的一个重要领导率领的早期工作队也没能解决张庄的问题时，便说：“如果高级领导干部都不能有什么突破，我们解决问题怎么能有希望呢？张庄就像一锅夹生饭，现在让我们来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剩饭。”

对这个问题最明确的回答是：“张庄当然是一个很难搞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派工作队到这儿来干什么？总之，什么是工作？毛主席说‘工作就是斗争’。所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团结紧，走出去，摸摸底。”

另一个人却说，他们讨厌斗争，尤其是农村的斗争，因为农村的条件太艰苦了。“如果城里的条件不如农村好，那谁还愿意到城里去？”王京和问。

对公社干部和来自农村被派到农村蹲点的干部来说，在张庄工作是习以为常，但对从城里来的工人、机关职员和机关干部来说要适应就很难了。

“城里的生活轻松多了。我们每天上8个小时班，星期天还休息，正常工作时我们不必像在这儿一样伤脑筋。在这儿呆的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很疲倦，因此，我们都想回到正常的工作中去。”一个工人说。

“你们还得担心技术上会落后，到时候恐怕晋不了级。”申说。

“我们不必想这个。”

“也许你不想，但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主要问题是在农村工作太辛苦，”一个钢铁工人说：“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们在地里干一天活，回来还得开一晚上会。每个人都得忘我工作，每天晚上都得干到半夜，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大概刚四点就又得起床，我们每天只能睡3~4小时，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都丧失信心了！”

“是啊，”申说：“我们亲身体会了‘三水’。老百姓说每天有‘三水’——早晨的露水、白天的汗水、晚上的雨水。”

为了避免大家扫兴，这时申安祥突然跳了起来：

“谁打乒乓球？”

卡玛马上响应，不一会儿，他们就在娱乐室展开了激烈的单打比赛，宣传队至少有一半人站在边上围观，有几个人一直准备上台当冠军。

地区有一个新闻记者叫戴晋忠，乒乓球打得特别好，他最后迎战卡玛，卡玛被打下台后，一个钢铁工人与他对阵，就这样轮流上台，一直打到深夜。

打乒乓球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把人们的思路从张庄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引开了。

二十七 顽抗到底

8月25日，早饭和早晨学习之后，与会者又一次集中起来听一个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次是长治市委书记、司令员田元峰作报告，田的报告比崔的更抽象、更富有理论性，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他

反反复复崔已说过的话，没有举例，没有说出任何整风运动中，在长治市各机关和直属地区的情况和事情。

“我们的工作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也是目前路线斗争的一部分。为了把工作做好，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看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统一思想……我们必须团结人民，依靠群众……在研究党支部的作用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个领导核心是否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这场运动是否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认识？支部是否督促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了？广大党员是否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代表广大群众的领导干部是否无限忠于毛主席？他们是不是政治挂帅？我们是否清除了坏人、吸收了先进分子？新的领导人是否积极学大寨、学大庆、学人民解放军？”

用了很长时间解释判断一个党支部的这几条标准以后，他继续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检查整风运动的结果。他说，检查将集中在农村，宣传队要交叉检查，在今后两周内，即8月30日到9月15日我们要了解总体情况，找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加以解决，然后在所有达到了或基本达到了这七条标准的地方，掀起整风运动的新高潮。检查过程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力求得到大家的理解。

他还特别提出两条要大家加以重视。

1. 整风运动是否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认识？党支部是否能督促他们起先锋模范作用？

2. 领导核心是否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

“判断这一切，唯一的标准就是看生产是否搞得不好。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又可以变精神，因为整风运动已进行了一年，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粮食生产，如果政治挂帅，狠抓了阶级斗争，生产就会搞上去。政治搞得不好，粮食产量低是不可能的。”

既然没有对这种含糊的观点提出疑问，他便继续劝大家，大部分还是老一套。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后，他说宣传队应该继续干下去，对各个大队出现的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工作做得好和已经达到七条标准的地方，运动就应该更升高一级，仍存在的弱点应该揭出来，存在的问题应予以解决。在工作做得不好，七条标准没有达到或只达到一部分的地方，在阶级情况不清楚的地方，在仍未吐故纳新的

地方，在没有学好没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秋后，宣传队员们就得更进一步开展运动，到那时，这些地方的队员们应该集中起来做好补救工作。

“在工作搞得好的地方找毛病，在工作搞得不好的地方找优点，”田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热情。你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只挑毛病，必须强调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优点，以此来调动消极因素的积极性。”

检查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1. 动员；2. 学文件；3. 调查情况；4. 解决问题。

如果有人这些事太麻烦了，田元峰会认为这是普通队员中存在的消极的“活思想”。

“有人认为整风是重要的，但检查未必重要，”田说：“他们认为，运动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即使有问题没解决又怎么样？值得那么费劲吗？所以他们不认真搞检查，特别是哪些检查工作已做了一部分的人，他们说：‘有什么用？管什么事？’他们对检查工作缺乏热情。”

“另一种‘活思想’是‘过了考验过了关’。也就是说，为了过关他们只注重表面工作，不重视深入的实际工作，为了轻易过关，他们尽量掩盖矛盾、遮盖矛盾，这样给人一种工作做得很好的表面现象，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如果不揭露、不解决，那就完全错了。”

“第三种活思想是‘一次只能干一件事’。因为现在人们都在忙农活，秋天快到了，又快要种小麦了，因此他们认为检查工作应该先放一放，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我们的脑子里不应该轻视检查工作，应该把它放在重要位置。”

“第四种活思想是‘该走了’。有的干部对工作十分厌倦，当时派下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工作是6个月，可现在他们已经在下面干了一年多了，所以他们想走，想回原单位，他们怕艰苦，他们受到表扬就高兴，受到批评就丧气，但所有想走的思想都是错误的。这次运动是一次锻炼和考验大家的机会，大家应该下决心干到底！”

“总之，这次检查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省里派给我们的任务。全省现在都搞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搞好。”

田元峰用一些一般的劝告结束了他的报告：“要小心谨慎，不要

言过其实，特别要注意开除和吸收党员。开除一定要经过市委批准，吸收必须经上级党委批准，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常的党总支批准时，要经市委批准，但宣传队员们必须先同意。在你们自己的意见尚未得到统一时，不要把问题上交给我们。”

“最后，要总结好你们的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市委书记的报告像几天前副书记的报告一样用了整整一上午时间。午饭、午休以后，宿舍里的讨论又进行了一下午和一晚上。

张庄宣传队的队员对“检查”的效果怎样表示很怀疑。

“用两周时间了解张庄的情况时间都不够用，”回民队员纪理清说：“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怎么能指望一个新的宣传队用这么短的时间来解决我们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张庄现在的领导班子属于哪一类？强还是弱？坏还是好？谁能准确地说出来？”

“张庄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吗？我怀疑！有人能在两周内回答这些问题吗？我也怀疑！”

“如果你追根究底，”王京和说：“张庄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两宝’的问题，问题解决了吗？没有。我们真正了解了问题了吗？没有。在张庄仍存在派性吗？存在。它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斗你，你斗我，这些问题三四天能解决得了吗？我怀疑。”

“除了‘两宝’的问题，还有王文则的问题，申进才的问题，‘造反派’头头小申的问题。王文则还没‘过关’，小申被开除了党籍也许是不公正的。能说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些问题吗？不能。首先我们必须决定它们属于哪一类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然后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这些矛盾，我们不能让它们一滑再滑，我们不能让它们无期限地悬挂起来。”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紧紧抓住不放，就能找到解决小申问题的办法。”高队长说：“问题的症结在李快糖（正宝）、秦贵宝和王文则身上。他们拒绝承认错误，不作自我批评。我们宣传队能把他们怎么样？”“我们可以组织群众批判他们，”副队长李晋东说：“迟早他们会转变的，现在已没有顽抗到底这种事儿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纪理清反驳道：“如果没有这种事儿，那党

的政策中为什么还有顽抗到底要受到审判和惩罚这一条，由此可见，‘顽抗到底’的人还是有的。”

这个看法引起了一场争论，所有的人上都参加进来了。一些人站在纪理清一边，他们认为，对于某些人只用简单批评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另一些人则站在王京和一边，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如果说有顽抗到底的人，那问题不在顽抗到底的干部本身，而在宣传队，他们的观点同样具有说服力。

“当然，”李副队长说：“对于李快腿，把他开除出党并一直批判他也许是犯了一个‘左’的错误，可他总该认识自己的错误吧，他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谁也无权批评他。他太顽固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总不能替他作自我批评吧，我们已经尽力了。”

“但这个问题也有它的两个方面，”王京和说：“被撤职的干部应该作彻底的自我批评，这是对的，可我们宣传队也没把工作做好呀，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亲近他们的办法。”

“两个方面，我同意，”李说：“可这两个方面并不相等，主要的问题在李快腿身上，我们尽力去做，可他却去找茬。”

王京和说：“我怀疑我们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必须承认我们工作上也有毛病，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进展。”

“但是，问题仍出在他们自己身上，”李又坚持说：“李快腿认为，除了张庄，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算计着我们终究是要走的，村里总会有支持他的人，他会恢复党籍和职务的，一定会的。他想：到那时我就不是反革命分子了，因此，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能熬到他们走。”

但是王京和仍不肯松口，“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队员不团结，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大家团结一心，我们就能解决问题”。

“你怎么能说我们认识不统一？”申安怀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认为‘两宝’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都认为他们应该认识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我们的不团结表现在哪里？”

“对秦贵宝的阶级立场有怀疑，对他和师桂香的关系有怀疑，能说明我们已摸清问题的底了吗？在王文则的问题上，我们显然没有团

结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在全村群众的面前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宣传队的人不知该讲什么，冷了场。我们不知该讲些啥，就因为我的意见不统一。”

“我不同意。”申说：“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文则不是阶级敌人，我们的工作作风上是有些缺点，我们虽然在领导小组会上讨论了纠正问题的办法，问题是我们没有告诉大家，那么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见解。”

“这确让我认为宣传队是不团结的，”王说：“这就是他们自我批评做得不那么彻底，问题没有结论的原因。”

“不，不，不，”申激动地说：“不能这么说，问题不是我们不团结，问题在王文则自己身上。”

“当然，”李晋东插了进来，他支持申：“宣传队在工作方法上也许有毛病，但问题的关键是王文则自己。群众不贴近他是因为他根本没变。这是他的错，不是我们的错。”

争论又一次激烈起来，人们互相争执，各不相让，又有几个人发了言。像“两宝”问题的主要争论一样：谁该受到责备？是哪些顽抗到底的干部？还是工作队没做好工作？参加争论的双方是在张庄呆了好长时间的老队员和刚来不久的新队员。老队员不同意新队员提出的意见，他们责备新队员不参加重要会议，不了解问题的真相，不理解为了改造那些顽固干部他们所做的耐心的工作和解释，新队员则坚持认为什么事儿都好办，就是问题没有结论，因此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也许这样工作才会有进展。

我对这种争论似乎很熟悉，忽然我意识到了熟悉的原因。23年前，王文则、王雨来、李洪恩和王喜友从县监狱回到村上，张庄的工作队也进行过一场非常类似的争论，当时我也在场。

戚文和谢虹建议对这几个拒绝作自我批评的顽固干部采取严厉措施，但工作队队长侯宝贝都坚持说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应该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使这场争论显得既这样熟悉又这样陌生，这样奇异，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主要原因是，王文则仍是争论的主要话题，而且争论的主要问题与23年前是一样的。他过去就傲慢顽固，大家指责他在当治安

主任时傲慢和对群众采取高压手段，在群众面前拒绝低头认错。他被停职改造了好长时间，才又重新担任村治安主任工作，又负责村里的治安。现在，他又因此受到指责，但他仍像以往一样傲慢、顽固，拒绝作自我批评。

申安怀毫不客气地说：“群众批评了他几个小时以后，他干了啥？他站起来说，‘我欢迎大家批评’，然后又不吱声了。”

也许“顽抗到底”的事情没有，但非常顽固的人确是有的，王文则就是一个，从表面上看，“两宝”也是，第四个是砖窑上的王满喜。因为满喜不是党员，所以不是党的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但因为他是干部，是副业队的队长，他出了问题，特别是大伙都知道的，他最近打了砖窑上的一个工人，就因为这个工人在大雨后没把场地收拾干净。因此，满喜这次也成了运动的靶子。

“先不说他们工作干得好不好，”纪理清说：“这样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宽恕的。打人不仅不能促进工作反而会把工作搞垮，这样的人怎么能继续当干部呢？他是死不悔改的！”

但其他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说满喜能改，“改是一个从不认识错误到认识错误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需要很长时间”。问题的一部分似乎是大家对待满喜的态度问题。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大队就把他推到一边，并给予严厉的批评，但当大队需要忠诚勤劳的人干工作时，又把他叫了回来，担任领导，“对他恼火时就把他推下台，需要他时又把他拉了回来”，王京和说，“这就乱了套，对满喜改正错误没有什么好处”。

我又一次被拉回到过去。土改斗争中，积极分子王满喜带头打了地主，得到了大家的敬慕，但当他开始像打地主一样打村里的老百姓时，人们对他的敬慕便烟消云散了，他在村里也吃不开了。但当村委会和富农寡妇女之间发生了冲突时，人们马上又想到了满喜，满喜今天的表现不能不说是这种事情长期发展下来的结果。

能说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不产生任何效果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满喜的行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仍是一副热心肠，偶尔会昏了头，特别是当有些年轻人妨碍了大队的工作时，我，只代表我自己，准备给满喜做耐心的说服和教育。

但纪理清不这样想。

“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当干部？在‘文革’中他还偷过一块木板，他的内心是不健康的，他的作风是不能胜任干部的。如果说他没做过什么淫荡的事，可他偷过东西。”

像对待“两宝”和王文则的问题一样，宣传队又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次在长治宾馆宿舍里的讨论，没有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但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对抗在以后日子里才逐渐发展到了高潮。

但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的宣传队来进行两周的检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卡玛和我也同意这一点，并对计划是否在张庄继续呆下去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新的宣传队来了，所有在张庄呆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人都要走，他们走了，我们该如何了解张庄的实际情况？我们该同谁了解最近几个村上的情况？该向谁了解张庄所有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况？

马厂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长富也参加了张庄宣传队的讨论，他把队员们的疑问和我们的意见汇报给了市领导。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队员可以离开，但在那儿呆得时间最长的核心人物，加上搞农村工作最有经验的王京和还得留在张庄，几个新来的队员和他们一起留下把检查工作搞完。这个办法很好，至少我和卡玛这样认为。回到村上以后，我们和宣传队队员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早午晚会议他们都热情地请我们参加，就像23年前的张庄土改工作队一样，把我们看成了自己人。

在讨论继续进行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整个会议缺乏明确的领导。因为两次指导性的报告都没有阐明具体的问题，与会人员发现很难找到内聚力。市委书记田元峰报告的主要弱点则只有抽象的条文，副书记崔胜和的报告还列举了一些生动的事例和第一手资料，这样才使得他的那些政治口号显得不太干巴巴的。经过两天的讨论和交流，田元峰的报告比崔胜和的报告越发显得枯燥无味了。参加这次会议对解决长治地区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妨碍各大队和单位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支部和党员工作中主要的缺点是什么？各党支部发现并撤掉了哪几种腐败分子？换上了哪几种新生的健康的力量？长治市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有哪些具体表现？怎样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他的报告中都没讲到。

市委书记田元峰对当地的情况没有分析，没有概括，没有估计，而下面的队员由于找不到对付问题的办法，成堆的问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张庄的宣传队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对“两宝”的问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假如有“顽抗到底”的事情存在，对他们应如何作出判断，简单地讲，怎样接近和改造他们才合适？假如一个大队轻视粮食生产而重视副业，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地区，怎样决定副业的作用才合适？为什么在长治郊区这个问题如此严重？搞私人运输、开私人理发店、私人修理自行车、手表及其他家庭用具符合政策吗？如果不符合，应如何评价？手艺人靠修理挣钱是剥削吗？对宣传队发现的张庄所存在的极“左”政策和倾向该怎么办？这些极“左”倾向表现在：对犯小错的干部实行“旋转门”政策，不提拔中农成分的人当干部。尽管不公平，从前被没收了财产的人的权利仍受到限制，地主、富农的第二代到第四代子孙的权利受到限制，不给那些已婚但未离开张庄的妇女的子女分口粮。

鉴于李快腿和秦贵宝与被镇压了的天主教反动头目的侄女师桂香的关系，人们有了把他俩按敌我矛盾对待的想法。师桂香的伯父是1966年“天主教暴动”的主要头目之一。但实际上，如果说有一些反动的天主教活动正在进行中，也超出了张庄的范围，不过肯定能找到天主教在其他县市、晋东南地区的活动。肯定地说，市委书记能指出这些活动哪里有，哪里没有。并以此来帮助乡村一级的群众，识别他们所处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讲了一些一般的概念——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什么毛泽东思想了，什么吐故纳新了……

派性像一条令人讨厌的长线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在四年多以前军队就阻止了公开的武斗，然而最早开始于“文革”后来发展到派性的相互仇视和不满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田元峰对派性问题却只字未提，大量对抗的事实被他说是风平浪静了，好像派性已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报告田元峰在天津、在黑龙江甚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它根本不涉及当地的任何实际问题。会议开完了，在我们要离开大家回张庄前，市委的领导同志到宿舍与我们道别，他们问我对这次5天的会议有什么看法。

我很为难，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依我看，这次会议没有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上面讲的是党的整风运动的较抽象的理论，而下面存在的却是理论所未能涉及的具体问题，上面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下面是异常复杂的矛盾。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对于这些矛盾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从张庄宣传队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我提出了一个受欢迎的意见。我通过余光看到了申安怀脸上飞逝的笑容，高队长眼里一闪的热情。可领导同志们对这个意见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们避开了这个话题，热情地与我们话别。也许他们根本没计划听取意见，或者也许他们对这个意见虽然认识到了一些什么，但不知如何作答。像你与我、同志与同志之间交换意见一样，与高级领导干部讨论真正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困难的，他们好像不愿意表明自己的意见，至少是不愿在一个外国人面前表明。

二十八 新旧衙门

在回张庄的路上，仔细考虑这次会议的教训，我深深地觉得我们开会的那个地方就有问题。

我不知道新政府是否考虑过这座建筑是否与人民的民主状况相适应这个问题。

按封建建筑的模式设计政府的办公大楼，就像过去的县衙，容易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高大厚实的院墙及障碍物把政府大楼与街道隔了开来，门口由武装的战士站岗，即使普通公民中胆子最大的想进去之前也得考虑再三。整个设计表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权力集中。

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几十年的战争中，共产主义革命者工作和办公的地方所表现的正好是一种相反的风格。游击战时，政府常常活动在远离县城，远离贸易中心的地方；首长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和办公室。他们常常把一些被镇压了的当地地主的院子作为办公地点，不仅如此，有时还常常和一两户新翻身了的农民伙住一个院子。脚边是鸡、猪，附近是驴叫，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处理紧急事件，办公、工作，警卫人员和腰上挎着德制手枪的八路军小战士和群

众打成一片，帮乡亲们干零活，为房东挑水，还常常在大清早和房东大娘及房东的女儿一起打扫院子。

就这样，首长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在家里或街上与老百姓拉家常，聊生活，因此，每当群众有了不满或建议总愿意找当官的讲，因此，传统的官民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就被填平了。人民把干部看成他们中间普通的一员，看成自己的亲儿女、亲兄弟、亲姐妹。确实，人民是水，而干部则是生活在水中的鱼。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描写她访问毛泽东住的延安窑洞时，这样写道：

我乘一辆载重卡车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卡车在陡峭的山路上蜿蜒滑行，在河水的砾石上颠簸，爬上一段险峻的弯路，开过杨家岭，党中央就设在这个峡谷的沟壑中。我们向深谷的高处爬了一段坡路，在玉米秆和土豆之间陡峭的小路上爬行，爬到了边缘，许多土窑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其中四孔挨着的窑洞就是毛主席的家……

傍晚来临，夕阳照在贫瘠的山梁上。我们在窑前苹果树下的平地上坐了下来，有一头迷人黑发的毛主席夫人和我们坐了一会儿便进屋安排晚饭去了。他们的小女儿，穿一件鲜艳的布衣服，在她父亲的膝边玩耍。

刚开始谈话，我就注意到离毛主席所住窑洞约五十尺远的山坡上的草里有动静。我心里想，从那儿往我们坐的平地上扔一枚炸弹简直是太容易了，很担心是否有卫兵保卫主席的家，便问：“那是谁？”“是另一家，”毛主席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很好奇。”

以前我很少看到过一个人能这样愉快、这样友善地对待他周围的一切。像一个农民一样地生活，他甚至不要求大多数脑力劳动者所必需的幽静的工作环境，他所要求的幽静只是邻居们对他工作的尊重，上面的孩子们可以往下窥视但没有吵闹。

随着全国的解放和政府的调整，随着新的权力机构在中央的建立，许多旧的、游击战争中非正式的、容易被接受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假如新的政府和组织没有搬回到旧的、表示权力的、用高墙围着的县衙去的话，那他们就一定是修建了新的现代化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

四周同样是高大厚实的围墙，墙的顶端要么是铁丝网，要么是插在水泥里的碎玻璃。守卫在大门两边的战士神色威严、全神贯注，肩上还挎着自动步枪。这样，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要进这个森严的地方，到二三楼去找干部，他在进门之前一定得犹豫一阵子。如果不考虑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如前2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干部的安全问题，那么我想大多数市、县的干部们都可以在单层建筑中办公，把这些办公的地方修成像县里、市里街道两旁的一般商店一样的结构。办公室采用这种结构人民一定会欢迎，因为这样他们进城上街就可以办理交税、卖粮、结婚登记等他们想要办理的一切手续。

花这么多钱修建办公大楼，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资金的浪费，重要的是在人民和政府之间重新挖了一条鸿沟，这在旧中国就是一种灾祸。这种建筑使干部脱离了群众，群众疏远了干部，这样，干部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命令主义，而群众则容易感到自己地位低下，遇事必须恳求甚至哀求。

即使大队一级的办公地点也用四面高墙围在里面。在张庄，进大队革委会大院只有一个门，这个门虽然常闭着，但没人站岗。在高墙里面，有大队干部办公室，有会计办公室、医疗所、药房、理发店、电工房、配电室，还有一个仓库、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是木工房)，人们常在这儿排练节目，全村群众大会也在这儿召开。每天都有上百人次到这个大院办事，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出进进，因为大队干部作为每个生产队的社员，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和院子与社员们住的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生活作风仍是游击战争中首长们给老百姓留下极深印象的那种旧的、与老百姓紧密结合的作风。

然而到了公社一级，旧的官场的习惯就出现了。马厂公社的公社所在地就是一例。在一个四面围有高墙的大院里有多个部门的办公室、政府机构，革委会办公室像过去的县衙大堂一样在最里面。进了公社大院，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搞不清哪儿是哪儿。作为公社干部的办公所在地，总应该欢迎老百姓到这儿来，但这个建筑给人的感觉并非如此，它把干部围在里面的办公室里，如果他们想干什么，可以滥用自己的权力，没人能看得见。

在形式和实质内容之间总有一种本质的联系，而这里的形式好像越出了官员平等的实质内容，而平等正是中国新的领导人刻意追求和创造的目标。

坐在堂皇的办公室里，新的政府继续干着旧的封建统治者干的事情，通过加盖公章签发文件、法令、通讯发票和收据。这些手刻的木头或石头大印上有单位的名称，级别越高，公章越大，最大的直径有10~15厘米，命令上盖的公章常常是代表官方的红色——表示命令所有的人执行。控制着公章就意味着控制着权力，抓住了公章等于抓住了权力，一枚公章（所代表的社会影响力超过一个排的士兵的威力）。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公章可使人具有真正的权力，因为人们敬畏它。在新社会像在旧社会一样，公章是一种崇拜物，是一种受人盲目崇拜的东西，是一种被赋予了独立生命的东西。当然，迷信公章阻止了思想的解放，而只有思想的解放才能开辟民主之道路。然而在中国是否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值得怀疑。

这是在我们乘吉普车回张庄的路上我脑子里的一些想法，但我没有对其他人讲。宣传队员们一回到张庄就开始重新组织他们的队伍。剧院主任李晋东、回民纪理清、工人郑怀信、会计裴平顺、教师李圣黛和钱顺英都准备离开张庄，两名新队员温良玉和刘书旺来补缺。治安主任申安怀成了队长，而原队长高踏生降了一级成了副队长，他是被管道工黄家煥拉下来的，黄家煥也当了副队长。好像为了消除我对其领导能力的担心，黄一当了副队长就一反他那工人的谦虚常态，穿上了他的旧军装，像军队的排长一样开始发号施令。他的意见总是那样教条，可总爱扯着嗓门喊。在社员面前，他似乎总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总爱扯着嗓门发布命令。

我们花了一个下午时间对即将离开的同志的工作及表现做出评价及鉴定，并听取了他们对以后工作的建议。之后，留下的队员们商议了手头的工作——动员支委们学习、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卡玛参加了宣传队的一些会议，但在会议间歇时我们继续会见像张贵才、张兴发这样的老干部，了解张庄在过去20年中发生的一些其他事情。

土改完成后的第二个十年是以“大跃进”开始的，参加者怀着极大的热情给我们讲述了“大跃进”。

二十九 大跃进

“那真是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农民技术员赵东旺说：“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特别高兴。那时我才21岁，多么伟大难忘的日子，那么多的人来到一起，他们的纪律性是那么强，每个人都能按时出工。大家因为同一个愿望来到一起，没有村与村的界限，不分你我。以前我们从没见过炼铁，可这次是我们自己亲自炼铁。”

“在等待铁水流出的时刻，大家都异常兴奋。我的任务就是看柴油机，它正常工作时，我就可以离开到别处去看别的炉子。这样，我在几个炉子间来回转悠，把所看到的东西都装在了脑子里。有一天，我在沙滩上浇铸了几个大字“全民大炼钢铁”，然后把铁水灌满这几个字的每个笔划，铸成了六个大字，我们把它挂了起来。”

“当我们第一次步行到西营的大坝上去劳动时，许多人都不想去，我们想象着这是一个又远又累又要挨饿的地方，所以和亲人、朋友告别时，大家都哭了。”党支部书记张贵才说：“从一踏进西营村开始，那里的人就对我们很好，他们让我们住进他们最好的窑洞，每天小米饭管饱，每三天吃一顿羊肉。伙食那么好，和那儿的人相处得那么好，等该走的时候，谁也不想回家了。”

“在西四河大坝上劳动的有10万人，到处是飘扬的红旗，晚上工地上的电灯泡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把整个工地照得犹如白昼。所有的干部都下来和群众一道劳动，每个人的决心都很大，干劲都很高。”供销社主任师才元说，“10万人分三班轮流上工，到处都是人。如果你站在山头往下看，简直是一片人的海洋。”

“在铁路建设工程中每个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争当英雄，谁也不甘落后。人们士气高昂，所以很好领导。每次我叫开会，大家都来参加，那时候当干部也容易。”五队菜园领导王文则说，“我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有一个从天市来的妇女叫苗文英，她能推着装1000斤石头的平车上下坡。男人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干活，因为她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劳动上。有时，我们展开速度竞赛，一个公社对一个公社，看谁往路堤上运的土多。苗文英用扁担挑两个大筐，没有

哪个男人能比得过她，就连总在男人当中当冠军的老汉赵大元也比不过她，她与十个男人比赛，一次一个，她都赢了。最后，我自告奋勇与她比试比试，大伙都说我不行，可我坚持要试一试，结果也败在了她的手下。”

张庄的人们就这样充满激情地讲述在“大跃进”这场群众运动中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1947年土改到1966年“文革”期间他们生活的至高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地方，最出名的是河南，合并了合作社，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个新的大规模组织的基础上，展开了生产的大跃进，另一些地方，为了加入已在全国展开的生产运动，农民通过联合迅速成立了人民公社。两个运动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在两个运动过程中，他们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的重新组合，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改造自然、在农村建立工业大炼钢铁的运动。

人民公社开始发展很顺利。1957—1958年的冬天，特别是在河南，党号召展开了一场引水灌溉旱田的运动。当时，这个省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了高级合作社，他们认为农民已经找到了一种组织形式，有了这个组织的力量，就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但当运动展开以后，由100~200户组成的小规模合作社很明显地妨碍着运动的发展，社与社之间在土地的使用，路权、水权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冲突，很少有人听从统一指挥。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迈向更高一级的合作社，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这个更高一级的合作社将把一些小的合作社，甚至全县所有的合作社合并在一起，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资源都合并起来，在大规模范围内分配劳力，这样，迄今为止仍是梦想的工程马上就可以变成现实。为了满足眼下的需要，一个合作社的大联盟诞生了。在视察了河南和山东正在组建的这种大联盟以后，毛泽东把它们叫做“公社”。很快“公社”这个机构就发展开了，远远超出了搞土地基建简单联合的范围。因为一个公社包括整个乡镇，有时甚至包括整个县，所以不久就取代了政府的职能，它不仅负责农业生产，而且负责小型工业，后来又把权力范围拓宽到了领导所有的行政机构、商业、银行、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最后还接管了军事事务、军事组织、民兵和军事指挥权。

“在目前形势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

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在这儿突然引进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真使人大吃一惊。许多人认为真正妨碍国家建设，影响分配原则的是在中国仍存在着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人民公社具有在生产各个领域开展技术革命的资源，具有在农村建设工业，同时发展全民教育的能力，具有发展文化生活和医疗保健事业的能力，所以能缩小并消除这些差别，把农村发展到城市水平，把农民变成工人，至少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兼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方面的能力，这个过程每走一步，就向远大目标共产主义迈进一步。迄今为止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不可能在10—20年时间内获得成功的目标。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用自己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组织起人民公社来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卫星人民公社由破窑山附近的27个农业合作社组成，在资源和劳力合并前，他们在搞重叠的、冲突的水利工程，1958年4月他们成立了卫星公社。卫星人民公社的章程在全国各地第一次发行，就为后来的运动确定了调子，它开辟了一条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社的发展之路，把九千多个家庭带入了一个多方面合作的集团。社员们不仅把原来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合并了起来，而且把庭院中的自留地，房基、牲畜和林木等私有的生产资料也转为公社所有，他们不按季节分粮而按月工资制分红，并保证每个人的免费粮食供应；他们组建了公共食堂、幼儿园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合并了便于土地基建和工业建设的财政资金，所有物资材料、财政资源和劳动力实行统一管理，这个庞大的合作社不久又与乡合并了，这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长和副乡长在公社和乡享有同样的权力。评论家们说，这种政府与公社的合并是国家最低一级权力的消失，是朝着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消灭国家”迈开的第一步。

河南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山东时讲了“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很快就遍及全国。公社成立后就围绕钢铁这个中心问题，开始搞大小规模的改造工程，搞小型工业建设，并由此开始了“大跃进”。由于整个合作化运动和向公社化的迈进，解放

了大量新的生产力，毛泽东又重申了他1956年提出的口号，再次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当时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将能够在经济、社会方面获得迅速的发展肯定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确实，仍有大量的生产力尚未动员起来，仍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尚未发掘出来。几千万农民一直只是部分时间劳动，他们只在农忙季节辛勤劳动，农闲时由于没有别的可选择的劳动所以只是虚度光阴。合作社前，一个农民每年平均只劳动10~150天，合作社后为200多天，人民公社将保证每个农民每年要劳动到300天或更多。许多劳动日将用来搞基本建设，这样将大大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将建设起能容纳几百万农民上班的新型工业。

如果几百万农民总是那样闲着，那么巨大的矿、水、荒地、边地和森林资源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由于首先是被地主——佃户制拖了后腿，然后又被分散的个体经济拖了后腿，中国大量的劳力一直没能用于开发国家的财富。现在，终于从个体经济中解放出来了，劳动人民终于能够为国家出力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曾经很活跃的力量就能使经济得到改造和发展，“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超过英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点谦虚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大国来说，“超过英国”的要求不算过高。英国不是超级大国，它每年的钢产量是4千万吨，发电4千5百亿千瓦时，但中国当时的钢产量只有5百万吨，发电只有4百亿千瓦时，因此在15年内能否超过英国很值得怀疑。

1958年全国粮食的特大丰收使人们非常乐观。丰收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头一年采取的广泛深入的保护措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年风调雨顺，全国既没有大面积持久干旱，也没有严重的洪涝灾害，适宜的气候送给农民一个史无前例的丰收年。有了充裕的粮食，中国人民认为再没有他们不能完成的任务了，敲锣打鼓的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走出来，几百万人走出幽静的山村拥向工地，在荒野上修筑大坝，开挖水渠改造河流，哪里有矿石和煤炭，他们就在那里开挖，并在现场炼钢炼铁，吃饱了肚子，充满热情，他们在向大自然挑战。中国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

“现在，人民的热情已被唤起。”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

充满热情的国家，时时被滚烫的热潮冲击着。有一句很好的比喻：我们的国家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将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将能够做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三十 政治准备

长治市区和郊区迎接这场新运动的挑战比较早。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讨论在全市范围内已经准备开始。集中在合作化与单干问题上的斗争引起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激烈的斗争集中在党内，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整风运动，学习文件、总结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张庄宣传队的王京和回忆了在黄碾开展讨论的情况，那年他作为市里的干部被派到黄碾工作。因为黄碾是个集中点，所以张庄大队的人也在这儿参加讨论。干部们用了5天的时间鼓励村民发表意见，所以许多问题，大的小的都暴露出来了。讨论委员会从那些提意见的人当中选出了三个人，因为他们的意见及抱怨引出了新旧社会的对比。一个是过去的伪区长，他公开攻击新社会，说：“猪落在杀猪人手里就没法活了。”第二个是一个上中农的儿子，他声称自从入了合作社他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第三个以前是共产党员，讨过饭，解放后他的两个哥哥都在壮年时去世了，他对这事感到很伤心，并怨恨合作社的纪律太严。他抱着怀旧的心情向所有的人回忆他“自由自在”的乞丐生活。

委员会让这三个人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人群聚集在街上，一面听他们讲一面驳斥他们。

那个中农的儿子没有赢得一个听众的同情。那年黄碾的人均口粮是450斤，可他说不够吃，

“解放前，我可以随便买，可现在才分了这么点儿。”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不够吃？”有一个人问。

“500斤够不够？”另一个问。

“不够！”被批判的年轻人说。

“800斤呢？”

“800斤？800斤还凑合。”

这马上引起了公愤，每人分450斤粮食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已经有剩余了。确实，一个人也许需要500斤，但还有自留地的其他食品和收入。要求800斤粮食就更没有道理了。在众人的驳斥面前，这位年轻人再也坚持不了，2小时后，他“投降了”，承认他错了。

人们发现曾当过党员的那个从前的乞丐不太容易对付，大家和他辩论了五天。事实证明这种辩论很重要，因为他说出了一少部分老实人的心里话。这些人对新的合作化，对为了使村民在一起能更好地劳动而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有看法。

这个人首先讲了他的家史，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是如何一起长大的。他说，他们有时做工，有时讨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兄弟三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哥哥参加了八路军，牺牲在战场上了；另一个当了国家干部，工作很辛苦，后来得了病，死在了家里，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过去的社会好。

“当兵要了我大哥的命，过度劳累要了我二哥的命，只留下我自己。要在旧社会，我大哥不会去当兵，二哥也不会被累死。另外，我觉得当一个雇农比有了自己的地好。我为别人割麦子时，一天能吃五顿饭，可现在我只能吃三顿。五顿饭吃的是什么？早晨起来吃玉面吃塔，半上午主人把馍馍送到地里，中午吃面条，下午又是馍馍，晚上是米汤配菜。就是讨吃也不赖，饿了就去要点吃，不饿就躺在树底下睡觉，活得挺自在。我躺在那儿看蚂蚁上下树，那时候想吃的东西都能搞得到，只要你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现在，咱们有什么？他给什么就只能吃什么。”

人们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刚一说完就问他：“在旧社会，你真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会儿有鱼翅、燕窝、海参、鱿鱼，你吃过吗？”

“我没有钱，如果有钱就能吃上。”

“那你为什么没有钱？”

他不吱声了。

“说，说呀！”人们冲他喊。

“因为我没有挣上钱。”

“可你不是说一天吃五顿饭吗？”

“是呀，可那是在收割季节，割麦子的时候。”

“那，地主为什么平时不给你五顿饭吃？”

“收割的活已经干完了，为什么还要给五顿饭？”

人们很容易就驳倒了这个人所说的旧社会吃得好的论调，但对他想睡觉时就能躺在树下睡这个事实人们却不得不承认。他的主要论调是宁在旧社会当麻农也不愿在现在的合作社里当主人。

“我想干活就干，不想干活就坐着什么也不干。”

“既然旧社会什么都好，你怎么还去讨饭？”

“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没人雇我了，就只好去讨饭。”

“有活干时，你干多长时间？”

“每天都干，从早到晚。”

“你怎么不坐着？”

“不能坐呀。不干活就没有钱，没有钱就吃不上。”

“那你现在一年劳动多少天？”

“200天。”

“也就是说你能休息100多天了？”

“我想是。”

在人们的追问下他退却了许多。又有人开始追问：

“在旧社会让你提意见吗？”

“我怎么能提意见，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旧社会你得过病吗？”

“得过。”

“你得了病有医生给你看病吗？”

“没有，我去哪儿找医生呀？”

“他们怎么把你抓去当兵的？那会儿你能拒绝吗？”

“不能。在那会儿也没有多少人当兵。”

“可当兵的都是穷人，对不对？他们都像我们一样穷。”

“是的，他们只抓穷人。”

一次又一次的提问把他逼到了墙根儿。

“现在你一年只劳动200天，每天有吃的，可以说你想说的话，生了病可以去看医生，部队又不抓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比起

旧社会如何？”

“说，大声点儿，让大伙都听听”，人群呼喊起来。

“这个人太顽固了，他忘了本，我们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有几个人说。

干部们把他当作混淆了是非的贫农对待，讨论继续进行。

最后，这个人说：“我不再争辩了，我输了。我会认识到做一个合作社社员是有些好处的。”

第三个靶子，是过去的伪区长作为阶级敌人站在了群众面前，他的“猪落在杀猪人手里就没法活了”，意思是说“共产党会伤害人民”。党支部书记让他站在一个高凳子上，好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他。

1958年全县都在进行这种辩论，它可以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因为组织者划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把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坏分子与头脑里有怀疑的老实人区分开来，所以这个运动团结了绝大多数愿意发展合作化的群众，孤立了极少数愿意搞单干的顽固分子。

张庄的辩论紧跟在黄碾之后，主要集中在李家三兄弟身上，他们是李全忠(李胖子)和他的残废复员军人弟弟李太平，还有小弟弟李继顺。

这兄弟仨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共产党员。李全忠现在是管辖着12个村包括张庄村的马厂乡政府的干部，李太平是张庄村的干部，李继顺仍是党支部委员。我在前面已讲过，这兄弟仨在土改后都成了新富农，也讲过他们是如何在加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凭着自己的大股额捞取邻居的好处的。1957年与他们同一个合作社的社员们批评他们越来越骄傲了，谁也不敢反对他们。不用说群众，就是他们的同事也常挨这兄弟仨的骂，他们不光骂自己的干部同事，什么人都骂，爱教训人。现在人们贴出了大字报，“在旧社会，地主老财骂我们，欺负我们，现在为什么你们也欺负我们？解放前，你们谦虚、勤劳，现在为什么这么傲慢？”

李家兄弟真正的问题当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他们所走的那条道路的问题，他们总想自家捞好处，总想着自己的利益，总是想方设法从合作社里捞私利。但人们看得最清楚的，最感到不满的却是他们的态度，大家只能通过批评他们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来触及他们真正的问题。

在批评的强大火力下，李胖子毫无防备，无言以对，他蹲在屋子

后面一声不吭，邻居们一个挨一个在数落他。

几天以后，人们又揭发说曾当过一段张庄党支书的孙九祥是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向伪军泄露了一个地下战士的行踪，这个战士被伪军抓了起来，被杀害了。这件事情真相大白后，党开除了孙的党籍。

辩论中还揭发出另外两个社员是反革命分子。一个是林和顺，他曾在军阀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连长，他在合作社的工作是开豆腐坊，但他总是漫不经心，社里许多头肥猪吃了豆腐渣后死掉了，这个豆腐坊老是赔钱，社员们骂他毁了合作社的财产。

另一个是杨广宏，他过去是国民党员，曾和国民党军官住过一个院子。土改运动中，农民陆勤发分得了这个院子，他为了让院子大点儿，所以要拆掉一堵墙，在墙缝里发现了一些国民党党员的卡片，其中有一张上写有杨广宏的名字，尽管杨什么都不承认，可社员们说这些卡片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据。因此，他被划为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说，这次大辩论搞清了一些新与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为“大跃进”的到来做了准备。

三十一 难忘的日子

毛主席称赞河南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传到晋东南，各级的干部积极分子都很高兴，他们一夜之间就建立起大规模的公社组织。张庄首先并入了黄碾公社，这是一个仓促成立起来的合作机构，包括潞城县和长治县的好多村。一段时间后，这个庞大的公社把张庄分了出来，张庄作为一个大队又并到了几乎覆盖半个潞城县的新东风公社。东风公社分四个片，每片大致相当于过去潞城县的一个区，张庄在最南边的一个区，中心是马厂。1959年在更激进的组织形式下，这几片又都成立了自己的公社，最后张庄成了马厂公社的一个大队，这时，地区专署决定把潞城县这一片移交给长治市，因为潞城这一地区工矿很多，并且有这一地区主要的铁路客货运输站，这个最后的变动使长治市的管辖范围向北扩展了许多。但在这儿我要讲的是1958年开始的故事。

1958年三个集中的运动使晋东南人民的生活发生着强烈的变化。首先是突然来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是号召所有的人走出家门大炼钢铁；第三是粮食空前的大丰收。当然这是大家辛勤劳动和老天爷开恩的结果，估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比以前任何一年都要多出一倍以上。

粮食的大丰收鼓起了村民的士气，打击了保守思想，这样才使得广大群众有可能丢掉顾虑，长时间地离家在外劳动，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的。

王京和怀着敬畏的心情讲述了那一年的事情。

在回村的路上，看见玉米棒丢在地上，我就问一个农民为什么不把它拣起来。

那农民反问我：“你自己怎么不把它拣起来？”

“至少可崩爆米花吃呀。”我说。

那农民反驳道：“谁稀罕！”

这就是这一年人的态度。

那一年，粮食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没有足够的车辆把公粮运走，于是粮食被堆在了公路旁，开过来一辆空卡车，人们就往上装一些，因为交通规则规定不许司机开空车，所以运货卡车在卸下货物返回时就得拉一些粮食。为了多运粮，有时一辆卡车要挂上2~3节，甚至7~8节拖车，在公路上行驶时就像在轨道上行驶的运货列车。这种车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那时候，每个公社都建起了小工厂，他们还组织了基建队，建起了医院、修理部。炼钢铁用的钱从下属各大队的资金中调拨。东风公社有拖拉机，有一个自行车、平车修理部，还有一个鱼塘、一个养马场，另外还烧耐火砖。

有了独立的收入，公社便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公社干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地方调集劳力和资金，他们有权从任何一个下属单位调用多至1万的资金。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个好木匠，他们可以调用；正晌午也可以通知拖拉机手，让他干到下午四点；如果某个地方有个砖，不管谁需要都可以拉走。那劳动者的报酬怎么给呢？全靠自己报。比如，一个农民在路边堆了200块砖，有人把砖拉走了。但很难说那些单位是否整理了帐目，支付了拉东西的钱。

那时候没人敢违抗平调财产的命令，干部们要什么，人们就给什

么，钱、粮、物资，什么都给。共产党对违抗命令的人可以作为右派来开除。

开始炼钢铁前，干部们在长治开了一个动员会。我作为农工部的干部出席了这次会议。工业部门的几位干部讲了话，他们号召所有人所有单位及部门都要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支持炼钢铁。

我说：“你们让炼铁，和我们工作有什么关系？”

他们没有理睬我的问题，反而问我：“你们有多少电动机？多少电线？多少柴油机？”

“干什么？”

“你不要隐瞒事实，必须坦白。我们能调你们多少设备来炼钢铁？”

“调？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到这儿来就是问这个事，你们是工业部，我们是农工部，你们怎么能调我们的设备？”

“别担心，你去写一下你们有多少设备，下午汇报给我。”

这位部长想把我们所有的动力机械都调去炼钢铁。

我立即返回了办公室。

“他们想调我们的机械。”我对我们的部长抱怨道。

“以后，别去开他们的会！”

“可他们要来找我们的。他们让我们去，他们会说：‘你敢跟炼钢较量’！”

这场新运动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以后，我们部长说让我最好到河南去一趟，所以我马上就动身离开了，就在全市总动员之前离开了长治。不过我没有去河南而是去了河北邯郸。邯郸各地已经修起了炼铁高炉。一周之内，铁路旁、公路旁到处都修起了炼铁炉。

然而，尽管我走了，长治市的干部还是把为农业准备的所有动力设备调到了炼铁工地。不过因为当时已是秋天了，调走设备对农业影响不太大，到了春天大部分设备就还了回来，外出的村民在春节前大部分回了家，这样，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这场运动是惊人的。队与队在生产记录上展开竞赛，所有干部全部参加。东风公社的史书记也和大家一起日夜奋战在高炉旁，他们的口号是：炼铁也炼人。

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我们就不会有漳泽水

库，因为大炼钢铁搬掉了村民离家外出的心理障碍。在这以前，村民一般是不想离开家的，但如果是要他们出去炼钢铁就什么都变得可能了，到处新建了各种工程。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我们的伙食很好，即使半夜也有馒头和面条吃，高炉附近就有大锅供应面条。谁也饿不了，工地上还有宣传队、敲鼓队，还演电影。那会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全没了。

“那真是些难忘的日子。”张庄第一个参加炼铁的赵东胜说。1957年到太原学习小型柴油机的使用和修理技术，1958年8月13日，在他的保护下用马车把柴油机拉到了店上大队，这个大队在张庄以北二十多里，那里的群众已经修起了高炉，这个小柴油机能带动吹风机加大高炉的火势。赵东明是这样讲述这一段往事的：

这儿聚集着来自各个大队的2~3千号人，他们来的时候带的有马车、箩筐和扁担。开始我们先用2~3个高炉冶炼，后来不知又修了多少高炉。起初修高炉是用砖从地面往上垒，后来我们就像挖窑洞一样在黄土地上挖了许多高炉，反正高炉的形状都差不多——又低又圆，高炉修好后，我们把煤和矿石交替着一层一层地装进高炉。我们还展开了大规模的竞赛活动，看一天内谁炼的铁最多，我们的口号是：“放卫星”。整个工地变成了一个大的炼铁炉，山谷中浓烟滚滚，烟雾缭绕。需要燃料时我们就到煤矿去拉，看见什么煤就拉什么。矿工们也在努力夺高产，他们说：“煤是工业的粮食。”

许多妇女也像男人一样在工地劳动，她们帮助粉碎矿石。到了晚上，整个工地都点起了油灯，照亮了整个山村。炼铁的人一下班就去帮助当地的农民干农活，帮他们刨花生时大家都吃个够，大队长还告诉我们尽管吃。

然而，纪律是严明的，未经允许谁也不许拿任何东西。谁也没有在路边的地里挖过红薯，如果有人挖了，哪怕是一个，大家也会在群众大会上批评他(们)。

工地上只有三四个人在太原学过柴油机，所以技术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弥补技术人员的不足，我们就选出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加以培训。这样许多年轻人都学到了技术，学会了开机器、接电线。这些人在后来公社的工业中都成了骨干。到处都需要技术人才，而炼铁运动正好为培训技术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时候，叫群众出来劳动根本不费劲儿，群众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担心，不用顾虑吃了上顿没下顿，只顾出勤好好劳动就行了。我到了店上，我老婆去了史赵，我们把门一锁就走了，不怕丢东西吗？不怕。再说谁想拿别人的东西？那时候没人偷东西。1958年开始群众不再操心自己的财产，被派到哪儿尽管去好了，世界上任何事儿不用担心。

我们把劳动和军训结合了起来，所有民兵每天早晨进行训练。我们都是年轻人，上工时把枪带到了工地，训练的号声一响，我们马上就集合起来了。

那真是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日子！

不久，想数清工地上有多少人就不可能了，所有的人都出来炼铁了，所有的村子都空了。

市里的中学、小学和机关的人也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工地，学生们用手帕或小袋运矿砂，与他们一起来的厨师在炉边点火支起了大锅。

山西这个地方，不论哪都有煤、有矿。我们具备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不用为原材料担心，就连耐火砖也是我们自己烧，我们能自给自足，我们有采煤、采矿、挖土、采石、运输队等。

每天晚上到半夜时，协调人都召开电话会议，他们会通知，明天什么地方需要400人，第二天就有400人到达指定地点。

我刚来的时候心想做好准备工作也得20天，但几天以后第一座高炉就修好了，并流出了铁水。我又想我们会逐渐修建和完成整个工程，可不久所有的高炉就都点火了，并安排好了负责管理这些高炉的所有人员。我心想工作一段就能休息，哎呀，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回家。谁会想到这些？

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心里总充满幸福和欢乐。

赵东明带着柴油机去了店上不久，张庄一百多号男女(包括儿童)就到另一个工地——史赵去炼铁了。王文则、郭真宽、师才元在不同的时间都领导过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应急队伍。与此同时，张贵才带着由90人组成的第二支队伍到襄垣县西营的新水库工地去劳动了。史赵在张庄以北，离张庄仅7公里，可西营离张庄就有50公里。

先去史赵的100人人太少，完不成分配的任务，所以又派人回村来叫人。夏天地里的活已干完，秋收的季节还没到，眼下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要干，所有能劳动的人就都去了史赵。那些以前连长治市

都没去过的小脚老太太也跟着到山上运矿石，母亲把自己才5岁的孩子也带到了工地，那些孩子还太小的母亲把孩子留给了上年纪不能劳动的亲戚家里看管，自己也跟着大伙上了工地。村里留下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孕妇和喂奶的，还有一些照看村子的基本人员。每个队留了一名干部，另外还有一位仓库保管员、一位会计、公共食堂做饭的几名师傅，还有几个喂牲口的人也留了下来。留下的人当中管用的只有那6名干部，老人来洪顺死了，这6位为他抬棺材。一般一口重棺材要16个人才能抬动，可这次，他们6人竟然完成了这项大任务。

每个生产队派一个小组出动炼铁，每个小组要自带粮食、锅灶和炊事人员。每个小组一找到合适的宿营地马上就修一个大的泥火灶。开始时，队员们先垒起一圈砖，在砖上加上木板，然后用泥巴苇席和木板糊在一起，修成四堵墙，他们就睡在这四堵墙围起来的没有顶的露天的地上。可后来天下雨了，公社给了一些篷布，他们就把篷布搭在顶上，造成了临时帐篷。虽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灶房，但无论你走进哪个厨房都可以吃那儿准备好的饭菜，没有人安排早、午、晚饭，只要你饿了，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都可以到离你最近的厨房去吃个饱，从南到北，沿路都是厨房，人们可以随便吃哪锅饭，没有人登记，公社保证所有人的粮食供应，公社后面还有长治市，这是“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物质基础。

开始，每个村的应急队伍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领导可以了解和比较每个生产单位完成任务的情况。群众修的炼铁炉很低，高约1.8米，他们在炉底铺上耐火砖，最底层架上干柴，上面盖上一层煤，再上面盖上一层矿砂，一层煤一层矿砂，一层煤一层矿砂，直到装满为止，然后从下面点火，由于没有足够的动力设备，大部分靠簸箕煽火，大约3天就可以开炉了。铁水一流出来他们就通知公社的人来检查。在史赵，炼铁的效果不总是好的，当时定的指标是每一炉出2吨铁，可他们常常只能出1吨半，铁的质量也太低，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送到长钢去回炉。另外，像我们大家能想象的一样，还有许多意外事故，有一座高炉靠电动鼓风机提供动力，结果有一天鼓风机坏了，不能提供动力，火就灭了，已经熔化的一炉铁又凝固了，光把炉里的金属掏出来就用了20天时间。另一座高炉，负责看炉的人睡着了，几乎又毁了一炉。

“正值‘大跃进’，大家都在卖力劳动，可他却睡觉，”真宽说，12年后的今天他们显得非常气愤，“因为他是党员，那就更不应该了。我们在工地上开会狠狠批评了他，群众要求开除他的党籍，可他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对不起大家，并请求大家的原谅，最后群众认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会议既教育了犯错误的人，又教育了群众，所以不再要求开除他了。”

从这次劳动的节奏上讲，怎么能让人不瞌睡呢？很难使人理解当时能不打瞌睡。“一到炉旁工作就没有昼夜之分了。”王文则说：“开始我们是倒班干，可不久就不倒了，一直干，一干就是2~3天不睡觉。”

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工作是不间断的，是什么给了人们这么大的动力？使人们想起“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吃的东西。

“我们的伙食很好，”文则说：“我们吃了许多肉。那会儿吃肉就是革命者，如果不吃肉那就不是革命者了。过年的时候我们买了10斤肉并要求各家各户都得吃10斤，人们甚至互相比赛看谁吃得肉最多。”

“突击队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停下来吃东西。”才元说：“他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各村各队自采自炼的规定很快就废除了，部分原因是炼出质量较高的铁，运动的领导者组织了这项工作，他们要求每个大队重点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史赵的矿砂资源相对短缺，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个工地，把重点放在了店上，他们在这儿重修了能产生更高效率、更大热量的高炉。之后，张庄来的人负责采运矿砂，其他大队的人负责冶炼。从采矿砂作业到高炉工地有约1公里的路程，他们用平车、扁担，有些人用手搬运矿石，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用手搬或身子背，如果矿石太大一个人背不动就两个抬。

第一次大突击战打完了，工作重新安排了，许多人返回了村上，最开始的100人一直在工地待到11月，不过有许多人也回家收玉茭去了。但是即使在收割季节也还有几十人在工地上，他们继续炼铁，炼了一年多。这些人中还有几个再也没回到村上。店上重新安装了设备，修整了高炉，建起了一个“东风公社钢铁厂”，这几个人就成了厂里的工人。到1961年东风公社又分成了四个公社，张庄归属马厂公社时，这个钢铁厂关闭了，当地的主管者把它变成了一个农具修理站。

后来，这些小型企业大部分都关了门。市里和县里的领导砍掉了许多小型工业，其中有一些是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保留下去的，但一被砍掉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那时刮的是单干风。”赵东明说：“工业都下了马。‘收缩风’一来各行各业都开始收缩了。”人们把这个归罪于刘少奇。

在总结整个运动，谈到技术方面时，赵东明说：“我们东风的铁井不坏，不像其他地方，我们的炼铁炉出的铁是合格的。炼了多少？这个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只管劳动，公社领导知道数量。当然，那时有些机器坏了，可后来我们不是修好了送回去，就是付给了钱。”

真宽领着大伙回村收庄稼，可季节已过了。“我们一回到村上，天就下雪了，而且下得很大。所以大家不得不在雪里收割，从雪地里把庄稼运回家。刚收了庄稼，就又来了指示，要人到西门帮助修水库，陆晋中带了一帮人去了，我留在村里组织深翻土地，搞积肥运动。”

三十二 两个大坝一条铁路

陆晋中和师才元带着一帮人到大坝上去劳动的时候，贵才他们一伙90人已经在西营干了两个多月，他们要干到春节，总共5个月的任务。

贵才满怀激情地给我们讲道：

起初我们都住在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暂时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这些窑比张庄的房子好。

墙壁上画满了画儿，这是那儿的民俗，每间窑洞都要花五担谷子，请画匠来画画儿，整个墙壁画得满满的，有古老的民间传说，有古代神话的坏人、怪物、“三国”中的英雄人物，也有现在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以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墙壁。”

“我们住在他们最好的窑里，同时抓紧时间挖自己的窑洞。我们挖的窑洞很大，每间足能睡20个人。几天以后，窑洞挖成了，我们便搬了进去。”

“踰城县，包括张庄，总共去了500人，因为大坝上的工作3-4天还没开始，我们就主动帮助当地的农民摘棉花，所有的棉花一天就摘完了。我们500人共建了三个食堂，西营人看见食堂成立起来了，

就送给每个食堂一只大羊，让大伙‘改善生活’。”

“在工地上，我们尽量奖励干得最快的工人和最快的队，奖品就是粮食。我们的基本定量是每人每天1.2斤，粮是从张庄带来的，每多运一方土就可有3斤粮的奖励(三斤粮中40%是白面)，外加4.5毛钱用来购买盐、醋、酱油等调味品。由于我们干得很快，挣的钱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需要，由于我们帮当地农民收棉花，一有机会他们就给我们送吃的。有一天，一个大队的干部领我去看窑洞，好家伙，里面满满的全是南瓜。他说：‘我们不能白送给你们这些南瓜，给五块钱，吃多少就拿多少。’当我们再需要羊肉改善生活时，他们8块钱就卖给我们一只。休息的那天，我们把这只羊杀了，总共30斤肉，我们把羊肉、南瓜、葱蒜在一起做了好多馅，美美地吃了一顿饺子。”

村民讲的最生动的情节又是吃，不过吃得好补偿了后来秋天和冬天的艰苦。封冻的大地使工作变得十分艰难，大伙在一起商量如何才能破开冻层，用炸药当然可以，但炸药太贵。点上一堆火才化开一小块冻土，从化开的地方继续挖下去就可以挖到冻层以下，只要挖到了冻层以下就可以用重锤往下敲，这样就可以挖出土来，然后运走。但这个工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再停下来，因为半小时就会重新结冻。所以工作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一班接一班不停地干，万一人要离开了就得把被子盖在土上，好几层被子，这样再挖的时候土才不会上冻。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运土速度肯定要减慢，所以有些人失去了信心。有个名叫程金龙的富农散布谣言说，像这样的进度几年才能完成工程。妄图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他还说不完成最后一方土谁也别想回家。他的话影响了张庄人的情绪，他们一个班只能运约1立方的土，而其他大队每班能运两立方。吃饭的时候，贵才发现有几个妇女在哭，男人们都低着头。

“怎么了？”他问：“你们怎么都垂头丧气的？”

“因为我们都不能回家，过年也不能回。”

“谁说的？”

“程金龙。”杨忠盛咕哝着说。

“这是谣言！”贵才说：“不要听那个富农分子的，我们过年都回家。”

贵才召开了一个会议驳斥了程金龙的谣言，程不得不站在大伙面

前低着头，听着大家对他的指责，汗液从他的前额流了下来。

贵才说：“他说这儿的活要干几年？这是破坏大坝，破坏社会主义！”

“对！”人们马上响应：“他是这样说的。”

“他还说了许多别的。”

“贫农和地主富农想的就是不一样。”

杨忠盛非常气愤，他脱下鞋跑上去要打程金龙，但贵才制止了他，他说大家讲的难听话已经够他受的了。那天的会议开到了深夜，大家恢复了信心和勇气，决心不顾一切困难朝前走。

一两天的时间他们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别的大队，这时在山顶指挥部的门前贴出了一张大红纸，表扬张庄人干得不错。这使每个张庄人都在深思，他们又骂开了程金龙。

他们说：“张庄人以前从没丢过脸，要不是这个富农分子，我们开始也不会落后。”

这一周每个大队的运土任务是190立方，这次是要挖山北侧的冻土，张庄人六天半就完成了任务，他们是第一名，富村是第二名，有的大队8天还没有完成任务。张庄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富村和张公社没有张庄挣得多，可因为这三个大队在一起用一口大锅做饭，这就出了问题。张庄人得到了超出定量的奖励，而别的两个大队没有，于是他们就开始争吵，张庄人吃得多，而其他人不够吃，最后富村和张公社为了把生活拉平只好向张庄借了700元钱，不过他们再也还没还这笔钱。

“当然，这笔钱不必再还了，”贵才说：“我们已把它从帐本上划掉了。”

当时贵才挨着窑洞征求大伙的意见，大部分人都说：“我们觉得这儿很好，现在就是送我们回去，我们也不愿回。”

“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好，生活也很好，所以地区总指挥部邀我去介绍我们的经验。”贵才说：“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区的8000人，还有几百名生产队长，真让我为难。我有什么好讲的？最后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就是揪出了坏人，我就给他们讲了我们是如何揭露和批判程金龙的，队长们都向我们学习，各队也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在坏分子的脸上涂上黑圈，给他们戴上高帽，让他们在工地上游街

示众。长治有一个大队在他们中间揪出了两个坏人，给他们戴上用草席做的足有八九尺高的帽子，还给他们画了大花脸。”

“政治斗争唤醒了群众，并鼓舞大家去努力工作。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好，就得抓阶级斗争。”

揪出了“坏人”，振奋了精神，劳动竞赛则进一步巩固了胜利的成果。除了能显出每个大队生产能力的生产记录以外，队与队之间为了得到奖励而进行的一些竞赛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内容。比如，每个队选出5名最有力气的年轻人参加挖1立方土的竞赛，先划出1平方米的指定范围，参赛者都脱掉外衣只穿背心或短袖，每个人背上都有一个编号，上级领导监督，检查员在旁边测量坑的深度。信号发出后，参赛队员就开始挖，尽可能快地挖，他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有的出力过大吐了血，有的劳累过度得了病。工地所有的公告牌上贴了挖土的纪录，某队某人1小时10分挖土1立方。贵才能记起来的最高纪录是50分钟挖1立方土。

贵才在讲西营大坝的事，才元也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他们在重新治理漳泽水库工地上的故事，漳泽水库属浊漳河的南源，在张庄村的正西面。

我们的供应组织得很好，上夜班时厨房要送两次热汤，大伙都能吃饱，他们用平车沿我们运土的路线送汤，我们是三班倒，整个工程组织得就像打仗一样，分旅、团、连。各处的喇叭及时广播各个点的新闻，工地领导也用喇叭指挥工作，向各旅、团、连发布命令。

其余的时间，他们把工地上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事编成短剧或顺口溜在喇叭上播给大家听，如果说喇叭还不够，工地上到处都有黑板报和大字报。

这只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有市里送来的新电影或派来的戏曲演出，另外我们还在工地上自编自演民间戏曲和滑稽短剧。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演出队，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编演表现民工生活和工地新闻的节目上。不幸的是，大公社解散后，当地的行政机构也解散了，当时编写的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不是丢失、失散，就是放错了地方，有的甚至被烧掉了，真是太遗憾了！

要想得到当时建设工程的完整资料，你必须去找像刘跃文这样的人，他当时是长治市政府协作领导组的领导人之一，是建设工程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也是水库的主任。他很有工作能力，处事坚决果断，

并且效果很好，有他在，你工作就不敢松松垮垮，因为他的厉害出了名。就因为这，他在“文革”中被夺了权，不过现在他又恢复了工作。所有大队，比如我们张庄大队完成了任务后就回家了，所以都不了解我们走后详细完整的情况，但在总指挥部工作的刘跃文有整个工程的全部资料和记录，多少人参加了总共运了多少土方，他都知道。

十万人住在大坝附近的村子里，我们住在帐篷里，住在席棚里，住在各种各样的临时建筑里，离开了工地10里远的村子都是宿舍，村子里的许多人搬了出来，腾出房子让修大坝的人住。当时我们的办法是在大坝上干一个月，回家住15天，然后再去干1个月，两头儿干两个月，中间休息半个。但从市里来的干部的时间安排就不同了，他们三四周末大坝干一周，这样不影响他们完成单位里的工作。

人们的干劲如此高昂，大家都忘记了寒冷，有一次我见两个人盖着被子躺在结冻的地上就问：“你们冷吗？”他们说：“一点也不冷！”可怎么能不冷呢？”

有如此高的干劲原因之一就是劳动竞赛。年轻妇女们有刘胡兰队，年轻的小伙有飞车队，平车冲下100米高的大坝就像闪电，他们把车推上坡顶，然后一松手，由于向下的惯性，平车就像野马一样冲向坝底，有一个人站在车后尾磨住地起刹车的作用。上年纪的妇女有余太君队，上年纪的男人有老黄忠队。尽管年纪大了，可他们不服老，他们的口号是：

挡住漳河水，浇灌上党田。

他们把这句口号写在席子上，两张席子写一个字。每张草席宽约4.5尺，长约6.5尺，然后把他们放在大坝的坡面上。

这件事鼓舞人们搞了许多新发明。开始他们是用手把平车推上坡，后来大家安装了绞车和绳索，这样装满的平车下来了，空车就顺着绳索上去了。打夯最初规定每次把三寸厚的土夯成两寸，后来人们学会了用水把土浇湿后再夯，这样就比原来夯得要结实得多，因此整个大坝就更坚固和安全了。

我们是冬天去修大坝的，回来已是第二年秋天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刚回来马上又跟王文则到铁路上去劳动了。这次，工地离家很近，从村口向东穿过公路就是，工程指挥部就在张庄，设在原来的育婴堂，也就是现在的卫生学校院内。

新的铁路要把黄河谷中的大型煤矿焦作煤矿的旧铁路延伸到上党盆地。这项工程要用3年时间。张庄人一帮一帮地轮着到工地上干活。王文则负责来自马厂公社各个大队的铁路建设队伍，一直在工地上坚持了3年，他指挥着五百多名民工，他们在铁路路堤上劳动，分段完成任务，从长治西站一路北上一直到五阳。五阳是襄垣县的一个村，1971年这儿是这条铁路最北边的终点站，后来这条铁路修到了晋中平原的太谷，并在此与省城过来的铁路汇合。一直延伸到山西西南角的风陵渡。

新的铁路突破了早在40年代初由阎锡山修建的铁路的旧线路，由于有坡度和弯度的新标准，旧路全部被拆除了，不过新路大部分还是在阎锡山的旧路基上修的。

1971年的王文则象1948年一样悲观、刻板，不易被采访。在大家的批判指责声中，在整风运动中，甚至在暂时不能“过关”的时候，他也只是很简单地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而且只答一两句，从不多说。然而，说到“大跃进”就不同了，显然这场运动是他生活中的最辉煌的一页。我们一谈起修铁路，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下午，而且绘声绘色、手舞足蹈。

他说：“当时，接受这项大的任务时我拿不定主意，因为这意味着要负起500号人的责任。可公社领导说他们就选中了我，所以我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坚持了三年。在工地上干了三年的所有的人甚至五阳矿区建成后都分配了正式工作，也可以在铁路上当工人，或到钢铁厂当工人，可我不愿离开家，我还是回到了张庄，在村上当了一名大队干部。”

“在铁路劳动时是按计件发给我们工资的，按人数的多少划分路段，按每人一天运土2立方计算划分路段的距离。一个组运够了规定的土方就把它夯实。工资按完成的总土方计算，发给我们的是钱，不是粮食或粮票，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际上铁路管理部门是按队或按夯的总土方数一块发给全队的工资，然后每队按每人挣工分的多少发给队员。”

“为什么那会儿的事那么好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如果干部不带头干，只是发号施令，命令群众这样干，那样干，当然不行。在铁路，我们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大伙商量，让

每个人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有些地方挖起土来说比别的地方困难得多，在这种地方干活的队就会落后。完不成任务。而在好挖的地方干活的队总要超过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开会讨论，为难挖的地方规定新的定额。因为每件事都处理得公平合理，大伙都满意，工作也就干得更好了。就是过年我们也没回家，大伙只休息了一天接着就又干起来了，真是‘开门红’啊！”

“那几年我们还积累了许多使用炸药的经验。我们在二岗山上炸石头就必须使用炸药，所以我们学会了打炮眼儿，一个人拿钎子，两个抡锤打下去，我们的炮眼打得有两米深，有时甚至3米，然后放一些炸药进去把口炸得大些，这样就准备好了放炸药的洞，就把炸药装进去，然后起爆，一次就可以炸下500立方石头。我们经常碰头，汇报已运走了多少石头，并交流爆炸经验。因此从来没有出现干活好坏悬殊过大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遇上了一条沟必须填起来，完成这一段路是任务的期限已经到了，大家都很着急，沟的侧边有一个小山包，只有把这个小山包填到沟里去才能尽快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决定使用炸药，我们在小山包上挖了一个大洞，往里面填上炸药，一声爆炸过后，沟就给填平了。”

三十三 幼儿园和公共食堂

在“大跃进”时期成立的“东风公社”有分配劳力、牲畜和设备的权力。它包括了大半个潞城县。公社作为一个核算单位负责按月分配每个社员收入。这种新型集体权力机构的成立，使大炼钢铁、修造大坝、修建铁路等工程成为可能，这些工程的上马打破了死守在家、互不信任和山头主义的传统习俗，这种打破了村庄界限的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为村庄内部的集体在做了试验，创造了经验。最主要的是公共食堂和公共托儿所解放了妇女生产力，使她们走出了家门，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撑起半边天”的能力。

村里开办了3~7岁儿童的托儿所，大多数儿童都可以入托，这样

极大解放了妇女生产力。

为了给公共食堂提供蔬菜，各生产队把各家各户保留的自留地合并起来做了队里的菜园，这样就把几百个劳动日从个人生产移到了集体生产，使蔬菜生产合理化，并进一步把妇女从家庭琐事中解放了出来。有了1957年1月购置的柴油机和6月购置的小型蒸汽机，才有了1958年蔬菜的大规模生产，用这些机器泵水可以灌溉几十亩菜田，因此激发了各个生产队在“大跃进”到来之前开发蔬菜生产的积极性。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大跃进”时期炼铁调走了机械，但那个时候张庄已经从公路对面的新水泥厂接上了电，已用电动机代替了小型柴油机和蒸汽机。1958年以前，没人敢要求从水泥厂接电，因为水泥厂和张庄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根本不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再说电被认为是高技术，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只有电工才能对付得了，一般普遍的村庄不敢瞎摆弄。“大跃进”打破了行政管理的界限，冲破了人们的思想藩篱。张庄人从公社指挥部申请到了电线，越过公路，接到了水泥厂的电机上，这样全村各家各户都通了电。电灯亮了，小型电动机也可以使用了，村民可以到加工厂来磨面，再也不用绕着石头碾子、石头磨转圈圈了。这更进一步解放了妇女。

村里通过各种渠道为发展这些新事物积累资金。张庄的农民到水泥厂和马路对面的火车调度厂及修火车的机务段干合同工，所挣的工资不是给了个人而是给了公社，合同工只挣工分不挣钱，他们挣的钱算入了公社的总收入。工分的收入总要低于工资的收入，正是这个差额才使公社积累了投资资金。

铁路和水泥厂建设占地要付给公社一笔钱，他们不把这种交易称为买卖，而是简单地称为“变成工业用地”。土地的补偿费相当于所占土地三年产量的总值，这样公社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却得了一笔流动资金。

新的资金的积累和1958年的丰收能够提供7项保障：保障食品、燃料、教育、医疗、住房、结婚和丧葬的服务收费用。东风公社没有这么多保障，只有食品和教育两项。这些保障，两项也好七项也好，都给了人们一种史无前例的安全感，许多人不再为看病、年迈和丧葬攒钱了，而是花钱买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过去的人们常说：

小的时候攒钱盖房子，
长大以后攒钱说媳妇，
上了年纪攒钱买棺材。

现在人们攒钱的目的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需要的和喜欢的东西，不再过多地忧虑会有什么大灾难发生。因此，一个活跃的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起来了。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尽管公社化运动没有全部兑现这些保障，而且大部分在一两年内都被取消了，但它却在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跨越大半个潞城县，曾一度有权安排40个村庄大部分劳力、农具和资金的东风公社于1959年分成了4个规模较小的公社，此后不久张庄的托儿所就关了门，公共食堂继续办了两年，1961年由于粮食短缺没法再办下去了，于是也停办了。公社核算取消后，以村为单位的合作形式即后来的大队接管了所有的帐目，大队接受了集体菜园、水泵、加工厂，每户的电灯都保留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后来在1963年，公社批评大队核算过分集中，是早产儿，所以包括60~100户的生产小队又成了结算单位，负责一切收入和消费。这更低一级的核算恐怕是当时公社运动的组织者们所未曾想到的。退却是大规模的和仓促的。

张庄的托儿所受到了全村妇女的欢迎。胡雪贞热情洋溢地讲道：

“我们加入公社后成立了托儿所，公社负担全部费用，孩子们免费入托。实际上我们村成立了两个托儿所，村南村北各一个。村南的托儿所占的是金宝贝的房子，北边占的是张贵才的老院，现在归了陆何仁。每个托儿所有两名妇女负责，贾金顺的老婆和李小妹负责村南托儿所，孙全美协助她俩工作。每个托儿所有七八十个孩子入托，不过季节不同，入托的孩子数也不同，地里的活越忙，到托儿所的孩子就越多，即使这样，也有许多家长从来不往那儿送孩子，而是留给姥姥、奶奶或是姨姨、婶婶照看。”

“大多数家长是早饭后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去上工，中午下工时把孩子接回去，下午上工时再送过来，孩子们在家里吃饭。不过托儿所为孩子们准备了吃的，公共食堂给孩子们准备的有疙瘩，孩子们把这当做饭间零食。”

“托儿所办得很好，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做游戏，还有许多人

到我们这里来取经学习，我们也到别处去参观学习。那时候晋东南各地都有托儿所，为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幼儿教师和家长经常互相参观，相互比较，看看哪儿的托儿所办得最好。”

我向张庄的托儿所为什么最后停办了，胡雪贞说：“冬天到了，天气冷了，许多家长都不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我们的托儿所是个季节性的机构，只办了两个季度，最后就停办了。”

张庄的托儿所办了大约1年(1958—1959年冬天)，后来由于东风公社解散，不再提供给资金，所以也就停办了。

和托儿所一起办起来的村里的公共食堂办得时间稍长一些，直到1962年7月。开始张庄6个生产队每个队开了一个食堂，后来两两合并变成了三个，这三个都坚持了很久。起初，不管怎么开会动员，解释集体食堂的好处，来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总是少数，如果家里有人做饭就在家吃，但后来伙食和服务改善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

厨师们按计划尽量变换饭菜的花样。他们想办法粗粮细作、粗细搭配，吃几天玉米高粱就吃一顿白面，逢年过节吃好饭，食堂间相互比赛，看谁做的好吃的多、饭菜花样多。他们还组织相互参观学习、现场表演，并讨论改进的办法。长治市接管了马厂公社后还安排了一名市委副书记负责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吃饭问题。

张庄的三个食堂，北边的设在大队部的院里，南边的在申天鹏的院里，另一个在南庙。每个食堂都有10间房子，不包括厨师们(每个食堂有2~3名厨师)住所。每个食堂有一个大火炉、一口大锅、一台加大火势用的电动鼓风机，另外还有小火炉和2~3口小锅供特殊情况使用。每个食堂都有蒸馒头用的大笼，还有动力切菜机，每个食堂还指定了一名供给主任，负责食堂的管理和采购工作。只要供给主任计划安排得好，一切就会很顺利。

公共食堂一成立起来就大得人心，主要原因第一是方便，第二是免费，尤其在农忙季节，必须在地里吃饭时，最能体现它方便的优势性。这时厨师可为6个生产队的社员提供热的饭菜，社员们只要派人去食堂拿就行了。如果没有这样的集体食堂，队里就得派一个人挑着扁担一路摇着铃铛到各家去收饭，因为那么多户人家同时把饭做好是不可能的，派去拿饭的人总要等着还没做好的人家做成才行，这样等

他把饭挑到地里时，先做好的饭肯定就凉了。大家的饭一起做，不仅省时间，省劳力，而且大伙还能吃上拿到地里都是热的饭菜。

即使在农闲季节许多家也还是觉得公共食堂方便，他们可以派一个人去食堂把饭拿回家来吃，对单身汉和人口多的家户这尤其方便。不过，那些强调饭菜花样、强调个人口味、强调病号饭、强调随时可吃到饭菜，或还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人就不易满足了。

农民拥护公共食堂，实际在1958-1959年的食堂的供应是半免费的，另一半还得各家各户自己付给，也就是说集体(开始是公社，后来是大队)从分配资金中扣除足够的粮食资金(资金占总收入的20%)，供给食堂半年使用，然后各户再从每年分配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粮食和钱供给食堂另半年使用。从1960-1962年，大队扣除了足够的粮食和资金支持公共食堂全年运转，每人每天有1.5斤粮食。显然，这不是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免费供应。张庄人吃的不是别人劳动所生产的现成的粮食，而是他们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买调味品和买菜的钱是他们自己挣的。

供给食堂的粮食和资金越多，每户分到的粮和现金就越少。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免费供应意味着不管哪种粮食都按人头供应，大家都一样，不考虑挣工分的多少，也就是说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关于粮食，张庄起初是部分地后来是全部地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实际上是一种平均的形式，张庄大队的每个人都分到同样数量的粮食，不考虑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力气等其他因素。当然有些人非常欢迎这种分配形式，更欢迎粮食大丰收的年景，因为这时粮食不成问题，不像在灾荒年，粮食成了严重的问题，收得农民的口粮不能维持生活。遇上灾荒年，那些勤劳的村民、贡献大的人，对缺少劳力的家庭和个人与他们共享劳动果实不满，这些人也就懒得劳动了。

平均分配、免费供应还带来一些浪费。因为有的家庭即使根本吃不了也要把分配给他的全部拿回家。

在“大跃进”后的重新调整、紧缩、节约运动中，长治市的领导不止一次到张庄了解粮食供给和公共食堂的问题。他们召开群众会议收集意见，听到了许多抱怨，有的人抱怨说公共食堂吃饭时间和饭菜安排得不够灵活，不给做病号饭，还浪费粮食。有了这些批评意见后，

有的群众退出了食堂，但大多数没退。公共食堂最后在反对“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命令风、共产风的运动中停办了，张庄的公共食堂是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60条)发表后停办的。

显然，1958年公共食堂的建立，确实满足了一些实际的需要，许多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事物比公共食堂更早地消失了。张庄的公共食堂比别的地方维持得更长，不过在长治管辖的地方内至少有一个大队的公共食堂一直没有停办，1971年小宋大队的公共食堂仍为全体社员免费供应饭菜，不管工分挣多少，一律平均供给。

三十四 共产风

直到今天张庄仍然有拥护“大跃进”的人，他们认为“大跃进”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运动，在这个时期，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人人都满怀希望、精神饱满地走出家门去干重要的事情。

“大跃进”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到最后的低落、畏缩不前，到最终失败，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由于“共产风”。自然灾害造成了粮食欠收、食物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饥荒，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就不可能搞大工程，“共产风”使物质刺激丧失了作用，使积极主动变成了消极被动，并搞垮了许多在自然灾害后的继续维持的各种生产及建设工程。

“共产风”这种不可抗拒的“绝对平均”的力量成了利用上级决定，不顾财产所有权，大范围调拨劳力和生产工具的借口，哪怕是生产队和大队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也不顾，上面的人要求农民为一项对本地本村根本无利的工程提供人力和物力。这个叫平调，从一个村向另一个村调拨物资和劳力是要缩小差别，保证合理分配。实际上，一些地方享受的“待遇”比另一些地方的“待遇”明显地“超平均”。村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村干部常扩大免费供应的范围，从免费食物到7种生活必需项目——吃、穿、生孩子、教育、医疗保健、结婚及丧葬费用全部免费，有些地方还增加了更多的免费项目如住房、燃料、洗澡、理发，甚至看戏看电影都免费，有了如此多的免费供给，

大队留下的供分配劳动工分的资金就少了。需要变成了分配的唯一标准，很可能不干活的人比干工作的人得到的好处还多。

实际上“共产风”不久就发展到不只是平均主义了，它引起了四种逆流，给“大跃进”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只要“共产风”一刮，“瞎指挥风”、“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就接踵而来。这几股风一起刮来，“绝对平均主义”又几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干部们向上级汇报虚报产量，兴建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工程，把失败的工程及项目说成是成功和胜利，任何对数字有怀疑、对决策有疑问的人统统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会受到大众的批判，甚至被撤职、降职或判刑。

1958年“四风”中刮得最厉害，影响最大的是“浮夸风”。下面是陈永贵讲起的“浮夸风”刮到大寨时的一些情况：

“大跃进”在大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秋天，地区招集全区的先进单位开会，我代表大寨参加了这次会议。乡亲们高兴地送我去开会，因为大伙觉得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年内我们的粮食亩产就增加了200斤，1958年比1957年总增产15万斤，平均每人比1957年多产粮食500斤，大寨的贫下中农很高兴，他们的欢乐和愉快就像张飞胡子——满脸。

结果才知道，这次会议根本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会上得“浮夸风”刮得很厉害。收100斤就报1000斤，我简直想象不到会有这种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每亩收成才达到540斤，可有的地方报的比我们还多，出现了许多“卫星”大队，结果全县的亩产超过了1000斤，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大寨人说你们是先进，可你们亩产才540斤，这根本上不了数，你们不能当先进，你们没啥先进的东西。”

有一个“卫星”大队亩产量就报了3.3万斤，亩产1000斤的县，亩产1万斤的公社比比皆是，大寨确实上不了先进的数。“谁理你那540斤？”

老地委、老县委们想尽力帮助我们，他们劝我把数字改成亩产2000斤，只有这样改动一下我们才能继续当先进，我们该怎么办？改还是不改？如果改了就可以当先进，我认真真考虑着。我想，我是个农民，会不知道每亩能产多少粮吗？如果把数字改了，我们就可以拿到“先进大队”的红旗，可如果把数字改了，我们村的阶级敌人——

地主、富农将怎样看我们？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说谎、夸了口，地主们会说些什么？他们知道我们的亩产量是540斤。我还在为我自己想，我已经40出头了，如果报了2000斤我怎样向贫下中农们交待？就是到死也对不起大伙呀。我又想，共产党员不能说谎，我不能那样做。

县委的人发火了，他们说：“如果你不改数字就不能当先进！”我说：“如果你们报了假数字，即使当了先进，你们早晚要垮。”他们要我去向那些“先进”单位学习学习，我说：“好，我愿意去向他们学习。”领导们并不相信那些“先进”大队的产量确实有那么高，他们让我们向这些“先进”学习，实际上只是想让我们把数字改大一点，以此取悦于上级领导。

他们把所有的“先进”单位召集在一起，总共有几十个，把我们这种当不了先进的所谓“后进”单位叫去向他们学习。有些“后进”单位对“先进”单位特别尊重，他们虚心地向人家学习怎样耕种，每亩地用多少种子等。可我由于有情绪就什么也没问，把头仰起闭着眼睛。有一个玉米“卫星”说，他们每亩种3000棵，收3.3万斤，每棵产量超过11斤。我想，这种事儿，不管你怎么学，怎么研究，就是把自己杀了也收不了那么多呀。我不是外行，我是个农民，也许对其他了解的不多，但对玉米我至少还知道点儿。

他们批评了我，看我不向人家学习，说我太骄傲，不过没有点名批评，只是说：“有些人太骄傲了，不虚心向别人学习，骄傲得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所有的“先进”大队都得了“特等奖”，县委奖励了12辆卡车，亩产数字更高的还得到了拖拉机，这些单位还要派代表去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所有得到“特别奖”的单位都要派代表去，多光荣啊！可是我们没当上先进，觉得灰溜溜的，我多想见见毛主席，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可是他们却把我留下了。我们县西寨公社的领导因为亩产燕麦3800斤去了北京，他们带着“燕麦大王”的称号到北京开英模大会去了。为了安慰那些被留下的“后进”单位，县委领导组织了一次“工农联欢”，他们选我当农民代表团的团长和工人们一起联欢，我不想去，我想参加那个到北京去的代表团，去见毛主席。但我们的成绩太少，资格不够，我只有返回大寨去做出更大的成绩将来才有可能

见到毛主席。我非常失望，有一个干部试图为我解释，他说：“你不应该这样，那些大队去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成绩。”

“不对，”我说：“一点儿也不对！”

“别这么说，”他说：“这样会把事情搞糟的。”

我很理解他，所以对他说：“好，我只对你说，跟其他人谁也不说。”

陈永贵很好客，特别欢迎那些对中国农村问题感兴趣的客人，他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就像打开了故事的闸门流出了故事，夹杂着自我批评、感叹、关于哲学的沉思等等。在阐述某种观点时，他边讲边用手势比划着，脸上的表情迅速地变化着。这是一张粗糙的脸，就像虎头山上一块峻峭的岩石粗犷而坚毅，然而却是非常富于表情的，这使我想起了法国伟大的喜剧大师——弗南多尔，一会儿是那般的严肃悲惨，一会儿又使人捧腹大笑，真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他的头上总是按太行山的习惯系一块白毛巾，即使在北京也是这样，哪怕参加全国人代会也不例外。后来他到了城里工作，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陈永贵的嗓音深沉而沙哑，毫无疑问他的声带也像他的手指一样被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熏成了黑黄色。他讲话的嗓音就好像在对另一个深谷里开石头的人喊话喊得太多而变嘶哑了。

他是纯粹的晋阳口音，重而生硬，没有多少声调和语调的变化。然而他肚子里的词汇却非常丰富，我从没见过谁的词汇量超过他。他善于比喻，爱用方言，爱模仿，如敲门——咚、咚，失望了——灰溜溜的；灰心了——哎呀、呀呀，两手空空——像高粱秆，剥了秆儿，只有芯了；高兴了——张飞的胡子满脸，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没人敢摸；一项阴谋——黄鼠狼给鸡拜年。如果把陈永贵的话译成英语与原话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1958年随着“浮夸风”的刮起，“命令风”和“瞎指挥风”也刮了起来，陈永贵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1958年，我们和公社的领导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公社领导要修建一个占地14亩的万头猪场，修建这个猪场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可公社根本没有一头猪，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各大队调，所以养猪的大队都向公社交了猪。大寨大队养了300头猪，他们向我们调30—40头，我们不同意，后来他们又来调粮食，因为有了猪还需要

粮食喂呀。公社一级又不种粮，所以只能从各大队调。那次，我不在家，后来我及时赶了回来，回去后就去找贾承让，在门口听见他正在打电话，他说：“明天我们一定送去。”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就剩我们一家没交喂猪的粮食了。”我抢过话筒说：“我们一斤也不给！我们已经把粮食卖给了国家，公社无权再多要我们的粮食。”

“陈永贵同志不应该这样顽抗，”在一次支部会上有一名支委说：“他不应该这样与公社对着干，这样会给大队招来麻烦。”

但是在这次斗争中如果我们态度不坚决，就垮了。其他大队按要求做了，他们把公社要求交的猪和粮都交了，可我们没有，我们没交一头猪一斤粮，这是符合政策的。公社是一个大集体，下属的是大队或更小的生产机构——生产队，大集体不发展生产只是从小集体要，从小集体调拨财物，我们必须反对。

因为我们拒绝交猪交粮，公社领导说：“大寨的干部们骄傲得不得了，没人能领导得了，他们谁的话也不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没人敢摸。”

其实我们的所做所为根本扯不到什么骄傲，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他们要这要那(无偿调拨集体财产)都被我们拒绝了。

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说我们不服从领导。

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生产，却到处瞎指挥，发号施令，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他们说把切碎的玉米秆和种子搅在一起播种能夺取丰收，并在全县推广这种经验。那几天我正在阳泉开一个干部会，我们大队派同志把我叫回去，他说：“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可顶不住，上面要我们在限定时间内用这种办法播种 200 亩，如果我们不照办，人家就要敲锣打鼓来把咱的红旗拿走。县里的干部说在这项任务上我们已经落了后，所以要我们派 300 个人把红旗给别的大队送去。”

“我一个人就拿得动那杆红旗，”我说：“不需要派 300 人。”

我情绪很不好，我借口想离开会场准备回家，可他们不让我走。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会上的伙食很差劲儿，由于心情不好我吃不下饭，他们以为是饭不好，就问我：“你不舒服？”“是不是吃不下这里的饭？”他们要厨房给我做了病号饭，可我说：“我不需要好吃的，我满肚子是气。”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沿路的人正在播种，他们正把切碎的玉米秆和种子一起种在地里。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干？”

他们说：“上头命令这么干的。我们又不像你们大寨人。我们不敢违抗命令。”

回到大寨，我们的人也在这么干，我让立即停止。我们不得不重新返工，结果我们按老办法把地种上了。我告诉大家，有些干部在瞎指挥，我们一定要动脑筋，不能盲目服从。

后来才知道我一离开会场，阳泉的一位干部就打电话给我们公社的领导，要他们赶快亲自去把大寨的红旗拿掉，他们害怕我自己会把红旗拿上送到另一个大队去，所以等我到家时，大寨已经没有了红旗飘扬了。

然而，当这种错误的指示被否定后，还是那些干部又批评别的大队当时不像大寨一样顶着干。

真是官僚！

“浮夸风”并不是从下面的农民中刮起来的。1958年8月，省地领导又批评我们说：“你们也不看看报纸，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卫星’上天，可你们却无动于衷。”下面的人说：“不敢轻易相信。”可上面的人说：“我们看到了人家的丰收并参加了人家的收割，报道还能有错？”

当时有句口号叫“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粮食是领头马，其他要跟着走。我们县在省里头受到了批评，说我们“既没有一马当先，也没有万马奔腾”。为了紧跟这条口号，有些人就作假汇报，空话连篇。

从上面来的干部到较先进的大队去煽风，“浮夸风”因此越刮越厉害。那些“先进”大队的人盲目听从他们的指挥，对他们的指示言听计从。

拿“燕麦大王”为例，我姐姐就住在这个大队。我问她亩产是否真有3800斤，她说：“没有，恐怕连380斤也没有。”又说成立合作社前她有一块地是靠近河滩的一块好地，亩产才只有200斤，如果你能产上240斤那就相当不错了。可上面来的人刮了一夏天的“浮夸风”，他们汇报时说多少多少地产了多少多少粮，汇报一次加一次，每次汇报都比前一次多，全是无耻的浮夸。开始他们要说亩产5000斤，可公社领导说那太多，最后只说了3800斤。

另一个办法是省委一些干部下来找一个“先进”单位，在报纸上登出他们产量的假数字，然后人们就会说：“他们能干的，我们为什

么不能干？”于是他们就开始绑了一个“跃进马”，越绑越大，大到一辆大车都拉不下，以此来表示“一马当先”。

这股风不是从上面刮下来的，那是从哪刮来的？它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他们报的粮食根本不存在，全是空数字，国家整个的计划都被搞乱了。工厂和其他单位要依靠真正的粮食来发展生产，不是靠纸上的数字。为什么最后在1959年上面又进行了全面清查？因为他们下来看实际上没有什么粮食，然后他们不得不做一番调查，了解粮食都哪儿去了？

那些抛出浮夸数字的人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们鼓吹水稻密植，说种植的密度要稠到一个人从地里长着的水稻上走过去掉不下来；他们还说麦田的密度要稠到一颗鸡蛋放在地里长着的麦穗上掉不到地上为止。这种宣传不会来自下面，下面是老百姓，他们知道实情，他们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只有官僚说出这样的话。下面讲求实际的人决不会想出或决不敢说这样的话。在大寨发生的桩桩件件也充分说明这是上面刮下来的。我们的亩产是540斤，可他们要我们说成2,000斤，还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改动数字，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吗？下面的群众反对浮夸，可上面的人太官僚，他们不关心下面的情况，只有粮食短缺了才下来了解实情，可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浮夸风”只有坏处，一点好处也没有。

有些人害怕丢了自己的官位，不敢维护真理，反对错误，所以“瞎指挥风”就顺顺当当地刮了下来。“学习先进经验，每亩播种500斤”，下面的群众表示反对，不照办，于是上面就批评他们，当官的告诉他们不要太保守了，“每亩种500斤是件好事。如果你种了500斤种子，即使每斤收回3斤，每亩还能收1500斤哩。”

这股风刮得这么厉害，我们也有一点摇摆。我们没有坚决反对，因为我们挨得批评太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们也按这种办了种了1/5亩。按老播种法，我们每亩用种子从来没超过200斤，更不用说500斤了。所以我们耕了地，把种子倒了进去，在我们面前的好像是露天粮库。我们还密植了1/10亩麦子，这种密植法每亩需种子200斤，可秋后我们的收成是每亩90斤。开始我们想这次下个大赌注，可现在事实告诉我们，这些人至少根本不懂农业。

简单地看，我们只能怀疑他们的能力，但如果从其他方面去看，

人们就会问，他们那么傻？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干？

从上面我举到的这些荒唐例子中你可以看出“瞎指挥风”就像在我们县下了一场冰雹。

三十五 万亩方

大寨在晋中的昔阳县，但“五风”也刮到了晋东南的长治市，刮到别的地区，“共产风”一刮起来，不仅吹毁了山西，而且吹毁了全国。

“在中国一直刮着政治风，”张庄宣传队的王京和说：“群众运动越达到高潮，风就刮得越凶。总的来说，大部分人跟着风向走，风往哪边刮，他们就往哪边倒。就像中国的丧葬仪式一样，吹号的走在前头，全家人哭嚎着紧随其后，街角站满了人，他们并不是来表示对死者的敬意，而是来听音乐，他们为吹鼓手精湛的吹奏欢呼喝采，那些哭天抹泪的人也无法继续拉长脸大声哭嚎了，终于他们也加入了喝采的人群，一个小男孩噙泣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黄瓜咬了一大口，突然鼓起掌来。追悼仪式开始后每个人都哀悼，但当喝采声响起时，所有的人都欢呼。”

我表示不理解“但如果有人受到了伤害，肯定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吧？”

“下面的人有时也发牢骚，但当领导的说：‘我们把意见公开一下’时，基层干部吓得马上说：‘谁？我？噢，不，我没有任何意见。人家会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会说咱是落后分子。别人喊我也喊，别人不喊我可不带头喊，我不想当出头鸟。’”

“实际上，”王京说：“像‘瞎指挥’这种现象，大都是从小的方面开始的，就像公社领导号召农民种葱一样：去年夏天，公社一个生产会议快散会时党委书记突然说：‘葱很重要，现在正是种葱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种子，每个生产队都应该种’。”

“可后来既没有学习也没有讲座，人们都不清楚什么时候种，在什么地方种、种多少。有些大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去种葱，所以大量的种子根本没有种到地里，有些种子没长出来，即使有长出来的也

很不好，这就是发号施令‘瞎指挥’的结果。没有时间、地点等具体的计划和安排，就很难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年春天，公社领导又号召打井，张庄打了7口井才算交差。号召打井是为了灌溉农田，尽管井打了，可农田却没有灌溉，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平整工地。一口井要花许多钱，光砖就得2万块，但没见有人用过新井水。只要有人响应号召就行，没有人真正关心结果怎样。这就叫劳民伤财，到最后是一无所获。”

很难说“共产风”是什么时候刮到张庄的。1958年秋天，“共产风”越刮越凶，1959年春天到达高峰。这年春天，大队计划同时大规模地修造一块万亩方，建造一个万头猪场，深翻土地，极度密植，这些计划最终都失败了。尽管这些行动都失败了，但由于10年前地里积蓄了丰实的肥料，这一年的收成还说得过去。严重的是1960年，整个山区严重干旱，全区粮食欠收，人民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正是这一年，“共产风”刮得最厉害。

张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修造万亩方工程。修造万亩方是要把劳力、农具、农家肥集中在一块最好、最肥沃的土地上，因而能够最有效最集中地发挥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的专长。有些技术人员认为这样的集中能带来粮食产量的突破。总产量会大大超出传统分散办法的产量。

这次办法源于位于黄河东面土地贫瘠的吕梁山区，那儿的人对每亩地只收一斗多粮食感到厌烦了，他们放弃了贫瘠的山地，集中精力耕种最好的土地，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它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承认，称之为“基本农田计划”——砍掉土地，增加产量。

长治市的领导在晋南稷山县看到了这个计划的实施情况。长治的市、县、大队干部一行，包括民主的陆晋中到晋南去参观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工作，汽车正好穿过稷山县经过特殊治理的万亩方。长得特别好的庄稼和平整的土地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来后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市级干部大会，会上决定以东风公社为试点，也修造一块万亩方。

为了开辟万亩方，公社领导指定张庄、马厂、高家庄和王公庄都参加这项工程，一开始就命令把这4个村所有的劳力和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万亩方中心的约2000亩土地上，他们认为这块大田的亩产

能达到1500~2000斤，这样不仅可以弥补被放弃的土地的产量，而且还要有剩余。

他们要求张庄和其他三个村的农民把村里所有的农家肥都送到以高家庄为中心的大而平整的土地上去。

“那儿没有我们的土地，”张兴发说：“我们确实不愿意把我们的粪送到那儿去，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想，如果这块地真能亩产2000斤，我们就靠它了。不过我们还尽量抽空种家里的地，只是以防万一。但公社领导说：‘不要操心家里的地了，不管哪个村缺了什么，我们都会给补上的。’”

“我们说：‘既然如此，如果缺了粮食，我们可要向公社要了。’”

“没一个真正相信那块地能产那么多粮，可我们还得把粪送过去，因为他们把地分成了块，每村一块，还要检查每亩浇了多少茅粪，上了多少堆肥，没办法逃脱，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由6辆粪罐车组成的车队往那儿拉粪，冬天才过了一半就几乎把所有的粪都掏完了。”

社员们刚完成了送肥任务不久，这个计划就夭折了。春节过后两个星期，中央来了一个指示，说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大队、公社，生产任务主要应放在生产队一级。

按照这个指示东风公社很快就解散了，所有大规模的集体工程计划都随之破产，各个大队又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在张庄，”兴发继续说：“我们把厕所剩的茅粪都掏尽挖干，把粪拉到了地里，想方设法种上我们能种的地。”

长治市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那年张庄的粮食平均亩产是205斤。大队会计申记财的记录却说他们亩产只有160斤，1960斤的情况更糟，由于全区严重干旱，平均亩产只有138斤，略高于土改前的亩产量。

高家庄虽然沾了各村粪肥的光，但产量也并不高，尽管肥很足，但由于不能灌溉，天气又干旱，土地严重缺水。在农业生产的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八项措施中，这里的土地只占了1项——肥，结果粮食亩产不是1500斤，只有240斤。

几乎在修造万亩方的同时，公社又发出了修建万头猪场的指示，他们说如果集中能使粮食破产量纪录，那就能使猪的产量也破纪录。这个计划是要把东风公社大部分的猪集中在一个地方，给予它们最好的饲料、最好的兽医，最好的管理，这样就能使分散的家庭饲养很快

跃为大规模的集中饲养，这样才无愧于“社会主义”的称号。

因为不像屯留县一样家家户户至少养一头猪，张庄的猪很少，相邻的大队也没有养猪的传统，所以没法为这个万头猪场做出太大的贡献。突然，有一天，一个由省、地、市干部组成的高级检查团要来检查。半夜，公社党委书记贾逢斌给张庄党支部书记真宽打电话，要他必须在次日早晨6点以前摆起一个正在修猪场的架式，“要搭起大门什么的，让大家看见我们正在搞。”

真宽派人到北舍去请了一位专门搭戏台的师傅，花了10块钱半个晚上就搭起了一个弓形大门，社员们用红绸子、标语、口号、麦秸秆和红灯把弓形大门装饰了起来，并称为“跃进门”。

第二天早晨5点钟，真宽看见“跃进门”搭起来了，就回家睡去了。刚睡着，一个公社干部就来叫醒了他，“他们一会就来，”那个干部说：“最好是让全村人都上工去，要是人家来了，有人围着看，那影响多不好。”

6点了，贾逢斌打电话来问：“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从上面来的干部吃饱饭，上了车，约8点才离开公社大院，他们乘坐的卡车一路南行，穿过了马厂向高家庄方面开来，汽车穿过万亩方“跃进门”前，但没进张庄村。

贾书记挥动着手臂说：“这是我们的万亩方，这是万头猪场的大门。”汽车没有减速，根本没有停下来意思，甚至根本没人想下车来看看这个“跃进门”里面是什么，他们轻信了贾书记的话，消失在尘土弥漫的公路上。

不久公社就传话来，把“跃进门”拆掉，于是真宽带了几个人去把它拆了。但这并不是万头猪场的结果，张庄人确实在“跃进门”里修了一些猪圈，但由于找不到猪，所以也就放弃了，后来猪圈的土墙慢慢地荡然无存了。

“这些从上头来的检查者，”兴发说：“坐在办公室里听着生动的汇报，什么万亩方，什么万头猪场，然后大吃大喝一顿，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是刘少奇刮的歪风。”

由于这股歪风刮得相当厉害，张庄还给黄碾的万匹马场送去了两匹最好的母马，这两匹母马在那儿待了一年半，其中还有一匹生下了

一匹小马驹。养马场解散后，给张庄送回了三匹而不是两匹马。

1959年，不仅有种种施肥集中养猪的号召，还有集中种植的口号。公社干部要求每个大队拿出一块地来做试验田，在里面搞密植，号召说：“种100，收1万，种200，收2万。”

“人们说这是吹牛，”真宽说：“1万斤粮食在一亩地里怎么长？可谁也不敢反对。如果你反对，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我们没种那么稠，因为大伙都强烈反对，到了春天谷苗长出来了，就像人的头发，我们让大伙间了许多，但即使这样，也没长成。”

和密植同时进行的还有深翻。这是河南的一个大队推荐的先进技术。王京和去河南参观，那儿的人们用铁锹把表层约7寸厚的土翻到一边，中间犁出一条垄沟，再把翻出来的底层土填进约1尺厚，犁过之后再上面盖一层表层土，再盖一层底层土，再犁再盖。用这种办法他们把整块土地都深翻了约1尺半，不过没有把底层生土翻到表面或推到垄边。据说这样做大幅度提高了产量，因为深翻不仅改善了土壤通风条件，而且水易渗透，有利于庄稼扎根。在河南每年有1/3的土地用这种办法耕种，结果连续好几年粮食产量都很高。

王京和在河南了解深翻的情况时，听说山西人也学会了深翻，他们不只深翻1尺而是3尺。于是他就问河南人，他们很惊讶，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深翻3尺。当王京和返回长治时，同事们告诉他深翻1尺已落后了，现在的口号是：翻地3尺深，亩产夺万斤！

为了在东风公社实施这种办法，长治市来了一个工作队在公路边深翻土地，他们翻的地是张庄的，足足翻了一米多深，但并不太细心，他们把底层土都翻到了表面，幸好没翻完就又翻了，才翻了几亩就接到了要修万亩方的电话，于是他们丢下手里的活忙着去搞万亩方大工程了，这工程刚开始又号召搞万头猪场，长治的干部们只好又去修猪圈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混乱情景，”贵才说：“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开始我们在公路边搞深翻，后来又跑到万亩方里刨玉米茬为犁地做准备，我们刚到那儿，又说要修万头猪场。”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

在1958年异常欢欣鼓舞的时期，人们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敢想，对被唤起的农民来说，世界上好像没有他们不能实现的目标。有一个大队的党支书计划买一辆卡车，一段时间后，当他因右倾保守受到批

判时，他说：“好，那我们就买架飞机！”

柴坊菜场的党支部书记认为，既然他和他的集体正在走共产主义大道，那就应该现代化一点，于是就买了一辆小轿车。那是一辆波兰车，是从华沙进口的，他们买车来显示他的大队的富裕，但他从未敢坐上开出来。因为当时市委也没有一辆车敢跟他比，他怕坐上这车太显眼，最后又决定把车卖了。支书老曹因为这辆车被人取笑了好几年。

“老曹，借咱用用你的华沙车吧？”1959年春节，人群中有人这样说。

“谁说的？”老曹反驳道：“你怎么还提这事儿。”

他希望人们忘掉他的波兰车，越快越好。

地区的干部们在计划修建漳泽水库时就决定要在水库岸上修建许多高质量的先进的楼房，但最终一幢也没修起来。然而马厂的人却决定要修一座大礼堂，干部们要求各家各户为这个工程捐一根木头，这样就为公共建设调拨了大量的私人木材。他们计划把大礼堂修在一个湖边。在公社党委的指挥下，几百号人付出了很苦的劳动才挖出了一个人造湖。他们在湖里养了鱼，在湖的四周，东西南北各垒了一堵高墙，各边还留了门。不幸的是这一切都在冬天干的，到了第二年春天，大地解冻后，墙就塌了。

三十六 最大的受害者

在“共产风”高压的日子里，干部们搞浮夸，甚至说谎，正像一首顺口溜讲的一样：

报告打得顶呱呱，
当官的脸上乐开花，
尽管撒了许多谎，
心里一点不发慌，
你尽管撒你的谎，
干部觉得很荣光。

公社干部们骂张庄的郭真宽是“右倾”，因为他老爱讲实话。1958年，一位公社干部带了一位市里的干部到张庄了解深翻土地的情况。

公社干部说：“这块地已经深翻了一尺半。”

真宽把手插进土里试了试说最多也不过4~5寸，这位公社干部马上就变了脸，生气了。上面的干部一走他就狠狠地批评了真宽。

回到大队，张兴发也批评了真宽。

“你为什么要告诉人家地只翻了4~5寸？”

“这是真的呀！”

“他说有一尺半，你就说有一尺半，何必自找麻烦？”

“可我我说的是实话呀。”

“如果你还坚持说实话，那你只能挨人家的骂。”

张兴发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春天，公社书记打电话来问他们每亩地上了多少茅粪。

真宽说：“我们把粪拉到万亩方里了，茅房里已经没粪了。”

“唉，怎么这样说，”兴发压低声音悄悄抗议：“告诉他拉够了，没人会来检查的。报给他一个大数目，不能说实话。他在电话那头不会知道的。告诉他咱们每亩上了5000~6000斤粪。如果你告诉他实情会自找麻烦的。他是大土豆，而我们不过是小土豆片。”

“可我讲的是实话，我是客观的。”

“嗨，”兴发说：“客观的！最客观的就是要注意风向，见风使舵。如果他跟你来真的，你也跟他来真的，如果他只要空头支票，你就给他一张空的。”

然而，真宽太死心眼儿，他只认他那“客观”。有一次，他到公社开会讨论向国家多售粮的事。尽管张庄已按指标完成了售粮任务，但贾书记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已列的单子，要求张庄再交售3万斤。

“我们一粒也不多卖，我们不能再卖了，如果再卖就不够吃了。”

他回到家情绪很不好，张兴发问他出了什么事儿。

“他们让我们再卖3万斤，我没答应。”

“你怎么这样做？他们叫咱卖，咱就不能反对。”

“可是咱们不能再卖了！”真宽说：“下一次开会我不去了。”

“那好，”兴发说：“那就另派人去吧。”

届时，兴发自己去了。

会上贾书记问张兴发粮食准备好了没有，张兴发说准备好了，可会后他去了贾书记的办公室。

“你来干什么？”贾问。

“你要的3万斤我们有，可那是我们的口粮，我们总不能不吃吧。”

“那你们计划卖多少？”

“我们可以卖一些，1万斤怎么样？”

“至少2万斤，不能再少了。”

“2万斤太多了。”

“那就1.5万斤，绝对不能再少了。”

“1万斤吧？”

“滚出去！”

张庄大队的干部最后同意卖1.5万斤，但当他们统计了到夏收之前社员们还需要的粮食数量后发现，如果卖掉1.5万斤，就会有4万斤的缺口。

“最后，他们只好返还我们4万斤，”兴发说：“他们总不能让我们每人人口粮比上一年少，所以只好返还我们4万斤。开始，他们不相信我们没粮吃了，后来搞清楚我们的粮食确实不够吃了就返还了我们。”

就这样，张兴发采取迂回战术，完成了真宽走直道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真宽经常给公社贾书记不痛快，所以丢掉了大队书记的职务，贾书记把他调到了黄碾的铁匠社。因为这是个公社级单位，所以张庄的人都以为他是提升了，实际上贾让他靠边站是因为公社领导都认为他右倾。

随后，贾书记让张兴发接替了真宽的张庄大队支书职务，但这次他只干了10天。

“那会儿，”张兴发说：“工作和现在可大不一样。如果你不懂财政预算就什么也干不了，来了电话就得报一个数字，来一个当官的就得报一个数字，他们只要数字，没人到地里去检查，但如果你报不出数字，就会被人看不起。”

“电话来了，要求每亩地上100担堆肥。电话要求100担，我们就上90担，他们说：‘要上够，再上10担。可我们根本不理他那茬，然后他们又打电话问：‘你们现在上够了吗？’我们回答：‘够了，全上够了。’”

“每天我都得向公社书记报数字，他要生产数、收获数、库存粮数……有时在电话里要，有时要人去汇报，所以我不得不去马厂汇

报，最后我告诉他：‘我报不了这么多数字。’‘谁能？’他问。我说：‘陆晋中。’

“所以他们换上了陆晋中，他一直干到1966年。”

“不过贾书记很信任我，”张兴发说：“因为他想听什么我就告诉他什么，而且从来没有妨碍过他工作。当然，我们不敢浮夸得太厉害，我们必须慎重估计自己的粮食收成，估计过低会被说成右倾，估计过高就得多卖粮，因此实际上我们不想报得太高，宁可少报也不愿多报。”

所以极力浮夸粮食产量的是上面的干部，因为他们不必为吃粮操心。在那些产量报得很高的大队，社员们不得不把已经分到手的粮食再交回去。”

在“共产风”的影响下，比任何大工程的崩溃更严重的是群众信念的崩溃。他们看到的是相互冲突的命令，紧急的任务和最终的混乱。先合并后解散；先往万亩方送粪，后又回家种自己的地，先免费供应，后又无偿调拨。万亩方下马后，张庄的社员们回村只种了很少生长期短的作物，后来他们也有点灰心丧气了，因为半年的辛劳全付之东流，所以他们不再想苦干了。

尽管人们士气低落不是件好事，但最大的牺牲是失去讲实话的习惯。

夏天的庄稼虽然长得不太好，但还是成熟了，有人开始从地里偷庄稼。公共食堂还开办着，但社员从那里得到的只是稀糊糊，如果想多吃点粮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偷。

老天主教徒申全德编了几句顺口溜：

百人一队贼，百花来相会。

偷了邻居粮，实在是不对。

去偷公家粮，那可无所谓。

不羞也不愧，偷了大队偷小队。

如果不去偷几回，保我一定会后悔。

不管干活多受累，还是喂不饱你的嘴。

最好的办法告诉你，见到吃的往家背。

张庄大队受够了万亩方的苦，而别的大队，像安阳，由于拒绝交出牲畜和土地，顶住了“共产风”，所以没受多大损失。但公社干部却让安阳的王新年家（由于生于大年初一，所以取名叫新年）吃尽了苦

头。老王坚持说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没有让胡乱调拨，“你们瞎了眼，你们都在盲目瞎跑，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拒绝交出他的马、猪和地，他们给他脖子挂上牌子，说他是右倾，并拿走了他家大队需要的一切东西。安阳的马和猪是被抢走的，而张庄的却都是自己主动交出来的，包括茅粪，所以最后大家的地里连粪都没的上了。

“所以，那一年我们村的人都躺在炕上，动也不想动。”张兴发说：“他们不用操心什么生产不生产，他们说：‘让公社养活咱们吧。’”

那年春，整个长治市流行着一种靠公社和市政府的想法。他们说：“粮食收得多了就得交国家，反正我们也沾不上光，收少了不够吃，国家还会救济咱的。”所以他们不再关心庄稼长势如何，长成什么就收什么，如果头头来检查，就带他们去最好的地块看看，路过长得不好的地块，他们就说：“这块地不是我们的，是那一个村的。”

早在“大跃进”开始，东风公社实行工资制时人们就有了这种想法。那时候，公社所有的人每天都有三顿饭吃，外加2.5元的工资，即使根本不干活的人也享受同样的待遇。这种叫“三保证”的办法实行了一个月，公社的粮食和资金就所剩无几了，整个工资制度也垮了。但“三保证”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已经传开，农民们开始对“共产主义”表现出一种怀疑态度。从可以免费吃饭，整天躺在家里也可以有钱花开始，那些本来积极勤奋、努力工作的人也开始变懒了，因为大家觉得既然劳动不劳动都有吃有花，还干活做什么？

现在，虽然工资制度已废除了好长时间，大队社员得自食其力，但是这种想法仍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不过，如果说到私人企业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59年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张庄社员的工分值却比从前的高，甚至在以后的许多年工分值也没有这么高。那一年每个劳动日可值现金1.35元，这是人们根本没有预料不到的。其实他们是发了灾难财，张庄的干部和社员们不知不觉地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事情是这样的：万亩方下马后，张庄没有粪肥种庄稼，全区又一直干旱，这时公社（东风公社已解散，这儿指马厂）召开了一个会议，要求全力以赴抗旱救灾，并给每个大队分配了应急的生产任务。因为张

庄已打了好几口井，有几十亩水浇地，所以他们要求张庄集中精力种萝卜、白菜等蔬菜，还要求张庄在原有砖窑的基础上扩大砖瓦生产。会后，张庄安排了大批人力搞制砖，第二和第五生产队合并了他们的菜地种了300亩菜，其他队种50亩。

这些生产的收入很可观。因为各地仍在搞建设，砖的需求量很大，张庄人不仅挣制砖钱而且挣运砖钱，往公路对面的新水泥厂送1000块砖就挣60元。由于整个晋东南地区蔬菜奇缺，种菜就更赚了。平时茄子在城里1.2毛一斤，如今在地里就卖5毛，白菜和萝卜也是5毛一斤，社员分得蔬菜再转手卖时就更贵了。

那年头价格猛涨，又没有人监督重量和质量。在砖窑上250块砖就是一订，可这些砖订中有整砖还有半头砖，拉砖的人不管这些，反正接去了是公家用，负责接受砖的人也不多去过问，因为那年头砖太缺，所以他们不注意砖的数目，甚至对大量的半头砖也不多过问，再者，建筑单位急需建筑材料，所以根本不计较砖的价格。

卖菜人卖菜时一般都要算菜的重量，但在1959年，卖主和买主都不去费那个劲儿。张庄人只把他们的茄子、白菜、萝卜成堆地堆在地里，论堆估计重量。“这一堆1万斤，那一堆6000斤。”尽管他们是往高估，从未低出估，但买主总是二话不说付了钱担上菜就走。那时到农村来搜寻各种吃的东西的人太多了，有的人还通过“后门”和大队联系，要用远远超过国家规定1斤5毛的黑市价购买各种农副产品。

“那时候我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并不太强，”张兴发说：“只要卖了砖和萝卜能给大队多赚点钱我们就卖。管他妈的工厂，管他妈的顾客，我们要提高到最高限度。现在才知道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通过今天的教育我们回想以前，才发现有许多事情做的不对。今天人人都得讲真话，没有浮夸和撒谎的市场了。”

我认为他的话只是一种观点，一种上面的领导想让我听到的观点，而不是真实情况和事实的反映。总之，浮夸和撒谎不会消失得那么快。

1959年的情况正是这样。这是一个紧缩、分散、干旱的年头，但对张庄的农民来说这却是一个最富裕的年头。根据大队的统计，每个生产队都因卖砖卖菜赚了大钱，加上国家粮食局补给的4万斤粮食，张庄不仅有了足够的钱，而且有了足够的粮。慢慢地，形势稳定了，

生活改善了，张庄人的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共产风’确实让我们遭了殃。”真宽说，“如果‘共产风’再刮下去我们就得饿死。附近的村子饿死了许多人。那两年的情况比旧社会还遭。是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救济粮才救了我们的命。”

把送救济粮归功于毛泽东，只是真宽的认为，这种看法很自然地吧毛主席和中央联系在了一起，但事实上，在1959年人民需要救济粮的时候，毛泽东已不再是共和国的主席，似乎他在政治上正不得势。1930年代以来，他的领导地位面临着最严重的挑战。

1958年毛泽东仗他作为革命最高领导者的威望，一意孤行在全国发动并铺开了“大跃进”，鼓励暴风骤雨式地发展、扩大人民公社，并发动全民用土高炉大炼钢铁。这些运动一开始，经济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方面基层干部搞起了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小型的集体企业像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他们对大量的资金胡花乱用搞瞎指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企业成立不久就破产了，成熟的南瓜躺在地里无人去收，因为大家都去干“大事业”了。在这样一种浮夸每一项成绩的异常兴奋的气氛中，许多地方的生产不但没有搞上去，实际上是搞垮了。1958年11月-12月，党中央在武汉开会，面对已经十分严重的混乱局面，会议强调对人民公社必须进行重新评价，强调批判绝对平均主义，重申按劳分配的政策，据说会上同僚们劝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1959年7-8月间党中央到庐山开会。恶劣的气候使失衡和失控的形势更加严重，有些地方已濒临饥荒的边缘，有些地方已经发生饥荒。农业的危机严重影响了工业，引起了几乎所有日用品的短缺，中央不得不批评毛泽东宏伟蓝图的失败。

然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却把矛头指向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是一名有崇高威望的老兵，1928年，他27岁时就在湖南军阀何键的军队里领导了独立起义，并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后来又率部参加了毛泽东、朱德的队伍，一起在井冈山建立了红军。两年后作为红五军的军长，他率领这个军8千人击溃了何键的6万人，一举拿下了长沙城，并占领了该城10天。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率领第一方面军先到延安，与日军进行战斗，后又率部东渡黄河直入晋东南，在这儿建立了与长治相接的太行山根据地，

建立这个根据地后又扩大为晋冀鲁豫边区，边区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张庄像师才元这样的年轻人，1938年参加的八路军，实际上就是彭德怀的第八集团军，他加入的688团(红军的35团)属129师管辖，129师的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

林彪在朝鲜战争初期休息后，是彭德怀顶替了他的工作，一直在朝鲜指挥战斗，直到1953年双方停火谈判成功为止。

彭德怀在党内、军队和政府内的威望不靠任何人的提拔，他凭自己的赫赫战绩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他在人民和战士心目中的威望是极其崇高的，由于他在解放后仍和解放前一样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作为一名司令员他和自己的士兵们同甘共苦，不分你我，作为一名行政官员他的生活与普通的中国公民有密切的联系，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和人民的联系最紧密也最广泛。他最平易近人，在诸多到双桥来参观我教学的拖拉机学校的领导人当中，只有彭德怀坚持要坐拖拉机走一走，当时是我亲自为他作的安排。

在30年的战斗和建设生涯中，彭德怀将军也有自己的失误，最严重的是1939年在太行山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次大战由于过早地发动，过早地暴露了兵力，招致了惨重的失败，使抵抗运动退步了好几年。也许正是因为这次惨重的教训使得彭德怀将军对过早的行动、准备不充分的进攻特别敏感，使得他对“大跃进”的混乱的灾难比别的任何人都更感到痛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毛泽东把他提出来时他才敢于反驳，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据有的书说，他问自己的妻子：“毛主席能朝我喊，我为什么不能朝他喊？”彭德怀回应毛主席说：“你延安骂娘40天，我怎么不能骂娘20天？”彭德怀认为在中央他和别人一样，相互平等，彼此彼此。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认为这种灾祸主要是“主观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造成的，他指出只顾个人意志和一时的热情，不考虑物质基础和生产力的因素，企图把生产跃向一个高水平是完全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它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广泛支持，因为对他的观点及引用的事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几乎用同样的词句对“大跃进”进行了总结。

但不幸的是，那次会议关于“大跃进”问题的争论被中断了。正是彭德怀的正确批评在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指出了毛泽东的路线错误问题，如果毛主席接受了这个批评，承担了全国混乱的责任，那就会严重危及他领导中国的威信，也许还会迫使他辞职。在一个国家，如果国民放弃了封建礼节，放弃了对上级官员的尊敬，那就几乎一定会有新的统治者产生。但是，毛泽东和许多老同志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面对领导地位和威信的严重挑战，毛泽东说服刘少奇和邓小平与他一起向彭德怀展开全面进攻。当时刘和邓已开始负责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作为对毛泽东给予他们按自己的主张修订国家政策的权力的报答，刘和邓同意了毛对彭的指责。他们逐步使毛退居二线，而尽可能保持他的荣誉，而彭被他们不光彩地撤了职。

党的文件说彭德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他为首的有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他们攻击说他那受到钦佩的坦率、忠诚和俭朴是伪装的，是妄图得到人民的支持并以此分裂革命队伍，还说他是伪君子，说他是代表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的野心家。这些诽谤不但以讲话和文件的形式在党内传播，而且在1959年8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作了定论。这是迄今为止最高当局发出的谴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林彪，9月17日中央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由林彪取而代之了。

革命的领袖们通过帝王传统的交易方式调停了在庐山的对抗局面，一方面找到了最大失误的“替罪羊”，挽回了最高统治者的面子，另一方面剥夺了他的部分权力。这次交易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是不谋而合的。特别是明朝的嘉靖皇帝罢海瑞的官与庐山会议的情景是何等相似，这次事件对彭德怀及其同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次极其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抗战前的西安，这次蒋介石作出了妥协使国共得以合作一致抗击日军的入侵。

1936年，蒋介石到西安强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向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发动进攻，但这两位将军不想再杀中国人，他们要调转枪口打日本，蒋介石不答应，他们就把蒋抓了起来，并威胁要杀死他。毛泽东派周恩来来到西安进行谈判，释放了蒋介石，救了他一命，蒋介石同意放弃对共产党的进攻，共产党同意放弃土地革命，双方一致同意共

同抗日。但为了挽回面子为了维护蒋的威信，张学良要把他送回南京。尽管在中国当时的形势下张学良将军的所作所为是绝对正确的，他向最高统帅的内战命令提出的挑战，向蒋介石提出应该重点抗日的要求都是十分正确的，但他还是因为不服从指挥受到了惩罚，这是一桩叛逆案。如果不把张学良送交法庭，如果张学良不屈从，蒋介石就很难坐稳他的总统宝座。但对这位东北军的年轻将领来说来到南京就是一场悲剧，蒋介石再没有放他回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他被带到了台湾，仍受到软禁，现在他仍住在台湾，在那儿他过了近30年的软禁生活。

彭德怀在庐山当了某种牺牲品，毛泽东却保住了他的最高领导地位，保住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夺回所有的权力作好了准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猜测中跟着走。因为确立毛的威信一方面是当时国家稳定团结最必需的，因此也是全国人民最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有足够的支持者和政治洞察力。据说，如果哪怕是最基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会使整个党和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而且毛曾威胁说，如果不把彭德怀搞下去，他就要回农村组织新的游击队。不过，毛泽东自己已经放弃了国家主席的领导权，进入了半引退状态。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毛泽东和这次的合作者很可能是在几种最坏的情况中选择了最好的。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威信，特别是毛泽东的形象永远不能被轻易褫夺。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太高了，它破坏了党内民主，违背了党章，背叛了毛泽东提倡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彭德怀没有做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情，他没有在背后捅刀子，只是使用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权力向党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他的批评意见之所以受到重视也正是因为反映了实际情况。

然而，不幸的是，彭德怀的合法行为和正确观点威胁到了毛的地位，因此便成了不合法的。不能不说毛泽东在这次交易中的所作所为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党内许多有威望的领导人被赶了下来，而有些居心不良的阴谋家却趁机爬了上去。他们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却挫伤了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党的威信，破坏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庐山会议以后，几乎没有党员敢公正地评价自己，公正地评价别人。谁敢

保证会有人听取合理的意见？实际上为了维护掌权人的威信应该预先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需要，“风往那边刮”成了求是的第一标准。

不能不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但并不是说领导者之间没有政策和策略的分歧。毛泽东反对向他挑战的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一场政策的持久论战历经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一直打到毛泽东逝世，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庐山会议的悲剧发生在权威命令超越了政策，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都不敢讲实话，不敢对当的失误作出正确评价的时候，即使彭德怀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感到内疚、有罪、羞愧，并请求再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然而，如果认为政策和权力是两码事，那就太天真了。没有权力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贯彻下去，政策和权力之间确实有牵连，但也有区别。然而在庐山会议上权力却高高凌驾于政策之上，政策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一旦革命建立了自己的“帝位”，随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推举“帝王”，然后很快就会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正像孙逸仙总结的那样：“帝位总要引起斗争，国家经历的每一次动荡最初都是为了争夺帝位。在中国，过去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斗争都是围绕着谁来当皇帝的问题展开的。”

如果说庐山会议上的交易是一个挽回毛泽东面子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并没有使他们自己得以完全解脱，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否正确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下面的干部已经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搞成了极端平均和极度狂热，引起了全国的混乱，所以没人再去追问最初发动这场运动是不是错误的，是不是不切实际的，把中国平实的资源和大量的劳动力用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会有错？

现在人们批评，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不是“右”就是“左”。在战争时期与蒋介石“只联合不斗争”的政策使新四军 1939 年面临危机，“只斗争不联合”的政策则分裂了自己的革命队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土改运动中，那些对分地主财产及土地犹豫不决，或要给地主留一部分财产及土地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但对财产土地要绝对平均分配，哪怕是一只碗一双筷子也要绝对平均分配的政策，则更加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它们使不同成分的农民互相斗争，把中农划到了敌人的一边。

每一次运动总是产生自发的错误倾向歪曲了重要的政策，而合理的东西却起不到主导作用。例如有一些干部反对土改，最后的破坏就是极端没收和分配所有的财产，即使没有土地的穷人也得退还。同样，有一些干部反对“大跃进”，搞垮“大跃进”的最好办法就是煽起“一平二调风”、“瞎指挥风”、“浮夸风”，有能力煽起这几股风的人都能料想到全国的混乱，因此使自己的愿望如愿以偿。然后，“我就知道，”正确的预言家将会预言，形势将发展到另一个极端——个体生产、单干。毛的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攻击说，为了搞垮“大跃进”，是刘少奇把“大跃进”推上了极“左”的道路。不幸的是，这种攻击可能是一种愚蠢的发明，它们不会轻易地被人们所承认或否认。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对1949年以来蔓延的“左”的倾向这一中心问题提出过疑问——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发动群众运动纠正右的偏差，而从来没有动员人们去反对危害更大的“左”的倾向？当然，在革命的过程中左右摇摆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不管出现哪一种倾向，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都应该有充分的纠正偏差的准备和办法。



第四部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的斗争。……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 1955年



三十七 急救

1971年9月14日，东方刚刚发白，礼堂屋顶的大高音喇叭就开始活跃起来，开始只是辟辟啪啪地响，告诉人们已经通上电了，然后突然四面八方都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刺耳且狂欢的声音把全村人都吵醒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即使只奏曲子，歌词也早已自动跳出每个听众的脑海，一次次的重复已经成了唤醒人们的号角：“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张庄所有的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被唤醒了。因为关掉这个声音是不可能的，许多家的门角都安装了一个小喇叭，小喇叭与大队的播音室是连着的，只要大队一放音，家里的喇叭就响，因此，这支歌便成了催人起床的号角。不过也有许多家没有安小喇叭，所以大队每天早晨都要放“东方红”，提醒人们注意新的一天开始了，该起床了。

为了向全村播放“东方红”，大队会计每天早晨都要比其他人家早起一会儿，把频道定在指定的位置上，放好扩音器。“东方红”之后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上党地区，甚至每个大队都天天如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总是以一两条毛主席语录开头，1971年秋天最常播的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语录念完后常常是一些关于党的整风运动的指示，最常见的是毛泽东关于党的性质的语录：“我们的党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能够领导无产阶级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接着继续报道一些省市成立了新党委的消息，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伟大成就，国家最近的体育运动情况和最新的世界形势的重要发展，如越南人民的胜利，尼克松即将访华等等。

9月14日，高音喇叭比平常更早期地把我们吵醒了，在没有播放“东方红”之前，我们听到了大队医生的声音，秦三姜广播了一个紧急情况。

“喂，注意了，大家都注意了。张庄有两个小孩得了脑炎，昨天晚上已送进了医院。这种病是蚊子传播的，我们要发动群众开展一次灭蚊运动，要清除、清扫所有能孳生蚊子的地方。所有的小孩都要打预防针。我们希望大家都出来，消灭你看见的所有蚊子。屋子都要喷打敌敌畏，茅房都要撒‘六六六’，池塘里要放漂白粉，垃圾废物都要清除掉，水坑都要填起来。请大家6点以前带小孩来医疗所。如果发现可疑的症状请马上告诉我。”

“脑炎的症状是头痛得厉害，呕吐、高烧、脖子和四肢发硬。如果发现这些症状马上向我报告。大家出来吧，我们开始干吧。”

这个通知使我浑身直打寒战。我妹妹寒春和妹夫阳早昨天刚好从大寨来到张庄，还带着我的3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8岁，一个6岁。脑炎一旦流行，不仅对我的全家而且对整个张庄都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卡玛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顾不上洗脸、刷牙、梳头就直奔大队部。街上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他们拿着铁锹、扫帚、萝筐等一切可以用来打扫街道和院子、清除垃圾和废物的工具。

受大队监督的地富老婆、过去的国民党分子和从外迁移来的富农，正在张庄治安主任李来全的监视下忙着清理街右边的排水沟。

李来全喊着：“把张庄打扫得干干净净，保证张庄人民的健康！”接着又骂那些“坏分子”：“要求这些人每天早晨出来打扫街道，可如果你不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他们就不干。这可好，今天非干不可了。快干！快干！郭老太，你能不能快点？不许拉下一片树叶，要打扫得干干净净。”郭老太是富农郭春旺的老婆。

李来全看上去确实很凶，大概是为了显示他治安主任的威风，他的肩上还背了一支步枪。

民兵陆安和手里拿着步枪站在郭老太身边，接着李来全的话补充说：“今天我们要检查，谁干得不好要返工重干。你们平时要是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今天不就少麻烦了。你们这些狗日的，什么时候能学得老实点儿。”

有两个小脚妇女也在踉踉跄跄地跟着大伙一块干，她们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好像根本挥不动那专门为扫街巷、院子制作的特别大的扫帚。男人们把树叶扫在一起，装进柳条筐里，在晨风中他们有些发

抖，好像也拿不动手里的铁锹，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一个非常悲惨的团体。这些“坏分子”和旧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不再能威胁任何人了，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唯一的反抗办法就是磨蹭。

幸好，全村的大扫除没有依靠这一帮监督之下的“杂牌军”，秦医生的话已经发动起了所有的劳动力，社员齐心协力，不多时就完成了大扫除的任务。

我们在大队医疗所看到了秦医生，他正忙着准备给孩子们打预防针。他说，这个月早些时候，马厂就发现了好几例脑炎患者。张庄染上这个病的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是铁路工人的儿子，他曾去马厂找朋友玩，在那里被蚊子叮了一口。他被送到了长北铁路医院，这个医院在张庄向北约三里处。另一个患儿是大队电工李忠禄的儿子，忠禄最近往家里接电线，把门窗都打开了，于是蚊子便趁机而入，咬了他的孩子，不过一发现有脑炎的症状这孩子就被送到了长治市医院。

秦医生不仅备有预防脑炎的药，而且有预防破伤风、百日咳和麻疹的药。几天前他就储备了鲜血浆，为急救作准备，以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同时，他还要求各户户喷打敌敌畏，茅房撒‘六六六’，粪坑用漂白粉处理。他说，成年人喂上中药‘贯众草’汤就可获得脑炎的免疫力。他正在给我们做解弹的时候，一位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的年轻妇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血浆，她是贾淑仙医生，36岁，张庄人，是秦医生的徒弟。

秦三姜医生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脸上总挂着微笑，他是张庄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是当年总跟在我屁股后那一帮小家伙中的一员，当时他才6岁，他跟我学手指游戏，还记了几个英语单词。有一天，跟他闹着玩的时候，我把他放在一个小矮屋的顶上，他自己下不来了，就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我才把他抱下来。他喜欢音乐、诗歌、戏曲和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中他常放焰火。他搜集了许多民间歌曲、进行曲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歌曲，并且大部分歌词能够记得。当他发现我也能记得一些歌曲时，非常愿意同我一起唱：

太行山高又高， 百万民兵退英豪，
年轻的庄稼汉， 不怕敌人枪和刀，
每一枪都消灭一个敌人。

在所有的爱好中最突出的是，他是一名好医生。他不仅精通跟他

父亲秦丙逸学会的中医，而且对现代西医的基础知识和技术也很精通，他在公社和市里几个训练班里学过西医。

“我是跟父亲学的，”秦医生说：“他是搞中医的，搞了许多年，医术高超。1958年公社开了一个诊所，邀请我父亲去诊所工作，但他觉得自己已上了年纪就让我替他去了，那年我才17岁。我们在那里学的做的也都是中医，但每个星期下午上西医课，所以我就跟着学了一点西医，后来只要有西医进修班我就跟着学，每学一次我的西医知识就上一个台阶。现在我能做一些小手术，但不能开肠剖肚。”

从技术方面来讲，秦医生比一般大队一级医生的医术要高。我们认为，张庄有了他是非常幸运的，但又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在附近的那家大医院里当医生。

后来才知道秦医生曾在五区、马厂医院工作过。他负责管理周围村子里孩子的出生工作，并是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秦三姜就帮助给新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好的圣名，并悄悄地在洗礼时为孩子取两个名字——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名字让平时用，一个像彼得、玛丽这样的圣名让在家里或教徒中使用。“四清”运动中秦的这种行为被揭露了出来，因此被医院开除并遣返回张庄。公社的损失是大队的获得，张庄从此有了这一地区最好的本村医生。张庄的医疗所因此出了名，不仅本大队的社员到这儿来看病，就连周围七邻八村的人也到这儿来看病。实际上，外村人来看病的收入就够医疗所用了，而且还有剩余，所以好长时间张庄大队的社员看病是免费的。

按照1966年6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的农村医疗制度的要求，张庄的每个居民每年交1元钱的医疗费，可以在大队医疗所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包括诊断、打针、针灸和小手术、孕期检查和接生，医疗所只按半价收取药费，大部分药都是医疗所的工作人员自己炮制的中草药，但也备有一些像青霉素、四环素、土霉素、链霉素这样的抗菌素类药物，还有一些像磺胺、磺胺胍这样的抗菌效力较强的药物。

为了使社员们吃药时少花钱，秦医生和贾医生开了一块地，自己种起了草药，并花大量的时间到附近的山上采集野生草药。两位医生如在山上发现有他们最需要的草药，就教给年轻人识别这些草药的办法，然后组织大批的年青人上山去寻采。他们把采集到的大批草药收

集起来，分类晒干，包装好，送到长治市药材公司，用这些草药去换已加工好的草药，价格要比买低得多。最好的演员王玉梅在大队药房工作，她把西药分类放在一个木架上，干草药和炮制过的草药放在木头做的小抽屉里，沿屋子的后墙摆了好几个药柜，足有几百个小抽屉。王玉梅根据秦医生的处方标出药费。她说，张庄医疗所药房的中药一般只卖市场价的三分之一，而西药的价格也比十年前降低了大约一半。1958年青霉素的价格是每支3元，现在每支1元，四环素那时每片一角，现在5~6分钱。

秦医生和贾医生不仅教人们采药，还教他们如何进行田间紧急救护，这些医疗助手被称为“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平时在指定的地块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利用空闲时间学医，他们经常背一个简易药箱，农闲季节他们就参加一些定期学习，学习针灸和一些中医疗法，如白菜根能治头痛等。他们还学习如何给骨折病人上夹板，如何止血，如何做人工呼吸等。

“赤脚医生”只挣在地里劳动的工分，医疗所的三位脱产人员挣医疗工作的工分，秦医生每天10分，贾医生每天8分，王玉梅每天7分，他们的工分和口粮都靠大队补贴，工分的现钱包括医疗所和药房使用的现钱都靠大队副业队的收入。

想起1948年4月出生的那8个孩子，可怕的脐风夺走了7个孩子的生命，只有一个活了下来，我就问起了秦医生当时接生婆和产妇分娩的情况，他说，由于接生婆的接生办法不卫生，张庄人已不再用她们了，再也没人请接生婆接生了。不过有一个过去的接生婆到学校学习了卫生的接生法，所以继续接生一直到去世。后来秦医生就教贾医生学习妇产科，她学得又快又好，所以过去的几年中还没有死过一个活着生出来的婴儿，甚至那些出生时生命危险不会呼吸的婴儿，也通过实施人工呼吸和心脏推拿幸免一死。创造这些惊人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孕妇进行定期检查。那些胎位不正的孕妇都在合适的时间被送进了当地医院，这样就避免了十分紧急情况的发生。

贾医生还教给孕妇们一种分娩时无疼痛的办法，这个办法包括肌肉和呼吸练习。她有一个药箱，里面装着接生时必需的所有用具，一有人来叫接生，她背起药箱就去。如果无疼痛的办法不管用，她就用针灸的办法引起麻醉来达到给产妇止痛的目的，她还使用针灸的方法

来减轻产妇分娩后子宫收缩引起的疼痛。

过去由于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限制了张庄人口的增长。我们问，现在所有的婴儿都活了下来，怎样才能控制张庄人口的数量呢？秦医生给我们讲述了控制生育的整个过程——宣传、说服、教育、药片、节育环、避孕套、输卵结扎和切除术。但希望至少生一个男孩的旧观念使得许多家庭人口增多。上面宣传每个家庭最多能生两个孩子，但如果这两个孩子都是闺女，几乎所有的夫妻就还要继续生育，直到至少生出一个男孩为止。秦医生的老婆生了三个闺女，所以还要生育，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可她想一个儿子太孤单了，没个伴儿，所以就决定再生一个，结果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样，本应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理想的家庭，却发展成了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即使那些第一个就生了儿子的家庭也还想再多要几个孩子，因为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女儿，现在女儿不再像过去一样认为是家里的负担了，她们长到一定的年龄就可以出去劳动挣工分，开始为家里做贡献，甚至招一个女婿到女方家来也是可能的。过去，女儿总是要嫁出去了，可现在，因为张庄就在公路、铁路边，地理位置较好，许多地方的人都想到张庄来落户，通过结婚迁入张庄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张庄的人口出生率看来不会很快下降。婴儿死亡现象几乎已经杜绝，加上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村里人的寿命普遍延长，张庄的人口恐怕还会剧增。

秦医生还告诉我们，他们几乎已经控制了所有的传染病，从梅毒、淋病到天花、小儿麻痹和百日咳，他已不再为这些疾病的发生而担心，他希望再作一些努力消灭脑炎。既然预防和及时治疗都那么有效，我们问他，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小毛病？比如像脓疱这样的头皮症和皮肤病，还有沙眼、角膜炎这些眼病？

秦医生说，皮肤病在张庄很普遍，因为这里太潮湿，虽然1958年在大跃进时修了水库，但这里的水位仍在地下4尺左右，不仅屋里的地面饱受潮湿之苦，甚至墙壁都是潮湿的，潮湿的地面，潮湿的墙壁使屋子变得不结实，有时甚至会倒塌，这潮湿的环境是人们得皮肤病的主要原因。有的皮肤病用青霉素就可以治愈，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解决问题，对那些青霉素过敏的人就必须使用中草药来治疗，用蒲公英汤或蒲公英汁涂敷在皮肤上，不过这种办法需要好长时间

才能见效。

秦医生说，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村里人不太注意皮肤病，一旦患病也不及时治疗，等湿疹长了一脸才想起来该看看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已不太好治了。

眼病也是这样，人们得了沙眼也不太在意，或者只用菊花水洗一洗，直到严重到不能治疗的时候才想起来找医生。

秦医生说针灸治疗结膜炎是非常有效的，可人们总是不去看，不去治，所以疾病常常发展到不可治愈的程度。

9月14日早晨秦医生、贾医生二位大夫给全村所有6岁以下的儿童打了预防针，之后便去检查他们的灭蚊战役打得怎么样，很快就绕村一周视察完了前线，发现所有的水坑都被填上了，排水沟被清理了，垃圾废物被清除了，所有的家庭已经按要求喷洒了屋子和茅房，所以他们很快满意地回到了医疗所。

一场蚊子的歼灭战胜利完成了，再没有人得脑炎，两名脑炎患儿几天以后也痊愈出院了。1971年与1948年的医疗状况的差别和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的话，医疗方面的进步就可以证明整个革命是正义的、合理的。

三十八 丈夫与妻子、妻子与丈夫

第二天早晨，我们集中在治安主任申安怀的住处进行政治学习，内容像前几天一样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一直烦扰着高检察长的一个矛盾，是贫农小林家庭的不和。小林跟他妻子吵架是因为他妻子跟他母亲吵架，这两个妇女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所以高让小林的母亲搬出了小林两口子的房子，到另一个院子里自己住。不幸的是，搬出来并没有解决问题，小林的妻子仍跟小林吵架，原因是小林每月给他母亲5元钱生活费，她觉得给得太多了。

“是呀”，王京和把他新大衣的毛领子往上拽了拽，说：“矛盾有许多，但经济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申安怀说：“我也觉得他们的经济收入不多，但这总不是小林在家什么也不干的理由吧，他能帮她干点活，可他却什么也不干，家里

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了她的肩上。”

“这还是个经济问题，”王京和说：“如果他妻子每月挣80块钱，他就会围着妻子转，就不会不关心她，就会捧着，而不会不理她。”

“可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思想问题，”高检察长说：“是新旧意识的矛盾问题，是妇女地位与观念上新旧看法的矛盾问题。”

“但政治和经济，物质和意识是分不开的，”王京和反驳道：“经济仍然是基础。”

在申安怀看来这个看法有点像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但他仍承认这个看法适合小林的情况。他说：“他们都想多花点钱，小林在汽车修理厂干活，一月只能挣40块，20块用来还债了，因为好长时间了家里吃的是大队的粮，那会儿小林从一个邻居那儿借来钱付了大队的粮钱，现在，每个月他要还那个邻居20块，直到还清为止，因此，他就只剩下了20块，他给母亲5块让母亲和他前妻留下的孩子花，这孩子跟奶奶一起过。在厂里吃饭买饭票得花5元，这样就只剩下10块给他老婆了，他老婆觉得太少了。还有一个半月，因为误了3天工，他只给了老婆8块钱，他老婆以为他在骗她，以为他把那些钱给了他妈，不是给了他妈就是藏起来了，要不就是给了别人，再不就是胡花了。”

“难道我说得不对？”王京和说：“不管你提到哪一家，只要吵架，根子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是表面现象，政治问题才是根本。”高检察长说。

“怎么能这样说？经济是基础，如果它不是基础，那又是什么？”王抗议道。

“我认为最根本的仍是思想问题。”高检察长说。

“可他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你说因为他们钱不够花，可我认为即便钱够花了，他们还会因为买什么而吵架。难道说这不是思想问题？”高说：“以我看夫妻吵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现在已在一天天减少。”

“你说越来越少？”申安怀反对说：“我见到的却很多。”

“这些吵闹大都是因为经济问题。”王京和说。他仍顽固地坚持他的观点。

“那你们说，”高检察长反驳道：“每个人一个月挣上100块钱吵架

问题就会没有了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王说着，并仔细地考虑着：“那样的话，会解决一些问题，但矛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收入高了也还会有经济矛盾存在，也还会有各种不同思想的矛盾。”

“不过，”申安怀说：“陆素云的问题好像不是经济问题。”

陆素云是大队妇联主任，25岁，身材苗条，神态安详，长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两颊没有血色，她总是忧伤地在村里四处转悠，好像总在忙着完成大队分配给妇联会的两项任务——召集妇女们生产、学习。

“为什么陆素云这样孤独凄凉呢？”卡玛问。

“一方面，像药房的王玉梅一样，她住在婆婆家里，她要为婆婆干大部分的活计；另一方面，总也见不着丈夫的面，她丈夫在大同一家半导体收音机厂当工人，一年只回家住12天，她的丈夫根本不关心她，不把她放在心上，他在大同又勾搭上了一个姑娘。”

李老师说：“我要遇上这种情况也会不高兴的。”

“那他们当初为啥要结婚？那会儿不是自由结婚吗？”卡玛问。

“是的，他们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但他们的爱情发展并不顺利。”申安怀说，他对每个农民的私人生活好像总是了解得很多，“陆素云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她在张庄上了4年初小，然后又到马厂上了4年高小，14岁高小毕业后回到张庄给她哥看孩子，16岁就参加了第六生产队的田间劳动。两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为她和李德云搞对象不久就被取消了党员资格。”

“是她的丈夫吗？”

“是。”

“那，为什么和他搞对象就被取消了党员资格？”

这个故事很复杂。

李德云就是那个没有被狼吃掉的男孩。他的父亲，上中农李宏金就是那个在土地被合并到合作社以后由于过度伤心而丧命的顽固老头。老李头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李德云才9岁，是他的弟弟把这个孩子抚养大的。另一个弟弟李章治曾杀过一个八路军战士，并偷了这位战士的枪，后来又在军阀阎锡山的晋绥军中打仗，由于他的坏名声，全

家人都跟着遭了罪。

李德云和陆素云是一块儿上初小的，后来他在张庄读中学，还是中学生的時候他俩就相爱并订了婚。中学毕业后，李德云先是到长治学电工，后来又回到四川重庆学习，以后又到了省城太原，在太原的一个兵工厂参加了工作。他和厂里的一个姑娘相好了，便向素云提出要解除婚约，素云非常生气，“我们以前相处得一直很好，你为什么突然不要我了？”她写信问他。

“你要想来就来吧，”他回信说：“来容易可回去就难了。想想吧，我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阶级？我们怎么能结婚？”显然，他不想再维持他俩的关系了，不过真正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又有了相好的姑娘。

就在这个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有些大队社员说李德云死去的父亲有严重罪行，人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到碉堡里报告过党的地下活动情况，向敌人泄露了我方情报，因而导致了几名抗日战士被抓和被杀。全国胜利后，李德云的父亲突然又成了杀害乡亲的同谋者，这些罪行加上章治叔叔的罪行，整个家庭的未来看来将是一片漆黑。

张贵才代表党支部找陆素云谈话，竭力劝她解除与李德云的婚约，“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和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来往究竟是为了什么？”由于素云拒绝放弃她的结婚计划，其他党员不让她过整风“关”，在她回心转意之前，取消了她的党员资格。

党员、干部们的压力加上被抛弃的愤怒，陆素云给李德云工作的兵工厂写了一封信，信上讲了她的未婚夫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情况，大队还附了一封他们对李家的情况提出种种疑问的信。兵工厂的领导见信后，决定最好当机立断，于是他们把李德云调出了兵工厂，安排到了大同的一个普通工厂。和李德云相好的太原姑娘小李马上落井下石，她不愿意冒险和李德云这样的人相好下去，所以李德云也被人抛弃了。顶着政治上的乌云到了大同，李德云觉得和陆素云结婚看来也不算太坏。正当这时，他收到了叔叔的来信，张庄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各种指控像鸡毛一样满天飞。“形势对我们很严峻。如果你不与素云结婚，事情会更糟。她是个党员，是大队队委会成员，跟她扯上了关系，你就是有一百个黑点也能遮挡住。”

这可抓住了关键，于是李德云回到了张庄哀求素云和他结婚。那时，她虽然已经和汽车修理厂的一个工人交往着，但在心里她仍爱李德云，所以她推掉了那个工人，和李德云结了婚。但婚后他们并没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丈夫返回了大同仍去当工人，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对他感兴趣的姑娘。

这样的婚姻不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希望。从男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爱情的比赛。在被抛弃的极度痛苦中，陆素云迈向了爱情的坟墓，她把自己的爱情装进了棺材，深埋在了地下，现在她只是一个无人关心、无人问津的无足轻重的人。太不公平啦！

一切都是毫无目的的，对李德云父亲的指控也只是一种指控。即使那些指控都是真的，那也都是在德云出生好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能让他承担责任吗？真正的难题是他的上中农成份，但在张庄这个问题根本不容易解决。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婚姻已变成了现实，一切问题都逐渐消失了，党组织又恢复了素云的党员资格，张庄的妇女们还选她当了妇联主任。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已向好的方面转化。但这位年轻妇女心灵深处的创伤却并没有愈合。

我和卡玛与陆素云谈论妇女工作。

“我们带领妇女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组织她们参加集体劳动，”她说：“男人能做的事，我们妇女也都能做。”

“男人们也这样看吗？”

“是的，我们和他们学习同样的文章，我们也像男人们一样在会上发言。农忙季节，我们组织所有的女劳力参加种麦和秋收。除了老年妇女照看小孩外，所有的妇女都参加生产劳动。”

“你们为什么不办一个幼儿园？”

“实际上没有必要，农忙时办起来，农闲时就得解散。况且我们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和人员。我们的安排比较灵活，捆不死。再说农忙季节时间不长，忙完以后妇女们就又可以可以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缝衣服了。”

“办个幼儿园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吧。”

“主要是工分问题。别人给你看孩子，你总得给人家工分呀，大部分人觉得不值。老人临时帮忙照看一下孩子是一回事，可给人家工分就是另一回事了。”

卡玛问她对嫁到外村的妇女，如果仍呆在张庄她的孩子就分不到口粮这件事有什么新规定。

陆素云很乐意谈这件事。

“两年前的规定允许妇女呆在张庄，但所有出嫁了的年轻妇女都想留在这儿，村里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所以我们就决定不给那些嫁到外面的妇女生的孩子在张庄上户口，也不给他们分口粮。问题是张庄的人太多了，吃饭的人太多而劳动力则够，所以一旦出嫁到外村，我们就劝她们离开张庄。”

“她们的丈夫能到这儿来落户吗？”

“不能。男人不能到这儿来，‘四清’以后就不许男人到张庄来落户了。如果允许那张庄的人就更多了。当然，如果一个家庭光有女儿没有儿子，可以允许一个女儿招女婿来这儿落户，但如果家里有儿子就不许招女婿。”

“这不是太不公平吗？妇女必须走，男人不许来。”

“可是，”素云总显出一种悲哀的神色，她继续说：“我们必须限制。这儿的生活很好，如果不加以限制，邻村的人就会成群结队而来，那就放不下了。”

“他们为什么愿意到这儿来呢？”

“我们这儿的条件好哇，平整的土地，平展的大道。这里很吸引山里人，你走出家门不用爬坡越岭，想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坐公共汽车，想拉什么东西可以用平车，不必用扁担，如果需要水，脚下几尺深处就有，附近还有那么多工厂正在建设，你可以找到活干。如果你嫁了一个工人可以在这儿找到房子住。这里有工业、建筑业等等，这里确实与众不同。”

她的声音非常兴奋，但嘴上并没有微笑。在张庄生活对别人来说不管意味着什么，对她来说显然是另一回事儿。

妇联会的副主任是杨莲英，39岁，她不像陆素云那样总是忧伤，相反地她总是非常快乐。

“我动员第三生产队所有的妇女都出去劳动。妇女占我们生产队的大多数。我们的工作就是动员她们。在张庄我和素云负责集合妇女们上工。”

杨莲英笑着，显然她很喜欢做妇女工作，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

“如果家里有了三四个劳力，妇女们就不出工了，因为家务事儿太多了，她们不做，谁来做。”

“男人们不帮助干家务吗？”

“不，大部分男人不干。他们不像我丈夫，他一回来就把家务活全包了。”

她又笑了起来，宽大的脸和剪得很短的头发泛着光亮。张庄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梳齐腰的辫子，就连土改时期大胆的妇女主任胡雪贞也不例外，但莲英不是，她梳着短发，而且还抽烟、喝酒，像喝水一样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你到张庄任何一个农家作客，都是男人陪你吃饭，女人在厨房里忙活，她们只有在往上送饭添菜时才进屋来。但在杨莲英家例外，如果你到她家吃饭是她作陪，她给你倒酒，并一杯又一杯地和你干杯，而她的丈夫却在厨房里忙东忙西，客人们都吃饱了以后他自己才坐下来吃。

杨莲英1931年出生在长治西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全家住在租来的两间小房子里，她的父亲是一个雇工，哪里能找到活计就在哪里干，经常是出去几天不回来，直到挣了足够的东西才带回家来。没活干时他就到山上去开荒，开了约三亩地种点粮食。杨莲英才一岁半时她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觉得养不活她就把她带到了张庄，因为他姐姐嫁到了张庄的王家，姐姐生了3个儿子没有女儿，特别是她最后生的孩子掉进井里淹死了，所以他想姐姐可能会收下这个女孩。但当他把小莲英带到张庄时，她姐姐又收养了一个儿子，她给他取名叫裕富。她丈夫和丈夫的兄弟们都不同意收养这个小女孩，收养个女孩有啥用？闺女屁事也不顶。人们都愿意要儿子，儿子大了能养老送终，能传宗接代，谁愿意要女孩？没人愿意。

拒绝收养莲英的王家兄弟中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王桃园，土改时期农会不接受他人会，他告诉农会会员们他卖了老婆，死了驴时失声痛哭。“是你把老婆卖了，现在又在这里哭。”他回答道：“我不是哭我那老婆，我是哭我那头死了的驴。”另一个拒绝收养莲英的王家兄弟后来收养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的大队电工李志禄，志禄在张庄70年代的生活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姐姐杨凤文拒绝收养小莲英后，他失望了，只好把莲英送到了天主教的育婴室，把她交给了那儿的修女，淌着眼泪回家了。4天以后，

他又回到育婴堂把莲英接走了，又把她送到了电留，想把她交给她奶奶抚养，可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愿接受，最后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把孩子又带回了家。回到家里后，小莲英和她5岁的哥哥一起受了不少罪，父亲外出做工时，他们就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她父亲就不能整年住在外面做工，所以只能干些零活，尽可能在家为孩子们做饭，真是又当爹又当娘。莲英9岁时，他父亲又结了婚，她终于又有了一个继母，但后娘来到这个家并没有给莲英带来什么欢乐，后娘待莲英很苛刻，不久小莲英就想如果父亲不结婚该有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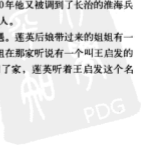
“我一想起从前的事儿就想哭，”莲英说：“那时候太苦了，我很小，没人照顾，冬天没有棉衣穿，经常饿肚子。我到张庄后还经常给我姑姑凤文讲起过去的事儿，有时父亲也提起往事，他总是说他太苦了，也太幸运了。如果姑姑收养了我，我不再是他的女儿了，就没有权利在一天天变老时接受我经常给他的小礼物和钱了。那时候谁能料到这些。”

解放后生活改善了，莲英的父亲有了20亩地，父亲和哥哥在地里干活，莲英和后娘在家里做饭、料理家务。

莲英是在1948年17岁时第一次遇到她的未婚夫王启发的。那次偶然的机遇她并没有过多留意他。那次她是来张庄的姑姑家走亲戚的，王启发那年22岁，已经在长治的一家兵工厂当了好几年工人了，那次正好在家休假。王启发是王雨来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老二桂英、老三榴花是两个闺女，老四是王文则，就是从前那个治保主任，脾气很坏，张庄历史上第一个老婆提出离婚的就是王文则。“不过不要急于下结论，”莲英说：“启发的脾气很好，他总是那样温顺，和他的弟弟王文则正好相反。我们结婚后，脾气很坏的是我，而不是他。”

启发16岁时被迫离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电留县去修铁路。日本人一投降他就回到了张庄，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不过没有上前线打仗而是留在了后方守卫兵工厂。1950年他又被调到了长治的淮海兵工厂，转业之后就在这个兵工厂当工人。

莲英第二次见王启发也是一次巧遇。莲英后娘带过来的姐姐有一个朋友在淮海厂给人家当保姆，她姐姐在那家听说有一个叫王启发的工人正在找对象，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家，莲英听着王启发这个名



字，觉得肯定是自己两年前在张庄见过的那个人。她表示对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她姐姐就为她作了安排，8月15日那天，王启发接到口信要他在厂门口等她。他在那里等着，杨莲英按时来到了，他俩谈了一阵儿并约定下次再见。第二次见面时他们就决定结婚。这个重大的决定一作出，他们就到供销社去为莲英选购做衣服的布料，这似乎是一种双方同意后必须办理的手续。

布料买好后，他们就叫上了莲英的姐姐当介绍人，一起去领取了结婚证，证明他们已是夫妻了。他们没有做结婚的衣服，也没有宴请启发的同事，就在那间办公室里结了婚，然后才出去找房子，他们在—户市民的家里找到了一间空房，那天晚上就搬了进去，几周以后，莲英的姐姐才帮着缝好了结婚衣服，可莲英再也不能穿着它结婚。

一对年轻人没有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就结了婚，直到阴历八月初一，启发带着他的新娘回来过中秋节时，老王雨来才知道他们已经结了婚，并已经3个月了。莲英的父亲知道以后表示坚决反对，他不同意他们的结合，以后一年多他拒绝与女儿见面。他非常生气是因为早在解放前(1945年)他就为女儿找好了人家，他选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女婿，他认为一个穷雇农的女儿能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是一种荣耀，这样女儿就能沾上富裕人家的光，不用再受穷了。

尽管这个富裕的老公公在土改时的斗争中被镇压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改变主意，他决心要谈成这笔交易。莲英说：“现在已解放了，我怎么能走那条老路？我不能嫁给那个人的儿子，一百年也不！”

杨莲英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不仅作为一个中国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妇女。她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自己选择了丈夫，而且对丈夫家的情况也不去多问，是她的丈夫用自己的工资为她买了衣服，但她不注重衣服，她挑选的是人。事情的每一步她都不依靠任何人，只靠自己。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决定。尽管启发作为一个男人，身上没有一点深沉、异乎寻常的、特别令人迷恋的东西，但她见了她，喜欢上了他，认为他就是自己合适的丈夫。在他们的结合中没有一点浪漫的爱情味道，后来她也一定从未体会过爱情的浪漫。启发死后好长时间，她又结了婚，很清楚，她结婚不是为了爱情，只是为了—种合理的选择，只是为了把这个家支撑下去，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再次结婚，她可以把自己和公家的事情做得更好。

依我看，莲英一定从小就非常自信，非常冷静，做事非常有目的；然而她却一点也不冷酷，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深地影响着她，她总是非常关心他人的痛苦，她对朋友，对同志，对所有信任她的人都非常忠诚，而且忠诚得几乎有些过分。

婚后，杨莲英在长治住了近12年。1952年她生了一个女儿，1958年在淮海厂食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1962年淮海厂精减了许多工人，所以食堂的工作人员也要缩减，她丢了工作，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她仍可以住在长治做一名工人家属，但毛泽东号召被精减的人要回农村去劳动，于是她决定回丈夫的家乡张庄去。这意味着要和老王雨来、王文则同住一院，莲英和女儿住了两间房，文则和老婆、孩子还有老父亲住隔壁的三间。1964年他们拆了旧房，莲英用两间旧房的料又在新的地方修起了新房，她和另一家交换了地基。

不像有些人回农村是被迫的、不情愿的，莲英回到张庄是因为她愿意回来。“我回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喜欢农村生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愿意回来参加生产劳动。当然我可以呆在市里当家属，但我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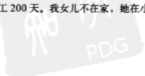
回到张庄不久，莲英又生了一个男孩。孩子刚学会爬，她就积极地为大队做起事来。她在第三生产队起领导作用，并被选进了妇联会。

1966年王启发因患喉癌去世。1970年莲英再次结婚。

“我跟电厂的一个工人结了婚，他在安阳电厂当厨师，43岁，老婆死了，有一个23岁的儿子已成了家。一位朋友对我说：‘干么要一个人过？你需要一个人在星期天帮帮忙，你需要个伴儿，老了的时候就需有人照顾。我认识一个男人，对你很合适，他不会妨碍你的生活，你也不会妨碍他。所以，她就介绍我们认识了。’”

“我之所以再婚有许多原因。我儿子还小，女儿很快就要结婚，跟儿子两人生活很孤单。过去，我的小叔子王文则不让我再结婚，不许我把一个男人带到这儿来，如果我想再婚就得一个人搬出王家，把儿子和房子留下，还说，我一走他们就点把火把我的房子烧了，意思是告诉大伙我走了，彻底地离开了，什么也没留下。但现在人们对再婚的看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那些旧的封建思想再也猖狂不起来了。”

“我回来后每年至少出工200天。我女儿不在家，她在小学里教



书，所以我得自己做饭，自己干家务，还要去地里干活，另外我还得给女儿做饭，因为女儿工作忙，得备课，到学习班学习，还得上课。不过到了星期天，我现在的丈夫一回来，就该他为我做饭了。”

杨莲英当新娘时一定很美，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她不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那种杨柳细腰、苗条娇柔、瓷娃娃式的窈窕淑女，而是一个结实、健康、活泼、善良的农村妇女，她有一张匀称的脸，一副健壮敏捷的体格，老练、成熟，同时又具有女性的魅力。她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热情，很难说她最吸引人的是哪钟特征。显然这些特征，和她接触时，你会有一种感觉：生活的营养丰实了，和她在一起，会感觉有各种新的想法不断出现和新的做法会不断地得以实施。有了这种气质，她很容易胜任领导工作，妇女们愿意向她倾诉自己遇到的一切难题，从她那得到精神安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妇女们都愿意找她出主意想办法。杨莲英很愉快地担负起了妇女们出于对她的信赖而放在她肩上的担子，并总是满怀信心地去解决一切问题。

杨莲英，一个获得了解放的妇女，一个天才的领导者，她轻松地对待自己，愉快地对待世界。如果没有她，陆素云根本不可能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妇女，甚至恐怕连自己都不能长时间地打起精神去完成一项工作。

三十九 信仰上帝

几天以后，我们正在吃饭，高检察长拿着一张纸条走了进来。

“你的一位老朋友要来。”

“谁？”我问。

“王定模。1948年踞城的县委书记，你还记得他吗？当年他给土改干部们作过好几次报告。”

“记得，我记得他。后来他一直在干什么？”

“你走以后他被提升为县委书记，后来调到了晋中。‘文革’开始时他是煤城阳泉的市委书记。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和一帮矿工造反派把他揪下了台。现在他是晋东南地委的干部。”

高检查长说的时候，卡玛一直在笑，她问道：

“他叫王定模？”

“是呀。”

“啊呀，他就是我们揪下台的那个人。他是阳泉的大修正主义分子，把他赶下台时，我还帮忙了。”卡玛摇着头说：“他见到我会怎么想呢？”

不用多长时间就知道了。几分钟后，王定模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个子很矮，身体稍稍发胖，一张红润的圆脸上挂着生动的微笑。

王定模热情地与我打招呼，然后与卡玛握手。

“1967年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批斗了你，其中也有我。”卡玛说。

“真的？”王定模说着，放声大笑起来：“我听说那帮人当中有一个‘大鼻子’，可我一直没能见到。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

他开始笑，卡玛也和他一起笑。这两个过去的对手笑得那么开心，我们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多么奇妙的世界！开始你批斗他，后来，他又把你当作座上宾。

“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大家都坐下来后我说：“我养了一个给你找了许多麻烦的女儿。”

“这不是她的错。”王定模仍然很开心地说：“这是当时的一股风，全国各地都在夺权，他们难道会不去夺煤矿的权？”

有了这样的开头，不知不觉我们就和王定模谈了整整一上午。申安怀已经告诉过我们，王定模是晋东南的知名人士，是全省最著名的抗日游击队员之一，他的名字使敌人胆颤心惊。但红卫兵不管你这一套，他们认为，民主革命的动摇派就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官越大、越反动。

因为王定模1948年以后还在潞城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些早期的事情，特别是天主教堂和马厂、张庄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出了什么事？他是怎样劝他们放弃对天主教的信仰的？

王定模说，马厂是一个变害为利、变坏事为好事的典型。土改的时候这里100%的人信仰天主教，整个大队的一切工作都由天主教的小集团控制着，生产队的粮食亩产只有100斤。一首当地流传的民谣这样说：

教堂立中央，四周是池塘，

圣母赐幸福，就可上天堂。

马厂的农民们认为如果不每天祈祷就会遇上麻烦。每家都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吃饭前都要坐下来祈祷，睡觉前要跪着祈祷，反正什么事都祈祷。因为他们总在祈祷，所以就没有时间干革命，也没有时间搞生产了。

天主教组织的头头是主教师和发，他主管安阳、马厂、南天贡和高家庄的教会活动。这几个地方都一样，如果不加入天主教就没法活，他们把非天主教徒划分出来，赶走了。

我们搞清楚马厂的书记和村长都是共产党员，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向我说他们也为天主教工作。按天主教会的指示，他们在街中间划了一条线。书记负责线以东的一切事务，村长则负责线以西的事务。这是根据主教的指示，由传教士们划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教会工作。

这两名共产党员执行的是师和发主教的指示。这位主教虽是县“人大”代表，但他从来未停止过做那些过去曾是天主教徒现在已忠于共产党的人的工作，他希望他们浪子回头，重新回到天主教徒的行列中去。他们甚至做曾带领马厂农民斗地主闹翻身的马厂著名的梁马豆的工作。不过这其中我们有工作的失误，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开展了一个反对干部搞特殊化的整风运动，因为梁马豆很出名，我们自然地就把他当了靶子，把一切罪名都加在了他的头上。我们拿他做了典型，待他太苛刻了，整个运动出现了极“左”的偏差，这是不公平的。师和发就是趁这个机会做梁的工作，他给梁马豆以支持，安慰关心他，使他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信仰。明白了这一切以后，我曾竭力纠正错误，给他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但一直没能使他回心转意。后来他再也没有积极起来。

我们的政策允许宗教自由，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地委书记王谦却强调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许加以干涉。我认为他是右倾，可他却反问我：“你有多左？”

每当我们有新的政策，主教就有他的新对策。当传达了每人要保证向国家交售380斤粮食的征购计划后，我们认为每个社员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一定会比这个多，但人大代表师和发却说是上帝赐给了每个人380斤，另一个人大代表问他：“如果我们收400斤呢？”师和发

说：“那是上帝赐给了你400斤。”

他知道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他就以此来作武器与我们作对。我们教育群众反对迷信活动的运动一开始，师就来找我，问我们这个运动计划怎么搞。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随后，安阳的老伍新年说：“政策保障宗教自由，你有信教的自由，我们有无信教的自由。”

这话惹恼了师和发，他马上跑到负责宗教事务的书记那儿去告发老五，书记没敢说什么，他害怕这些人找麻烦。

但我们还是和教堂发生了磨擦。有一次我走进师和发的家（在高家庄），看他桌上的材料，有的材料是用英文写的，我根本看不懂，这惹火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要动员群众搞生产，他却要人们搞宗教活动。正是春播时节，是地里最忙的时候，他却坚持要所有的天主教徒穿上白衣服从高家庄到南天贡到马厂再到张庄进行大游行。所以我们派了杜生旺书记去问能不能取消这次游行，师和发说：“不能，人们要求这次活动，我们必须进行。”

于是，我们决定开一个群众大会来制止这次游行，但在会上哪个干部也不发言，他们害怕违反了政策受到批评。长治市委书记问：“你们都怎么了？是不是害怕天主教徒？”

他们回答说：“要那么简单，你去说呀。”

最后他对王京和说几句，我们教给了他怎么说、说什么，王京和才站了起来，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相信上帝，但我遵守政策，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但不管什么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根据政策，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的自由就是受共产党的领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自由。你们违反了政策，你们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徒违背政策的合理规定，政府的什么规定是不合理的？我们所有的规定都是合理的。”

“我们的婚姻法是合理的，但你们违反了我们的婚姻法，因为你们不允许离婚——这是不符合政策的。”

王京和一件又一件地驳斥了天主教的活动。会议结束后，师和发

不得不让步，他说他愿意听政府的，于是下令取消了游行。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使他取消了这次游行。

1951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召开一次全县春播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远近村庄的一千多名干部。在会上，南天贡的治安主任、贫农王生宝(以前是天主教徒)严厉地批评了教堂。“每年我们尽力组织人们搞生产”，他说：“可教堂每年都搞破坏，社员以参加教堂的活动为借口，不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回家后他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一条毒蛇，邻居们告诉他教堂里传出话来说他是恶魔，上帝要跟他算账，回家的第3天，村民在一个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王生宝的死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向教堂发起了反击。第一步是要抓住并审问主教师和发，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教徒们把他保护起来了。他们的土屋下面都有地窖，家家户户的地窖一个连一个由地道相通。我们一进村，主教就躲进了地窖，然后从这个地窖钻到那个地窖，我们无法找到他。有时候，他突然出现在高家庄或南天贡，有的共产党员就通知我们，但等我们赶到时，他又躲进了地窖，我们又找不见他了。他安排村里的人放哨，妇女们坐在大门口，看上去好像是在做针线，实际上是在放哨，一看见我们来了就赶快给他报告。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搞了三四年，我们一直没能侦破这桩谋杀案，最后只好搁下了。师和发从地下走了出来，像普通农民一样开始了村里的生活。我们认为天主教的问题多少已经解决了一些。后来我就调离了潞城，到新的单位去了。

但是，在1966年，太原附近发生了天主教大起义。教徒们成立了一个叫“圣母军”的组织，他们传扬说圣母玛丽亚要在太原附近的山上创造一项奇迹。来自数县以外的、各县甚至各地区的教徒都来此观看，参加这项活动的共有数千人，这些人站在黑暗中向山顶观望，他们看到山顶有一道光在闪烁，意思是说圣母来了。

当时王大任负责省里的公安工作，他决心要把事情搞清楚。作了彻底的调查以后，那天晚上他率领了一队公安人员登上了山顶。在山顶上他们看到有一个人正拿着一个亮的手电筒上下舞动，创造“奇迹”的光束。他们逮捕了这个人，并向在场的所有人揭露了这个阴谋。

师和发是这次阴谋的组织者之一，当地的公安机关逮捕了他，并



把他关进了监狱。他们搜查了他的家，发现了许多非法的物件和材料，并计划搞一个展览来揭露他的地下活动，其中有一些英文材料，还有一些他和他侄女、张庄明星师桂香睡觉的照片。

结果证明，他一直过着一种见不得人的生活，一直试图腐蚀干部和积极分子，散布“要变天”的谣言，并以此威胁群众听从他的指挥。他从不亲自出马，只是利用别人执行他的计划。

在“四清”运动中，在揭露了太原山顶上的阴谋之后，我们解散了“圣母军”，大多数天主教徒与天主教断绝了来往。从此以后，生产开始发展，去年马厂的粮食平均亩产到了600斤，这就是我说坏事变好事的原因。外因的帮助推动了内因的变化，这个外因就是工作队集中人力解决了天主教的问题。因为马厂100%的人信仰天主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扭转了局面，因为张庄只有1/3的人信仰天主教，所以我们没有太注重这儿的问题，因此，这儿现在仍有人信教，他们仍做礼拜，仍祈祷。

王定模为他不能提供更多的关于天主教的情况表示道歉。后来才知道，他所有的有关材料和记录都被在阳泉夺权的红卫兵抢走了，他们抢走并毁掉了潞城天主教材料的全部档案，因为这个，我们决定卡玛必须受到一部分责备。

王定模在马厂发动消灭天主教运动的结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1971年以来的几年时间里，事情的发展逐渐表明，王定模过高地估计了在马厂消灭天主教运动的成果。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使大多数人相信他们将重新允许宗教自由。

那些几年来一直秘密地搞集会和祈祷的和那些根本不敢集会和祈祷的天主教徒，又在他们家里的墙上贴起了圣母画像，而且大部分贴在毛泽东画像对面的墙上，并且敢公开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仪式。今天的马厂又像1945年解放时一样，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不过，张庄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仍保持在1/3。

1971年9月的那天王定模走了以后，我们又和老支书张贵才、张兴发、师才元一起追忆了张庄的历史。他们说，“大跃进”以后，许许多多大工程、大计划下马以后，晋东南的农村经历了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退却。

四 十 退 却

退还土地——我们的庄稼会丰收，
 退还牲畜——我们养肥了能吃肉，
 退还农具——不再因用坏而发愁，
 退还副业——我们自己会赚“大头”。

申全德和李和仁热情地为我们朗诵了这首诗，他俩仍积极参加张庄天主教的活动，仍做礼拜，做祈祷。他们“退还”的意思是把合并的财产退还给个人，归个人所有。这不仅是张庄几个闹独立的农民的要求，而且也是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精神，他们试图以此来挽回1959年灾难的某些损失。面对“共产风”的失误，因“共产风”导致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垮台，加上因“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引起的生产上的崩溃，重新改组的党领导了一个全面退却，退回到农业搞个体生产，农村的财产、土地归个人使用。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集体还是个人)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邓小平说：“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把个体企业作为基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为了解决紧急情况可以暂时使用。现在看来，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搞个人生产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件好事情。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提倡的就是“三自一包”——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供个人买卖，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农业上有四退还，即退还土地、大牲畜、小牲畜和园林给个人；工业上有五调整，即对集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改，意思是要把它们中许多变为私人所有。许多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像是调整、提高、巩固集体的工业和农业，倒像是要清理集体工农业。因为批评家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所以必须集中力量纠正发展过快的不稳固的社会经济关系，纠正给工农联盟带来尖锐矛盾的平均主义的关系。问题较严重的地方

要解散大型的集体生产形式，把生产交给少数人，如果必要甚至可以交给个人。在晋东南，各地党委开始学习安徽的经验。安徽由于粮食欠收，大批农民离家行乞。那里的大队分了土地，拆了猪圈分了集体的猪，为了重新分配水库下的土地甚至毁了大坝和水库，不久安徽的经验就在晋东南推广了。武乡县把集体1.5万头牲畜中的7000头退还给了原先的主人，地区领导作主解散了全区约3000个公社企业，只有全国劳模李顺达的家乡西沟和陵川县富漳公社的企业得以幸免。李顺达很出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富润是地委书记卫恒的老家，那儿的老朋友和老乡亲向卫恒提出了一个请求，因为他们付出了许多汗水才购置了生产设备，所以希望不要解散他们的企业，最后卫恒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长治市给所管辖的公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来推行“三自一包”。当时是农工部干部的老八路王京和回忆说，他反对上面的政策。

“当然，”王京和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传下来时，我们都犹豫不决。一方面我们想，我们怎么敢反对上面的政策？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想，上面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没敢反对它，但却竭力制止群众执行它。”

“有人说：‘河南已经开始包产到户了，咱们最好也快点。’可我说：‘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政策。我们还是等等吧。正好有一个矿工的亲戚从河南来了，他说河南确实已开始搞包产到户，每人五亩口粮地已分到各户，另外每人还分了五亩公粮地，包产交给国家公粮。’”

“必须保证将公粮地一定产量上交国家，比如，他们公社有一个大队种了许多花生，但每年农民都把花生偷回了家，大队去收摘时地里已经没有了。现在包产到户了，地到了个人手里，于是土地就有了收成，他们总不会偷自己地里的东西吧，所以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我认为这样不太好。如果仍收不上花生怎么办？你又不能对他们动武，又不能把他们打死。况且这也够不成犯罪。那问题怎么能解决？”“包产到户”和“花生到家”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走这条路就会犯大错误。”

“我的同事说：‘这是上面的政策。’我回答说：‘可我们下面不能照这个政策去办。’”

主要问题是觉得这个政策不对头。我们知道这股风刮得很厉

害，可我们更知道如果跟着走，以后受到批评，甚至惩罚。”

在张庄，张贵才也非常谨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他说，他认为这个新政策是一个圈套，“实行‘三自一包’，让人们先跳出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把他们打倒”。

这是一种坦率的想法。听到关于河南传说，张庄的大队干部就开会进行讨论。他们决定，如果是毛主席让把土地分到各户，他们就照办，否则决不执行。所以在张庄没有分一寸土地。我们知道当时东风公社已分成了四个公社，但大部分地方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们仍像1956年以来一样一起种地，集体劳动。

但与此同时，他们把牲畜还给个人饲养，并鼓励个体副业生产。

牲畜的退还并不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的旧制度，交给个人饲养的牲畜吃的仍是大队的粮草饲料，这种“集体所有，个人饲养”的形式只是要个人为集体操心照料牲畜，并不归个人所有。有些人像照料自家的牲畜一样精心照料集体的牲口，可有些人只要集体财产落到他们手里就任意糟蹋。张庄给了申天喜一匹好马让他喂养，6个月以后，马还是那样膘肥体壮，也给了臭名昭著的无赖申胡子一头牛，牛被他喂得很不好，群众就开始纳闷：牛饲料都到哪里去了。当村民看到了申家的猪才明白。不久这头牛就死了，可申家的猪却成了全城里最肥的。

牛死后，群众非常气愤，他们开会斗争申全德，让他赔那头牛，可是申像往常一样没有钱，把他关起来也没用，所以只好给了他一顿批评。

“毛主席的政策是说服、教育，不要过于惩罚，所以我们就对他实行了宽大处理。”贵才说。

在鼓励个人搞副业生产的政策下，出现了许多小型企业——个体商店、家庭纺织，还有许多其他特殊的职业和服务，如：修理钟表、修理手表、修理自行车、修锁等。在张庄有秦来才和吴双喜两家修理手表，他们每家有一套修表工具。由于修表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秦来才和吴双喜加上家里帮忙修表的人就都不去地里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庙会 and 集市，不管远近，他们都要去摆摊接活，他们不光修表，还修手电、钢笔等村里人常用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门上不挂任何招牌，所以不是国营的，但与村里人也没什么两样。1971年，人们说他

们的生意损害了集体利益。

村上收入最高的手艺人晋守义。起初，他只有一间不算大的自行车修理店，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锻工车间和氧焊设备的平车加工厂。晋守义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搞氧气罐。有一个赶毛驴车的人，他的工作是从长治一家工厂拉上氧气罐送往一家火力发电站，每天几乎在同一时间路过张庄，晋守义不断给他烟抽，给他好话听。作为回报他答应供给秦焊接用氧，但他从来不大量给，以免引起他人怀疑。后来这个人在厂里发现了一只多余的氧气罐，就把它放在了晋家，晋却声称这是他自己的。

随着个体职业和服务项目的增加，大队领导作了一些努力，企图通过一种特殊的制度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大队要求出去挣钱的手艺人所得的大部分收入应交回大队，然后把这些交回大队的收入换算成工分，以此来保证他们一年两次的粮食分配。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要算入集体的总收入，然后按工分所得分配给所有社员。

这种统一进行现钱与工分换算的办法对个体手艺人有一种内在的刺激。每个手艺人每月交大队40元现金，挣20个劳动日的工分，从表面上看似乎对大队有利，因为手艺人用2元钱才能换一个劳动日的工分，而当时(1959年)平均每个劳动日才值1.35元现金，平常年份一个劳动日才值一元现金。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对手艺人有利的，因为在外面干活他们大部分人一天能挣2元多，每个月要干20多天，可他们每月只交大队40元，这样他们的收入就远远超过了那些只靠大队分红的人。

在这种制度下，晋守义靠他的工具和设备赚了大钱，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支出，所以他又扩大了生产。如果允许他继续这样干下去，不久他就会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远远超出他自己所能操作的能力范围。这样他就得雇用其他人，他可以轻易地使自己成为一名企业家。开小店铺、搞修理服务的手艺人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不过，很难说那时商人和投机商是否走了同样的路。1959年8月6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批准重新建立自由市场，允许在农村进行自由买卖，不过有一个条文：共产党员不许参加。实际上这种贸易早已开始，党中央的决定只是使这种已经很普遍的行为合法化了。它之所以合法，是因为至少暂时为人民提供了国家和大型企业所不能提

供的生活日用品。商人，甚至投机商确实推进了许多商品的流通，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收入比贡献要大得多。许多社会上的落后分子也发奋起来，激励自己想方设法赚钱。他们便买上小平车和自行车到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去卖，常常能发横财，姑娘们又把他们看成了最理想的择偶对象，这些现象使那些待在家里竭力为集体种好地多打粮的农民心慌意乱，士气日渐低落。

贵才到长治参加了号召重新开放自由市场的会议，回村后他告诉大伙：“从现在起，大伙想卖什么就可以卖什么。但我们共产党员不许参加(当然卖的东西不包括粮食、食油、布匹、猪肉和煤，这些东西是国家定量供应的)。”

后来提到此事时，贵才说：“我敢保证我自己不在任何自由市场卖任何东西，可我没能力阻止别人，因为上面号召开放自由市场禁止党员参加。我自己不参加，如果你们愿意参加，我也没意见。我对兴发说‘现在号召这个，以后肯定会变的，因为不许党员参加，如果我们参加了，以后肯定会跟我们算帐，那就又是一场整风运动。’同时，我又希望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能跳出来表演个够。”

过去的上中农晋发旺、晋大洪和富农晋忠富、申安龙晚上都推上平车出去搞投机，如果干得好，一晚上就能挣7~8块钱。

杨子和骑自行车到忻县，5块钱一斤买回100斤萝卜籽，在师庄和附近村子卖25块钱1斤，一晚上就挣了几百块。

晋宋义到各地去买自行车和平车零件，并利用这个机会做投机买卖。他南下郑州、汉口甚至上海，北上邯郸和北京，从这些地方买上自行车座套回来就能赚三倍的钱。他以每根一毛钱的价格买上自行车辐条，回来每根就卖一块钱，他以1.2元一块的价格买上农民的银圆，到汉口每块就卖3元，这是一桩非法却很赚钱的买卖。有一次汉口的警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没收了宋义所有的银圆。后来才知道，这些银圆不是他买来的，是人家托他卖的，卖了以后才给钱，这下委托人全赔了，可他们又不敢抱怨，因为当初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银圆，说所有的银圆已在8年前抗美援朝时交给了国家银行。

村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比个体买卖、投机商人更多，对集体的团结危害更大的是个人对垦荒地的占有。这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分不开

的，因为个人地里的产品可以自己去卖，收入归个人。这不仅破坏了农村的集体生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内部和城市周围的工业生产，干部和工人受高收入的诱惑，也回家去开垦荒地，种植烟叶、茄子、萝卜等需求量最大，最能赚钱的农作物了。

在张庄，有些农民开始忽视集体农田，集中精力去开垦那些大田与公路、水渠相连接处没人种植的小块地，或在路堤和坝堤上种植小块地，谁发现、谁开垦。谁使用、谁受益。这种牺牲集体农田扩大小块耕地的“开垦先锋”到处可见，比比皆是。最不象话的是，有一个农民居然侵占了灌溉农田用的水渠和干河床，他就是富农晋忠富，他对晚上推上平车搞投机挣的钱还不满足，于是就到处开荒，最后在水渠中开了一大块地，水渠暂时没有使用是因为张庄的土地平整工作尚未搞完，加上水库的水位太低暂时抽不出来。

曾被群众当汉奸斗过的解放前伪街道主任晋一仁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集体干活了。”但却把全家拉到了离公路不远的山上，在那儿开了几块荒地，加起来有五六亩。

开荒的人不都是过去的富农和斗争对象，王文则，这位曾成功地领导了三个铁路建设大队的共产党员，也开出了五六亩路堤和坝堤地，在他们的眼里，这和做买卖搞投机不一样，他认为这是生产，是发展生产。他开的地粮食亩产有五六百斤，而集体的地亩产只有200斤。李林峰开的地亩产也有五六百斤。

个人的土地产量高只因为得到了精心的管理。他们起早贪黑，中午也不休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茅房里有茅粪，猪圈里有猪粪，他们就上到了自己的地里，而不是拉到集体的地里去。当然，他们不是大白天公开这样做，而是等黑夜大部分人睡了才干，他们不是用平车拉，而是慢慢地用扁担挑。夜里在自己的地里这样卖劲地干，等到了白天在集体地里干活时，他们就沒劲了，活干得很慢，而且总是找机会躺下睡一大觉。

在个人买卖、个人经营之风刮得相当厉害的日子里，那个曾饿死队里牛的申胡子可有了好光景。这个游民解放前就跟着人家抢劫、偷盗，15年过去了，他根本没有被社会的改造所感化，仍是那样极端自私。他非常机敏地分析着新的社会关系，趁机钻人们相互信任的空子，学会了把自己怎样装扮成最受人尊敬的战士、民兵和干部，一次

一次地骗取他人的小物品和服务。

战士、民兵和干部都享有一定的特权，且受到人们和国家的尊重，申胡子发现，装扮成这几类人，可以享受特权而不易被马上发现。土改以后，社会上的人普遍相互信任，不再像解放前那样检查身份证件和看长相了。

民兵干部理发时可以把理发费记在指挥部的账上。在潞城县城的一个理发店里，声称他是民兵指挥部的干部，理发师傅给他理了发，指望从民兵总指挥董天富那儿结算理发费，太巧了，董天富进门申出门。

理发师傅问：“他是什么时候来指挥部的？”

“谁？”

“刚才出去的那个人。”

“他不是我们指挥部的，”董说：“他是张庄的申胡子，你不认识这小子？”

也许，下一次他就认识了，可这一次他白给人理发了，没有挣到理发的钱。

对申来说，世界太大了，有许许多多的理发店，他不必在一个地方行骗两次。

有一天，申胡子在长治身无分文，他对一个赶马车的人说：“我是张庄中学的总务主任，你把我捎回去吧？”

那人同意了，把申拉到了张庄中学大门口，但要申出2块钱，胡子走进校门，说去给他拿钱，可再也没回来，最后马车夫只好自己走了进去，找到了学校办公室，说他们的总务主任欠他2块钱，因为他把他从长治拉了回来。

“可我们主任今天一直在学校没有出去呀？”办公室的人惊奇地说。

马车夫不相信，办公室的人只好把厨师、帮忙的临时工、总务主任等所有总务上的人都叫来了，可没有一个像那个坐他车的人。

最后有一个学生说：“半小时前，我看见申胡子从后门跑出去了。”这才解开了这个谜，但没有解决马车夫的车费。

总务主任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马车夫，问道：“你不认识这小子？”“如果我再看见他，非揍扁了他不可。”马车夫答道，可他再没见

到过申，当然也没能揍上他。

有一天在北舍，申觉得很饿，一个从供销社出来往家走的青年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家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军属之家”，她一进屋申就大声敲门。她一开门，申就说：“你不认识我？我过去跟你丈夫在一个排。”不想冒犯丈夫的老战友，这位年轻的妻子请申进了屋。

他问：“你是不是怕我吃你的面条？”

“噢不，”她笑着说，“请吃点吧。”

于是申坐下来吃了两碗，正要吃第三碗时，这位妇女的丈夫回来了。他怀疑自己的妻子与这个男人私通，便开始怒骂妻子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引回家来，妻子则责怪丈夫没有告诉她在城里有个老战友，趁夫妻吵架的当口申赶快吃完了第三碗面条，悄悄溜走了。

夫妻俩越吵越厉害，邻居们不得不来劝架。一个邻居说：“那是张庄的申胡子，你们不认识这小子？”

然而，申留庆并不是每次都能逃跑。有一次，石屹节煤矿的工人们抓住了他偷煤，他们给他画上花脸，戴上高帽，把他拉到高高的煤堆顶上。

申一直喊叫：“我是西天贡的，我叫申来庆！”可西天贡的人都说：“他胡说，他是张庄的申留庆，你们不认识他吗？”

显然，矿工们认识他，因为他们让他从煤堆顶上下下来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还有一次，申到西旺去拉煤，在那儿偷了一些铁条，张庄的其他人看见了，回村后就到大队报告了此事。大队主任把申叫了去，像往常一样，申什么也不承认。最后在几个目击者面前他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路上他把铁条埋在了高家庄，大队派人监视他去挖回了铁条，回来后开了一个社员大会，他被带到了台前，群众发言议论时，他必须把铁条举过头顶，社员斗争了他一下午。会上揭露了他许多坏事，但并没起什么作用。

几天以后，这个家伙又自愿为一个离了婚的铁路工人说媒，他说他需要给女方娘家70块钱。婚礼如期举行，到这时，这位可怜的铁路工人才知道他的新娘和娘家从来没要过，也没收过任何钱。当然，申已经把钱花光了，也没办法让他还了。

贵才说：“解放以来，申留庆挨过不下20次揍，可他不悔改。”

在退却的年月里，在集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张庄的大队主任张兴发却开始办理有关房子的个人交易。8年里，兴发买下、修理、转卖了四次房子，为此，他从大队借走了几百斤粮食，后来一直没还上，最后也正是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导致了他的下台，使得他这个张庄最重要的村领导遭受了创伤，变得黯然失色了。尽管张庄的党支部换来换去，村支书像走马灯似频繁更换(从1948年到1966年共换了6次)，但张兴发从土改到“文革”前夕一直是张庄生活风云变幻中的主角。

张兴发是在1947年第一任党支部张天旺离开张庄，参加工作后担任的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一直干到1949年，1953年又干了一年，1954年他推荐师才元当了党支部，自己去当农业合作社主任，合作社扩大到全村范围后，张兴发又当了大队主任一直干到1965年被撤换下来。这么多年他一直担任党支部行政工作的重要职务，大部分时间担任副书记，他因房子的事受到人们的批评时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

尽管在解放后的中国各个单位名义上都是党的书记最有权力，但在张庄，张兴发即使不在书记的位置上，实际上也是最有权力的。由于具有资格老、能力强、政治经验丰富的长处，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谁当名义上的一把手，张兴发在村党支部内总起着支配作用，年代有不同，时间有长短，张天旺、孙九祥、师才元、王文则、郭真宽、陆晋中都当过张庄的党支部，但他们每个人都找张兴发讨主意、寻支持，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听从他的安排。在不断变换的、摇来摆去的领导人当中，他是最稳固的一个，也是担任大队干部时间最长的一个，不管张庄取得了怎样值得夸耀的成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领导得好，不管张庄遭到了怎样应该责备的失败，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领导的失误。从张庄的历史似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头脑不够清醒，没能带领张庄坚定地沿着集体富裕的道路走下去。一次又一次，在张庄前途攸关的关键时候，他带领全村人走上了可行的集体化道路，但同时他又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他只沉醉于解决一些小问题，而不去想办法为全村人寻找一条广阔的大道，最后终因搞房子投机掉进了个人发财

致富的漩涡。

张兴发像张庄其它贫雇农一样在土改中分得了一栋房子，就在天主教堂大院的隔壁。1950年这个大院成了地区潞安中学，1952年中学扩建时，张兴发便把他的房子卖给学校，要了一块新宅基地，买了材料，在学校的院墙外盖起了新房，后来学校又扩建又买下了他的房子，他又用卖房子的钱在村南头买下了他弟弟启发的五间房子（启发土改时分的房子就是著名的西店，大队选中了他的院子当大队部，后来就给他把院子换到了村南）。兴发买下启发的五间房子，进行修整加固后又转卖给了从西山迁移来的、党支部成员陆进俊的亲戚杨成道。后来他借给启发一些钱，启发又修了新房，启发修起新房不久，兴发又花600元买下了这套新房，扩建以后又以2000元转卖给了别人，用这2000元兴发又修了一套坚固的、一层半结构的新房，这就是他1971年的家。

一个党员领导，一个大队主任就这样深深地陷入了个人财产的交易之中，这也许是一个问题，但在兴发房子的买卖交易中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如果是用他自己的钱搞了这些交易，张庄的人也不会说三道四，也不会张庄引起什么反响，可惜的是兴发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收入用来买进、修整那么多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他从大队集体的仓库中借粮，而且最后都没还清。正是因为把集体的财产据为己有，兴发才成了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调查对象。几年的时间（1959~1962），在最艰难的岁月中，张兴发共借粮食900斤，从来没还。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大队主任，队上的干部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愿意他，希望和他套近乎拉关系，他要借的粮食数目不大时，他们就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说：“大队要三袋”或“大队要五袋”。社员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以为这些拿走的粮食都记在帐上了。如果说他们知道这些粮食借给了私人，那他们想以后会还的，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翻遍了一个月一个月甚至一年一年的帐本都没看到借粮的记录，这样，第三生产队的于宝占、第四生产队的李晓风、第五生产队的孙九祥都一次又一次地帮了张兴发的忙，他们知道总共借给了张兴发多少粮，生产队的会计也知道，就因为他是大队主任，他们才没有把他借的粮记在帐上。事情被揭露后，他们和张兴发一起成了运动的靶子，张兴发被说成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张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对象。

四十一 李来全捍卫自己的权力

张兴发在李来全的房子处理问题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个故事很值得讲一讲，因为通过他可以看到农村生活中社会主义影响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个人的房产问题，亲戚朋友要求偏袒和施加的压力问题；掌权人不情愿地卷入了房屋的纠纷，被侵权的农民大胆地要求政府阻止这种侵权行为，强烈的感情用事将会影响土改的成果，然而在这一切即将发生之前，终于寻找了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

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返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张庄驻扎着受日本人指挥的伪军部队的一个支队，中农甄忠喜有一个小院，小院有两栋房子，每栋房子有四间，这两栋房子相对立，中间的距离很窄。日本人进村后村上的汉奸就强迫甄当伪保长，直接受统治村子的伪军司令温启荣指挥。甄是个大烟鬼，爱沾便宜的小商人，他给温司令提供鸦片，他们在一起，一抽就是几个小时，两人对着抽，不分彼此，就在这亲密无间忘乎所以的时候，温便开始寻问张庄的情况，特别是地下抗日运动的情况。党的干部说，就是因为甄忠喜提供了情报，地下工作者申锁则才被捕继而被杀。

解放后，在第一次斗争汉奸的高潮中，觉醒的农民斗争了甄忠喜并没收了他的财产，没收了他的土地、他的院子还有八间房子，可后来党的政策说与日本人勾结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与那些通过土地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区别开来，因此要区别对待。农会的干部不管地主富农的表现如何，一律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哪怕是革命积极分子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这是对地主富农全家所采取的一种阶级措施，这种措施能够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与此同时，他们把与日本人勾结看成是一种个人犯罪行为，不同程度地予以惩罚，处死、关押、罚款都可以，但不能没收财产，他们认为不没收财产是一种较合理的办法，因为没收财产意味着一个人犯罪全家受罚，会迫使那些中农和贫农去讨饭。就连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家庭还可以有地种、有

房住，难道汉好的家庭和亲属应该受到比地主还糟糕的待遇吗？更何况他们中有许多是中农，甚至贫农，答案是很清楚的。

随着晋东南全区运动的发展，干部们退还了没收的财产，也退还了甄忠喜的财产。按甄的情况，他们退还了他大部分财产，但没有把所有的房子退给他，因为他当过伪保长，沾了村里人不少光，所以应该付出一点，村上把他八间房屋中的四间作为土改成果重新分配给了别人，这四间从甄家没收来的房子被分配给了李来全，他是60年代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文革”中当了村党支部副书记。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他的名字，来全意思是“都来了，来齐了”，因为李来全有个习惯，开会总是来的很晚，所以人们就开玩笑说，只要他一来，人就来了，会议就可以开始了。李来全发现和甄忠喜住一个院子很不愉快，地方太狭窄、太拥挤，四间房子不仅住着来全一家，包括来全媳妇、孩子、还有老娘，而且还有来全的哥哥一家，包括嫂子和他们的孩子。来全的哥哥当兵几年不在家，复员后患病，卧床休息了好久。

因为房子、院子都很小，李家和甄家经常磕磕碰碰，因此就经常吵架，最使人恼火的是甄忠喜最后总是那句话。

他说：“你们斗争了我们，分了我们的财产，难道现在还想压迫我们？”

“你们斗争了我们一次，还想再斗争一次是咋的，想把所有的房子都占去呀？”甄的老婆扯着嗓门大声喊叫。

不愿意这样无限期地斗争吵下去，不愿意在这里再住下去，李来全到处找房子想搬出去住，最后在村北头租了医生秦三姜家的几间房。开始，房东秦三姜要李来全一次付清100元租金，后来他把100元还给了来全，每间房子每日收房租5毛钱，后又涨到了每日1块，最后，许多铁路上和砖厂的工人都到张庄来租房子，不管多贵他们都乐意租，所以房租又涨了。

于是李来全发现房租成了一种负担，不过更糟糕的是无法与房东和睦相处。1965年来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走就是5年。他不在家的这5年中，母亲和秦三姜吵过好几架，尤其是和秦的母亲，这种争吵达到顶点是因为一头死猪，秦家的两只小猪崽常常溜出院子，有一天，其中的一头死在了街上，秦的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就埋怨李的

母亲，她把死猪崽扔在李家门口，要李的母亲赔偿，李的母亲说不赔，她就让她搬出她家的房子，为了显示她的厉害，她把房子的门和窗都拆走了。

李来全在部队，另一个儿子在水库劳动，两个儿子都不在家，李的母亲不敢反抗，只好离开秦家到一个朋友家去“避难”，同时她向侄儿，大队治安办的申天喜诉说冤屈。

“这种争吵没完没了，”她说：“那猪崽一跑我就出去找，不止一次地把它们赶回来。可现在死了一只她倒怨起我来。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再住下去了。”

申天喜作了彻底的调查，结果证明李来全的母亲是无辜的，所以他警告秦三姜的母亲，以后不要随便冤枉好人。从那以后，秦家院子里的矛盾减轻了一些，但并没有消失。

李来全复员后知道了这些事，便决定向大队申请宅基地，他想要在村外自己盖新房，清静地过日子，申请一批准，他就拆了在甄忠喜院里的旧房，想利用上边所有能利用的材料盖新房，不过旧房已没多少东西能派上用场了，1958年公社成立后，这四间小屋就被用作大队的一个公共食堂，所以他拆的时候，房子已经快塌了。

李来全刚把旧屋拆了，甄忠喜就在原地盖了一间牛棚，这可惹恼了来全，他认为，这地方他不占了就应该归公，大队给了他新地方，这旧地方就应该归大队。于是他去找大队主任张兴发抗议。

“我的老地方现在是大队的财产，”他说：“大队可以使用，也可以给其他贫农使用，但甄忠喜占了就等于向土改进行报复。”

“别激动，”兴发说，“现在你已经有地方住了，还为那个老地方操什么心？”

来全一次又一次地抱怨，可兴发说“甄忠喜只是在那儿盖个牛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是要推翻1948年土改运动的成果，这是在袒护甄忠喜，因为张庄新上任的党支部陆晋中是甄忠喜的女婿。陆晋中正在允许他的岳父重新占有土改中被没收了的土地，但却让兴发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对他来说公开袒护亲戚是不体面的。

当来全逼迫兴发解决这个问题时，兴发说：“这件事不用你管，大队已经解决了。”

“谁作的这个决定？”

“孙进富和郭福书(党支部另外两名成员)。”

“我不管是谁决定的，”来全说：“反正我不让甄在那儿盖牛棚！”

“你让也好不让也好，牛棚总归要盖的。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儿。”

被武断的回答激怒了，来全拿出了最后一手。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陆晋中肯定插手了这件事儿。”

“住口！别再说了。”兴发说：“不要把他扯进来，这件事是我负责的。”

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来全决定等甄忠喜的牛棚快完工时，再求助于公社领导。

甄忠喜动员了所有的亲戚来帮忙尽快盖好牛棚，陆晋中也来了，很快他们就上顶、抹墙了。

这时，李来全又找到了兴发。

“我抗议他在这儿盖牛棚。”

“他想盖就在这儿盖，你管不着。”

“不一定吧？”来全说：“给我写封信就说大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要拿上它到公社去。”

“你妈的，”兴发火了：“老子不给你写，想去你就去吧，让你白跑6里地，什么也得不到。”

“那好，不写就不写，我倒要去看看到底白跑不白跑。”

来全去了公社。他知道陆晋中是公社领导眼里的“红人”，所以早有遭冷落的准备，他没有要求公社干什么，只要他们给他写一封到长治市委的介绍信。

“别着急，”公社那天值班的干部说：“现在负责同志都不在。”

“我怎能不着急，”来全说：“如果再等，牛棚就盖完了，决定就成了现实。那样我还有没有脸？如果你们无动于衷，那我就只好去市里啦。”

这位干部犹豫不决。

来全生气了。

“你们都哑巴了？”来全喊了起来，“党的政策变了没有？我们还有没有说话的权利？你们的权力大，把我的复员证拿走吧。我和我哥

都是贫农，都当过兵。噢，现在连出气的权利都没有了？”

公社干部看着来全举到他鼻子底下的复员证。

“消消气，别发火嘛。”

“我来这儿就够冷静的了，”来全说：“主要是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不能制止，我马上就到市里去。”

最后这位干部说：“再给我说一遍详细情况。”

来全说，这位干部最后写了一封信并盖了公社的章。这封信命令甄忠喜马上停止施工，等待调查。

来全要的就是这个。他一路小跑返回了张庄，找到民事主任李忠禄，把信递到了他手里。“看这个，这是公社的命令，马上执行吧，要不我可要执行了。”

李忠禄马上就跑到甄家院子，命令把所有的活计都停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忠喜问：“我能抽支烟吗？”

“你想抽什么就抽什么，不过请念完这个。”

他念了那封信，并传给大家看。

忠喜说：“让我们把牛棚盖好吧。”

但李忠禄说：“不行，停下来，马上停下来。”

他们只好停了下来。

三四天以后，他们又一起拆掉了牛棚，这块地归了大队，大队又把它划给了第三生产队，第三生产队在这里修起一座五间房大的会议室。

李来全很高兴，他愿意让别的贫农使用这块地，愿意让第三生产队使用这块地，就是不愿意让它重新回到甄忠喜这类人的手里，这地是作为土改的果实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怎么可以再回到他们的手中？

因为甄忠喜是中农，而且第一次曾被错误地没收了全部的财产，所以我问，让他重新占有那块土地是不是毫无疑问地错了。回答是肯定的，是错了。因为大队干部又把历史倒回了1948年。潞城县的第二次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们已经退还了甄忠喜的大部分房屋、土地及其他财产，没有退还他全部财产是因为他当伪保长时捞了不少的好处，沾了乡亲们的光，李来全认为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不应该被陆晋中、张兴发或其他任何人轻易推翻。

就这样李来全的房子问题成了60年代初张庄的一个争论点，在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李来全把它作为一件不平之事提了出来，以发泄对陆晋中和张兴发的不满。在安昌村的“过关”会上，兴发出乎意料地说出了一切，他说，陆晋中曾找过他，让他帮甄忠喜盖牛棚的忙，因为忠喜是他的岳父，他不能亲自出面办这件事，所以就去找兴发，兴发答应了。这两个村干部自然是同盟军，愿意互相帮忙，但他们低估了李来全，低估了群众对土改运动成果的强烈感情，这种感情在“文革”中在甄忠喜的事件中轻视他们的几位干部激发了起来，变得愈加强烈，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李来全挑起的事端给兴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仍觉得很难拒绝那些来找他帮忙的人。就像党支部陆晋中找他帮忙一样，人们来找他帮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陌生的人来找他帮忙就很难理解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兴发对那些想来张庄落户而找他帮忙的人有些过于放宽了。

因为他自己是河南林县人，所以他欢迎那些来张庄定居的河南人，而且对他们的背景总是不作足够的调查了解，结果，许多上中农甚至富农都被当成贫农在张庄落了户。

除了从林县来张庄落户的以外，还有几个从西山迁移来的。1948年到1950年间，查路条查良民证的规定已经取消，粮食供应本和户口簿的制度尚未建立，人们可以自由迁移。李九祥和他的弟弟还有姐姐肖福来都被划为富农，所以从西山逃出来，要求在张庄以贫农成份落户，兴发对他们的背景没有作详细彻底的调查，听信了他们编造的因为山里流行甲状腺病才逃到张庄的故事，为他们找了房子，分了地。作为来张庄重新落户的贫农，他们后来还得到了国家的救济，肖福来成了第四生产队的保管，但他并不诚实，盗用队里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在“四清”运动中被树成了靶子。

新任党支部陆晋中在对待新迁移户的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他允许他岳父杨成道迁移到张庄，并听信了他说自己是贫农的话，实际上，他在家乡长子县是受监督的富农。后来陆晋中让他当了副业队的采购员，杨成道在副业队的采购中贪污公款800元，所以在“四清”运动中也成了斗争的靶子。

陆晋中在指定孙九祥担任第五生产队队长的问题上也暴露了他蹩脚的辨别力。孙九祥1952年曾担任过张庄的支书，但后来被免职

并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曾在伪军司令部当过兵，是他给敌人提供了情报才导致地下工作者秦德的牺牲。孙九祥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就不该委以新的职务，但陆晋中忽视了这个人的污点，就因为他是一个长辈。孙九祥担任队长也成了张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个争论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反对自由放任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运动。

我与张庄的农民们交谈，与市里的干部交谈，人们对“大跃进”以后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回忆反映了1971年秋天的政治气候。他们不掩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集中火力攻击的却是后来制定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混乱。实际上，不论是过分集中的集体形式的失败，还是向小型集体、家庭生产、个体企业、个体服务、恢复农村自由市场的退却，在60年代初期的农业恢复过程中也许都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张庄1958~1964年的平均粮食产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斤/亩）：

1958	169
1959	205
1960	138
1961	193
1962	209
1963	251
1964	210

然而，到了1971年，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干部们主动宣布，个人生产不管多大规模都是错误的，他们严厉批判包产到户、个人买卖（尤其是投机买卖）和没有被控制的自由市场，他们搜集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根本不考虑它们引起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每个人都至少在口头上承认，60年代初期的退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幸，有些人还竭力证明他们确实没有执行上面制定的对集体生产有危害的政策。

到了1980年，一切的一切又都颠倒了过来，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正常的经济秩序开始恢复，揪出了“四人帮”，党中央恢复了与60年代初完全相同的政策。新的政策为中国开辟了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市场，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赢得了全国上下的支持，

高级干部们开始认识到在极少数地方依然存在的公社核算是错误的，他们反对大队核算，强调小队核算，要求把大一点的生产队分成更小的生产小队，甚至分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小组，并指出，在农田不集中，土地较分散的地方，可以推行家庭承包，如果合法和必要甚至可以单干。

到了1981年，政府很明确地鼓励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不仅可以在偏僻的山村实施，而且逐渐形成了在全国各地农村推行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年的六月份，我乘飞机飞过河南南部，俯视下去可以看到广阔的平原被分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小块，那些小块地太小了，恐怕连马车也难以通过，农民卖了牲口和马车，又挑起了扁担。新的承包制已经造成了不一般的土地分散，这种情况恐怕在土改前也不多见。

假如今天有人提出我1971年提出的关于60年代初的问题，那回答一定是不大相同的，至少高级领导干部会作出与1971年完全不同的回答。事实并没有变，但领导对事实的看法和态度却变了。尽管邓小平说要“实事求是”，但对中国的许多官僚来说，对客观现实的第一态度仍然是“现在刮的是什么风？”

四十二 本地人回来了

1962年恐怕是中国解放后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的秋天，一对穿普通工作服的青年夫妇在长治北站下了火车，正沿公路向南走去，他俩要步行3里地到张庄去。两人背上背着行李，手里提着许多再也打不进行李卷里的小包裹，像往常中国人的习惯一样，男的走在前面，妻子吃力地紧随其后，一方面怕落后了，另一方面又怕丈夫嫌她慢。这男的长相挺特别，又宽又高的额头使他的脑袋显得比一般人的大。大部分人不管是圆头、尖头、大头、小头都理的是平头，与他们相反，这个人剃了光头，他的脑袋、脸、眼睛都比一般人的又圆又大，头就像倒立的鸡蛋，像一个胖的圆球，又圆又大又宽，脑袋不仅长得大，而且特别灵，也许脑袋本身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但他特别好问，总是迫切地去学、去看、去了解，而且总能很快地接受生活中一切有影响的，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新事物。

不寻常的脑袋指挥一个不寻常的身体，他的体形有点儿畸形，两肩下溜，脖子前伸，突出了看来是经常用扁担挑重物造成的驼背。他的颈椎有些前倾，所以脖子不是直的而是向前伸出，因脑袋总伸向前面，他走路时样子总好像是急于到达目的地在寻找一条最快的路。

然而，这男人的驼背似乎并不影响他的健康，他背着一个大行李，走起路来像飞一样快。

那位在竭力赶上这个男人的青年妇女是一个漂亮的小个子。她的长相也很特别，也是一张圆脸，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差不多与她丈夫的眼睛一样大一样明亮。她梳着齐耳短发，看上去活泼可爱，就像一个第一次出门去上学的十来岁的小姑娘。她穿着布鞋，两只脚很小，从她的脚就可以判断她的身材也是苗条纤细，她穿上又宽又大的工作服和电厂工人的宽裤子，就好像装在了麻袋里，身子在里面晃来荡去。

这个青年男子叫李正宝，就是这个人九年以后的整风运动中成了主要的靶子。这时他才19岁，回张庄来是因为他丢了在电厂当工人的工作。这位年轻的女子是他才结婚几个月的妻子，叫关季英，18岁，她的电器设备技术员的工作也丢了。这个青年人丢了工作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撤走了专家，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1960年确实是灾难性的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全国各地粮食奇缺（库存已几乎被掏空），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为了强迫中国同意他们的世界政策撤走了专家，带走了许多他们协助建设项目的图纸和计划，并终止了完成这些项目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的供应。这些突然的变故引起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使五年计划陷入一片混乱。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放慢速度，最后停建了许多大的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停止不是立即一次执行的，而是在苏联撤走了专家几个月后逐步逐项停止的。

由于工程建设项目的下马，工人们开始成百成千最后成万地被精减了。这些被精减的工人中不仅有建设工地的人，而且包括为这些工程提供设备和服务的国营工厂的工人。关键设备，尤其是重型设备靠从苏联订购，但轻工机械和许多别的设备却是靠我国自己生产，现在工程一下马，订购终止了，设备也不需要了，工人们就失业了。裁员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他们几年以前就离开了自己的

家乡，怀着美好的希望汇入了国家建设的洪流，现在突然一切都变了，前途变得渺茫，又要回到家乡去扛一辈子锄头，真有些受不了。

但这些工人的返乡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几十万掌握一定技术，具有在农村不可能获得的一定经验的工人呼啦一下回到了家乡，他们回去的不仅仅是人，与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大量较先进的文化、习惯和技术，对他们的家乡来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那些对突然返乡适应较强的人，在乡村一级的改革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文革”中，几百万知青被送到了农村插队落户，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到农村去，农村也不愿意接受他们。总的来看，问题很多。但相反地，中苏关系破裂后，大量受过工作训练的年轻人返回了农村，却在农村干得很不错，他们的家乡也愿意接受这些人，他们不仅充分利用这些年轻人的技术和才干，而且还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确实是这样，至少在张庄是这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正宝(李快腿)。

李快腿虽然生在张庄，却不是生在李家。他的父亲叫陆金顺，是1948年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陆家四兄弟中的老大，他们可以炫耀的就是他们的木工技术和一些木工工具，哪儿能找到活他们就在哪儿干，没活干时就挨饿，他们从张庄搬到了高家庄，因为高家庄盖房子的人多。

但1943年因为饥荒，到处找不到活干，陆金顺又只好返回了张庄，李快腿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他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家里连两个大人吃的东西都没有，更不用说养活5个孩子了，母亲的乳汁已被吸干了。

金顺和老婆便把新生的儿子送给了他老婆的妹妹，她嫁给了张庄一个姓李的中农，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很想要个儿子，但就在李正宝出生的时候她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因为她不想一下哺育两个婴儿，只好很不情愿地拒绝了正宝，陆金顺和老婆找不到要孩子的人，就把他扔在了玉茭地里。

由于仍想要儿子的愿望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孩子的姨姨作出了强烈的决定，她把自己的亲生女婴送到张庄天主教堂的育婴堂，交给修女，到玉茭地里把李正宝换回了家，哺育起来。就这样正宝在李家长大了，直到许多年以后他还不知道住在村那边的那位善良

的“陆大妈”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许多年以后，陆金顺已经很富裕了，他不仅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而且是杨忠盛或穷棒子互助木工社的发起人之一。开始几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之后，这个木工社在50年代开始兴盛，社里所有成员都干得不错，日子也过得蛮好。可与此同时，李家的环境却非常艰难。李快腿两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死了，不久养母也患了子宫癌，一直发展的病情使她干活越来越少，全家经济负担日益加重，除了正宝，她还得养活她丈夫的老母亲和两个小女儿，家里什么都不够用，不是缺这就是少那，正宝8岁时开始上学，但没钱买书、纸、笔和石板。因为他常到陆大妈家玩，他的亲娘知道他的实际困难，饿了就给他吃的，渴了就给他喝的，是她给他钱让他去买上学的用具，还替他交了一半学费。和他亲爹陆金顺一起干活的木工社的同事们看到正宝就和他弄着玩，“你的石板真好呀，知道给你买石板的女人是谁吗？”“你叫她什么？”“谁给你买的这些铅笔？”每天见到他，他们就问他好多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正宝才知道“陆大妈”就是他的亲娘。

当他问起李家妈妈这些事时，她告诉他说，她是从玉茭地里把他捡回来的。她不敢告诉他实情，因为她害怕他离开李家，害怕等她老了他就不会像亲儿子一样孝顺她。

正宝10岁那年，家里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就在这一年人们开始合并土地搞生产合作，建立起了互助组，李家妈妈把土地入了互助组，她的驴也每天能去挣工分了。两年以后互助组买走了这头驴，李家妈妈从此有了点现钱。

加入了互助组而且还有一头驴，李家的生活开始比没有劳力自己单干时好过了一些，但他们仍很穷。

1955年李正宝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但他没有钱继续上学。这所学校在十几里以外的南垂，他没到那儿去住校，不仅自己要吃得交学费和书本费，而且高小收费远比初小高，不论是养母还是亲娘亲爹，谁都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最后，从他的邻居张存善(1948年的村长)那儿借来7升小米，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宝的亲哥陆晋中那会儿已经能挣工分，还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让正宝坐在车梁上，把借来的小米装在一个口袋里搁在车后面，把行李卷搁在上面，骑车送正宝到南垂上学。在路上不知什

么时候米袋擦住了一直转动的自行车轮磨出了一个洞，等他们到达南垂后，小米已经漏完了。

这可使正宝陷入了困境，他已经被学校登记注册，他希望能另想办法交费，留在学校读书、上课，但他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再也借不到粮食。他呆了下来，但一旦他吃了学校的粮，还不了是不让走的，因为还不了就得呆下来吃更多的粮，那样就更还不了了，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最后他的亲大哥陆晋发从北京回来，他是北京一所航空学校的学生，自己攒有一点钱，他到南垂才还了学校的钱，把正宝和行李一起带了回来。李正宝的正规教育就这样结束了，那年他12岁。

因为不能再上学，他便开始在合作社干活，他赶一辆小毛驴车为互助组拉粪拉肥拉粮等。虽然他劳动了一年，最后家里还是欠合作社6元钱。已够干活挣工分年龄的二姐结了婚，离开了家，养母的病发展到了白天黑夜都出血的地步，她的脸色惨白——像纯白色的面具，后来奶奶去世了，正宝把他养的两头七十来斤重的猪卖了，卖得47块钱，又从合作社借了20块，买了一口棺材把老人埋葬了。但除了他和养母的粮款，除了其他一些必要的开支，他再没能力还合作社的借款了。

1957年正宝开始加倍努力地劳动，播种的时候他用平车拉，用扁担挑，把每个撒籽的坑里灌上茅粪，新芽长出后他精心管理，除此之外，他还辛勤劳动，负责给队里记工分，那一年情况有所好转，他除还清了家里所有的欠款，还余下40元现金。

那时李快腿李正宝就开始积极参加村上的社会政治活动，他学会了踩高跷，参加高跷表演，还参加了戏曲小组，在“文化”之夜大显身手，他开始在政治夜校学习，参加政治讨论，9月份加入共青团。

同年，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重体力活，特别是用扁担挑重物使他的肩膀溜了，脖子弯了，背也驼了，不久村里人就说他看上去像头骆驼。李快腿怎么也搞不清楚他的驼背是因为长身体时干了重活，还是天生遗传的。他的哥哥陆晋中十来岁就开始干重活，也和他一样有点驼背。可是张庄许多人都和他们一样很小就开始干重活，背却一点也不驼。

不过这不算什么问题，驼背并不影响正宝的健康，他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工作得也好，而且比大多数的同龄人精力旺盛。有一

点不好就是驼背影响了他的美观，使他失去了年轻小伙子应有的英俊和风度。

1957年，国家在张庄以北十几里的安阳建设了一个发电厂。这个厂不仅要为当地的工业供电，而且要为周围的农村供电。附近各大队都要送派年轻人到电厂去学习，然后回村为各家各户架电线安电灯。张庄大队选了五个人，三女两男，其中就有李正宝。学习3个月后，他们就应该回来为村里服务，但由于他们几个学习成绩都很好，给厂里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山西省水电部基建处把他们招收成正式工人。一个女的被安排去搞电表修理，两个男的和另外一个女的搞发电，李正宝被安排到电厂工地开起重机。

他们是1958年3月安排工作的，一年以后已经掌握了工作技术的李正宝被调到了内蒙的包头。当时大型的包头钢铁厂正在建设，包头发电厂是靠蒸汽发电，所以当时的工作就是架设管道，使蒸汽通过管道被输送到解决厂大型新建的一号高炉。这项工作完成后，李快腿又帮助火车发电厂安装了一个大型锅炉和汽轮机。他记得当时最激动的一件事是站在锅炉上看到了开往1号高炉的一长串首长们坐的小轿车，第一辆车上坐的是周总理，站在高处只看了总理一眼，李正宝就觉得自己一下子上了天，因为他参加了一项真正的国家重要工程的建设。

“参加这种大型工程的建设拓宽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思想。”几年以后李快腿说：“只要你肯动脑筋，肯看，肯做，就能学到许许多多东西。还有许多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好人。原先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明白，但只参观了一个地方我就开始明白了。于是我就开始琢磨我看到的一切。”

“第一次在太原火车站我看见到处是火车头和车箱，我就想仅仅一个省就这么多，那全国该有多少？我们的国家多大，多富强呀！我觉得中国确实伟大，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富裕，我看着这个伟大的城市想到了全国有那么多这样的城市，多大！多富！多光荣！”

“我当主人翁的第一天就系上安全带爬到了30米的高空。从高处往下看，我看到了一片毫无秩序的景象，人们南来北往，匆匆忙忙，方向不一，显然是没有组织，没有安排的。后来我才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在为国家的建设奔忙，这与我们在农村随便松懈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工作上有严格的保养、维修、折旧制

度。为什么在农村不能用同样的制度来要求呢？一台机器如果只使用不维修，很快就会报废，地里的庄稼也一样，你必须按时锄草、施肥、喷药，否则你就什么也收不上。一个人可以从工业的经营方式中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关于个人责任的有关问题。”

李快腿操作起重机已成了老手，他总是负责安装电厂所有的重型设备——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的旋转部件和发动机外壳，然后再用管道或管子把它们连接起来，每个部件的定位必须准确无误。这些设备都很重（一个锅炉就有50吨），所以提吊时需要特别小心。一个经验丰富的装配工当领班，他通过手势和信号指挥如何准确无误地操纵起重机，指挥新工人如何拉紧绳索，如何准确无误地把数个设备安排到位，除了起吊和定位，他们还得修锅炉架，接几里长的管道。他们常常是在让人头晕目眩的高空焊接，李快腿也常常离开他的起重机去搞焊接，所以他也掌握了这门技术。

李正宝把建设工地视为“大学”，他总随身带着一个钢卷尺和一个笔记本（因为写在散纸上容易丢失），看到他感兴趣的、新鲜的、有用的东西就拿尺子量一量，在本上画张草图，并标注简单的文字说明。

“那会儿，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李快腿说：“看到我喜欢的东西就把它记在本子上，如果记在散纸上容易丢，所以我总带着一个本子、一把尺子。过去我有一个钢卷尺，可后来弄丢了，我就买了裁缝用的皮尺，更好用，很软，你可以把它绕在物件上测量。哪怕看到一张普通的桌子，我也要量一量记下尺寸，多宽、多长、多高、用什么材料做的。”如果看到一个电动机，我也量被动轮、主动轮即三角皮带轮，还要算他们的比例。“就这样我不仅学会了技术，而且使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如果我一直呆在农村，每天在地里干活，恐怕早已把那点知识忘光了，现在我能写一些小文章，并不至于拿不出去。”

“一个建设工地就是一个学习的大课堂，因为它包括的工种和技术太多了——锅炉、管道、车床、焊接、测量，每一个单位常有他自己的运输、动力、各种要求，每一项技术都是复杂、多方面的。如果从一种工作调去干另一种工作，你见识得就会更多，到的地方越多，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各种不同型号的机器、各种不同的做事方法。”

“如果我一直呆在包头，就只能看到一套方法，可我从包头调到了临汾，又调到了安阳，后来又到了晋城、高城，最后到了太原的河西第一发电厂。每到一处我总能学到一些新东西。”

“除了在工作中学习以外，我还参加各种学习班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开始我只学了3个月的电工，后来在工作中我不断参加技术学习班，我认为既然干电工就必须学电、懂电，但我从未和高压电打过交道。在建设工地，我们安装的所有设备都与电无关，工厂一修好就交给了厂里，我们又到新的地方去施工，因此，尽管我们安装大型变压器、电线杆、在高空架电线，但从来没有接触过高压电。起重机上最高的电压也只有380伏。”

“我学到了许多技术，提高了文化水平，还学会了吸收其他工人的优点和长处，从他们身上我学会了爱护国家财产，按时上下班，对工作认真负责，工作起来踏实肯干等优秀品质。在30米的高空，在冬天恶劣的气候下他们都能很出色地完成工作，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立脚手架的时候要用许多钢丝把木桩捆牢，因此拆了脚手架那些用手捆木桩的短钢丝就没用了，但老工人们没有把它们扔掉，而是把它们收集起来，把两头焊在一起，做成了钢圈，这样下一次又可以用它们捆绑木桩。这样的效果很好，木桩下陷时，紧套在木头上的钢丝圈还牢牢地固定在木桩上。上级领导听说后还表扬了我们的这个创新。”

“那时候，人人争当英雄向秀丽。向秀丽是一位广东姑娘，在她工作的工厂失火时，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国家财产保住了，她却牺牲了。我们学习她的事迹，学习其他建设英雄的事迹，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还把描写英雄事迹的书籍和毛主席语录的卡片送给家里，送给兄弟姐妹，送给同学朋友。”

建设工地的生活条件是很原始的，工人们总是住在砖块垒成的临时房屋中，有时甚至住在帐篷里，在包头工作时，李正宝住的是蒙古包，外是篷布，里有毛毡。李开始是学徒工，挣钱很少，每月工资只有12元，半年后每月17元，一年后又升到每月19元，两年后他晋升为一级工，每月工资34元，1961年即参加工作的第四年他晋升为二

级工每月工资 40.5 元。

李正宝是按级别不是按工作量领工资。在包头的时候他在共青团工作中成绩突出，还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1959 年 10 月调到山西临汾后，又被安排到共青团工作，在办公室干了四个月的秘书工作，为调到新单位的同志开介绍信，寄挂号信，收团费，给各支部发通知，抄写文件和报告，还干许多杂事儿。

1960 年回到太原后，被安排在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分管工人的福利，白天为需要救济的家庭分配救济款，晚上为职工们演电影。电影队有两部放映机，一部 36 厘米，一部 16 厘米，李快腿的工作是租影片、安排放映时间、卖票、收票、操作放映机。负责电影队的那位工人生病退休后，就李一个人负责这一切，这样他成了一名技术熟练的电影放映员、文化生活的组织者。

总之，1957—1962 年对李快腿来说是一段旅游、学习、现场研究、努力工作、个人成长的非同寻常的、值得自豪的岁月。除了这些，他还认识了一位姑娘，与她相好并在被裁员回乡前与她结了婚。这位姑娘就是关秀英。实际上，秀英对李正宝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虽然她是从章义公社来的，但正宝在安阳学电时她也参加了那个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安排去从事电表修理，他们分开了。可一年以后，她也来到了临汾，像李一样也做共青团工作，也正是这时李开始注意她，很明显，他俩互相都有好感，并开始互相了解，很快就会相爱的。当地的团委书记叫张根治，老家也是长治的，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在关键时刻插手进来，给他们当了介绍人。有一天，张叫来李正宝，对他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确实需要个媳妇，就想给你介绍一位从你们那儿来的姑娘，她叫关秀英，如果你将来回去，可以带她一起回去，要是你跟外地人结了婚，以后返乡，人家恐怕不愿跟你回那么远的农村去呀。”

有了团委书记组织上的介绍，李正宝和关秀英就可以正式确定他们的关系了。张书记一捅破这层窗户纸，他俩就公开相好了，其实没有他的介绍，他俩也会相好并相爱的，但李正宝愿意让别人知道是张书记介绍他俩相好的，他不是那种喜欢浪漫的人，不是那种没经人介绍就自己搞对象、谈恋爱的人，尽管他们的相爱那么摩登，那么特别，那么开明，但李正宝的头脑中仍隐藏着一些封建思想，这是富有战斗

精神的中国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他们在政治、技术、建设国家乃至国际事务方面都显示出很强的开拓进取精神，但对待家庭事务和其他亲属他们却常常不自觉地遵守孔夫子的思想。

李正宝和秀英订婚后，工作又把他们分开了，他被调到了安阳，而秀英却到了运城，不过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两年以后，张书记说过的被裁员返乡的事儿突然降临了，所有1958年招的工人都接到了被裁员的通知。苏联专家撤走了，留下的工作连老工人都不够干，更不说新工人了。李快腿工作的总工会的领导想留下他：“我这儿可以留下一个人，就决定让你留下。”可电力厅不同意，他也没什么办法，厅里要留下管理人员，解雇建设工人，总工会毫无办法，所以李正宝被解雇了。但不久办公室为他 and 秀英举行了婚礼，并送给他俩许多礼物带回家。

李正宝和关秀英的婚礼是在工会总部举行的，工会用大红纸写出了他们要结婚的通知，到了晚上客人们来了，太原总工会的主席为他们俩当主婚人，他向来宾们正式宣布婚礼开始，并勉励新郎新娘以后要好好学习、互相帮助，然后要求他们谈谈恋爱经过，他们是如何认识、如何了解、如何相爱、后来又如何通信的，李快腿和关秀英当然得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做一些在中国青年人结婚的那天来宾们起哄要求他俩要做的事儿。

在李正宝的脑子里印象最深的，至少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谈起这件事儿时说印象最深的是经济上的好处。像总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组织在省城为他举行婚礼，并为他们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他能印象不深吗？1962年是很困难的一年，是缺吃少喝、没穿短用的一年，有的地方甚至在闹饥荒，不仅粮食、布匹、食油和猪肉定量供应，就连香烟和糖也是定量供应。工会的党委书记说“给他们供应券，让他们买布、买毛毯、买蜡烛，尽可能让他们回家后能成起一个‘家’”。所有这些东西在太原都比在张庄便宜，他俩把平时积攒的钱都买了家庭必需品，他俩买不起的东西工会都送给了他们，连回家的路费工会也给了。李正宝的母亲送给他俩一条新被子，所以回家后，他们没什么问题就成立一个家，家里所用的一切基本上都具备了。

回到张庄，他俩很快就找到了与自己学过的专业相近的工作。秀英当了马厂公社的电话话务员，李快腿当了张庄大队的电工，他当了

三年电工，而秀英不久就怀孕生了孩子，不得不放下工作哺育孩子，这样她在外面的工作就越来越不正常了。

在政治上，李快腿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仍然很活跃、很积极，1965年6月，经长治市武装部政委、派到张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队长肖察的推荐，李快腿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马上就成了张庄党支部副书记，他的哥哥陆晋中是书记。

党支部没有给李快腿任何试用期，一天时间内他成了共产党员，并被指定为党支部副书记。这是不寻常的，那些对这种现象不满意的人说张庄成了“陆家王朝”、“陆氏”掌握了张庄的绝对权力，他们随心所欲地安排村里的一切，根本不考虑其他人的愿望，李快腿成了“直升飞机”干部，当然，推动这“直升飞机”的力量是个人的关系。

1962年是李快腿回乡的那会儿，也是妇联副主任杨莲英回张庄的那一年，被淮海兵工厂食堂精减回乡的杨莲英是和由于苏联撤走专家被迫回乡的李正宝一起回到张庄的。杨莲英到张庄来不是因为这是她的家乡，因为这是她的丈夫长大的地方，像我们前面已叙述的一样，她一回来就开始在村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莲英的提拔不像李正宝那样坐了“直升飞机”，她是靠自己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和贡献赢得了大伙的好感，一步一步地走上来的。

在同一年里回到张庄来生活和工作，李快腿和杨莲英加强了张庄的领导班子。李快腿加入的领导班子有他的哥哥陆晋中，还有过去的支部书记、现任的大队主任张兴发，过去的大队主任、现任支部的关键领导人物张贵才，还有1948年就负责治安工作，60年代仍负责治安工作的王文则。杨莲英作为文则哥哥结发的妻子，自然能适应这个班子，不光大队干部们能接受，而且小队的干部也能接受对她的提拔。所有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到来时，都成了那些没有掌过权的人起来向大队干部挑战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杨莲英和李快腿的命运是那样地相似，两个人都出生在解放前的灾难的岁月里，都是很幸运地活下来的弃婴，两个人都是刚学会走路就得干活。如果不是解放，不是土改，不是合作化，说不定他俩都会死于战争、疾病或饥荒，即使勉强活下来，他们也将是愚昧、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他们的才能将得不到发挥，得不到赏识，得不到

重视，他们也将像数百万数不清的普通劳动者，受别人的领导和管束。然而，他们却都在自己的社会生活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远远超过了长治范围，甚至山西省的范围，至少李快腿的情况是这样。

这两个青年人回到张庄正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要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全面颠倒过来的时候。很明显，毛还决心要把自己那一年在庐山会议上所遭受的个人挫折颠倒过来。

四十三 毛泽东的反攻

在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和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仍是党的主席，但已经不再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的毛泽东，发起了一次针对“大跃进”以后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单干放任主义等倾向的大反攻。毛分析这个问题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民自发倾向的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敌对势力、封建残余和新老阶级敌人反对党的总路线向党发起联合进攻的一部分。他讲道，这种进攻不只限于一般群众，而是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最危险的是包括一些党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攻击革命的根本目标和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毛列举了在农村普遍存在的反映阶级斗争本质的几种现象：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

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教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到处发生。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毛泽东问大家，这些事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1963年5月20号，毛泽东号召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立场，克服各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关于这个号召，毛主席清楚地指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前进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结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些人

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拉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多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虽然毛泽东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革命利害相关的问题，但他还强调这次新的运动仍然是一次教育运动。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

5月20号《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员和干部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因此必须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重新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要选出贫下中农自己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这样改革的动力将来自基层。

这些新组织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帐目、仓库、财物、工分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所谓“小四清”)，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样的清查将会帮助解决普遍存在的基层干部与造成帐目、仓库、财务、工分管理混乱的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把这种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主张所有的干部都来“洗温水澡”、“打预防针”，这样他们就能放下包袱，改正错误，重新建立与人民之间的团结，轻装上阵。

同时，由于许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被揭露了出来，所以毛泽东又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打击和粉碎

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通过让少数犯错误的人“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这场运动保证了所有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顽固的敌人，这样“团结90%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换句话说，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这场运动将带来人民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人民和干部的团结，因此，将能够成功地处理社会上存在的阻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对抗性矛盾。

《决定》的第九点强调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支部书记按照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向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

《决定》号召县社一级的干部要按照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主张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群众一起劳动。在这方面昔阳县做得很好，受到了中央的表扬，被树为典型。

毛泽东的指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引自于毛泽东的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和《决定》的第十条，都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两者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重要性，“放下架子”，深入基层，吃在基层，住在基层，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首先是通过眼、耳、鼻、舌、身开始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最后再把这个思想放回社会实践实践中去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写道：“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唯一……”毛泽东继续说：“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该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和学习，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做好工作，克服困难，少犯错误……”

为什么要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呢？主要是由于在中国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空头政治司空见惯，且占着统治地位。强调实践可以避免这种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了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并严重反映在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统治集团当中。“当官的坐在衙门里，农民们扛锄去上地，世界就是这样稀奇，官民之间互不考虑。”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中国怎么能进步？

为什么同时又强调学习的曲折性和反复性呢？也许毛泽东是为了以后群众和干部的长期争论做准备，他的观点还可用来批驳那些在“大跃进”过分急躁的行动导致国民经济剧烈后退时放弃了跃进，放弃了人民公社和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人，对那些认为“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一次灾难性的实践的人，毛泽东也许会回答说，没有任何伟大的社会实践是前人经历过的，前进的道路要通过亲身的实践，总结经验，对计划进行不断论证和修改，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反复多次才能成功。

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他坦然说：“造成的混乱总的责任在我”，毛泽东不愿全盘否认“大跃进”，别的人总强调把“大跃进”的失误放在第一位，而他在提到这些失误时总是说：“有失就必有得。”“实际上，他们把‘得’放在第二位是故意的。”他抱怨道：“‘大跃进’失败了吗？不，只是部分地失败，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共产风’已经刮过去了，全国人民从中学到了教训。”

不管别人怎么说，毛泽东不愿放弃1956年为发起生产运动第一次提出的，后来在“大跃进”中为鼓舞人心又被重新强调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也不愿说动员全国人民兴起一个大的群众性共产运动是错误的，他把这些错误看成支流，是朝正确方向发展洪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在他看来，“大跃进”的中心问题不是犯了那么多错误，而是数千万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只有他们，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事业；中心问题不是那么多社会的和科学的试验都遭到了失败，强迫可能发展的新领域倒退了一步，毛泽东认为“大跃进”运动中社会的混乱、劳动力的使用不当，物资的浪费，希望的破灭等令人震惊的失败也有“反冒险主义”、资产阶级的悲观失望主义的原因。不愿尝试，不

愿反复实践，不愿积极去干，不敢试验一下中国人民在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验改造的条件下的能力，今后我们还要为这些市侩作风付出多少代价？

紧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产风”造成的破坏，暂时稳定了局势，使国民经济再次有了起色，但毛泽东又站出来阻止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很大范围内采取的紧急措施，他出来阻止已经在许多地方实行的“单干”。

他选择的办法是发动新的党的整风运动，动员所有党员和群众开门提意见。在这场整风运动中，大多数干部要“洗手洗澡”，抛弃一切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团结一致走社会主义道路。按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场团结大多数，反对极少数的运动，是一场治病救人的运动，在运动中教育党员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不幸的是，山西的领导们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地违背了毛泽东的政策。他们的动力不是来自下面，来自贫下中农的群众组织，而是来自上面，来自由上级干部带队的庞大的工作队组织。

四十四 大寨抗爭

“可了不得。”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对我说：“一下来了几千人，他们嚣张着哩！”

昔阳县的工作队员总共有5000人，派到大寨的就有300，这个大队的总人口不足400，因此，几乎是一对一。

下面是陈永贵讲的关于工作队在大寨和昔阳开展工作的故事。

工作队的干部们来不及放下铺盖卷就接到通知去找旗杆杆上的虫虫（大队掌权的坏人）。他们答应团结给大队干部提意见的人，谁反对工作队谁就被定成反革命，并说这次运动的果实（从贪污的干部那里收回来的财物）应该比1946年土改运动的果实（从地主富农手里没收的财产）还要多。

听到这个计划，特别是要团结所有给干部提意见的人这一条，陈永贵惊觉起来。

他对自己说，这里有问题。这些人不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他想，你可以依靠任何喜欢你的人，可我要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你揪斗资产阶级势力，那咱们就干一场。

他对他的同志们说：“提醒全村人，准备战斗。”

第一天，工作队队长张子义（地委组织部的一个科长）就把群众叫在一起让他们学习一本叫“桃园经验”的小册子。这是一份总结材料，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写的。在社教运动中，她到了河北的一个村子搞了个试验，她的行为严重偏离了毛泽东的指示。

“你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地学‘桃园’？为什么不学毛泽东思想？”陈永贵问。

张子义说：“老陈，你是个聪明人，你该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转向其他人笑着说：“看你们，你们怎么不说话？老陈刚看过这个材料，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成绩来，如果没有成绩，我们怎么向上面交待？”

“你们哪也别想去，啥也找不出来！”陈说。

可过了一段时间，张子义和工作队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搜集到了所有他们想要的材料。

陈永贵作为山西代表团的代表到北京去参加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这次会共开了40天。老陈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工作队撇开大队干部，安排工作队员接替他们的工作，对干部和大多数干部家庭的人员提出了指控。首先，他们攻击陈永贵，说他和他所有的亲戚都“红”得发紫，他们停了陈永贵儿子陈明柱的大寨共青团领导的职务，说陈永贵在公社供销社当会计的女婿侵占公款，因此关了供销社的门，说陈永贵的妻子在她工作的大队猪场偷过猪饲料。他们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其它大队干部，说他们都是“陈派集团”的成员，并派人去证实他们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贪污腐化的。

工作队的干部们还试图通过官僚主义的分裂和统治手段建立具有危害性的个人档案。他们叫来了贾承让，告诉他宋立英已经揭发了他所有的罪行，然后又叫来宋立英，告诉她说贾已经揭发了她许多违法行为。

他们还去找贾的二弟，要他提供党支部七名党员的违法证据。

他说：“我不能干任何违背我意志的事儿。”

“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就会被划成反革命。”他们威胁说。

“我不能接受。”他反驳道：“就像一个从没偷过东西的人要反对别人叫他小偷一样，我要反对你们叫我反革命。”

作为最后一招，他们告诉大寨的干部：“你们谁也不能跟陈永贵比，他已经在北京作了彻底的交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在桌子上摆了一大堆文件，说这就是陈永贵在北京交待的所有材料。

可这一招也不顶事儿。

陈永贵说：“在其他地方，工作队可以把党支书搁在一边，告诉支书说他们已经从其他同志那儿听到了所有的罪行证据。那么支书反映常常是‘这狗娘养的，在背后捅刀子。我也要指控他。’可他们在大寨使用这个花招，党员们却不会上当，他们说‘没有人会这样说我。’所以他们拒绝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在我们当中，让一个人在背后反对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们传播谣言，我们反而感到自慰，为我们没有被攻破而自豪。其他人向我们学习，而工作队却忙于传播我们的谣言来攻击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顶住了压力，没有屈服，他们便怒气冲天，‘他妈的’他们说‘我们从没见过这样顽固的党支部。’”

张子义领导的工作队向大寨干部们发起个人攻击，试图让他们相互乱咬，同时，他们还攻击大寨大队，试图搞坏它的先进声誉。开始他们盯住了粮食产量问题，那年大寨的粮食高产是600多斤，在河北平原没有一个村子收那么多粮食，工作队的队长们对产量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开始找毛病，他们首先认为大寨隐瞒了土地面积，说大寨人种的地一定比报的面积多，因为报的亩数少了，所以亩产量就高。“800亩？”他们嘲笑道：“你们这儿的地两个800亩也不止。”工作队队员们不相信大寨农民的话，他们到周围——金石堡、高家岭、吴家坪等村去问那儿的农民大寨的村界在哪儿，然后又逐块逐块地进行测量，从与邻村的交界处量到虎头山顶，最后他们得出的数字远不足800亩。这个数字被县委驳回，说如果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肯定会超过800亩。于是，他们又进行了测量，这次连在最高的山脊上的最小的地块也没落下，结果总数也只有796亩，比大寨人告诉他们的802亩少6亩。

这下大寨人真的生气了。工作队给他们丢了6亩地，他们要工作

队还他们这6亩地。实际上，沟里新地的建设占用了一些岭上的薄地，在那儿种上了树，结果，实际上他们的总耕地面积是800亩。

找不出多余的地，工作队又以为粮食数被夸大了。他们把各家各户，大队仓库里的粮食都称了一遍，然后又检查了所有卖给国家的粮食单据，检查得非常仔细，没有落下一斤粮食，结果发现大寨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上账。

后来又有人想起了粮食含水量的问题。因为未完全干的玉米含有15.5%以上的水份，所以称重时扣去一些斤数，这是一项大寨人从未听说过的国家规定。告诉他们这个规定以后大寨人拒绝接受，因为大寨的粮食是在春节以后才称重分配，到这时，玉米是干透了，肯定不会含15.5%以上的水份，再说国家粮食局已检验过大寨卖给国家的粮食，并没有说含水量高。

但工作队却以含水量压大寨，他们把这个规定告诉了群众，“你们的干部有他们自己的‘中央’，他们对含水量制定自己的政策，你们认为自己分的粮食是公平的，可实际上你们分得的粮食必须扣除20%、30%甚至40%的重量，因为粮食里含有水份。他们在欺骗你们。”

有些干部害怕了，但大多数干部仍一点也不动摇，“我们不用扣除水份，因为我们的粮食干透了。光说我们干部比以前分的粮食多了。大伙都比以前分得多了。他们一方面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太少，另一方面又告诉大家我们干部多占了粮食，说如果把我们多占的粮食分给大伙就比在土改时还分得多，大家想想，能有这么多吗？”

双方的战斗在土地测量、总产量和含水量的问题上暂停了，工作队的干部们不得不向后撤。但不久他们又拿干部的工分问题进行反攻，“你们干部没有劳动就挣工分。”

大寨所有的干部都断然否认了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挣过不劳动的工分。”但一个工作队员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很久以前，他和省农业厅的一位干部在大寨待过，这个人要求各方面工作的汇报，所以大寨的干部们中午、晚上都得向他汇报，在他离开的那一天，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汇报完，所以他们就利用比一中午还多的时间进行汇报，争取不落下任何一个问题。所有汇报的东西他都记在了本子里——年、月、日、时，但他发现那一天所有的大队干部都记的是满分。这样，大寨大队的干部们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了，确实有一次因为汇报工作他

们劳动迟到了一小时，却记了满分。但大队的老百姓们不同意工作队的说法，说这是欺骗。他们说：“我们上工迟到了是因为我们为大队工作，又不是为自己。”他们问工作队的干部们：“你们吃着人民的饭，坐在办公室工作，你们就没有迟到过1小时？就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生过一次病？你们说你们一年也不误一小时？真是胡说！10小时、100小时也不够你们误！”

工作队继续找工分制的毛病，大寨规定给冬天扫雪的人记工分。因为大队冬天的工作是改造沟沟岭岭，不管天气怎样，人们都出工，拉石头、运土，如果路上的雪不扫，这些活就干不成，人们认为扫雪和其他工作一样重要，所以他们就给扫雪的人记工分，如果家里有弟兄两个，一个去修梯田，另一个去扫雪，他们挣的工分是一样多的。工作队说不应该这样，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还有“扫雪”工分，他们认为扫雪是一件轻省活，人们应该抽空去干。在工作队的压力下，大寨大队把扫雪排出了工作计划，扫雪的工分也取消了。

袭击了工分问题后，工作队又向大寨的粮食分配办法发起了进攻。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每个大队社员不论年龄和劳动情况每人每年要分配300斤的口粮，在这个规定范围内，大寨大队又作出了一条新的规定：6岁以下的儿童每人分180斤，6~10岁的每人240斤，成年人300斤，根据劳动情况还可以多分。分配粮食的总量按全村的人口算是平均每人300斤，但由于小孩不可能吃300斤，所以分的要少一些，这样多出来的粮食就分给了那些干活最卖力的、最需要粮食的人，这样，大寨没有一户有多余的粮食，因此，也就没有一户到黑市去卖粮。

工作队的干部们说这是无根据地歪曲政策，因而又责骂大寨为了欺骗群众，自己建立了一个“中央”。

事实上，大寨没有任何使张子义和他的工作队感到高兴的地方。工作队批评大寨，大洪水冲走了他们的黄土窑之后修建起来的一排新石窑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说，这样“没有地方喂猪，没有地方种烟叶，”他们还批评大寨没有自由市场，“没有自由市场？你们的生活这么苦不鼓励做买卖。这不是压制人民吗？”

有些批评是有根据的，大寨是不允许在房前屋后喂猪、种菜。但有一些批评是要引起争论的，即使中央对农村自由市场搞多大、多长

时间，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一些批评显然是荒唐的，从太原的一位作家，要搜集骡子下崽后，把卖了崽的收入派了什么用场的材料，他构思着一桩贪污案件，到后来才非常吃惊地知道骡子根本不会生产。还有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队员不知道为什么大寨的玉米秆与他在其他地方见到的不一样，那么细，那么高，后来才知道那是高粱秆，根本不是玉米秆。他们用这些来攻击大寨。

“为什么工作队要这样攻击大寨呢？”陈永贵说：“因为大寨比其他大队富。了解了大寨你就可能作比较，可能开展学习运动，他们不开展学习运动是因为大寨有个陈永贵，他总找麻烦，因此大寨也不好。他们尽可能反对大寨，压制爱找麻烦的陈永贵，每天他们都会想出新办法、新计划来压制陈永贵。”

有一个干部就认为陈永贵是个死找麻烦的人，他叫薄宏忠，是昔阳县5000人工作队的总队长。出身在昔阳县河东的一个山村。他的父亲是昔阳县最大的地主，1945年土改时农民们没收了他父亲全部的财产。当时，薄宏忠已加入共产党好些年了，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的党，提拔得很快，到1964年他已不仅能代表晋中地委而且能代表山西省委了。

受省里的委派到他的家乡来领导这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他开始怀疑每一个人，谴责每一个人，强迫每一个人坦白交待，他对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进行强烈的报复。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是贫农，曾领导过打碎昔阳县封建土地旧制度的斗争，所以他们开始认为他是在伺机为地主阶级报仇，在极其不公平的环境中，农民们开始叫薄宏忠“还乡团”，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比当年的“还乡团”还坏。

薄很了解陈永贵。尽管是在几个月前他俩才见过一面，但陈永贵一点也不怕他，这使他很懊恼。他俩见面是在“十月事件”中，这是在新县长上任后发生的一起诬陷事件。老县长张怀英工作领导得很好，在他的领导下，干部们经常参加生产劳动，作家、演员常有新的剧本和节目出台，农民们努力增加产量为新兴工业作贡献。尽管工作做得很好，但1961年张怀英还是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了一个叫张俊环的人，他俩的名字虽然相近，但政治立场却截然不同。

新上任的县长逐步推翻了他的前任制定的一切基本政策，他否定集体生产，表扬个人开荒是“开荒先锋队”，鼓励个人买卖、个人企

业、自己赚钱，甚至提议拆毁大坝，重新分配大坝所占的土地，当群众否决了这个提议后，他把大坝卖给了阳泉市，结果造成了昔阳县大多数的大队干部都不拥护他的领导。

1964年10月，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夕，张俊环宣布他挖出了一个昔阳县里的“反党集团”。他说80名县级干部、400名大队干部都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因而，有的被他定为“反革命分子”，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被他定为“反党分子”送到新的岗位上去改造赎罪，他还把二十多名三级干部作为特殊案例送到了地委。负责调查这些特殊案例的人就是“还乡团”的薄某，他大骂这二十几名干部，并下令对他们采取刑讯，审问他们直到他们认罪服输，他们一旦承认了一些罪行，他就下令继续刑讯逼供，直到承认全部罪行，最后，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情况下，这些干部们只好编瞎话、痛哭。

然而，有一个人，无论薄如何努力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他就是陈永贵。薄说陈永贵是反党积极分子，把他叫了去让他指挥其他人，眼看着那么多的老同志被打，陈永贵非常气愤，他卷起袖子准备战斗。

薄说：“我叫你来是让你揭发他们。如果你坚持要保护他们，那我也要指控你。”

这更激怒了陈永贵，他准备把整个地委翻个底朝天。

“为什么我要那样反击？”后来陈永贵说：“因为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干部们犯了错误应该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可他们却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有些人甚至被打死！他们是在打击大多数，保护一小撮。我谋算着，即使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也会有人来放我出去的。”

薄不愿明目张胆地打击像陈永贵这样的出名人物，他让步了，机会一合适他就把陈送回了家。

1964年10月，薄把陈永贵送回了家，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农民干部对他的反抗。几周以后，作为工作队的领导回到昔阳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寨，并在这里安插了许多满怀敌意的调查者。

然而，出于个人成见以这种方式安排工作队的工作是错误的，派到其他县里的工作队都是这样干的。遵照刘少奇和安子文的指示，他们集中火力解决村级农民干部的经济问题，并采取各种策略强迫他们交待。

四十五 “打老虎”

陈永贵说：“昔阳县的工作队正认真追查贪污和腐化的问题。查出非法占用的钱、粮越多，他们的成绩就越大，因此功劳也就越大。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事儿，他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没有教育人民任何东西。”

在贪污问题上，工作队不是从事实出发，对存在的问题作现场的调查，而是看谁当了多少年干部，他的亲戚有谁与钱财打交道。大队的总收入还不到1.2万元，他们却毫无根据地指控大队的8名干部贪污了1.2万元。他们指控侯庄大队的优秀党支书王华洲贪污了4000元，还把他和他大队里被怀疑有问题的人都隔离了起来，27名干部就隔离了24名，昼夜进行监视，白天让他们在工作队的监视下出去劳动，晚上又把他们关起来严加看守。

工作队搜查了他们的家，并对他们的家属进行严厉的审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传唤王华洲的妻子，告诉她和孩子们说，王华洲是“四不清”干部，要他们揭发他参与的一切犯罪活动。

王华洲的三女儿只有8岁，才开始读小学，工作队把她叫去了，让她说出证据，然后几个人把她推过来推过去，致使她摔倒在石头上并磕破了头。他们还诱使王华洲在离家较远的中学住校的二女儿，写封信劝她爸爸坦白交待。

工作队还到那些反对侯庄干部、说侯庄干部坏话的人家里去，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揭发会，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富农，他们当然反对村上的革命干部。王华洲承认向他们瞪过眼，甚至骂过他们，他为什么不能骂阶级敌人？但他坚决否认他们强加在他头上的贪污罪行。

工作队在县里找到了一位曾在一家陶瓷经营单位当过采购员的人，他曾从侯庄的窑上买过许多大缸。在工作队的压力下他证实，有一次他直接交到王华洲手里800元钱，并在证词上画了押。工作队认为这就是贪污的证据，于是他们把王叫来，要他承认这件事，接连3

个下午两个晚上，他们一直叫他站着，强调他坦白，他们朝他大喊，猛敲桌子，把他推到墙根，对他进行威胁，但王华洲态度一直很坚决。

“如果这是真的”，他说：“我要求开除我的党籍，要求杀我的头。”

最后，工作队内部对王的问题有了分歧，强迫那个采购员写证词的工作队员承认他伪造了证词，工作队感到丢了脸，把他调到别的工作队去了，再也不提那800元的事儿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王华洲的攻击，不指控他贪污还可以指控他有反党行为，可以把他作为特殊案例送到全县的会上去，那儿有许多三级干部正在接受审查。于是他被送到了县里，会上说他有反党行为，因为他反对县委书记张俊环。7天7夜，他们一直在整王华洲一个人，晚上，他的床两边站着两个人，门口站一个对他进行监视，“想解手必须征得这三个人的同意，他们跟着我到厕所去，一分钟也不离开。”

王华洲确实反对张俊环，不仅反对，而且还在1963年组织40名干部投了张俊环当县委书记的反对票，他反对张俊环是因为张反对他向大寨学习，反对他三年改变侯庄面貌的计划。按张俊环的观点，侯庄没有任何资源可以通过冬季劳动来开发，王华洲驳斥了他的观点，所以惹下了这位书记，因此他说王是反党魁首，是反党阴谋家，王华洲承认他反对张俊环，但他决不承认他反党。

“如果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也许早不在人世了，”他说：“我怎么会反党呢？”

遍及昔阳县的工作队在“还乡团”的领导下，对当地的基层干部发起了非同寻常的攻击。

把他们关起来，动员他们的家属起来反对他们，在没完没了的会议上折磨他们，把他们说成是严重腐化分子，甚至反革命。极少数不太坚强的干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自杀了，还有许多也在考虑自杀。

陈永贵在北京开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到大寨后也遇到了麻烦。尽管大寨大队党支部一班人团结一致，不互相拆台，不说坏话，不控制别人，但有一些大队干部却屈服于工作队的压力，对他们的领导提出了错误的指控，大队里受监督的地主和富农也提出了许多不满。工作队把这些不满和指控收集起来，写成了汇报，盖上公章寄给了省委的陶鲁茄和卫恒，据说，他们又直接汇报给了刘少奇。有了这些到手的汇报材料，刘少奇认为大寨没有王光美整理过材料的桃园大队

好。于是指示传了下来，要加大压力，把所有的贪污及违法乱纪行为全部揭露出来，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

这些指示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表扬大寨，并要全国学习大寨的指示是矛盾的。在人大会议上陈永贵不仅与周总理交谈过，还参加了毛主席的生日晚会，并与主席本人进行了交谈。陈永贵非常受鼓舞，他满怀激情起程回家，希望工作队已放弃了他们对大队干部造谣中伤的打击，但他到家时却失望地发现，工作队已经重整旗鼓，正在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我到家的第一天，社员们都不敢接近我，干部们聚在我家哭了一下午。他们拉着手，扒在我肩膀上说：‘我们没有死，唯一的原因就是要等你回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早去见阎王了。现在看到你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去了。’”

这些老同志说要自杀，他们的话使陈永贵头晕目眩，他需要休息，他需要时间考虑，所以他让他们回家去等着。吃完晚饭他像旋风一样闯进了工作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大吃一惊，猝不及防，他要求给大寨大队的干部恢复名誉。办公室里坐满了上级领导，有省委领导、地委领导、部长、副部长，一个姓刘的副部长正在充满信心，平心静气地看文件，陈永贵突然闯了进来，并用拳头猛击桌子。

“你们坐在这儿看文件，可我们的干部却在受害！请恢复他们的名誉，现在就恢复！”

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动作使刘副部长惊恐万状，大惊失色。突然，他的头向后一仰，脖子一伸，休克了，最后不得不被送进了医院。

向工作队提出声明以后，陈永贵回到家，把干部们叫在了一起。他问地主和富农们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也没说多少。”

“那群众们呢？”

“他们很害怕，天黑以后才敢在沟里见面。”

“不敢坚持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陈永贵说：“你们必须进行反击，如果你自杀了，那他们就会认为你有罪，说你是畏罪自杀。回去与他们进行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胜利！走，咱们去见见群众，咱们不能死在他们手里，咱们去向群众是要咱们死还是要咱们活。”

于是，他把老同志们领到了社员们正在劳动的山顶上。工作队听

到风声也派了几名干部来监视他们。

陈永贵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便开始问：“大寨的干部们都在这儿，”陈说：“你们说他们犯了死罪吗？”

没人吭声，一片沉默，许多人扭过脸来看那些来监视他们的工作人员。

“不！”陈永贵大声喝道：“往这儿看！看着我！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都不至于是死罪，可工作队要把他们推上绝路，要逼他们去死。”

就这样不到10分钟，陈永贵就把群众唤了起来。社员们开始发言了。

“工作队欺骗我们，造干部们的谣。”

到这时，工作队的干部们也动了心，有些积极分子背叛了他们的领导，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开始攻击工作队的工作。

天黑下来了，陈永贵转向一个工作队的领导问：“你能接受这一切吗？”

这人摇摇头。

看来，战斗还得继续下去。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陈永贵的老朋友，夏丝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宝力来敲陈家的门。

“老陈，我想悄悄地来看看你。工作队在监视我，可我想见你。今天我是来告别的，我想自杀。”

“你怎么能想这种事儿？”陈永贵很生气地问道：“你是不是人？以前敌人占领了昔阳都没能杀了我们，可现在你却要自杀！”

“他们把所有的罪行都加在了我头上，”王说：“我哪还有见死人？”

“群众也认为你有罪吗？”

“他们不敢讲话，倒是那些地痞流氓很活跃。”

“这才是真正错误的地方，”陈说：“群众不敢讲话，坏人倒很猖狂，而你，你又要自杀！你错了。你要敢自杀，我就动员全县的人都来骂你。只要工作队不砍下你的脑袋，你就应该活下去，哪怕他们把你关进监狱也没关系，你就在里面坐着，总有一天会给你翻案的。”

陈永贵就这样羞辱王宝力，激励他起来进行反击。

“正像你看到的一样，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不论是在大寨还是在

别的大队。”陈永贵说：“残酷的斗争也好，它可以教育人民，它还告诉我们一切斗争都要谨慎小心。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如果你有一点不注意，就会自食其果。我们必须强调战术，必须团结所有的干部，必须依靠群众。”

“这样工作队就得停下来想一想，他们是否能完成任务？他们一直在琢磨其他地方的工作队为什么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他们是怎样挖出了那么多的贪污分子的？因为在这儿他们一个贪污、腐化干部也没找到，所以非常着急。”

“就这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加依靠广大群众。如果你这一边没有真理，那在斗争中你就不会站稳脚根。我们还强烈地感觉到团结非常重要，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就不能打胜仗。”

陈说：“现在我们反而觉得他们压制我们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不那样竭力地压制我们，我们就不会变得如此坚强，我们被压成了钢。他们很残酷地压制我们，压、压、压，当时我们很不痛快，可在回过头去看看，觉得倒也不坏，反而是件好事儿。”

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成了团结大寨人民和全县人民进行反击的催化剂，他们一仗又一仗地打。第一仗是针对扫雪记工分的问题展开的。

从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就有成百上千的参观者到大寨的虎头山、七沟八岭来参观。冬天，如果农民们不清除积雪，来参观的人就几乎无法出门，有时他们甚至无法从昔阳县城到达大寨大队。有一次，工作队接到通知说有一个5000人的重要参观团第二天要到大寨来，上面的领导要求工作队保证参观顺利进行。那天半夜正好下了雪，有一尺多厚，挡住了道路。恐慌中工作队来找大队干部帮忙，他们说：“把雪清扫一下吧。”

可大寨人说：“我们不干了。计划上又没有安排清扫道路，是你们坚持让我们把扫雪的工分砍掉的，你们自己去扫吧。”

大寨的社员们坐着不去扫雪，工作队只好推翻了以前的规定，恢复了扫雪的工分。

看到了集体的力量，侯庄的干部们很受启发。参观团要来了，他们突然提出让工作队重新确立他们的党支部班子，这个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专门起哄”的力量来源于一个规定，如果没有

首先建立起一个功能齐全的党支部，就不能说工作队完成了任务。那里的党支部被解散了，所有的被停职的党员必须首先重新进行党员登记，然后才能被重新接受，党支部才能重新建立。因为侯庄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被指控为贪污分子、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然而被开除的不多，被判刑的更少，所以在支书王华洲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都拒绝登记。

他们的行动有效地触动了工作队，工作队向他们保证所有悬而未决的案子很快就会得到最高水平的定案。

陈永贵一回来就发现了“四清”运动的结果，昔阳县80%的干部被定为坏人，其中40人自杀！

陈永贵在下面动员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上面党中央有些人也开始提出疑问。周恩来看了“还乡团”送去的“黑材料”以后认为昔阳县有些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派了一个小组由李雪峰带领到昔阳来进行现场调查。

这个小组到了大寨后，让陈永贵汇报生产情况。

“生产？”陈永贵问：“我怎么能汇报生产？这儿的大事是‘四清’。内战、土改、大跃进我们都过来了，可现在，工作队才来了几个星期，已经有40名干部自杀了！”

他说，面对这些问题，工作队队员们害怕得两手发抖。几天以后，北京命令工作队撤走，但又派了一个新的工作队来。

正当毛泽东的新指示《二十三条》传来时，以张子义为首的大寨工作队离开了大寨。新的工作队带着以《二十三条》为原则的新的指示来到了大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工作队依靠当地的党支部，并和他们一起把先进大队管理好，因此，基层干部不再由于工作队长的猜疑被搁在一边了。

“新工作队来了以后，队员们并没有按他们答应去做。”陈永贵说：“他们到先进大队去，又开始把那儿搞得一团糟。他们还是说：‘先进大队问题多。’他们又搬出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虽然在会上他们说‘不要学’王光美的‘经验’，但他们一来就开始搬用这个‘经验’，他们在洪洞县也是这样做的，在那儿他们打了第二次歼灭战。后来我经常抱怨大寨的苦衷，可洪洞县的人总是说‘我们那儿更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三个工作队又派到了昔阳县，队员们马上又开始第三次打击那些曾被薄宏忠树为斗争靶子的干部，这激

起了人民推翻县委和行政机构的造反运动。

陈永贵接任了县委书记，大寨、侯庄及所有在“四清”运动中受过苦的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一致要求把薄宏忠工作队的所有领导干部揪回来，进行批判和再教育。

张子义不得不返回大寨。白天他们让他到地里干活，晚上开群众大会批判他。因为他曾领导工作队测量过大寨的土地，结果量出来的总亩数比大寨人报的少6亩，所以人们要他在离开之前为他们造出6亩地来。

“我们那6亩地哪去了？是你给弄丢了，你应该把它们找回来，给我们造出6亩地来，否则不许你走。”

“可是，”张子义伸出他那软弱无力的手说：“造一亩地就得300个劳动日，不到5年时间我是造不出这6亩地来的呀。”

“谁管你多长时间。”他们回答。

他们让他苦苦劳动了1个月。

“我们是铁手，他却是软绵绵的手，他只晒黑了皮肤，最后他写了一份深刻的自我检查完事。”大队贾主任说。

大寨公社晋沟大队的群众有一次开批判会时命令薄宏忠站到台上来。陈永贵要来参加这次会议，他要保证让群众讲话，可又害怕便宜了薄宏忠。果然，当他赶到会场时，发现薄正在漫不经心地听着人们对他的轻描淡写的批评。

“这叫什么批判？”陈永贵问，接着他开始控诉以薄为首的“还乡团”的种种罪行。他越讲越生气，挥动着双手，愤怒地指责薄宏忠。陈永贵的发言和姿势感染了在场的群众，人们站起来，抓住薄宏忠的双臂，强迫他低下头，把两手放在背后老高，让他坐“喷气式”。

薄宏忠痛得大喊大叫。

“你喊什么？”陈问：“你还知道难受？你忘了你领导工作队时，有多少人自杀了？”

这种形式的斗争甚至体罚对省级及地区级领导都使用过。按大队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他们把薄宏忠工作队的领导至少揪回了十来个，让他们都坐“喷气式”，并痛打这些他们最恨的人。

“打人是我的错，”陈永贵说：“如果我开始不那样对待薄宏忠，全县就不会发生打人的事儿。但这种行为一旦开始，我就难以制止了。”

昔阳县工作队的傲慢、高压和政治偏见孕育了一场疯狂的斗争，就像狂风一样预示着一场大暴雨的来临，告诉人们一场严重的动乱即将到来。

四十六 私访桃园

从陈永贵对昔阳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运动没有打击、分裂和挖出任何真正的政治错误或真正的敌人，也没能真正地重新教育人民，重新组织农村的革命阶级的力量，也没能把干部改造成新人。

这场运动没有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背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相反地，背在干部们身上的包袱被绑得更紧，更牢了。不分清红皂白把所有的错误和缺点看成犯罪，因为这些“罪行”把干部们搁在一边，即使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不让他们站出来，不恢复他们的工作。这场运动不是一场团结95%干部和群众的运动，而是一场分裂干部和群众，打击干部，使干部相互对立的运动。“四清”工作队打击了所有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因为他们都曾经或多或少的有过一点越轨行为，吃过一顿半顿公家的饭，从集体的地里往家拿过一穗玉米或一截绳子，吃过集体树上的一只苹果，工作队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微不足道的“越轨”行为上，而对这些干部们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视而不见。

1971年，人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以中央的名义制定了一套农村工作的补充条例，歪曲了毛泽东本来的意思，使运动偏离了方向。这个条例被称为“后十条”，是对“前十条”的补充。

我一直没能找到“后十条”的原文，但批评家们说它主要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不是起来清除大的经济犯罪，使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与那些腐败势力作斗争，而是把不正当的行为当成了主要靶子。他们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发展方向的问题，而是“四清”、“四不清”干部之间的矛盾，是贪污干部和不贪污干部之间的矛盾，他们还把党内和党外的矛盾混为一谈，说党员、非党员干部都不清，党内党外都有贪污分子，都应该清理，对掌

握主要权力的党员干部和掌握次要权力或根本不掌权的非党干部一样对待，这样就解脱了党和党员。这样，一场解决当时“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问题的运动变成了一挺打击各地经济犯罪和贪污分子的机关枪，如果工作队找不到大的贪污犯他们不仅会认为那个地方不清，而且会认为这场运动失败了。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曹中南司令员说：“这种里外不分的政策没有瞄准毛主席确定的主要目标。主要目标应该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把他们打倒，不管解决了多少问题，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不允许扩大打击面，不能说只要是贪污犯，党内党外一样对待，否则，就会把目标移向群众，移向基层和农村干部，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犯过一些小错误，尤其是在灾荒年。”

“例如，根据规定，给干部的补贴工分不能超过生产队或大队总劳动日的2%，为了生存，干部们就得参加集体劳动，大部分时间他们要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参加劳动，所以，如果干部迟到了一次，吃了公家一碗饭，多分了点东西，或装了一两次病，就成了经济犯罪。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罪行”上，不看他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他怎样领导群众，只看到他的错误和缺点，并用这些错误缺点来证明他和群众有矛盾，和所有正直的人有矛盾。”

“不相信95%的干部和群众，我们终究会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各类矛盾搞得一团糟，结果我们打击了所有的贫下中农干部，因而就会得出农村形势一片漆黑的结论，我们就会认为农村只有解不开、扯不断的犯罪团伙。所以，结论只能是我们失败。如果大多数干部确实是坏人，那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

基于大多数干部都是坏人的设想，共产党使用“人海”战术，强调外地领导的重要性。党中央派非山西籍的领导干部到山西来指挥全面工作。这些外地干部在省内几个尚未开展运动的中心城市挑选了一些干部，把他们派到第一批被选中的8个问题较严重的县去开展工作，这几个被选中的县包括晋东南的长子，还有阳高、洪洞和昔阳。干部们6月份进行集中培训，10月份分赴各个“靶子”县区，按各县人口平均每20户派一个工作队员，7000名干部到长子，5000名干部到昔阳，到昔阳的5000名干部中有3000名不是昔阳籍。

工作队一到，就避开当地的党员和干部，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搜

集整他们的材料。他们认为外地干部可以不用暴露真实姓名，毫无顾忌地去发现问题，可以对互相包庇和掩盖阴谋的情况采取应急措施。

工作队的战略都来源于“桃园经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隐瞒姓名、身份和一个“四清”工作队一起到过河北东部的一个村子——桃园。她认为毛泽东1927年使用的民主调查办法已经过时了，所以她绕开村里的党支部和群众进行了秘密的一对一的调查。山西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她在村里找到一个特别爱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相信他，依靠他，并让他掌权，撤了其他党员干部的职。然后，为帮助桃园在生产上超过大寨，她要求上面给予大量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帮助。被她扶持为大队主任的人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他在自己的周围发展起一个与他志趣相投、好拍马屁的人组成的小集团，他不搞“先公后私”，不搞以农业作为基础，以粮食为纲，也不能团结全村人大规模地改造自然条件。他不是依靠桃园的广大群众，发挥他们极大的热情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依靠国家帮助，依靠贷款、补助和外地的专家，结果，国家提供的物资帮助没有得到很好的充分的利用，群众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去获得多快好省的经济效益，而是躺着等别人来解决问题。群众说，这就是所谓的“桃园经验”，然而，王光美却为她在桃园的“经验”感到骄傲，为她和她的工作队在桃园发现的大小“罪犯”感到了不起，写了一份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成了全国“四清”运动的指导纲领，当时她的报告作为学习材料分发给各地的工作队，各村的党支部和老百姓。

在我看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1948年驻张庄的土改检查工作队执行的政策是非常相似的。当时，由于张庄许多贫农并没有真正翻身，所以就土改失败了。他们认为土改没有成功就应该责备村里的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肯定是坏人，不是阶级敌人、贪污、腐化分子，就是和这些坏分子一气的“老好人”。土改失败了，大多数干部是坏人，那村里的情况就是一片漆黑，农村的形势就很危急，所以党必须展开一场决战。工作队员们被告知，要么像老黄牛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么被送进屠宰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是要动真的。

工作队一进村，就把党员和非党干部搁在一边，他们只相信与干部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管这些意见的来源和倾向，所以认为村干部

都很坏。结果，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和不正直的人趁机捞了一把，而正直的群众、党员和干部却摔了跟头。至少有一段时间，运动在调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圈圈内徘徊不前，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确实，如果撤换所有的干部，那换上来的干部当权时就更缺乏奉献精神、更没有经验，更不正直。

在土改和“四清”两个运动中，从上面传下来的指示可以被认为形“左”实右的。形“左”是说，他们对对抗性矛盾实行严厉打击，由于他们认为形势一片漆黑，到处都是坏干部，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的运动，审查干部，撤掉所有的干部，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实右是因为他们不做判断、不寻根问底，把一般的矛盾视为对抗性矛盾，但实际上情况并非他们说的那样。

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打击所有的干部，人为地造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不是坏人却硬说他们是坏人，这样打击了干部，分裂了群众，却鼓舞了机会主义分子，使真正的敌人抬起了头。不管“左”还是右，都是革命的逆流，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这种叫做“打击大多数，保护一小撮”的战术在中国革命的残酷斗争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着，每一次它都牵制着运动的发展，每一次都扩大批判的范围，把教育运动变成打击广大干部，乃至广大人民的运动，每一次却都保护了一小撮，因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四十七 洗澡

晋东南的干部们坚持说，他们在黄碾、张庄这样的关键地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前，已经纠正了运动最初在长子和昔阳县搞的过分的行动，说他们已经放弃了“人海”战术，采取了传统的办法，疏散了工作队，放弃了秘密审查，并禁止对所有的错误缺点一律指控。然而，这场运动仍给了全区所有的干部，包括“四清”、“四不清”干部以沉重的打击，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长治市管辖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较晚，并且是分“小四清”、“大四清”两步走的。张庄的“小四清”是在1964年冬天，也

就是在省里派出的工作队受到批评离开大寨的时候开始的。为了开展运动，市里派到张庄一个工作队，不过，不是3000人而是3人，他们是张根虎、薄国祥，还有一个姓刘的，后来姓刘的走了，只留下了一个两人的工作队在张庄开展工作。

张庄的“四清”工作队召开了一个全村动员大会，给群众解释了即将开展的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然后把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组，背对背开会揭发干部的错误和违法行为。“背对背”意思是揭发人和被揭发人不对面。被揭发的人、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分别在“放下包袱”会上见面，会上他们可以听取别人对他的指控。可以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可以揭发其他人，如果揭发得好，就可以成为运动后期的积极分子。

干部的错误和罪行一旦通过“背对背”会议被揭露了出来，就得在“放下包袱”会议上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得直接面对群众，群众就是“澡盆”。在张庄有两个“澡盆”，村南村北各一个，每个“澡盆”由一个市里来的干部监督，由这一片儿的贫下中农负责管理，负责审查住在这一片儿的干部。

白天群众、干部都像往常一样工作、劳动，会议都在晚上开，气氛很紧张，问题很尖锐。工作队的张根虎和薄国祥根本不作任何无罪的设想，他们怀疑每个干部都有不正当行为，即使没有贪污和盗用，至少也白吃过公家一顿饭，多分过公家的一件物。他们说，每个人脸上都有污点，所有的污点都应该揭露出来。

“我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你有问题。”张根虎对第四生产队的保管肖福来说。

肖福来脸红了。

“看，看，我说什么了？”张说。

肖开始出汗。

“你最好都讲出来，你的问题少不了！”张喊着，给肖施加压力。在他的强烈攻势下，肖垮了，一五一十地承认了他所做的一些不诚实的事儿。

对肖福来的主要指控是他在自己管理的仓库里盗用了生产队的几斗麦子，他承认这件事还牵扯到郭元龙。郭元龙是贫农，天主教徒，1948年他保护过张庄的党员，说他们是“好人”，并因此当选了第一

届村人代会的代表。

郭元龙1954年失宠，因为他是承认自己曾是天主教地下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的成员，被揭发参加了这个组织的还有共产党员孟福祿，战时的伪村长郭德有，多嘴的贫农申全德，农民纪永年和木匠李和仁，但由于一被揭发出来他们就坦白了一切，交待了他们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所以没有被起诉，只是受到了批评，消沉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逐渐重新加入了村里的生活。郭元龙后来当了第三生产队的干部，开始负责民事工作，因为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又当了第三生产队的会计。当了会计不久，他又出了问题，成了出名的“多吃、多占”干部，总在人家结婚、新屋落成典礼上吃个够、喝个足。一次，他管的账出了问题。他说他锁在抽屉里的现金丢了，许多人怀疑是他自己花了。另一点，在“四清”运动中又查出他分了肖福来从第四生产队仓库盗出来的麦子，鉴于以上罪行，队里的社员撤了他的职，他又一次变成了普通老百姓。

另一个生产队会计李锁子，工分帐目很乱，他给自己的朋友随便多记工分，自己不上工也记工分，一年时间就给自己多记了80个劳动日，除此之外，还给他的朋友多分粮食。他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怀孕，他就给尚未出生的婴儿分了粮，但却没有记在生产队的帐本上。像肖福来和杨成道一样，李锁子也是从外地来张庄落户的，大队干部对他的背景和历史都不太清楚。他说他是从八义来的中农，可调查表明，他出身于一个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产的上中农家庭，在后来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八义的干部们认为没收了他家的财产是不公平的，所以向他家道了歉，并归还了他家的财产，至少是部分归还了，但“斗争对象”的污名仍缠绕着这个家里的成员。

杨成道，是从长子来的富农斗争对象，张庄的干部们没有对他的背景和过去作任何审查就允许他到张庄来落户了，因为他老婆是陆进俊的姨妈。这次，他也被揭发了出来。作为副业队的采购员，他掌管着的钱比张庄任何一个干部都多，他为砖窑、包工队和副业队的其他企业采购木头、苇窝、煤炭等其它一切必需品，他的帐记得很乱，也没有报销条、收款单，自己滥用了大量现金。副业队的财务帐目太乱以致没人能清理出来，直到1971年，还有1000元现金找不到下落，人们认为杨成道起碼又贪污了1000元，张庄把他送回长子老家接受

监督改造。现在他还在长子。

社员们还指控副业队的会计牛宝山，在几年的工作中贪污了一千多元，把他给撤掉。

“小四清”运动中另一件大案是涉及大队会计郭富书的，他干这个工作已经快二十年了，所以社员怀疑他贪污的数目一定很大，可查帐后发现他的帐目上只短600元，人们指控说在这600元中他贪污了100元，虽然数目不大，但这就足够了，他也被撤了职。当然撤他的职不是因为100元的数目大，而是因为这钱是被一个曾在抗日战争中当过伪村警头的人贪污了，他被撤职是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加上小小的不能让人信任的贪污行为造成的。

郭福书丢掉了大队会计的职务，申启明的二儿子共产党员申继财接任了这个职务，郭福书当大队会计时，他是大队出纳，现在他当了会计，另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胡文发接任了出纳。这个年轻人接任后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不过这事儿以后再讲。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治市的干部执行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他们在张庄执行的政策不像省委工作队在昔阳执行的政策那么残酷，在贪污盗窃存在的地方，怀疑那里所有的干部，他们的怀疑导致一些案例的揭露。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没有给群众讲清楚运动的根本目的，所以运动不能深入下去，调查也只是了解表面现象，证据总是不充分，这样，一些干部能凭编瞎话通过群众这一关，跳出“澡盆”。

“只要你承认了一切，”王京和说：“不管是真是假，只要群众满意就可以过关，如果群众不满意你就得继续当‘靶子’，就得下台，问题就在干部队伍中，每个人都得坦白交待。难道这样做了问题就揭出来了？从表面上看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揭出来了，但实际上，很严重的问题都漏掉了。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并没有教育群众真正理解和抛弃1958年至1959年的‘共产风’和随后的‘三自一包’风；所以工作队和群众只是抓住1000元和10000元的贪污犯不放，他们以揭发出贪污分子的多少作为运动是否成功的标准，工作队从不动员群众，分析和揭露不同的掌权者执行的不同的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涉及路线问题。实际上这是用经济斗争掩盖阶级斗争。”

1971年，王这样的干部认为，政策上的差别是路线斗争，是跟阶



级斗争是一回事，以为不同的阶级就会提出不同的路线。这种看法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前是普遍存在的，然而今天这种看法正在逐步改变。

“在各大队的工作队之间存在着竞争，”王京和继续说：“一个工作队说，‘我们挖出了三个1000元的贪污犯。’另一个工作队就会因为没有挖出一个贪污犯而感到羞愧。”

“你们一个也找不到？那个工作队又说，‘也许你太右倾了。’害怕别人说右倾，所以每个人都在努力找大贪污犯，所以有时证据不足，甚至根本没有证据也要给人戴上‘贪污犯’的帽子。”

即使做了最主动、最积极的工作也很难揭开许多复杂案件的真相。老王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负责特殊案例，并负责对问题作出总结。他指出调查者首先必须保证找准了要调查的人。

“我们调查了一个叫喜伦的人，据说他了解一些情况，但当我们让他写出他了解的情况时，他却拒绝动笔，我们认为他很顽固，并开始怀疑他有什么坏的动机，我们跟他谈了好几次，但都一无所获。后来才搞清楚了解情况的人不叫喜伦，而是叫伦喜，我们找到了伦喜，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

记住准确的调查地点和调查内容也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即使跑断了腿也会一无所获。

“有一桩物资案件，”老王说：“单据上说是在侯庄买的，可是有3个侯庄，我们把3个侯庄都调查过了，发现根本没有卖过这种东西，我们就问一个空手回来的调查人员他是到哪个侯庄去调查的。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公共汽车把他拉到了邯郸，然后他就去了邯郸附近的县城。”

“哪儿，说准确点。”

“我也不知道，你去问我的同伴吧。”

不管是谁，用这种态度怎么能把事情查清楚，所以了解全面的情况也是很重要的。

在西白兔公社，到处传说富农把驴粪放在了公共食堂的饭锅里。

“怎么能允许这样卑鄙的阶级报复？”

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个传说根本不准确。

两个老妇女正忙着准备蒸馒头，忽然刮过来一阵大风，一个妇女警告另一个说，小心点，把笼盖好，别让灰尘刮进去，说不定还会把

驴粪刮进去呢。一个正在门外忙着干活的人听到了这位妇女的话，不过只听到了一部分，就跑去报告说富农弄脏了饭，往锅里放上了驴粪。

当调查结果表明“这是两个妇女要保护食物干净”时，工作队长不相信。

“告诉我真相，”他说：“我什么都知道。”

于是市里又派了第二个人去调查，揭露阶级敌人，但最后他得出的还是同样的结论：她们根本没往锅里放驴粪。

张庄的坏分子申大胡子偷了一个铜轴承，拿到供销社去卖了，有人说这根轴承足有9斤重，人们听了很气愤，但申却不承认有那么重。

“不管你们有多气愤，”他说：“反正我的罪不大。”

这是他典型的混帐逻辑。

“你说‘气愤很大，但罪不大’是什么意思？”我们问：“如果你不犯罪，那我们的气愤是从哪来的？”

一个工作队员到供销社去调查此事，那儿的售货员给写了一张纸条，说有一个姓申的来卖过一根8.9斤重的铜轴承。但是，申胡子仍否认此事，他承认卖过一块1.2斤重的废铜，从未卖过什么9斤重的铜轴承。

因为他交待了许多其他罪行，有的比这件还严重，所以工作队的另一名队员起了疑心，他决定到供销社去作进一步了解。结果表明，从一开始那个供销社的年轻女店员就否认她收过这样的轴承，于是第一个来调查的工作队员就去找供销社的主任，主任说：“她怎么会记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于是他把女店员叫了来，劝她写了那张纸条。现在她坚持说那纸条是被迫写的。当第二个调查者带着这个情况去找主任时，主任说：“她是一个不能相信的家伙，经常作假证明。”

因此第二个调查者带回了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证明是错误的。

当群众这样互相包庇、互相掩护时，就很难搞清事实的真相。

工作队还调查了一个党支部书记（他家里的其他成员也被证明有贪污行为），在长时间的审问中，他承认自己靠投机倒把挣过10元钱。要具体点？他说出了他买的东西，买的价格，卖的价格和做这笔交易的供销社。

经过与那家供销社店员的反复核对，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最后，在重压下，那位店员写了一张纸条，证明事情确实像那位支书讲的一样。后来，这位支书说他那样做是为了摆脱工作队，那位店员说他打证明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你不交待出一点“罪行”，他们是不肯罢休的）。

张庄的工作队把大个子民兵、1961年以后一直担任大队保管的申天喜树成了主要的“靶子”。在“背对背”会上，吴树林说他和天喜从大队仓库里拿过8袋麦子，在天喜家的院子里放了三天，王文则和陆三贵说他俩看见过这些粮食被搬进了天喜家的大门。天喜也承认这些麦子是搬进了他家院子，不过只放了一晚上，那是因为白天装袋装得晚了，不能往其他地方放了，他坚持说第二天早晨就交到了粮食局，陆玉生可以作证，因为是他把粮食拉走的。但由于好几桩别的事情，社员认为陆玉生不诚实，所以，没人相信他的话，没有相信仓库帐本的记录和事实是相符的。因为看见粮食拉进了天喜的大门的是3个人，而说粮食被交到粮食局的只有天喜和不可信赖的陆玉生，所以工作队的干部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他没有贪污这些粮食”。因此，他们要天喜至少赔6袋粮食。他们本来计划要他赔8袋的，但由于当时天喜喂养的两头大队的骡子长得又肥又壮，他们认为这些骡子吃了偷来的粮食，因为骡子是大队的，所以让他少赔两袋。

天喜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并把工作队的决定上诉到了公社，但公社的领导仍坚持原判。这个事情一直拖到1965年“大四清”运动开始。

“小四清”运动的一个似乎不太重要的成果是老农民申启明的大儿子申进财被遣返回张庄。

因为申进财的名字与一个远方亲戚的名字一模一样，人们叫那个人“大申”所以叫他“小申”。1964年清查运动开始时，小申已经在马厂的社办供销社当了好几年干部了。组织派人到供销社帐目进行彻底清理中发现了一些糊涂帐，小申被指控盗用了公款，因此被开除了公职，遣返回乡，对一个共产党员、公社干部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小申不仅个子高、结实、英俊，而且有文化、有能力，所以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家乡，被安排在副业队当工人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坚信自己是一块干大事业的料，他的祖先就很有名气，不仅在张庄，而

且在整个踞城县都很有名，所以他下决心要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干一番事业。小申虽然出身贫寒，但他不会忘记他的爷爷是秀才，曾在县城的一所高小当国文教师，过去家里有30亩地，在上党地区属上等阶层。小申的父亲申启明的财产继承权被爷爷后来找的老婆剥夺了，所以全家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小申从小就在困难的阴影下生活，但由于他在学校学习成绩很优秀，并且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大队干部对他印象很好，所以他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最后又被推荐到公社当了干部，可现在，他又无辜被打到了最底层。他没有深刻检查自己、作自我批评的习惯，也许他在一两次交易中得到过好处，但在他看来这些交易是合法的，社里帐目的混乱不是他的错，他觉得自己当了那些盗用公款人的“替罪羊”。

他的经历与他常常用来激励自己的秀才爷爷的经历很相似，他爷爷就是因为太老实，才没有在老踞城县的贪污环境中发达起来。申爷爷发现自己每次都和一个也是从张庄来的姓李的秀才合不来，李秀才的孙子李光宗也住在张庄。过去，申爷爷和李秀才都有为县里收租的权力，可李秀才收租时总要收政府要求数目两倍的粮食，然后把多收的那一半装到自家的粮仓，而申秀才为李秀才欺骗农民感到羞耻，就告了李秀才的状。但警察局的头头站在李秀才一边，所以争执了好长时间也没结果，申秀才被激怒了就躺在路上喊冤，警察局的头头就打他，结果这事儿闹到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两位秀才都作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一个自己满意的裁决。因为在踞城相持不下，后来案件又被送到了省城太原，到太原后，李秀才找了许多路子，费尽心机，结果申秀才被判输，不久就死了，究竟是伤心而死还是鞭打致死，至今仍是个谜。

申秀才死的时候，他的孙子小进财只有1岁，这孩子不久就知道他是秀才爷爷第一个老婆的孙子，发现自己生错了枝。他的亲奶奶生过一个儿子，即申启明，两个女儿，但在她死后，丈夫又结了婚。这次他娶的是一个很富有的兽医的女儿，这个女人因为很有钱，结婚以后马上就掌管了家里的一切，她对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就像外人一样。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没有奶，就强迫儿媳喂养，这样就剥夺了小申的奶水。申秀才在太原死后，她和她父亲合谋分了丈夫的财产，她和她的两个亲生孩子得了大头，而丈夫前妻留下的儿子申启明

一家只分得了9亩薄地、三间房和老人欠下的一大笔债。启明不得不卖了房子和地去还债，他把老婆和儿子送回了屯留，在屯留小申的姥姥家有20亩地。然后，他自己到太原去拉人力车，辛苦一年后他攒了一点钱让人捎回家，可这捎钱的人把他的钱全私吞了，所以他不得不又辛苦一年，这次他多攒了些钱，亲自送回家来。后来，他又出门给一家地主扛活。小申13岁的时候就在农忙时上地帮父亲干活，农闲时推上一辆独轮车到路上替人家拉瓦罐、棉花等东西，等上啥拉啥。到那时，弟弟申继才也长大了，能和他一起劳动了。父亲和两个儿子辛辛苦苦的劳动终于攒够了钱，能把在张庄曾属于他们的那九亩地和三间房买回来了，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张庄，积极参加了张庄的土改运动。土改中，他们又分得了29亩土地，并有了半头骡子，这样，他们的生活改善了许多。两个儿子学习成绩都很好，都达到了农村干部的读写水平，都入了党，都当了干部。小申到公社信用社当正式干部时，弟弟继才先当了第四生产队的会计，后又当了大队会计。

小申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他发现事业上 and 爱情上的成功对他都来得那么容易。他的翩翩风度和办事能力使他所负责的交易一个接一个地成功，他英俊的外表和出息的经历倍受女人的青睐。追女人不止一次地使他遇到麻烦，最严重的一次是1960年，有人说他和黄碾的一个漂亮女人勾勾搭搭，女人的丈夫对他俩的事儿义愤填膺，要与他决一雌雄。小申，这个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小伙子轻易地就征服了那位可怜的男人，打得他住进了医院。黄碾有许多这位丈夫的亲戚朋友，他们把这事儿报告了派出所，小申被抓了起来，关了2个月，不过没有对他起诉。县里的领导从来没有想过把他关进监狱，最后，他被释放了。虽然他与女人勾勾搭搭很可恨，很不对，但考虑到他的工作态度和经历，是够不着关进监狱的。

很快小申又和张庄村另一头的一个年轻妇女相好了，她是民兵队长秦贵宝的哥哥秦财宝的寡妇，她自己长相好，把家里收拾整齐而出了名，干家务活也是张庄最好的把式之一，饭做得最香，衣服缝得最好。她丈夫死后，许多人想跟她好，最积极的一个就是他的小叔子秦贵宝。表面上她对秦最好，她要让那些想跟她相好的人相信，她要 and 秦贵宝结婚，但同时，她又悄悄地让小申到她的屋里去，偷偷与他相爱，

然后，突然宣布要和他结婚了。秦大吃一惊，非常懊恼，他不朝抛弃了他的嫂子发脾气，而是朝小申大发脾气，因为小申戏弄了他。从此，他就对申进财有了深深的怨恨。在他看来，他的新娘被情敌勾了去，就好像罗密欧征服了朱丽叶。

小申由于财务问题被遣回张庄为以后矛盾的发生提供了一个舞台。不管事实如何，大队很重视他的经商能力，不久就让他负责起了副业队的工作。但他却认为这个工作没意思，他曾经是公社的干部，他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比村里哪一位干部都强，但没有被选为大队干部，却被派到了这个小小的副业队，他觉得自己失掉了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名誉和地位。他不把公社信用社对他的指控当回事儿，二十多年前，他的爷爷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为什么又轮到了他？他和全家人都认为原先的诬陷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每个人都得把自己往好处想，在中国官场的政治运动中，如果自己不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先辩护，那还能指望谁呢？

降到了一个队干部的地步就够倒霉的了，小申又把自己摆在了民兵队长秦贵宝的对立面那就更倒霉了。秦名义上是为大队主任陆进军的人效力，实际上却狐假虎威。秦之所以恨小申是因为他抢了他的新娘，但新娘给小申并没有带来别的，只有麻烦。

徘徊了一个时期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来到张庄时，小申看准了机会，他要翻上去夺权，他要行动了。

四十八 毛泽东的“二十三条”

“大四清”运动是在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补充十条发动反攻以后开始的，毛对“四清”运动被用来打击大多数干部群众感到痛惜，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了一个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并总结了一个纪要叫《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由于这个纪要分为23个部分，所以也叫“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向刘少奇提出的狭隘的经济方针提出了挑战，指出全国目前应集中精力抓阶级斗争，第一条说“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第二条直接反对刘少奇关于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到了以下三条：

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是刘少奇在他的十条里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提法没有阶级性、历史性，他说，最后一种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度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

然后，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仅仅是贪污、受贿和犯错误的干部群众。

接着又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边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边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以上总结说得很清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及其支持者主要有两种人：

1. 一直反对搞社会主义，但并不在幕前的阶级异己分子。

2. 蜕化变质，接受贿赂，分不清敌我界限，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的革命分子。为了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商人这些阶级异己区分开来，第二种人可以或以后可以很明确地称作“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显然，对这个1965年第一次提出，以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断重复强调的观点，大多数群众是不大清楚的，他们不大清楚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指什么人。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私人资本家，用剥削的手段占有、控制生产资料，获取利润只是一种主观想象，它已不再是划分阶级的界限，仍然存在的是对信仰和行为的主观见解和判断，对不同政策和路线的主观看法。物质刺激、为获利而生产（哪怕是集体）、强调技术忽视政治，这些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但毛泽东又一直很明确地指出，物质刺激可以搞在生产上，要力争产量，超计划，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掌握先进技术，这样，人们就很难找出一个标准来作出对与错的判断，谁能作出正确的选择？正像叶剑英在1979年时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和批判修正主义，但对‘修正主义’书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相对而言，要找出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与国民党有勾结的人、为日本人服务过的人就容易多了，你可以找到许多这些人的“犯罪”事实，然后把他们划为“敌人”。

因为干部们发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很难下定义，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一边去重新审查过去那些斗争对象的阶级成份了。

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指出，刘少奇的提法没有说明运动的目的和对象，对运动成功与否的标准，刘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清与不

清，这四个方面归根到底就是个经济问题。在此，毛提出了六条衡量运动是否成功标准，虽然也包括经济问题，但又不仅仅如此。毛的六条标准是：

1. 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 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 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 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 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 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针对运动初期强调秘密调查和因此而扩大了打击面的倾向，毛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方法，他说：“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工作队必须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的分配（生活问题）”。

工作队积极揭发经济犯罪，通过增加揭发数量来表示自己的成绩，他们按照运动初期的政策，使用了残酷的手段，包括刑讯和威逼，来强迫当事人坦白交待，毛泽东坚决禁止这种做法，甚至禁止把坦白作为证据。

刘少奇的部下不信任本地干部，让外地干部来领导工作队，他们在逃中的地方集中大量的干部打“歼灭战”。毛泽东则强调每个省、市、自治区都应该有安排工作队的权力，反对把庞大的工作队派到县、社、队去，反对搞“人海”战术。

在运动初期曾普遍实行的政策，把大批干部搁在一边，把小毛病、小错误说成大错误、大罪行，因而使大批被指控的干部再没有重新站起来了。为了克服纠正这个政策，毛泽东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说：“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

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以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强调，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同时，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从下到上一律夺权的现象是以“二十三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第7点为根据的，“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

这里并没有暗示要从下到上一律夺权，这是党的领导对工作队的指示，这里的夺权是指工作队通过和上级领导商量，以发动广大群众，征得群众支持为目的的一种行动。当然，很少有人会想到二年内，全国上下就出现了夺“走资派”权的来自基层的成群结队的造反派组织。很难说，1965年毛泽东有没有这种想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有决定革命命运的斗争因素都是在“二十三条”中提到的——走资派、反党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等。夺了权的有两种人，一种人占了便宜，从下面夺了权，但上面不承认；另一种人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工作队员，他们撤掉了犯错误的干部，暂时掌握了领导权。后者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常常出现，例如，1948年太行地区的土改检查工作队就是这样。前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从未见过，要找到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必须返回到全国解放前，小股共产党组织举行造反，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那20年的斗争中去。

毛泽东的“二十三条”出台后，张庄及长治市管辖的其他农村大队的“小四清”运动慢慢松了劲，最后在春耕前结束了。市里召回了它的工作队，组织他们学习“二十三条”，然后把他们集中派到了长子去试行新的政策。虽然揭出来的问题很多，但真正得到解决的却很少。离开的干部们留给大队的是一片被悬起来的兴奋和激情，许多党员、干部的问题没有定论，被搁了起来，再没人过问了。

四十九 大四清

1965年8月，张庄刨土豆的季节，又一个整风运动的浪潮“大四清”运动到来了。这次来的是一个由15名市里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长治市武装部政委肖察是工作队队长，政治主任是一个叫毕敏的人，其余还有一名副队长，12名队员。每个小队都派去两名工作队员，这样张庄每个生产队都由一个三人委员会领导。

这些市委干部都学习了毛泽东的“二十三条”，至少表面上学习过，他们满怀阶级感情来到张庄，声明他们不只是为了找贪污分子，更重要的是要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实际上，他们执行的仍然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策，他们不接近张庄的任何一名干部，不在干部家里吃派饭，甚至不与他们说话。他们把所有的干部都搁在一边，让派到生产队去的两名工作队员负责队里的一切事务，他们把农会委员召集起来（这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让他们负责审查干部。他们不允许任何干部及家属参加恢复了的农会及农会的活动，还警告干部们见了面不要“交头接耳”，就是说不要交流意见和看法。为了保证这个警告生效，他们派农会的积极分子昼夜监视村干部，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说什么是？跟谁说了？甚至让积极分子注意他们睡觉时说了什么梦话！

几天以后，工作队把各大队的干部都集中到了公社所在地——马厂，在那开了20天的“洗脸、洗手、放下包袱”会议，或简称为“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少数各大队的积极分子，他们是代表各村的农会来与干部们“面对面”的，而各村的农会正在忙着“背对背”收集材料。

好长时间没人知道到底要干什么，积极分子们也不知道叫他们来干什么，有严重问题的人白天黑夜都担心，没有严重问题的人也在担心。最后工作队才解释说，积极分子是来提供材料的，少数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所以有些被指控的人还可以成为积极分子，大部分问

题也会根据当事人的态度分期分批得到解决。解释以后才缓和了許多人紧张的心理。

工作队要干部们一个一个地讲，先是大队会计，然后大队保管，再后小队会计，最后小队保管，问题讲出来以后，大家进行讨论。如果有人說“去年，我白拿了公家5斤北瓜”。另一个就会說：“你敢說不是10斤？”

工作队把每个大队的干部分成了两组，每组有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每个人都作了第一轮试验性的自我批评以后，那些问题不大的人就成了组长。小组对组员的生活和安全集体负责，他们实行了强制性纪律，保证没人回家，防止有严重问题的人逃跑、自杀，所有反常和可疑行为都得向工作队汇报。

这样的机构一建起来，工作队就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案件。白天，工作队员们与可疑分子单独谈话，晚上可疑分子到大队或联组会上交待问题，如果组里对他们的交待不满意，那他们就得到“四清”办公室等待进一步处理。大队会一般在晚上11点才结束，紧跟着还有一个二个小时的个人动员，领导要解释党的政策警告被怀疑的对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会人員拿着从大队群众会上带来的材料，判断每个人的自我批评是否彻底。干部没有彻底交待大队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就让他们多交待一些，然后再把交待的内容总结出来送回他们所在的大队，去跟群众的揭发进行核实。

工作队让每个干部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记住以前他们有多穷、有多苦，记住是党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现在当了干部，掌了权，却干起了损公肥私的事儿，通过忆苦思甜，他们哭了，于是工作队便要求他们讲清楚到底贪污了多少。

一旦工作队的干部们满意了，他们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决定是从宽还是从严处理。

“讲得很好，尽管他贪污了100斤粮食，1000块钱，但他全坦白了，所以赔偿的数字可以少一些。”

他们把安昌大队的黄小元树成了典型。他贪污了几百斤粮食、几百元钱，他的母亲和舅舅到会上揭发了他，他们“忆苦思甜”，责备黄小元忘了本，他们说：“现在，他想剥削人民。”

他们让共产党好好教育他，严厉惩罚他，这样他以后就不敢再干这种事儿了。由于他自我批评作得深刻、彻底，所以每样东西工作队只让他赔一部分，也没有再给他其他惩罚。小元自己也很高兴，很轻松，在大组会上讨论他的问题时，有人说，“看人家小元讲得多好，看对他的处理多宽大。”这样，其他人就有勇气坦白了，不再隐瞒任何问题。

小组会是每天开，任何干部如果在小组会上不彻底坦白，领导就召集大组会要他坦白，他们叫这个办法是“加温”，如果大组会上仍不见成效，他们就召集更大的会议，领导们就是这样无情地对待贪污问题，他们给干部们施加的压力也确实够大的。

李来全在张庄当了半年的小队副队长、一年的队长，他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工作队把他叫来了，用同样的办法威胁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问题，群众已经揭发了你的问题。别以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你必须提高革命觉悟，老实告诉我们，你拿了多少粮食？”

“我没拿公家一颗粮一分钱！”来全说。

“好！如果你敢保证自己讲的是实话，我们可以相信，但你最好再想想。”

再想也不会改变事实。因为，实际上工作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有问题的材料，所以，他被指定当了小组长。

大队会计郭福书在来全这个小组，大组会以后他哭着来找来全。

“你哭什么？”来全问。

“我说不清自己的问题呀？”福书咬了口馒头硬咽着说：“这里吃得很好，可我过不了关，我确实没什么问题，可他们硬说我有。”他哭了好长时间。

他当张庄的大队会计已快二十年了，就因为解放前曾当过伪警察，大队有些人、工作队有些人就不让他“过关”。“小四清”发现他帐上短100元。实际上，是张庄工作队的政治主任毕敏想在张庄挖出一个“大贪污犯”，他看见郭福书很像，但最后，一切想给福书加上大罪名的企图都失败了。遭到失败后，毕敏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申天喜和那8袋粮食上。

对天喜来说，不幸的是，那个曾拉走了4袋粮食的吴书林被张庄农会选成了积极分子。他已经揭发了别人许多问题，但他喜欢更高的

名望，所以在同申天喜“面对面”的会上，吴书林重复他的指控。

“拉到天喜院子里的是8袋麦子。我拉了1车，天喜拉了1车，1车拉4袋。”

王文则和陆三贵站起来说：“没错，我们看见过。”

“你说这事儿没问题，”毕敏转向天喜说：“可这儿有人作证。”

在毕敏的诱使下，会议就这样开了一整天，最后天喜觉得受够了，站起来说：“是，是我干的，我贪污了这些麦子。”

“你吃了多少？喂了牲口多少？”

“天喜看了看周围说：“大部分浪费了，我吃了我想吃的那么多，喂了牲口许多。这就是骡子那么肥的原因。”

“还剩多少？”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拿公家的粮食，怎么能说出还剩多少？他得想想，编一个数字出来。

因为天喜说不清，那天的会就暂时散了，毕敏要天喜好好想想。因为后来也没有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所以毕敏说天喜贪污了8袋麦子，并像以前一样，决定让他赔6袋。

因为天喜没有执行这个决定，这件事儿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他自行退了党，党支部重新建立时，他拒绝登记，直到1971年他仍在党外。

就在毕敏追击像郭福书、申天喜这样的可疑目标时，真正的贪污案却在他的鼻子底下发生了。

郭福书被撤销了大队会计后，申继财接了他的班，继才从前的出纳工作交给了20岁的胡文发，几乎同时，另一个年轻人申大力接任了副业队的会计。在“小四清”结束，“大四清”开始的7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个在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贪污了怀疑郭福书在20年时间里贪污的钱数。张庄的群众非常信任他们，把他俩都选成了农会的积极分子，显然，这两个年轻人把这个看成了他们逐步升级的贪污行为的最好掩饰。他们把那些在“小四清”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人赔给大队的钱贪污了，把国家给在马厂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每人一天4毛钱的补贴也贪污了，这些钱本来是作为公积金的一部分以后要按工分分配给社员们的现金。秋天开始算帐时，村里人找不到这些钱哪儿去了，胡文发和申大力都贪污了。

“这确实使我们吃惊，”李来全说，“尤其是胡文发，他就生在张庄，才20岁，平常很老实很积极，才从学校毕业，我们想给他一个机会，帮助他进步、发展。‘小四清’以后才让他当了出纳，才干了7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他贪污的钱居然比张庄任何时期的任何干部都多。”

正像老八路王京和说的一样，工作队死盯着贪污问题不放，大的问题就容易被忽视，同样，小问题也很容易被夸大为大问题，张庄大队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张兴发的问题就是这样。马厂的三级干部会揭发出了他所有的房产交易和从三个生产队借粮的问题，他们说兴发和三个生产队长是一个“贪污团伙”，并把他们当成了教育全体干部的典型。兴发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十几次自我批评，听取其他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向工作队作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被群众讨论以后，兴发自己又和工作队的干部读完后再到群众大会上去讲，群众再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提出新的问题，就这样，对兴发的批评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时间。

在批评教育的过程中，他成了张庄有名的“走资派”，成了“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因为他在房产问题上搞投机，借了公家的粮食不还，解放前参加过“土匪”活动，大队撤了他的职。参加“土匪”活动的事儿，已经被提过好几次了。这件事儿发生在灾荒年1942年，兴发作为杨地主的雇农，曾参加了杨地主组织的夜里袭击粮仓的活动，并帮助把偷来的粮食运回了地主家，作为报酬他还分得了一点儿。一个干部犯了新的错误时，解放前的“罪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为了更确切地证实这件事，后来工作队又派人详细调查了兴发的过去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但不管他们怎样渲染、夸大这件事儿，也很难把兴发定成一个罪大恶极的顽固的反动分子，因为他占用的公款数字太小，只有180元，因为坦白诚恳，后悔他占用公款欺骗了村民，他们把他欠大队的钱减掉了80元，卖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就赔了一切。

工作队没有把他的案件上交法院，党的领导也没有给他任何党纪处分，最后，大家都认为他得到了从宽处理。

但一个张庄的领导干部、一个当了20年村干部的人、一个领导张庄经过了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的人，最后就由于180元钱被说成了“走资派”，羞辱中生活了许多年的事实却是存在的。

几乎同时，一直盼望有个儿子、并已收养了他弟弟的一个儿子作继承人的兴发，很骄傲地当了父亲，他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早产孩子生下来才一斤多重。孩子出生后，母子俩都病了好长时间，兴发由于被撤了职，也没啥公事可做，正好呆在家里照顾这个处在危难之中的家。他雇了一个中医住在家里，随时观察照顾这娘俩。慢慢地，他妻子复原了，儿子也侥幸地活了下来。看到这一切，所有的人，包括兴发都很惊奇，兴发给儿子取名“小圪儿”（小不点儿），因为他实在太小了。“小圪儿”虽然个子小，在其他方面却与正常孩子一样发育，一学会走路，就天天跟在他爹的身后，兴发到哪儿他也到哪儿，兴发太喜欢这孩子了，一刻见不到他都不行，孩子要什么，他就给买什么。张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兴发宠小圪儿那样宠自己的孩子。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不再为公家做事了，有空闲了。

然而，像兴发这样有能力的人不会被永远抛弃，几年以后，大队决定建一个猪场，让兴发去负责，他又一次为公家做事儿了，虽然这太单调了。

在调查过程中，工作队还指控了兴发许多与他根本无关的问题。其中一件就是裴小四的死。

裴小四是张庄大队的一个年轻社员，水泥厂开工后，他偷了厂里的工具和铁条，厂里的工人抓住了他，并把他交给了公社的治安干部，这个人问清情况后就把他放了。之后不久，有一个农民在张庄的一口井里发现了小四的尸体，长治公安局派人来调查了此事，得出的结论是自杀，因为他们在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打斗、暴力的痕迹，所以下结论说：“没人打他，也没人把他推下去，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一般来说，官方作出了结论，这件事就可以了结了，但这次没有，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不相信公安局的结论。从那以后，纠正党风、克服大队干部问题的运动一来，就有人把裴小四的死提出来。在“大四清”运动中，突然有人说是兴发把小四打死投进井里的。

这种指控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代表着一种倾向，每次换上新的领导，都有人说是大队干部杀了小四。

许多年来，这桩奇怪的，有点异乎寻常的裴小四案件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每次运动，党外的人都把它作为跟党员们算帐的武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中，搞派性的人也用了这根“棍子”。从裴

小四事件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挥舞这样的“棍子”在张庄的政治生活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在“四清”运动中，兴发被说成了“走资派”，但张庄不只他一个，工作队把郭元龙、郭福书、肖福来、申天喜、胡文发、申大力这样的贪污犯和贪污嫌疑犯都称为“走资派”，还把那些在1960—1964年的“三自一包”风中占了便宜，建立起了个体企业、搞自由买卖的农民也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为了保证这些“企业家”们回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挣工分，工作队取消了对他们的特许制度，指出任何人不许再以大队的名义去搞各种经营活动，即使给大队交钱也不行，任何人不许悄悄在家搞修理挣钱，他们还命令大队没收了这些人所有的修理和装配工具。如果说工作队制定的政策有些过分，那大队干部们执行的就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糟，他们没收了秦来财和吴双喜的修理工具，却允许生意本来就做得很大的晋申义留下了他的工具继续干，还允许王老太的儿子、中学毕业生、共产党员王仁宝干起了自行车修理生意。

当工作队在慢慢处理这些“走资派”案子的时候，长治市委又下达了“四清”运动的新规定，又一次号召对村里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调查、核实和重新划分。这个规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的考虑。

1.“二十三条”说，支持“走资派”的有已划了的和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

2.“二十三条”号召要以贫下中农组织为骨干。

如果不对有怀疑的家庭的阶级背景作彻底的调查，就不可能说出到底有没有实际上是地主、富农却被划成了贫下中农的人，不对全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核实，就不可能说出到底谁是贫下中农。在土改运动中划分阶级成份以后，这项工作1954~1955年又搞过一次，自那以后，群众已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因此到1965年，他们对阶级标准已比第一次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18年前土改的时候，村干部根据解放前三年各户拥有的生产资料及财产划分雇农、贫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因为在那个革命阶段最关键的问题是划清敌我界限，中农是朋友，富农是敌人，所以上中农和富农之间的划分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做了最细致的工作。我在《翻身》中写道，干部们在这两个成分的划分上非常细心，

靠自己的劳动挣得一半或一半以上收入的家庭被划为中农，而不到一半的收入靠自己劳动所得，其余的靠剥削雇农、出租土地和向外放高利贷的家庭被划为富农。

1948年强调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土改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依靠农民中的哪部分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呢？就此毛泽东有一个新的提法，“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阶级成份——下中农，而且把这一类视为基本群众，这样就出现了一条新的、值得人们注意的划分线，在下中农和一般中农之间的划分线。

下中农包括两种人——老下中农和新下中农。前者是指那些在土改前就占有，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土地、牲畜和农具，但仍受剥削的家庭，因为他们还得出动帮工，至少部分时间出去帮工，有时还得借高利贷，这些家庭在土改运动中没有分到足够的生产资料使自己能够完全自给自足。

后者，新下中农，是指那些在土改中分得了足够的财产，大致达到了老下中农水平的家庭。

除了这两种“还不富裕”的下中农，还有许多过去的贫农，尽管他们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但由于缺少人力、畜力和农具生活仍然很困难，所以的确不能被划为中农，仍然是贫农。

这些贫农和“还不富裕”的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60%~70%，对“这几部分人”，毛泽东说：“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还是困难的，或者仍不富裕。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所以，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不富裕的人们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

这是毛泽东1955年7月的指示，遵照毛的这个指示，党对全国的农民进行了一次阶级成分的重新划分，以便把所有的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10年以后，“大跃进”、“共产风”、“三自一包”以后的1965年，一个巩固合作化运动的新的运动又一次强调它的社会基础——贫下中农，并号召重新审查，谁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1965年，晋东南的干部们对这个指示执行的不像从前那样严格，他们倾向于把农民的阶级成分划得低一点，这样就扩大了贫下中农的范围，缩小了中农、地主、富农的数量。

农民们又用自报公议的办法来取得共识。张庄把过去的上中农划成了中农，把一些中农划为下中农，陆和仁、李平定、王书宝、赵宝成和赵进友都由上中农划成了中农，杨富生和陆勤发由中农划成了下中农。

阶级成分降一级对这些人的精神影响很大，每个人都愿意成为“基本群众”。

但同时，有大约20个人的阶级成分突然升了级，这些人都是土改后来张庄定居的，在他们中间，本来是上中农的却说成了中农，本来是富农的却说是贫农。这些人包括从西山来的肖福来，他的小舅子李九祥，还有李九祥的哥哥。他们说他们之所以离开西山是因为那儿在流行甲状腺疾病，但实际上，因为他们是富农，被没收了财产。这种人还有从林县来的好几家姓郭的，他们都是大队会计郭福书的亲戚。郭福书自己是1942年从林县逃荒来的，由于兴发的帮助(兴发也是林县人)，尽管没有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郭福书就让他们在张庄定居下来了。晋发旺、晋万良、晋喜生和晋大宏都被查出过去是上中农，这个成分使得他们在张庄几乎呆不住了。

张庄本村人的阶级成份按自报公议的办法划分，所有从外地来张庄定居的人必须有他们原籍公社开的证明他们成份的证明书。这样，有些人，如李九祥，好像很为难。虽然他回了西山好几次，却没有开来证明，不是说那儿的干部不在家，就是说人家很忙，再不就是找不到，最后，他终于拿来了一份证明他是贫农的证明信，是住在他院子里的一个新定居的人晋来财为他开的，但干部们不相信这个证明，他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就派了两个人到他的原籍大队去调查，结果查出，李九祥根本不是贫农，他和他的哥哥还有肖福都是斗争对象。

这个情况使大队干部感到很窘迫，因为他们已经把李九祥选成了大队积极分子，代表张庄的贫农到马厂去参加“大四清”会议了，他们还救济过他30元钱、3斤棉花和15尺棉布。在“四清”运动时，政府拨出一些救济款物给穷人，以弥补过去由于阶级界限混乱，大刮私人企业风，救济款物被滥用或分配不当的过失。

当大队干部们得知李九祥实际是一个逃出来的富农时，便让他退还了国家的救济款物。他还不了，因为已经花光用尽了，他们就把他

的房子作了价，充了公，让他以后分期付款再买回去。

这房子是他作为贫农免费得到的土改运动的果实，现在，他成了富农，所以必须出钱来买。

时间的迁移和所有制的变更，产生了1955年尚不存在的与阶级成分划分有关的问题。一个是对地主的子女们谈如何称呼的问题，那些自己当过地主，曾收过租，收地税的人仍被称作“地主分子”，但这个称呼不能强加在那些自己名下从来没有过土地，没有收过或花过不劳而获的钱的年轻人头上，这些年轻人开始参加了互助组，后来又参加了张庄大队的集体生产劳动，最后被称作“无业劳动者”。

另一个是应该如何划分郭真宽妻子这类人的阶级成分。她原先嫁给了国民党官员、伪区长孟宪忠，丈夫孟宪忠作为汉奸被镇压以后，郭真宽娶了她，当时她的成分是地主，与真宽结婚后，她作为一个贫农的妻子勤勤恳恳劳动了许多年，表现很好，她获得了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权力，大队干部把她改划为贫农，同时，要求真宽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因为他妻子的脑子里残留的一些地主阶级的思想也许会影响到他。

虽然通过结婚可以改变阶级成份，但共产党的指示仍包含一些以性别为基础的不公平的因素。一个地主的遗孀或女儿嫁给了一个贫农，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改划为贫农；而一个地主的儿子和一个贫农的女儿结了婚就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不管他勤勤恳恳劳动多少年，他仍是“无业劳动者”。这是因为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姓氏、成份等一切可以继承的东西都随男方。妇女嫁“出”，在众人的眼里她很快就成了他丈夫或丈夫家的阶级成份。相反地，男人取“进来”老婆，却不能随老婆的成分，而且这个继承下来的成份还要传给他们的儿子。

五十 曲折的路

试图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假设、推测、问题及回忆进行总结，我要求每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场运动是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是否贯彻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晋东南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英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在今天，他的这些观点肯定会被认为是“四人帮”的观点。他彻彻底底地谴责运动的初期阶段所执行的政策，照他的观点，实际上是“坏人”——反革命分子领导了这场运动。

李司令员称负责长治市和城郊农村社教运动的大型工作队的队长王尚治是叛徒，说这个工作队的政治主任程首创和武乡县工作队的政治主任张行夫是国民党分子。张行夫当晋东南地委常委和省委联络组主任已经8年了，可李说，解放前他在黎城县领导过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现在仍在秘密活动。

李司令员还谴责这个黎城县大地主的儿子领导的7000人的长子县工作队，他称他“老爹”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袭击共产党的国民党官员”。

李英奎认为共产党是按照刘少奇“吸收向共产党投降的，背叛了国民党的人”的政策，吸收了这些坏人、叛徒和卖国贼。照李英奎看来，这些人虽然加入了革命队伍，但并没有与国民党彻底断绝关系，他们是革命的定时炸弹，在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内起着特务的作用。

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接收了一大批爱国学生，其中有许多人是国民党官员的儿子或女儿（那时候，除了他们，谁还能上得起大学？），李英奎轻易地就可以拿出证明他们阶级成分和从前与他们有联系的其它干部的罪恶材料。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战争年代按照共产党的团结一致抗战的政策与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国民党积极分子也成了阿基里斯的脚后跟，他们是用“无产阶级”的挡箭牌来抵挡一切对他们的攻击。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英奎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了革命的，他的阶级背景也难免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也许是他对他们有深仇大恨的原因。

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李散布这样的观点，刘少奇的“十条”一提出，地区的“官员”们就组织了一个7000人的工作队派到了长子县，去贯彻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些干部们隐姓埋名，使用秘密的工作办法，拉开“人海”去扎根串联，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击大多数正直的干部，保护一小撮叛徒。只是在毛泽东提出了“二十三条”以后，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把运动转向了正确的方向，即使这样，他们也只纠正了一少部分运动初期的错误。

1971年已经当了昔阳县县长、山西省副省长的陈永贵，虽然从来没有说过是国民党分子领导了“四清”运动，但他却也像李英奎一样强烈谴责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政策。

“‘二十三条’提出以前，”陈说：“工作队执行的方针和政策是错误的。毛主席干涉以后，工作队纠正了一些错误，但只是在表面上。如果工作队再进一步深入了解问题，他们就会打自己的脸，所以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中南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指责刘少奇错误的同时，也强调了积极的一面。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发表后，他说：“运动有了正确的方向，但仍有一些流毒存在。比如工作队仍很庞大，虽然他们放弃了王光美“扎根串联”的办法，但仍使用着一些非常复杂的工作方法，他们经常用刘少奇的观点来歪曲毛主席的路线，仍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

“我们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对的。刘少奇企图阻止、破坏这场运动，但每次毛主席都及时地指出了问题，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觉悟，每次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路线总获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完全抹杀“四清”运动的成绩，为被打倒的人翻案，但中央基本上肯定了“四清”运动。必须看到当时农村的具体情况，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主要是不清楚毛主席的路线，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只要认识了错误，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就可以继续工作。”

“但不管下面的问题解决得多好，他们也不能挖掉上面刘少奇的根子，就是说，在下面的县里也还有没有被揪出来的人，因为上面有高级干部保护着。你在村上干你的，可上面有人操纵着一切，因此，问题还是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这一点与周恩来的看法大致相同。周恩来1971年总结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党内两个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那一年党中央是这个看法，后来也一直是，直到1980年邓小平才对这个看法提出了异议。

周恩来说，1963年，毛主席提出了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刘少奇就提出了另一个“十条”来进行反攻，全是些毫无意义的复杂的東西，是繁琐哲学。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抓党内走资派，

他坚持要划清“四清”、“四不清”的界限。所有的干部，不管你掌大权还是小权，党员还是非党员，只要你有一个不清，就要被撤职。

有了这样的政策，不禁要扩大打击面。在农村干部中，自私自利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常有拿一点公家的东西据为己有的现象。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被说成是坏分子，那几乎所有的农村干部（极少数除外）都得被撤职。假设一个干部把掉在地里的东西，一只筐、一条麻袋、一根绳子拿回了自己家，他算不算贪污犯？如果把这也叫做严重的贪污，那贪污犯究竟有多少就很难估计了，那数字可不得了。

刘少奇把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看成坏人、腐化分子，他打击了许多人。他和他的小组到农村蹲点时搞秘密调查，他们说这是“扎根串连”。共和国成立都15年了，他们仍在搞秘密工作，这有什么好处？

“扎根、串连、搞秘密调查”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他根本不提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全背离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

用刘少奇的这种办法撤掉了大批干部，提拔了大批的新干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一场谁来掌权的毫无原则的斗争，还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最后就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给我提出了一些劝告：“如果你到桃园去搞调查，就应该在那儿呆上一段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大寨、张庄、桃园这三个村是值得注意的三个点，大寨走的是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桃园走的是刘少奇、王光美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张庄现在的情况怎样，张庄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这些观点没有一点抓住了今天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发动下面的群众，他要求人民判断、批评、监督党和国家机构，因此要求恢复贫下中农协会，而刘少奇则好像把这样一场群众性的运动看成了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权威的威胁，他竭力用从上到下整顿基层干部的办法取代动员乡村一级的群众，正像莫里斯·迈斯纳（美国作家）指出的“毛泽东强调第一步是发动群众，让

群众发动起来，而刘少奇则坚持开展社教运动要从上面派工作队，整个运动应该由工作队领导”。

主要依靠工作队开展起来的运动就不会以高级领导阶层的“走资派”为靶子，而这个正是毛泽东认为的最重要的靶子。这两种态度说明了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总是把人民看成聪明智慧的贮藏所，是胜利的主宰者，总是依靠人民去克服党内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纯，相反地，刘少奇把党的领导看成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他认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所有的缺点和错误。在刘看来，党，至少党中央的形象是绝对完美的，而在毛看来，唯一绝对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按他的理解，他认为党走错了，就越过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这样，他越过了所有的革命机构，直接发动起了人民。

所有的评论家都同意一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叫“四清”运动），根本没有结束，1966年它又被一场最古怪、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吞没了。在争夺政府权力和职位的派系斗争中，1963年提出的看法一直没有找到结论，对领导权究竟属于人民还是属于党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致的看法。至于农村，没有人能详细制定衡量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劳动所得与免费供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标准的尺度，所以只能对大队社员各种不同的兴趣进行调查和调和，这样他们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使几千万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共产风”，强调公共、集体免费供应和共产主义新风，把广大农民又带回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中。这也是一场政治灾难。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干部自我改造的整风运动，它没有“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是把干部和群众搞成了对立面，为了夺权相互武斗。

看看这些结果，我们开始担心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四清”运动是不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且需要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对60年代纠正党风和中国的建设是否起了正确的作用。

要回答这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的一些情况，我们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并尽力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场运动不像

现代历史上的任何革命运动，更像封建时期大规模的起义，如法国的百年战争，日本的倒幕运动。但在找到机会去向老百姓们了解这场运动之前，我们参加了张庄农民的种麦动员，参加了宣传队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新的党的整风运动。



第五部

整社

资产阶级社会嘲笑我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只讲公，好像不存在私似的。”其实这并非事实。我们认为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我们所提倡的是——集体第一，公众第一，个人第二。

——周恩来 1971

新
子
舟
舟

PDG

五十一 种小麦

一个难得的下午，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远处的山脉尽收眼底。在一块五英亩大的地里，50名社员分成若干小组，各自干自己的活儿。一组妇女分散在地里，走在其他组的前面，负责用木桶把拖拉机耕耙过后留下的土块打碎，这最后一分钟的苗床加工甚至可以确保小麦的发芽生长。

妇女们的东面，赶马车的人来来往往，不断地从第四生产队肥料堆拉肥。十来辆平车不停地把运送的肥料一堆一堆地倒在地里，排成一条条直线。由于一些人推肥倒肥，另一些人装车，所以，在地里穿行的总是只有一二辆车。运肥车之间点缀着拉大粪的车，这种车比运肥车少，车上装有一个木桶样的容器。他们有自己的时间表，他们把大粪倒进临时厕所中被社员戏称为宝贵“黑色金子”的土池里，专门有一组人把尿素从塑料袋中倒入土池里，每池里倒二三袋，以增强肥效。

赶大车的和倒化肥的都设法适应播种小麦者的节奏，正好走在播种人的前面。一大群妇女分成四个小组，第一组是开沟者，用一队马和一个特制的犁，几分钟便可开出足以使别人忙活半个小时的犁沟。他们之后是十来个施肥的人，他们全力以赴用扁担挑着桶从化粪池里舀上大粪，均匀地倒在开好的犁沟里。第二组十来个人不是用桶，而是挑着筐子把适量的干粪肥撒在地里，再混和起来。最后一个步骤是，一对技术精湛的播种者把种子均匀地撒在犁沟里肥沃的土壤上。他们后面跟着几位社员，在种子上盖上一英寸厚的表土。

在这种复杂的作业过程中，每项任务都是从其准备工作中产生的，因为每项任务都为下一项任务做了准备工作。干活儿的人就像某类乡村芭蕾舞演员一样，随着他们前进的步伐，编出一组各种各样的动作，而又毫不费力地组成了一个和谐的节奏。一道又一道的犁沟横穿整个田野，几十个人各自都按不同的速度干活儿，但是作为一个整体都在由西向东前行。他们身后刚刚新播种过的土地成为来年生活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张庄通往张公庄土路不远的田野里，第四队的红旗在粗壮的旗杆上迎风飘扬，十分壮观。此时此刻，显示了张庄村集体生活的无形力量。这儿不是在可怜的小块地上为勉强维持生活而挣扎的无组织的单干户的阵容，而是有组织的井然有序的突击队。他们采用新的大面积播种小麦的方法，施上预定数量的肥料，甚至加上化肥使土地更加肥沃，播上本地区试验培育的优良品种。一旦麦苗长出来，就从水库抽水进行大面积灌溉，而水库本身就是成千上万邻近百姓共同劳动创造的结晶。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今非昔比的。

社员田间休息时都坐了下来。生产队干部，一二名大队负责人以及市宣传队的一些干部立即召集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解决问题：犁沟的宽度、深度行吗？播种进度行吗？肥料够用吗？施用多少尿素、小麦不会被烧死？如何减少田间踩踏？如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话，那么这一群认真的协商者是应该能够超过那位古代智者的，并且比他高明多少倍了。

显然，这种协商似乎远远超出了集体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协商人员不仅包括负责这些土地的当地农民，而且还包括全大队、公社领导，以及市政府的代表。在生产第一线的第四队社员背后有村、公社以及市政府做后盾，反过来，这些机构后面又有省以及国家做后盾。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被人忽视、忘却、忽略或搁置不管。似乎人人都把它作为改造中国总体战中的一部分，整个指挥系统上下，显然都有人民关心着。

那年秋天我们所感受到的运用于麦田里的集体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种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它是自上市政府最高指挥机关，下至各级领导，最后至各生产队，乃至每个家庭共同辛勤组织的结果。

幸好，7月以来天气转好，使秋天的组织工作卓有成效。9月初降雨量减少了。尽管天气仍旧比通常雨水多，山上的洪水还是减少了。由于流量减少，长治的水库水位也不再上涨了。裂缝严重的主坝仍然威严地挺立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从8月15日降暴雨以来，开始不断加高并加固的围堰亦安然无恙。过了好些时候天气才转好。洪水包围了围堰和大坝，尽管围堰很高，但是如果水位再高一英寸，所有的临时土方工程就会被彻底冲垮。

水库的水位稳定后，大家紧张的心情就开始放松了。大家的话题也从洪水控制转向了日常事务，如：为什么有些人让猪到处乱跑，为什么赶车的人经常压坏正在生长的庄稼，秋收大忙季节谁能去收割庄稼地里的蓖麻。

有关猪的问题最为尖锐。当村民关不好自己家的猪时，猪就会跑出来，迟早会找到庄稼地里大饱口福的。猪用鼻子掘地寻找还没刨过的红薯，撞倒玉米秆吃玉米穗儿，甚至袭击社员精心管理的菜园子，吃茄子、吃西红柿。猪主人不知他们的猪哪里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根本不为此担忧，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让猪四处游荡，免费在集体地里养肥自己家的猪，还有什么行为能比这种做法更充满市侩习气呢？大队发出通知要求必须把猪关好，以后一经发现私人的猪跑到庄稼地里，大队领导就要采取果断措施，甚至会予以没收。

马车碾压庄稼的问题更加普遍，更加棘手。社员们种庄稼真是见缝插针，大路小路边道旁都不让荒废，以免浪费土地。但是天一下雨有两种情况总是威胁着庄稼的生长：土壤松软，玉米、高粱之类高茎庄稼往往就会倒伏，甚至一阵和风也会把玉米吹倒在路上。车夫们总是匆匆忙忙想多挣点工分，往往从倒伏的庄稼上压过去，把庄稼压入泥泞的路面里。当他们看到倒伏的庄稼时，本应用一会工夫扶正它，必要时还应捆扎好，以便庄稼能正常生长。但是大部分车夫只图自己赶路，指望别人来挽救庄稼。

另外，不论何时何地道路土质松软，车马陷入泥泞，庄稼就要遭殃了。在阴雨天气车轮会深沉压进泥泞，无论是毛驴、骡马还是牛，想把车拉出来，实在是难上加难。一旦原来的路不能通行，车夫们就向左或向右拐弯，直接进入庄稼地里，把庄稼压倒开出一条临时小道。这样损坏的庄稼要比由于倒伏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尽管领导三番五次严厉谴责这种绕道，但是他们的话从来也没起过作用。在旧社会，土地所有者通常在路旁挖防护沟，防止有人进入地里。

这样就在村民之间造成了互相矛盾和冲突，车夫和土地所有者都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道路通行权而斗争。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没有人太注意修筑防护沟渠来特别保护某一块地，结果破坏的范围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因为雨季比往年都长，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张书记提醒全大队注意这个问题。尽管大多数社员想方设法避免破坏自己工分收入

的源泉，但是其他大队以及邻近工厂和单位的车辆也使用共同的马路，当地发出的任何呼吁都触及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问题仍然存在。

至于蓖麻，1971年社员们就想方设法在马路边、水渠旁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正常耕种的边角地带种上了这种作物，此时蓖麻正在成熟，一株株果实累累的蓖麻都裂开了，蓖麻子撒落在地上或沟渠里，一下雨就都被水冲走了。由于当时正是下种小麦的大忙季节，生产队怎么能收回蓖麻呢？于是张书记决定号召老年妇女、有孩子拖累的母亲，以及学校的儿童，有计划地去收蓖麻，搞一定数量的蓖麻籽可挣得一定的工分。张书记的号召起了作用，几乎白天任何时候都可看到妇女儿童手提篮子或用围巾，或用其临时用具收蓖麻，这样可以补充全村的收入。乡村常常缺乏食用油，想方设法种植亚麻籽和菜籽也不能弥补不足，仍满足不了需要，农民们把蓖麻压成油可以说真是宝贵的资源。

生猪管理、车辆以及蓖麻之类问题加起来也只不过是一种分散村民注意力的小事而已，张庄农民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仍然是“三秋”工作（指秋收、秋种、秋耕）。最后一项工作包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水渠维修以及秋耕。

由于这三大任务相互交叉，相互紧逼，而且又必须在立冬以前完成，因此秋收是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需要投入大多数的人力畜力，大多数的设备以及各种物资。

首先，播种小麦就造成了繁忙局面，因为必须在9月底以前完成下种任务。关于这一点，我是从来就不大清楚的。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冬小麦播种时间可以延续到10月中旬，甚至11月份，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为了获得好收成，至少必须提前一个月完成下种任务。

提前下种小麦的任务向农民提出了挑战，而首先接受挑战的是全省的党组织和政府，尤其是负责农业的各级部门。省委发动各个地区，地区发动各市县，市县又发动各个公社。

上级领导干部召集会议，作指示，而且还以“三秋”前线战报的形式在报刊上逐日报道进度。

张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贵才和副书记申起财在马厂公社参加了会议，这样动员令就传达到了张庄。公社领导在会上要求张庄播种800亩小麦，其中三分之二采用新的宽垄种植法在水浇地上播种，三分之

一用群众熟悉的老办法在旱地上种。每亩水浇地要施用130担有机肥，30担人粪尿，每亩应产345斤粮食；每亩旱地施用160担混合有机肥，每亩应产粮254斤。

粮食产量似乎定得不高，但是当我听说了1971年的产量，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没人愿意把产量定得高一些。前一年小麦一开始下种就遇上了干旱，影响了小麦发芽生长；一冬无雪，严重的霜冻把许多未出土的幼芽都给冻死了；一春无雨又阻碍了零零落落的麦苗的生长，所以到6月底张庄每亩收成还不到91斤。

当然，今年小麦下种期间没有人预料会再遭旱灾，而是担心涝灾。但是万一来年干旱，一切生产计划也是围绕灌溉而制定的。关于小麦的问题倒是件新鲜事儿，农民们总是把小麦看作低产作物，收多少算多少。传统的耕种方法是有什么肥就上什么肥，把地犁过后，以行距约14英寸的宽度把小麦种下去，至于长好长不好就不管了。他们从未尝试过对小麦大量施用化肥，进行精耕细作或灌溉，因为他们觉得花费这样的人力物力，生产那么一点粮食得不偿失。

现在，上级传下话来，如果进行精耕细作，小麦可以变成高产作物。大寨、西沟、南呈以及其他一些先进大队，通过采用新的精耕细作方法，每亩小麦产量达到四五百斤，甚至高达900斤。

有关当局说张庄也可达到这个标准，这确实是个态度问题。如果人们肯定小麦的产量可以与其他任何作物相匹敌，并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丰收，本地所有粮食纪录都可轻而易举地打破，仅小麦一项张庄大队粮食产量就可跨过长江（每亩800斤）。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农民们是不愿轻易放弃的。

公社领导提出的方法叫“宽垄种植法”。不像过去那样行距很窄，一行紧挨一行，稀稀落落地种些小麦，而是鼓励农民把犁沟开到至少4英寸的宽度，施上化肥，还要把有机肥、人粪尿以及尿素混合起来施入土壤下面，然后每一垄沟下面全部都要种上小麦，就像一条宽宽的带子一样，然后轻轻盖上土。如果小麦带行距至少达到2英尺宽，那么就能浸地浇水，而且来年春天也可以在此空隙种上玉米。这样庄稼增加了一倍，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即使每亩小麦产360斤，玉米产510斤，那么每亩产量也可达到900斤。——这是张庄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纪录。

公社干部不满足于灌溉和宽垄种植，还建议尽可能多深翻一些地。这种方法是用以昔阳县大寨大队命名的“大寨铁锨”，把土地深翻一尺左右。首先把除去表土后暴露出的土适当翻过来，这样下一条沟的一锨宽的表层土就可上下颠倒放入刚开出的壕沟内，并把壕沟填满，亚层土又暴露了出来，又开出了与旧壕沟相毗连的新壕沟。整个过程和犁地差不多，在犁过地后，拖拉机手用某种动力工具把下面的底土搅动起来。这种精耕细作的方法基于这样的想法：

松土、翻土，给土壤通风透气可以提高产量，地翻得越深，收成就越好。经试验证明，一个社劳力从早到晚苦干一天，可以深翻三分之一亩地。

张贵才和申起财全身贯注地听取了公社干部所讲的一切，即使有异议，他们也不会表露出来。

尽管新的宽垄种植法没有在张庄的地里试验过，但是听起来似乎不错，他们愿意在水浇地里采用这种方法。他们知道可以收积大量的混合肥和人粪尿，可以派人外出购买尿素，而且还可以发动社员深翻土地。大队干部唯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种植面积问题。张庄能种小麦的地不到800亩，无论如何计算他们只能提供650亩，其中水浇地450亩，旱地200亩。当张和申提出650亩时却遭到公社干部的反，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没有选择余地，因为没有人能再找到土地。

贵才和起财回到张庄后，召集各生产队干部讨论小麦下种问题，劝说社员们用新办法试一试。为了便于讨论，他们准备了油印材料，把计划种植总面积按生产队——具体分开，水浇麦田多少，旱地麦田多少，宽垄小麦多少，深翻土地多少。各队代表热烈地交换了意见，然后向大会报告他们的建议。

第二生产队民兵队长、政治指导员陆何仁首先发言。由于整党运动即将开始，他肯定会受到批评，近几周来他士气低落，但是小麦下种似乎鼓舞了他，他满腔热情地报告了他所在生产队的情况。

“我们要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动全体社员抓紧灌溉和积肥送肥。我们要突出政治，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修筑必要的水渠，总共需要8条水渠，现在我们已有4条，所以一刨完红薯空下地就再修四条渠。要把地平整成正方形方格地，每小块十分之一亩，以便能均匀地浇水。我们要把所有的水浇地深翻2尺。我们有35把“大

赛铁锹”，如果35人每天每人深翻三分之一亩，7天就可完成全部任务。一组人负责深翻，一组人负责平整，然后再耙地。我们有20把耙，干10天就可以把一切准备就绪，包括水渠在内。但是我们混合肥料不足，我们将立即开始割野草沤青肥。如果这样干，保证每亩上8吨混合肥、2吨人粪尿，春天我们还将每亩再增加3吨肥料、20斤尿素，天下雨不下雨无关紧要，如果不下雨我们将给小麦浇五六次水，如果下雨就只浇2次。”

何仁滔滔不绝说完了这番话，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突然他停住了口，让别人完全理解他的建议，然后补充说：“我们保证亩产350斤。”

眼神忧伤的郭真宽代表第五队发了言，他没有表现出何仁那种热情，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宽垄种植法，或是不相信深翻，而是因为第五队有50亩最好的水浇地被太行锯条厂占用了。为了完成计划中提出的100亩小麦下种任务，他们不得不把70亩小麦种在干旱的梯田里，当然也就没人保证产量了。

第六队也被太锯厂占用了土地，不过只有30亩，他们感到可以在其它地里进行补偿，因此保证水浇地面积超过80亩。第一队和第三队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计划份额。第四队发现他们在积肥方面落后了，但是队长杨四旺认为，开展割草沤绿肥运动，清扫所有的羊圈、猪圈是能够弥补不足的。只要全队社员深翻所有的水浇地，并进行精心的平整，他也保证亩产350斤。

副业队也不服输，保证晚上派出人力帮助落后队，白天在砖窑劳动，或在火车站装卸货物的社员晚上割草，往地里运肥，或是深翻土地。

老乡们称作高法官的检察长对这次会议非常满意，赞扬各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然后简短地讲了几句有关“政治挂帅”的话就散会了。他指示各队每天留出一点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并建议大家特别注意毛主席有关语录“只争朝夕”、“粪是庄稼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土地深翻好”，以及“关于正确思想的来源”等。

小麦宽垄种植法的建议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每两行小麦之间留下空间种玉米，每两行玉米之间留出空间种小麦的做法。卡玛和我与第五队社员一起在玉米地里修整麦田，发现这种间作法比起单一种植法难度大了好几倍。有一天我们预知下午有空余时

间，吃早饭时找到真宽要他下午四点去找我们。于是，我们就和第五队大多数社员一起下地去了。9月份我们几乎总能完成间作任务。第一步是把玉米行与行之间的空地深刨六英寸，然后把刨起的土块打碎。当我们刨完地时，其他人已把一大堆一大堆的肥料倒在地头。由于运肥车不能顺着玉米行进入地里，我们不得不用扁担挑着筐子把肥料挑到各个角落，这样来回挑运肥料又把地踩实了，我们不得不撒完肥后进行第二次深翻。

然后我们得修筑横沟灌溉渠，我们同样小心谨慎地使用锄头修渠，以免伤害玉米。由于水渠是横向直角通往玉米行里，有些玉米正好在水渠线上，我们不得不把这些玉米铲起，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希望玉米穗在秆儿干枯时还能成熟。在修渠过程中，又把地踩实了，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三次翻地了。

最后，我们匆匆忙忙用宽垄种植法种小麦时，先上混合肥料，再用人粪尿加大土壤湿度，结果又把不少地踩板结了。这样我们不得不进行松土，然后再离开地里。这是不到十天内进行了四次松土。

翻地、挑运肥料、修水渠和下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大约15人用好几天时间才种了18亩地。卡玛和我在一块地上至少翻了三次地，完全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挽救一些一亩连170斤也收不上的玉米。要不是间作玉米，我们就可以用骡子或拖拉机犁地，用马车运肥，用牲畜或机器开垄沟，用车辆把种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但是由于一些玉米尚未成熟，我们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真宽和他的社员们一早就起床，早饭午饭都在地里吃，从天亮前一直干到天黑以后，希望能够夺取小麦丰产。

显然人人都清楚他们所干的这一切额外活儿是不合算的。但是他们顽强不屈、坚持不懈，他们决定春天进行间播的尝试，而且下定决心不管出现多大困难，都要把试验进行到底。

起早贪黑的苦干几乎把真宽的身给搞垮了。折磨他多年的慢性气管炎现在更加重了。他家和我们教堂院子仅一墙之隔，他通夜咳嗽不止，搞得我们大家都不能入睡。

“你怎么不休息一两天？”我问。

“我年纪大了，倒是很愿意在家吃顿热饭，晚上早些回家多休息休息，而且干些轻活儿，可是这样怎么能学大寨呢？如果队长不带头，怎么能让别人干呢？”

这种逻辑迫使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领全队社员在地里整整干一天。天黑后放下锄头才吃晚饭，晚饭后还得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如果他一周能多睡几个小时是多么幸运啊！这样就证明他既有一个人的特征，也具有革命者的品质。由于他经常过度劳累，通常总是发冷，他病倒了。他是个文盲，无法读书看报，不能决定在田间休息时该读什么报，或该对社员说些什么，这一缺陷使他当政治领导更加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

看着真宽一天又一天地带头苦干，我们对他的钦佩之心油然而生。像他这样的农民，只要能站起来，就不愿坐下休息，就不知道“失败”这个词。他们相信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并且要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

我们在其他生产队也看了间播情况，他们的许诺比第五队还多。真宽的错误是玉米种得太稀，反过来说可能他们种得也不稀，只是成活的微乎其微。无论如何，苗情确实很糟，如果麦苗间种的玉米长势良好，加班加点苦干似乎也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我对这种种植法还是有疑问的。到了收割玉米的时候，社员们不得不像我们一样，用扁担往地里挑运肥料，把所有的玉米和秆儿挑到地外边。在肩挑人扛的过程中，人们第五次把地踩实了。即使每亩产五百多斤玉米，这么加班加点苦干，这样糟蹋土地值得吗？由于一块地单一种植玉米，每亩就能收八百多斤，要是水浇地就可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因此，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把低产作物变成高产作物，夺取小麦大丰收的计划是乐观的，足以发动全大队社员同心协力大干一番。各生产队都完成了预定的种植计划，至少是基本上完成了计划。

他们未能完成的任务是深翻。生产队干部以及社员们所作的深翻土地的保证是设想遇上好天气，即老天干燥不下雨。平整水浇地，深翻、撒下大量的肥料，最后混合肥与人粪尿混合发酵后作底肥，然后用宽垄法播种小麦。全部的工作要在两周内完成，至少需要十天好天气，但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8月的天气大雨滂沱，正像干旱产生了旱灾一样，雨天也引起了涝灾。由于倾盆大雨一场接一场，整个上党地区潮湿不堪。每次太阳一出来，大量的水蒸气就升到天空，结果又形成了云团，再次下起倾盆大雨来。农民们能在地里干活儿的时

候很少，因此，他们不得不取消原先的部分计划。绝大部分是忽略了深翻土地，但是因为下种期临近，结果连一些平整土地的计划都取消了。大队干部决定，哪儿的土地准备就绪就哪儿下种，甚至准备好一半也可以。以后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再修整另外的一片片麦地，如果没有时间修筑水渠，那么他们就只好用老办法播种剩余的麦田了。当下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党支部书记张贵才去另一个县了解小麦新品种的情况。他研究了二百多个不同品种的小麦，最后选定三种：“东方红一号”、“长治五一五号”，以及“南福农泰号”。他带回足够的优良品种供全大队播种，并建议各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种子。当社员们问到他们在长治市内以及周围地区看到的另一种优种小麦时，张书记持反对态度。理由是，那种小麦需要极其肥沃的土地和只有城市人口密集地区才能提供大量的充足的人粪尿。他说张庄无法达到这种要求。张书记进一步介绍说，所有的新品种都必须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处理，以预防果穗病以及种子本身带的其它病。他派人到外地购买了适量的药品。

当田间的工作取得进展时，其种种情景时时鼓舞我们。我们每天参加劳动重新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困扰全村的派性、争吵、对抗、以及种种不满情绪消失了。牢固的集体主义觉悟基础已经奠定了，大家尊重集体，依靠集体行动。不论新时代会出现什么麻烦，他们都不会旧技重演，抵制过去那段历史几乎是绝对的，甚至像被指控为“走资派”的“二宝”之类的人也没有人指控他们否定村的集体组织机构。他们把这种机构的优越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愿破坏这种组织机构，只是计划在此机构内繁荣富强。个人某种形式的富裕可能是对集体制度的威胁。这一点他们是不太清楚的。他们把互相合作的生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似乎并不充分理解这种生活每天每时都需要巩固和改善。

一天晚上正值收割高潮之时，我们外出摘茄子，并把茄子运送到第二队的打谷场，准备分给社员。我们对集体的力量也有同感，对互相合作生活感到轻松而满意。生产队各家的代表挤在马车周围分茄子，小孩子们紧跟在大点孩子们的背后，带着小孩的母亲们手提篮子、布袋，以及难以名状的各种容器，和汗迹斑斑的车夫，以及臭气冲天的掏粪工排成一行。队干部给每人分配多少斤茄子作为一种“免

费供应”，不管是老少，不论是病人还是健康的人，勤快人还是懒汉都是一视同仁。大家对这种做法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从总体上讲又是有争议的。人们高昂的兴致，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和共同的集体责任感使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从打谷场回到大队部，那天晚上的所有感想又重新得到再现和扩展。院子的一边，参加几个会议的干部挤满了几间屋子；另一边理发员正在给一个农民理发；南面会议厅里，几十个青年人正在排练新的舞蹈节目和滑稽剧；东面的药房里，药剂师王玉梅在配药，过腰的长发十分迷人。村办公室后面，院墙的另一边，大队的粮食加工厂机器轰鸣，伴随着震颤，三位女值班员个个忙得话也顾不上说。男男女女和高低不同、身材各异的孩子们在等候磨面。他们彼此开玩笑，嬉戏，玩得真开心，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健康、朴实的情愫，院墙内外充满着深情厚谊。平凡的人们怎样能把这样的村子组织得更加井然有序，更好地面对未来呢？

我们感受到了那年秋天互相协作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和市级领导所发挥的积极影响，但是却低估了上级干涉过多带来的消极后果。在复杂的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有来自上级种种的主观武断的干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件就是由于“上级插手”而造成的。多年来，“上级插手”不断增加，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农民的手脚，但是，这种干涉到目前为止只不过是张庄地平线上的一片云彩，不能抵消合理引导，上下一体所产生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未来的潜在力量。

在修整麦田的过程中，第四队似乎走在了前面。部分是因为第四队负责的年轻人发现了一种方法，在犁上加上一块木头就可以开出一道宽垄沟，不需要再挖了。这样就节省了时间，许多忙于松土挖沟的人就可以集中力量施肥了。由于肥料堆放合理，化粪池选位恰当，下种工作进展迅速。

在灌溉渠另一边干活儿的第三队似乎落后了，第三队社员在杰出的妇女杨莲英的领导下，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平整土地，所以尽管他们的粪堆比别的队大一些，但是播种方法十分落后。他们用锄头挖出的垄沟和第四队犁开出的垄沟相比，显得弯弯曲曲凹凸不平，宛如一位老太太用颤抖的手在地里画了一把梳子。在广阔无垠的田地里，他们

每天的进展似乎微不足道。由于他们远远落在后面，我们就不计划注重他们了，因此也没有再走出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或如何做。

然而当麦苗长出来的时候，第三队的麦苗长得绿油油的，十分茁壮，而第四队的小麦却显得稀稀疏疏微黄无力。由于当初种小麦时仓促行事，第四队在垄沟里施用没沤好的肥料，从化粪池拉来的粪肥尽管数量充足，但是由于八月雨水过多灌入了化粪池内，结果肥效不高。尽管又倒进了化肥弥补不足，也无济于事。

第四队的干部年轻，富于创造力，又发动了有组织的运动，其实他们是华而不实，所以尽管没有进度迟缓，但仍不如勤恳不屈的第三队干得好。当然最后结果如何，还未见分晓。第四队仍有时间给小麦追肥除草，给肥力不足的麦田追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年春天的灌溉，但是第三队似乎还是占有优势，因为他们为了平整土地更是煞费苦心了。

五十二 拂晓下地 晚上开会

由于发动全村白天播种小麦，市委要求晚上进行整党。有人可能会想农民们白天种小麦就够累了，晚上应该休息了。显然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宣传队干部在每次开会开始讲话时都否认政治和生产任务之间有任何矛盾，组织各种会议正是整风运动的中心。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不厌其烦地老调重弹，都不能说服党支部书记贵才。

“一开始社员会来，”他说：“但是，由于他们天天在地里干活儿，越来越累，就不会天天晚上来了。”

“春播季节你们不是经常开会吗？”范机灵问。

“那可是两码事儿，那时人们劲头很高！”

“好啦，抓革命应该促生产，不会影响生产。”范机灵说：“今年的会议不比往年多吗？生产没有搞上去吗？开会不会妨碍生产。合理安排会议是领导干部的职责，你必须鼓励大家，早来早散会。”

有一次开会时，一半人睡着了，另一半人提前回家。高法官坚定地說：“有人认为开会和生产互相冲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开会和生

产没有任何矛盾。现在白天时间短，晚上长，早上我们可以早点起床。有人说大忙季节应该停止学习，恰好相反，越忙越应该重视学习。”

幸运的是9月2日开始下起雨来，正好开大会进行整风。如果说阴雨连绵威胁到大坝的安全，损坏了庄稼，推迟了收割，却倒是促进了政治工作。由于雨下得很大不能下地，宣传队“抓紧时间”在会议厅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人们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地把整个会议厅前后左右，甚至主席台都挤得满满的。全村男女老少、已婚的、未婚的、离婚的、寡妇孀夫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带着许多孩子，刚学走路的幼儿，襁褓中的婴儿，有的咯咯地笑，有的哇哇地哭。当婴儿哭声太大时，干部就让母亲把孩子抱出去。大队一些最漂亮的姑娘，身穿最漂亮的衣服，把堆放在南墙跟的砖头放在最前排当座位，她们梳着长长的辫子，甚至已婚妇女也炫耀着北京妇女都不敢穿的束腰服，衣料有用花纹装饰的印花布或与底色对照艳丽的方格布。她们对我和卡玛的兴趣比对会议要大得多，一会儿互相交谈，一会儿哧哧地笑。

几排后面坐着老天主教徒申喜乐，他是1948年受虐待的新娘仙娥的父亲。这是我返回张庄以来第一次见到他，这些年来，他的胡子显然花白了，在他附近的一个小凳子上，坐着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太婆，她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们，这就是本村医生齐三强的母亲——一位坚定的公开的天主教徒。

由于会议厅没有座位，人人都得自带板凳、木头块或砖头。因为天还下着小雨，一些人不能站在屋外透过窗户观看会议进行的情况，不得不全部挤进会议厅。大家你推我挤费了好一阵子功夫才重新坐好。一位宣传队干部数了一下人数，一共370名，全部挤进了按设计只能坐200人的屋子。

高法官在主席台上，坐在一张大桌子旁作了报告。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型毛主席画像。

高法官以擅长作长篇报告而著称，他那天的表现证明他确实是名副其实。一开始他回顾了对“二宝”的谴责，解释了免除他们职务的理由，然后他又谈到新的领导班子春天所发动的令人振奋的生产运动。他详细列举了典型人物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他把这两方面的成就归功于通过学习与斗争思想觉悟的提高。他说这充分显示了思想意识能转变为物质财富。

作为开场白这些话都说得非常中肯，对于群众参加评议大队新领导班子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他重复讲了市委会议所确定的判断党员的七条标准，阐述了即将进行的开门整风的性质。普通群众要在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听取本队党员的发言，并对他们进行批评。

高法官提出的整风计划，要求花5天时间进行动员学习，党员用5天时间进行自我总结检查，用10天时间全力以赴评议新领导班子的各项政策和表现。如果可能，还要对仍有疑点的问题进行结案，最后5天审查管理大队生活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安排。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体社员能畅所欲言。

高法官最终讲完话后，市委办公厅主任范机灵讲话强调了上述问题，并强烈呼吁社员积极参加整党。

他说：“我们天天讲两条路线斗争，而两条路线的基本区别就在于是否相信人民。根据毛主席的观点，每个党支部都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开门整风，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始的检查运动是开门运动，是大家的事，群众必须讨论大队干部工作的好坏，还需要干什么。毛主席要我们参加，这是他信任我们的标志，如果我们不积极参加，我们就对不起他。”

“因此，谁不关心这场运动，谁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大家必须克服害怕说实话遭打击报复的心理。”

“有些人犹豫不决，害怕讲实话惹人，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几次运动中，有些干部不遵循毛主席的路线，利用团伙力量打击报复。他们或者小事大作，或者无中生有，想方设法利用少记工分，或分配枯燥无味的工作进行报复。”

“因此，有些人想，见鬼去吧，我们要保持沉默。”

“但是，现在大家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我们党支部有了新的领导干部，我们完全可以信任他们，大家放心大胆地说吧。”

“人们犹豫不决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私自利。人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宁肯满足于现状而不愿互相批评，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最终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弱点，团结一致改造张庄。”

“至于惹人，如果是阶级敌人，管他呢！如果不是阶级敌人，我们仍然必须与坏思想坏行为作斗争。如果把他们放过了，整个集体就会遭殃。‘二宝’的情况不是这样吗？两个人都是贫农出身，历史上都

没有任何问题，他们俩被选拔到大队部工作，是因为他们是好人。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变得这样坏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监督。无论什么时候，成立任何新的领导班子，都有一个依靠群众进行监督的问题，每隔几个月我们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检查。一切问题的关键是领导班子，而保持他们不断前进的关键是群众持续不断的批评。对领导干部来说，关键是倾听群众意见，如果你要群众跟你走，你就必须首先跟毛泽东走。”

范机灵在充分论证了这一点以后，接着又阐明了几个在社员头脑中引起混乱的问题，其中之一是那件老问题——“裴小四案件”。由于张贵才又当了张庄支书，谣言传开了，说10年前在井底发现的年轻小偷之死，是贵才的错误。

“为什么老是提起这个案子呢？”范机灵问：“是因为存在着误解吗？不是，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有人想拿死人压活人。”

“我们要整风，最终是会触及到这些人的，因此，他们提出‘裴小四案件’。他们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企图把我们引入歧途。每次我们开展运动，这种事情总会发生。究竟每次是谁挑起这件事呢？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人。”

在接着谈到尚未落实的案件时，范机灵说：“有些人想利用清查，迅速落实他们的案子，但是落实案子有两个方面，谁想尽快解决问题，谁就必须首先大胆地讲出实情，讲清事实，这样落实案子就容易。”

最后，范机灵谈到大队团结问题。

“有些人想方设法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因为小错误而咒骂大队干部，这种咒骂干部的风气只不过是一种歪风。想想几天前秦快嘴说的话，他说：‘是的，我们是黑帮，咱们看你们红帮能干好，不用多久人们就会骂你们的’。”

“秦快嘴这是什么话呀？”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整个下午社员都在一起讨论运动的问题。这一次他们是以小队为单位进行的。卡玛和我去了村东南角的第五队队部。原来这是一个破院子里的一座破烂不堪的屋子。在一个大席棚之后，住着解放军的一支坦克部队。这个屋子是用土坯盖的三间平房，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墙根摆着当座位用的砖块，中央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门对面的墙中央，挂着毛主席画像，画像之上贴着毛泽东和

林彪的合影，合影两旁挂着张庄民兵的奖状。一张是地区表彰第五排（第五队民兵单位）的优胜奖；另一张是市政府表扬一班的（第五排的一个班）。北面的墙上有马厂公社革委会颁发的表扬一班的奖状。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因为窗户上没有安装玻璃，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他们尖叫和笑声，窗户是本单位一位木工随便用些木棍子做成的，窗户底部横着钉了一块纤维板，但是纤维板太短，左右两边都挡不严实。

社员们零零落落走进队部，生产队长派人去把那些慢性子的人叫来，最后，几个人来了说他们不知道要开会。这就意味着他们漫不经心。因为高法官在群众会上通知时，反复强调过，而且趁中午时分又通过高音喇叭广播过开会的事，叫人费了好大劲儿，但是收效并不很大。开会推迟了，当大家等待别人时，几位早到会的人起来走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露过面。

王文则来了，他的裤子卷到膝盖之上，以免被雨水弄湿，他的腿瘦骨如柴，青筋暴起。他头上用传统的方法挽着一块毛巾，这是与会者中唯一的一位头挽毛巾的人。王贵宝戴着一顶白帽子，所有的年轻人都戴护目镜，穿干部式制服和裤子，齐踝关节的胶鞋，有些年轻人身穿条纹衬衫，兰白相间的条纹水平地横过他们的前胸后背，他们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而老年人却仍然抽旱烟袋，但是不再使用传统的火，而且用时髦的拇指激发打火机。

队指导员李玉喜主持了会议，他首先宣读了7月1日山西日报社论，重新回顾了整党的主要目的，号召大家讨论重新建党阶段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但是会开得很糟，显然是因为主题太抽象，大家都无话可说。

为了打破沉默，队长秦炳奎讲了几句话。张强柱接过话题也讲了几句，但是，此后又是一片寂静。上午的残雨——毛毛细雨下得更小了，于是王文则站起身走出了院子，几分钟内三分之一的人随他走出会场。很快门外就展开了一阵热烈活跃的谈话，玉喜十分恼火，出去一阵训斥把他们赶回到会场，但是王文则没有再进来，而是悠闲自得地回家去了。一个被暂停党籍、最需要整风的第五队社员反而觉得这样的会议不屑参加。

会议开得一团糟，由于没人发言，李玉喜无可奈何只好宣布散会了。

其它地方会议开得也不好。第二队只有“二宝”的最有力的支持者、重点整风对象、“流氓嫌疑犯”、八字脚郑大胆发了言，他匆匆忙忙从一个组窜到另一个组，挑起一个又一个话题，十分活跃，但是，就是躲避在大会上发言，最后他站起来发言时，只是满腹牢骚。他说自从大队新领导班子掌权以来，村里的一切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第二队干部发现难以控制会场秩序，社员们不断地溜走，队干部无法劝他们回来。大多数人甚至怎么劝说都不听，最后秦发言时，许多人却自动返回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必定会支持他，而是因为非常好奇，想听听这个臭名远扬的“黑帮”会说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得知他要发言却是个谜。

秦实际上是说，宣传队干部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是片面的。他曾几次设法找他们，想把问题谈清楚，但是他们都没有接待他，他把对宣传队的批评夹在一些无意义的自我批评中间，如：“整风运动很好，如果我是领导，运动就不会搞得这样好。我应该好好学习‘毛著’，批评自己的错误，低头认罪，而且还要请同志们批评我。”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作真正的自我批评，他的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作为重要群众运动的起点，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讨论整党的重要意义太抽象，太理论化，引不起群众的兴趣。当整党进行到下一阶段，社员和党员面对面时，普通老百姓参加会议情况略有好转，但是即使在整党高潮阶段，比起1948年那场令人激动人心的整风运动来就逊色多了。

不管整党是否激动人心，进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小队会、支部会、支部宣传队联席会、贫农代表会，以及贫农妇女会，一个接一个。农民干部白天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后，一有时间就开会。所有这些会议，一方面试图诱使普通老百姓发表意见，另一方面为党员和干部认真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作准备。

五十三 收集意见

9月10日，10位贫农代表一起去治安主任老申办公室参加会议。尽管他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漫无目标，只揭露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而且很难加以总结，但是，会议还是开得热烈活泼而富于成果。

生产队长大部分是党员，愿意不愿意处理问题并批评他人，这是群众不断提到的话题。社员们批评那些回避这种斗争的人，而赞扬那些参与解决问题，甚至不怕惹人的事。

第六队的二名种菜社员在给生产队收菜时，把最好菜留给他们自己，结果引起争吵，只好去找队长刘生。他安排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分菜问题，他批评那两个惹事者，才解决了问题。其他社员感到高兴，因为他们都不愿提意见，担心被打成捣乱分子，以后被迫接受下等菜，谁敢冒险呢？然而，如果队长采取行动，就会赢得社员的尊重，没有人能叫他闹事者。

第六队的一位长脸老头儿李林光详细说明了这一点。“队长在场时，社员是一种干法，队长一走又是一种干法。有些人只是学懒了，不想好好干。我总是想说些什么，即使没人听我也想说明白，我总是爱找干活儿马马虎虎人的岔子，可是没人听，他们只听队长的或指导员的。”

“当然，也有些人同意我的说法，但是，一些年轻的放肆的怪异的人就是吊儿郎当，大吵大闹。秦二贵就是个领头人，这是个坏家伙，什么事都不在乎。去年炎新批评他锄玉米时锄掉苗留下草，当场被二贵打倒在地，选记工员时，二贵连参加都不参加。本来我们应该选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二贵却说：‘选上谁，谁当’。年轻人都仿效他，谁也不说谁合适。”

“我们评定工分时，绝大多数人觉得只要自己的工分定得不错就最好别吭声，不管别人定得高低。

即使有人不该记高工分，也没人提意见，害怕以后遭受报复，或许他们自己的工分也会减少，因此，还是不说为好。”

“所有这些情况，使得青年人干活儿马马虎虎。年轻的姑娘对我说：‘看，你锄一行，我也锄一行，’可是，质量如何她们不管。有些人一次锄三行，苗与苗之间不锄，草依然挺立如故，或者在玉米周围堆土，把草埋住。往玉米苗周围堆土是对的，可是应该先把草除掉。”

“这些年轻人都说，‘一次锄三行效率高’。在他们看来，只有老保守才在地里来回一行一行地锄。如果队长在场，年轻人不会那样干。如果当天有定额，他们就会干得好些。可是如果没有定额，他们

就只是慢吞吞地走，什么也不完成。”

“各个生产队都一样，学大寨不那么容易。如果不破除老好人思想，永远也学不好大寨。至于我嘛，我已说过了，我愿意说实话，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年轻人看见我时，就说：‘看这个老家伙又在这儿！’”

“你看今年社员干活儿有什么变化吗？”高法官问。

“没有，没有变化。”李长脸悲叹地说。

“可是你仍然得说比往年好些，”第一队陆水长不服气地说：“不能说毫无变化，以前队长批评时，人们直接顶嘴，照样我行我素。现在如果说其他人的话不听可以，至少队长的话还是听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队得支持队长的工作。如果队长批评人，惹了人，而大队不予支持，那么他在队里就失去了威信，就再也站不稳脚跟了。”

“以前就是这样，你在队里提到问题找大队，他们只是说‘好，好’，可是从来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坐在那儿整天‘和稀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丢不掉老好人思想。”

“只有丢掉怕惹人思想，才能干成一些事情。无论谁犯了错误，我们必须敢于批评。”

“说得好，”第六队的齐关胜插嘴说：“只有得到大队支持，生产队干部才敢于斗争。即使队长不怕惹人，如果大队干部不给撑腰，也支撑不了多久，最终必定听之任之。”

“我同意，”高法官代表工作队说：“大队和小队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大队干部应该支持小队干部，当然绝对不能支持干坏事的队长，只能支持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人，我们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队支持小队队长干坏事。”

长脸李林光还是不相信1971年有那么大变化。“孙进富和齐成思在地头，社员就好好干活，可是炎新一个人在，社员根本就不理会他，不听他的，他没有威信。自从去年他挨了打，大队没人支持，以后人人都随意欺负他。”

“可是，”高法官说：“可能人们不听某些小队队长领导，是因为他们工作方法有问题。”

“是啊”李林光说：“炎新也许没有好好干，他事情多，下地经常迟到，结果别人迟到了他也没法严肃批评。早上一些社员坐在地里

说‘队长还没有来，我们怎么开始干呢？’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

“我们队的国良有问题，”一队的水长说：“他干活往往拣轻怕重。他拉大粪上坡时，不把车后面堵好，一边上坡，大粪一边四处飞溅，等上了坡顶就只剩下一半了。拉粪时，他把炉灰放进桶底，猪粪放在上面，这样车的份量就轻了，他还说，那样做是为了关心牲口。”

“第六队党员倒是起了较好的作用，”齐关胜插话说：“以齐胡兰为例，过去除了她自己的家事，什么也不关心。她曾挨过一次打，以后再也不负责了。可是现在正好相反，无论什么时候看到错事，她就大胆说。”

“我也是直来直去，”第二队的王贵保说：“有一天我们锄地时，队长锄得坑坑洼洼的，我只得用耙子把地平整好，我告诉了队长这个事。有几个人问我，怎么敢给队长提这样的意见，我说‘如果他没错儿，我什么也不会说，可是如果他做错了事，提提意见不犯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都承认，尽管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了，许多人敢于讲实话了，队干部敢于领导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他们说大队领导班子仍然太软弱，会上作出很好的决定，往往得不到贯彻执行。大队作了决定，有些队执行，有些队就不执行，而大队也不坚持到底。因此，尽管种小麦时大队领导决定必须把所有的肥料都施完，但是村里到处仍然堆放着许多粪肥，而且第三队和第六队甚至还为已经施用了的肥料而大吵大闹。

开完贫农代表会后，党员们就聚集在一起，听领导简要介绍在即将进行的开门整风会上，他们应该抱什么态度，采取什么行动。

治安主任申解释说，整风运动不仅要求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要求对过去工作中表现出的优点、弱点，以及自从整风运动以来的进展情况进行长远的、全面的估价。他们还应该表决心。

处境好的党员和暂停党籍的人都应参加这次评议会，身份好的党员应着重进行全面评价，而靠边站的应集中进行自我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至今都未能认识自己的严重错误，至今仍不能恢复职务。

关于党员自评的标准，申首先强调了1968年元旦社论所引用的毛泽东50字语录：“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关于什么人才是先进分子，申鼓励大家学习1969年党章所规定的

党员五条标准。

1. 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 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3. 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自己的人；
4. 有事同群众商量；
5.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¹

关于党支部的工作，申说宣传队将根据支部完成新党章所规定的党支部五项任务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评价。

1. 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 对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3. 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
4. 密切联系群众；
5. 发展新党员，吐故纳新。²

党员们对治安主任申讲到的公开评议的问题只好表示同意。他们说应该在适当时间经常开展公开评价工作，以使党员能避免犯错误。

听到这一点，仍未过“关”的秦快嘴又作了一番评论，立即就成为全大队争论的焦点。

“学大寨就是要苦干，我苦干，行吗？”他问。

9月11日清晨，工作队干部开会总结工作，他们对每个党员都逐个作了颇有趣味的评价。

李玉喜(第五队队长)

立场非常坚定，诚恳老实，吃苦耐劳，不喜欢自吹自擂。

李满旺(第一队)

事事同意，总是和上级领导看法一致。回去后依然我行我素。

秦二贵(第六队)

确实难对付，就像木板上的节疤一样，难以刨光。

孙晋满(第六队队长)

¹译者注：只是原文中的一部分。

²译者注：第3、4、5条均系节选。

能干，说到做到，敢于斗争，没有老好人思想，一挨批评就火冒三丈。自己本身苦干实干，然后说：“这是我干的，如果你干不成我这个样，就及不了格。”这种做法使一些人不高兴，方法太粗鲁。

刘孙(六队)

同样相当有能力。

李来全：

仍然总是最后一个到会。当他到时，人们都到全了。但是最近有进步，尽管脚肿得厉害，仍能苦干实干。他带领一个突击队修水渠，一直干到凌晨一点钟，然后当天早上又早早上工。

万满：

自离婚以来，表现一般，离婚使他心烦意乱，这是个思想问题。他已放弃第二队的队长职务。

陆何仁(第二队)

和队长裴良顺有矛盾，4月份干活吃苦，但现在变懒了。为什么？谣言太多吗？不是，是对立面太多，拥护者太少。他无法扭转这股逆流。

说起逆流，当第二队公开批评秦快嘴的情妇师桂香时，社员要求仍被停止党籍的八字脚郑也站起来，但是他拒绝了。“我不和她站在一起，她是个什么东西？”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乌鸦笑猪黑。作为一名党员，八字脚郑的问题比林经新娘子师桂香严重得多。

“这就是二宝集团的特征。”高法官说：“他们总是顶嘴，总是有话可说，无视群众要求。他们应该听从群众批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总是当场顶撞。”

会议一结束，生产队就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帮助党员准备预定当天晚上的开门整风。

高法官用一段简短的话开始了会议：“我们应该谈谈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用大寨来判断张庄，找出我们的弱点。为了表决心，我们应作出具体计划，应找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是仅仅挑剔别人，因为用那种办法，最后得出结论是群众落后，没出路。

干部党员都一一发了言，他们都拿春播时期的满腔热情和9月份的满不关心情况作对比。

“今年春天，”二队指导员陆何仁说：“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抓

阶级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很快就干完去年冬天留下的所有活儿。我们及时表扬好人好事，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现在一切都放松了。对工作只作指示，不作检查，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春天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说实话，尽管我们许下诺言，要深翻土地，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深翻过，因为地太湿。我们只用锄头翻地，也许比平常翻得深点儿，但是深不了多少。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挖了好多肥。”

李来全的发言也一样。“和过去相比，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今年春天，错误思想一出现，我们就批判。我们往地里送粪，修渠，组织突击队。我们黑夜甚至义务往地里送粪，我们大家都很卖力，大家都高兴，心情舒畅。”他说这番话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而且越想说得越快。“那时，我们热情确实很高，出勤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老年人也参加了。有些年轻人对一个老头说：‘别搬，太重了，你搬不动’，可是，这位老头拒绝放下，‘我要尽我的一份力’，他说。”

“起初，我的突击队只是些年轻人，可是很快就出现大量的老年人。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竞赛，人们早出晚归，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我们几个人刚从大赛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再次激发这种精神。我们的人和大寨人一样，我们的自然条件比他们好得多，如果我们干不好是可耻的。”

范机灵在这次会上只是静坐旁听，在听完所有的人发言后，最后才讲了几句劝告人的话。

“你们是否能鼓励群众对你们进行批评，取决于你们的态度如何。如果你们的态度诚恳，确实欢迎批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你们讲成绩时，稍稍留点儿余地，有十分成绩就讲八九分，不要把十分都讲出来。如果你们那样做，人们是不会欢迎的，但是谈到缺点时，就要和盘托出，毫不隐瞒。”

五十四 一个队长的话

那天晚上，我们再次去第五队参加会议，人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天小麦后，十分劳累，晚上九点钟以后才集合起人来。是太阳落山人们

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后的时间。天花板上两根电线的下端，吊着一盏电灯，照亮了空荡荡的第五队办公室。

按照习惯，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最主要的干部要带头，郭真宽站了起来。他发言时表情十分严肃，显然他对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思考，句句话都发自内心深处。当然有些话像例行公事一般，他用了许多中国人在发表政治讲话时自然重复的陈词滥调。但是真宽显然不只是重复套话，而是诚心诚意地设法表达自己对过去的感想，暴露自己的缺点，表示将来要决心更加积极工作。

真宽在正式场合讲话时，总要首先引用几段毛主席语录，此次他吞吞吐吐地背诵了“红书”中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及“农业学大寨”。

真宽因为不识字，只得把毛语录记在心中。50年代，大队曾送他上过扫盲班。但是，尽管他在学习班住了两年半，甚至没有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当他回来后，朋友邻居问他学了多少钱，他的回答是：“一个也没记住，国家给我白花钱了。”

“用那么多小米，至少也该买一个字。”他们嘲弄地说。

“忘掉它，”真宽红着脸说：“统统忘掉吧。”

现在他开始用多年来长期咳嗽形成的沙哑的声音讲话了。一开始他慢条斯理，吞吞吐吐，但是随着他思潮涌出，说得越来越流利了。

“我要说说自己对整党和学大寨的看法，今年我是第二次去大寨参观，我和一位老农住在一起，和他聊了天，我深深感到，我们越来越落后了，因此我要表个决心。”

“我是贫农，老党员，老干部。我当干部已经20年了，最近我真想退休，可是由于我过去的工作，我确实在毛主席和贫农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

“过去第五队干部团结没搞好，我没有起到一个党员、指导员本应起的作用，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从来也没有好好学读过书识字，所以我没学好。在这次运动中，我学到了路线斗争知识，我对过去的工作感到羞愧。”

“我决心打消退休想法，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自从那时

起，我就带领全队学习，让识字的人给大家念。”

“今年春上，我们干部团结一心，开展积肥运动，决心提高五队产量。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圈粪上。过去一亩地上80担肥（每英亩27吨）报成100担，110担，那是浮夸，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最后只能自己骗自己。粪是庄稼宝，我们得想办法看怎么才能积更多的肥，我们把所有的肥施完后，觉得肥还不够，于是我们就大割青草，打扫院子，在附近地区搜寻，又积了不少肥，最后每亩上到120担。这次运动中，我们领导群众苦干实干，因为不抓肥料，就抓不住粮食。”

他又把话题从肥料转到灌溉上。

“我们年年谈灌溉，年年不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平整土地。今年我们终于想法平整了土地，修了水渠，进行灌溉有希望了。前年我们修了水渠，但由于大雨淹没了主干渠，我们的水渠被冲垮了。因此今年不论雨量大小，我们决心要让水渠发挥作用，这样我们的辛勤劳动不会像过去那样被白白浪费掉。”

“由于新的灌溉系统在公路西边，我们修整了西边的180亩地，大部分地都能用水浇。如果不进行浇水，就不能抵御旱灾。”

“至于东面的地，我们用两天时间浇了水。但是由于地没平整好，有的地方水淹了，有的地方仍然受旱。我们把这些地也修整了，因为干部带了头。首先干部自己必须好好干，才能批评那些落后的人。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提高产量，为什么对批评社员缺点，表扬优点犹豫不决呢？”

“我们锄地时每锄完一行，在返回来时我都要看看是不是都锄好了，这时候很容易看清谁在用心锄，谁在应付差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我查看过后，就可以发言了。如果自己不检查，只听别人汇报，就可能犯大错误。”

“整个春播期间，我带头在地里批判刘少奇。我们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抓阶级斗争，也抓生产，从种地到锄地我们都抓。但是后来我思想上产生了坏想法，我要把它谈出来，请大家帮助，因为别人更能看清我的缺点。”

“我想我们的庄稼比去年长得好，所有的苗都出齐了，我们对缺苗的地方进行了移栽，玉米谷子都长得好。不像去年，整个谷地里空

荡荡的没苗。今年的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用宽垄种植法种的和浇过水的谷子，长得很好，我骄傲了，我们还要什么呢？”

“但是，骄傲就会失败，我们千万不能骄傲。我想庄稼长得非常好，当宣传队队长问我能不能收四百斤时，我说‘差不了几斤’我太不虚心了。”

“在学习上，我也放松了。我发现认个字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太麻烦了，所以我有时只是坐着休息，我不识字只能熬时间，因此感到很为难。有时就像这样，二三天都不学习，后来突然想起我们还没学上一会儿，我该赶快组织学习学习了。”

“如果我们不领导群众学毛主席路线，必定会减产。而且我们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我觉得，一开始学习就得灭了烟斗，真讨厌！还是舒舒服服坐着好。可是学习全靠领导，领导号召学习，大家就会学习，但是我决心不大，努力不够，因此不能好好领导群众。另外，我觉得庄稼长得不错，也是部分原因。”

真宽边想边说，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社员们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围坐在墙四周，没有吵闹声，甚至连咳嗽声也没有。有的在门对面三三两两，东一团西一伙地坐着。队长的大寨之行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又谈起大寨来了。

“现在我刚从大寨回来，去年我也去了，今年他们的玉米比去年长得更好。去年我们从东面上去西面下来；今年我们从西面上去东面下来。这样我们又把大寨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我们在虎头山上集合，当地人把每条沟都给我们作了介绍，告诉我们是如何治理的。看庄稼的长势，他们说亩产一千斤总没问题。玉米穗儿一般大小，谷穗一样长短。回来看看咱们的庄稼，显然没有人家一半好，庄稼七高八低，有的玉米秆上穗儿也没有，至于谷子是长穗儿的少，短穗儿的多。可是大寨每根谷穗都有一尺多长。他们说亩产一千斤，不是神话，确实没错’。”

真宽停了一停，让别人理解他的想法，然后又接着设法进行解释。

“那里的干部带头，一天有两顿饭在地里吃，社员都是早出晚归。昔阳一位老农民告诉我，过去他自己的自留地亩产不到200斤，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仍然得挨饿。后来他们参观了大寨，人们团结起来，三年内亩产达到700斤，甚至更高。这位老头个人分了600斤，

另外还分了土豆，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旦干部使了劲儿，生产就上去了。他们早上四点上地，早饭、午饭在地里吃。他们计划得好，三个人的活儿就派三个人，并且要跟踪检查质量，活儿干不好，谁都别想挣一分工。”

“听了这老位农的话，我觉得我们领导应该责怪我们自己，而不应责怪群众。今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那是因为干部要呆在家里吃，干部要呆在家里，群众就会呆在家。学大寨挂在我们嘴上，可就是不见行动。”

“至于我，自己年龄大了，我觉得需要好好休息休息。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好好干。可是，这是种懒汉思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吃苦受累了呢？这样怎么能干革命呢？怎么能赶上大寨呢？”

“我们去参观西口壁，一个1200人的村子，开山挖渠，修了200米长的大坝，造了50亩地，亩产达到100斤。他们怎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我们干部怕吃苦？还是保守呢？”

真宽再次停了停，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话，同时决定如何收场。王文则点燃了烟斗，申顺达咳嗽了几声。外面一些孩子们仍然清醒着，一边在黑暗中玩儿，一边欢笑。

“根据这次参观大寨，”队长接着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的决心。我决心拿下两块高产麦田，每亩集中施200担杂肥，40担青肥，为了保证浇水，要用宽垄法下种。山上的薄地肥料不够，我们必须再增加一些，今天晚上我和李玉喜已讨论过了。”

“秋收要保证颗粒归仓，不能像去年那样，路上、地里到处都是粮食粒。谁违犯了规章制度，谁就要受到批评，而且我们还得保证在地里吃饭，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在收割季节才能抓紧时间。我们应该把80%的玉米秆切碎，然后像大寨一样用大粪和化肥混起来沤肥。秋收后，必须深翻或深耕80%的土地。学习方面也必须抓紧，绝不能当懒汉，学习上当懒汉，就是不革命，消磨时间当懒汉就是消磨革命的时间。”

“参观大寨花费很大，全由国家支付。如果没有学到东西，就对不起毛主席。大寨为毛主席增了光，为世界人民增了光。要是没有粮食，谈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纯粹是空话。”

真宽说完后，高法官问是不是有人在后墙跟睡着了。

“没有，没人睡觉”，黑暗中传来了答话声。

有几个人溜出了门外，在凉爽的晚风中点着了烟斗。

“外面人最好进来，”高法官说：“谁偷跑出去，就把谁叫回来作自我批评。现在咱们分组讨论真宽的问题，他对自己的优缺点估计适合吗？”

有些人从院子里摇摇摆摆走进了屋子里，而屋子里的人犹豫了半天才分开小组，一开始讨论进展缓慢，社员只是小声嘀咕。

一个嘴唇厚大而突出的男子在屋子的另一端对周围的人说：“干部们都是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可就是没人说到做到。要是你们自己都做不好，其他人怎么能干好呢？”

“你是指真宽吗？”一个青年民兵问。

“对，他反复无常没有主心骨，老是喊学大寨学大寨，可只是口头上学，大家都是空话太多，实干太少。”

“我大伤脑筋的是一阵冷一阵热，”杨贵林说：“你不能为了通过检查，只记住合格一天，第二天就忘记，就放松了。”

“光是批评老实人，不管难对付的人也不行，”一个厚嘴唇的男子说：“老实巴交的人不论做什么都是错的，都得挨批评，可是难对付的人却从来不受批评，因为他们能顶嘴，难对付。”

大部分社员都不同意这一点。秦平贵说：“真宽在运动中有进步，尽管不识字，可是学习还是用功的。他敢于批评，而且和偷懒的人作斗争，劳动也是处处带头。”

王文则表示同意：“真宽学习好，能唤起工作热情，敢于批评。无论干什么事，都是有头有尾。他有耐心，修水渠时他坚持到底，直到能浇地才罢休。”

显然农民们对真宽评价高，一个反复提到的问题就是真宽有时学习松散，但是总的来说他带头学习做得好。

当其他人谈论真宽时，兴发就定任务、定工分问题简短地发了言。“如果不明确具体分工，人们就不可能干好，”他说：“任务或指标不明确，人们只是磨洋工熬时间，有手表的看手表，没手表的看太阳。我们太懒了，这样好的自然条件，可是没人想种地。大寨人得用扁担挑庄稼，可我们不论什么东西都能用车拉回家。我们不仅车拉东西，

而且车把式还自由自在地坐在车上。”

由于没人对真宽提出什么严肃的批评，高法官进行了总结，然后叫副队长李玉喜发言。玉喜发言时心情和真宽差不多，他说他放松了带头学习政治，计划不周到，往往回避问题，不愿批评人。他发誓要干得好些，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并发誓要达到预定目标。

有几个人对李玉喜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最严重的是说玉喜对人缺乏耐心。一有什么事情要纠正或批评他就粗暴无礼。

“他应该做耐心的思想工作。”

“只有通过耐心讨论，才可能干好。”

“他批评人完全是出于好心，可是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尽管如此，总的来说社员还是同意玉喜的发言，而且觉得，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干得就不错了。时间已经很晚，肯定过了11点，因此，高法官决定散会，以防有些社员就地睡着。主要原因还是社员仍没有真正积极大胆地进行发言，部分原因是时间晚了，部分还是因为部分社员仍然心有余悸，拿不准最后结果会怎样。

高法官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结束讲话时没法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队有九名党员，”他说，“今天我们只进行了两位，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明天晚上请早点儿来，咱们八点半开始。”

“大家讨论得不太热烈，大胆发言是个政治问题；不发言也是政治问题，是自由主义。有些组讨论得热烈，有些组就不怎么好，有些人说没意见，谁相信呢？你们住在一起，干活儿在一起，怎么能说没意见呢？那样想是错误的，有那样的想法张庄怎么能变化呢？”

散会时，玉喜简单安排了一下第二天种小麦的活计。他派了七辆马车，并点名指派了车把式。但是怀疑有多少人听清了他的话，他们三三两两地在黑暗中慢慢地回家了。夜已深了，周围一片漆黑。

我们选择第五队，是因为我们和郭真宽关系密切，每当吃饭时，他端着碗到街上和我们一起吃，下地时我们和他一起干活儿，因此，我们自然要参加第五队整党。在卡玛和我参加五队整风时，陪同我们的林东参加了第二队的会议。她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了许多有关尖锐斗争的故事，并且详细地作了汇报。

第二队也是队长首先发言，但是第二队队长是以沉默寡言而著称的，因此他作了可能是张庄有史以来最简短的自我批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裴良顺说：“我像个敲掉壶嘴儿的茶壶一样，我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因为我不会大胆说话，所以我不是队里的火车头。至于我的优点、缺点，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还讨论干什么，只要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好了。”

他的优点大家都清楚，种庄稼是好手，对工作认真负责，一心一意。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第一个开始干活儿。每天早上他打铃集合全队上工，在地里带头干活儿。通常他总是第一个完成锄地任务，第一个完成翻堆，或挖渠任务。他还善于提出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尽管二队的庄稼从来都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一般人都承认，当队长没人会比裴更有资格。他的主要弱点是老好人态度，缺乏斗争精神，不愿批评坏人坏事，甚至好人好事也不表扬。

正常情况下，作为队长这是严重的错误。1971年对第二队来说几乎是个灾难，因为秦贵宝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他爱挖苦人的性格往往影响着二队。他能在自己周围纠合一帮亲信，如八字脚郑和李守平，无论在什么地方，想积极干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使你一败涂地。第二队指导员张庄民兵队长陆何仁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激进的运动，他是接替秦贵宝的职务的，因此决定了他是秦的冤家对头。陆何仁热情激进，勤劳勇敢，但是缺乏社会经验和处世机巧，在政治上往往简单化，主观武断。考虑到第二队的情况，最糟的是他常常睡过头觉，上工迟到。这些毛病显然使他成了批评的对象，从而削弱了他所从事的动员和说服别人的崇高的革命工作。最近他作为指导员、大队民兵队长，参加了许多会议，少睡了许多觉，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上工迟到的充分理由。事实上，正因为他这样引人注目，因此不管他付出多大代价，大家都期望他能给别人作出榜样。

当裴良顺队长请求批评时，秦贵宝带领他的小组赞扬了他。但是，当陆何仁发言之后，秦在小组里带头对年轻的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连珠炮似的攻击。他们批评他懒惰、无知，没资格当指导员，简直快把他逼得痛哭流涕了。何仁告诉宣传队，从那以后，他晚上睡不着觉，结果得了严重的持续不止的头痛病。

社员们都认为，秦小组的攻击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因为陆自从春天担任干部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春播高潮时期，他组织了号称山西抗日英雄刘胡兰“刘姑娘”突击队和“硬骨头”中年突击队。他

不仅帮助制定了夺取当年丰收的科学计划，而且还搞起了试验田，田里标明种田方法、种子名称、数量以及化肥种类等；他领导全队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组织地头学习。正因为如此，宣传队曾表彰第二队为模范生产队。

只是到后来锄完庄稼时松了劲儿，和其他队干部碰头也少了，和队长良顺吵了一架，从此开始担心批评人会惹人，因此才变得优柔寡断、主观起来。所以挨批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抹杀他的成绩。

五十五 大队书记发言

来自中央的林东给我们介绍了第二队情况，这是张庄村两条路线、相互冲突的两种势力公开对抗的地方。简而言之，这是“阶级斗争”公开爆发的地方。我们决定暂时离开第五队，抽一两天时间注视一下第二队整风情况。

12号晚上，我们终于抽出时间去参加第二队会议。这是一座砖砌的三间二层楼，和第五队办公室非常相似。一部分小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因为在旧日本碉堡旁边新建的学校容纳不下所有的儿童。由于年久失修，门上没门，窗上无窗。尽管有几张旧桌椅（白天当作老师的办公桌），但是大部分社员找不到座位，只得像往常一样自带小凳子或搬些砖头坐上。第二队是否有自己的办公室，没有人提及过此事，这个教室似乎是可找到的唯一的开会场所。

这天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原大队干部贵才。他仍然是二队的社员，因为他住在二队的工地上，当选大队领导前是二队社员，根据最近的决定，从现在起他要到一队上工，作为和领导组的日常联系人。但是由于过去他没有和一队一起干过活儿，所以在一队社员面前发言，或听从他们的批评就没有什么意义。贵才在台上谈论大队事务没有什么尖锐对抗，这样使得一天前的会议十分活跃。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小集团活动的证据，没有看到使林东保持警惕的阶级斗争。

尽管如此，既然贵才是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们渴望看到他说什么，人们对他有什么反映。

1971年我在山西，每到一处都有一个习惯，贵才也是如此，一开始总要引用几条毛泽东语录，他选择了两句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语录。

“在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决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在他开始发言时，细心选择这些语录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点他强调的和前天晚上郭真宽在五队会上强调的内容一样，贵才称之为自己的半截子革命思想。”

“这次整风运动之前，我不想再工作了，客观原因是什么呢？我不识字，年纪又大了。而现在搞政治工作要格外小心谨慎，不像解放后我们那种大大咧咧、粗枝大叶的作风，因此我开始想当半截子革命了。另外，我家也比过去好了，盖了新房，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所以我开始想当半截子革命了，并且发现我不如以前那样热心为人民服务了，现在看来那是非常错误的，许多文官都干得不坏嘛，大寨、西沟都有不识字的人当干部，而且比我年纪还大，因此，我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可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现在整风运动已进行了一年，我又想了很多，我学习杨水才和焦裕禄等先进榜样，认识到如果不继续革命，就会变成反革命，不把革命进行到底不对。我要做的一切就是新旧社会对比，过去我放过羊，当过长工，现在我是党员，是干部。如果群众要我当他们的服务员，我拒绝不干怎么能对得起毛主席呢？我应该用尽我百分之百的力气。”

“如果群众要我服务，我就该当好人民的老黄牛，绝对不应该为了过好生活、多挣工分而操心费神。很简单，为人民服务搞好生产使大家都能吃好。”

“因此，现在我不再前后盘算了，我的想法是，如果群众需要我干一天，我就要好好干一天，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算拉倒，我决心改变张庄的落后面貌，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今年我在地里干活儿少了，没参加足够的集体劳动，而且我还有主观主义，有些问题我没有和人商量，只是自作主张，我和干部群

众商量不够，脱离了群众。”

“最近我又产生了骄傲自大思想，认为今年庄稼长得好，即使亩产达不到400斤，我们的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不是一种好想法，因为人一自满自足就不能进步。事实上我们在马厂是落后的，更不用提山西或全国了。往北一英里人家收四五百斤，而我们还不达300斤，至于大寨和西沟，我们连人家的零头也赶不上。”

“参加集体劳动少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主要标志。我是属于二队的，但是和他们一起劳动的时间不多，或者接触不多。陈永贵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要下地劳动，为什么早饭前我不该下地劳动呢？”

“二队的一些问题应该由我负责，毛主席说哪儿有困难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如果有问题，就必须处理，但是我为队里解决的问题不多。我听说他们烧坏一台电动机，但是没有调查过，这是官僚主义。我的成绩很少，但是缺点很多。”

“因此，今天黑夜我就检查这些，今后我一有时间就要和群众一起劳动，有问题就和大家商量，我要开展学大寨运动。”

“下一次我要在党支部和全大队面前作自我批评。请批评我，我自己脸上的脏东西自己不容易看见，可是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你们不给我提出缺点，我还会认为我是对的，我一直把毛泽东50字语录作为标准，我完全赞成，但是我觉得我缺少必要的生气。”

“说完了，欢迎大家批评，如果你们不批评，就害了我！”

考虑到贵才身负重任，二队社员对他的评价是温和的、笼统的，群众没有直接发泄不满，而是间接地谈论，比如说贵才的姐夫周成福和他的哥哥周成乐，因为其父亲的遗产——院内地界线问题大吵大闹，他说：“我们应该根据国务院政策办事，不管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都要符合国务院的政策，有多少条呢？六十条？我记不清了，但是反正应根据制定的条款办事。”

显然，他认为在他个人财产问题上，他哥哥违反了六十条。

主要对象秦快嘴最后发言说，贵才应该学会团结和自己有分歧的人，这是毛泽东整风纲领的重要一点。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白，可是他似乎显然是指贵才应该和他这个发言者，以及他所有的追随者团结一致。

“为什么？”秦问道，“二队社员割草时畅所欲言，而你一来他们

就不吭声了呢？你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倾听各种各样的观点，多学点东西。”

这儿尽管没有指名道姓，秦快嘴再次告诉贵才考虑他们一伙的意见。秦还说贵才在大喇叭上讲话很多，应该省出更多的时间听听中央的声音，省出更多的时间解释国家和地方政策。

所说的一切说明，表面现象下面酝酿着满腹牢骚，只不过是人们不愿直言不讳罢了。但是如果考虑一下发言者，又说明这些抱怨牢骚是涉及到个别闹独立性人的特殊情况的，并非有关贵才领导工作的根本问题。

大多数发言者都感到贵才作为大队干部干得不错。他们喜欢他，信任他，发现他平易近人，尤其是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更是如此。他们尤其喜欢他深入群众之中，乐意倾听批评意见。他们提出的最大问题与主观主义有关，大队领导往往不预先准备，不作适当的调查协商就当场作出决定。他宣布租给工人的房租每个房间一元钱就是个例子，怎么能好坏房子一个价钱呢？另一个决定是出嫁妇女的户口如果不迁移到丈夫所在村，其第3胎孩子不给分口粮。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贵才往往作出违反国家政策，或忽略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决定。关于一些其他问题处理得也很简单，他没有对群众作适当的解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分配救济粮，这是大队为使全队渡过困难时期，维持到秋收借给社员的粮食，没有说明这些粮食只是为救济困难户而分配的，许多人误以为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当不按人口分时，他们便大发牢骚，但是这一切都是由于对借粮基本政策误解了。

申石玉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他是多嘴多舌的天主教徒申传德唯一在世的儿子，其父在1948年起了令人怀疑的作用。

“既然你是一把手，我想说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肥料，而是对科学方法的信任问题。我们抓肥料、灌溉，但是，土地本身仍然还是个问题，地一浇水就变硬，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另外，还有对土地选择优良品种问题，如何改良土壤，如何培育合适的品种，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自从大坝竣工以来，有一次大坝放水灌溉，农田有了主干渠，然而张庄农民还没有为灌溉修

整好土地，这是肯定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土地本身对水的反应，这种土壤本地称“盐碱地”，就是说秋天雨季结束，大量的水蒸发时把底层土壤剖面土的盐带上来，因此把土地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的粘土，几乎无法耕种。国家号召灌溉施肥，然而实践证明对张庄的情况很不适应。这里的技术问题不是增加肥力，引水灌溉是能解决土壤结构、排水，以及内部渗透问题，但是大队没有处理这些问题。大队、公社以及市里的干部都把张庄的产量低看作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们的方法是加强集体意识，强调大寨自力更生，大寨苦干实干，强调多上粪、多浇水。由于反反复复的运动都强调这些东西，但都没有成功，人们很不情愿扩大灌溉渠，平整土地，而干部们则认为群众落后、顽固、堕落。当然由于这是对中共运动的一个信任问题，没有落后的群众，唯一的另一种结论是，只有干部是落后、顽固、堕落的。

当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可以称为政治问题。一个献身社会主义的领导本来早就该把农业放在张庄的首位，早就应该把影响高产的技术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不必将来自上级的一般解决方法信以为真——多上粪、多浇水。这样的领导本来应该研究张庄的特殊的土壤状况，并且进行各种实验来征服这种“盐碱地”。正确的政治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产生正确的技术方法，但是，面对产量低下，耕地面积日益减少，人口急速增加等问题，大队领导都采用了简单的方法，强调搞副业，而同时上级千方百计使张庄把重点放在多上粪、多浇水的轨道上的种种努力遭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他们知道浇水能使土地变硬，几乎可以使来年长不出庄稼，继续按照传统方法种地，拒绝汗流浃背地修筑灌溉系统。

当张庄农民听说一英里之外的马厂庄稼长得很好时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很清楚，马厂的土地没有张庄的难耕种，也可能根本就不是“盐碱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肯定是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提出，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人们所全神贯注的是秦快嘴在这次开会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似乎控制着会议进程。他说：“咱们讨论讨论。”大家讨论就开始，他决定讨论进行够了，讨论就结束。他的性格似乎操纵着各个小组，而他的追随者如八字脚郑，起着非常积极

的作用。他比别人发言次数多，声音大。有一次，秦快嘴不是要求，而是命令陆何仁给他倒一杯水，似乎这位队指导员是某种仆人一样，而且何仁也答应了。

显而易见，似乎秦快嘴和他的工作人员是在进行有预谋的活动。次日晚上秦快嘴问王腊肉他是否能作自我批评。

“如果我只说我的错误，可以发言吗？”

“我们和领导商量一下，”王说：“原先的决定是只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才能在生产队会上发言。”

“可是，这儿人人都认识我，”秦说，“我怎么工作，我干了些什么，我在自己队社员面前发个言有什么坏处呢？”

“我得把这个问题向领导提出来。”王重复道。

这话使秦十分恼火，他大步跨进人群，拿起小板凳，狠狠地走了。

他企图控制小队会议，操纵会议进程，没有任何自我批评的样子。人们都感到秦快嘴态度专横，行为野蛮，致使大会失去控制。他的态度完全是抵触性的，再加上他挖苦讽刺小麦下种率低和分配救济粮等问题，结果自己把斗争主要矛头直接对准了自己。

秦快嘴一走，二队的会议便平心静气地进行开了。大家听两名党员进行了自我评估。一位是19岁就入党的老同志陈万田；另一位是1964年四清运动入党的青年妇女李莲萍。

陈万田为他饲养牲畜工作道歉，尤其是没有按计划繁殖骡马。但是自称春种高潮期间参加突击队和青年人一起肩并肩苦干，一点也不落后，并且还自豪地谈到给过路的8名解放军战士借被子过夜。“他们一共只有4条被子，我把我的被子借给了他们，还为他们烧水，这仅仅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是我的义务。”

李莲萍是二队记工员，她感到她没有扎扎实实刻苦学习，而且缺乏斗争精神，“我没有和坏人作斗争，没有真正懂得两条路线斗争”。她没有提起她这位年轻母亲带着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的情况。

社员们热烈地讨论了他们俩的情况，并作了尖锐的批评。

“记住，”二队指导员陆何仁说，“我们有共产党员标准，不能像老百姓那样来作评价。我觉得陈万田改了不少，现在比过去关心公共财产了，他拉的车坏了，不找队里修理，而是自己在家找东西抽时间

修理，生怕耽误工作，他还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带领车把式修灌渠。”

“他的弱点表现在阶级斗争方面。在这方面他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当然文盲不识字，是个借口，学习有困难是个借口，但是批判阶级敌人不需要知道如何看书写字，坏人坏事总是会揭露出来的，他能在这方面有所进步。”

裴新民同意何仁对陈万田的看法，他在屋子的一个角上发言，声音从黑暗中幽幽地传出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裴说陈万田今年有进步，他过去在磨坊干活儿，现在赶车，非常负责任，分给他什么牲畜他要什么，不管好坏。如果车坏了，他抽时间自己修。但是，他的缺点是在阶级斗争中不主动，不管是批评谁他从来不言语。”

“这是自私自利的态度，”申树德附和着说：“他没有斗争精神，确实是自私自利。他应该认认真真批评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他们也批评了李莲萍的同样弱点，但是对于她当记工员的表现都同声赞扬：“非常负责”、“一连工作好几天，都不出半点差错”、“解决问题耐心”。但是，“她从来不向领导报告群众的不满和批评，而是和群众一起发牢骚”。“在阶级斗争中，她是个老好人”、“他是个好记工员，但是她是个老好人”。

散会后，群众都走了，党员留下讨论如何对待群众的批评问题。

裴新民首先说：“要做的事就是下决心苦干和工作。”

“对。”陈万田说：“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意见，我们都要改正。”

“但是，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在群众后面，”新民说：“我们应该确实起带头作用，队里的决定要执行到底，不能姑息迁就。每天的工作要定额，五行就是五行，不能只锄四行，看看太阳落山，人们准备走就收工。”

“对，”陆何仁说：“尽管我们现在每人只有2亩地，附近还有这么多工厂，还有机务段，我们可以搞到各种粪肥，如果我们不能提高土地产量就说不过去。但是，我们的社员本应下午二点下地，可是他们仍然是三点才去。”

“最慢的还是没老婆的人，”万田说：“秋收季节，中午我们连回家吃饭都顾不上。”

“我有个建议，”新民说：“铁三局附近有个地方许多人已住进去

了，还没有安排人掏粪，此外，村里的解放军也没地方处理猪粪，我们应与这两个地方联系一下，在三局附近建一个化粪池，还要和解放军联系有关猪的问题。”

“说干就干。”王腊肉说。

“明天我和他们联系”，新民答应说，“我们还有大缸吗？”

由于大雨滂沱，水位很高，只挖化粪池是不可能的，得埋下大缸才好收集人粪尿。

陆何仁说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大缸，然后又补充说：“群众的批评听起来不可能总是很好听，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绝对不能发火，那不符合党员标准。我们一定要带头参加劳动，勤奋工作，不能只是对领导定下的任务发牢骚，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发挥重要作用。”

裴良顺提出最后一件事，车碾庄稼问题。

“如果牲口跑了，压倒了庄稼，我们不能太责怪赶车的，”陈万田说：“但是有些人竟然坐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一整行庄稼被车轮压倒，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满不在乎，而且从来不听人劝告。”

他们决定召开小队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还进一步作出计划用新的宽垄种植法播种小麦。

五十六 普通社员轮流发言

9月15日各队又开会整党，五队办公室王老太的儿子王仁保，前张庄妇联主任胡雪珍、前党支部书记张兴发都发了言。

王仁保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首先说他被刘少奇路线毒害了。这可是顶大“帽子”，但是，经他解释以后，我们才明白他的意思。仁保是个经验丰富的修理工，利用这一技之长，他在大路边用砖草率地盖了个自行车修理铺，招牌是“张庄五队修理铺”，实际上是私人开办的，只是通过队里领的许可证。在他开这个铺子之前，大队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他每天交队里一元捌角钱，队里给他记一个劳动日，每年队里分红时，他可根据其所挣工分的总数领自己的一份。由于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从来也没超过一元，所以这种分配法对队里有益处。

队里每天收进一元捌角，只付出一元，这种分配法也有利于仁保，

因为几乎每天他都可挣一元捌角以上，那么每天超出部分的报酬就装入自己的腰包了。而且每月只算20个劳动日，剩余10天的收入百分之百归他自己。如果诚心诚意干1个月，仁保的收入要比下地干活儿的社员多得多，有时甚至可多二三倍。社员们的尖锐批评，使他承认这种做法不太公平，对一个党员来讲确实不合适。

“这场整风运动提高了我的觉悟，”他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个路线问题。我是为自己干？还是为集体干？我是个贫农，在共产党帮助下才翻了身，我认为成立这样的私人企业是错误的，我走错了路。”

仁保提出的建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由张庄大队主办成立一个联合铸造修理铺。除了修理自行车，还能修理各种农具、运输设备或大队所需要的任何其它东西。由于有现成的电石气焊设备，有收集好的铁、铜，以及其它材料，成立这样一个集体单位有雄厚的基础。大队为这项工程提供资助，其成员在各自生产队挣工分，除去消耗，全部收入归大队。为什么不马上就成立这样的企业呢？

这个想法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兴趣，大家接受了他的建议，个个赞不绝口，并鼓励他尽快干起来。

下一个发言的党员是张兴发，我们更渴望听他发言。20年来，他实际掌握着张庄的命脉，只是因为做房产投机买卖，才在四清中下台。自从被撤职后，他感到自己的威信还不如一般平民百姓。他打定主意首先照顾好自己，关心好自己小家庭的冷暖，尽可能过几天舒适的日子。

他不学习，没有给自己制定任何政治目标。他被分配去建一个集体养猪场，工作搞得有条不紊。他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别的主意，他担心干不好，担心如果失败了大队会责怪他，再次严厉批评他。尽管他态度消极，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样样事情进行得确实是一帆风顺。一开始仅有3头母猪，现在已有15头了。另外，他和他的助手们用粉房的下脚料养了40头肥猪，如果一头母猪一窝生上6只小猪，1972年他们可望达到200只猪。不管怎么说总是个大飞跃。

养猪的成功和整党的挑战，使得兴发对自己重新进行了评价。“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永远也不能保证我家过上富裕生活”，他说，所以他决心重新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之中。

社员们非常欢迎他的决定，都说兴发养猪真是创造了奇迹，他们

希望他不仅能为集体养几百头猪，而且为个人提供猪崽。

整风对胡雪珍没有多大意义，在自评时，她只说了三言两语。她强调她有许多缺点，没有优点，没有成绩。因为身体不佳，她既没有参加生产劳动，也没有参加党务活动。

几个人问她，为什么不能像过去那样组织发动群众呢？为什么不妇女们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呢？

她回答说，她已下定决心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她私下告诉治安主任申，工作很难干，因为她丈夫王文则把她的话从来是当作耳旁风。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他大4岁，他喜欢说个顺口溜：女大4岁，满家富贵。实际上，对这一点他从来就没有开心过，总是闷闷不乐的。”

“别再为此烦恼了”，申说，然而他和她都清楚地知道那首顺口溜是文则挽回面子的方法。后来申告诉我们，漂亮的先娥提出离婚，文则失去了他真正喜欢的妻子，因此，他现在用这无聊的顺口溜来进行自我安慰。

如果胡雪珍的发言可以和二队裴良顺简短的自我批评相提并论的话，那么第四队的申东良比他们就胜一筹了。申在小学教锻工活儿，心满意足地说了三句话：“我没有起到作用，我想好好干，我准备想办法干好一些。”

听了这些话大家都笑了。

尽管如此，社员对他评价还不错。他们觉得自从整风开始以来，他的工作态度和方法都有进步。他们鼓励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干一辈子革命。”

以前，申东良从不以争强好斗而著称。有一次当他看到有些邻居贴大字报揭发文则问题时，却设法阻止了他们。

“你们竟敢写他的大字报！给我贴上100张有什么关系？但别给他写！”

“过去，”治安主任申说：“你就是朝申东良开三炮，他都不会吭一声。他当队长时，曾经一大早去敲门叫社员去上工，几分钟后要没人到场，他就一个人下地了。”

如果有些党员缺乏“斗争精神”，那么有些党员显然斗争过了火。

齐风腾在不存在斗争的地方能看到阶级斗争，经常无端攻击韩满文。韩满文是第一队6个党员之一，他父母亲1954年前充当日本人的汉奸，因此，土改时财产分配给别人，此后便印上了“斗争对象”的污名。满文自己1953年参军，当兵时入了党，1956年返乡回到张庄，成为大队党支部的积极分子。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攻击为“斗争对象”的儿子，因此，决定退出政治舞台，无论怎样劝说都不能阻止他。现在整风的方法使他相信毛泽东思想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他又开始活跃起来，积极带头工作了。其他人每人往地里拉4车粪，他自己拉6车，其他人上坡时要帮手推车，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拉上去，队里的同伴们个个对他赞不绝口。

但是，队里主要党员齐风腾是个爱吹毛求疵的人，他指责韩满文拣近的地方倒粪，在统计表上引人注目，但是却躲避往远地里倒粪。

“两个不同的阶级，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风腾说：“贫农选择最艰巨的任务，而中农却鬼鬼祟祟拣容易的干。”

因此，风腾把微小的矛盾说成了对抗性矛盾。其他队的社员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两个人干的活儿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人在地的近处卸粪，而另一个在远处卸粪。随着人们从地里往过走，人人都要移动卸粪的地方，最后整个地都要上粪，开始往远处卸粪的人在近处完工，而在近处开始的人在远处完工，最终拉粪强度证明是公平的。

人们说风腾对别人太苛刻，劝他对自己的活儿操点心。1964年队里让他放60只山羊，4年后只剩下18只，“你批评别人的缺点，可对自己的缺点却视而不见”，他们说，“你不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别人，而是发火骂人”。

风腾似乎老是骂骂咧咧的，他的工分低了大惊小怪，粮食吃完了指责生产队。他为自己的阶级出身而自豪，往往轻视那些出身富家的子女。

“他觉得自己是一朵漂亮的花，别人只是一块豆腐渣。”

另一个对人刻薄的党员是申起昌，绰号“三多同志”，他牢骚太多、废话太多、考虑自己太多。他思想落后，工作差劲，有时甚至有偷窃行为。此次整风批评，使他进步很快，不仅成了副业队的积极分子，整风活动积极参加，热情帮助队长工作，而且在家里养猪积肥，

又挣了一百个劳动日工分。

如果一些人斗争性不强的话，另一些人则是盛气凌人。据说仍然有三分之一党员敢于坚持原则，处理各种问题，其中之一是大队会计三队的申许文。

同意当会计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冲突，因为许文父母觉得无论谁当会计，最后必定会陷入困境。他们劝他不要参与此事，常言道：

“一二、一二、一二三，灯光下细心打算盘，

不分白天和黑夜，运动来了准过关，

最后当个老百姓，老实下地把活干。”

申许文不同意这种看法，没有会计革命怎么能成功？并非当会计就过不了“关”，而是那些违背毛泽东路线，把自己置于人民大众之上，利用职权办坏事的人才过不了关。据申许文说，他安然自得地接受了大队会计职务。

宣传队刚到时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一个小组查看所有的帐目、帐单；一个小组全力揭发大队各级干部贪污受贿行为。专案组邀请了数字概念极强的申许文参加调查工作，但是，这一回又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

这怎么能不引起麻烦呢？当然，揭发贪污受贿是件好事，但很容易犯错误，跟踪假线索，进行无把握的指控，最终只能疏远乡亲。因此，你不会迈向阳关大道，而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还是求个稳妥，安分守己别惹麻烦为好。

但是许文又不同意，一个人如果不愿冒风险，反对贪污受贿，革命怎能成功呢？当然，他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如果犯了错误就改正，好人是会理解的。如果工作中惹下了罪犯，惹就惹下了，怎么能挡住前进的道路呢？

由于申许文承担责任，群众同意了。但是，自从当了会计和调查员，他发现没有时间下地干活了。面对的一切都需要仔细计算分析，说声“我很忙”是很容易的，但是要说他有点变懒了、脱离了生产劳动，在他和老百姓中间形成了鸿沟不是更加真实吗？

申许文不得不同意他应该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多下地参加生产劳动。

整风运动一开始进展缓慢，未能发展成为热烈的群众运动。但是，

随着时间一天天消失，一个会接着另一个，整风形成了某种热头。参加会议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多了，发言不是越来越少，而是更加直言不讳、从容自由。似乎没有一个人的检查是令人注目的，没有一个人的批评单独就可以震惊全大队，或者震惊一个社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气氛有所改善，在地头人们不再谈论天气或庄稼，开始谈论整风了，简略地一次又一次地回顾每个党员的经历。

“过去谁敢批评党员？”许多人说：“他们忘记了五六十年代许多运动中，党员就像目前一样站在‘关口’前。过去党内问题都要在大队进行讨论，现在又交回到群众之中，整风应该是定期的，1月1次，2个月1次，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密切了。”

党员们发现人民群众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远远不是泄私愤、图报复；就感到好多了。进入自我批评阶段后，他们曾犹豫不决，担心被开除党籍，而现在他们发现群众鼓励支持他们。

尽管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群众还是支持他们的。这样他们就扬眉吐气了，接受批评就好像洗澡一样，可以清除污垢，使人振作精神。这种积极的结果，立即在地里显示出来。二队的陆何仁和裴良顺过去道德品质恶劣，本周末也下地参加劳动，各自带着一组同伴个个精神焕发。

“党员带了头，群众往前走。”高法官说。

没有人反驳高法官的说法，也没有人太当真了，很清楚整风运动并没有能激励全体群众。在分析原因时，我得出结论，1948年使人人醉神迷的说理对质的新奇感早就烟消云散了，几乎没有期望人们会以23年前的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中进行整风。全国解放只标志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新社会艰难繁重的任务必须花几十年，甚至可能几个世纪的时间。

毛的这一论点由种种事实所证明。既然如此，没人会幻想任何一个运动就能奇迹般地改造好整个社会，及其党员和干部。张庄必须反复不断经历这样的运动，一个年代接着一个年代，以保证不断向前迈进。

无论如何，如果经历一次运动，整个团体确实会取得进步，人们就会满腔热情地承担任务。了解夺取丰收，需要来年长期奋斗，决不会减弱人们责任心，忽略当年的耕耘。那么，为什么农民对于发展培

养建立社会联系，这样缺乏责任感呢？他们经历整风运动，但是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整个过程缺乏“热情”。由于我期待1948年“过关”所取得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进步，我灰心丧气了。我意识到比过分暴露的更严重的东西阻碍着人们的进步，但是我不能明确说明是什么东西。

然而，我几乎没有时间去理解这些印象，更不用提得出结论了。小麦下种即将达到高潮，白天人们每时每刻都为此而奔忙。在地里来回奔忙一天后，我发现在会山会海之中，晚上群众很难保持清醒而不睡觉，我并不孤立，有一二个农民几乎总是还不等最后一个人讲话就背靠着土墙睡着了。整个团体似乎已全力以赴了，不可能期望承担其它事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大忙季节，张庄会勇敢应付二种新的挑战。

五十七 乡村交易会

9月中旬，日落西山。一阵凉爽的秋风使张庄中心的麻池飘洒着蒙蒙雨雾，清晨时分，雨雾已向四周扩散，附近的小巷院落，到处水雾弥漫。天刚拂晓，我们起床参加宣传队的学习。太阳透过潮气使整个地区充满柔和灿烂的光芒。条条胡同、道道土墙、棵棵大树，座座院子的大门变得虚无飘渺，颇似幻想中乡村的舞台道具，而不像我们了如指掌的尘世之物。

几个用竹杆和席子搭成的小棚子，更增强了我们的幻觉。这些小棚子就像蘑菇一样，在夜半三更占据着空间。货摊依广场北沿而立，几家炉火冒出的炊烟透过席子和席子周围徐徐升入上空。天空没有一丝风，炊烟和悬浮在树高处的迷雾混和在一起，纹丝不动。

这些棚子是张庄一年一度秋季交易会的第一处摊棚。我们擦擦眼睛，看了又看，真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曾有人告诉我们交易会是不会举行的。晋东南地区副专员、素食主义者李志远就在几天前还宣布，这样的交易会干扰小麦下种。为了使张庄每个人全力以赴完成好这项中心任务，防止周围邻村、亲戚朋友和熟人因张庄人的殷勤好客，而中断工作，人所共知的张庄大队传统的交易会会被正式取消了。

让每人都避免花费3天时间进行招待客人，参与小商品展销、小吃、看戏、货物交易以及娱乐活动，人人可继续进行手头的工作——“三秋”季节的大会战，以显示他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学大寨运动的。

但是，在黎明前的迷雾中，第一批交易会摊点已经搭好了，甚至在我们观看的时候，又有人三三两两陆续走来。有些人用仅几平方英尺的地方摆设各种货物，有些人在搭建大大小小的摊棚，每个棚子都要满足搭建者计划和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需要。

浓重的驴肉香味从一家炉火中扑鼻而来，由于大清早想到一块块肥厚的炖驴肉，就使我和卡玛一看就没有了食欲，我们被吸引到第二家炉火旁。那里一位老头在做甩饼，我们心醉神迷地看着他把一块面团做成一个薄薄的饼子，准备烧烤。他没有像上党地区通常那样把面团前后来回咣咣翻动，而是让面饼在空中围绕他手中的一根面杖自由旋转，随着一圈圈地转动，面饼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直到大小尺寸正好和甩饼鏊子一般大小，然后恰到好处地、熟练地一挥动，咣咣一声把甩饼放在烧热的鏊子上烘烤。

当这一张甩饼在吸收热量过程中，他用左手把蓖麻油擦在第二个鏊子上，同时用右手拿着的面杖旋转第二块面团，一经旋转好后，便把甩饼往空中巧妙一抛，咣咣一声落在空鏊子上。然后用手腕轻弹，把第一个鏊子上的甩饼来个翻身，翻在上边的一面显出诱人的面包皮一样的棕黄色。甩饼做好以后，我们花几分钱买了一块品尝。

这位小贩精湛的技艺和意大利老练的烘焙饼制作师的技艺相似，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要不是突然想起学习时间已到，我们会多观赏几次这种手艺术。由于担心误了新的课程，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开他们，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其他早起床的人突然从迷雾中出现，他们迎着飘逸在全村不能抗拒的香味而来。

早晨我们学习完毕时，迷雾已经散尽，展现出一幅上党以此闻名的阳光灿烂的景象。随早晨时光的消逝，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然后又变热了，对8月的天气来说是够热的了，但是却没有雨季的潮气。

在返回广场的途中，我们发现主要大街两旁，到处都是——批批货棚、摊点，把麻池围得严严实实，甚至连几个胡同小巷也挤满了人群。太阳出山前开张的货摊仅仅构成了众多货棚摊点的始发中心而已。大街上拴着驴、骡、牛、马，由西向东，一直通到马路上，不过只是集

中在大街南侧。大部分牲畜周围已围满了买主和好奇的过路者。正如摊棚和牲畜激增了一样，人也爆满了。那天高峰期，交易会吸引了五千多人。他们有的步行来，有的乘汽车，有的坐牲口车，以及骑自行车而来。有空地方就有自行车靠树放着，停放在门柱旁或放在路旁地上，把偏僻的小路堆放得乱七八糟。土改后，中国农村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就是自行车数量稳步增加。以前，只有最富有的地主或较富裕的小商贩才有希望购买自行车，现在几乎每家都至少有一辆自行车，有的家每个人就有一辆。

我们在人群中看到一些奇特的偏僻山区的人，用色彩艳丽的彩带、围巾装饰着，显得光彩夺目，而他们竟然觉得自由自在、怡然自得，似乎这种场合就需要穿着华丽，而其他的人穿着才不合时宜。我们也看到残疾人、傻子，以及不少严重患有眼疾的人。想到张庄诊所所提供的有效的医疗保健，更有公社医院，附近铁路医院提供的更加有效的医疗服务，很难理解为什么本地竟然有这么多疾病患者。但是，这些人确实大踏步走过集市，他们的眼睛由于患沙眼或结膜炎一半被损坏了。我们不禁注意上他们，因为张庄村外的人看到美国人在街上出现被迷住了，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没完没了地盯着我们。如果说被正常人盯来盯去而令人局促不安的话，那么，回头看见的脸上一只眼流出灰色液体，另一只似乎已无法医治的红肿、发炎、半睁半闭的眼睛就更糟了。

赶集的人挤满了狭窄的街道，他们在摊棚之间来回走动，荡起了一股股灰尘。正午时分，灰尘悬浮在整个乡村的上空，宛若一层薄幕，所占据的空间，几乎和清晨迷雾完全一样大小。

不用说，尘土没有它所取代的大雾所具有的任何迷人的魔力，不管怎么说，尘土也为交易会的场景增添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气氛。如果需要这个信号的话，它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身处华北地区。

小商贩们在地下摆放、在棚里陈列的，或在大街上大声叫卖兜售的各种货物，使我们十分着迷，有锄、叉子、耙子、扫帚、筛子、面筛子、粗筛子，都是用于农业方面的。有的摊棚里摆满布匹，既有需用布票买的机织布，也有不需要布票的手工粗布，有些手工布显出天然棕色棉花精致的茶色，其余大部分是未印染的白色。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家庭纺线染色后再织成鲜艳的花格子图案的布。其他摊贩摆着

自留地或家中花园种植的蔬菜，如茄子、白菜、豆角等。有些摊贩陈列着一筐筐水果，尤其是当地特产大枣、梨和最近引进的苹果。一串串的柿饼也在市场销售，有些地方商贩只有一篮子产品出售，一个人卖完东西，摊点刚腾出来就被别人占用了。并不是所有这些场所都是个人买卖东西的，许多地方是由大队或生产队派人来，销售的收入要交归大队或生产队，年底作为现金分配。

我们得知，甩饼摊和驴肉摊都是集体经办的，如许多卖糖果、干水果摊子一样。就在他们中间有一位确实证实是个人开业的巡回牙医，他清出一块场地，在一块红布上摆出他历年拔下的令人厌恶的数以百计的牙齿。他大肆宣扬他是无痛牙科，他是用笨重粗大而不卫生的注射器和针头，注射大量的奴佛卡因来保证无痛的，最后拔牙是借助一堆可恶的凿子、锤子、手钳等工具进行的。这个“口腔诊所”吸引人之处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进行的。每当一个牙快被拔下时，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鼓励牙医和病人，每拔一个牙齿的总费用是一块五角。

出卖五金器具以及其它产品的货摊很多，有的专门出售表并且修表，其它的有修理自行车、补轮胎，还有一些人修理手电筒，破了的暖水壶、钢笔或瓷器等。修理东西大部分是立等可取。

整个交易会上最热闹的地方大概就数麻池北面，供出售刚断奶的小猪崽儿的街市，这些小猪，是用大柳条筐子捆在加重自行车后架上，运到交易会上的。此时小猪一群一群地放在地上，每只小猪两条前腿捆一条绳子，通过脖子顶端互相捆在一起，同时后腿从后面捆在一起。

由于这样捆扎着，小猪扭扭曲曲在地上能滚出几尺远，但是不可能站起来逃之夭夭，因此，躺在地上有的哇哇嚎叫，有的直哼哼、有的扭来翻去，等待买主选购，把它们从正午的阳光下带走。有一买主抓起一头小猪，它就尖声大叫起来，似乎用刀子戳了它一样。大部分猪是黑色的，但是有的也有白色花斑，有的猪全身微红带黑斑，卖主和顾客并排蹲着聊天，不时地把折腾扭出猪群的小猪扔回猪群中间。

一位小贩，是一位中年农民，身穿一件非常干净的制服，他告诉我们他是武乡县人，县城在张庄以北120多华里的地方。像这样的猪，在他们那里供应充足，每斤卖8角钱，而在长治郊区人们不重视小猪繁殖，每斤值1元钱。每头猪平均十一二斤重，那么，每只小猪可多收入2元钱。一个人骑上自行车从太阳出山动身，到太阳落山就可把10只、

15只，甚至20只小猪运到张庄卖掉，一整天的收入可多达30元，甚至40元，远比一个人在地里苦苦累上一个月的收入还要多得多。

我脑海里想起一个问题，这算是投机倒把吗？或者如果这个猪价公平合理，是什么因素制约小猪价格不会逐日上升呢？尤其是公共养猪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情况下。答案是每斤猪价都有最高限价，这是由集市管理员制定的，此人是市政府经委官员，在那儿不仅对猪价，而且对所有的其它商品价格都强制推行最高限价。原来这个交易会并非传统的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供求平衡关系靠自我调节，而是一个无论出售个人、集体的商品或财产，价格都要受国家控制。

如果任何买主觉得有欺骗行为，可以找到市场管理员投诉，违法商贩就得因提高物价而受到处罚，并可能降低价格。这种整顿市场管理法在1971年张庄7月交易会上证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就在交易会中张庄大队突然发动了一场社员买猪的群众运动。

在观看了整个交易会，并设法了解情况之后，我对副专员李志远曾设法取消交易会感到非常吃惊。抵制交易会这是这位著名的“反修”老战士的看法；交易会必须推迟，以免干扰小麦下种和“三秋”工作。然而，交易会显然对秋季工作有很大益处，人们拿到交易会出卖的，以及要购买的物品，几乎都与生产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场交易会对“三秋”工作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经济意义。

最重要的作用是交换耕畜，主要是为交换马、骡、驴、牛等。要出卖牲畜的大小队找出上党尚存的秋季交易会，即使这些交易会是在数十华里之外，同样需要牲畜的大小队派人到边远县区的交易会上购买，有时甚至需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把买到的耕畜赶回家。

没有几家交易会根据季节，按照预定模式从一个乡镇转到另一个乡镇，很难理解买卖双方是如何进行联系的，大概地方报纸专设购销广告版，是会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报纸上没有这样的版面，即使有，报纸广告是难以代替一个接一个供人对比和讨价还价的，活生生的牲畜的。

9月交易会的牲畜交易中，交易量最大的当然是小猪了，这也和“三秋”生产密切相关，因为饲养上市的猪崽要依靠夏收作物作为饲料，而秋天小麦播种则要靠这批猪崽新造的粪肥。由于大部分阉割公猪是秋天上市，现在正是购买小猪的时候。张庄交易会对于猪多粮少和粮多猪少的县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往北一百二十多华里的武

乡县，生猪繁殖都成为个人和集体的一项重要副业。那里每家都养母猪，但是，种植的粮食不够饲养所有的小猪崽；相反，长治郊区饲养母猪少，粮食却相对丰裕。这次交易会正是武乡卖主和长治买主的集会，对双方均有利可图，可以相互确保将来山区和平原的猪肉供应和粮食生产。

家畜是交易会最重要的交易产品，但决不是唯一的重要产品。要使用耕畜干活儿，农民需要挽具、缰绳、笼头、鞭子、马掌、马掌钉，粮食的播种、收割、加工需要种子袋、播种机、粪桶、扁担、锄头、铁锹、镰刀、柳条筐、扫帚、面筛子、粗筛子，只提几种东西就够了。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在某个货摊找到。

甚至销售布匹，对生产也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对那些衣服已穿破的家庭是如此，对于那些已用完布票的家庭尤其重要。机织布在合作社经常可以买到，但是，非配额的家织土布几乎找不到，而这种家织粗布由纺织者或由一些专门从事此类产品的小贩直接投放市场。

你可能甚至争辩说，陈列巡回牙医去年拔下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牙齿摊子也与生产有关，因为如果牙痛不止，谁能全力以赴种麦收秋呢？

如果没有交易会，只有少量的蔬菜水果可以出售，那就没有几个农民会不辞劳苦种植这些产品，植物栽培就会限制在满足各家自己食用，那就不会移植什么果树，已经结果的树，也会被人忽略。一个发展成熟的合作社，必须经营这些物品，但是，据我断定，1971年乡村供销社没有经营这些难存易烂的产品。

交易会上还有货摊出售甩饼、驴肉、蜜饯果之类美味食品。当然这些食物是搞农业生产不需要消费的奢侈品，不仅精美，而且昂贵。购买这些食物的人只能被称为自我放纵，尽管如此，显然整个休息、娱乐、适度的自我放纵也和生产有关联，因为人总不能日以继夜，一周接一周，长年累月地“埋头苦干”，而仍然对工作保持满腔热情，人们需要有张有弛，有休息，有消遣和某种娱乐活动。对张庄和周围乡镇来说，这年9月的交易会提供一个稀有而极珍贵的传统休息和庆祝机会。8月中秋节，春节十天假日提供了另外的机会，单凭娱乐为理由，似乎张庄交易会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市、公社以及大队干部，对于这些因素不进行任何讨论就取消交易会令人费解，取消“三秋”工作必要的物质交流机会，而不提供某

种可行的替代机会，只能被认为是极端狭隘和偏执的做法。但是，要理解为什么高级干部、甚至宣传队员会陷入此泥坑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上，商品交易带有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投机倒把之色彩。对整个自由市场要鼓励到什么程度？控制到什么程度？应经营什么商品、对价格如何限制？所有这些问题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党的干部在这些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各持己见。一方面有的干部鼓吹把自由贸易、私人交易、赚钱谋利作为农村生产的刺激剂（1971年这些干部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有的干部主张彻底取消自由市场，谴责他们为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1971年他们神气十足，自从那时他们被称为“左倾教条主义”。

双方的观点我似乎哪个也不满意，给予自由市场毫无限制的支配权，就是鼓励农村投机势力，给集体生产和交易加上了不必要的负担，而完全取消自由市场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不管是国家商业部门，还是合作供销社，都无法经营种类如此繁杂的商品和服务业，都无法为繁荣昌盛的农村经济提供雄厚的基础。

在具体操作上，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有时满腔热情扶植自由市场发展，有时进行严厉限制，甚至不准他们发挥其潜力，或者完全取消、限制自由市场。任何特定的发展阶段，自由市场都可能发挥某种最适当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不容易决定的，因此，决定市场的命运之风，一会儿这样吹，一会儿又那样吹，完全取决于哪种风支配着整个社会。

1971年支配长治市和马厂公社的是忽视张庄交易会 and “三秋”工作有任何联系的反自由市场之风。一切反对交易会的人都振振有词地说，交易会对小麦下种有三天的破坏作用，而毫不承认小麦播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会买到的各种家畜、工具和物件、商品等事实。

幸运的是农民较理解这种关系。尽管官员们取消了交易会，但交易会仍如期进行，而且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前几年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生产充满了活力。上边的禁令所达到的目的是取消了演出，而仅演出本来就可为交易会赋予某种政治内容。过去交易会期间，张庄领导经常邀请周围地区最优秀的业余剧团，甚至花费相当的代价雇用专业剧团助兴。下午、晚上剧团上演主要剧目和歌剧，连续3天为戏曲爱好者免费演出一系列地方剧、话剧、滑稽剧、歌舞等

节目。大部分节目都带有某种应时的或长期性的政治内容，有的庆祝过去取得的革命胜利，有的鼓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坚定不移地努力奋斗，有的批评落后思想和行为，或表扬先进的思想行为。

交易会一经正式取消，大队就不能挪用经费来搞娱乐了。因此，也就取消了活动传统的政治内容。在交易会的经济作用自发地达到高潮时，大队却没有发挥政治指导作用，没有传达明确的信息，当然，这就意味着商业活动在缺乏政治指导的情况下，显示了自己的特征，个人第一的思想促成了传统的狂购乱买。由于缺乏政治内容，经济利益便占了支配地位。

这里是说明“左倾教条主义”不可避免地使“右倾机会主义”占了便宜的情况。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级干部取消了交易会，从经济上讲，对当地农民是一种难以容忍的打击，因此，交易会还是进行了。同时，从文化方面讲，庆祝和赞颂社会主义思想活动却失败了，因为这种活动通常是依赖上级组织领导的，这是取消交易会所造成的一大灾难。

同时，突然涌现在张庄村中心的、活跃的猪崽市场向张庄农民就养猪问题提出了挑战。

五十八 猪的问题

商贩们在张庄大街做了一天生意后在清点现款，整理货物，卷起垫子。这时候，五队会议室的电灯突然亮起来了，几十个疲惫不堪的农民在昏暗的灯光下讨论一个新奇的要求：每户至少买一头猪。

会议刚开始，老二驴起身就要走。

“去哪儿？”队长郭真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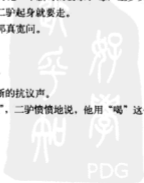
“站住。”

“上哪儿去？”

“我们刚刚开会。”

老头周围传来不断的抗议声。

“我要回家喝晚饭”，二驴愤愤地说，他用“喝”这个字，因为他们晚饭是稀糊糊。



“猪怎么办?你不打算买吗?”

“哼,从中午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你应该少弄几条狗,买头猪来支持毛主席”,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

但二驴不理睬。由于他胃口有毛病,他总是养狗,因为狗肉性“热”,所以他能消化得了,猪肉却是另外一事儿。

他不顾同伴们的劝告,走出了会场,进入黑暗中,嘴里嘀咕着“连一个喝晚饭的机会都不给,饿着肚子买猪!”

“这个二驴,”真宽说:“太顽固了,那么大的院子,养的都是狗,就是没有一头猪!”

市委办公厅主任范机灵,手指被烟熏的黑黄黑黄,是他要大队对其令人悲观的养猪成绩保持警惕。9月交易会的第一天,边远地方如工农公社大星大队的猪崽买主就来买猪了。当范机灵问他们大队养了多少猪时,原来到国庆节大星大队将增加到户均二口猪,张庄交易会提供了优良的猪崽,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与张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范机灵很清楚400多户的张庄大队,现下仅有165头猪,而且其中53头是属于兴发指导下集体繁殖小猪工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张庄农户养了猪,按照一户一猪的国家要求的目标,考虑到山西一些更先进的大队已经人均一头猪,这确实是个可悲的数字。

范机灵立即把大队领导和宣传队召集在一起,鼓励他们发动全村开展一场买猪运动,使张庄即使不超过,起码也能达到国家目标。由于庄稼丰收在望,国家粮站允诺提供额外的粮食,来自整个晋东南地区的猪仔,就在他们门口,让张庄人再装腔作势地继续零零散散地养猪是愚蠢之举,既没有大队目标,也没有大队性运动,因为他投合一些个人户主的心愿。

那天晚上各生产队在不同的会议室召开会议,不像八月长治市召开干部会以来那样,中心议题不是整风,而是养猪。

解放军坦克停车场后面昏暗的屋子里,五队正在开会。参加会议的人还不到家庭人数的一半。在派副队长李玉喜去召集拖三拉四的人以后,宣传队长高法官打开了话题。他滔滔不绝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是个原则问题”,他提高嗓门强调重点,“忠

不忠于毛主席，从养不养猪就可表现出来。现在猪仔从远方到了咱家门口，其他大队的买主路远迢迢来买猪，而我们却犹豫不决，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明天我们怎么买猪的问题。大小队干部，党员必须带头，其他人也应该表个态。由于这么多人缺席，明天下地前我们要为今晚所有没来的人专门开一次会议，我们要求凡是没养猪的人，明天都要在交易会上买一头猪！”

“当然有些实际问题，有些人没地方圈猪，我们建议在修好自己的猪圈之前，先把猪圈在大队圈里，有些人钱不够买猪，我们建议从大队借钱以后再还。大队会计申起财和曹东民明天要上街解决没现金人的筹集资金问题，今晚我们每家都要保证明天买猪，今年秋天养着，谁先发言？”

一位嘴唇极厚的老头儿陆光汉首先发言。他是位养猪热心者，“买猪太好了！”他说：“怎么会受损失呢？对自己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为什么还有人犹豫不决呢？”

另一方面，队长真宽作了自我批评。“身为队长，我本来应该带头养猪，但是，过去我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件事，今天下午我到公社开会时，市委范同志问我交易会是不是开始了，当我告诉他开始了时，他问我张庄的社员买了多少头猪，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确实知道我们队71户分明只有8户有猪，在他们所养的12头猪中，有5头猪属于李快腿一个人，他有一头母猪，刚刚下了4只小猪崽。我们所做的只是给每家发了一份中央关于养猪的指示，嗯，是”——他停了停，略加思索——“这件事我们已讨论过好多次了，但是，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主要问题是我们的领导没有起到带头作用。”

“咱们现在列个名单，谁要买猪？我第一个买，给我计上一个。”

“我买一只。”6英尺高的申顺达说，大家叫他申小个儿。

“给我记上两只。”

“一只。”

“记上我的名字。”

片刻工夫似乎买猪运动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后来在后墙那儿有人悲观失望地说：“老早以前我就想养猪，可是我没地方圈猪。”

回报他话的是一片寂静，对面墙角传来一阵嘟嘟囔囔的嘀咕声，

然后又是一片寂静。

高法官打破了这种沉静，宣读已记下的在座的，已经有猪或在队里允诺养猪的名单。

“李快腿五口，史春喜三口，秦大红一口，李绍祖二口，陆光汉一口，张兴发二口，李新瑞一口，武存弟二口。即使算上今晚的自愿报名者，列入名单的还不到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谁还参加？”

李雪真老婆沮丧地说：“就是买一口猪，拿什么喂呢？”

“我们计划供应饲料。”高法官说。

“喔，我连猪圈也没有。”她说。

“你不应该发愁没猪圈，你家那么大的院子。”真宽说。

“好吧，那么写上我买一只。”这位妇女犹犹豫豫地说。

“我也根本没有喂的地方。”秦喜生说。

“大队会给你找个地方。”高法官说。

“可是那些人会发疯的。”秦垂头丧气地说。

他为挖一个厕所的地方，刚刚吵完架，不想期待另一场争斗了。由于他院子里没地方挖厕所，大队在街外边给了他一块公地，但是，他修的厕所实际上占用的地方比村上答应的大一些，因此，邻居们生气了，狠狠地把他臭骂了一顿。

“那样的话，他们又会骂我的。”他说。

“让他们骂吧。”高法官说：“即使他们有点不高兴，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他们可能生气，明天也可能还生气，但是，过一阵子他们会习惯的，就不会再生气了。”

“也许是吧。”秦怀疑地说。

“凡是没有猪圈的人，都可以暂时把猪圈在邻居家，或交给大队管理”，真宽提出一个建设性解决办法，他说：“大队还要制定一套分配猪饲料的制度，收割季节会提供谷糠、秸秆，大队将建立一座发酵站，发酵过的饲料要按需分配”。

在停了一阵让大家理解他的话后，真宽接着提出一个更加重要的有关猪粪的建议。

“我们要根据三队试验的方法，解决猪粪的报酬问题。他们过去根据猪粪数量来决定猪粪报酬，但是，大家得花时间把猪粪挖出来，结果占用了下地干活的时间。由于每筐猪粪价格定得非常低，得不偿

失，因此，没人愿意积极参加造粪交粪。现在，三队给猪粪记劳动日，每5担一等肥，10担二等肥相当于一个劳动日。申志昌和郭太山光交猪粪今年已挣了一百多个劳动日了。”

“养猪好处多，为什么不能户户养猪呢？猪可卖钱，可以吃肉，交了猪粪可以挣工分，猪粪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人的口粮可以增多。这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现在我需要做的是解决饲料、猪圈之类的实际问题。其他事容易，而真正的问题就在我们脑子里，像我一样，你们可能会认为养猪这种买卖太麻烦，过去两年我没有养过猪，可是现在我想通了，你们也会想通的。一旦下了决心，其他事情很好办。还有谁明天买猪？”

又有几个人立即报了名。

于是，一米八高的申小个，提出了一个没人想到过的问题。“如果我们就那样全体出去买猪，明天的猪价会涨得天一样高。猪是个人卖的，每人只有几只猪，买猪的人少了，价格就会下跌，但是，如果突击买猪，价格就会高得不得了！”

“噢，我们为什么不能派一两个人买猪，避免一涌而上提高市价呢？”

“你是说让一个人为我们大家挑选猪崽？”

“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何乐而不为呢？”

“好主意！”

“计划是这样的。”真宽说：“凡是要买的猪，就都买下来，每只猪带上价格标签，运到这儿，然后你们就选择你想要的猪崽。”

“我有一个办法，”李快腿说：“为什么不把猪的重量加起来，然后平均一下，再按斤卖猪？”

“那太麻烦了。”

“还是头一个办法好。”

于是，事情决定了，第五队选出由郭真宽、李济生、李华庭组成的代表团去买猪，正如李玉喜指出的一样，这样还有另外的好处，其他劳力可以照常种小麦，秋季的主要工作也不会耽误。

高法官总结之后就散会了。

“原来有猪户，加上现在报名买猪的25户，一共32户，连一半都到，我们必须通知所有没有开会的人，千方百计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户一猪!”

临走之前，社员们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散会，他们消失在夜幕之中。

张庄大队所有七个生产队（六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18日晚上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大部分小队都选出了几个买主去给社员挑选猪娃。由于全大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买猪运动，猪市场第二天从早到晚成了交易会最活跃的场所，单是张庄买主就买走150头小猪，几乎把那天市场上的小猪都买光了。这对市场形成了很大压力，同样的猪，头一天每斤卖1元，第二天就提高到市场管理员的最高限价，每斤1.2元。如果不是有最高限价，价格可能会比这高得多，由于最高限价，卖上等猪的人受了损失，因为连最次的猪每斤也卖1.2元，而最好的猪也限制在同样的价格上。总而言之，尽管这样，买主和卖主皆大欢喜，卖主找到市场按高于头一天的价格，把他们运来的所有猪都出售完了，而买主通过讨价还价，用比较公平的价格买到了猪崽。有些情况，如果考虑到猪的其他因素，也算是廉价买下的。

那天晚上各队再次召开会议，买猪运动仍是首要议题，首先对那些尚未答应买猪的人施加了长时间的压力。

在五队会上王喜宣读了尚未买猪的人名单，然后接着说：“如果还没有买上猪，你们还有时间去买，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说好话，满足于做思想工作，如果你们不买，队里给你们买上送到你家门口，因此，不要把光彩的事变成为难的事，现在买头猪为自己增点光彩。”

甚至买上猪的人家也成了进一步规劝的对象，真竟向他们强调买两头猪，“如果猪长到三四十斤，喂不起两头时，可以给大队交一头，养成一头猪就行了。”

第二天晚上和第一晚上一样，动员工作都取得了相同的结果，五队买猪户第二天出发，带有至少50头猪的订单。

9月20日早晨，宣传队召集学习时，就像前两天生产队会议一样，买猪、养猪成了主要话题。治安主任申编了一段顺口溜，描述了旧的思维习惯。这种想法认为粮食生产达不到一定的目标，空谈增加猪头数是无用的。

猪是活物天天长，每天都要喂它粮，
粮食丰收是关键，没粮养猪不兴旺。

“这儿所缺少的，”申说：“是认识养猪能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懂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猪要吃一些粮食，但是，也能吃许多野菜，吃残汤剩饭。”

“如果社员收集这些东西喂它们，猪是吃的，”王说：“这就意味着要做许多额外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单身汉，更不用说寡妇，不情愿承担这项任务，”申说：“他们没时间。”

“另外还有国家政策问题，”老八路王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了，生猪生产一旦达到某种水平，地方收购站就突然降低等级，把一切搞得一团糟。每斤一等猪肉国家应该付给四角捌分；二等四角陆分；三等四角叁分；四等四角。如果他们不履行其诺言，人们得不到所许诺的东西，那么养猪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猪就没人养了。”

“对，他们应该像别人一样严格执行政策，”高法官说：“风险太大了，额外赔上粮食，贷上款买猪，大队动员供应发酵饲料，动员修猪圈，如果收购站不信守诺言，保持价格稳定，所有这些优待政策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应该务必请他们这样做。”王腊肉说。

“用什么办法呢？”

“无论如何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老王说。

宣传队个个为家畜战线突然活跃起来得意洋洋。几天前养猪甚至还列入议事日程，突然，由于范机灵的鼓动和9月交易会，张庄养猪开始了一场革命，可能大队再也不会这样了。但是，老八路王全面地观察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是他的习惯。

“像这样开始容易，但是，坚持下去就难了。最后，没人会说养猪事业在张庄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除非人们繁殖母猪，实现小猪自给自足。这次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把猪从一个大队转移到另一个大队，我们还没有为国家增加一头猪呢”

“而且，要养好我们买回的猪并不容易，人们借钱买猪，并允许每养一头猪可买60斤公粮，这些物质鼓励是非常诱人的，但是，粮食一到手，有些人可能会转身把猪卖掉，我们就又回到老地方了。”

“说得对”，王腊肉说：“二队一个社员昨天上午买了一头猪，晚上就卖了。他老婆拒绝帮忙，不愿在屋外，甚至自己院子里干活儿，

她带着婴儿坐在炕上整整消磨了一天，因此，他已经把猪卖了！”

申川德之子申田玉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好像要强调这一点——巩固养猪事业的难处。

“我家的猪跑了。”他沮丧地说。

和他死去的父亲能干傲慢的态度相比，小申似乎总是半醒半睡似的。他穿着一件没有袖子的棉上衣，胸前半开半扣，在寒冷的晨风中胳膊上布满鸡皮疙瘩，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只记得他的损失，他双肩耷拉着，上下颚松弛着，斜靠在门柱上。

“你倒把猪给丢了？”

“嗯，它跳过墙，跑进地里去了。我知道猪在那儿，可就是抓不住，它跑得可快哩。”

“那是那一天买的最好的猪。”高法官怀疑地说。

“是，我出的钱最多，17块。如果有人去马厂找那只捉猪的狗，我就回去看住猪。”

马厂似乎有只狗能把猪抓住而不伤一根毫毛，直到两条腿的追猪人赶到现场。但是，治安主任老申不相信猪周围的任何一只狗。

“别管狗不狗的。”他说：“你只是回去注意看住它，会一结束，我们就去帮忙抓猪。”

听了此话，小申高兴了，缓缓地走了，双肩比平常要直挺多了。

小申刚走，另一个农民就来了，提出了同样严重的问题。他是大队领导答应给他找圈猪的地方后，才买了头猪，大队领导在附近选择一个较大的院子，尽管院子主人竭力反对，贵财还是制服了他。

“如果你在这儿修，我就当场躺在这儿。”义愤填膺的农民说。

“继续干”，贵才说：“你躺在这儿，我们就在你周围垒一道墙，把猪和你一起圈进去”。

这话暂时把那人说得哑口无言了，但是，贵才一走他又大吵大闹起来，猪圈仍然无法修建。

治安主任申答应调查此事。

“老周成福也有猪圈问题。”王腊肉说：“我没猪圈，怎么能养猪？”他喊道：“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新领导班子要我这个平民百姓吗？如果他们要，让他们给我找修猪圈的地方，我听你们干部的话，我听共产党的话，但是，从来没人听过我的话，从来没人解决我的问题。”

“你在喊什么呀！”郑八字脚说：“我不只养一头猪，我要养两头，我是单身汉，我加班加点干活儿，仍然能养两头猪！”那是郑八字脚敷衍我们批评的方法，在这条战线上，他突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老成福把会议搅得一团糟，他就是这样胡闹。最后，我问他是不是靠他哥家院子南墙修一个猪圈，“如果领导这样说，我会的”，他说，“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可决不会养猪。”他真正想做的就是在他哥厨房外面修猪圈，欺负他哥。厨房争吵尚未解决，成福又准备开另一架。

“贵才说‘周成福家没好人’。”治安主任申笑着说。

“他应该知道，他娶上了这个人的妹妹。”王腊肉说。

“这些猪确实把这个村震动了。”老八路王说。

学习一完，我们都等待着去追猪，这正是我们振奋精神所需要的。但是，正当我们要出发时，申田玉跑回来告诉我们，他和二队的弟兄们已把猪捉住了。

至少一个问题解决了。

一方面，由于一些农民头天买上猪，第二天就卖掉，一些猪跳出墙外跑走了；另一方面有些家户为修猪圈吵得不可开交，我倒是开始想知道范机灵的文明计划是否具有冒险性。9月21日交易会的最后一天，那些显然不想真要买猪的家户，买了另外50头猪，他们会遇到多少麻烦呢？修理牢固的猪圈，找野菜草根，以及残汤剩饭补充粮食的不足，即使抱有世界上最好的愿望，张庄人怎么能找到足够的粮食，饲料以及剩饭残汤来喂养比以前多出的212头猪呢？我不知道，如果制定一个较适当的目标，不是会好些吗？比方说，约定每增加一百头猪，其中至少要把十几头养成育仔母猪。

但是，结果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好。

突然买猪，猪逃跑之类的事，随着地产界线纠纷平息下去了。轰轰烈烈的买猪运动3周之后，只死了4只小猪，一只被卡车压在马路上，一只死于胃溃疡，其它两只跑进地里被狼吃了，只剩下几根被狼咬断的骨头，成为那两个不安分守己呆在圈里的小猪无声的证据。

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原因之一是国家采取了一套刺激养猪的政策。假使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没有任何政策涉及到物质刺激，而是依靠合理的奖励。

首先，国家粮站为养猪运动拨出相当数量的粮食，每养一头种猪或母猪，可向国家买120斤粮，每养一头肥猪，买60斤，从大队买60斤粮。此外，每养一头猪可领到额外的布票、油票。最后，每卖给国家一头猪，可自留10斤猪肉供自家食用。

作为养猪的奖励，允许农民购买粮食，布匹、食油，以及吃一些肉。表面上这些措施好像并不十分诱人，事实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优惠措施，因为农民没有粮食供应本，他们不能在市场上买到平价粮食，而且布匹和食油的配给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除了救济，养猪为农民外出多买点粮食提供了唯一的途径，而且比在合作社用工分挣的粮、配给的布匹、食油还多。

根据这种制度，国家售出的粮食不一定非喂猪不可，家庭成员也可以食用，而用其它东西喂猪。但是，如果猪长得不好，达不到市场需要的标准，就不能继续享有买粮权。仅仅为了这一原因，大家都千方百计把猪养活、养好。一个家庭也许不会把所购买的粮食喂了猪，或许喂一些，或全喂掉。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吃了粮，而用其它东西喂猪。

使张庄养猪打下牢固基础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他发明了一种新型酵母菌，把酵母加进磨细的玉米秆、棒子芯、谷粮，或其它饲料里，会以这样的方式转变成猪能消化吸收，赖于生长发育的糖化饲料。在陶制缸里发酵饲料的过程，就相当于在没有反刍胃的动物体外，放置了牛羊之类的反刍胃，预先消化了粗猪饲料。粗饲料猪一般是不能食用的，或者即使吃了也不长膘。在中国仍然是以粮食为主的经济情况下，所有的粮食都是为人所消费，肉食动物通常以荒地为生（家畜、羊、山羊）或以废物为主（猪、鸡），任何剩余食物、大粪、垃圾，以及猪、鸡在村子各地能找到的其它废物，再加上酿酒糟，或做粉条剩下的粉渣，这些都是主要饲料。

从废物中获得的猪食，做粉条以及酿酒的副产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养猪养鸡也是有限的，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自然粮食副产品也会增加。由于一些地方粮食充裕，这个地方甚至专门分粮喂猪，但是，这些数量增加有限，因为按照人口比例，整个粮食形势仍然十分紧。

新的发酵饲料的发现，为大规模养猪开辟了途径，使中国把传统

的粮食经济转变为粮食、饲料、牧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成为可能。

负责主办大队养猪工程的张兴发，让我们参观了玉米棒芯、高粱和玉米秆如何能磨好装缸，再与酵母一起加工成宝贵的猪饲料的过程。此外，他管理着一个粉条加工厂，这两种产品都是由精心加工过的玉米和豆子做成的。当把料浆放到水缸里后，较沉的粉条沉入水中，而较轻的浮在水面的副产品撇去喂猪。因为漂浮的废物，猪吃了容易消化。因此，中国到处都是粉坊和猪圈。

除了饲料之外，肠道寄生虫是中国养猪者最大的难题。张庄的肥猪，以及大队的配种家畜，深受寄生虫之害。家畜发育生长也是很缓慢的。在华北，我们每到一处，包括大寨，都发现同样的问题，膘肥体壮的猪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猪是瘦骨嶙峋，大腹便便，深受虫害之苦，我们发现这是个普遍现象，只有一家例外——长治南呈大队猪场。那里的猪个个膘肥体壮，不同寻常，部分是因为南呈养猪者采取了特殊措施，确保了猪饲料配方的平衡，而且他们还用某种方法控制了寄生虫，遗憾的是我没考察此事。

在农户的猪圈，一次养一两头猪，似乎可减少寄生虫，因为猪被相互隔离，只有一年或一年半才引进新一代猪，许多排泄的传染物，随时间的推移已不再有害。每次养一两头猪，每次在没有寄生虫的猪圈开始圈养，也是可能的，也许因为这种原因，农户养的猪往往比集体养的猪好，因此，领导更加极力推行“一户一猪”的号召。

事实上，猪可作为化肥厂，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那时，这是中国农村的一种信条，而且这正是由毛泽东本人在全国上下广泛深入提倡的。一头发育生长的猪，对它所食用的饲料是不会增加任何东西的，猪不会使这些食物产生出比它本身更多的肥效。事实上，消化排泄的过程本身就毫无疑问地损害了某些物质中的营养物，要不是被猪消耗的话，饲料或许就会成为植物的肥料。不言而喻，如果农民直接把废物混合造肥，它就可以成为植物养料的形式，生产出比把废物喂了猪，然后造作猪粪所产生的粮食要多。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相信“养猪积肥”的口号呢？为什么他们坚持养猪会增加粮食生产呢？

在我看来，似乎唯一可信的答案是：他们养猪时不辞辛劳收集废物，并把废物放进猪圈，即使这些东西没有被消化加工，也被踩烂和猪粪尿混在一起，而成为有用的混合肥料，而如果没有猪，是没有人

耗费精力去积这些肥料的。

这种方案的益处，显然有限，尤其是假如猪损害了它们所加工的一些物质本身的营养价值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首先把生猪头数增加到一户一猪，然后一人一猪，然后更多的数字，而一旦大部分废物被收集完毕，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报酬递减的情况。毕竟中国只能产生一定数量的废物饲料和副产品。把生猪增加到中国所能维持的极限以外，最终会减少粮食供应本身，因为猪不得不开始全部食用粮食而不是废物。自始至终整个过程中，猪不会新产生一磅氮、磷、钾。因此，粮食生产无法依靠养猪，只能靠大规模发展化肥工业，大规模普及使氮固定的豆类植物。

为了对负责农业生产的中国领导所作的计划，做到公平合理，我应该说，他们用两条腿走路方法，也在尽快建设化肥工业——即：既利用小规模的老办法，也采用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方法，中国不仅仅依靠养猪增加粮食产量，而且还发展各种所有可能的植物营养资源，从精心收集加工处理猪圈内废物，到用煤、汽、电力生产氮肥等。

五十九 南征北战

交易会的最后一天，一股寒流横扫上党高原，气温下降至摄氏一度左右。宣传队员治安主任老申和王腊肉在炕上睡觉，这是一种内设烟道能加热的泥制平台。我们颤颤抖抖在猪市场度过白天的最后几个小时后，都聚集在他们(申、王)的屋子里，坐在炕上，吸取炕上的一些温暖。

天气一冷，老八路王受伤的左臂就要疼痛。他一边按摩一边开始以无限留恋的心情回顾了他在部队的生活。对那些在三四十岁曾驰骋疆场的人来说怀旧似乎是普遍的。那是全国上下空前团结一致的时期，各阶级成员走到一起，首先抵抗外国的侵略，然后，接着抵抗国民党的统治。

老八路王一经打开解放战争的话匣子，就能滔滔不绝讲述几个小时：

天津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很害怕。但是

在那些年代里，没人问“你害怕吗？”唯一的问题是“你能完成任务吗？”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指挥员就必须找别人去完成，那么就把你转移到其它地方。

指挥员、政治指导员必须带头。别人可以隐避起来，而我们必须站着，我就是站着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时，突然一颗子弹把我的帽子从头上打掉的，接着我感到鲜血从头上流了下来，至今仍有一小片子弹留在我的脑袋里，就在头顶上，有时伤口还疼痛。

后来，我的胳膊被从背后打来的一排子弹击中，有些弹片仍留在里面，我的腿和背也被子弹击中。天一下雨或变冷，所有的伤口都要疼痛，我觉得半个身子都在痛。

我是怎样脱险的？我不知道，当时我神志不清，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我仍躺在天津医院。

那时，我们麻醉药不多，即使我们有也要节省下来挽救重伤员，医生从我胳膊里取子弹时，只往伤口倒点盐水，然后就开始找子弹。

在那个手术室里有个“小鬼”(通讯员)，臀部有颗子弹，医生去了就把伤口割开。

“疼吗？”他问。

“疼。”男孩说。

“你是说一名解放军战士，毛泽东的追随者能感到疼吗？”

“当然不能。”男孩说。

因此医生把子弹取掉，而这个男孩再没有说过一个疼字。

在那场天津战役中，我们的一名战士把炸药包扔进一个地下掩体，里面一个敌人正好又把炸药包扔了出来。这位战士非常沉着镇定，捡起炸弹又扔回地下掩体。那个炸药包把墙炸得见鬼去了，敌人防线打开了一个口子，于是我们的部队冲了过去。那位战士获得了三级勋章。

“你为什么那样勇敢？”我问他。

“我只是千方百计执行我的任务。”那个人说：“过去我不是好人，抽洋烟，追女人，浪费了我的年华。现在解放军给了我机会，如果不能完成任务，象话吗？”

“当炸药包飞出来时，为什么你把它捡起来呢？”

“如果不捡起来扔进去，炸弹一爆炸我就被炸死了。”

“所以，你就又把炸药包扔回去？”

“是的。”

这就是英雄们的壮举行为。

我喜欢电影《南征北战》中战士们样子，我们确实就和那个样子一样，后来的一些电影没有这部好。当我看那部电影时，我觉得似乎看到了那些年代我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后来的电影从来也没有能领悟我们的风格，我们生活的精华。

那个一直不干好事的战士，突然成了英雄，使我深受感动，如果我是个作家，我是会把他写出来的，但是我不会写。发生的事情很多，没有记者能把他们都写出来。

参加战斗前，我们总要发誓无论生死团结一致，确实是团结一致。那些年代政治工作好做，你只简短讲几句就行，没有额外的话，大家个个都是竭尽全力。我记得有一次战斗之前，政治指导员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你们想活，还是想死？”

“我们想活。”

“那么跟我走！”他大声喊着向前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写简单的报告。

“武器、弹药、人马收到。侦察员派出……”

但是在那种年代当干部就那么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必须独立作出各种决定，还必须解决自己的供给问题，既没有学习文件，又没有填写表格，那么，我们怎样得到供给呢？

我们袭击地主家，每天每人一元半现金，我们有句顺口溜：

生活艰苦，含笑迎困难，

人人每天，花费一块半。

我们的战士也莽撞，不考虑顶嘴，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驻扎在路边的宣传队，他们设法为部队鼓舞士气，让他们走得更快。

“累了吗？”他们朝我们的战士喊道。

“不累。”我们喊着回答。

“反正骑马的一个也不累。”一个自作聪明的少年嘲笑说。

但是尽管青年人的话是那样说，参加战斗都是非常勇敢的，打起

仗来个像猛虎，因此没人挑他们的毛病。

我们的文化水平确实很低，我仅上过四年小学。尽管如此，在我们分队还算是孔夫子呢。我们的理论水平也很低，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叫干啥就干啥，不注意战略问题，只是看如何才能取得战斗胜利的战术。但是，石家庄战役以后，领导决定在部队实行民主，和部队讨论所有的战斗计划。这样使得一些指挥员心烦意乱，他们不能想象事无巨细都与步兵战士讨论，他们认为我们的水平太低，如果将来就用这种办法，”他们说，“我再也不带兵打仗了”！

真好笑，在那些年月里，我们的想法是如何改变过来的。抗日战争中我们这样想：赶走日本鬼子，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

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谈论和平时代。我们许多人都打着如意算盘，随声附和着。国共重庆协议号召裁减武装力量，我们把八路军精简到九个师，把一些部队转入地方武装，并彻底解散了其他部队。许多战士对此不满，但是有人告诉他们穿平民衣服，即“老百姓”的衣服时候已经到了。

当报纸公布了10月重庆停战协定后，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放松了警惕，我们想，我们总算黑夜能脱衣服好好睡觉了。但是协定的墨迹未干，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在第一次冲突高潮以后，战斗减少了，但是新军阀又开战了。当国民党来进攻时，我们仍在相互拜年，我们的侦察员报告了敌人进攻的消息，但是没有人注意，因为我们不想参加战斗。毕竟我们签定了停战协定。对不对？但是国民党还是发动了进攻，在接到简短的通知后，我们不得不拉出去，没准备好的被留在后面。

那是美国、国民党、八路军官员组成三方停战队时期，但战斗仍在全线猛烈进行。

有一次我们趁黑夜越过铁路进行反攻击。尽管我们把臂章藏了起来，悄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国民党部队的皮鞋，有个家伙拍摄到了我们草鞋的脚印，一次会议上他拿出照片作为我们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

当国民党包围了我们，停战队从来不露面，但我们一包围了国民党，停战队就来帮助他们脱离包围圈。

解放战争中，我们的思想又改变了。我们开始考虑生存的问题，

“我们能活到抓住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一天吗？”那时我们都见过大城市和风景优美地区，我们问“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切吗？”“我还能见到家乡吗？”

这些问题意味着革命即将结束。为了实际的目的，将革命进行到更高级阶段的问题已经被丢在脑后。

老八路王的故事激起他人的回忆，钢铁工人黄家欢告诉我们，他曾在西藏打过仗。

“当我们进入西藏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活佛指挥的藏兵。我们听说他们不怕死，因为子弹挨不了他们的身。但是大炮一开火，活佛就逃跑了，躲在一个水沟里。我们都跑上去看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神，原来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儿，无知，不识字，畏缩在深水沟里，怕得要死。”

佛像，使张贵才书记想起农民红枪会成员过去做的小佛像。“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在黄纸上写上白字，然后把纸烧掉并在水中溶化。如果你喝了那种水，就会刀枪不入。人们是那样说的；但是实际上子弹就从身体穿过，也确实很快！”

“日本兵习惯在脖子周围用绳子挂一个雕刻的如来佛像。老八路王说：“参加战斗前，把佛像拿出来鞠躬。有一次我们包围了一个日本兵，他取出小佛像，鞠躬，然后拉出了手榴弹导火线，一声爆炸结束了他的性命。”

“日本人对待伤员残酷无情。”王继续说：“一个重伤的士兵是他同事们的负担，因此他们往他身上倒汽油，然后点着，把他活活地烧死了。”

“对，”常书记说：“有一次我为日本人当劳工，一个卫兵把膝盖给炸飞了。他们把这个兵仰面朝天放在一条木凳上，浑身倒上汽油。这个卫兵流泪了，他的同事们也哭了，然后他取出佛像，低下头，此时熊熊火焰四处烧起。火天后，我们不得不去拿他的骨头，然后压成粉末，他的同事们用纸包住送回日本。”

黄家欢的话使我们大家十分惊讶，他说他不仅在西藏战斗过，而且还在中印边界参加过战斗。他曾一直行军到喜马拉雅山脚下阿萨姆邦的茶叶种植园：

1962年10月18日，我们接到进攻命令。在出发时，每个人带了

足够七天食用的配额粮食，但是，指挥员告诉我们这些配额粮必须食用二周。因此，我们减少到一日二餐，第二顿饭吃得很晚，有时是在半夜三更吃。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包围了一个大雾笼罩的地区，深谷对面的敌人从据点里用机枪向我们开火。我们想法扼制他们，但是，我们几个人被击中，因此指挥员命令使用炮兵部队。大炮炸碎了机枪点，我们占领了整个地方。但是，印度指挥官不知道，他们原以为这个地区仍属于他们，飞机来了在低空盘旋，我们隐蔽起来，心想他们会轰炸我们。但是他们却用降落伞投下给养品，我们打下两架飞机，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弄错了，设法赶快升高，但是，下面防线的另一个连把它击中了。飞机装载着为他们自己人准备的给养品、大米、煤油、棉衣等，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已占领了该地区，以后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和燃料，我们从空投中得到我们所需的一切。

我们在各处抓获了许多战俘，我们大队就抓获九百人，另一支部队包围了三个整队，除了考尔将军外，我们抓获了所有军官。考尔逃跑了。

他们的人都是大个儿，比我们高得多。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们会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在中国人中我是个大大个子，但我看他们时还得仰头看。他们是长胡子的锡克教徒，我们包围了整个锡克部队，他们抛弃武器，分散在山坡上，于是我们只好去把他们召集起来。我们发现有的人把头埋进洞里，缩着身子，屁股朝上，双臂在外，在空中等着被擒，有时还手中拿着手表，意思是“别杀我，拿表走吧。”

我们拿了他们的手表，让他们站起来，然后又把表给他们带上，我们把他们带到后方，给他们找上棉衣和食物。供给部队把他们从前线运到供给更充足的营地。在冰冻严寒的山脉上，他们许多人只穿着夏季制服。他们的脚冻伤了，肿得发紫而不能走路。我们四个人抬着一个瘸子爬上一个陡立的山间小路，就是不带任何东西要爬上去也是够艰难的。我们四个人勉强强把他抬了上去。我们把战俘带到安全地带，就给他们换上最好的棉衣、棉鞋和棉帽子。

我们一直猛攻到山脚下，后来我们接到撤退的命令。我们必须撤退，归还一切战利品，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领导坚持说这是政策，我们打的是一场政治战，必须撤退，正如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我们

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一样。我们把缴获的所有武器集中到一起，包括奇特的苏联火箭，把它们都捆好，甚至清洗干净，然后，我们邀请红十字会的来检查清楚。我们撤退后，印度人来接收了这些武器。

至于战俘，我们也把他们遣返回国去。他们走的时候，有些人不愿离去，他们哭喊着，要和我们呆在一起。他们担心会因投降而遭受惩罚，担心他们回去性命难保。他们是刚入伍的新兵，因此，我们劝告他们，让他们放心，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发生意外。

“我倒是从来没有南征或北战过，”张书记说：“但是，尽管如此，我见过许多军事行动。张庄是个复杂的地方，清晨天刚亮，日本人来要粮食，他们把麻袋扔到地上，要我们装满。

然后下午国民党匪兵来找粮、找衣服和钱。就是从身上脱下的衣服他们也不在乎。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做了一双新鞋，他们脱下我的鞋，用鞋抽打我的脸，然后拿着鞋大摇大摆地走了。

如果他们找到村长，就把他的手捆起来，双踝关节捆在一起，在脖子上套上绳子威胁，如果不提供粮食和钱就把他扔到井里。”

“人们确实痛恨那些国民党匪徒，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抓住了一名中级伪军指挥官温福全。他杀害了张庄12个人，包括一个妇女仅有的两个儿子，当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时，妇女们用剪刀扎他，割他的耳朵、鼻子和嘴唇，然后剪下他的舌头，她们用纳鞋底用的锥子戳他，然后用石头把他的脑瓜子砸碎了。

“韩绍文在日本人手下指挥一个伪军排，在战争期间，他杀害了三百多人，他过去常说：‘如果三天不杀人，我的手掌就痒痒’，我们派15个民兵去找他，最终在邯郸把他抓获，然后用两把刺刀刺他，一把刺在左臂，另一把刺在右臂，把他钉在墙上，但是饶了他的命，以便他们能把他带回来进行严惩。就在群众大会上，他们把他捆在桌子上，在他周围堆上玉米秆点燃，韩绍文被烧死了。”

“至于潞城伪军驻军指挥官温纪云，地方武装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们派民兵去逮捕他，我们把他带到马厂万人群众大会上，群众要去喝他的血，要杀死他。我就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台阶上，他怒目而视的样子，使我十分恼火，我从他后面跳上去，抓起我的枪，使尽全身力气把刺刀刺进他的后背，刀刃正好穿透他，他四肢一伸，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其他人蜂涌而上，用刀子、刺刀戳了他几百刀，

最后结果了他。”

“我有一个粗鲁家伙的名声，张庄‘地主还乡团’传出话来，‘第一抓住满意，然后抓住贵才’。他们给满意出了最高悬赏，因为他揍过许多人，而我是党的领导干部。必要时我也参加了行动。”

这些故事讲得热情生动，揭示了今昔鲜明对比的方方面面。讲话者区分敌我，不会有什么麻烦。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并且取得了胜利。在印度边界，中国士兵把普通战俘当作阶级兄弟，就像他们对待从蒋介石部队抓获的应征新兵一样。后方的地主、“走狗”汉奸和叛徒作为敌对势力，和大家所能团结的人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人谈论有关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问题。压迫者本身做了一件大好事，促使人们注意这个问题。

70年代，敌友并不再是泾渭分明了，由于没有外国侵略者、恶霸土豪，或者欺骗租子的绅士可以反对，于是，党领导提出了要严防潜心搞破坏的暗藏分子的隐患问题。每当问题出现，发生矛盾冲突，每当有人进行可疑的活动，他们就号召对带着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保持革命警惕。但是，这些号召非常奇怪，似乎和我们面前的现实毫无关系。

在张庄交易会结束时，大队领导向宣传队作了汇报，宣传队领导要他们总结一下他们注意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个标题下，他们总括了大大小小所有的消极现象，和损害集体或违反风俗习惯的一切行为。

偷窃事件构成最大的一类案件。那年秋天偷窃被打成破坏秋收的行为，主要是作为政治的，而不是作为经济行为。但是，似乎小偷和盗窃事件不断发生，每个队都报告了许多此类事件。

一个叫做朱久长的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了两根南瓜，每一株都结了20斤重的大南瓜。但是，还不等他去摘，南瓜就不见了。人人都说在张庄偷南瓜八成是络腮胡子申流氓干的，人们曾看见申前一周几次偷看过那两个庞然大物，因此，他是第一号怀疑对象。

郑生年丢了5穗玉米，有人把他前院玉米穗从秆上砍下来，这可能是谁呢？

老武万田在院子里种着一些枣树，有一天睡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被锁在家里。当他设法出了屋门，几十个成熟的枣儿不见了，无论如

何老武是这样说的，但是，其他人说，是他自己把枣儿吃了，然后再散布谣言说是小偷干的。至于说到老武被反锁在家的事，却没人提出质疑。

此后不久，寡妇陆贤惠发现她自己被锁在家里，当她最后把门打开时，她想肯定会发现院子里有什么东西丢了，但是，一切都原封不动。她想那是因为隔壁院子里演戏一直到深夜，由于这么多灯火，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小偷才不敢轻举妄动。

申胡成家树上丢了几个桃子。

第三生产队在村边菜园附近种植的玉米，丢了70穗，都是用刀砍的，一整行玉米全不见了。

五队也报告，一整行玉米不见了，他们怀疑是在大路上行走的某个陌生人，或住在铁路边的铁路工人干的。每个铁路边的农民常常发现他们的玉米只有秆儿，没有玉米穗。一个人报告说，他看到一个下班的火车乘务员，在火上烧烤新鲜玉米，这些玉米穗从哪儿来的呢？

每当给铁三局提出这些问题时，总是引起他们的反指控，说张庄农民自己偷的。黑夜院子里的煤不是经常丢吗？陆元海不是偷去两桶煤吗？戴、韩和同家的5个孩子不是从三局仓库拿走5把铁锹吗？据传说另一个叫申海的孩子，偷了一根链条到漳沂市场卖掉了，更严重的是从三局通讯大院偷走两根电线杆。

由于发生了这么多的小偷小摸事件，人人都得小心谨慎。邻居树上的一根树枝掉进了齐玉兴家院子，树枝搭在电线上，但是，玉兴等看见王腊肉才敢把树枝砍下来，他担心被人指控偷人东西。

袭击村干部，使得事情更加困难，发展成为二类“阶级斗争”。

第四队干部对齐承前有意见，他在大街上骂过来骂过去，放羊工每天本应挣八分工，可是队里只给他儿子记七分半，队干部救济粮时，齐家只分到高粱而没有玉米。齐在第四队果园忙活好几天后，队长的兄弟骗了他的工分。

“杨齐旺，你们全家和我过不去”，齐大声嚷着，在他的前院子跳来跳去。

“给我的儿子记低工分，给我不记工分，我们只能吃高粱！”

“可能杨家兄弟只是忘了给你记工分。”一个邻居提醒说。

“不是，他们和我过不去，我要到公社告他们。”

杨齐旺兄弟听说后，说：“好吧，你要告了我，将来你挣得工分会更少。”

同一周内，齐承前老婆和齐万昌老婆都朝队长杨齐旺老婆发火。承前老婆号称“小飞机”，因为她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万昌的老婆号称“土豆儿”，因为她体态矮小浑圆。按照人人有份的原则，小飞机和土豆儿被强迫去摘蓖麻籽，但是，队长老婆可从来连照面也不打。

“我们知道她不会来。”土豆儿说：“她太忙了，监督别人给自己盖宽大的新房，好租给工人，给他们照看孩子赚钱。”

于是，她骂骂咧咧，诅咒不止，本来她就是以这种诅咒而闻名全村的。

为什么这一切都列为“阶级斗争”呢？

正如他父亲在那之前受监督一样，土豆儿的丈夫是受人监督的右派分子。人们知道他的父亲齐安心是“三代红人”，就是他在三个不同的政权都干得不错。阎锡山统治山西时，他是替地主收租子；日本人来了他挥霍家产抽大烟；八路军解放晋东南时，他的财产已挥霍殆尽，土改时还分到土地，多么幸运呀！

齐安心老婆号称“大黑豆”，尽管由于他的祖先和他本人历史的受人攻击，她逼迫儿子万昌和“土豆”结婚。他曾是阎锡山的医生，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但是，复员回家时，仍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中，他和一群叫“海燕”的人联合起来，他们掌权后，他跳得很高，但是“海燕”组织掌权时间不太长，垂头丧气的万昌抱怨到：“你们把我们夺取的权力掌握了。”没有和他共事，他不喜欢某人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脸总是朝天看，因为他比别人矮小得多。

六队因为秦二贵痛打过队长炎新，声名狼藉。秦老是批评队干部，他告诉所有肯听话的人说，大小队干部再也没有一个人肯讲实话了。

问题是为什么六队普通老百姓这样消极懒散？是坏分子幕后操纵吗？共产党员秦二贵这个闹事者，把事情搞得纠缠不清了。

六队还包括18岁的孤儿申守生，他独居在父母遗留下的房子里，经常通宵熬夜，每当他已婚的21岁姐姐回来时，他家经常是一群一伙，粗枝大叶的铁路工人出入和通宵聚会的地方，这是什么行为呢？

如果某些小队领导遭受侮辱，那么，大队干部也难以幸免。有些

工作人员在路边岗地上种玉米，为了防止被偷去，不等玉米成熟就收割，在大队四方院里剥去皮，然后把皮扔到大队厕所里。

二队一些社员来拉大粪时，发现厕所里满是半腐烂的玉米皮。

“怎么这么多玉米皮呀？”一个社员问。

“显然这是从大队办公室扔下来的。”另一个说。

“原来玉米跑这儿来了。”第三个人说。

“为什么这种大粪这样臭气冲冲？”第四个人问。

“因为这不是干红薯片造的。”有人回答说。这话暗指不像张庄普通人家一样靠河南的红薯干为生，大队干部晚上享用营养丰富的新鲜玉米。

轮到秦贵宝讲话时，不仅大队领导，而且公社革委会领导都变成嘲弄的靶子。

在张书记从公社下来查看小麦下种准备工作时，告诉秦一定要把肥料撒均匀，以使小麦能均匀地出芽生长，秦的反应是把头一扭，呸！朝地下唾唾沫。

后来秦和郭队长一起种小麦，秦每亩地用了约15斤种子，郭队长问种子是否充足，“根据公社的指示，宽垄种植法需要20斤”。

“如果你只把手松开一些就能用60斤。”秦回答道。

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有些宣传队队员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公社党委决定种20斤，可秦快嘴却怀疑他们的指示。他想干什么呢？另立中央吗？他是想千方百计破坏秋播秋种，破坏大队，破坏社会主义吗？

就在次日晚上，更加惊人的事发生了。那天晚上，八字脚郑有点喝醉，摇摇晃晃在大街上，从北一直走到南，放声高唱“骂殿”，利用这出戏，对大队领导进行攻击，而且对公社以及市委进行攻击。难道他们不是选举并同意了张庄新领导班子吗？

林东说，这次八字脚太出格了，是该揭开当地阶级斗争的盖子，和一切阶级敌人算帐的时候了。她建议和“二宝”以及他们的同伙，所有同流合污的坏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范机灵、治安主任申和钢铁工人黄家欢热情支持她的建议，高法官表示异议，但是，得到王腊肉支持的老八路军认为时机不成熟，反对采取行动。老王不愿把如此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贴上一个单一标签，他要抽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老八路王觉得生产队干部把所有的事件都看作“阶级斗争”，歪曲了阶级斗争概念的本意。

大部分矛盾冲突看起来更像“人民内部矛盾”——即个人恩怨、家庭磨擦、牢骚不满而形成的对抗状态。小偷小摸固然不道德，但是，那主要是穷人家孩子干的，铁路工人家的孩子们出去图个快活，或是少数几个众所周知的恶棍无赖干的。自解放以来，他们就没好好干过一天。至于唱“骂殿”，可能是八字脚有些牢骚不满，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叫作“阶级斗争”呢？

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王争辩道。如果干部不能实事求是，怎么能理解面临的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怎么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呢？怎么能利用整风纠正错误呢？

农民对整个整风过程缺乏热情，是有其根源的，他们反对领导随便给人加上危险的罪名。一些人也有可能对无休止的运动，没完没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反复复的整风运动感到厌倦。但是，他们真正反对的也许是过分渲染的花言巧语，把坏事说成罪行，把持不同意见说成是反革命，把老朋友、老伙伴变成敌人，把一切消极现象，不管是致命的，还是善意的，统统混成一堆，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

难道这些歪曲是无意的过失，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滔滔洪流中令人烦恼的涟漪，还是能使整个革命停止前进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偶然现象？

那时，我们在张庄逗留了一半时间，几乎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概括地说明，更不用说得出答案了。我们所感觉到的是，对运动的方向忧虑不安，数周之后，这种不安又演化为震惊。



第二卷

文化大革命

革命
紅衛

1966-1976

第六部

当今社会绝对正确



六十捉贼

十几个年轻妇女，上穿花色艳丽的束腰外衣，腰围绣花围裙，下穿黑色丝绸运动裤，一齐向前跳跃，向前迈一小步，把手中的锄头往下甩，好像是在刨地。然后，把锄头甩在头顶，准备另一次有节奏的刨地动作。当手中的锄头向上翻飞时，这些舞蹈演员后退半步，转向左侧，然后再次向前跳跃，宛如刨完了一座荒山，每前进一步都要扬起一团泥土，象征着它被翻动。从这些动作中，你可能看出秧歌的起源和华北摇摆舞步基本的四步舞形式——左右前进运动，然后轻轻地左右后退。在她们跳跃着挥舞手中的锄头时，同时高唱《开荒》歌。用这种歌词和节奏，妇女们制造出一种令人开心的欢快氛围和充满活力的意境，好像世界上唯一的重大事情就是开荒，并用歌声来庆祝。

在现实生活中，张庄青年人无论在哪方面都不突出，但是一轮到演出，那可得另当别论了。

为了弥补张庄盛大交易会的美中不足，才华出众的演唱者、舞蹈者和演员，每逢这种场合，一个个从各家的院子里出现了。这些年轻演员富有激发观众想象力，诱使观众脱离现实生活迈入奇异的精神世界的的能力，甚至连我这样多疑的人也轻易信以为真了。

剧团的明星是第二队队长裴良顺的20岁女儿。她中等个头，面庞宽大丰满。她的身材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主要演员那样苗条俊秀，但是一旦跳起舞来，她那优美协调的舞姿，飘逸流畅的动作，仿佛在舞台上空翩翩起舞，顿时使任何可能的消极印象荡然无存。她的表演使观众心醉神迷，以致许多人把前面节目的表演者都遗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挑出其他演员的毛病来，只是说没人能超过小裴占优势的观众上座率，潇洒自如的舞姿，完美无瑕的节奏和动作相媲美。她那丰满匀称的四肢和身材，化妆后红彤彤的脸膛，清楚地显示一个乡村姑娘健康幸福的特征，如同一个艺术家可能给《中国建设》杂志创作的象征现代集体生活的广告画。她的嗓音洪亮，在合唱声中仍然清脆悦耳，音质出众，构成了歌声的主旋律，其它和声围绕着主旋律起着烘托作用。我发现对她的演唱和舞蹈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

那天晚上她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似乎都无可挑剔。

仅次于裴家服饰华丽姑娘的，舞台上最吸引人的，是张庄被没收财产的绅士之一申金河的后代。尽管她和其他人一起又跳又唱又笑，我还是从她的脸上看出“困难的”阶级出身必然给“斗争对象”每个子女的生活带来的痛苦和忧伤的痕迹。大部分时间里，她成功地用一双毫无表情、假面具般的眼睛和其他特征掩饰了她的感情。然而不时地失去控制，流露出她内心对阵阵掌声疑虑重重，以及身处同伴之中的局促不安之心情。相对照之下，她的同伴们相互之间，与音乐以及观众之间却显得和谐融洽。我知道第二代地富子女深受歧视，村里人常常把他们写作封建尾巴。现在，看到这位年轻妇女竟然在公众面前表演，我感到十分惊讶。显然她至少暂时在张庄剧团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村里人可能会根据她的才华，而不是她祖父的土地财产对她来评头评足。尽管如此，要出来排演、化妆，在全村人面前演出，是要具有非凡的勇气的。和她出身相同的同龄人已经放弃了希望，除了报到上工外几乎足不出户。

《开荒》舞蹈演完后，接着是位苗条的13岁少女独唱。她一个人大踏步走上舞台，而毫无怯场。长长的脸盘，微微的小嘴，向后缩的下巴，这些特征如果单独来看并不十分令人动心。但是所有这些特征汇总在她姿态优美、端庄的脸上，的确创造出一种令人惊叹不已的美。她几乎与裴家姑娘一样使观众深深为之倾倒。她的嗓音洪亮而尖细，宛如清晨清脆悦耳的竹笛声，表达了她强烈的感情。我发现这种感情难以名状。它充满欢乐又有怀旧之情，活泼而又有孤独之感，流露出少女初次意识到村外世界，满怀激情与希望迈步向前，而又对前景缺乏自信，因此仍然留恋童年时光而表现出内心有些许慌张。

当这位少女演唱时，整个剧场鸦雀无声，演唱完后仍然一片寂静。只有当6个小伙子突然像小野牛一样踏着脚步登上舞台，人们才如梦初醒。他们排成一条直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凝望着前方，好像即将表演的是我们观众，而不是他们自己，逗得满场观众哄然大笑。他们扮演着一群自私自利的乡巴佬，不清楚他们为何而来，或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表演一开始，就把我们突然带入了一个滑稽世界，就像他们粗暴摧毁的浪漫世界那样令人心服口服。我们都乐于继续欣赏演出，因此观看滑稽短剧表演不仅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激动，而且也

使我们感到十分快乐。

中国有一种诗歌，要求每个表演者用前一个人所诵读的诗句的最后一个字开头，尽快编出一句新诗。按照习惯，幽默的诗句应该一句比一句通俗和辛辣，而且在等待轮流作诗的人，可以随便加些动作，或者敲击乐器，或者回嘴。

六个人突然在舞台上展开了一场作诗比赛。他们事先肯定已把诗句记在了心里，但是表演起来就好像是当场即兴赋诗。每个年轻人都一本正经地站着等候，然后断断续续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诗句，同时模仿鼓饶“咚不锵”而结束，待下一个演员说出自己的诗句。每个演员在模仿鼓饶声音时，都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但是声音里充满愤怒之情，似乎只是模仿一下这些声音就使人痛苦不堪，仿佛对不用真实乐器而用自己声音模仿感到新奇。这个节目演完后，观众报以阵阵嬉笑的笑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些青年男子演完这个节目后，接着用押韵的对联形式演出了学大寨小滑稽剧。六个人每说完一句诗后，一起跳个小型舞，一步向前，一步向侧面，一步向后退，就像前一个节目的“咚不锵”一样，显得恰如其分的严肃而又故作笨手笨脚，好像刚刚从粪堆里出来，抖掉脚上的粪肥一样。这个舞蹈博得全场喝彩。突然我发现自己也和周围的观众一起捧腹大笑。

但是台上的男子在说完每句诗和后面接着的惯性滑稽动作后却从来没有笑过。这个动作所以特别令人欢快，是因为人们知道，这些表演者并不真是笨手笨脚。这种粗野的粪堆舞步，是他们为了向我们显示穷乡僻壤的乡下人初学跳舞的幻想场面。不是他们不会跳舞，而是主题确定的艺术形式。

演完欢快的学大寨节目后，观众仍然没法歌一口气时，这些青年小伙子演出了一幕“四担萝卜”的小短剧。一个身高体壮的四人合唱小组大踏步走上舞台，每人肩挑两大筐沉甸甸的蔬菜，唱道：

东风劲吹红旗飘，
祖国建设起春潮，
我们四人走上台，
把四担萝卜表一表。

“四担萝卜有他妈什么讲头？”一个演员临时扮作赶集路上的年轻

人，放下扁担问。

“同志，别着急，别担心！”另一个演员回答说：“萝卜的故事好多好多，由于故事曲折复杂，很难一下讲完。中心要点是，经济战线的阶级斗争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哼，你知道什么呀！”怀疑者说：“那么咱们接着演吧！”

于是演出开始。一个姓王的老贫农天不亮就起床，带领三个伙伴挑着沉甸甸的萝卜，到县城赶集。没走多久，他们碰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晨雾弥漫的十字路口鬼鬼祟祟地活动。这个人偷偷摸摸像个乞丐一样谄媚地说：“劳驾，这萝卜卖吗？”

“卖萝卜，什么意思？”第四个人大吃一惊问。

“别着急，莫叫喊，小事一桩别翻脸，你把萝卜卖给我，保你多挣五毛钱。”

老王对在集市外投机倒把十分气愤，叫他的伙伴们赶快赶路。但是，鬼鬼祟祟的投机分子，是不会被轻易摆脱的。他跑上前再次把他们拦住，这次他每担萝卜出的价格高出市场八角钱。

“住口，”老王说：“把筐子放下。”

投机者欣喜若狂。“心中乐开了花。”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中国名牌香烟“大前门”，递给老王一支，并反复把这盒香烟在老王鼻子下晃来晃去，让他不断品味浓郁的扑鼻烟香。

但是！

“老王是个大好人，背离社会主义万不能，声似惊雷震山崖，义愤填膺脸铁青，当场召开批判会，批评欺骗国家制造矛盾的牛鬼蛇神。”

就在十字路口，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因搞投机倒把，遭到所有过路人的唾弃和谴责。老王看清这个罪犯的丑陋面目后，挑起萝卜，带领他的三个同伴朝菜市场走去。

“日出东方红彤彤，万里山河一片红，胸怀冲天凌云志，迎着朝阳向前走。”

张庄的青年人热情洋溢地演出了这出戏，观众同样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它唤醒了公众的良心，使许多人想起了1960年夏天。那年，他们肥料全部送到了北方的万亩田，自己村的地里却无肥可施了。绝望之中的张庄农民提出种植萝卜，而且获得了大丰收。那年市

场普遍缺少萝卜，他们把萝卜全部高价出售了。大灾之年，萝卜给张庄人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人均收入。如果本城、本地区年景不好，而张庄人趁人之危发了一笔财了，那么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对振兴农业和建设毫无益处，最终会给众人，包括暂时富裕的张庄人带来灾难。“四担萝卜”是对“投机倒把”的一个不太成熟的驳斥。1960年，这种风气在整个晋东南地区十分盛行，十年后仍然侵蚀着许多人。观众看演出时，既看清了过去，也认清了现在。他们非常欣赏这幕剧，它赢得掌声比其它节目更多。但是究竟他们是对这个教训感到痛心，还是仅仅喜欢表演这个节目的热情就难以断定了。

“四担萝卜”开演时，张庄人已挤满了剧场。到场的不仅有大多数本大队的社员和家属，而且在张庄租房子住的铁路工人也赶来凑热闹。大部分人没有坐的地方，就是那些自带板凳和砖头早进入剧场的人也不得不站了起来。因为演出一开始，前面坐着的人为了看清楚都站了起来，迫使后面的人也站了起来。

晴朗的夜空下，观众在场外透过大门，或北墙的窗户，就能看清楚演出。由于剧场门上无门，窗上无窗，所有的门窗都可自由出入，为旁观者开了方便之“门”。他们肩并肩站了七八排，伸长脖子随着舞台上的演出而来回移动。此时此刻，场外站立的观众和场内坐着或站着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这正是对演员们的赞赏。

戏曲、滑稽剧和舞蹈，仅仅是娱乐活动，是那日晚上重要议程的“文化”前奏。真正重要的事原来是整党运动，宣传队把全大队人召集到一起，是为了听大队支书张贵才作自我批评。

张贵才所讲的要点和前几天在第二队所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当他开始作自我批评时，观众开始减少了。许多工人及其家属演出一结束，就都退场了。对大队社员来说，自己选择的领导作自我批评是件大事，或者本应如此，然而贵才没讲多长时间，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会场。不是支书讲话太笼统，重点不突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可能东拉西扯，前后颠倒”，就是人们不把领导当作村里重大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当支书讲完时本应听他自我批评的人就只剩一半了。

张支书刚坐下，高法官就走到台前讲起了阶级斗争问题。此时，又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场了。

“有什么根据说我们仍然必须重视阶级斗争呢？”高法官问：“这

个，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阶级敌人到处在破坏，到处在散布谣言，而且还大肆进行盗窃活动。他们在地里偷玉米，有些小偷年龄已不小了，有的已三十四岁了，还有一个已经二十岁了。我听到一个顺口溜：拿公家东西不算偷，不偷白不偷。

我是说：一切小偷小摸行为都是错误的，是不能宽恕的。我们必须保护秋收，必须派人护秋，发动群众抓小偷，批判小偷……”

正当高法官慷慨陈词时，治安主任申跑到舞台中央。

“停一停！”他大声喊道：“我们被盗了，有人闯进李天齐家把箱子偷走了。民兵班长立即到大队办公室！”

申的通知几乎结束了会议。会场上剩下的人都马上议论起来。各民兵班长立即冲到门口或最近的窗户旁。许多对“阶级斗争”不太感兴趣的人，趁会议中断也冲到门窗旁边。

高法官和治安主任申想办法控制会场，高法官继续讲话，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活动已转移到大队办公室。范机灵和管道工黄已把民兵召集起来，设法确定对明目张胆的抢劫行为采取措施。

没有人能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调查者首先走访了受害者李天齐的母亲，详细了解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对鉴别嫌疑犯不可能有什么用处。

据她自己说，平常老太太很少出门，可是那天晚上受演节目的诱惑，破例去了大队。她锁门时对同院老邻居说：“俺们要全家出动，请帮着留心点门。”然后她就小心翼翼地迈着小裹脚去了剧场。在戏台前人群中，她和儿子、女儿和外孙女一起看演出。

最后一个节目刚结束，她和儿子就离开了剧场。小李匆匆忙忙回了家，看到院子里原样无异，就进屋躺下睡觉了。老太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街上和胡同里慢腾腾地走着，稍晚一些回到了家。

“谁？”他儿子喊道。

“我。”老太太说。

费了好大劲儿，老太太才打开门锁，躺在炕上已是精疲力尽了。还没觉得睡熟，她习惯地摸摸自己宝贵的箱子，里面藏有许多小巧贵重物品和200元现金。

她摸了个空。

“我们被人偷了！”她惊讶地喊叫着：“我们被人偷了。”

她儿子跑了进去，“什么事？”

“箱子，箱子不见了。”

“不，不可能，”小李说：“刚才门还锁着吗？”

“嗯，刚才我就像往常一样开了锁。”

“那可能是你放错了箱子？”

“怎么会呢？你把我当成啥啦？箱子不见了，我告诉你箱子不见了。”

小李心急如火地找着箱子，找不着时就仔细查看了一下门。他一推门，门链散开了。原来门链上的一个链环早就磨坏了，他用几根铁丝做了链环换上。小偷用手钳剪断铁丝链环，临走时把门链打成圈，用钳子拧好，挂锁，仿佛没人动过。

当小李母亲嚎啕大哭时，小李匆匆跑到大队办公室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几分钟内，不仅民兵干部，而且许多普通男女民兵都涌出会场，准备行动。

民兵干部分析了三种可能：

1. 小偷已把箱子拿回了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必须很快把箱子转移出去，因为小偷不敢在家保存这样大的物证。
2. 暂时把箱子拿到地里藏了起来，那么，小偷得把箱子带回家。
3. 已经把箱子拿到了其它地方。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太远，因为小偷肯定是本地人。外人不知道小李全家都去看演出了，也不会知道他有装着宝贵东西的箱子。

范机灵建议，发动全体民兵在每个可疑者家附近进行监视，同时包围全村，确保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庄稼地。治安主任申和管道工黄发出了执行任务的命令，然后，范、申和其他宣传队干部返回去开会，由队长陆何仁负责维持秩序。

高法官仍然在会上高谈阔论阶级斗争，听众在急剧减少，而且很难安静下来。高法官用单调低沉的声音讲话，台下窃窃私语传过了门口，有些人谈话还非常活跃热烈。

“为夺取小麦丰产而奋斗！”高法官口若悬河，“这也是阶级斗争，我们要夺高产，而有些人却满足于低产，这不是反对学大寨吗？这不是阶级斗争吗？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我们的敌人没有突然老实了，没有善罢干休，因此，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战斗到底。”

“我们要求造畦田种小麦，这样每亩必须种20斤。这是公社领导确定的标准。可是我们发现二队有人只种15斤。一场激烈地争论开始了，一个社员说：‘你只要把手指松开一点，就能种60斤。’”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反革命言论，破坏性言论，不是好人的言论。这是那些盼望我们犯错误的人的话。我们的目标是亩产500斤，他不高兴。”

“这样的话，这样的错误思想，不管在什么地方露头，都要进行揭露。妻子不应该包庇丈夫，子女不能包庇父母，父母也不能包庇子女。包庇干坏事只能帮助干坏事的人堕落成罪犯，可能变成阶级敌人。犯了错误不承认，可能变成敌我矛盾，变成阶级敌人，总有一天会由好变坏的。”

高法官的严正警告，对所剩不多的听众并无明显的作用。台下的闲聊仍在继续，甚至范围扩大了。五六个人凑到一起嘀咕小李家箱子的事。

治安主任申对社员们我行我素的样子十分恼火，跳到台前讲话，目的在于让人们认识高法官所提的阶级斗争这一重大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仍然漠不关心。

“我们必须抓阶级斗争”，老申喊道，他的声音洪亮有力，传遍会场的四面八方。他不像高那样发表讲话，而是在抗议。

“有人在损坏庄稼，偷粮食。刚才有人偷箱子，砸门锁偷箱子。有人在大街上唱‘骂殿’，咒骂什么呢？反正这不是好人的行为，而是危险分子的行为。他不喜欢八个样板戏，喜欢旧戏。”

治安主任申突然由不点名转而喊叫：“秦贵宝在吗？”

台下没人回答。

“没有来。他连重要会议都不参加！就是他说‘只要把手指松开就能种60斤小麦’。这不是破坏三秋工作破坏学大寨是什么？合理密植是科学，谁听说过一亩种60斤？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还有林跃龙。机器坏了就骂榨油厂，为什么骂人呢？有意见可以找领导，辱骂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这不是企图破坏副业队和榨油厂的关系吗？榨油厂挨骂后，再也不要我们的人了，他们只好回家去。”

“由于我们吃完了粮食，不得不吃国家一万斤返销粮。本来粮食应该分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可是阶级敌人煽动不满情绪。到处煽风点

火，说什么‘他能分粮你怎么就不能分？’有些人受骗上当气愤万分，‘我为革命工作，可是连粮食也得上不了’。这算什么觉悟？”

“郊区一个歌舞团要招聘舞蹈演员，一些张庄农民丢开小麦下种任务不管，跑去应试。参加剧团目的是正确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可是在下种小麦时期跑去应试符合毛泽东思想吗？这些人根本没有组织纪律观念，一下几乎跑掉20人，因此我们必须狠抓阶级斗争。”

老申越说，他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越严重，似乎阶级斗争无孔不入，渗透到一切工作中了。

“今天晚上戏一开演，大礼堂就爆满了，可是，演出刚完许多人就走了。我们应该清点一下，看是哪些人半路走了。人常说，‘万事开头，先看路线。’节目演完就不开会了，这不是说明政治觉悟低吗？那些一直在台下开小会的人怎样呢？做针线打毛衣的人呢？甚至批评以后仍然我行我素。”

“我们不能只看头上红旗飘，不看阶级敌人在霍霍磨刀，只顾睡大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现在发生了许多怪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放松了警惕，没有当场开会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阻止他们违法乱纪。”

此时，老申意识到他讲话有点过火，攻击了与会的所有人。这些人仍然坚持开会，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村里的先锋队。组织纪律性差、觉悟低的人已经离场回家了，于是他改变了思路和语气。

“阶级斗争就意味着抨击坏人坏事，也意味着表扬好人好事。我们应该表扬像李来全这样的人。尽管腿疼得厉害，但是他坚持好几个晚上为集体修理大车；还有郭真宽，不顾年迈体衰，对搞好农业生产的劲头仍然很大。”

最后收场时，老申闭口不谈阶级斗争，又回到下种小麦的话题上。

“我们要批判小麦低产论，这样看问题是低水平。如果我们提高了思想水平，就会提高生产水平。现在我要提出‘六不政策’。

每亩达不到200担肥不种。

不平整好地不种。

没有优良种子不种。

不密植不种。

不浇地不种。

不认真锄草不种。”

时间已很晚了，台下的人群骚动不安，又有人开始退场了。最后老申命令各队队长、指导员“把所有提前退场的人名登记下来交上去。”

于是，大家都回家去了。

与此同时，民兵已把全村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凡是有房屋和土地的地方，每隔30米配置一名民兵看守。

这个战略部署很管用。

近半夜时分，一个哨兵（小李家姐夫申二江）听见村西蓖麻地里传出一阵沙沙的响声，并看见一个瘦小的人影扛着一个箱子从地里走了出来。

他跟踪着嫌疑小偷进了村，直接去了独臂程家院子里。

“谁？”他喊着冲了上来。

“我。”

原来是程三的儿子齐忠纪，20岁，没人会想到去怀疑他。

“什么东西？”

“箱子。”

“在哪儿找到的？”

“蓖麻地里。”

“给我。”申二江说着把箱子从忠奇手中夺了过来，拿着箱子大踏步地走了。

齐站在院子中间一声不吭。

“你不来吗？”申问道，既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返回去。

齐没有答话。他目送着这名民兵消失在夜色之中，然后走进屋子躺下身子。

申二江扛着箱子得意洋洋地去了他岳母家。

“小偷在哪儿？”老太太问。

“没有来。”申说。

“抓不住贼能证明什么？”

“管他呢，申二江说，‘他怎能跑得了呢？是齐忠纪，想什么时候找就能找到他。’”

果真如此，半小时后，二江和狗孩去他家找齐时，他正在炕上睡

大觉呢。

他们粗鲁地把他拖了起来。

“干什么呀？”惊醒的睡客问。

“你偷箱子被捕了。”申二江说。

“什么箱子？我什么也不知道。”齐说。

他们不由分说把他硬推到大队办公室，派一个人看住他，然后去找治安主任申以及其他宣传队员。

当这两个民兵带着几个干部回来时，齐却不见了。

“他去哪了？”

“厕所。”看守的人说。

厕所内空无一人，齐忠纪越墙逃跑了。

老申再次提醒全体民兵提高警惕。100名民兵夜半三更把全村及其周围庄稼地像梳头一样搜了个遍，但是仍然是一无所获。凌晨四点，他们大多数人半途而废回去睡觉了。

“我们明天早上找他。”申说。

正当这时，齐忠纪双手反绑着出现了，民兵狗孩在后面推着他。

“在哪找到的？”

“猜一猜。”

“猜有什么用？”

“他又回了家在炕上睡觉哩！”

可怜的齐忠纪前途黯淡。人人都说齐当小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祖宗埋在贼头坟，因为风水不好，齐家过去就是小偷，将来也是小偷。如果你站在他祖坟前看太行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远方的山巅；如果蹲下，山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如若半蹲半站，就可看到一座山顶和一棵树。这种半蹲半站的姿势，据说就是小偷的站立姿势。因此这座坟地就是贼头坟，埋葬在那里的人的子孙后代也最终注定是要当贼的。

然而有人持反对意见。齐忠纪并不是齐家男性直系子孙，他亲身父亲姓程，母亲才姓齐，那座坟怎么能决定他的命运呢？阴阳先生说就是因为他改了姓。他舅父死后，齐过继给了他，以便能继承死者的房屋。当继承人就必须改用人家的姓，继承了姓也就继承了齐家的命运，因为其祖宗埋在贼头坟。风水和占星术一样，对任何人都不会怜悯。

六十一 攻击受害者

9月20日晚上，在地里又整整干了一天后，我们顺便到办公室打听消息。我们发现高法官在来回踱步，态度严肃认真。小偷齐忠纪在书面交待自己的犯罪经过。齐忠纪是一位发育不良的青年，面容憔悴苍白，下巴上留着刚刚长出的黑黑的胡须茬子，看上去他像15岁而不像20岁，很清楚他在地里干活儿是很难应付的。有人告诉我们，他一天只能挣七分工，而他的同伴却挣十分，由于他要赡养两个人，他家的生活水平肯定不会高。

齐忠纪旁边的桌子上，放着许多在他家里找到的各式各样的五金器具。我们可看到电灯泡，把手上刻有“养猪场”字样，铁道的月牙形扳手、折叠刀、套筒扳手、修自行车工具、小钻子、大电动机罩壳、挠性管末端的油脂套筒装置，地上放着有名的李家的箱子，15×15×20英寸大小，是棕色木头做的，没有油漆过，一把小金属锁紧紧锁在箱子上。

桌子上的一些东西，似乎和那天农民向大队办公室指控齐忠纪所偷的东西相吻合，上个月全村各处丢了许多东西。他们所丢失的东西包括：两付新自行车轮胎，帆布带，八种各式各样的木工用具，新抽水站的电线，一套扳手，猪场的一付钳子以及灯泡等。

高法官没有审问嫌疑犯每件物品的来龙去脉，而是要求他重新写供认书。如果这位年轻人的拘捕和一整天的询问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不需要进一步对质了。他将把自己一切东西都列出来。

当齐忠纪坐在一个低功率的昏暗灯光下吃力地写每个字时，高法官告诉我们齐自从半夜三更逃跑后村里所发生的一切。

凌晨四点钟，民兵狗孩发现可疑小偷又回家上炕睡大觉了。他第二次拘捕了他，把他押送到大队办公室，由治安主任申和范机灵一直审问到天亮。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齐断然否认他知道任何关于民兵申二江从他手中夺过箱子的事情。

“我从头到尾都在看演出，”齐说：“当申说有人偷了箱子后，我和其他人一起跑出去抓贼。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问我朋友何贵、孟

大年或武宝贝，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当齐忠纪只能详细叙述所演出的七个短剧和滑稽剧中的三个时，他的话就更显得软弱无力了。后面三个节目他只能想起个大概来，而说不出谁扮演哪个角色（与此同时，民兵们在他家找到了许多东西，各种工具以及零碎东西，似乎是以前被盗的东西）。申趁机给小齐讲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正当黎明的晨曦驱散了院外的黑暗时，这位年青人崩溃了，他痛哭流涕地承认是他偷了李家的箱子。

次日大约中午时分，高法官接着进行了审问。

“姓名？”

“齐忠纪。”

“年龄？”

“20。”

“出身？”

“下中农。”

“家里几口人？”

“三口，父亲、弟弟和我。”

“他们的年龄？”

“父亲 70，弟弟 14，还在上学。”

“你上过学吗？”

“在马厂小学大约上过一年。我还很小时我母亲就死了，所以我就回大队干活儿了。”

“你参加劳动几年了？”

“五六年了。”

“参加过什么组织？”

“没有，但是文革中参加过红色兵团。”

“听说你母亲把你给了她弟弟。”

“对。”

“你父亲姓什么？”

“程，可是我舅舅姓齐，所以我姓了齐。”

“你舅舅家有几口人？”

“没有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过继的这一家的任何人。我舅舅在给我改姓让我当继承人以前就死了。”

这惊奇的回答使高法官迷惑不解。他询问后发现，忠奇母亲与她哥哥齐思德商定安排这个男孩当另一个无儿无女的年长哥哥的孩子，以便他的房子仍然属于齐家。忠奇改姓他死去的舅舅的姓，成了死者的儿子，因此继承了他的一半家产。另一半家产归齐思德的养子，消极怠工的惯偷齐大红。大红不乐意这种安排。由于他是父方关系最近的男性继承人，因此他希望继承全部房产。他不理会忠奇的要求，找大队领导要求准许卖掉全部财产。这使已故舅舅的遗孀大为恼火，她觉得一旦她侄子把房产卖掉，齐家就会烟消云散，齐家的姓就会消失，那么近处就没有子孙给祖宗上坟了。她谴责当时的大队主任张兴发、副主任张贵才为了几包香烟几个鸡蛋和其它礼物，出卖了齐家利益。她说大红为了得到大队领导的同意，给他们送了大量的礼物。当大队领导拒绝听她的抱怨时，她向长治市法院提出诉讼。

林法官传唤了兴发和贵才，生气地责问他们接收了齐大红什么礼物而偏袒大红。

张贵才大发雷霆。“你妈的，”张对林法官说：“你坐在人民法院，吃上人民的小米是干什么的？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被收买了，最好告诉我我是怎么被收买的，我的价钱是多少。至于我，我不在乎。我尿你一身，我叫你现在在这儿把我逮捕了。”

张贵才一顿狂轰乱炸，把秦总法官惊动到了现场。他曾是潞城县第五区的联络官，和贵才是老相识，知道他是不容易被收买的，因此，要林法官赔礼道歉。林法官向贵才道歉后，贵才也为他挑衅的态度、不文明的语言向林法官表示歉意。然后他们和解了，心平气和地了结了此案。法院起草了一封判决书，判定大红拥有一半房产，忠奇拥有另一半，各人均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售房屋。最后是齐忠纪卖掉了自己的两间房子，得了380元钱。他仍旧和他亲生父亲程和弟弟住在一起。但是齐家的姓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上，他得到380元钱，就继承了需要照看贼头坟的责任，此外也继承了注定要当贼的命运。村里有一半人确信他最终不会有好下场，而他们的蔑视态度有助于保证这种预言最终成为现实。

然而高法官与一些土生土长的张庄人不同，他根本不相信贼头坟坟对齐是什么不祥之兆。他向这个年轻人保证，不管是谁，只要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老实交待，都会得到村里人的宽容和谅解。

“你还很年轻，出身下中农家庭，如果你和我们合作，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照我看，我完蛋了。”齐忠纪悲观丧气地说：“我的前途黯淡。我身上有了这污点，怎么能洗得清呢？”

“一个污点不能毁掉你的一生，”高说：“只要你吸取教训，你的前途任你选择。人人都会犯一两个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迅速纠正错误，避免将来重犯。因此最好把你过去几个小时内的思想情况说出来。我们关心你的前途，你自己也应该关心自己。你选择什么道路呢？”

此时此刻忠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泪如泉涌。“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我对不……”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好啦，你最好把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演出开始时，我在人群里看到了李天池的母亲，这就意味着他们家可能没有人。我经常去他们家，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保存东西，因此我偷偷溜出去闯进老太太家，扛上箱子藏在地里后又返回去开会。当听说有人偷了李家东西时，我跑出去和别人一起调查了解此事。”

“是你一个人进去的吗？”

“是。”

“你用手钳了吧？”

“嗯，我离开会场先回家拿上手钳。他们用铁丝换了一个链环，我是用手钳剪断进去的。我拿上箱子藏在地里，后来村里平息了后，我去要把箱子拿回家。可是二江看见了我，夺过箱子跑了。他对我喊‘你不来吗？’我说‘不去，’就回家了。我很想睡一觉，狗孩就是在我家找到我的。”

“你是什么时候溜出会场的？”

“第三个滑稽剧演完后。”

“你回家拿手钳时没人在家吗？”

“我父亲在。”

“他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吗？”

“他知道我回去了，可是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是什么样的手钳？”

“绿把儿的。”

“你在那儿弄到这把手钳的？”

“我弟弟带回家给我的。”

“昨晚把手钳放什么地方了？”

“鸡窝顶的砖上。”

“你知道你拿的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那么为什么要偷箱子呢？”

“嗯，我看见箱子上着锁，估计里面一定有宝贵东西。”

“你说的是实话吗？”

“当然是。”

“现在你不会再欺骗人了，是吧？”

“当然不会，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发誓。”

高法官转向了新的话题：犯罪的动机上。

“为什么你要抱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的态度呢？你已经考虑了好长时间了吗？”

“没有，小李是我的好朋友，我经常去他家。”

“你在他家时他们开过那个箱子吗？”

“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要选择箱子呢？”

“有两个箱子，可是那个小箱子上着锁。”

这并不能使高法官满意。他要的是自我分析。“你必须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偷东西的。你必须从思想上找到根源，否则你是不会改邪归正的，最初是什么东西使你产生了这个念头的？”

忠奇没有立即回答。他略加思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李家有个妹妹，我想她一定有些衣服。我家根本没有东西可锁，只有我们三个人。”

“可是这和偷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妇女衣服干什么？你又不能穿，而且他们领到的布票和你家是一样的。”

“可是李家干活儿的人比我们多，我家三口人，只有我一个人劳动，要养活三口人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那么你不知道他们有贵重东西吗？”

“不知道。”

“你只是认为他们干活的人多就可能东西多，对吗？”

“对。”

“可是还有许多其它人家生活并不困难，是吗？”

“可能吧，可是我对他们了解得不那么清楚，我对他们不熟悉。”

“但是小偷往往偷自己不认识人的东西，所以你最好说清为什么你要偷你朋友家的东西呢？”

“我对李家很熟悉，我看到他们全家都在看戏。”

“就是在你看到李老太在看戏时，你有了偷的想法了吗？”

“嗯，我常想他们家比我家富裕多了，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偷他们的东西。”

“你没有考虑过偷那个箱子吗？”

“没有，我只想将箱子打开。”

“有这种思想多长时间了？”

“五六天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富。”

“是什么使你想进能进了门儿呢？”

“我看有一个门链用铁丝补着。”

“如果你只想把箱子打开，为什么要拿出外面呢？”

“我怕他们会回来。”

“所以你怕被抓住？”

“唉，这就像一场恶梦一样。我在他们家时确实不太害怕，只是事后才害怕起来。”

“今天早上他们拘捕你时，你说是在蓖麻地里发现那个箱子的，为什么？”

“唉，我知道我要坦白就会得到宽大处理，如果抗拒就会被枪毙。”

“那么你写的这是什么样的交待呢？”

“抗拒。”

“怎么，不要宽大处理了吗？”

“要。”

“那么为什么这样交待问题呢？”

“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什么想法？你怀有什么幻想吗？”

“幻想？我不知道，‘幻想’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我只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只是想，如果我不砸坏门没人会知道我进了他家。”

“现在呢？”

“现在我想通了，我要把事情的经过统统告诉你，然后回家下地劳动。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劳动，我得为此操心。”

“这个想法好，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而且要考虑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那么你怎样才能回家下地劳动呢？”

“坦白交待一切。”

“好，这回你把什么都讲清了吗？”

“对，都讲清了。”

“那么，”高法官用一种沮丧失望的语调说：“我们在你家找到的东西呢？”

“有些是我弟弟带回家的。”

“凿子呢？”

“那是陈石田的。”

“扳手呢？”

“我向水泥厂小杨借的。”

“我认为你没有讲实话。”

“我自己还有一把扳手。”

“哪儿来的？”

“买的，杨林老婆去黄碾时给我买的。还有林跃龙给我买的灯炮。机务段老裴给我的插座，他住在村南我姐家。”

“还有斧子呢？”

“我自己的，我在临沂买的。”

“多长时间了？”

“一两个月了。”

“多少钱买的？”

“三块三。”

“是藏在炕底下那把吗？”



“不是，你们从我家拿的那把根本不是我的。”

那一点已得到了证实，他们在忠奇家炕下发现了李快腿老早以前借给猪场的那把斧头。猪场为斧头赔了四元钱，结果斧头跑到了忠奇家。

“显然你只说出了部分真实情况，”高法官说：“你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统统讲出来，甚至包括那些你自以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是保证你前途的唯一方法。”

“至于前途，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忠奇说：“我想我已经完了。”

此时，长治市委范机灵插言道：“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没有把你送交警察？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政策。我们可以把你交给警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你最好认真考虑一下，然后统统告诉我们，你家还有其它东西吗？”

“一节铁管子，是我用二毛七从林耀龙那儿买来的。”

“值那么多钱吗？”

“他们按斤收费，每斤三分。”

“绝缘线是哪儿来的？”

“小秃架电线时给我的。”

“你家还有什么？”

“值五毛钱的小插座，那是我买的，可是我还没有给钱呢。”

“说完了吗？”

“噢，还有一些零碎东西，可我记不清了。”

“什么零碎东西？”

“我记不清了。”

“好吧，请记住，你隐瞒任何事情对你都没有好处。”

“现在天气不早了，”治安主任申说：“晚饭后我们继续谈，那时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待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对，”高法官说：“你最好回去把今天下午你告诉我们的事都写下来。”

“我能回家了吗？”

“不行，只有把事情全部讲出来并想通后，你才能轻轻松松地回家。”

“可是从早上到现在我连什么东西也没吃。”

“他们没有给你送饭？”

“我父亲告诉我弟弟什么也别给我送，反正我也不值得吃东西。可是我要喝水，有水吗？我能喝水吗？”

“当然，我们让你吃让你喝，我们要好好对待你，但是我们要你承认你的问题。我们要你憎恨你肮脏的过去。”

“即使我痛恨过去也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和你父亲谈谈。”

“啊，不，别对我父亲说，我的所作所为只能使他伤心。”

“但是这不是坏事，对他也是个教育。”

“可是他连自己也照顾不了，他只有一只手，他顾不了自己。”

“我看出你知道什么是羞耻，可是你从未考虑过箱子丢了对李家是多大的打击呀！那些东西是一天又一天辛勤劳动挣工分才买来的，而你却转眼间据为己有，这难道不是剥削吗？李家母亲气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好啦，我们保证你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睡。同时你最好试着重新交待自己的问题。这一次交待可要完全彻底。”

忠奇写完后，管道工黄大声朗读了起来：“昨天晚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人们来看戏时，我去李家砸开门锁，拿上箱子藏在蓖麻地里。后来我想把箱子带回家，可是李抓住了我。人们和我谈话后，我承认偷了箱子。现在我感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保证决不再干这种事情，只要求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领导下走革命道路。”

这个青年的文化水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想，他只在小学上过几年学，但是他和村里大部分的同龄青年人不一样，竟能坐下来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

当我正在对齐的文化水平惊叹不已时，管道工黄在对这个可怜的家伙所写的内容连连摇头。

“太简单！”黄严厉地说：“对你的动机只字未提，你必须把你闯进别人家门时的想法写出来。而且你还必须把我们在你家找到的全部东西和我们让你上厕所你却跑掉的事都统统写出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承认，你问题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劳而获思想。通过偷盗你可不费吹灰之力获取财富，这样就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个阶级问题。”

“对，”高法官说：“你必须仔仔细细把你的全部历史回顾一下，把

每个问题都回想一下并逐一写下来，然后进行分析。你用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你做的错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别做错事。如果干了错事，总会有人知道的。你可能希望没有做过错事，但你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待、坚决改正。”

“我们还必须批判你没有前途的说法，”治安主任申急不可待地插话：“当然这次偷东西会玷污你的清白，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前途。你还很年轻，阶级出身是下中农，如果你肯努力，光明前途就在你眼前。如果你坦白交待了所有问题，贫下中农是会原谅你的，但是如果你不肯坦白，那就越少说越好，考虑考虑吧。”

把齐的行为划成阶级斗争，并把它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我感到迷惑不解。似乎犯罪并非仅仅是犯罪，而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这种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失去控制了吗？我为小齐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他似乎在沉重的压力之下生活。他一天只能挣七分工，几乎连一个人都不能养活，可是他得赡养三口人——年迈的残废父亲，上小学弟弟和他自己。他越来越深入陷入贫困之中，而他的邻居有四个人劳动，生活富裕，而且箱子里还积攒着钱。

这两家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可能必须看作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所带来两极分化的例证。“同工同酬”的平均主义诺言必然被不平均的劳动力和不平均的需求和负担所破坏。赡养人少的强劳力往往会积累剩余财富，而赡养人多的弱劳力会逐渐变得缺钱少粮，以致最后陷入困境。正如毛泽东几年后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哪里“资产阶级法权”占支配地位，这样的两极分化就会使哪里的人深受其害。但是只要生产力依然落后，任何国家都不能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如“同工同酬”之类的东西。而且只要国家、集体、个人生产同时存在，社会就不得不保持市场，就不得不允许人们进行商品交易，而且商品的价格也必须大致反映出体现在商品上的劳动。

大队能为小齐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必须像对全体社员做的那样，向小齐全家保证最低限度的人均口粮。这种保证就相当于免费供应。但是甚至这一点也有料想不到的困难。如果齐挣不到足够的工分来养活三口人，大队就得给他们三人提供粮食。根据合作社章程，大队必须把帐记在齐家名下。齐家不会挨饿，但是因为所挣工分不够买粮就会债台高筑。如果大队不在将来某个时候勾销他的债务，那么偿还债

务将使他终身受苦。然而一旦他弟弟开始参加劳动，两个人有可能靠辛勤劳动来还清债务。

一个20岁的人竟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从这种观点来看，其前途一定黯淡无光。我把小齐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牺牲品。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似乎是给其父亲找一些轻活儿，为这个家庭找到经济上的来源。如果大队能找到一些办法帮他们增加一些额外收入，盗窃问题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大队领导、宣传队员和张庄老百姓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这种情况下唯一受害者是暂时失去箱子的李家成员。小齐是新生的阶级敌人，问题的核心是小齐的思想意识，是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大队新面临的问题是阶级问题，其解决方法是要加强阶级教育。他们问齐忠纪是否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当他说没有时，他们给他找了一本。“学学有关阶级斗争和青年问题部分”，他们劝告说：“你就会明白自己离毛主席对中国青年提出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六十二 对付“二宝”

宣传队大部分成员认为逮捕齐忠纪这个贼是天赐良机。对他们来说齐的犯罪似乎是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确信无疑的例证。如果处理得好，本事例可作为揭开张庄阶级斗争盖子的契机。

在齐供认后的早上，宣传队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选择了学习材料。李老师听朗读的语录之中有好几段叙述毛泽东所称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

“……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

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学习这些引文确实是及时的，因为那次会议以七个精彩的戏剧节目开始，而以张庄现实生活中明目张胆盗窃戏剧性地结束。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二宝”和大队以及小偷与大队之间矛盾性质问题。

那些从这两种矛盾中看出相似之处的宣传队员们，要安排一次群众大会，让群众同时公开批判小偷齐忠纪和前任民兵营长秦快嘴。这些宣传队员包括八字脚郑和络腮胡子申。他们把这两种矛盾都看成是阶级冲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一举揭露张庄阶级斗争的本质，把危害大队团体的最主要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只要揭出问题就有助于解决问题。

在学习中间受到管道工老黄热情支持的治安主任申，建议召开这样的会议，老八路王则表示反对，而高法官、王腊肉和白发苍苍的曹福贵却要抽时间对此事进行研究。

老八路王反对进行联合批判，理由是在政治上没有充分的根据，秦贵宝和大队的矛盾性质问题他们尚未解决。秦快嘴有可能是个阶级敌人，但是更有可能是暂时和现任领导翻了脸的一个贫农，和他的冲突仅仅是人民内部的一种冲突，尚未成为对抗性矛盾。如果能正确处理，这问题可能会相对容易地加以解决。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对抗矛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当干部不能适当处理各种矛盾时，他们可能把一般矛盾转化成危险的敌对矛盾。

治安主任老申想到自己可能对某些坏事要负责感到吃惊。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是好事能变成坏事吗？”他问。

“当然，”王说：“记得不愿把自己划规到屯留县的老支书，他是个好人，战功卓著，土改期间又赢得很高的声望。当他们村里同伴抗议加入屯留县的决定时，他赞同他们的意见，并又向市委的划规法提出了挑战。村民团结一致支持他，赞扬他，他感到自己好像又成了英雄。因此更加精神十足地进行反抗，通过反抗为人民服务，就像他在过去经常做的那样。麻烦的是这一次他在公然反抗朋友和伙伴们。当屯留干部来商谈此事时，他派人把来人的车推翻了。当他们设法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砍倒电线杆，我不听他们的傻话，’此时矛盾变为对

抗性矛盾。一位模范大队的支书结果成为罪犯，被指控毁坏公共财产。他拒绝走他们指的出路，从而毁了自己。他自己没有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如果我们召开你所提议的批判大会，我们也是会重蹈覆辙的。”

“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老申问，他仍然迷惑不解。

“还不清楚吗？”老八路王说：“设法考虑用其它方法解释这一问题。偷盗的确是犯罪，盗贼和大队之间的矛盾确实是对抗性的。当然最终我们可能不按对抗性矛盾解决。我们可以把小偷当作是误入歧途的人民的儿子，劝说他改造自己，从而宽恕他的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秦快嘴和小偷混到一起处理，就等于公开宣布我们和秦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他是个阶级敌人。”

“如果我们继续那样做，我们也会没有回旋余地的。以后我们怎样收场呢？我们不能一天把他当作敌人批判，另一天又反过来说他是人民的一员。他扮做鬼脸，我们扮做红脸，然后他突然摇身一变也成了红脸。”

“那种事怎么会发生呢？”老申问。

“噢，难道党最终不可能恢复他的职务吗？很有可能。毕竟他可以作自我批评，自我改造。那时我们怎样对群众开口呢？我们不能一会儿置他于死地，一会又转身要群众把他当作党员、革命先锋对待。由于现在我们对案子的性质尚无把握，所以最好给自己留点回旋余地。”

老王对先前的群众大会那种开法已大为不满。高法官直截了当地说：“阶级敌人到处破坏，到处散布谣言。”他举出关于下种率的争论以及说：“松开点手你可种60斤”的未被点名的人为例证。

接着老申站起来进一步发起了进攻。他说：“秦贵宝叫嚷60斤下种率是千方百计破坏生产。”阶级敌人已经有名有姓了！

“如果有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就让他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老申继续说：“有人就救济粮问题制造混乱，有人竟从地里偷玉米，有的从铁路院里偷煤，现在又有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偷箱子，许许多多其它不良现象也纷纷开始露头了。”

老申已曾列举过这些现象，批评过那些不等散会就退出会场的人，开会不听讲话而是专心致志做针线活儿，打毛衣，以及小团伙搬弄是非的人，还批评过那些想当演员在小麦下种期间中途跑到歌舞团应试的青年人。

尽管他没有把问题点透，但是老申的论点是，所有这些消极现象都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当然也证明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的存在。结果他最后向所有与会者都发起了猛烈的阶级进攻。

“群众连嘴还没张你就指责大家。”老八路王反感地说：“你又没有给我们留下回旋余地。你把矛盾对准了群众！”

事情的症结仍然是如何对待秦贵宝，大家的话题仍然回到他的案件上。秦贵宝听说自己在大会上被点名批判后，就去找宣传队干部理论。

“就因为秦贵宝犯了一些错误就意味着他全错了吗？”他问，用第三者口吻问道：“贵宝在破坏秋播秋种吗？”

老王回答道：“那么，至少你是经常火冒三丈，口出狂言，像什么60斤下种率之类恶毒攻击的话，不是心怀不满能是什么呢？”

“我承认有不满情绪，”贵宝略加思索后说：“但是并不是破坏。”

“可是像那样的言论客观上会起破坏作用，结果是不会好的。”王反驳说，设法为宣传队的极端立场辩护，至少是为了记录。“根本的问题是你对自己太自信，你的个人主义十分严重。看到反对你的人，总是忍不住要顶回去，这样对抗情绪就越来越严重。”

“你们知道了吧。”一天早上学习时老王说：“还是点名笼统地提一下所发生的事情为好。如果贵宝自己来说：‘你是在说我吗？’他已进了一步，但是如果你把这叫做破坏行为点他的名，就把他逼到死胡同了，他不能不反抗。”

“但是那不是破坏吗？”申问：“毕竟公社党委发出了正确指示，要求20斤的下种率。”

“正确还是错误，仍有待证明，”王说：“我仍然得在实践中证明，怎么能说20斤对张庄是绝对正确的呢？这儿的土地不同，山后的气候和公社的其它地方也不完全一样。可能需要调整张庄的下种率。公社发出指示是作为行动的指导，并不是作为绝对真理。去年春天，他们不是要我们种改良的杂交玉米吗？结果如何，两成的玉米由于叶子枯萎而腐烂。现在你能说这是优良品种吗？”

“公社还提出‘六不种’，不送200担粪就不下种小麦，你把‘六不种’传达下去了。但是我们很清楚，有些生产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

肥料。他们该忘掉种小麦吗？因此我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试验 20 斤下种率的指示是否正确，这还不清楚吗？”

“可是，你，你想要把这件事提到吓人的高度，反对大队支书，就是反对公社书记，也就意味着反对长治市委书记……一直推至批评中央，因此本来是由于我们本地人处理事情简单粗暴一气之下说的话，结果变成反革命破坏！与会者突然成了反革命分子！”

王自己下结论说秦快嘴有思想问题，秦快嘴愤愤不平，因为上级免去他的职务，他对大队新的领导不满，而许多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并不是犯罪，而是一个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我们应该这样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如果这样做，或许会找到解决这个人的办法。贵宝所说 60 斤下种率的话确实是说：“按大队领导的话做。他们说种 20 斤就种 20 斤，他们说种 60 斤就种 60 斤。”他的意思是“既然他们认为自己聪明能干就让他们负责，闭上嘴听任他们摆布就行了”。

“但是用我们的方法处理此事，常常使许多人不敢讲话。”王说。

“如果我们把思想问题看作犯罪，谁还敢张口发言呢？人们会闭口不言，害怕我们把他们的意见当成阶级斗争的证据。这样我们就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我们的工作就会搞糟。”

王就这样为自己的立场辩解，反对把盗贼忠奇和秦快嘴作为共同的靶子开会进行批判。

“快嘴是个党员，”王继续说：“你们计划把他当作抓获的贼放在台上批判？那怎么行呢？一个人有思想问题，另一个人实际上犯了罪，他们根本不是同类人。”

但是治安主任申不同意。“肯定他们是同一类人，”他说：“他们俩都是‘三秋工作’的破坏者。当然我们可以一起批判他们。至于论到解决这两个案件，我们不能一起解决，但是可以同台批判这两个人。”

两个宣传队干部的意见彼此针锋相对，一个说他们不能一起批判两个人，但是可以一起解决这两个案子，而另一个说他们能一起批判这两个人，但是必须分别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完全陷入僵局。

面对难解的矛盾，王力求找到折衷方案，最后他总算找到了，他建议如果大会说明某项总原则，如继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强调“形形色色”这个词，他们可以发动召开一场联合批判会。比如，有盗贼这样只为自己，不为集体的个人主义者；有受资本主义道路思想

影响，领导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二宝”之类人。每个例子说明一种不同形式的两条路线斗争，但都不同程度地和资产阶级思想有关。

但是尽管王作出这样的建议，他的内心上并不真正赞成，因为他认为，在宣传队员对大队和“二宝”之间的矛盾的根本性质未澄清或未达成一致看法以前，与“二宝”对抗的做法是片面的，难以理解的，不成熟的。

“基本问题自然是：我们和贵宝的矛盾性质是什么？”

“答案仍然是我不知道。”申说。

“好吧，我们调查这件事已经10个月了，已进入后期，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正确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连是哪种矛盾都不能确定。既然不知道，怎么能把贵宝和盗贼放在一起批判呢？那种批判没有政治水平，而既然没有政治水平又怎么能提高觉悟呢？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在处理‘两宝’事件上受到挫折。看到他们和一个普通小偷一起低头认罪会使群众满意，我们可以使他们名誉扫地同受耻辱，可是这能解决问题吗？”

“如我们要批判贵宝就必须分析他的错误思想、错误领导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如果我们把他和一个贼扯到一起，他是不能接受的，而其他人也不能理解，不能接受。”

在我倾听他们辩论的时候，我想起了文化革命高潮时刘少奇及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面对数万名批判者的情景。大会主持人污辱她，逼她穿紧身长袍、高跟鞋、在她脖子上戴着一串镀金乒乓球来模拟珍珠，所有这些都是要丑化讽刺她被怀疑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但是清华的学生们后来意识到，这种嘲弄的结果适得其反。它把与会群众的注意力从手边真正的问题上转移了，把严肃的批判会变成恶作剧，成千上万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光美个人身上而不是她的政治纲领上。

我的思绪又漫不经心地游荡到早期被钉死在两个盗贼中间的十字架上的某个人¹。宣判他有罪的全能检察官的顾问们辩论过用其它方法处罚他吗？有人是否问过把他们的牺牲品和一伙盗贼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能把他贬成一般囚犯吗？有人提到过旁观者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人

¹ 指耶稣基督。

们会厌恶这种不正当行为，整个事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吗？

不幸的是王的争辩未能获得胜利，21日晚宣传队召集第二次群众大会批判秦贵宝及其“集团”的几个同伙，以及一个民兵半夜三更抓住的手抱李家箱子的可怜的年轻人齐忠纪。

六十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2.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3.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

4.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这些毛泽东语录为大会定了基调，大会似乎正朝着老八路王担心和告诫人们提防的方向进行。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申奇才宣布会议议程，号召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相反，”申用他那严厉呆板的语调说：“张庄村的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自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阶级敌人隐藏起来用尽各种诡计阻止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

他为此引证了什么证据呢？从地里偷玉米，从电站偷电线，从李家偷箱子，破坏小麦下种和破坏猪圈合用的言论。

“对这些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到底。杀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当申奇才离开舞台中央时，潇洒的新大队会计、党委委员申许文起立声明，张庄人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理论，积肥促生产，修渠，买猪，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中间有人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申会计喊叫着。

“秦快嘴站起来！”他命令着，把与会群众以及他所谓的敌人都冷不防吓了一跳。

当秦贵宝在会场中央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时，老申竭尽严厉之词对他进行攻击。

“秦贵宝谈论‘黑帮’和‘红帮’，他破坏我们的辛勤劳动。对这些妖魔鬼怪如果不和他们斗争，他们就会压倒我们。革命是主流，而反革命是可怜的小支流。你们这种人的唯一出路是改造世界观。我们会把那些破坏秋收的人揭露出来打倒。如果你坚持你的腐败习气，你将会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秦快嘴仍然站在会厅中央，他的周围坐着张庄的农民。申从地上站起身来呼喊口号。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路线！”

“千万不忘阶级斗争！”

“横扫一切毒草，一切牛鬼蛇神！”

当申许文高声呼喊口号时，大厅深处传回了断断续续的回声。年轻妇女、老太太、无经验的青少年、饱经风霜的老农民都聚集在那儿，尽义务地重复喊着年轻会计的口号，但是声调呆板单一，既没有热情又缺乏信心。他们对于如何对待群众批判会了如指掌。他们毫无反抗地参加着熟悉的活动，但是他们又没有产生任何批判的情感和义愤。我觉得对社员来说，他们在勉强默认一种形式，因为他们无法回避，因为那是宣传队和大队安排的，他们似乎感到这是与己无关的一种形式。

一个名叫杨振平的青年农民接着申许文上了会台。杨从衣袋掏出发言稿，就像小学生齐声朗读纸上或黑板上的汉字一样，不是用通顺流畅的念稿子、正常讲话时轻松的语调谈，而是独特地断断续续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

杨振平坚持让秦贵宝站着，一件又一件地重复前民兵队长贵宝所说的各种破坏性言论，最后大声威胁说：“秦贵宝你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失败了！如果你坚持到底必将被革命的车轮轧得粉碎。”

当每一个发言者离开讲坛时，另一个青年人立即在舞台上取而代之，每人都带有充满口号、套语、警告、威胁之类言辞的发言稿。很快就明白了这些讲演并非青年人一时冲动所为，张庄共青团员们事先

并头开了会，分了工，每一个人事先都写了抨击1971年秋敢于抬狗头的万恶的阶级敌人内容的发言稿。

发言的重点各自有别，说明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了讨论计划。杨振平重点集中在学大寨和贵宝的言论上，“只要我们能打下粮食，大寨路、张庄路，有什么关系？”

罗翰华重点集中在张庄可怜的养猪状况上，并把它归咎于秦断言的“群众落后”论。

齐玉根的目标对准了1万斤救济粮和贵宝的言论，“我们黑帮连一颗救济粮也得上，可是你们的红帮是人人有份”。

秦福田再次强调了养猪问题，申红章批判“二宝”煽阴风，点鬼火，宣扬“张庄阶级斗争熄灭论”，但是他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

第六个发言者申洪福把抨击的矛头转向小偷齐忠纪。申让贵宝坐下，然后命令齐忠纪站起来，指控他就是搞阶级斗争。

“齐忠纪，”申念着自己的发言稿：“我们要告诉你，不管你如何狡猾，你也跑不掉！”然后他给齐指出了出路，“只有老老实实自我批评，你才能重新做人，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李康兴继续向齐贼发动攻势。他把齐说成典型的受刘少奇黑线影响的年轻人。

申明旺接着登上了讲台，一道新的命令又让观众大惊一场。

“八字脚郑站起来！”

八字脚站起来后，齐忠纪坐在地上，明旺喊道：“下贱的八字脚郑，你这个刘少奇的残忍的黑爪牙，你怎能这样错误判断我们的未来呢？你的目的怎么能达到呢？”

一位年轻的妇女申秀英继续进行抨击，直到秦成元把注意力集中在林耀龙身上才尚罢干休，林耀龙因为在长治钢铁厂搞副业牟取暴利而臭名昭著。

在此期间另一个年轻妇女——兴发的女儿张仙花抨击了刘少奇的妇女观。她没有冒昧断言张庄任何人支持刘的这一观点，但是要他睁开狗眼看看妇女也是有力量的。“男人能做事，妇女也能做”。小张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将证明我们能顶半边天。”

这些连篇累牍的发言惊人之处是所有这些年轻人个个都能写会道。

每个人只承担共同任务的一个方面，并且每个人都写出了自己的批判稿。这和1948年土改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那时，贫农积极分子常常为不识字表示歉意。在我看来在1971年，似乎学习文件已太过分了。

青年人个个能写会说“红书”或“人民日报”中的套话，“如果我们不执行毛泽东路线，就会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形势大好，新高潮已经到来，波涛汹涌，红旗招展，斗志冲天，发生巨变”。“阶级敌人煽阴风，点鬼火”。我发现我自己急切希望有一个，哪怕只有一个发言者扔掉讲稿，说几句发自内心的张庄人平常说的话。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令人失望的会议议程照计划继续进行，群众像尽义务似地听完发言者讲话，偶而心不在焉地跟着喊几句口号，就像他们对中起财那样。

突然，讲话中间，李来全主任手拿一通知迈步向前打断会议进程。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了吗？又发生了盗窃事件了吗？窃窃私语停止了，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寂静，听众在迫不及待地恭候着意外的消息。

“人群里有一个小孩丢了一只鞋，”来全说：“谁发现鞋请送上台来。”

听了这一新危机，人们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并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不等当时发言者继续讲话，一只色彩鲜艳、刺绣精美的小布鞋从人群中飞出来，嗖的一声掉在讲台中央。来全悄悄地走向前取回了这位“游客”，而发言者继续发言没有停止。这仅仅是归还鞋子的“农民”方法，还是反映了对大会内容的不满情绪呢？这事很难说，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让我感到越来越不安了，给我当翻译的女儿韩琼也是如此。

她经常发现很难翻译那些华丽的文词，那天晚上简直把她难倒了。全凭极其坚强的意志她才能倾听并用英语翻译出来。

最后一个发言者管道工黄，穿着耀眼的军装，声音高亢，激情迸发，超过前面所有的发言者。他对听众慷慨陈词，声音高昂刺耳，命令主义的声调如同那十恶不赦的恶棍刘少奇自己就在我们中间。在讲话中间他常停一停，嗓子眼里发出“啊，”或“啊，啊，”声音来强调。

这些“啊，啊”之声仿佛像池塘里青蛙哇哇的叫声。如果你停止听他的话而集中注意那些“啊，啊，”每一次啊声都比先前一次更像青蛙叫声而且更加吓人。他扭着脸，举止夸张，声音过高，他的观点

一清二楚，“阶级敌人靠边站，否则就被消灭”。

“千万不忘阶级斗争，”黄喊着：“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啊，但是那个思想反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秦贵宝在干什么呢？啊！他坐在哪？学习‘小红书’，啊，学习毛主席的语录以便对抗我们，啊。难道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例证吗！啊！啊！这不是他的惯用掩盖手法，而事实上图谋……啊……将来报复？”

管道工黄然后又重新回顾了最近秦贵宝、李快腿、林耀龙、郑八字脚、大胡子申和小偷齐忠纪的罪行。他号召人们对他们都要进行批判。赞扬晚上的会是生气勃勃的会议，普遍提高了大家的斗志。他赞扬大队社员在小麦下种、购买小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600亩小麦已种400亩，两天买了190头猪），并以呼喊六个口号而结束了他出色的表演：

打倒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路线！

支持毛主席革命路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如果有任何区别的话，群众的反映只是比以前更微弱了，因为大多数农民早已溜之大吉了。仍留在会场的只有几十个人，在此夜半三更之时他们对喊口号的热情已降到最低点。

一回到房间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了如下的话：

“我对这次会议感到迷惑不解，如此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敌我）界线不清。贵宝是阶级敌人，还是人民的一员？抨击的政治内容是什么？他应该和盗贼同属一类？盗窃行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为什么他们不要贵宝作自我批评？他真是在破坏秋收工作吗？客观吗？有意的吗？”

其后好几天韩琼和我与林东、范文就整党方式进行了一些激烈的讨论。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和老八路王的看法趋于一致：把所有这些事件一起进行批判处理是错误的。不仅整个做法似乎是错误的，而且在我看来其后果似乎是灾难性的。人们成群结队远而避之，参加了生产队会议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无话可说。如果思想问题用这种方式处

理那就没人敢大胆讲话了。许多在现实中正迅速认识到了王的这一预言。的确，我争辩说“二宝”的案件必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宝”可能与某种反革命地下组织有联系的问题应该彻底调查。除非，并只有揭发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大家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民中的两位干部——由于被免除职务并贴上“黑帮”的标签，他们气愤并且有抵触情绪，但他们显然不是有意破坏者，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不是反革命。

“治病救人不是毛泽东的政策吗？”我问。但是群众大会上没有显示出这种精神。相反几乎每个发言者都把“二宝”叫作“阶级敌人”，这样堵塞了他们的出路，并且几乎肯定，内部矛盾早晚会转变为敌我矛盾。

作为回答范机灵强调了“二宝”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重复轻农向钱看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砸、抢。现阶段他们的态度和言论客观上起着破坏作用。范机灵宣称叫他们阶级敌人是不困难的。

林东竭力支持他。

卡玛和我却说我们不明白无论如何谴责能走那么远，仅仅因为“两宝”犯了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并不能说他们是走资派。如果他们追随了错误的反革命路线，只能说他们犯了那种错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事实上在暗中破坏村领导，腐蚀新的负责干部的权威，难道不能归咎于严重的个人主义，对被打倒的愤慨，归咎于个人野心，以及类似的自私自利动机而不是归咎于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吗？如果他们承认错误，改变态度，不叫他们阶级敌人，而把他们称为犯有严重错误、个人主义倾向严重，仍然可以争取过来的干部，不是更加实际吗？

我们指出李快腿倒有一种受人欢迎的长处。他不仅在家里养着猪，而且还照顾母猪下了四个小猪，实际上在执行毛泽东指示的养猪路线，他把村里98%的人远远抛在后面，至少在这方面大家必须赞扬他。

讨论进行的越来越热烈而严肃，但是却不能解决问题。每次吃完饭时都有失败之感，那就是说，感到范机灵已下定决心把“二宝”当作阶级敌人来抨击。由于这种决定在我看来似乎是过于激进和极

“左”，我看不见张庄能摆脱现在僵局的途径。什么时候这种“打倒”之怪圈才能结束呢？我们好像在一条看不见一线光明的隧道里行走。在一个情况已一团糟的村子里，甚至最高领导还在犯那种只能使局势恶化的错误。我的情绪异常低落。张庄的政治工作怎么能陷入这种困境呢？

范机灵不断攻击我们的论点是，普通老百姓永远也不会领悟我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个反革命分子所作的细微区别。当前首要大事是揭露嫌疑犯，唤起群众反对他们。当轮到判别案件时，干部们可以做出必要的仔细区别。

韩琼和我反驳时清楚地说明，我们并不期待所有的农民都能清楚地地区分“阶级敌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倾向严重的人”。但是我们觉得领导区分这点，搞清楚党的“治病救人”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我们能给“二宝”出路，也可能把他们当作干部和革命者来挽救。为什么市委干部和宣传队竟然跟在群众后面呢？

当然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并不是市委领导跟随在群众后面。群众意识到宣传队所采取的整风政策是极“左”的教条主义的，他们用脚投票，他们避而远之以示反对，就像1948年那样他们拒绝参加会议。那时极端主义的贫雇农路线主宰着张庄的一切活动。当干部们千方百计制造实质上反动，概念上空想的绝对平等时，普通老百姓拒绝参加会议，就是出席会议的人也拒绝发表意见，用睡大觉来熬过冗长的空洞无物的报告，或者一有机会便溜之大吉。以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当领导使群众面对脱离现实的不成熟的牵强附会的政策时，群众往往似乎是落后的，只有当领导提供正确的革命政策时，才能热情团结激励他们向前。

这一点我们也辩论过，因为几乎没有人能说上次群众大会所提供的讲稿表达了人们的普通看法，这些讲稿对宣传队来说显示了一次有组织的尝试，由宣传队领导通过大队党支部和青年团的努力，对指定的“阶级敌人”发出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尽管青年团员们所表达的思想并非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一旦上级组织作出决定，他们就乐于参加这种运动，究竟有多少发言者真正相信他们所讲的话，是无法确定的。由于领导煽起批判之风，大部分忠实的党团员便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而随声附和，只有老八路王这样

的真正经验丰富的老兵才有成熟的思想，才有反潮流的政治勇气，而且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经常道歉。他把自己的观点描述为“可能是右倾的”或者甚至是“修正主义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就范机灵而言，他继续用强有力的论据而反驳我们的观点，以证明“批判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宝”的历史记录使群众失望，他说。因此他们大胆讲话，方向是正确的。“领导干部除了表示支持还能有何作为呢？”他问。

“但是即使批判会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回答说：进行抨击的性质和形式是错误的。群众对要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尚未真正理解。如果领导在那种情况下只给于“全力支持”，群众怎么能避免犯严重错误呢？领导干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实情，正确区分错误、错误思想和犯罪、敌人分裂破坏等等，并恰当地评价所发生事情的性质。”

在某种程度上范机灵被这些论点所说服，开始有点动摇了。有一阵子他同意批判会是粗鲁的、不成熟的，又过了一阵子却又断言这些人实际上是阶级敌人，应该受到粗野的批判。他这样动摇不定，一会儿与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一致，一会儿又断言我们的看法完全推翻了整个批判会。

我越来越强烈的地意识到，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改变态度，张庄就会招来麻烦。林东不时提醒所有的人，她是从中央来的，有某些未明说的理由，要利用一切手段粉碎“二宝”。可能范机灵希望给林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赢得中央的好感，总是附和她的意见，采取极端的立场。

其他宣传队员因为这个问题分裂，治安主任申，管道工黄选择严厉的阶级敌人政策，而老八路王、高法官和王腊肉则提倡“治病救人”方针，即与落后思想作斗争的方针。其他成员并不像领导干部那样畅所欲言，许多仍然在思考如何拿定主意。

宣传队员们从未就此问题彻底辩论过，至少我们在场时没有。谁能说清楚最后宣传队会提出什么建议呢？要对林东代表的“中央”施加影响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北京和中央的威望仍然很高。没人能轻易反对自称代表中央的高级别干部，而且该干部坚持说中央决定就是客观真理。

关于客观真理这个问题，林东和我曾多次在吃饭时候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每次争论的都是由于对某个有名的干部或著名的群众组织的评价的改变而引起的，以山西省原革委主任刘格平为例。1967年元月中央把刘当作卓越的革命干部，全国各地学习的楷模，而公开进行支持，而1969年中央却突然免去他的职务，把他清除出山西省委，并调到外地去做无名的工作。我们的良师益友，李英奎副司令员争辩说刘格平涉嫌参与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被称为“五一六”集团阴谋事件，并暗示这是北京中央所持的观点。

在评价刘格平问题上转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时，问题出现了，应该把哪一个评价看作是是正确的，先前的肯定性评价，还是后来的否定性评价？

根据林东的观点，两种评价都是正确的。这倒不是因为好人变成了坏人，由于刘结果不好，所以他一定向来就不好，而是因为中央的决定永远都是反映了客观现实。如果就某个问题所作的新决定显然和旧决定完全相反，只要每个决定都是决策者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所有有关资料作出的，她坚持说，新旧决定都是正确的。根据新的更加全面的资料，旧的决定可以修改，甚至可以翻案，但是不管是修改还是翻案，在其决定作出之前都不能改变原决定的效力。

不考虑有关个人和组织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所有问题，也不考虑有关情况变化可能引起变化的所有问题，对于有关人或组织的材料总是近似的看法我确实没有异议。新材料可以加深对各种结论的理解，引起修改甚至完全改变各种结论。在我看来这是进一步证实了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主观性，以及收集足够的有效资料来得出接近客观真理的结论的困难性。但是根据林东的近似材料观点，如这种材料是某一时期中央所掌握的最佳材料那就意味着客观真理。根据新得材料所做的新决定，即使完全推翻了旧决定，也同样意味着客观真理。

我所看作是对人的意识之外的现实所作的两种主观评价，随着材料积累而不断改进；而她却认为是由时间所分隔的两种客观真理，每种客观真理在作出评价的时间之内是正确的，在她看来，似乎中央根据所获得的最佳材料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对于任何党中央决定几乎都具有同等效力是完全适用的。正如随处可见的口号所歌颂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们从来也未能跨越这条鸿沟，无论是思想上的探讨还是实践。林东觉得我不懂得真理的辩证关系——真理如何发展和变化，而我却感到她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世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或人对他的认识之外。我们俩都认为现实是发展变化的，但是我感到她所说的话根本不是变化中的现实而只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在改变。她混淆了真理与人脑对真理反映的关系。

如果这仅仅是一场哲学辩论那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林东把她的真理观，她的“现今绝对正确论”，应用于张庄政治工作中。她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计对张庄潜藏着极大的危害，比如说，如果实际上这样的阶级敌人不存在，或并非乡村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那么发动全体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有什么益处呢？

反复考虑这种形势时，我不禁惊奇地感到现在的形势与1948年4月形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早期的工作队干部就如何处理张庄四位老大难干部问题发生分歧，有些人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砸碎“烂苹果”而其他人却强调挽救他们的必要性。1948年从大学来的知识分子戚云和谢虹主张用对抗手段，而《翻身》里沉默寡言的沙市村的侯宝贝却主张通过教育进行挽救。那时地区党领导王谦同志强烈站在农民侯宝贝一边。他主张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来挽救四面受敌的四位干部。

我问自己，今天的王谦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昨天的王谦在哪里呢？据谣传，那位耐心而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已在山西省身居要职，只是1967年才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赶下台。据说，他被下放到某个乡村亲自种庄稼去了。又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在当地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大革命”就像险恶的阴霾一样，整个地平线都被它笼罩了起来。

第七部

炮打司令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六十四 整顿

天一亮，宣传队员们就习惯地在陆家院里集中，进行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尽管清晨天气有点冷，他们还是宁愿坐在门外，观看第一束温暖的阳光，而不愿挤在潮湿阴暗的土坯屋子里。这屋子是陆家借给治安主任老申和王腊肉住的。洞穴式的屋子即使在正午，也难以见到阳光，而且，不到晚上是有人在炕下烧火的。

“文化革命中，山西的名人都倒台了。”治安主任老申说，语音里带着惋惜之情。

“确实如此，”高法官说：“只要你点一点，就知道了——薄一波、安子文、彭真、李雪峰，他们都是作为走资派下台的，山西好像是最倒霉的。”

“唉，”老八路、市委干部老王说：“这期间也有几个山西人升起来了。”

“谁呀？”小李问。

“怎么，纪登奎算一个，他是武乡人，离我们这儿不远。那是太行山最老的抗日根据地。他1948年南下，最后当了河南省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支持红卫兵，毛主席接见了，把他调到北京去，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知道另一位高升的山西人，他是坦桑尼亚副领事。”治安主任老申说。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山西干部都下了台，”王老兵说：“还是有几个高升了嘛。”

“这不顶多大事，”高法官¹闷闷不乐地说：“山西人在解放咱们国家时起了那么大作用，现在有名的人都有问题了。”

一阵评论之后，接着是一片寂静。局势变动这么大，山西人都感到灰心丧气。他们从襁褓中就养成了故乡的荣誉感，很可能把它保持终生。

¹译者注：高法官，文革前长治市的检察院检察长。

在场的宣传队干部一共10人，有的坐着小马扎，有的坐在砖块上，或干脆蹲下——这是他们学会的一种姿势，只要需要，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是代表长治市委、市政府到张庄检查“文化大革命”的，并要从大混乱中挽救出一些东西。他们继续留下来整党，并重新组织村委会，如果可能的话，要确保大队建设和生产取得一些进步，因为至少十多年来，这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我女儿韩琼和我坚持每天早上参加小组活动，从未间断。这种非正式讨论，进行得活泼热烈，披露了生活和政治的方方面面，这是我們不可能希望在一般情形下遭遇，或者偶然发现的。

1971年9月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北京来的头儿和指导员林东，前天在街上扭伤了脚，躺在床上休养。小组会上大家发言滔滔不绝，比平常轻松自如多了。林东参加小组讨论时，人人发言都得小心谨慎，因为她可能会把他们的话捅到北京去。在那种情况下，最好三思而后言，或者干脆一言不发。由于林东不在场，没有这样的拘束了，似乎没人在意他们的话是否会传到美国。无论如何，美国又能怎么样？他们没有想到试问一下，如果这些话传到美国，中共中央会有什么反应。而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讨论的正式议题是《人民日报》8月27日社论。地区师范学校青年俄语教师小李朗读社论，她留着剪发头，作为一名大学生，她是宣传队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经双方同意，通常由她宣读重要文件。该社论论述有关党的建设问题。第一段，宣布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市都成立了党委会，这是一个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是以各地党委靠边站而开始的，饱经了“文化大革命”分裂动乱之后，新建立的党委会为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

这个好消息，小李朗读得非常通顺、准确，大家对最后几个省委会成立的日期和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的干部，热烈地交换了意见。小组里从未有人听说过西藏党委新的第一书记任荣的名字，而且他们对曾长期在黑龙江身居要职的潘复生，不再是该省领导班子的成员而感到吃惊。他们看到取代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华北区领导李雪峰，没有在河北省委获得一席之地而感到遗憾。大多数著名的地区领导人，由于榜上无名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宣传队干部匆匆把姓名过目一下——陶铸（华南）、李雪峰（华北）……因此，得出结论，所

有干部和李雪峰，以及高法官了如指掌的其他的山西籍干部统统“下台了”。

当小李宣读第二段时，激起了比第一段更加热烈的讨论。本段强调了整党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必须再过一次整党关，由其同事，以及人民推选的代表把守“关口”。

“文化革命是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王腊肉说：“这点很容易忘记，但是确实如此。”

“对，”曹福贵说：“但是，文化革命和我们以前参加的运动都不一样。过去他们常说‘整顿，整顿’，但是谁挨整？只有平民百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区书记从未挨过整。可是，这一次学生把矛头对准了领导干部，这就是他们倾巢出动，镇压1966年的学生运动的原因。”

“记得王承（1966年任长治市委书记）吗？”小李说，“他老婆是一个中学老师。当学生们起来反对她时，王跑过去不让他们讲话。”

“对，他命令把全市墙壁上全部刷写上大幅毛主席语录，”老申说：“就是要群众保持安静，谁胆敢在毛主席语录上去贴标语呢？”

“从那以后，形势发展的够快了，”老八路王说：“我记得一次高层会议学习毛泽东思想，两个师范学生把会议打断，说他们代表‘红色妇女支队’。‘你们说你们支持毛泽东，可是你们的所作所为是镇压人民’，她们喊道。没人敢质问她们，但是后来，我发现她们的‘红色支队’只有两人”（她们只代表她们自己）。

“一段时间里，青年人是当家作主的，说啥是啥，但是他们的宗派主义败坏了一切，”王腊肉说：“我知道一个儿子反对他父亲，父子俩争吵时，儿子竟打了父亲一个巴掌。”

对老王来说，这个消息比张庄¹四队麦场上用枪打死一个学生还要糟糕。

“我认识的一对兄弟，站在两派，”王老兵说：“他们的父亲死后，他们达成了停战协议，以便弟兄俩能一同回家奔丧。但是，在回家路上，他们争吵起来了，不得不分道扬镳，然后，隔日再回去尽孝志哀。”

¹译者注：山西省长治市郊区的张庄，韩丁习惯称张庄为“Long Bows——长弓”。

“唉，没有人能袖手旁观，”老申说：“你不参加这一派，就得参加另一派，走中间路线是不行的。有一次一位市里的干部来到马厂，他说‘我听说他们在调查一些大字报问题，请过问一下此事，我看他们好像是中间派的标语。’他说‘中间派’！你听说过有这种怪事吗？就是有中间派，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或者是土崩瓦解，发生分裂，或者全部倒向这一派或那一派。”

大家都认为整风永远也不会结束。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三番五次发动这样的运动，但是，每个不同历史时期，整风的内容各不相同。1948年中心任务是每个干部对土改的态度问题，然后1952年是对合作化的立场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开门整风运动，涉及社会觉悟的教育，但是，许多干部对此却不真正理解或接受。

“记得王新年³吗？”王老兵问：“他顺顺利利地通过了“四清”运动，并就此写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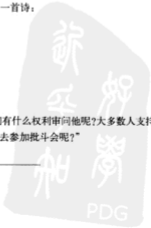
六五年来了大四清，
工作队来势汹汹，
背靠背，面对面，
“四不清”罪名满天飞，
运动猛整搞一年，
谁能毁我一毫毛？

“1967年，安阳村民突然批判他时，他无法理解，由于正逢他的生日之际，他又编了一首诗：

正月初一是新春，
春节生日正相逢，
半碗米饭未吃完，
拉上大街去批斗，
牛头马屁行行站，
佯装伸冤为群众。

“牛头马屁股，他们有什么权利审问他呢？大多数人支持他，少数人有什么权利把他拖出去参加批斗会呢？”

³马厂公社安阳村的支书。



“好啦，这就是李快腿、秦快嘴和王文德现在的想法。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人竟然有权批判他们，”高法官说：“他们不理解‘牛头马尾’，有什么权利质疑共产党员。”

零零碎碎的传闻，必然地，也间接地一步步把我们引进“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决定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有步骤地认真了解“文革”。在紧急的“三秋”生产任务之间，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从乡村到城市，到地区和省，最后一直到首都北京。各级提供消息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披露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为我们了解实情，打开了一条条裂隙。这些事件如此离奇，如此混乱复杂，甚至小说家都无法凭空想象出来，记者也无法对此类事件进行详细的报道。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意义，在后面几章，我们还是对我们所能大致构画的，“文化大革命”惊涛巨澜中的几条小支流，以及我们所能记录的一些人物的故事和一些事件，进行了描述。

六十五 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

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人小工商业合作化，最后出现与国营企业、商业贸易和金融合并的局面，这样，几乎把私有经济完全排除在国民经济之外。中国领导人有某种理由说，他们从经济上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上层建筑的革命性的改造上来。

毛泽东并不认为工厂国有化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从而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只有进一步对社会关系、组织结构、文化艺术以及思想意识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巩固刚建立的新社会，并把它向前推进。而反对者声称，新确立的先进社会生产关系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生产力的不适应，是中国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则提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受旧传统束缚的社会机构，仍然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他认为由官僚阶级掌握党和国家机器的存在，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似乎这种机器更有可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正如迈斯纳⁴总结的那样，毛泽东基于两个前提：“其一，党的上层官僚集团，凭借他们的权力和在国家机器中的威望，正在从物质上获取特权，剥削整个社会，事实上，他们变成了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特权是基于政权而不是财产……其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机构，在维护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从中获得特权，因此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愿意容忍（或者甚至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在社会上自由泛滥”。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路线，使他直接站在了中国大部分当权者的对立面。他三番五次地直接号召人民，发动群众运动来对抗他们不满意的现状。这些运动，或者绕过保守的经济专家和组织管理人员所赞同的“正常”程序，或直接向他们的经验和控制提出挑战。

“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都未能实现毛泽东所制定的目标，直接导致了庐山会议（1959年，译注）的争论。在庐山败于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毛一边强忍着怒火，一边在为重整旗鼓作准备。他给对手留以足够的时间和权力，让他们自己犯严重错误。在林彪的帮助下，毛集中精力在部队建立强有力的势力，以确保日后采取行动的自由，而且集中精力搞“毛崇拜”，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

正如我们所见，毛的第一个反击行动是“社教运动”。当社教运动不能粉碎刘对党组织的控制时，他决定采取更加大胆，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毛没有像在庐山威胁的那样，要重回乡村建立新的游击队，重新进行农民革命，而是于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击。为了与空前的局势相配合，毛创造了独特而更加可畏的方法——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政治攻势。由于没人听说过这样的“革命”，开始大部分人并没有认真加以重视。他们认为毛发动了某种持久——但是温和的教育运动，一种新的能产生过多的讲话和文章的整风运动，而在真正解决社会或政治难题方面，却不会有什么作用。

就毛而言，他发动这场运动，是以谨慎方式由上海作家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姚指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这个剧本，决不是它作为掩饰的历史描述，而实际上是对毛解除彭德怀元帅职务的攻击。这种指责确实接近事实。姚继第一篇文章发表

⁴译者注：迈斯纳是Maurice Meisner的音译，著有《Mao's China and After》（《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pp.345-55）。

后，又几次批判北京作家邓拓并无恶意地命名为《三家村夜话》的一系列文章，邓指责毛患了健忘症，建议用无锋刃的工具撞击他的头脑，以使他恢复记忆。

这些文章激起了对海瑞历史作用的某些学术争论，以及关于教育方针的论战。与此同时，毛说服他的重要靶子之一，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长的彭真率领五人小组负责建议中的“文化革命”。彭利用自己的地位，批评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但是，毛借助部队的支持，发出旨在针对彭真“黑帮”的连珠炮似的论战，进行了反击，解散了五人小组，解除了彭市长、吴晗副市长、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全国文化工作的周扬的职务。然后，他推荐值得信任的同志李雪峰任北京市市长，并重新任命了全新的“文革小组”，由自己的老秘书陈伯达、他的夫人江青，以及长期担任安全部门首脑的康生领导。采取了这些措施后，毛重新确立了他对北京的权威，以使所有的媒介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毛处在全国神经中枢，对他挫败而处于下风的对手，进行只能称之为突然袭击的进攻。给予他们一点警告，或者没发什么警告，毛就支持号召学生起来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而引发一连串以后无论是毛，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事件。

在农村，干部和农民在苦苦进行着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大四清”，而没有太注意北京的事件。然而，当毛的“文化革命”突然以公开的政治运动方式突然爆发时，他们再也不能不熟视无睹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6名职工贴出大字报，指责大学校长的反革命活动。他们揭露陆平校长禁止群众集会，下令撕毁大字报，制定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进行战斗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粉碎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控制和阴谋，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以北大哲学系女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一群干部提出的行动号召，使全国警觉起来。

陆平和北大当局的反应是，发动多数师生员工，反对造反小组，把他们拉到群众大会上，谴责他们为反革命分子。最初的大字报是5

月25日贴出的，一周的尖锐对抗之后，于6月2日令人吃惊地结束了。因为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让全国人民阅读，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广播，似乎毛主席事先已亲自研究过，并完全赞成这张大字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在全国进行广泛宣传。³

这张大字报具有独特的效果。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并在报纸电台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大字报就相当于代表各地学生，号召起来反对他们认为是保守的修正主义，或反革命的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首次广播几小时后，不仅大学生，而且中学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纷纷行动起来了。由于6月2日对聂的大字报内容进行了广泛宣传，文化革命波及到中国所有地方，包括每个县、区和社区，其中也包括山西长治潞安中学所在地张庄村。这个中学的校址就是过去天主教的育婴堂，那里，好战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向校方提出挑战。

1966年6月初几天，确实是学生们欣喜若狂的时刻。造反证明了他们的行动。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要横扫中国一切陈旧的反动的东西，为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开辟道路。然而，随着事态的实际发展，第一阵欣喜若狂没有能维持多久。6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进行巡视，把指导文化革命的权利交给刘少奇手中。对于学生造反，刘少奇的反应是派出由北京市委组织的市直干部的工作队，进驻首都各大、中学校，要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些工作队的真正目的很快就清楚了，他们是要遏制学生运动。在极其激进的华丽词藻掩饰下，他们关闭大学校门，禁止张贴大字报，号召所有师生员工闭门进行政治学习，并鼓励大家在他们中间找出反革命分子。众所周知，这种策略的结果，在社教运动中就是把批评的目标从干部转移到群众身上，把民众发动起来，互相检查揭发，扩大打击的目标。那些响应聂的大字报，用他们反对陆平的材料发起猛烈进攻的学生们，突然遭到激烈的批评和压制。此时轮到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了。他们从工作队获得这一顶帽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进攻了陆平，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把注意力从富有吸引力的目标身上转移开，以便集中精力纯洁自己的队伍。

³译者注：确切说，大字报应是6月1日晚广播发表的，而且由7人署名，不是6人。

工作队时期维持了50天，直到毛从南方归来为止，后来被称之为“50天白色恐怖”。对这种“白色恐怖”的不同反映形成了学生运动分裂的基础。这种分裂不仅对学生本身，而且对随他们卷入冲突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数千万农民都带有毁灭性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清华，其它主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坚持造反的大多数学生，不顾工作队的一切攻击、诽谤，开始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先锋。这些早期“造反派”，把那些分不清谁是（所谓“右派”的学生挑战者）谁非（镇压他们的工作队）的学生，把中间派看作是机会主义者拒之门外，把那些忠心支持工作队的“保皇派”谴责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派，因为后者认为工作队是代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然而，这些被弃绝或被遭谴责的大多数师生员工，不论他们在那“50天”内的立场如何，毛一旦阐明了运动的目的，并清楚地表示支持后，也于八月奋起，要求革命。

此时，呼吁进行团结为时已晚，团结在清华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周围的那些“50天”的斗士们，抛弃了那些所谓“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们”。这些姗姗来迟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一旦成立，便和早期的“造反”对手就为对革命的贡献和可靠性问题展开热烈竞争，但是面对蒯大富发动的反对他们的攻势，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组织。普通成员逐渐退出原来组织，而参加蒯成立的“第三司令部——清华井冈山”，从而有效地掩盖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各种区别。但是，1968年就清华园控制权的冲突公开爆发时，“清华井冈山”内部两派一决雌雄。每一派队伍中都有早期和后来参加革命造反的师生员工和其他人，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和“50天”期间进行的选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吸收——还是弃绝那些被打倒的教职人员造成队伍分裂。

晋东南地区有4000名中学生，300名大学生，大多数都在长治市内和周围地区。对他们来说，1966年春天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有组织地学习批判有关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夜话》作者邓拓的系列文章的问题。上海的姚文元一旦把这些作品谴责为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后，举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界没有研究原著，而是研究姚文元否认和嘲弄这些作品的过激的论战文章。他们在这种政治学习中没有发现什么新鲜或陌生的东西，旨在教

育人民提高觉悟的系列政治辩论，前几年已生气勃勃。这次运动尽管以北京副市长和北京散文名作家为靶子，但在性质上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

4月，整个北京市委突然改组，彭真、吴晗下台。大家意识到，辩论可以超出纯理论问题范围，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也同样与此利害攸关。但是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以前曾有过高岗、饶漱石事件、彭德怀事件。因此，首都之外，直到6月初聂元梓大字报的出现为止，学习一直是风平浪静地进行着。

与下面情况性质不同的是，六位持不同意见者向师生员工发出公开造反的号召，毛声明“造反有理”支持他们的运动，作为响应，首都整个教育系统处于激烈而不可逆转的动乱之中。

长治中学当局害怕本地学生的直接挑战，起初号召开展学生运动，反对某些压制过工农学生，或政治社会关系有问题的教师，以千方百计安然度过这次急风暴雨。6月14日发起的这场大字报浪潮，仍按计划进行，直到“6.23事件”突然发生为止。那天，长治一中的一位物理教师把批评的“矛头”不是指向某个普通教职员工，而是指向一校之长——张书记本人。校方立即谴责了这张大字报。他们把这位物理教师和有关联的人统统赶到图书馆监视起来，并发动其他师生员工包围了图书馆，批判这些孤立无援的靶子。这样，长治师生员工以及政府领导，事实上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5月25日到6月1日发生在北京的事件。这起事件发生在聂元梓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之后。

当地报纸把发生在一中的整个事件谴责为“6.23反革命事件”，长治市委别无它选，只得派出一批干部进行调查。当他们开始工作时，一系列新闻和评论，潮水般地从北京涌来，清楚地说明压制学生运动就是最严重的错误。在调查过程中，报纸把“6.23事件”的报导中“反革命的”删掉了，很快“事件”本身在头版新闻中也无影无踪了。斗志昂扬的学生和共产党领导，在相对心平气和的气氛中对峙了数日。所有的班级都停了课，大字报运动暂时取消，没人敢决定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然后，7月份两起互不相干而又有关联的事件凑巧一起发生了。首都士气高昂的学生，受北京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来到长治，急不可待

地促进真正的地方造反运动。同时，长治市委效法北京市委派出工作队进驻各学校，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中的两派新生力量，都选择了校支部书记老张作为批判对象。他们把一顶高帽子紧紧扣在他的头上，让他在校园示众供人批判、嘲弄。他们指责他玩忽职守，支持上山打鸟玩乐，任用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当教师，压制学习毛泽东思想。

如何对待张书记的问题，使师生员工发生了分裂。团结在物理教研室组长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慷慨陈词反对使用戴高帽，反对使用武力。同情那位策划“事件”的物理教师和另一群师生员工，却立即斥责这位组长及其追随者为保守派。他们把高帽转而又戴在物理组长头上，就像几天前对待张书记一样，让他在校园里游行示众。

在毛从南方归来一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派出的工作队，于7月28日撤出所有校园。8月5日长治市委派出的工作组也不声不响地撤走了，而留下的则是一个严重分裂的校园。站在一边是称作“要武大队”的一派师生员工，站在另一边是自称“红色风暴队”的同样数量的师生员工。

“要武大队”尽管顾名思义倾向采取极端行为，不反对头戴锥形高帽游行示众，但实际上却没有组织过任何暴力行动。这个名字来自发生在天安门的一件小事。8月18日，当毛泽东首次接见云集北京参加声势浩大的百万人集会时，毛泽东曾问一位热情的少女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这位女孩子回答。

“宋彬彬”，这位主席若有所思地品味着文静的名字，这与目光炯炯的女青年挑战神态之间形成对比和反差。“你父亲怎么不叫你‘宋要武’呢？”

从那时起，“要武”成了全国上下激进派最流行的名字。

为了不让反对派战斗精神占了上风，另一群学生坚持说他们也要革命，选择了“红色风暴”的名字。

后来双方都改了名称。“要武大队”在和若干小组合并后，决定叫“红联”，而“红色风暴大队”合并后改成“北京公社”。但是理智的名称，没有使他们变得理智起来。之后两年期里，两派间的分歧扩大，尖锐化了，像首都的范例那样，为控制各自的校园，以及各自城市而发生了公开的武斗，直到最后被解散为止。

张庄潞安中学的事态发展，与长治一中的活动密切相关。

潞安中学只有高太生、王老师两名理化教师领导了首批“造反派”。而“保皇派”则暂时和他们的校长——反对派称之为“范地主”的范秀奇站在一边。支持高和王的人，简称自己“红卫兵”。而支持范校长的人称他们自己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张庄学生和长治学生联合时，“红卫兵”与“红联”合作了起来；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和“北京公社”联合了起来。

六十六 文化革命“十六条”

正当这些地区学生组织不断成立，组织之间分歧明朗化时，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发布了一个最重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这个特别文件，聊胜于无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框架，指出了“文革”的动力、目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特别强调了已经出现的种种过度行为，并提出了一些特殊问题，如：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军队、学校的作用问题，最后号召普遍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主要段落用各种方式反复重申中心问题，伟大的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向一切阻碍改造社会的事物挑战，参加激烈的斗争和认真的辩论，在实践中学习，不仅要使自己摆脱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犯有命令主义错误的干部的控制，而且要破除剥削阶级的一切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以便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风俗、文化和习惯。而且，根据这个问题推断，党的领导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自己被赶下台，被免除职务，都不能阻碍运动，而应该欢迎它、帮助它，并把它推向前进。

第一条的第三段强调阶级斗争，值得全文引述：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

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决定》接着赞扬已行动起来年轻人，为他们过度行为和错误作辩护，认为这是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经验缺乏的青年人不可避免的缺点，并进一步确定了斗争主要推动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在斗争过程中和曲折中会被冲垮，而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会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决定》谴责了那些利用各种手段阻碍运动发展的党的领导人。有些人是因为对所有的新的挑战感到不知所措，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便怕人批评，有些人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怕群众揭露打倒他们。相对之下，《决定》高度赞扬了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批判和揭露的领导干部。“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第四条强调中国人民群众需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会使人民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第五条确定运动的重点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也规定斗争对象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革命派应该善于发现和发动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孤立这些敌人，以便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革命派还应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和做过一些错事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把“学阀”或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同具有一般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革命派也应注意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决定》认为人民之间的不同意见为正常现象。意见分歧应该通过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问题。革命派也应该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因为当局几乎都普遍把初期造反的学生攻击为反革命分子，把造反派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攻击他们的借口，第七条特别警告随便使用这种伎俩的当权者，称惯用这种伎俩的人为“扒手”。

第七条指出，许多当权者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口号是路线错误，并且严厉批评了这种态度。

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罪行外，当权者一律不准动用法律手段惩治学生。此文件宣称持有不同意见决不能划为犯罪行为。

第八条再次明确了运动对象，该条把干部划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犯有错误但不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大多数干部为前两种人。革命派只应该揭露、批判、斗倒最后的一种右派分子。即使如此也应该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九条确定许多学校、许多单位已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文化革命的组织形式。该条称这些组织为“革命的权力机构”。学校中成立的这些组织以学生为主，也应有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因为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期，因此，这些委员会组织应是常设的群众组织，不应当是临时性组织，而且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定期的全面的选举制。

第十条把教育改革看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并且列举了几个明确的目标：“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决定的最后几条号召通过批判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进行思想教育。但是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批准，有时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另一条要求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都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革命派应该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和作风。另一条宣布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是文化革命的重点。农村应该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适当时候逐渐与文化革命结合起来。《决定》规定文化革命的总目标是通过思想革命化，使各条战线尤其是生产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多、更

快、更好、更省。”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另一条明确规定部队不参加群众运动。陆、海、空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按照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最后一条，第十六条，号召在工农兵、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要遵守毛泽东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尽管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已有所了解，再回顾一下这个文件，你必须承认此文件仍然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惊奇的事物，哪里曾有过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批判揭露一切似乎阻碍他们前进的东西，号召人民清除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呢？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一次广泛的、决定性的整党运动，一次发动亿万普通人民，摆脱一切现存当局束缚，允许人民用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改造他们党的领导，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活的运动。

至少在表面上，作为这个号召的基本前提是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他们要真心诚意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相信他们一旦发动起来，会千方百计揭露批判一切干扰这个目标的东西，千方百计重新组织教育他们自己学习，以便实现这个目标。

而且，表面上，毛所采取这种非凡步骤的决定是因为为了解决基本路线和方向问题，以前开展的历次有限的群众运动、整党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据报道，和毛在1967年2月所说过的一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1966年由于学生运动的高涨，由于从学校到政府机关和工厂，革命群众组织的普及，由于《十六条》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宣传，党和人民似乎已经最终找到了这种方法。全国人民怀着深深的兴奋和乐观的情感。他们意识到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在眼前，而且只要亿万积极分子起来反抗，只要他们坚持斗争，未来的中国保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中国人民确实能把那著名《决定》的十六条付诸实践，如果他们能通过辩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解决各种争端，如果党的积极分子能够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孤立、揭露、开除一小撮被叫作“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的人的职务，那么中国人至少是会取得部分胜利，会清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障碍。一方面，庞大、日趋无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威胁着每个人；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言，身居高位的反对派，在暗中破坏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努力。由于几乎不可能期望那些当权派进行自我改造，为什么不把此事交到普通人民手中，帮助他们整顿党和国家呢？在现实生活中，重建中国决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文革”一开始，没有人提出一个划分“走资派”的客观标准，人民对斗争对象发生尖锐分歧，于是很快就开始了相互攻击。

第七条强烈反对“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或学生互相斗争”，而事实上这正是在发展过程中自由泛滥的事。哪里爆发了造反，那里的普通群众一旦推翻了当权派，那里的群众运动就一定会发生分裂，造反者就开始互相争斗起来，并不是因为未来新政权的形式，而是为实际上谁执掌大权。

《十六条》所警告的消极现象，除了极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急剧增加了。第六条清楚地指明“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第五条明确指出“不应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却都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相混淆”，以及“不要把资产阶级学阀与有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普通学者混淆起来。”

但是这些混淆现象几乎一哄而起。在野心勃勃的活跃分子的花言巧语中，轻微的人民内部矛盾迅速升级为敌我矛盾；他们把成千上万犯有若干错误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把数以千计的教师、专家，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政府在全国各地广深入宣传《十六条》，鼓励亿万人民学习《十六条》。值得怀疑的是，人民群众对其他文件是否也像“文化大革命”、“宪章”一样进行了如此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但是对于这个纲领，人们在各取所需。他们利用文件中的各段不同的内容来证明他们所作所为的合法性，特别是毛泽东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

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之后，这种局势加剧了。根据这个定义，一派的人很容易认为另一派实际上并不代表一部分人民，不代表另一部分民众意见，而是代表可憎的国民党，因此他们应该利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彻底把他们击败，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显而易见，不同团体的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此时被误认为或蓄意宣传为敌我矛盾。

“文化大革命”一旦开始，自发的和精心策划的敌对行动，就几乎席卷全国，但是，这些敌对行动即使也有极少反映什么原则问题。不论是北京还是外省，最初的分裂，主要都是由于各团体根据各组织成立日期先后，争议其革命合法性而引发的。首先企图改变现存状态的造反派和后来同样造反的人发生分裂。当然，这些似乎是事关重大的问题。由于一开始造反时的人危险性更大，因此率先奋起造反的人认为这是他们最有力的革命凭证。由于他们希望优先夺取一切权力，所以他们不愿和那些“文革”开始持中立，甚至一度仍效忠旧有体制的人来往。一旦后者决定参加革命就别无他法，只有成立自己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一旦成立，往往在对立中，对那些领先于他们的人持强硬的态度。

毛泽东首次南方巡视回京后，号召所有的群众组织与好的或比较好的教职员和干部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的估计，大约占总数的95%），但是他的号召只是加深并扩大已经存在的分裂。因为这些竞争的人，对打倒的教师和干部的估计无法达成一致。一派认为是优秀革命家的人，而另一派则看作是无用的修正主义者；一派认为犯有错误但可以改造的人，另一派可能被谴责为反革命分子。随着分裂的加深，仅仅依附于任何一派就可引起对立一方的谴责。如果某个教师响应——比方说踏安中学红卫兵的建议，同意和哪一团体合作，另一司令部的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会自动地反对那个教师，并深入调查，设法找到任何反面材料，与其说使个人名誉扫地，倒不如说使个人所参加的集体组织的名誉扫地。查寻反面材料制造反面材料，仅仅是一个很短的阶段。在后来竞争合法性的过程中，捏造和反捏造充塞了议事日程。学生不同派别之间的对抗行动的激化，经常导致最终只能以武斗结束冲突。“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争端，陷入一片

暴力与反暴力的泥沼之中。基层单位，市、地区、省以及全国都投入一片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每一派都为夺取并掌握大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确保另一派永无翻身之日。

毛把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谴责为资产阶级派性——说是资产阶级的，因为斗争不讲原则立场，因为这种斗争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控制市场，为争权夺利，各种商业利益所进行的斗争一样。在推翻原有当局后，各派都感到他们，只有他们才有权上台掌权。而且，每派都使自己的追随者相信，如果他们团体失败，毛泽东就不能指望在北京保住自己的位置，从而将威胁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这种貌似坚定的革命理由，实际上是用似是而非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自己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因为那时只要一两个人登上权力顶层，多数人机会渺茫，而顶层又暂现权力真空。

上述描述暗示，宗派主义倾向自下而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是基于当时群众的觉悟。宗派主义确实在草根阶层爆发，大部分是因旧家族、小团体、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竞争对抗的死灰复燃，但是也有理由认为，要不是北京中央内部对立集团自己为争夺最高领导权，企图获取巩固自己反对别人的权力而必须具有哪种群众支持，派性这种现象是绝不会像那样泛滥成灾的。

只有那些天真无知的人，才会相信聂元梓的大字报是自下而上自然而然产生的。她和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写那张大字报，是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的，或者至少得到了和毛关系十分密切的几个人的支持，包括当时他宠信的将军林彪，他的终身私人秘书陈伯达，及其夫人江青。⁶

在北京人所共知，早在聂“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之前，聂就罗列种种不满，反对陆平，而且为此她也吃过苦头。北京市长彭真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队，把她和她的同事们召集到国际饭店参加整风会议，并于1965年把他们在那儿关了好几个月。但是工作队所有企图改变或压制她的可憎观点和做法却失败了，因为这些观点得到了中央第二大权力集团的支持，而这是与毛主席本人意愿相违背的。当副大富作为学生造反者在清华脱颖而出，坚定不移地谴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

⁶译者注：作者的这段涉及高层多人与聂的大字报关系的推测，缺乏实际的证据。

镇压学生运动时，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一位投身革命理想主义、勇敢无畏的青年学生，而是与中央大权在握的人物有种种联系，这些人支持他、鼓动他，并为他提供作为斗争炮弹的消息。

当因为某种原因害怕动乱的高级干部，看到毛及其支持者有效利用学生运动和红卫兵时，他们迅速成立了自己的学生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以便他们也有争权夺权的群众基础。有些人走得甚至更远，现在似乎真相大白了。那些最终成为“四人帮”的人，早就看清了诸如此类的派别斗争对他们是多么有利可图啊。他们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只建立各种派别，作为支持达到自己特殊目的的群众基础，而是把无休无止、愈演愈烈的派别对抗，看作是阻止瓦解人民革命政权的理想环境，而他们鼓励把所有的大权转移到他们自己手中。因此，他们竭尽全力，愚弄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为各派提供相互争斗的武器弹药，对各派进行阿谀奉承，断言没有他们一派的胜利，革命绝不能进行到底，并源源不断地为各派提供诬陷对方成员的材料，这一些材料一旦使用，就可使另一派名誉扫地。

《十六条》妙不可言的言词，终于掩盖了可追溯到帝王时代自相残杀、利令智昏的斗争。普通当权者很快就掌握了“文化大革命”放纵的这种新鲜的或陈旧形式的混战，迅速领悟到利害攸关的首要问题。这就是也只能是：政权问题，并且领悟到这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毫不相干。中国整个官僚机器，开始不遗余力地玩弄历史悠久的把戏，一方面对上层卑言屈膝，看风使舵；另一方面为窃取一切地方权力或地位，对下面残酷无情、狡猾欺诈。毛批判彭德怀时不讲原则性，在他压制刘、邓时又故伎重演，为这场自由参加的闹剧，确定了战略战术的标准。因为《十六条》在人民当中享有某种声望，人人都谨慎小心地使用《十六条》的言词，而内行阴谋家则以不折不扣、达官贵人的方式，开始着手把一切阻碍他们自己飞黄腾达的人统统打倒。

尽管毛的纲领对建立新型的农村人民民主政治激起一阵激情和希望，但是，了解内幕者很快就发现，夺权掌权仍然是问题的核心，只要有利于实现那穷凶极恶的目的，任何事情都可通行无阻。正如北京一位干部坦率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演变为一场看谁能把谁送到干校的竞赛。”

毛准备“五七”干校，声称要对长期沉浸于城市官场，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的官员，进行政治教育。在干校，他们要和人民重新建立联系，进行体力劳动，种庄稼养猪，学习政治，批判修正主义，参加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承担重任，锻炼自己。然而，那些被有幸选中的干部往往发现，他们只是被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进行繁重的劳动，毫无希望把握自己的力量，以向把他们下放到干校的敌手发动反击。

只要发布的《十六条》所引发的无原则的混战局面存在，任何阶层搞好团结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能有个联合一致的学生运动，各地学校或许也会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学生运动。但是，由于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党核心内部争夺最高利益，分裂了首都的学生运动，使得全国其它地区的学生运动也注定要走向类似的分裂。反过来，这场分裂的学生运动又注定在其影响和鼓动下发展起来的伟大的工农群众运动，必然同样导致四分五裂。

六十七 从袖手旁观到赤膊上阵

一开始，这场四分五裂的学生运动对张庄农民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件。从1966年到1967年，仅仅是他们袖手旁观露天中学生种种稀奇古怪的“文化大革命”活动。这个学校位于张庄村中心，旧天主教堂院内。晚上农民下地辛勤劳动归来后，不得不倾听两派在高音喇叭上进行的无休无止的辩论。对许多农民来说，这种连续不断的广播，只不过是令人讨厌的侮辱中伤而已。在没完没了的喧闹的相互攻击中，人们怎能安安静静地聊天，考虑问题或休息呢？睡觉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有文化人的事，为什么不能文明点，不要打扰没文化的农民呢？在毛关于包括农民在内的人人都应关心国家大事声明的鼓舞下，其他一些人对学校进行的斗争也发生了兴趣，千方百计想从辩论中学习一些东西。

关心一下事态发展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双方的大喇叭经常同时广播，每一方都试图用超高音量压过对方，结果双方的喇叭声都相互抵消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广播设备一旦出了毛病，这样对方就

可趁机进行独家广播，他们十分重视这个机会。

大队支部副书记，农协主席郭真宽就是对此感兴趣的农民之一。如果他对“文革”不感兴趣的话，那他的处境可就糟了，因为他家正好紧挨学校，每个日日夜夜，他和他家人几乎无法充耳不闻从土墙之上不断传来的广播声，真宽谈论过那时的事：

由于我家离学校很近，我不得不听他们的互相指责。有一次我甚至卷入他们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一个名叫高太升的中学理化教师带领“红卫兵”去阻拦一些开往（部队）水泥厂的军用卡车。我们一些农民和几个工人看见了他们，看不惯他们的做法。学校的另一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不喜欢。于是我们联合起来去找高老师。他正在学校操场，由他忠实的支持者包围着，但是我们人多势众，一涌而上冲了过去，抓住了他。后来战士们批评了我们。他们说，动用武力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进行辩论，所以我们就立即展开了辩论，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我们决定要当场确定谁是谁非。我们批评“红卫兵”拦截军车，而他们没有什么好反驳的，最后解放军战士说他们想带走高和他们谈话，答应第二天把他送回来。但是高的支持者不干，有的抱他的腿，有的抓他的身子。军人们说：“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帮助他把事情考虑清楚，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还不能说服高的一派学生，于是军人们就让他走了。

后来辩论进行得确实紧张激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高喊：“打倒高、王（两个理化教师）！”而“红卫兵”派的成员反喊道：“打倒范秀奇（中学校长）！”那时人们常常谈论夺权，我们识字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的文盲却不知道“夺权”。你看见权站在那儿就夺过来？说不通啊。

中学生也同样非常重视夺权，“红卫兵”组织威胁要夺权。学校会计和看大门的人把学校图章看作就是权力，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俩各自把一枚学校公章随身装在衣袋里。看门人的妻子住在水泥厂，一天当她丈夫去看她时，“红卫兵”派的人在途中伏击了他。他们夺走了公章，然后跑回学校广播说，他们从学校的走资派手中夺取了权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伙人立即在大喇叭中咒骂他们，指责她们的行动是完全非法的——不是夺权，而是抢权。对我自己来说，我搞不清楚人们怎么凭抢走公章而夺取政权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他们正在相互辱骂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伙说他们的对手批判他们

的错误思想，要求他们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红卫兵”派回敬说，他们仅仅做了不得不做的事，这样他们吵闹着，两派都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指责对方。

在“红卫兵”组织夺取中学权力后，撤退到长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的一些人，从市里来寻找借口。他们在一位教师的桌子抽屉里发现了一幅刘少奇的画像。凭借这一条他们谴责“红卫兵”组织保护刘少奇。“我们在忙着准备打倒刘少奇，你们却在支持他！”他们乘大约二十辆配备有几个大喇叭大卡车而来。他们一发现这幅画像，大喇叭就全部启动宣布了这条新闻。为了防止“红卫兵”组织反击，他们夺取了“红卫兵”组织在中学所使用的大喇叭，而且还去村里夺走了“红卫兵”组织送给张庄一个农民组织的一只喇叭。原来，一个敌对组织的年轻成员，已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他们(长治的红卫兵)。

整个下午学校操场一片混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要重新夺回政权，他们到处搜寻公章。他们抓住一个姑娘，痛打了几个人，但是“红卫兵”派的人手倒手地传递公章。有一百多双手传递，长治人无法找到。最后他们带着夺取的两只喇叭和刘少奇画像撤走了。

长治人一走，各个学生派别开始互相指责开了。一派指责说：“你们保护像高一样的坏人？”另一派反指责说：“你们支持范地主！”晚饭后又发生了严重对抗。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辩论，其他人聚集一起只是旁听。根据毛泽东观点，任何人都不应咒骂他人，或动用武力，但是在这次辩论中两派都在咒骂对方庇护坏人。人们都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至少他们没有相互动起武来。

每天晚上，这些辩论一直进行到半夜三更。我们农民吃完饭无事可干就去中学操场，坐在场外听他们辩论。

郭真宽讲述的这些事件，尖刻、刺耳、荒唐、可笑，同时又令人可畏，一直持续到党中央作出决定，全国农民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才结束。不管你是否愿意，几乎一夜之间，中央政府的决定，就把张庄村民从袖手旁观者，转变为深陷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促使这种转变的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这个大标题下，小标题是“供讨论和试行用”。中央是在全国大部分秋收工作结束后，于1966年12月15日发布这项指示的。这就意味着严重背离了先前发布的官方文件，如：1966年9月

14日中央的一个指示强调，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是即将到来的秋收工作，并警告红卫兵活跃分子不要把他们的革命活动扩散到农村中去，或者深入到农村去（特殊情况除外）。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2月15日指示，开始用一段话激励执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并且告诫农民，“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并且“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根据规定，不派任何工作组”。该指示说，群众应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根据《十六条》结合社教运动期间所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所确定的原则精神。实际上他们应该把社教运动中的“四清”，转移到“文化大革命”的“轨道”上来，把所有遗留问题当作这场新的伟大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幸的是：这个文件强调并点出最后列举的“五类坏分子”，好像人人都知道这些人构成了1966年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主张，它为以后几年间出现的种种过度行为，诬陷，以及政治上走弯路，奠定了基础。

下一句话令人心情振奋，早期曾使北京和其他城市青年人兴奋不已，它鼓励人们砸碎纪念物、私闯民宅、损坏档案、焚烧书籍，并要求把“红色”作为交通灯指示“通行”的颜色——摧毁剥削阶级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和新习惯。这个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彻底改造的革命要求，变成了活跃分子攻击任何他们所厌恶事物的借口，经常导致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给一切事物强加上传统的封建主义标志。

在12月十条指示中的第三条，劝告农民纠正干部中间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执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这对保证合作生产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谁来纠正呢？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并逐渐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利用什么组织形式呢？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民主选出的贫下中农“文革”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通过群众讨论，带头重新组织，精简并选举生产领导组。即：农民应民主地重新评价和改造生产队。

另外，青年人应成立红卫兵组织。领导干部子女不应担任这些组织的领导，居住在外地的地富子女，也不应回老家建立革命联系，这一条禁令非常必要，因为下一条则允许城市的革命学生组成小组到农

村去，进行“革命串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要他们不垄断运动或包办代替，就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

第七点强调“大民主”即“广泛的民主”，规定为“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指示要求开展最广泛公开的，无清规戒律的，人人都可参加的民主的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斗争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这个口号的另一种说法是“坚持说理斗争，不搞武斗。”整个文件都反复不断地强调了这点。第七条还允许队与队、社与社之间进行革命的“串联”，同时警告反对“由坏人挑拨”的派性斗争。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文件中的所有条款在今天看来都带有一种幻想的、乌托邦式的风味，是革命初期带有天真无邪的理想主义东西。

为了能充分利用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文件要求公社，负责免费向所有参加“文革”的人分发纸张、墨水、毛笔和浆糊。

第八条，绝对禁止对表达过不同观点的普通百姓进行打击报告，特别是指出大队和社干部以克扣工分作为打击报复的常见手段。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破坏分子”的人应该受到保护。同时文件也指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群众专政的明确对象，禁止他们以“文革”的名义，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反，实际上这两条互相抵消了，因为在实践中，当一个不同政见者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压制他的唯一手段就是把他或她列为“五类分子”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根本没有人人要尊敬的权利，显然没权免费得到纸张、墨水、毛笔来反驳自己贴上的标签，来为自己辩护了。

第五条是有关教育问题。文件宣布学校立即放假一直到次年夏天。要求半工半读大中学校制定出自己的适当办法“抓革命、促生产”。第九条要求公社大队领导小学干革命。和著名的8月8日《十六条》最后一条一样，第十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号召结了尾。这种主张成为农村大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死记硬背，被一些地方当作著名的“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语录设置了舞台，死记硬背孔家教义的方法被运用到学习新文集——毛主席语录上。

张庄领导十分重视“12.15”决定，立即进行了贯彻执行，成立了

一个叫做“文革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和一个叫做“革命造反兵团”的群众组织，这个“文革委员会”由七名当选的代表组成，六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各选出一名。从理论上讲，每个代表都符合毛主席1964年驳斥赫鲁晓夫时，所确定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但是因为党支部严格坚持《十条》决定的原则，警惕包办代替，极力避免干扰农民的自由选择，结果选出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代表。最引人注目的是申大胡子。事实上，人人都把他看作是臭名昭著的流氓。他是第一生产队选出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主任周成乐(党员)、副主任林令奇(小学教员)、齐关胜、魏志光、怀腾鸽和李林丰为一般成员。

在这个新选出的小组领导下，七个队分别开会选择能加入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兵团”的人选。委员会最后通过了普通群众赞同的所有名单，凡是不受监督的公民不分男女都可成为该委员会成员。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填表说明自己的出身、职务，委员会只允许历史上没有污点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加入组织，甚至即使这些人也并不是都受欢迎，因为“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审查领导干部的又一道“关口”。委员会取消了干部、干部家属及其子女参加组织的资格，委员会还取消了“公安六条”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中的任何一类人，参加群众组织的资格。这些人包括自1954年以来革命政权监禁过的人及其直系亲属、包括子女，也包括1954年以来政权判处死刑人的直系亲属及其子女。

实行这些严格的标准，把大批的人排除在“革命造反兵团”之外，相当于承认曾鼓舞北京许多早期红卫兵组织的传统理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或更简明扼要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张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尝试，选出了一个仓促选择的，“文革”委员会批准的农民核心小组，反过来又得到了党支部的支持和信任。那些主要赞成维持现状的人，可以在已经大权在握者的监督下进行伟大的“造反”了。

对比之下，整个组织工作中的言词处处闪耀着革命的光芒。群众要奋起反对那些“走资派”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要根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残余势力。根据1967年元旦社论精神，工厂、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坚持让群众自己

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都不应自己包办代替。”此外，运动必须“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意味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亿万人民向社会主义的敌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批评和监督各级领导机构和干部”。当然如此大规模的民主必须由军队、民兵和警察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必须坚决地、始终不渝地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保证以正常的方式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大规模的交流革命经验。”

张庄党支部领导曾设想在学习了8月8日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和12月16日发布的农村进行文化革命《十条》后，“革命造反兵团”成员就掌握了“四大民主”，就会迅速完成文化革命。

“我们原以为，”那时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快聪说：“一个组织就够了，就可以解决“四清”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所有的干部问题了。”说得婉转一点，他纯粹是幻想。

张庄外边发生的事反映出：乡村有条不紊的“整党”运动已不合时宜了。从8月8日中央最初确定“文化大革命”，到年底，农民开始根据12月16日《决定》行动起来数月期间，富于战斗性的造反已从学校扩展到各级政府，和工厂、矿山、铁路、运输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大中学生一成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就开始串联。由于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可免费旅行，北京的学生向边远省区扩散，而外地学生则云集北京，参加声势浩大的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一次就接见一两百万学生。这些集会所产生的激情和伴随他们的宣传运动，很快摧毁了许多团体为反对红卫兵渗透而制造的种种障碍。学生和青年工人联合了起来，青年工人又与老工人和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很快中国的工厂、矿山、铁路、汽车站就像校园持续的情况一样，各种活动逆起，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上辩论之声震耳欲聋。当“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时（中国唯一大量的工人，本身就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他们居住的城市，与从农村进行招工的不同），政治运动很快冲破了只进行广泛宣传煽动、辩论、批评，以及进行揭露的束缚，从而转向了夺权。

张庄农民坐下来，按照五条标准讨论入选“文革”委员会资格问题的那一周，号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派上海工人和学生实际上已罢免了上海市长曹荻秋，华东地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以

及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党委其他官员的职务。报刊电台把这次夺权宣布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党政领导长期复杂斗争的高潮，是工人阶级的起义，人民对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胜利。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官方宣传掩盖了；至少一半上海工人阶级和学生联盟不赞同这种行动，并且很早就组织起来设法阻挡夺权。在这令人怀疑的例子鼓舞下，群众夺权成了当时的日常议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激动人心的言辞宣布于1月6日接管上海市。1月11日山西太原一群高级干部从他们上级手中接管了山西省。不久，1月31日黑龙江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动事件。电台、报刊对每次夺权都进行支持性的宣传，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下级推翻上司的可能性上，但实际上夺权的举动，非常类似一群上层人物反对另一群上层人物的政变，而不像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这种气氛下，张庄开展“文革”所采取单调的按步就班的步骤失败了。通过一系列井然有序的选举和吸收新成员而成立的“文革委员会”和“革命造反兵团”，10天后，两个组织都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七个群众组织。每个都由不同生产队组成。这些组织比政治上纯洁的“造反兵团”更忠实地代表了普通队员，而且队员们还确立了每个组织要攻击的具体目标，即：大队领导干部。七个组织在谁是真正斗争对象上意见分歧，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团体，但是他们像全国无数竞争的组织一样，合并入两个司令部。

这七个组织是：第一队的“保卫毛主席思想战斗队”、第二队的“保卫毛主席兵团”、第三队的“真理卫士”、第五队的“卫东”、第六队的“揭阴谋战斗团”、第四队“风暴海燕”和副业队“上甘岭战斗队”。头五个组织选择的名称和全国群众组织一样，而后两个“组织”却选择了更新颖的名称。“风暴海燕”是根据高尔基诗，著名的《海燕》而命名的。诗人观望着海燕，欢迎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就像革命者一定欢迎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一样。“上甘岭战斗队”是根据朝鲜一座著名山岗而命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部队，以悬殊的兵力在朝鲜中部山脉与美军进行拉锯战，在此坚守了几个月。

随着几个互为冲突的组织成立，张庄混乱而激动人心的时期开始了。激情萌发之时，所有七个组织用大字报向不同的对象发起了进攻。一开始，是在本队范围内，比如说，第四队的“海燕”抨击他们的队

长王文则的高压手段。副业队的申大胡子总是把自己还看作是第一队队员，他要攻击一队队长朱喜进和政治指导员齐寿喜。第一队内部的反对派已经把申大胡子选入革委会。“文革”委员会垮台后，他以副业队成员身份参加了“上甘岭战斗队”。但是当“上甘岭”9个成员拒绝向队领导朱、齐发动进攻时，他退出了“上甘岭”，在第一队内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在第一队造反。“上甘岭”尽管不受副业队长小申的正式领导，但是受其影响很深。

他们首先攻击了万无一失的斗争对象——受监督的四个“坏分子”：闫来生、林河牛、杨光红和秦保川，理由是，他们四人表现不佳。然而几天后，他们发动去反对更危险的复杂对象，他们参加了“海燕”组织的会议，帮助他们对付王文则，然后又召开群众大会对付党支部书记陆进军。

当他们攻击有威信的大队干部老王和老陆时，这些造反者使全村发生了分裂。由于“大四清”运动中免除了张兴发的职务，陆进军成了名副其实的张庄干部。多年来王文则不仅是第四队队长，而且还是大队治保主任。“上甘岭”战斗队一开始攻击陆、王，其他组织便起来保护他们。很快七个组织分成了两派，“上甘岭”、“海燕”站在一边坚持要打倒陆进军和王文则，而以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为首的其他五个组织都坚持要保留他们的职务。

1967年2月2日召开了一次批判王文则大会，这是由“海燕”和“副业队”、“上甘岭”主持的一次联合批判会。一开始他们只是指责王文则傲慢自大，多次拒绝批评以及惯用高压手段。但是一旦其他队的社员们决定打倒他，他们就提出了其他潜藏的更严重的指控。有些人说他和反革命分子拉拉扯扯，因为他盖新房时，向受监督的坏分子林河生借过粮食，接受过同样受监督的闫来生送去的一盒饼干。有些青年人指责他态度有问题，对毛主席不尊重。就在几天前张庄上映了一部描写毛泽东在北京群众集会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电影，这部电影使人们群情振奋，尤其是青年“在电影上看到毛主席就像我们自己亲眼看见他一样。”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去北京亲眼见到他本人该多好啊！”

“那又怎么样呢？”文则说。他对青年人不好好干活，一直谈什么革命，革命，大为不满。“就是你们见到他又怎么样呢？看一眼既不顶

吃又不顶穿，你们还得在这儿受苦。”

青年们说：“这决不是一个贫农该说的话！”

王文则在大会上傲慢自大依然如故，拒绝接受社员们的任何批评，一些青年人非常愤怒，气氛十分紧张。“海燕”的队长、郭真宽的前妻所生儿子郭民恩主持了会议，人们统统写纸条提问题，一交上主席台，郭民恩就大声朗读。

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影响了张庄“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进程。1971年就这次事件我就听到几种不同说法。有些人说写在纸条上的问题被郭民恩扯掉了，而其他人则说这个问题是从会上传来的，是由臭名昭著的投机商、单干分子秦生义的儿子秦云深讲的，究竟问题具体是怎么问的，人们众说纷纭，但是大家都相信肯定涉及到王小南的命运一事。为了搞清楚他为自己的地主姐夫隐藏一窠金币，是不是不止一窠金子的问题，这位中农于1946年被打死了。有人说：“问题是王小南是如何被打死的？”有人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王文则在土改中打死多少人？”其他人说，问题是“造反派批评你时，你怎能说他们想为王小南翻案呢？”不管问题具体是怎么问的，不管是出自谁之口，确实把搁置20年，本来在1948年整风运动就应该解决的丑闻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有些人立即对此问题提出异议。他们说这个问题应排除在议程之外，而其他则催逼回答，于是他们开始互相对喊起来了。郭民恩发现难以恢复秩序就散会了。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断言在问题提出后，王文则就像拒绝其它问题一样，拒绝回答这一问题。于是会议继续正常进行直到散会。不管真情如何，在一点上人人是同意的，向王文则提出质疑的会议最后是不分胜负而散，暂时只使双方态度僵硬起来了。但是至少一个问题，对土改运动中的大裁决方法提出挑战，这个事实仍然使人们心中愤愤不平。几个月后，各派开始了互相攻击，这个问题变成了一派手中特殊的武器。

第二天，又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来对付张庄支部书记陆进军，因为大多数忠实的村民都觉到他是个好干部，这次会议同样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陆在“四清”运动中经受了严格的审查，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并被再次确认为支部书记，他怎么能突然变成走资派呢？

反对陆的人坚持认为，陆是走资派，因为他犯有一系列错误，而且有些错误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就已提出来了。在“四清”运动中，一些人认为，张兴发应对在铁路院里偷工具被抓获而投井自杀的年轻人裴小四的死负责，现在他们突然指控陆进军对此事负责，因为那时他是支部书记。他们还指控陆要对王天平母亲之死负责（死于一般小病），一些人指责大队领导没有重视她的疾病。第三起死人事件是，关于一个做箩筐的游商，意外碰上掉到街上的高压线不幸触电而死的事。

似乎对三起死人事件负责还不够起诉，反对派还指控陆进军利用职权多吃、多占、享受种种特权。1965年张庄粮食大丰收，足可使大家多分些粮食，然而大队却向国家粮站多卖了粮。长治市政府为了表扬他取得的成绩，奖给大队一辆自行车，有些人说，陆进军却把这辆自行车据为己有。

还是1965年，市要求大队领导推荐一人去另一个村参加“四清”工作，张庄领导推荐了在长治当小学教师的陆进军的妹妹陆月琴。为什么张庄支部书记该推荐自己的妹妹呢？为什么陆进军该帮助伪警察郑存喜，在土改时期分给李来全的土地上盖棚屋呢？这不是翻土改的案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特殊人是支部书记的岳父吗？为什么陆进军推荐西山的富农杨成保在张庄落户呢？为什么让他当副业队的采购员呢？为什么允许他侵吞数百元，而还把九千元公款丢得一千二净呢？还不是因为杨成保是陆进军的姨夫吗？这不是说明对亲戚进行特殊照顾吗？

最糟的是陆成海案件。他和郑存喜一样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警察，土改时逃往洪洞结了婚，生了个儿子现在已十几岁了，1960年又返回张庄，陆进军允许他外出给另一单位制砖，只要他向张庄大队交钱。“四清”期间大队选他当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他到处讲用，好像他真是模范一样，实际上他是个叛徒。

反对派指控陆进军八条罪状的大字报贴满整个张庄。尽管陆本人无法躲避“上甘岭”和“海燕”两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但是他支持申大胡子向一队领导朱喜庆和齐寿喜发起声东击西的攻击，从而卓有成效地挫伤了这次大会的锐气。申大胡子的“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集中火力对准退役军人、党员，当时一队指导员齐寿喜，街上称他为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与抨击陆进军的大字报不相上下。与此同时，一队的会计、另一名臭名昭著的流氓杨四和，也

钻出来攻击中农成分的齐寿喜，说齐在“四清”期间，强迫查他的帐，压迫他这个贫农。最后，他指控“四清”运动非法强迫他交出五间房子，来偿还他贪行的公款。申大胡子和杨四和都声称他们深受齐的迫害，不是他们俩，而正是齐寿喜偷了人们议论的钱和物，他们要求把齐开除出党，陆进军站起来发言支持这个要求。

随着指控与反指控越来越激烈，张庄的“文化大革命”逐渐使张庄人发生了两极分化，每个人或迟或早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支持“海燕”、“上甘岭”打倒陆进军的呼吁；或者加入“保皇派”的行列，支持“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及其联盟保护陆进军。

我在使用“造反派”和“保皇派”这些术语时是有些犹豫不决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放入引号中。任何人都不要设想这两派之间存在任何重大的思想或政治分歧。向陆进军支书提出挑战的农民，比起陆的革命性来既不强也不弱。他们的挑战，并不表示他们在纲领上有什么重大分歧，因此，当然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这是“在野派”对“在朝派”的表现表示不满的事例，部分是因为“在朝派”的表现欠佳，但是主要还是因为这种表现给了“在野派”一个从政的机会。必须强调这一区别，因为西方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毛鼓励政治激进分子起来反叛，然后出卖并镇压了他们。如果“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术语使你相信这种神话的话，那可就太不幸了。我使用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基本政治观点相同、为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的两派积极分子时，方便起见而已。

六十八 夺权、反夺权

到2月初，中国大地上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的各个省份，以及省、地区、市、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党政部门，每月、每时、每分，都在进行着夺权斗争。有时是由于上级机构夺权引起下级单位夺取，有时夺权过程则正好相反，是由基层的骚动引起了上级机构激变。马厂公社正是典型的后一情况。在公社领导更迭之前，几个大队(包括张庄在内)把大队领导干部赶下了台，而公社的造反者在业已成功的乡村造反者协助下，才进行了这种改变。

“海燕”、“上甘岭”成员于2月8日在张庄夺了权，10日派出一个小分队去安阳，支持那儿的造反派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夺权行动，12日又一同去马厂威胁党委书记师超升和公社主任张爱奇。公社武装部长杨秀山趁造反的浪潮，指控师超升犯有8条罪行。他竭尽全力从各大队召集了許多人，面对面质问起了师超升。在这次尝试中，张庄的“海燕”和“上甘岭”成员非常活跃，但是最终他们却失败了。

就“海燕”和“上甘岭”而言，帮助别人夺权，是一种放肆的姿态。他们自己家里的权力远远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他们代表的仅是张庄农民的少数，而且还不是威信很高的少数。当这两个组织的头头最初决定向张庄的现状提出挑战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争取了广泛的联合。他们邀请了第一队“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第三队“真理卫士”，和第二队“卫东兵团”，但是只有最后一组织的个别人同意参加。

他们从外地组织得到的支持，比从本地得到的多。水泥厂的“红卫兵”，机务段“造反兵团”，潞安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安阳电厂一群工人，都派出代表参加了2月8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这支匆匆召集的力量，天黑后聚集在大队办公室，决意要接管公章，宣布成立大队新的行政机构。

具体地讲，夺权就意味着夺取大队处理公务的印章。夺取公章在某种程序上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第四队的申起财是“上甘岭”成员，而他的哥哥申进财当大队会计，掌管公章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然而“造反者们”并不只想拥有公章，他们要大队负责人通过交出公章，来移交权力。不幸的是他们找不到陆进军。据造反者们说，他逃跑了。当陆不在时，他们抓了那时的大队副主任张贵财，以便申起财能把公章交给张，然后他们再要求贵财把公章交给“造反派”。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当贵财最终把公章交到“造反派”的手中时，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把公章传给他们认为没人会搜查的年轻的“海燕”成员——张兴发的女儿仙花。然后大家就回家睡觉去了。

如上述所示，许多上了年纪的张庄农民，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们本乡本土发生的所有的造反行动。张兴发不赞成他女儿扮演的角色；张似乎对1965年让他靠边站的社员仍然怀有仇恨。

“我女儿仙花参加了‘海燕’组织。她告诉了我有一天晚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情况。”

“什么会？”我问。

“讨论夺权的会。”

“怎么讨论的？”

“我们只是决定要进行夺权。”

“可是你们不是需要贫农、民兵等三结合的支持吗？”我问。

“噢，我们并没有真正开什么会议，”她说：“只有申进财、齐万冒和杨起旺在那儿。我们是在村南上的药铺里聚会的。”

“那么，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他们要我当造反派长。”

“天哪，你确实爬得快啊！”我说：“你刚去参加会议，他们就给了你一个重要职位。但是要我是你，我是不会去夺权的。”

我为她担心。如果她去参加夺权，一切进展顺利倒还好，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说，“看，张兴发丢权2年后，现在抬出她女儿来替他夺权了！”

十点钟，他们派人来找她。他们的夺权斗争就要开始了。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去夺权。”

“你敢去！”我斩钉截铁地说。

她听了我的话，没有走，于是我就睡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听说“海燕”已夺了权，并把大队公章给我女儿保存。中午她回家吃饭时，我问她拿上公章干什么？是谁给的，原来她说是齐关胜给的。齐关胜说：“她是个年轻的姑娘，由她保存比其他人保险。她可以保存一天一夜公章，然后我们要开会选举新的大队委员会。”

那天下午我女儿要出去。但是她不知道拿上公章去干什么。

“最好谁给你的，你就把它还给谁。”我说：“我们不想参加这些事，它和我们没关系。”

晚饭时分她回来了。

“你归还了公章了吗？”

“嗯。”

“咱们把这件事忘掉吧，”我妻子说：“过年啦，别吵。”但是我没有善罢干休。

“你身上带着公章吗？”

她拍拍衣袋。

“空的。”她说。

几天以后，我再次告诉我女儿：“别在那个组织里了。我们不想参与进去。如果你引起麻烦，我也会被卷进去的。”

李玉喜和她一起加入了组织，可是不久就开始动摇了。当他决定退出这个组织时，她也同时退出了。她贴出大字报说：“我不再是‘海燕’的成员了，我已交出了袖章。”

后来她外出时碰上了杨起旺。

“你退出‘海燕’组织了？”他问。

“嗯，我现在不想在那个组织了。”

“好吧，你最好认真考虑考虑，”他说：“你这样可是要冒开除党籍危险的。”

所以我女儿焦急不安地回来了。

“没关系，”我说：“他们没人代表支部，不能开除你。”

她一旦退出“海燕”组织，我就放心了。

长期担任贫协主任的郭真宽和张兴发一样，对于夺权这样离奇古怪的事感到怀疑不解，忧心忡忡，但是郭的妻子和他儿子郭民恩，却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夕之夜，“海燕”和“上甘岭”两个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那天晚上，他们把所有的村干部都叫到大队办公室宣布：“我们要夺权了，你们最好把它交出来。”于是干部们给他们交出了政权——大队公章。

春节那一天，我儿子郭民恩没有回家，因为他和其他人在办公室保卫“政权”。第二天，这两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去了安阳，因为一个兄弟组织请求他们协助。他们高举红旗，放声歌唱，排队出了村。民恩没有去，他在家护卫“政权”。他回家吃饭时，我问他人们去哪儿了。

“去安阳夺权。”他说。

“你们在这里都一事无成，”我说：“怎么又跑到安阳了？你到处跑来跑去，一天你们把公章传来传去，一天你们看着办公室，又一天你们又跑到安阳去了，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夺权。”

但是，事情在安阳进行得不那么顺利。支部书记王新年站在讲坛上，手拿大队公章在空中晃来晃去。

“公章在这儿，”他说：“谁要？你们必须选出人来负责，否则我就不交给你们。”

由于去夺权的人少，安阳大多数农民聚集在王新年周围，那儿的“造反派”呼吁张庄的“造反派”帮助，但是我们去了安阳，看到那儿的真实情况时，就犹豫了。

王新年用两个指头捏着公章，任何人要夺过公章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没人行动。

“他们自己怎么不夺权呢？”张庄人问，然后他们就扭头又列队回村去了。

那一天安阳没人夺权。

我女儿郭民英去了安阳，她回家时我问她上哪儿去了。

“安阳。”

“你们夺权了吗？”

“没有，支书站在那儿把‘权’高高举在空中，但是没人敢拿，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自己进行夺权。”

“你们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说：“你们在张庄都一事无成，可你们又跑到安阳去了！”

我儿子和女儿开始和我辩论开了。

“我们两个组织是互相帮助。”他们抗议说。

“不管什么时候叫你们去，你们就去？”

“对，如果他们叫我们，我们就去。我们要支持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夺不了权，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去那儿只是为了帮忙。”

“以后，别干涉别的大队的事务，”我警告说：“在这儿谁家的方向正确，你们就可以参加谁，但是，如果方向不正确就不能参加。”

此时，他们取出了“红宝书”，开始给我谈起语录来了，他们说：“政权要为贫下中农服务，资产阶级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是走资派。”

“谁是走资派？”

“有些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掌权人。”

“你们知道个屁！”我说。

这句话把他们气疯了。

“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们会掌握大方向，如果你不想听，就请你见鬼去吧。”

他们走了后，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没有好好把问题想透。他们只是想干些事情，只想采取行动。至于我，我不理解现在进行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两三天后，公社司令部的人号召青年人去公社夺权，他们要“海燕”给予支持。于是我们年轻人就去了，在公社呆了一个通宵。所有的派别都派出了的支队，张庄、安阳、马厂、马厂小学的都去了公社，他们在黑暗中进行辩论。太阳出山时，他们终于饿坏了，回家吃饭去了。

这些青年人确实精力充沛，他们不吃东西整整辩论了一夜。

“你们在那里有什么收获？”我问。

“我们进行了辩论。”

“谁家的方向正确？”

“我们正确，我们辩论，反驳了他们。”

“你们夺权了吗？”

“没有，我们只是想辩论。”

“现在是公社的同志要你们帮助夺权。如果是市里有组织也这样要求，你们怎么办呢？”

“就是中央要我们帮忙，我们也要去，长治市就要不用说了。我们要把刘少奇和走资派手中的大权夺回来。”

“好吧，”我说着耸了耸肩膀：“干吧，你们会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张庄“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像电波一样，迅速传遍了全村，立即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对。第二天没人下地干活儿了，以后数日都是如此。全大队的生产全部陷于瘫痪。陆进军的支持者举行集会要求进行反击，并去公社要求给予帮助。马厂的公社司令部赠给他们几本党的理论刊物《红旗》的新社论，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进行了认真学习，热烈的讨论。正如对待那么多的“文化大革命”文件一样，所有的派别都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释这篇文章，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忠于旧大队领导的人，竭力利用夺权时主张区别对待走资派和一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路线、“是党的宝贵

财富”的领导干部段落。社论说：认为所有的当权者都不可靠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加以区别地“揭露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他们声称，陆进军显然不是走资派，而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接着警告，对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专政，“对反动派来说，即使有限的民主也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大民主了，一丝一毫也不行。对他们，我们只能进行专政”。

保皇派指控说，出身可疑、诡计多端的人，出身地富家庭的人，和起来向贫下中农造反夺权的各种反革命和坏分子子女，领导着“海燕”和“上甘岭”。为了证明他们的指控属实，他们整理了五个主要造反者的材料，使人听起来似乎反革命确实在张庄抬起头来了。

难道副支书李快腿和民兵营长秦快嘴，真的认为地主在张庄进行反攻倒算吗？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幕后策划鼓动“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员，收集并散发这些污蔑和诽谤的材料。他们谴责这种夺权运动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废除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亲戚的权力。个人利益促使他们使用种种手段使“造反派”名誉扫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造反派”头头诽谤为阶级敌人。当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由，捏造一个虚假的案子时，自己很快就信以为真了，但是，反对所发生事情的主要理由，和阶级斗争毫无关系。

事实的真相是，张庄尽管不像许多传统的中国乡镇村落那样，受家族宗族统治，但是按照古老的家族血统，张庄长期以来被分为南北两个家族。这种划分产生了两个互为竞争的庙宇。陆家在北头，和大部分地主占支配地位，齐家修建的老北庙一直完好无损，直到50年代翻身的农民才砸毁了它。申家在村南头发挥主要作用，而老南庙很早以前就消失了，但是却遗留下值得家族骄傲的永久的庙宇遗迹。至少从解放以来，可能远远早于解放时期，陆家就在村政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解内情的人很久以来就称呼张庄为“陆家王朝”。对占统治地位的陆家来说，南头第四队和以小申为首的副业队为基地的起义意味着：在申氏家族的唆使下，村南的人急不可待、暴跳如雷地要接管权力。显而易见，自尊自爱的陆家不得不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不能放过这些“暴发户”，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多年前，进行幕后策划的小申和秦快嘴之间结下了私仇，被赶下

台的民兵营长和陆家是最亲密的联盟，这使得突然爆发的造反运动更加难以容忍。这种仇恨，是小申和秦快嘴俩人都声称属于自己的女子结婚时结下的。这个女子是秦死去的哥哥秦财宝的遗孀。对于这起令人吃惊的根本改变个人命运的事，秦快嘴责怪的是小申，而不是作为寡妇的嫂子，因此连见也不想见他。当青年人在小申的动员下起来夺权时，他们的行动深深触怒了秦快嘴，他把这种行动看作是新娘诱拐犯的另一起卑劣的阴谋。然而此次可是利害攸关的大事，远比抢夺新娘更重要得多了。领导张庄的大权就取决于这次运动的结果。对秦快嘴来说，这种挑战必须被彻底粉碎。

张庄有句谚语：“‘两大案’、‘两大恨’，张庄斗争永不停”。“王小南案件”（中农村民在土改中被打死一案）和“裴小四案件”（小偷投井自杀案）和“夺权”与“抢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变成了矛盾冲突的祸根。这些就是最紧迫的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文革”开始时，张庄人分裂为“保皇派”和“造反派”，然后都为争取最高权威而如此激烈竞争呢？但是，1967年所形成的斗争，几乎完全使这种腐败的动机相形见绌了。人们谈论的议题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与反革命、贫下中农动员起来保卫政权与地主富农阴谋推翻政权。

由“保皇派”“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促成的反对“海燕”和“上甘岭”造反派的案件听起来相当令人心服口服，郭民恩控制“海燕”组织，主持会议批判王文刚和陆进军，并带领该组织于2月8日夺了权。

“保皇派”说：“郭民恩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孟先存的儿子。日本占领期间，这个反革命分子是伪警察局的头头，抗日战争期间迫害致死许多人，解放后农民起来报仇时，用砍柴刀把孟刺成了肉泥。他父亲的案件经复查后，村学校解雇了民恩，不让他当教师了。”

杨起旺是“海燕”的副司令，是所有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根据“保皇派”所说，他母亲是个天主教修女，更糟的是，她是臭名昭著的地主范善志的女儿，也是避开和日本人冲突，骚扰抗日力量，抢劫、强奸、屠杀平民百姓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首领范东喜的妹妹。八路军一个小分队战士把范东喜和他的十个人逼到张庄一个院子里，使他们无路可走，然后放火烧了院子，范东喜爬进一个装满水的陶水缸里，但是

火把水烧开了，把他煮死了。火熄天后，农民们在水缸里发现了他焦黑的尸体。另一方面，杨的祖母，虽然是个贫农，但是曾经为地主隐藏过财产，结果费尽心机反而挨了打。

周来福是“上甘岭”组织的头头，据“保皇派”说，他的出身比另外两个人的出身还要坏。他是师仁保的儿子，地主师拉明的孙子。师仁保不仅仅是范东喜国民党土围支队的成员，而且早就和范东喜的妹妹结了婚，这样周就成了可疑组织“海燕”分子杨起旺的表兄弟。范东喜被火烧死后，仁保带领范作恶的残存者参加了伪军第四支队，之后跟着日本人作恶。解放战争时期，师逃跑了，但是，他的妻子仍然留在张庄，在土改运动挨了打，死于内伤。

尚银库是“海燕”的积极分子，“保皇派”强调说，他是日本人统治时期伪村长尚石头的儿子，尚石头被解放区县法院判了死刑。几个八路军士兵于1942年在一次勇敢的夜袭战中处决了他。

秦根少也是“海燕”派积极分子，“保皇派”肯定地指出了他父亲是富农成分。

还有副保长之子戴茂祥(每百户为单位的治安组头目，一人犯法，全体负责)。“保皇派”指出了许多其他与坏分子有类似血缘关系的人，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人没资格加入官方负责的“革命造反兵团”，但是，该兵团解散后，他们都聚集到“海燕”和“上甘岭”组织(按“保皇派”说)，为的是“翻土改的案”，恢复地主的统治，并为他们的父母报仇。

“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保皇派”也抨击了小申的历史，他们都认为申是造反运动的后台，即幕后支持者。如果没有这位老共产党员、副业队长、前公社信用社干部的支持鼓励，“海燕”、“上甘岭”组织的年轻造反者是绝不敢采取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的。但是，小申果真是他们声称的坚强的革命者吗？当然不是。“保皇派”说，首先他坐过监狱。“公安六条”是对农村进行文化革命所发“十条”的补充，“六条”禁止有前科的罪犯积极参加运动。因为一位贫农盯上了他的妻子，申一怒之下，毒打了他，为此县公安局1960年逮捕过小申，并监禁了他两个月。小申不仅蹲过监狱，而且还曾把一支枪给了声名狼藉的反革命分子高喜惠之子，因为高明旺收割时期看守打谷场，小申给他拿了一支枪，严重违背了规定。此外，“四清”运动揭发了小申

做过食用油的投机买卖。他以每斤一元的价格买进油，以每斤二元的价格卖给了另外一个大队的人，这是一件私人交易，而不是为了大队经营的利益。

从夺权的第一天起，广泛宣传的这些可疑的违法活动，就在张庄煽起了激烈的论战。糟糕的是，“海燕”和“上甘岭”组织成员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出身在夺取政权的第一个小时内，就引起了种种反响。甚至连“上甘岭”造反派一个小组的头头——青年流氓杨志和看到尚银库、秦根少和戴茂祥在场巡逻执勤时，都愤然退出了“夺权”会场。“如果这些人夺权”，杨志和说：“我无法容忍。”他离开了会场退出了组织。

以后数日期间，随着反对“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呼声愈来愈高，其他年轻人，像张兴发的女儿仙花、贫农李玉喜决定退出了这些组织，并强烈声明脱离这两个组织，成立“立功战斗组”。但是，约八十名忠心耿耿的骨干人物仍然留在这两个组织内，坚定不移地为他们的阶级出身、政治表现辩护，并为他们有权造陆进军和张庄当权集团的反，以及造其他人的反，而进行辩护。

正如“造反派”看到的一样，事实并不是“保皇派”所声称的那样。首先“保皇派”的几位领导，包括副支书李快腿本人都有值得怀疑的阶级关系。收养真保为子的中农老李和张庄第二大土地拥有者王来新有亲戚关系。当王来新死于一个边远县城时，全家去奔丧，当真保的养母（他姨姨，是他亲母亲的妹妹）死了后，他邀请她丈夫所有的亲戚参加葬礼，其中包括地主王来新的子孙。难道一个贫农领导人应该接受这种人邀请吗？

还有民兵干部秦快嘴。他的一家都是天主教徒的后裔，他父亲曾是反革命天主教组织圣母军的成员，而且他的舅舅齐祥云曾是这个圣母军的小队长。群众能信任这样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控制大队民兵吗？

据说李快腿有杆双筒枪，两个枪筒都是“黑的”——即坏的。一个是“黑笔杆”——齐龙成；一个是“黑枪杆”——申大胡子。齐龙成是张庄文化程度最高的农民。李快腿让他当大队文书，需要写证明时就找他，因为他学过数理化，又让他当农技小组长。但是人人都清楚其父亲曾是国民党员。一个国民党员的儿子怎么能在大队事务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没有人怀疑过申大胡子贫农出身的事实，他的问题是个人历史不清白。日本人占领张庄时他在碉堡里荡来荡去，日

本人要抢粮食的时候，他带他们到北舍，他和“二宝”集团中另一民兵李守平曾帮助日本人搜寻抵抗战士。难道申大胡子应该管理枪支吗？他能依法执行命令吗？

关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队伍纯洁问题就讲到此为止，谈到“海燕”和“上甘岭”成员罪名时，“造反派”说，大部分罪名根本就站不住脚，以小申为例，难道他确实属于犯有前科、蹲过大牢的人吗？不对，尽管他被监禁过两个月，但是他的监禁是调查这件事期间预审前的拘留，法院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就释放了他，决没有把他的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未给他判过刑。既然如此，怎么能把他看作罪犯呢？大队禁止所有到过监狱的农民参加政治运动，会严重削弱积极分子的队伍。

或者以郭民恩为例，他亲生父亲是道德败坏、残酷无情的伪军头目孟宪忠，然而，孟从来也不是什么有权势的人，仅仅是砸、抢、杀、掠的芝麻官儿，从来也没有发迹过。解放时，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用铡刀把他肢解处死。那时他的儿子叫孟永生，才一岁。他妻子成了寡妇后，嫁给了土改一开始就任农协主任的赤贫郭真宽，她成了真宽的贤妻，后来被划成贫农，她从未告诉现在叫郭民恩的儿子，说他是郭的养子，或他亲生父亲是个被处决的反革命。民恩在贫农家成长为一名贫农，父亲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当新生革命政权的主要领导干部。民恩小学毕业后，在张庄当了小学教师，但是作为一名教师挣的工分很少（不到三百个工作日的分），他要求转到副业队，以便他能更好地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副业队劳动一天，常常挣一天半或两天的工分，这样加起来一年可挣到四百个或更多的劳动日。学校从来没有赶民恩走，是他自己要求改行的。

至于周末福，他根本就不是师仁保的亲生儿子。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因为穷困潦倒，在饥荒之年，几袋粮食就把他卖给无儿无女的师仁保。那时他才7岁，他在这一家生活不过两年时间，接着解放了。他的养父逃之夭夭，养母被打死，他成了饥寒交迫的孤儿，直到党员、大队积极分子周成乐收养了他为止。他从出生到7岁，只知道贫农的不幸，9岁以后他在被解放的贫农、党员家里长大成人，怎么能叫他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呢？

从他父亲一方说，杨起旺是数代贫农家庭的后裔。解放前，他父

亲太穷，甚至按天主教育婴堂的低价都买不起一个老婆。解放后，教堂倒塌，育婴堂解散，这个教会的修女失去了谋生手段，却给一个贫农提供了机会。杨的父亲迅速采取行动，恰巧和范普志当修女的女儿结婚成了家。这位妇女成了老杨的贤妻，被重新划为贫农。他们的儿子杨起旺出身于贫农家庭，父亲是贫农，母亲也是贫农，他的贫农成分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尚银库，尚石头之子，尚石头是敌伪政权统治时期被委任为村长的贫农。当他拒绝和抗日力量合作时，八路军士兵把他杀了。他有两个儿子——尚金库和尚银库。两个男孩解放战争时期双双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尚金库不幸阵亡，尚银库一直战斗到最后胜利，才解甲归田。他和一个叫齐琴仙的姑娘结了婚，她是共产党员，在大队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人民法院把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当叛徒处决。果真不假，但是他自己也是位解放军退役军人，革命烈士的弟弟，共产党员的丈夫。难道能把他叫作双手沾满鲜血的妖魔鬼怪吗？

另外，还有秦根少，“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的成员都一致认为根少是富农之子，但是实际上他们发现他是个革命者，一个虽出身反动阶级家庭而“反败为胜”的人。情况既然如此，难道他们不应该和他团结一致，为改造中国而共同奋斗吗？不这样做就是奉行“血统论”，甚至是元旦社论都谴责的反动的“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已成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东西”，社论说：“应当指出，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利用这种口号，从本质上讲是要宣扬剥削阶级的反革命‘血统论’。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钻洞’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历史唯心主义。”

所谓的“反革命历史唯心主义”对“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关系来说，就像贫下中农“阶级立场”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常情罢了。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是不允许他们这些“富农坏蛋”分享张庄大权的。第四队、第五队和副业队“造反派”组成的少数派，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造反夺权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行动符合历史潮流），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第六队“保皇派”组成的多数派，厉声谴责臭名远扬的地、富、反、坏进行造反是反革命行动，因此，分裂扩大了，加深了。许多开始参加“海燕”的第五

队社员，在不断升级压力下，才退出这个组织，结果使得造反派组织更加孤立无援。

由于他们领导的是少数派的运动，他们许多人很容易受到政治攻击，夺权斗争的成功机会不大。“造反派”执掌村政和公章大权的日子仅仅持续了数日。由于无法把其他派别的人团结到自己一边，无法成立任何可接受的领导班子，无法动员各阶层进行生产劳动，“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不得不承认他们失败了。

他们2月8日夺取了政权，但不到一周就放弃了。1967年2月14日，他们把公章交给了以六英尺高的退伍军人申小个为首的接管委员会。这是在此次突然爆发的斗争中代表另一派的共产党员。“这个接管委员会，由各队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六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其中包括许多前任大队干部，如王满喜。尽管委员会里有他们自己的代表，还是被“造反派”称为复辟。一方面，“接管委员会”说明了“造反派”取得的进步，因为陆进军和李快腿（支书、副支书）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说明了失败，因为入选接管委员会的多数代表，是这些姓氏不同的亲兄弟的支持者。

接管委员会仅仅是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是两派都承认的，在这个临时机构的领导下，大队社员下地干活了。然而，针对究竟谁应真正掌权而进行的欺诈行动，在继续着，并日益尖锐了，双方贴出大量的大字报，学习班、动员会、战略讨论会、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连续不断，令人眼花缭乱。

3月15日参加群众大会的人群把张庄中学图书馆里挤得水泄不通。“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召集了这次会议，审查陆进军的历史，并听他作检查。这些“造反派”不仅动员了张庄的支持者，而且还动员了外地他们能召集的一切支持者，如：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机务段和粮运站“造反兵团”，以及水泥厂表示同情的兄弟组织。

陆进军和李快腿邀请了他的安阳的盟友，现在掌管公社委员会的马厂造反派司令邢秀川，以及同情他们一派的其他人和群众组织。先前在张庄领导“四清”工作队的长治市民兵司令部指挥张青海，也应双方的邀请而来，他的作用是主持大会。

据小申讲，“造反派”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胜利。他们的支持者在人数上超过了反对派邀请的人。公社领导邢秀川，尽管也受到对方的邀

请，但是也批评了陆进军，支持了“海燕”和“上甘岭”的“夺权”方向，并驳斥了那些叫小申“走资派”的人。

“在这次大会上，”小申说：“所有来自机务段、粮站和水泥厂的人，都支持‘海燕’和‘上甘岭’，结果对立面不再欢迎这样的大辩论。”

究竟是真是假就很难说了。可能小申的话确实有些道理。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造反派”都说，在这次公开辩论和大字报对抗中，他们胜了，但是在夺权斗争中，他们却失利了。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席卷全省全国数月之久的强劲的“夺权”之风，大大增强了造反派在大辩论中的力量。表面上夺走资派的权，实际上，是夺任何当时恰巧在执政人的权。1967年头几个月的议事日程就是夺权。所有的媒介、报刊、电台、党政宣传以及街谈巷议，都在庆祝全国各地夺取各级政权的胜利，因而煽起一股没人敢轻易直接反对的风暴。

甚至李快腿也不得不同意。1971年他对我说：“1967年2月8日，我们自下而上进行了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毛主席发布的各项指示的，没有人反对夺权，因为这是显而易见要做的事。但是后来就如何评价干部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些人可能会补充说，还有如何评价进行夺权的那些人。

“显而易见夺权是大方向，”李快腿说：“但是仍然会制造分裂，不赞成夺权的人，去民兵指挥部发牢骚，他们认为张庄大队根据毛泽东的《二十三条》成功地结束了“四清”运动，成立了优秀的领导组，而领导组成员是根据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选出的。另一方面，那些夺权的人，在土改期间都曾是斗争对象，或者斗争对象的子女，他们还窝藏了公安机关《六条》禁止担任领导职务的社会分子。这些人，包括其家属被作为革命对象处决的和被革命监禁的人。由于在张庄带头夺权恰恰正是这些人，所以人们不赞同这种接管法。

到民兵指挥部发牢骚的农民，得到了几份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庆祝“无产阶级夺权”的社论，应该夺谁的权呢？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并不是夺革命干部的权；他们是“我们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人民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地富趁机夺贫下中农的权。

“保皇派”抓住《红旗》第3期社论的这篇文章，作为他们发动反击的根据。他们在街头、田间、墙上、会上大肆宣传这篇材料。他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写小短剧、宣读社论，在村里墙上

张贴大字报，广泛宣传他们的立场，在辩论和宣传中维护夺权现状者，拒绝处于被动地位。如小申及其同伙说，如果“保皇派”在公开大对抗中失败的话，他们倒是在村庄街头墙上保持了主动，显示了他们神通广大的组织才能。他们成功地使农业生产瘫痪，直到“造反派”把大队公章移交给一个没有造反派参加的接管委员会才得以恢复。在新生的委员会临时保护伞下，“保皇派”致力于成立一个更加永久性的革命委员会，最终能重新确立已被打倒的人的统治地位。

从组织上讲，这场对抗是五比二。只有第四队的“海燕”和副业队的“上甘岭”作为“造反派”携手合作，向联合为“革命联合战斗队”的其他五个组织进行挑战。

当“接管委员会”负责时，最初的舌战，后来发展成拉锯战，从2月中旬开始，一直进行到3月底。接着，长治新的革命委员会行使职权后，一个称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队”干部来到张庄，帮助成立符合要求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工作队和以前的工作队一样，由长治市民兵指挥长张青海领导。

由于新的工作队到达，张庄的两极分化走到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张青海和马厂公社民兵指挥杨秀山建立了密切联系。由于杨已决定支持张庄的“保皇派”，说服张相信，“造反派头头确实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工作队命令“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开除周来福、秦根少、杨起旺、尚银库以及其他嫌疑分子，否则面临作为非法群众组织而解散的危险。当遭到“海燕”和“上甘岭”拒绝时，公社夺权司令部把他们作为反革命组织而取缔了。

取缔“造反派”组织的会议于3月31日举行。4月1日，由所谓的老干部、军人代表（在此，是民兵代表）以及群众组织领导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接管了张庄。这不是一个经选举产生的革委会，而是在工作队和五个合法的群众组织，与原贫农协会、党支部进行协商以后，任命的一个小组。新生革委会应是一个十人委员会，实际上工作队只指定了九个成员，为原来属“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八十名左右农民的代表保留一个席位。如果他们同意驱除他们的领导进行整顿的话。

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大队领导描述当时局势时，往往忘记了他们向“造反派”发出的命令：驱逐他们的领导。只是强调他们为“造反派”保留了一个席位，但是造反派必须承认革委会是合法的。这是一

个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因为这样做就意味他们不得不谴责他们自己的组织和领导。

“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成员，仍然坚定不移地互相忠于对方，坚持他们所声明的原则。他们拒绝把他们的头头当作地、富、反革命分子进行驱除，拒绝承认新生的革委会。在他们看来，这个革委会只不过是旧领导组的复辟——一个“反动的大杂烩”。

然而，没人理会他们的意见。村支部副书记、青年团书记李快腿重掌了大权，当了革委主任。大队民兵队长秦快嘴、大队主任张贵才、另一个副书记李来全为副主任，其他五名成员是：支部书记陆进军，农协副主席李小花，妇联主任罗淑云，新任命的副业队长宋晋福，以及退伍军人、受人尊敬的党员李光青。

很清楚，正如“海燕”和“上甘岭”的头头们所说，只稍作了一些人事变动，旧的领导组就又重掌大权了。但是，难道就是这一个“反动大杂烩”吗？这些人是走资派，还是革命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正如他们对“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头头的政治性质，以及他们对最初导致全面冲突的问题的观点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也截然相反。他们之间的竞争以辩论开始，但是由于地区、省以及全国的派性分歧加深，文斗逐渐演化为武斗，所有导致分歧的问题的对错、是非，已被世人所忘却。越动用武力越不讲理，两派就越陷入僵局；一方伤害另一方的人越多，就越难以找到任何最后的解决办法。

六十九 打、砸、抢

新生革委会的成立，“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被开除出夺权委员会，导致了对自由大辩论的严格限制。“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一旦被剥夺了合法的权力，就再不能使用集体供应的纸张、墨汁、浆糊、小册子和墙报了。公社领导一旦指明他们为“反革命”，就终止了他们享受文具和浆糊的权利，这是所有群众组织都可免费享受的；再买纸张他们就不得不靠个人捐助了。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个鸡毛蒜皮的问题，毕竟这纸和文具并不昂贵。但是投身于“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事业的张庄农民，则把这种禁令看作是一个

沉重打击。他们把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财产集中起来，购买他们能买得起的纸张和墨汁，用红烧土在墙上写字，用成员家庭捐助的白面粉做浆糊，竭尽全力推动这场斗争向前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禁令已禁止了敌对两派之间的自由辩论。

同时“造反派”不失时机地抗议公社和长治市委所采取的行动，他们亲自送去抗议书和信件，要求撤销决定，派出代表团亲自阐明他们的立场。他们要求恢复他们成立群众组织的权利，并引述了有关中央政策的章节——“任何人都无权武断地解散任何群众组织”——但是他们被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得到的答复常常是“如果你们把周来富（日本汉奸的养子）、郭民恩（国民党官员之子）、杨起旺（地主外孙）和其他可疑分子开除出你们的组织，你们的权利即可得到恢复”。公社委员会史九全和杨秀山命令“造反派”把这些嫌疑分子交送公社监督起来，但是，“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拒绝考虑谴责这些成员，拒绝把他们上交公社。在他们看来，遭到非难的人并没有干任何错事。此后，这些人感觉压力增大了，尤其是对“造反派”组织内唯一的老党员和干部的小申来谈更是感觉压力增大了。

8月第一周内，“海燕”、“上甘岭”两组织进行宣传所需的文具纸张问题更加严重了，“造反派”把纸张、墨汁和浆糊全部用完了，现金之类赞助也逐渐断绝了。8月8日他们再次派代表团去公社为他们的问题作辩护，并要求公社从物质上给予支持，代表团成员会见了武装部杨部长。

“我们向你发出呼吁。因为你参与了解散我们组织的事，”他们说：“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贴大字报的权利，你为什么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杨反驳了他们。

8月18日，十几个人又去了公社，王书记已取代了杨书记，由于这位干部没有插手驱逐他们组织的事，他们就请求他帮助。

“让我们借点纸吧，”小申说：“市委不同意公社的决定，问题一经解决，我就可以清帐。”

但是，王书记不敢未经商量就默许他们，他2月被打倒，现在又复职的党委书记史昭盛打电话，史回答说没有纸。

与此同时，张庄一些青年人冲进了西院，在那儿他们发现了一位

姓张的办公室秘书。

“你们找什么呀？”

“我们想借点纸。”

“有一堆，”张指着柜子说：“想拿什么就拿吧。”

这些年青人拿了500张白纸，100张红纸，1瓶墨汁，1个复习板和3支毛笔。他们拿上这些文具匆匆回家，开始写大字报了。

“造反派”袭击公社办公室的消息，在全郊区引起了一阵骚动，杨部长发动了10个大队的支持者，写大字报谴责反革命分子小申抢劫财物的罪行。一大早，杨锁上了公社办公室的门，带领他的全体工作人员扑向张庄。人群聚集在大队办公室前面的大街上，去听公社干部谴责“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以及他们的幕后策划者。张庄革委会成员也参加了，有些人互相交谈着，有些人则准备张贴大字报。“小申带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去马厂打、砸、抢。”

小申亲自走到人群面前，毫无惧色。

“毛主席在《十六条》中说，我们应该以理服人。他把四大权利、四大民主给了我们所有的贫农。如果允许他们贴大字报，就该允许我们贴大字报。如果他们贴大字报反对我们，我们就能在旁边贴出大字报为我们自己辩护。让群众看到两派的大字报，让群众去评价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

在申发言时，他的支持者分头去贴大字报。公社来访问者和张庄“保皇派”会合在一起去阻止他们。由于各派都想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大字报张贴在最有利的位置，而防止对方张贴，结果打起来了。

那天这两派的人在张庄发表演说，进行辩论，为大字报发生对抗，零星的拳打脚踢、推撞、呼喊，成群结队的人转来转去，整整持续了一天。傍晚时分在一场混战中，“海燕”的两个年青人抓住了攻击他们的一个公社的通讯员，并把他推到第四队的饲养院里。他们把他在那儿扣了一晚上，次日清晨释放了他。他回到公社时说遭到毒打，受到刀子的威胁，而且拒绝给饭吃，给水喝。

“造反派”严辞否认了此事。“我一听说我们抓住一个通讯员，我就去了饲养院，”小申说：“我告诉年轻人决不可动手打他们的俘虏。不管是谁以任何方式伤害了他，谁就要负全部责任。天快黑了，公社来的人动身回马厂了。这个俘虏想回家，但是，如果我们黑天半夜把

他送回家，怕他们会袭击我们，如果我们让他一个人走了，要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定会指责我们的。‘天已黑了’，我说，‘你最好在这呆上一夜’，我们给他做饭，给他东西吃，并要他和我们一起学习中央政策，第二天早上，我们送他安安全全回了马厂。”

这个年青人在张庄逗留期间，似乎不可能像小申声称的那样舒适愉快。无论他受到的优待是真是假，这次“绑架”事件都是火上浇油。他们的对手抱怨说，“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不仅袭击了公社办公室，进行打、砸、抢，他们还抓住并毒打公社工作人员。这个反革命团伙，是什么事也做得出的。

此刻，对“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的真正头头的指控日益升级。8月，在2月批判王文则时所提出的问题——土改期间“王小南”之死的问题，发展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保皇派”谴责说，小申及其同伙为王小南之死而指责王文则，是在千方百计地翻土改运动期间已定了的案，这就相当于翻土改运动本身的案。这伙地、富、反、坏想方设法推翻张庄的革命，以便复辟封建主义。全村、全马厂上下到处都贴满了辱骂人的大字报。“造反派”不仅在大会上诬陷王文则，而且此后，他们还设法隐瞒事实真相。在2月大会后举行的一次12人秘密会议上，小申命令所有人必须对此事保密，并威胁，谁要违反了纪律就报复谁。会议期间，呈送上的纸条原件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国民党官员的儿子郭民恩保存着其他纸条，但是为了适合一时情况需要，把这一纸条丢失了。显然他是图谋为死在革命运动中的父亲报仇。不正是他主持了会议，接到井大声朗读了所有纸条吗？利用放错或销毁了这个纸条的手段，他和小申共谋掩盖整个事件。所有受牵连的人，所有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人都应抓起来，进行调查并给予惩罚。

为了使人们领会他们的观点，“保皇派”塑造了一个巨大的小申泥塑像。他们把这个塑像置于药铺正南端的两尊诽谤性塑像旁边，这些仅几周前出现的塑像，把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公社前党委书记张莲英刻画成栩栩如生的动物。一个无名雕塑者用同样的姿态，仿照小申制作了他的塑像，用蹄子代做他的双手和双脚。三尊塑像的面部表情活像他们受攻击时的模样，十分可怕。小申塑像独特之处，是他的鼻子被丑化得硕大无比，晚上，真人般大小的塑像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宛如三只庞然大狗，在教堂墙下鬼鬼祟祟地

活动。

诽谤侮辱的宣传，并不能解“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心头之恨，他们还要求公安局采取行动。据小申讲，长治市公安局来了三个人，确实来调查过张庄的情况，准备拘捕人。他们是秘密来的，呆在大队马路对面的市营水泥厂里。一直到张庄地区中学同情“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通过和市里联系得知公安局有人在张庄，并在长治大街上贴出大字报抗议时，许多人才知道了此事。

小申拿着这些大字报，在水泥厂找到了这三位警察，设法让他们了解自己是贫农，无限崇拜毛主席，是土改运动才使他和他家人免于饿死，又活了20年，因此他是不可能要“翻土改的案”，不可能强行绑架公社干部，或盗窃公社财产的。他的辩护没有起作用，但是当 he 取出抗议大字报，向他们证明他和他的组织事实上确实和地区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联系时，警察们判定这是一个大误会。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即拘捕人，就回市里了。使他深受鼓舞的是，在即将对他们采取行动的最后一关，市委当局垮台了。“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向他们斗争对象的马厂公社领导发起了反击。他们的重点集中在武装部杨秀山和复职的党委书记史昭盛身上，他们的大字报写着：

“炮轰杨秀山！警告史昭盛！”

“你们不执行市委指示。”

“你们肆无忌惮地镇压我们的组织。”

“你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使用了火药味十足的语言。

这一次张庄农民向长治市当局呼吁纠正错误只不过是一种无用之举。这说明了群众对上级救世主，对严重分裂、深陷自相残杀泥沼不能自拔的党领导的正确性和诚意，仍存有某种天真的幻想。1967年夏，整个省、市、郊区都已陷入一片混乱和骚动之中，而且还在日益加剧，全国就更不用提了，由老干部和基层组织仓促成立的联盟，充其量也只不过代表他们声称的所代表的人民之中的一小部分，各地到处都在向现存当局夺权。

北京的指示，根本改变了最初的号召，即根据巴黎公社原则进行

选举，而选择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为了响应北京这一号召，“造反派”试图建立由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老干部的代表和武装力量的代表三方组成的委员会。各群众组织应该自下而上进行大联合，在形成政治上的一致后，再成立三结合委员会。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许多组织都在临时拼凑这样的大联合，但是他们几乎无法隐藏相互的敌意和猜疑，往往是联合声明的墨迹未干，新的冲突就此起彼伏，主要都是因为对老干部评价互相抵触而引起的。新生革委会，通常是在双方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成立，委员会中一派占的席位比另一派多，从而使受轻视的一派感到受屈。此后，一派认为是“无产阶级政权”，另一派就认为是“反动大杂烩”。那些自认为行使“无产阶级权力”的人，把攻击他们的所有人都看作是反革命，认为革委会不合法的人，则认为重新造反挽救革命绝对必要。因此，“拥护还是反对革委会”的新问题，使现存的冲突加深了，激化了。另外，由于部队参与了成立革委会以及参与决定是否支持革委会，这个问题又发展为另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拥护还是反对武装部，拥护还是反对人民解放军。”此后，任何反对解放军支持的新生革委会的人，都有被打成“反军派”的危险，这条罪名比起被打成“反对毛泽东”或“反对共产党”的罪过，轻不了多少。20年代以来，全国上下在政治上形成一致，有三支不可动摇的柱石：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军队，拥护共产党和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反对这三根柱石中的任何一个，就等于反对革命，就是人民公敌。

长治市政府工业局管辖着五阳煤矿。这个局比起它的姊妹局——农业局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金，因此，其干部也享有更高的威望。农业局只是在市里优先保证了工业系统后，才能得到所剩无几的恩惠和财力人力。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对工业局的竞争比其它任何部门都更为激烈，为什么这种激烈争夺，会扩散到五阳煤矿之类所有的下属单位的原因。

正当“文革”的派性斗争开始激化时，张庄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申仲堂，于1967年在煤矿当了合同工。他对采矿业几乎一窍不通，但是对进行政治煽动，大辩论，写大字报以及后来的巷战却是内行里手。

申仲堂描述了矿工的生活情况：

“武斗是年初开始的。开始我们用拳头、木棍。如果从大辩论开始，就以武斗结束。张贴大字报就为大字报内容武斗。有一次我在会上直率发言时，他们痛打了我一顿。有时在饭厅坐下吃饭我们就争论起来了。争论往往引起口角，于是我们互相向对方扔凳子，砸电灯，没有伤过人命，但受伤的人很多。

一天晚上，我们二三个人和四五个对手在食堂吃饭，他们大谈他们一派如何如何好，当我们表示不同意时，他们夺过我们的饭碗摔在地上。于是，我们都抓起凳子互相追打起来了，我背上重重挨了两下。由于我们的人没有他们的多，我们已定好一计，打灭电灯悄悄溜走，丢下对手让他们自相残杀。争吵一开始，我背上挨了一击，但打灭电灯后，我设法偷偷溜到食堂的另一端逃跑了。我藏在庄稼地里，直到找到我的同伴才跑回张庄。那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究竟为了什么进行对抗，没人能解释清楚。1967年初，独立组织还很多，各种组织解散联合变化反复无常，简直把最忠心耿耿的人都搞糊涂了。申仲堂的几位朋友是潞安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这个组织依附于一个称作“总司令部”的松散联盟，把它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这个总司令部支持长治市革委会，但不喜欢革委主任、解放军的司令武天明。这样就把他们自己置于“坚持保卫”武天明，被称作“红总司”的另一个保护伞组织的对立面。这第二个司令部的一支坚强的分组织——“五四兵团”控制着张庄机务段，直接与河南“二七公社”的分组织相联系，而后者以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中枢——郑州铁路局为基地。申甚至连他的“总司”为什么反对军分区的武天明都记不清了，但是很快这个问题就不切实际了，因为另一个松散联盟，联合一致奋起反对武司令领导的革委会。他们采取的第一行动就是阻止部队拉水。“总司”和“红总司”对这种“破坏行为”感到十分震惊，他们立即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终同意采用以“联”字结尾的很长的共同组织名称，采取行动，支持当时执政的市革委。为了确保部队拉水，他们开始在长治大街上打了起来，很快武斗之风就扩展到所有市属单位，包括五阳煤矿。

那时“联字号”在矿上根本没有组织，贯以很长的组织名称的反对派(以“红”字结尾，最后成为“红字号”)控制各个部门。但是，张

庄的三四个合同工，包括申仲堂和四五个马厂工人，追随他们家乡的大多数人，反对“红字号”，并开始张贴大字报，反驳煤矿内张贴的“红字号”的大字报。大字报导致了食堂武斗，“红字号”把仲堂和他的同事从矿上赶走，但是没有多长时间。申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

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几乎两周时间我们都不敢回矿上班。那段时间，我和五阳煤矿、长治钢厂的“联字号”取得联系，并成立了“五长红岩兵团”。然后，我悄悄在天亮前在煤矿大门外贴出我们的宣言。“红字号”看了大字报，派人和我们进行辩论，鼓励我们参加他们的组织回去上班。我们人数少得可怜，因此我们拒绝了。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回去上班，并设法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

我在矿下工作面干了一阵后，队长分配我执勤。由于我是“联字号”，而矿上是“红字号”掌权，我们和他们合不来。我经常是没完没了地站岗放哨，由于必须长时间站着不动，腿都站肿了。我的同事们也受到同样的对待。无论干什么，我们总是接受最艰难的任务。每当我们在一起都抱怨太累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决定开展大辩论。

那时，我们已在周围争取了几个朋友，而且我们有五阳煤矿工人、长治钢铁厂工人的有力支持。无论我们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展开了辩论，其他人就来混入人群之中。没人能认出他们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但是一旦遇上麻烦，他们就和我们一起拼命干起来。于是我们张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这次辩论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后来在夜里爆发了战斗。这一次人群中有我们好多朋友，我们干得很漂亮。武斗一开始，我们发出呼吁，请求五阳煤矿声援，外单位的矿工个个手握粗大木棍乘卡车来了。他们一来就群情激昂地四处乱打，就这样，我们把“红字号”给赶走了。

尽管他们大部分逃跑了，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几个。我们把他们当作俘虏，扣压在煤矿招待所，并命名为“高级监狱”。我们抓住谁就痛打谁。其中之一是“红字号”的头头，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不断公开审问他。当我们审问时，就把他们押到群众大会上，“让他们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如果他们不好好说，或我们觉得他们不讲实话，就让他们爬在桌子上，打他们的屁股。我们把已坦白交待罪行的人押上群众大会，进行批判，实际上大部分的口供都是毒打成招的，没有什

么对错可言，我们只想惩罚他们。

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激烈的武斗使五阳煤矿一片混乱，而且外单位的许多人也参与了。除了第一次武斗我们逃跑了之外，我们再没有输过，我们捉住谁就痛打谁。

派往我们地区的解放军，三番五次要求我们释放俘虏，最后我们不得不放了他们。有的受了点轻伤，有的负了重伤，有的还流着血。解放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医院，为此我们批评了他们，我们认为挽救敌人就是镇压我们。

一旦把俘虏送进医院，我们就完全控制了整个煤矿。然后我们召开会议，结束了武斗，并恢复了生产。由于我们把“红字号”都赶走了，我们再无人可揍，矿上平静了。后来解放军开着汽车装上喇叭，深入矿工的家乡，鼓励跑走的那些人回去上班，要他们放心回去上班。

但是，当他们返回矿上时，他们不能不担惊受怕。有时武斗在坑下爆发。于是，部队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大联合，以便我们都能集中精力搞生产。这次会上，战士们坐在中间，“红字号”、“联字号”两派各自坐在两边。但是当会议顺利进行的时候，武斗爆发了。我们“联字号”开始喊“打倒程××！”（红字号头头），有人扔开砖头了，于是两派很快互相向对方扔石块、砖头了。由于解放军在会场中间，有些人挨了打，他们不断从中间往外边推人，把武斗者推开，最后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武斗。

那天晚饭后，他们又在食堂吵了起来。由于许多“红字号”成员已叛逃到我们一边，那些仍留在“红字号”的只占少数。当武斗爆发后，他们一大帮人又第二次逃跑了。留下的人，有些被说服参加了我们的组织，有些人则继续上班，但不发表意见，所以煤矿仍然牢固地掌握在“联字号”手中。

我们都去上班了，生产恢复了。解放军要我们把跑走的人都叫回来，但是我们不干。军人还要我们别参与市内的政治斗争，只呆在煤矿上班，但是我们的头头还是继续去市里开会，而且我们也多次参加了那里的武斗。

五阳煤矿和长治市发生的武斗蔓延到张庄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七十 张庄门前的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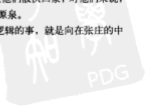
8月24日天黑以后很久，一千多名学生、工人(有的说1600人)，分乘几十辆大卡车，停靠在西到张庄村，东到机务段的交通要道上。他们跳下汽车，手持木棍、长矛、大刀，在第四队打谷场集合，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去袭击他们的首要目标潞安中学；一路去保卫长治北站职工密集区的北侧；另一路去防守东侧。东侧是一个可能发生反击的策源地，因为附近就是机务段和人所共知的铁路工人“五四兵团”和控制潞安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结成的联盟。

袭击者发动这次“远征”，目标非常简单——为失去校园控制权的“红卫兵”学生从中学夺取粮食和粮票，以便他们能维持日常生活。1966年“红卫兵”举行集会，支持高、王两位老师，向被他们称为“范地主”的校长挑战。此时他们已经控制了学校校园，敌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部分成员被迫撤退了。如果他们回来，也是以袭击者的身份回来的。

但是到1967年仲夏，激烈的武斗把这种局势完全颠倒了。开始是“保皇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后和本地区的其他“保皇派”结成联盟，共同打出“联”字派的旗帜。这使他们成为多数派联盟的一部分，至少在长北地区是这样。在他们新联盟的支持下，他们诉诸武力夺回了潞安中学控制权。

接着“红卫兵”学生在张庄再也呆不下去了，他们成群结队逃往长治市和当时市内占统治地位的势力，与工业系统的“红”字派结成联盟。一经逃跑他们便断了生计，断了粮食和所有中学生从政府得到的助学金。由于没有粮食，或没有在国家粮站领粮的粮票，这些学生作为有组织的单位是无法长期存在下去的。长治没人有多余粮食供他们享用数日，一旦这一点无望，被赶出校园的红卫兵只能分散在全区各地的家乡，向父母求援。无论是为中国前途而参与激烈斗争的学生们本身，还是市里各派别头头，都不希望他们散伙回家，对他们来说，中学红卫兵是代表群众支持的一个重要源泉。

由于陷入绝境，红卫兵要做的合乎逻辑的事，就是向在张庄的中



学进行袭击，重新夺回理所当然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粮食、粮票。这是他们作为学生而有资格享受的东西。这样的袭击对学生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是和市内各派别头头的利益相吻合的。因此他们集结了自认为是可担此重任的力量，没人能预见袭击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奇袭队的支持下，分派进军中学的小分队迅速占领了整个校园。然后强大的突击队到事务处，去夺取粮票和能找到的粮食。他们本来想要细粮——小麦、面粉或大米，但是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所找到的丰富小米了。他们把小米一袋一袋拉出去，开始装上汽车。

与此同时，被压倒优势的突然袭击惊得不知所措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人去公路对过机务段求援。为了阻止任何反击，“红卫兵”派又决定不仅要攻占中学阵地，还要攻占机务段。机务段本身并没有重兵把守，总共也不超过约50名工人住在那儿，但是他们组织得当，领导有方，全体进行纵深防御，一个组操纵大喇叭，号召“红卫兵”撤走，另一组开动一个火车头，把它部署在公路与机务段之间的轨道上。

在蒸汽机火车头开动时，向左右喷着蒸汽，威胁要干掉50英尺内的任何人。这种致命的新武器，迫使袭击者重新组织力量。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分队四处散开去寻找石头，在火车头往北驶去后，把石头堆放在铁轨上，当火车头返回时，被大量的障碍物堵住了，使袭击者有时间爬上火车，制服司乘人员，破坏机器。

在“红字号”袭击者蜂拥越过铁道，冲入工厂大院时，所有的守卫者，河南工人们都撤退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跑上楼顶，抓到什么东西就扔什么，同时，一个小分队冲出东门，绕到大岗山后，朝停放着一排汽车的公路跑来。

此时天已大黑了。防守者打开院子里的电灯，使她们能看清下面袭击者的行动，每一个飞行物都得重视。袭击队头头徐彪在投入战斗时，把两支手枪里压满了子弹，他用枪击灭了电灯。在黑暗的掩护下，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忠实队员朝大楼冲去。根据他们所接到的情报，守卫者没有武器，因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是在肉搏战中谁战胜谁的问题。由于来自市内的力量从人数上占优势，他们对胜利确信无疑。

然而，红卫兵和他们的工人联盟不知道，只是在几天前，铁路工人人才为自己配备了武器。由于他们的局势严峻，有几个人从二楼窗户

上向进攻者开了枪。一颗子弹击中了对方的要害。

“冷”武器突然变成“热”武器，使进攻者惊恐万状。由于他们的一个成员被击中，即将身亡，他们扭头便朝他们的卡车跑去，结果发现大部分卡车已被损坏。从山后绕道去公路的铁路工人小分队，已经从南面到达停放汽车的地方，至少戳破他们九辆汽车的轮胎。仍然能开动的卡车很快挤满了人，在黑暗之中呼啸着，夺路朝市内开去了，把数以百计的惊恐万状的工人留在后面，没法逃走，只得步行。有些人逃往公路，有些人害怕在野外被追击者抓获，便藏在野地里，等候天明。第二天铁路工人逮捕了一些人，把他们当俘虏带回了机务段。

当这个消息传到上级政府部门时，驻市部队自我辩解说，我们曾带着几封省里指示去过长治北站，但是铁路工人阻止了他们，而且还夺了他们的汽车。后来他们要求归还汽车时，铁路工人还打了他们

铁路工人的描述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们的敌手为了攻占机务段，发起了强大攻势，而50名勇敢的保卫者如何击溃1600名顽强的进攻者的故事。

张庄农民没人参加著名的机务段之战。或者即使他们参加了也不承认，但是他们都能详细谈论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不可能对进犯他们近邻的事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1971年大队会计曹东民，给我最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晚上11点，我从大队办公室下班回到家就睡觉了。大约半夜时分，我听到了敲窗户声。

“谁？”

“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我打开窗户用手电照在这个人脸上，我认出这是中学的一位老师，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快起来。”他说。

“干什么呀？”

“‘红卫兵’来袭击来了。”

“他们打你了吗？”

他卷起袖子，我用手电照在他的胳膊上，看到发紫的鞭痕。

“他们为什么打你？”

“他们去事务处拿粮票，抢走了所有的粮票和库房所有的小米。干部职员不放，但是他们来的人比我们人多，谁不服从，他们就打谁。

这位老师要我叫一伙人一起去传出口风说，学生绝不能来中学打、砸、抢，如果他们这样做，张庄农民会报复的。

我起了床要返回办公室。我要他先走，我跟着就去。首先我查看了大队部的门是否关着，我知道那儿没有现金，我们所有的帐本都在办公室。我们可丢不起这些东西。

当我看见门仍然关着时，我松了一口气。我设法唤醒住在里面的理发员茂盛，尽管我喊了很长时间，还是没人吭声。当我们在那里站着时，约三十来个人沿大街往南走去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们就跑了。纪则还没睡觉，让我们进了他院里。当我们告诉他有陌生人时，他说最好别再叫醒其他人，于是我们只是坐在那儿，最后这位老师走了。

15分钟以后，我们听到机务段传来呼喊声。火车汽笛响了起来，大喇叭也开始呜里哇啦响起来了。大喇叭里传来这样的消息，“受蒙蔽的‘红’派群众们别再来这儿，别受了坏头头的骗。”

在长时间呼喊声和广播声后，我们听见人群大喊：打！打！此后，我们听到了枪声。枪声很多，但是都是步枪声。没有机枪声。

后来大家都很快跑走了。我们听到张庄街上走动的许多脚步声，我不敢回家去，我和纪则谈了一会儿后，就在他那儿睡觉了。我一觉醒来时已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家里人在找我，我半夜三更离开家，一直没回去，他们听说中学操场有人被打死了，担心可能是我。我的小舅子最后找到了我，他把我叫醒说，全家都在为我担心。

我回家后又出去看那个死人。这个人不是死在操场，而是在四队的打谷场，是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颗子弹打掉了他半个脑袋，把头都打烂了。一滩血把他身旁的地都染黑了。

我看到路外面有9辆被戳破轮胎的卡车。几天后，我们才得知死去的人是长治市里的一个中学生。

郭真宽的房子挨着中学围墙。他是袭击开始后第一个被惊醒的人之一。那天晚上，他叙述说：

玻璃破碎声惊醒了我。然后我听到学校卫兵吹号，我害怕了，我听见砸碎窗户，砸裂屋门的声音。他们把学校院里的所有的玻璃都打

得粉碎，强行打开所有的屋门。在一个学生越墙跳进我家院子里时，我听见一些人喊：“别让他跑了，捉活的，捉活的！”他沿街跑走了，追赶他的人捉住许多其他人，毒打了他们。我听到他们挨打时的尖叫声。

“我们完了，”我对妻子说：“太糟了！”

突然我听到火车汽笛声，汽笛声一直呜呜响，没有停。正当汽笛声突然停止后，接着开始打枪，枪声一声接一声，时间是凌晨三四点钟。

“袭击者原以为守卫者没有枪，但是他们错了。几天前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了。当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开枪还击。由于对真枪实弹毫无思想准备，袭击者开始逃跑了，有的人跑向南天贡，有的朝崇道跑，还有的从马厂向山周围的富村跑。我听见几个人从我家门口路过，有人藏在村里户家、厨房里，或仓库里，有三个人藏在第三队打谷场的麦垛里。

此外，夜里还下着雨。但是尽管天下着雨，后来还是有许多人在村里到处乱跑，满地横七竖八丢了许多零碎东西，泥泞的大街上，他们丢失了鞋、帽子、刀子、笔、锹，以及其它东西。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床。大家已经都去了大街上，正当我要走出我家大门时，几个铁路工人过来说：“别出来，回你家去。”我没有理睬他们，跑到我队饲养院。一头毛驴要在那儿下小驴子，我停下来看毛驴是如何下崽的。正在这时候，一个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被打死了，一个在四队打谷场，一个在机务段东面的十字路口。有人说第三个人死在我们砖窑里，这不是真的，只死了两个人。

铁路工人仔细搜查了我们村，寻找躲藏起来的人。我跟着他们去了三队打谷场，看见他们从草垛里拖出三个人来，把他们带回了机务段。他们审问了这三个人，后来把他们放走了。他们有人知道进行袭击的全部计划，有些人则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枪声一响，他们就到处乱跑。

第四队打谷场死去的是个学生。他家人来找他的尸体。他家人脸上都带着一条胶布，以便辨认。有人还在死去孩子的脸上也贴了一条胶布。

铁路工人赢得这次武斗的胜利。后来许多人都来这里看来了，就像我们的秋季交易会一样热闹，张庄、马厂、付村以及其他地方的村民都来看被刺破轮胎的九辆卡车。大家都赞扬“五四兵团”以弱胜强获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五四兵团”是河南省“二七公社”的支队，“二七公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及毛夫人江青直接支持的全国闻名的左翼组织，兵团作为胜利者闻名于整个晋东南，甚至远远超出晋东南之外。但是，同情“联”派的人赞扬这战斗兵团，而支持“红”派的人则害怕并指责这个组织。“五四兵团”的指挥之一自称为“牧羊狗”，他以“修理人”时使用的长鞭子而一名远扬。他的鞭子是用螺旋型弹簧钢做成的，使用起来具有毁灭性的效果。他朝别人的四肢或背猛一抽，就使人皮开肉绽。

“牧羊狗”的副司令也获得了残酷无情的名声。他为自己造了个绰号“胡里根”(流氓 Hooligan 音译)。这个名字来自外国，但是这样一个词是怎样传到上党高地的，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死于第四队打谷场的学生，和死于长北机务段十字路口的工人，如果不是全山西省文化革命最早的丧命者的话，也是属于最早的死亡者之列了。他们的死远远没有使局势缓和下来，而是火上浇油。既然有人首先使用了“热”武器，各派都意识到未来的命运取决于火力的强弱。凡是尚未拥有武器的组织，不得不设法制造或夺取武器了。

农民民兵支持他们派性偏见的指挥员没有问题。每当严重对抗受到威胁时，民兵队长就给他们发放枪支弹药。自传有机床的工厂工人，不仅很快掌握造步枪、手榴弹技术，而且也掌握制造重型武器和炮弹的技术。这样就使不属于民兵组织的学生和农民，或反对民兵指挥政策的农民，以及一般工人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没法依赖别人，只得靠袭击，夺取武器。

张庄的各派要搞到武器是没有问题的。李快腿的最亲密朋友和伙伴，是大队民兵营营长秦快嘴。一看到冲突的最初迹象，秦快嘴就命令他所信任的忠实成员，向每个人都发放了枪支，用优势兵力对抗敌手。尽管“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成员，原先属于民兵组织，但是，那时他们已失去配备武器的权利，因此不得不用非法手段恢复平衡。由于对他们盗窃武器的指控，很快增强了他们的对手的指责，用

来证实他们是反革命分子，“翻土改的案”以及“绑架公社干部”等。1967年8月28日以后，对方指责声名狼藉的“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抢夺了马厂公社故驿大队的武器弹药。尽管作为组织来讲，他们与此事毫不相干。原来，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的潞安中学学生对故驿进行了袭击。8月24日参加抢夺粮票和机务段大院之战的幸存者，决心尽快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和机务段“五四兵团”，以及司令部设在长治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对装备精良的故驿民兵分队进行了大胆的袭击。他们选择这个地方的大队作为袭击目标，因为这个大队社员不可能轻而易举辨认出他们是何方来客。

由于袭击者对故驿都不熟悉，他们要张庄第四队的一位青年人万田水给他们带路。万田水订了合同，在漳河岸旁的高家庄的灌溉站工作，因此临时住在故驿。然而，袭击者必须首先把万引诱回张庄。他们派人去告诉他，他母亲死了。大吃一惊的年轻人匆忙赶回家，却发现他母亲安然无恙，自己却被迫要带路袭击故驿，最后他答应了。由于他家里的人都参加了“海燕”，万的投降就意味着为了夺取武器，他成为那个严阵以待战斗部队的成员了。

袭击者在长北车站集合，乘一辆大卡车开往故驿，但是汽车刚刚开动就出了故障，大家不得不下了车。此时，铁路工人和运输公司工人进行袭击的激情荡然无存，就决定不去了。盼武器心切的中学生说：“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去。”于是就带万田水步行出发了。

当他们到达故驿时，万田水把他们直接带到大队部，找到民兵营长孔振英和革委会主任宗虎全。袭击者把这两个人的眼睛蒙上后，告诉他们俩，他们是长治南部淮海兵工厂的“红”字派。他们命令孔振英带他们回家，夺走步枪10支，机枪1挺，然后撤退到村外。他们带着这两个俘虏转圈，弄得他们搞不清东南西北，然后命令他们躺在干涸的水渠里。

“悄悄地躺下，否则就打死你们。”他们临走时说。

两位故驿干部静静地在水渠里躺了好长时间。最后天亮了，其中一个人设法拽掉蒙眼的绷带，看见他的同伴在离他仅几迟远的地方安然无事地躺着。由于担心袭击者可能还在他们的村子里，两个人就朝方向相反的潞城县城走去。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动员全村百姓，包括民兵四处寻找他们。被痛哭流涕的儿童围着的妇女们，天亮

前去公社指挥部报告，他们的男人失踪了。过了两天民兵们才在潞城找到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可以安全回家了。

当潞安中学袭击队返回学校时，其领导人把他们夺取的机枪赠给了“五四兵团”，把步枪交给他们的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对这起事件调查了四五天后，马厂公社领导得出结论，抢劫武器的人不是淮海兵工厂的工人，而是潞安中学学生。他们派治安主任老申去要失去的武器，但是他发现很难进入学校校园，学生们已经把他们的校园变成了军营，每道进出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一旦进入校园内，就是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都由神情紧张的值勤员用枪威胁着监视他们。主人说“去那儿”，他就去那儿，主人说“来这儿”，他就来这儿，他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老申和他们不是同一个政治派别的，他们是绝对不允许他踏进大门一步的。他要枪的请求只遭来一阵茫然的凝视。

“我们只是借枪支用一段时间，”学生们说：“等我们制服了他们，我们会归还武器的。”

一个名叫李可海的年轻积极分子领导了学生们的袭击行动。当张庄李快腿和秦快嘴听到这次袭击的消息后，他们就在全村到处搜查可海，抓住并痛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送到故驿进行批判，故驿村民又把他揍了一顿。几次毒打使李可海怒不可遏，好几个月后，在一次解放军军官主持的归还枪支弹药的交涉会上，他竟然用切肉刀去砍李快腿。

李可海觉得他被人出卖了，他不仅把自己看作和李快腿同属一派，而且和李派还有联姻关系。在潞安中学上学时，他寄居在煤矿工申仲堂家，曾向他姐姐求爱，而且最终和她结了婚。

自此以后，他多次参加了他姐夫的“保皇派”，进行打、砸、抢行动，然而他辛辛苦苦最终却挨了毒打。

“保皇派”了解袭击故驿的真相，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没法指责“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首当其冲的是申吾财。他们集中火力对准带路人万田水，把他划为“海燕”派，因为他亲戚是“海燕”派的。他们还以李可海领导了这次行动为由，不断提醒群众，这个挑动事端者曾是“海燕”派的成员，但是为了需要，而故意回避夏天他见到仲堂姐姐后，思想突然改变的。“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对这种公然歪曲事实的行动越是抗议，对立面就越是竭尽全力宣扬此

事。“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保皇派”成员，只要宣扬什么可能使对手名誉扫地，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他们心安理得地把一切真相都兜了出来，或颠倒事实。无需说，以小申为首的受害者也是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研究截至1967年8月张庄“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使我们相信，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必须回顾长治市、地区，以及省里的进展情况。大部分袭击本大队和使大队社员四分五裂的政治潮流，都是从上面和村外刮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追本溯源。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第二周，我们约见了几位地位高一些的干部。



第八部

全面内战

.....

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布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新
平
知

解
署

PDG

七十一 晋东南——玉米、 煤炭、钢铁之乡

李英奎是山西晋东南军分区的副司令和参谋长。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足智多谋、野心勃勃、夸夸其谈，诡计多端而又富有魅力的军官。这几种特征他兼容并蓄，值得研究。

在军队系统，山西省组成一个军区，晋东南地区则是个军分区。李英奎负责晋东南地区军分区司令部的工作，这是他的军职，他还担任行政职务，担任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党内职务是地委副书记。这些部门的最高职位由武天明司令担任。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么多的职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普遍实行的一种新制度的一部分，叫做“一元化领导”，也即统一领导。各级主要党内官员根据职务高低，都分别担任次要的行政职务，下自乡村小队、大队，上至中央各部门都是如此，几乎概莫能外。最大的例外当然在最高层，毛担任党的主席，却没有担任国家主席职务。毛一旦主导策划推翻了刘少奇，他既不自愿担任此职，也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担任，中央委员会取消了这个职位。

李英奎司令有一副广东人的矮小身材，小小脑袋，干瘪的脸庞歪向一侧，他嘴的右侧突出而下坠，从而使得他的右眼永远斜视着。这究竟是受伤的结果，还是天生的缺陷，我不清楚，但是给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的脸令人难以忘却。当他情绪好的时候，开口哈哈大笑时，这张严重扭曲的脸宛如恶作剧的调皮鬼的面容，另一方面当李英奎态度严肃或勃然大怒时，他那扭歪的相貌呈现出一付凶相，与其说是顽皮淘气，倒不如说凶狠可恶。你可在他轻松愉快的外表之下，感觉到某种冷酷无情、丑恶阴险的特征。1971年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他几乎总是设法保持友好愉快的姿态，显得彬彬有礼，从容沉着，才华横溢，智慧过人。

他生性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他讲起话来比大多数中国人都快，当然也比大多数北方人都快。他从不不会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即使有的

话也很少见。他喜欢讲故事，常常讲一些幽默离奇的故事，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对那些习惯北京话的人来说，就像是严重歪曲了的中国普通话，简直难以听懂。

李英奎地方口音浓重的故事，在晋东南广为流传。我们听说，有一次，他给部队讲江西苏维埃时期王明、博古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听众以为他在讲白菜萝卜。又有一次他让人“坚决深入抓”，人们听成“拿针直接扎”。

然而，李英奎机警敏捷，把弱点变成了长处，充分利用了南方沿海地区方言的特性。为了和在北京的同事通电话，而不被任何人监听，他找到两位福建籍战士，把一名派到首都，一名留在长治，当他们互相通电话时，线路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听懂，好像用密码通话一样。¹

1977年，我听说李英奎的心情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他的故事也并不总是幽默风趣。本地区接替他职务的人说，他的脾气臭名远扬，诅咒、臭骂、谴责，使得他的工作人员时时胆战心惊、忐忑不安。

尽管李英奎副司令在晋东南来说是个外人，但是，一说到这个地区，他总有一种自豪感，而且对本地区也了如指掌。他喜欢背诵毛泽东关于在那里进行的内战的描述，说：“上党区四处环山，就像一个浴盆一样，在这个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

李司令还喜欢列举某些基本事实和数据来总结他所负责的地区的特征：

“晋东南地区，”李说：“是由叫做‘上党’的高原组成的，四面环山——东有太行山，西北有太岳山，西南有中条山。高大的山脉和构成山脉的峻峭的丘陵，占了全区2.3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85%，其余部分是山谷地带，只有小部分的谷地，如张庄周围古老的湖盆是平坦的。”

上党高原海拔790多米，与其相连的山脉高达1830米，这些山脉之后，沁源县境内的华波山高达2438米。三条河流把这座高原截为三截，沁河和丹河两条河流较小，向南流入河南省，而大浊漳河却向

¹译者注：李司令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就像美国电影《风语战士》中记载的在二战中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在幕的印地安战士，进行绝密的电台联络一样，运用部族方言进行联络。

东注入河北省，并在那儿与清漳河汇合，最后又与卫河汇合，构成了天津附近的大运河。浊漳河的南部支流向北，流经长治注入漳泽水库，为张庄村提供了灌溉用水。

晋东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温和，但是也十分干燥。每年150多天的无霜期，有利于农业生产，但是，580毫米的平均降雨量也限制了植物生长。大部分降雨集中在7月和8月。当这些月份不能提供其定额雨量时，甚至水库都会干涸，因而导致庄稼歉收。

1971年，本地人口373万，其中农民350万，分别在22700个生产队居住和劳动，组成了4965个大队，341个公社。他们耕种着772万亩土地，分别种植玉米、小麦、谷子、高粱、棉花、大麻和党参。这就相当于每人平均二亩土地，但是，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得为23万城市居民提供粮食。土改后二十几年，集体化15年，他们成功地使粮食产量翻了番，但由于人口也几乎翻了一番，所以人均粮食水平仍然和过去相差无几。

然而，25年后的工业成就，给人的印象就要深刻得多了。晋东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包括煤、铁、硫、铜、镁和铝。1949—1970年期间，吸引了国家大量的投资，开采矿物的价值和生产的商品是原来的10倍。仅煤矿就有564座，大部分都是新开采的。这个地区的工业生产总值达到61666万元。

李司令夸耀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南呈大队领导李秉壁有机械天才的声誉。1954年，他用两匹大骡子换回了一台被烧毁的福特牌拖拉机，用毛驴从河北拉回家，然后修理好用木炭作动力继续使用。这台拖拉机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6年运送到中国的。1971年，他又重新改装，用汽油作燃料。60年代，李秉壁购买了足够的中国制造的新式拖拉机，来耕种他大队大部分土地。他不顾男人至上的旧思想，让年龄还不满18岁的姑娘们驾驶12台手扶拖拉机，分配他们往地里拉运东西。在大队开办的铸造机械厂，男女青年们浇铸拖拉机引擎部件，生产车床和钻孔机，在附近销路很好。一组农民在野地里用电动压缩机制砖。

南呈还有无寄生虫猪、大洋马，为造肥而饲养的一栏栏家畜；粮食由集体贮藏，而不是家户贮藏。有大队中学；一周一次免费洗澡，一月一次免费理发。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另外，大队领导李秉壁每天

清晨四点起床，开着卡车去一个地方煤矿为全大队家户拉煤，家户只付煤款不付运费。显然，南呈有些方面可以比大寨还好。

东四义大队走得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它专门从事中草药种植，公共卫生事业和全面卫生保健事业。那里的公社社员，在特设的园田里种植栽培草药，并适时采集野生草药，在漫长的冬季，为北京加工草药。他们配备了一个医疗所，并为它供应各种中草药，他们用石块铺了大街，在流经他们村口的混浊的河上筑坝拦水，并沿着这样形成的蓄水池修筑起石墙，看上去宛如北京颐和园的湖水一般，他们把村外的砖窑，改建成一个生产氮肥的塔形建筑物。

晋城县大阳大队专门从事生铁冶炼。那里的山坡上矿井到处星罗棋布，农民矿工用手推车、毛驴车，或者小型铁矿车沿着窄轨道，把矿石运到乡村高炉，大队社员们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下，拥挤在一起的一组组石块修造的房子里。悬崖之颠，一座千年古庙俯视全村；点缀在石屋之间的座座高炉，昼夜不停地喷吐出缕缕浓烟，从古庙的前方飘过，烟雾中的腐蚀性物质被吸附，渗入庙宇的雕梁画栋上，久而久之被熏得漆黑。

大阳的高炉显示出三种技术水平：大队一级水平，社员们是在黄土中挖矿井，安装着冷气鼓风机，每天每座矿井生产一吨半生铁，尽管生铁是脆性金属，不适于制造机器，但是，仍然可以浇铸成饭锅以及其他家用器具；公社一级水平的高炉，是由技术人员和工人用砖坯砌成的大型锥形熔炉，装有热风鼓风机，每天可生产6吨灰口铁；县级炼铁工人毫不示弱，他们建起了两座钢塔，如果无法与古庙媲美，却也与其试比高低了，这两座高炉每天可生产40吨灰口铁。

大阳农民冶炼当地铁矿搞副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早在大跃进提倡到处兴建土高炉之前，他们就建起了自己的高炉，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农民废弃大跃进时期的高炉好长时间之后，大阳农民仍然坚持冶炼生铁没有停止。大阳有600人长年从事炼铁业，他们在庙东挖铁矿，唐西采煤，在中间的古庙附近冶炼生铁。每年大阳的15座高炉可生产2万吨生铁。

晋城县煤、铁资源丰富，专门大办各种小工业。县工业展览馆展示了数百种地方产品，显示出他们从制造化肥到理发剪刀的一切物品的各种土办法。晋城县的一个人发明了一种矿车自动卸货设备，这种

设备能使车底盘脱离满载矿石的漏斗车，在一卸货后再将矿车联接起来。许多其他发明物的模型陈列满了整个大展厅，既有独创性又很有实用价值。

李英奎副司令使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改造远远不是强迫在全区搞千篇一律，这种改造已经释放出巨大的潜能和创造性。山西晋东南人，多才多艺，才能出众，不能不给所有的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李司令和地市其他领导干部接着谈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地的人才、活力和创造性，也使派性斗争加深、扩大、发展和复杂化了，其程度之深是自公元前几百年的战国以来，在这些山脉中发生的任何派系斗争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的问题集中到了关键的1967年。

七十二 三圈两步

1967年夏天，晋东南革命委员会仅仅代表一种徒有虚名的“大联合”。团结已变成了紧跟形势的，不加掩饰的伪装，虚情假意就像演戏一般。而委员会内部两大敌对派系头头们，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尽可能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联盟，和调动一切可能的财力上，为夺权进行最后的较量而作准备。

在地区的竞争舞台上，双方不仅都在偷偷摸摸地怂恿一些人进行诽谤性的宣传，而且还暗中支持下属单位，突击搜查文件、实施绑架、施行肉体迫害、夺权。高层的明争暗斗需要各方动员下级进行支持，从而导致乡村的群众发生两极分化，引起广泛的纷争和混战。由于双方都不想使自己孤立无援，或遭受挫折，每个行动都会激起报复行动，而且在程度上往往比原先更加激烈，采取行动导致过度反应，过度反应导致了暴力冲突。一旦爆发武力冲突，几乎不可能理智地恢复谈判，更不用提和平解决了。由于不满引起不满，伤害引起伤害，征服招来征服，两派甚至一见面就怒不可遏，进行和谈就更不可能了，双方几乎都热衷于武斗。

地、市发生分裂的根源和张庄大队一样，都可追溯到1966年的学生运动。市一中初期号称“要武大队”的一群“造反派”，为了压倒

一群叫做“红色风暴”的“保皇派”，找到了同盟者，并结成了联盟，叫“红旗”，作为报复“红色风暴”成立了“北京公社”。

到1967年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权之时，晋东南就或多或少存在着两大群众组织网。每个网络都固定在一个学生联盟的周围，每一方都在持续不断为争取下面的成员和上级承认而竞争。然而在初期，组织的路线还显示出某种不稳定性，同盟不断进行调整，组织的成立、解散，或者改换观点的组织形式，就像“联络站”、“司令部”以及所有其他特殊的群众活动形式变化一样，因此，彻底把原属“造反派”和原属“保皇派”的人混合在一起了，要再进行这样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尽管通过合并，所有的“红联”和“北京公社”仍然可以追溯出他们前后的一致性，但是，最后出现的敌对两大联盟只简称为“红字号”和“联字号”。

当“红字号”和“联字号”逐渐形成的时候，他们仅仅进行随意的活动——这是风暴前的安静时期，去河南省矿山城镇串联的长治学生回来后，讲述了各种尖锐对抗的情况和形势，但是，他们在上党地区却煽动不起类似的事件来。从省府太原下来的一支学生小分队，发现长治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十分扫兴，不等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就张贴大字报，谴责晋东南地区死水一潭的局面。他们呼吁采取能挑起争端，制造混乱的行动。没有激烈的辩论，没有武斗和混乱，旧秩序不可能摧毁，新秩序也不可能确立，如果没人唤醒群众，如果组织之间不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那些日子里，赞颂暴力和混乱不仅证明倍受欢迎，而且也是强制性的。那些对此犹豫不决不肯赞扬的人自然被看作“保皇派”修正主义者、反动分子，甚至被视为反革命分子。投弄是非，造谣中伤，率先指责，以及最终诉诸武力的人才被看作是革命派。

晋东南地区的武斗者迅速回应，迎接太原启蒙者的挑战。上海夺权的消息，于1月7日传到山西。1月14日，上层“造反派”推翻了在太原的省政府。不到一周时间，“红联”（通称为“红字号”）发动长治所有可能发动的联盟，包围了市委和地委。全副武装的小分队把公章监护起来了。但是，他们没能得到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支持，反对派组织拒绝承认这次突然行动，所以几天内“红字号”政权就垮台了。

1月25日敌对联盟“北京公社”（通称为“联字号”）向掌权的干部

发动了第二次袭击。代表着1万名成员的52个组织，把数以千计的好斗者派到大街上。这一次，当头头们夺取公章时，命令骨干小分队在市政府前面来回走动。由于营造了这样的“合法氛围”，这次夺权成功了，“联字号”在市和地区当家作了主。²

我们在张庄已非常熟悉的烟鬼范机灵，在接管市政大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原先是粮食局一名保管。1966年6月，他写大字报抨击局领导不去开展群众运动，不去批判和揭露北京邓拓的《三家村夜话》，因而声名大噪。接着，他抨击粮食局局长杨青写的一本有关粮食购销、储存、处理，跟踪粮食变化的手册中，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或阶级斗争。范机灵的攻击尤其得到粮站工人的支持，他们对必须掌握区分粮食贸易复杂的等级、温度以及价格十分反感。他们谴责所有的这些做法是“业务挂帅”，尽管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时，还没有出现这个术语。

曹副局长把范机灵的大字报作为基础，在自己周围集结一群人跟踪杨局长。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他指控杨的历史不清白，杨不甘示弱，动员一些支持者对曹进行了穷追猛打，指责曹副局长充当日本人的汉奸，为一个朝鲜人的资本家买海洛因；他还为一个姓吴的嫌疑叛徒掩盖事实。这个人从日本人的监狱获释后，利用自己参加过部队的功劳窃取了长治副市长的职务。

当粮食局两个局长相互攻击的时候，普通党员们和范机灵携手合作，把他们两个人统统赶下台了。一个新选出的党支部满腔热情地承担了这项任务，继而向前任曹副局长开了火，指控他参与了一起大的叛徒案件。1968年曹子绝望中，在一个放扫帚的小屋子里悬梁自尽了。

在这期间，范机灵积极肯干的表现和文才引起了市领导的注意。得到外面支持的学生好斗分子，已经发动向《长治日报》造反。党委需要有个具有“造反派”牌子的人来处理危机，他们选中了范机灵，把他提拔到市党委，并让他负责《长治日报》，这样他们请来了这位最终把学生好斗分子全部轰走的人。

市委成立的文化革命大型组织称作“红旗战斗队”。最高峰时，其

²译者注：当地人们在谈论文革时，把最终成为“红字”或“联字”的组织分别称为“红字号”和“联字号”。“1.25”夺权活动的主力军是“晋东南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即“联字号”的早期组织。

成员多达180名，全部是党员干部。尽管这个组织与自称为老造反派的“红字号”建立了联系，但是它却支持市委书记，因此被范机灵授予“保皇派”的绰号，“红旗战斗队”为其成员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每个成员必须是干部、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而且是历史上从未犯过错误的革命者。

由范机灵领导的报社18位党员中，只有两人阶级成分和历史合格，可以参加这个受大多数人信任的进行新革命的组织。范机灵就是两者之一，但是“红旗战斗队”排外的章程驱逐了他。于是，他决定和13位创始者成立自己的组织——“红色新闻造反派”。后来，这个所谓的“群众”组织发展到17名成员，它的目标是在报社认真开展“斗、批、改”运动，支持学生要求，为长治的“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

被驱逐出“红旗”组织的另外8名党员成立了“红色造反派”，并发誓要搅动市委的一潭死水，和它的反革命路线算帐，清除长治“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绊脚石。

这两个少数派组织与广泛的学生、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松散地附属于所谓“保皇派”、“联字号”联盟，其中有长钢、柴油机厂、国营建筑公司，以及报社印刷厂的工人小分队。联络的学生包括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长治一中、二中组织，以及在张庄的潞安中学支队。

当“上海大革命”的消息传到山西省后，范机灵的“红色新闻造反派”和“红色造反派”领导的七个联盟组织，夺取并查封了“红色新闻造反派”控制的市报社，然后发布了一封叫做“长治新闻”的煽动性文章，它的纲领是：谴责市委并准备夺权。

范机灵给我们描述了冲突是如何产生发展的：

在我们接管报社后，我们问为什么市委能镇压学生和干部，并且得出结论，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大权。显然，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市委的大权统统接管过来。

我们派出两个红色造反者去打探同我们一派的组织，征求对夺权的意见，结果他们回答说：“今天晚上就是机会。”

我被弄糊涂了，怎么能成功呢？

他们说，我们必须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所有领导干部集合到一起，告诉他们无权了，命令他们靠边站，并成立我们自己的指挥部。

我问省城太原是不是这样干的。

他们说。

可是，我仍然有几个疑点，这是北京中央号召干的事吗？我们究竟真正代表谁？我们能组织个什么样的管理机构？一旦我们掌了权该怎么行使权力呢？

外来的学生们还是老调重弹他们以前说过的话，太原造反派是学习上海模式，我们应该模仿太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一切都符合中央指示。

报社的一些人辱骂我害怕承担这样一件重大任务，外来的学生不耐烦地说“没有你我们也要干！”

干就干，我想，如果他们要采取行动，我最好和他们一起干，即使看不清将来命运如何。于是，我说“好吧，咱们别担心对错了，只讨论一下如何采取行动。”

同意那个方法后，我们成立了指挥部，并作了安排，我的组织负责把所有市委书记们召集到一个地方，并把大楼关闭起来扣留他们，不让其他人进去。这话听起来容易，但是我们只有17个人，怎么能把他们5个人逼在一个地点，又同时把大楼封住呢？那座楼里有500多人上班，怎样处理这些人呢？

其他人说，如果我们能对付党委书记们，他们会帮助我们看好大楼。于是我们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另外，我们还决定每个参与行动的人，要在左臂上佩带白毛巾，那样我们就能确定所看到的人是那一派的。

25日下午，市党委在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走进去，责问党委成员们，我们关闭长治日报社是否正当，他们中有些人怀疑有阴谋，立即走出会议室逃跑了。我们命令剩下的人别动。王景生市长、副市长以及3名常委服从命令了。党委的老郭问，他是否可以出去买点东西吃，但是，我们不允许，我们说他必须首先回答我们的问题。其他人甚至连走的要求都没有提，他们担心我们要动武了。

反对派组织“红旗”派出小分队封锁了大楼的出入口。几个成员进楼内和我们进行辩论。他们说至少应该让老同志们出去吃点东西，可是我们不答应。我们进行了分工，一半人和“红旗”派的人谈话，另一半人和市领导说话。我们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8点。这时，一个

只有8名成员的组织“红色造反派”发动3000名学生工人包围了大楼，他们齐声呼喊“打倒王景生！”到那时，市长才意识到他遇上了麻烦，他问：“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说：“不知道。”

“红旗”派派人出去看去了，但是再也没有能返回来，因为他们没有佩戴白袖章，我们的人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扭送到一楼看管起来了。

我们抓住三位最重要的市委领导，把他们拖下楼梯，拉到前门。

楼门前，一位来自长北机务段的名叫徐治有的工人，和一位来自北京名叫罗定战的学生，代表我们“夺权指挥部”宣布，我们已解除了他们三位的职务，其职务由我们司令部负责。外面传来了我们的支持者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我们把三位市委官员硬推进一辆轿车，送往地区宾馆，在那儿，把他们扣留了几天。在我们夺市权的同时，其他小分队夺了地委机关的权，于是，仅仅一天工夫，地、市大权就双双落入我们手中。

附属于“联字号”的组织，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一举成功，迫使那些坚持站在另一派的许多人怀疑起自己的立场来，毕竟夺权是当时的潮流，如果他们反对，他们的下场会怎样呢？数十名市级干部脱离了“红旗”一派，成立了大约有15个新组织，他们有些人要求参加新造反“指挥部”，他们觉得虽然夺权是正当的，但是，采取行动时机尚未成熟，“指挥部”并没有得到下面足够的支持，一些特邀组织也不符合联盟所要求的标准，他们的历史似乎也不清白，甚至是反动的。这样考虑问题的人联合一起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总部设在市府南端，号称为“南站”，并和地区“红字号”组织建立了关系，支持夺权的人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联盟联络站”，司令部设在市府北端，号称为“北站”，并和地区“联字号”组织建立了关系。

南站成员举行秘密会议，策划推翻“指挥部”，但是，还未采取行动，就走漏了消息。“1.29黑会”遭受毫不留情的攻击之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从1月25日地、市政权更迭后，到4月5日，南北站最终组成联盟，长治市处于一片骚乱之中。外面的学生，尤其是来自太原的山西大学学生，不断煽起新的争端，把省城学生运动的分裂带到了地区。他们辩论的分歧，反映了为争夺校园的控制权所发生的对抗。

山西大学“8.14”的几个成员和“南站”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一

看见与北站联盟的山西大学“8.8”的几名成员就忍无可忍。“8.14”指责“8.8”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那些日子里，关锋经常以主要的左派大员身份出现在新闻媒介中，“8.8”公然违抗关锋，退出了在太原掌权的联盟，这样，在其对手看来，正是暴露了它自己的反动本质，这样的—个组织怎么能声称有权分享长治的权力呢？它们—出现就对“指挥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由于“8.14”与“8.8”两派相对抗，“红旗”与“红色新闻造反派”两派相对抗，而且“南站”对“北站”相对抗，群众运动似乎是绝对两极分化了。然而，曾有一段时间，一些持异议的独立派，仍然犹豫不决，左右摇摆。其中之一是由市政府六个科级干部成立的“遵义尖刀队”，他们支持“指挥部”，而“指挥部”却拒绝和他们有任何交往，所以他们徘徊不定，想寻找一个有组织的大本营。

1967年最初几个月的冲突，仍然主要是以舌战引发的。市政府和大街周围到处都在昼夜不停地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由于大部分人白天必须上班，学生们从八点一直辩论到下午四点，但是，傍晚时分，工人下班、政府干部离开办公室后，半个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辩论。晚上九点左右，激动人心的辩论达到高潮，直到凌晨两点左右，“顽固派”认输回去睡觉，辩论才骤然平静下来。

在大街上，成群结队的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又分成了许许多多小股人群，人群不断地聚散组合。一个地点有十几个进行激烈辩论的活跃分子，只要他们能坚持大声争辩，就能吸引—倍围观的听众，辩论声音减弱时，旁观者就渐渐溜走而转到其他地方了。—派可能在某一个地方辩论失败，但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混乱之中经常爆发武力冲突，许多次辩论都引发了武斗。

—派的成员往往把—个辩论小组团团围住，然后派人进去参加辩论。—旦他们在人群里被挤散的话，他们就捡起砖头往外扔，于是就引起“自卫”，他们外面的同事就把石块砖头扔回去。接着发生了激烈的武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怒之下爆发的，实际上，每次这样的事件都是某个组织幕后操纵的。孤立无援的辩论者也可能引起争斗。—个青年人会—手把小红书高举过头顶，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而用另—只手猛击—个对手的腹部，并踩他的脚。街上的大部分人都穿着布鞋，但是许多工人穿着沉重的皮鞋。如果他们猛踩—

脚，会把脚趾头给踩骨折的，如果受害者说：“嘿，这是干什么呀？”讲演者会矢口否认：“挨打了？我可没有打你，冲动什么呀？”

大部分旁观者都感到莫名其妙。

人们从一个叫“东方红”的组织，学会把辩论变成武斗的可靠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叫做“三圈二步”。一群好斗者会把几位反对派头头领到一边去商量事情，然后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样围起来的人群，看起来是漫不经心的，但他们实际上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内圈里站着年轻姑娘，第二圈站着是同一派给他们撑腰的男子汉，而他们后面是更多的兄弟组织的男女成员，尤其是专门动员来的人组成了第三层包围圈。当辩论进行到激烈的时候，前面的女成员就大叫起来，用手指头戳人，甚至用织毛衣针刺人，反对派的人或迟或早会掴一个女成员的耳光进行报复。于是，男成员就跳上前去“保护女性”。当女成员逃走时，兄弟组织的身高体壮的开始大打出手了，而中间的一小组人却偷偷溜到一边，到武斗达到高潮时，那些惹起事端的人早已溜之大吉了。

“东方红”的组织是依附于“红字号”一派的医专学生。他们选择一个叫王进奇的人当头头。他的敌人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无赖，能说会道，而且还懂得如何哭，当部队司令叫他去，斥责其卑鄙的伎俩时，他开始大哭起来，他的30个追随者也和他一起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有些人甚至晕倒在地。其实这是他们玩弄的一个诡计。

“如果青年人不受迫害，会哭得晕过去吗？”王反问道。

在大街上自由争论的过程中，大字报是对大辩论的补充。相互竞争的组织在大街上竖起了临时宣传栏，英雄大街的主路上从南到北，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许多其他街上也随处可见。各个团体本来应该各自使用自己的宣传栏，但是，他们很快学会蔑视规定，想在哪个地方贴就在哪个地方贴。写大字报的人，在他们新写的大字报的所有边缘都写着：“保留5天”的字样，但根本没人理睬。刚贴的大字报浆糊未干，对手们早在上面贴上了新大字报。一开始人们在家写大字报，然后拿出去张贴起来，后来他们很快放弃了这种方法，而直接把纸张、墨、笔和浆糊带到街上，就像他们匆匆写大字报一样，又匆匆忙忙随心所欲地贴起来。甚至，当他们到了街北时，对手已开始覆盖他们在街南留下的大字报了。

大字报之战迅速蔓延到市外。仍然以只有八名成员为骄傲的“红

色造反队”，把大字报沿公路一直贴到太原。这种热情从那些反对夺权和长治新“指挥部”的人那里赢得了“铁杆保皇派”的称号。“红色造反派”头头李继忠也被称为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黑走狗”，这种指责把李继忠和被推翻的卫恒联系在一起。谣传卫恒在太原失权后，曾派出追随者去长治夺权。

写大字报、张贴大字报，往往会引起武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且愈演愈烈。然而，最严重的武斗并不是由大字报引起的。2月29日，山西大学“8.4”成员和200名支持者一起向市政府游行。他们要去抓“8.8”派的12名成员“修理他们”³，就是说要狠狠揍他们一顿。

“8.8”派组织十几个人把自己锁在北站办公室放声高歌，以示反抗。他们的同盟者范机灵，命令他的支持者去保卫大楼，为了确保胜利，他还报告了市里的解放军司令部。部队派出一个摩托班和一个骑兵班去维持秩序。看到这支半机械化、半骑马的部队就够遏制200人了，他们仓惶撤退了。

4月5日，为了响应全国上下加强团结的号召和当地部队指挥员的迫切要求，长治市北站“联字号”加入了南站的“红字号”的“大联合”组织。4月8日，大联合联盟的头头选择了由军官、老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组成的革命委员会。4月17日，晋东南地区“大联盟”选定了类似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新组成的政府一旦接管了两级政权，他们就宣布政治斗争过时了，号召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并鼓励大家携手改造社会，发展生产。

到5月，已清楚表明这样的和平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成立大联盟和统一委员会，就像往活火山上贴纸一样。从“文革”一开始，就使人们互相妒忌、仇视，敌对情绪仍然在恶化、增强并迅速加剧，派性斗争和武斗迟早会重新爆发的。

第一次冲突的迹象是5月初成立的反对“1.25”夺权组织引起的。这个组织叫做“批刘邓红联站”，不仅联合了那些仍不能接受现状的红色联盟成员，而且联合了各团体反对派联字号联盟的叛逆者。晋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淮海兵工厂”的工人，组成了一个庞大兵团。他们

³译者注：“修理”是文革中流行于一些地方的名词术语，意思是尚武的教训和揍人。

曾支持“红字号”首次的夺权尝试，但是，却没有参加“联字号”进行的第二次成功的尝试。当最后选定革命委员会时，这个反对派称之为“大混乱”、“大杂烩”、“一桶泥沙”，代表复辟派，不代表革命派。在他们看来，真正掌了权的是部队，他们认为这支部队是一股保守势力。

的确，这支部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月25日夺权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得到了驻地部队的支持。部队司令员武天明和参谋长李英奎没有和第一次夺权合作（可能根本没有请求过他们），但是却全力支持了第二次夺权，甚至派部队上街制造一种“合法气氛”。很久以后，当各派联合成立新的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时，武天明和李英奎自然在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们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许多人得出结论：“枪杆子指挥一切”。如果他们在处理与不满的群体和团体的关系中能大公无私，他们或许会得到广泛支持。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任人唯亲，和那些服从命令、阿谀逢迎的干部、运动的头头密切合作，而孤立其他人。

新生革命委员会主任程首创不是军人，而是省革委会最初指定的领导地区“核心领导组”的共产党干部。因为他是外来的被任命者，“联字号”造反派夺权时，就忽视了他。再则，因为他是地区级别最高的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反对“1.25”夺权，所以他们选定他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然而程首创很早就和武天明司令、李参谋长闹翻了。分歧的产生是由于对被推翻的老干部估计的问题上，这可能是预料中的事。到5月时，在哪个干部该复职、哪个干部靠边站的问题上对立十分尖锐，以致程首创帮助建立了分离的组织，叫作“华北为王尚志复仇造反大军”。

“四清”工作队队长、前地委书记王尚志。在“文革”开始时，从内蒙分配到晋东南地区还不到一年时间，市公安局于1966年12月31日，发现他死于一个机井里。6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调查他的死因。是自杀，还是某个敌对派把他扔到井里的？没人知道。然而，曾在王尚志领导的“四清”工作队任政治指导员的程首创，指责解放军要对王的死负责。

1967年7月19日，数千名示威者，包括一支淮海兵工厂庞大的队伍，包围了长治市的部队司令部。他们谴责部队在地区独揽大权，

镇压左派，支持修正主义复辟，更加具体的就是把王尚志迫害致死。他们要求解散执政的革命委员会，选择由人民赞同的新的革委会。

7月21日又一批示威者，以淮海厂工人为战斗中心聚集在一起，包围了“联字号”的堡垒地区医专，并企图冲进去。在随之发生的武斗中，据后来“联字号”组织指控所说，淮海工人毒打了200名保卫者，打伤90多人，严重受伤的17人，损坏财产价值10万元。

7月22日，“红字号”组织包围了晋东南地区军分区，要求武天明司令员出来，当面接受批判，他们粗暴责问了他好几天，“联字号”组织说“斗争了他”。曾领导攻击在张庄的铁路机务段遭惨败的工人徐彪说：“必须打倒武天明，如果我们一周内打不倒他，我保证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到他司令部门前。”

7月23日，李英奎司令带领西沟劳动模范李顺达，上首都北京，找到被召往北京讨论晋东南地区混乱局势的山西省副省长、省革委会主任刘未老。⁴刘主任说，尽管“复仇大军”包围部队包围军分区并不是错误行为，他还是劝告这个兵团中止这种行动。次日，7月24日，“复仇大军”确实取消了示威活动。

几天以后，市革委会、常委严厉责问了“红字号”的同情者程首创有关反军示威和医专武斗问题。这一次是他上京找省革委会主任去了。当他去了那儿时，刘主任邀请他参加讨论有关山西的问题，第六十九军一个护卫队于8月11日把程护送回长治。后来，据“红字号”组织说，“联字号”组织的支持者拉程首创参加群众大会，都反过来斗争他。

在拉锯战冲突时，最严重的对抗，发生在淮海工人包围了部队军分区的时候。据李英奎司令说，他们的示威活动，最后一天下午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那天，只有一名士兵站岗，当敌对的人群呼喊着反军口号列队游行时，从站岗士兵附近走过的人，都朝他吐唾沫，孤立无援的哨兵，仍然持枪直立，从没有改变过姿势。据大家所见，他甚至连肌肉都没动一下，数以千计的敌对工人，把唾液吐到他的脸上，手上、枪上和军服上，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当人群继续不断唾沫时，过多的唾液开始从他的身体前部流到地面上。当最后一个示威

⁴译者注：即山西省组织夺权的领导干部刘格平，当时部分群众干部反意见讽他“踏遍晋山人未老”，故名。

者从他身旁走过时，哨兵仍然纹丝不动地站着，唾液开始慢慢从脚根向外流淌，几分钟后，李司令让这名哨兵得到了解脱。但是那位军人身穿湿军装，站在不断流淌唾液中的情景，并没有很快在目睹过他的人心中消失。

1977年，地区领导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然而，我倒是倾向于相信李参谋长说的是真话。就是他那丰富的想像力，也不会轻易凭空想象出这样不同寻常的场面，和如此可耻的举动。假设确有其事，前任地委书记的死，会引起数千计的工人，往一位解放军战士身上唾唾沫吗？在这种耻辱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呢？为什么兵工厂的工人会首先攻击部队呢？

这些工人憎恨在晋东南地区部队，无可辩驳的首要原因是部队司令员和工人们所属的派别不和，在本地区主要政治生活中，他有效地把他们全部排除在外。那年春天，全国上下刮起的反军之风，更加深了这种不满情绪。1967年4月，北京文革小组内王力、关锋的好战同事，警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临即将到来的四层资产阶级包围圈的威胁，尤其是包括“山西部队所支持的右翼倾向”。7月14日王力严厉批评陈再道司令员走资本主义道路，陈后来扣押了王力本人¹。当程首创“复仇军”组织的成员包围了长治军分区，并进而向哨兵吐唾沫时，他们的先锋王力，仍然被单独禁闭在华中武汉市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普通工人对初次夺权的方式不满，对向他们进行的诽谤性指责，及取消了他们的优越地位极为愤慨。可以明白，被武汉事件感到震惊的普通工人，是如何赞成这股从北京吹来的强劲的政治之风。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在长治的中心，的确面临着军装的反革命。

我们现在还能理解当地武天明司令、李英奎参谋长，是如何能把针对部队的造反示威，看作是极“左”分子所煽起的全国性的、反军阴谋的一部分。“复仇军”的阴谋，与北自沈阳，南至广东的多起攻击部队设施和部队机关的事件相巧合。部队司令解释说：这样多方面的进攻，几乎不可能是同时自发产生的。他们坚信人民解放军是革命

¹译者注：指武汉1967年7月20日发生的军人、群众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事件，但王力并非陈再道司令员扣押，而是支持陈的军人和群众；参见后面作者的专门记述。

的堡垒，确信是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策化了攻击部队的事件。9月5日，当毛夫人江青，谴责全国性反军之风，指责“5.16”阴谋集团一伙时，武和李感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很清楚，正是他们自始至终保卫了革命，而其他人在反对革命，反对他们的对立派领导人是危险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在以后的几周内，武天明和李英奎发动了旨在使反对派永远名誉扫地的反攻。他们的策略是把火力对准地区革委会主任、反对派力量的领导者程首创，怀疑他是叛徒、反革命和国民党分子，用这种手段使他的整个组织，以及在他领导下联合一致的，一切大小组织威风扫地。

进行这个反攻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李英奎司令。

七十三 诬陷的剖析

1971年9月，当李司令坐下给我们谈程首创时，他那不拘礼节的特征，口若悬河的风格，突然变得吞吞吐吐，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讲话慢条斯理，说完一句话，停下来看看天花板，一停似乎就没完没了，然后又补充第二句，仿佛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下一句话应该如何说。韩琼翻译时，只能想出他后面将要说的话。在我看来，他似乎毫无自信心，他在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试了一个想法又一个想法，注意着每个想法对听众的影响，然后继续谈自己对程的看法。

在整个谈话期间，他的这种表现是不符合他的基本特征的。当他详细说明所摆出的“事实”的重要性时，他逐渐开始正常谈话了，当说到关于如何了结此案，谈他自己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他有力地说：“程首创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应该让他缓刑两年，给他个改造的机会。如果两年期间，他没有再犯错误，可以判成死缓，否则死刑必须执行。”

李英奎给我们的讲述的第一件事是，他对“红字号”领导程首创的出身、工作经历，以及从入党以来的历史进行的调查情况。他谈了他如何派出调查组，在全地区、全省、甚至到附近省份了解这位地区专员的历史。然而，李司令说，派的调查组提出，在程首创的档案中找污点时，而其他工作队则提出要发表程首创档案中最优秀的材料。

当程的敌手发现10份文件，说他的档案有严重的问题时，他的支持者拿出了能证明他是坚定的革命干部的86份文件，进行反击。

他指责说，程的支持者走得甚至更远。他竭尽全力阻止，甚至破坏其他派别找岔子的调查研究。当“联字号”组织派人去黎城县调查敌伪时期档案时，“红字号”组织发动其支持者用武力占领县城，结果，没人能找到档案。“联字号”几次前去黎城，每次都遭到毒打，捆绑和监禁。然而，当程的支持者太原市兵团去黎城时，却畅通无阻地得到所有相关的材料。“联字号”去洛阳、太原时，处处受干扰，在洛阳，“红字号”企图绑架他们，但是，当地解放军粉碎了“红字号”的阴谋。

李英奎司令指责说，正当“红字号”阻止“联字号”调查人员去寻找证据时，“红字号”调查人员本身也发现了可使程身败名裂的材料。但是，他们就此撒谎，正如他们阻止“联字号”调查人员辛辛苦苦寻找任何证据一样，隐瞒了程的罪证。

因此，李英奎说：“调查和反调查引发了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尽管困难重重，李司令的人还是很快搜集了完整不可辩驳的材料，这些材料分为几类：

1. 程的阶级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
2. 捏造历史，冒称在抗日战争中是爱国者。
3. 公开的反革命活动。
4. 后来冒充革命干部的骗人历史。
5. “文革”中掌权。
6. “文革”中的分裂活动和主要罪行。

下面是李将军搜集的有关他的冤家对手的一些“材料”：

程首创生于1919年，他说其父母是贫农，实际上是富农，一家4口人就拥有80亩土地，一头骡一匹马。从1935~1947年他们一直雇用长工，每年收租1万斤。程的父亲是他家族的首领，也是一位阴阳先生，他母亲为道教、太阳崇拜社的首领。他姐姐程爱田初婚嫁给一个地主，后来又和国民党书记长曹潘成有暧昧关系，他二姐程晋平也是嫁给了一个地主。

程还在年幼时，由父母包办，与一个姓宋的女人结了婚。当他外出时，他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怀了孕，因此，他母亲卖了她，安排他娶

了同村另一个姓宋的妇女，他们叫她宋易换。这姓宋的女人是本地一贯道首领的遗孀，她的丈夫参加了1942年反对解放区政府的暴动，八路军捕获并击毙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后，她嫁给了程。李英奎说：“他整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人历史清白的人。”

1936年，由国民党特务分子杨成方推荐程在黎城县监狱当了监狱长。1937年他参加了国民党军官训练队，训练队属于山西军阀阎锡山组织的新军一部分。薄一波领导时，这支部队变成“山西抗日决死纵队”，程一开始是一军五连的班长，在五连被提拔为政治干部，当了连政治指导员。1939年保卫平遥，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住院。

根据程自己的说法，当他住医院时已是党员，是1937年入党的。他说出两个自己入党的介绍人的名字。1967年当进行调查时，一个人已经死去，另一个人说1943年他本人才入了党，因此，不可能在1937年介绍程入党。“所以程是钻进了共产党内”，李英奎说。

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程回了家一次，一年未归。李英奎说，因为他面对日本人的进攻被吓破了胆，在家期间，李指控说，程和在村里办合作社的国民党特务建立了联系，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特务组织的保护伞。敌伪档案显示，程1944年12月参加了国民党，档案中还包括一封程给其支部透漏革命消息的信件。后来被处决的国民党特务叫程为同伙，两个其他国民党特务，一个在程家乡，另一个在四川，证明1944年12月6日，他介绍程和其妻参加了国民党。

进一步的调查说明，程的妻子家，曾是国民党特务在屯留县的联络站，是从晋东南通往河南省的联络网的一部分。

“因此，”李英奎说：“调查说明程首创原来是个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1944年晚些时候，程加入了潞城县二区武委会。1946年调到县武委会，在任职期间，他偷了4支步枪，1支手枪，并贪污公款2.4万元，为此共产党对他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监禁审查。“这是除了开除党籍以外最严厉的惩罚”，李补充说。

1948年3月，程被调到太行区三分区武委会，总部设在长治，这个民兵指挥部1949年8月1日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合并，那时部队已成立了自己的山西晋东南司令部。在长治工作期间，程生了病，到天津解放军医院休养了两年时间。1951年，地区政府分配他到上党煤炭

公司任书记。1952年政府调他到企业公司任经理，1953年任命他为长治工业局局长。1954年，工人选他为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且该代表大会任命他为长治市副市长。1956年他当了市长，1958年省政府提拔他为晋东南地区行署专员，负责全地区的工作。1967年1月夺权后，“造反派”没能把他打倒，他当了地区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当造反组织1967年4月17日成立新的地区革委会时，他被选为主任。

这倒像是论功行赏地一步一步地提拔上来的，但是，李英奎并不这样解释。“自他1937年混入共产党，他调动工作29次，11次伪造历史。他经常填写比他实际级别高的职务，说什么他是正职，而实际上是副职，他工作中有问题的地方常常只字不提。比方说，1943年，他没有提到回家，而声称那年在部队分区办公室任科长，实际上那里还没有这样的办公室。”

那么，他怎么能担任这样高的职务呢？

“因为他伪造历史，当一个干部从部队往地方上调动时，他可以欺骗人一段时间。军分区参谋对他不熟悉，人们也对他不熟悉。他自称自己是受旧的党政领导攻击的干部，这样提高了他的声望。任命老干部的代表参加革委会（群众组织头头、部队、老干部三结合）是极其必要的，所以革委会选定了他。”

据李英奎讲，1967年1月后，程的工作表现越来越糟，首先是王尚志之死。当案子还在调查之中，群众还不能确定这位党委书记是他杀还是自杀，程就要求给死者开追悼会。由于他是在某些群众组织猛烈攻击之下死去的，召开追悼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这些组织的否定，这是存心利用死人压活人。

李司令宣称，程对了解或揭露他过去情况的人残酷无情。他曾命令一个群众组织，把张贴包含有他反面历史材料的一名县委书记抓住打死。

程的支持者，把他们村的一个叫杨志成的会计打死，因为他公开宣传对程不利的某些材料，杨是被报复的对象。

尽管程多次声部队是他的“母亲”和“家”，但是，他到处不失时机地攻击当地驻军。1967年7月19日，数以千计的人，朝一个孤立的哨兵吐唾沫，难道不是程组织发动的示威游行引起的吗？

1967年7月21日，淮海厂工人用铁棍殴打医专师生员工，用锯

条抽打人，用刀子砍人，难道不是程组织发动的吗？在这次事件中17人受了重伤，但是，程千方百计要求部队说根本没人被殴打，以此来掩盖这起暴行。

8月11日，程首创赴京参加高干会议归来后，分裂了群众运动，并亲自挑起整个派性斗争，结果导致武斗。据李讲，程在1967年要拼凑自己的派别之前，晋东南地区并不存在派性。李指控说，程一旦挑起派性，他就引发了一桩桩暴力事件。

“请允许我，”李英奎说：“谈谈我自己对程的看法。”

“我认为他是个叛徒、国民党特务、顽固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参加革命后，就参加了反革命，这就使他成了叛徒。”

“他参加了一伙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暴露了我们一些抗日战士，这就使他成为特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疯狂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他是一个不肯改悔的、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他纠集形形色色的地主、富农，以及所谓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刑满释放分子，国民党特务，以及所有的社会渣滓，与他们一起策划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他为暗杀反对他的证人出谋划策，他双手沾满革命烈士的鲜血，他欠人民的血债，使他成为现行反革命。”

每次李英奎司令都能成功地详细叙述程首创这位地区革委会主任的全部档案材料，为此，他感到自己十分庆幸。他的目标是准备一份无懈可击的，能经得起太原、甚至北京的反复查证的起诉书。随着他搜集整理的指控材料不断充实，他已经能使程领导下的力量名誉扫地，并彻底把他们打倒，从而巩固由他自己和武司令领导的势力，直至完成控制整个地区。⁶

当人们问起，一个人有嫌疑的反革命历史，是不是能构成足够的、谴责上党高原一半人民的理由时，李司令断然为他选择的目标和方法作辩护。

“我们正在解决革命战术问题，”他说：“在战斗中，人们必须集中兵力，从力量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把程的历史作为敌特分子

⁶译者注：据悉，以上当时普遍流行的和李副司令对程首创的怀疑和严正指责，文革运动以后，在落实政策中业已一一澄清和排除。

来揭露，可使人们处于证人的地位，可以为解决任何可出现的困难，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开始是讨论政策问题，只能引起激烈的辩论，而陷入对别人，而且也包括对我们自己错误进行反诉的困境之中。但是，如果我们集中力量对付程，我们就能避免扭转方向，而直接抓住问题的要害。程这个特务是关键因素，是全地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除掉这块绊脚石，我们就能解决其他所有问题。无论是什么斗争，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并战斗到水落石出。以这样的主要目标为基础，我们就能战无不胜，就能在中央面前站得住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李司令需要特别有力的诉状，来反对其对手，因为他在这个地区武装力量中，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法定垄断权。尽管他指挥这里的所有陆军，但他无权指挥海军。使他沮丧的是，徐立生司令领导下的海军0115部队（师级），向他所采取的任何措施提出了挑战。的确，海军并不能为他们驻守在内陆的上党山脉之中而自吹自擂。海军的少量首批工作人员是50年代到长治保卫气象站的。据说，后来海军人员来是为了“搞建设”。到1967年时，他们不过数百人，人数太少而不足以控制整个地区，但是，足以影响当地的权力平衡。如果他们没有决定权，那么，至少也拥有某种对当地政治力量的否决权。

1967年初，北京的中央军委命令一切武装力量“支左”时，问题就产生了。徐立生司令在谁代表“左派”的问题上，和李英奎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徐积极加入了派性斗争的反对派，打破了李作为所有地方争端的、最后裁决的地位，从而加强了李英奎建议要打倒的那些人的反抗力量。由于驻守这里的陆军人数和海军之比是10:1，20:1，最后甚至是100:1。海军人员没有希望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扭转乾坤。然而，武装部队仅仅以反对派身份存在，就削弱了陆军及其司令员的影响和可靠性，使得任何陆军部队，很难对他们自认为敌人的人，采取任何统一行动。

显然，海军的存在，在不久的将来，还是具有一种缓和作用的。李英奎司令不惜任何代价要竭力避免的事是，不管当地的海军部队多么薄弱，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冲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坚决反对正规部队，尤其是执行独立任务部队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尽管怒火中烧，但是指挥官没有一人首先引起武装冲突，从而使自己蒙受耻辱。

陆军不情愿攻击海军，至少暂时对市民的派性斗争也具有一种节制性的影响力。大型集会上，把武装部队部署在英雄台中心，形成坚固的屏障，陆军部队站在一侧，海军站在另一侧。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互怀敌意的平民百姓，能在同一地点集会，而相互不接触，引不起互相袭击。一群自称“支持左派领导班子”的陆军指挥官们，1967年9月5日，组织了一次盛大的联合大会。会议的目的是向上级当局显示，部队至少在设法为4月份形成的大联合注入新的生命力，把反对派各方力量召集在一起，部队就能证明各派正在向实现正式联合迈进。因此说明了部队在执行毛泽东指示，尽管他们背后也在为最后的政治决战调兵遣将。

张庄的申仲堂在煤矿当守卫，9月5日参加了举行的大会。他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

人群分成了敌对阵营，部队派陆军和海军占领了广场中央，把两派隔开。“联字号”一派的支持者涌满了陆军北面的场地，而“红字号”一派的人挤满了海军南面的场地。双方都同意“联字号”事实上的头头武天明，和“红字号”公认的头头、地区革委会主任程首创都不到会。他们还同意两派都不准呼喊任何口号，“支左领导班子”告诫“联字号”，撤回打倒程的要求，而说服“红字号”停止支持程“暂时把程首创的问题搁置一边，团结起来”。

大会开始后，“红字号”代表首先发言，当他还在讲开场白时，程首创突然出现在一辆海军的卡车上，由二十多名海军护卫着，绕广场一周。

“坚决支持程首创！”“红字号”发言者违反了规定。

“联字号”成员立即开始扔开了石块，“红字号”成员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了他们。程被突如其来的暴力所震惊，匆匆驱车走了。双方的石块大部分落到了广场中央和军人们的身上，但是，陆军和海军战士严格遵守命令，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在连珠炮似的石块、砖头，以及其他坚硬物连续猛烈的袭击下，他们仍然坚守阵地，结果一百多人受了伤。

为振兴大联合而召开的这次大会，结果以卑鄙的、令人不快的吵骂打斗而告终！

我们五阳矿工和长钢工人，冒着冰雹般的砖头石块的袭击，拼命朝我们的卡车跑去。当砖头、石块扔完后，“红字号”成员抢过街上

货摊上的水果、大蒜。我们个个低着头，但是，司机发动不了卡车，袭击者占领了那个地方，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我们来是为了武斗，我们在卡车里堆满了木棍，当挡风玻璃被打破后，我们抓过棍子，跳下来，把“红字号”的人赶跑了。此后不久，我们的司机发动车，我们才离开市内，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半。

此后，我们几次进市里张贴大字报，参加武斗，但是，再没有像英雄台事件那样严重。部队领导知道我们去市里，既不是去上班，也不是去辩论，而是为了武斗。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让我们呆在家里。当我们小组上夜班时，他们各派一名战士和守卫一起站岗，确保守卫呆在所属的岗位，并严密监视大门，不准任何人出去。而且他们对请假回家，也非常严格。他们要准确了解我们的去向，请假时间是多少天？返回的时间是多会儿。

有时，我请几天假回张庄，我父亲就骂我参加武斗。

如果海军的出现使陆军的热情平息下来，并帮助阻止了支持“联字号”组织的公开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也使“红”和“联”两派冲突激化了，使得武斗升级，几乎无法避免了。由于双方都声称自己有部队赞同和支持，双方都没有理由让步。正好相反，每一方都感到自己提高要求和增强攻击力是正义的。

晋东南地区冲突的唯一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李英奎司令继续整理程首创的材料，由于李英奎显然计划发动引人注目的攻击，因此程首创别无它选，只能策划反击，于是对抗就逐步加剧。对抗、谴责、发动群众，以及公开的武斗日益激化，以致饱受困扰的太原当局，也为此深感震惊。1967年秋，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决定出访晋东南，以便为迅速促成和平而作最后的努力。

七十四 “刘未老”接管山西

在大部分旁观者看来，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动身前往晋东南地区，至少可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1967年秋天，太原势不两立的派性冲突，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就是比包括长治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致命激烈。晋东南地区的对抗程度不断加剧，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都得到了太原兄弟单位的丛愿和支持。这些单位为了能在省府固守阵地，必须在太原外围地区建立基地，正如地区、市里的各组织为了寻求他们下属的公社和大队支持，把他们争端扩展到乡村一样，省级的各个组织也在各地区寻求支持，也把他们的争端扩大到全省各地的城市和城镇。首都的各个组织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原因，把他们的对抗扩大到全国各省份的情况，就不消说了。

山西省“文化大革命”是复杂而不同寻常的，很多人给我们描述的是，它通过剧烈而痛苦的斗争才进行到底的。给我们提供消息的，有省革委会副主任曹中南将军，省革委会常委王治平司令和太原市委书记马杰。

周恩来在北京给我们简要介绍情况时，我们已预先得到了警告。

周总理说：“山西是进行首批造反夺权省份之一，但是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两个派别哪一个表现也不好。”

“一开始他们造了旧省委的反并夺了权，这是正确的。两个主要领导造了反。第一位是旧省委成员、副省长刘格平，第二位是山西军区政委张日清。”

“一开始这两个人还能合作，但是后来他们俩闹翻了，成立了敌对派别，闹得很凶。我不知道他们争吵了多少次，这两个人都反对旧山西领导，一直反到薄一波，他们俩都是新面孔，并不是旧面孔，但是这只能说新面孔也会闹翻。”

“由于他们的分裂，派性影响到山西的整个文化革命。我无法告诉你，为了力争解决山西问题，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这里开过多少次会，我们就使用过这个房间和其他许多房间，我们要求这两个领导团结起来。他们在会上说得好，答应要团结一致，但是一回到太原，他们就又争吵起来了，而且还挑动武斗。”

“太原有一个头头，站在刘格平一边的，非常凶狠，确实是个无赖。他父亲曾经为日本人效过力，在伪满洲国表现也恶劣。此人名叫杨成效。我曾和他在北京饭店面对面谈过话。这个姓杨的，那时是山西造反派总司令，政委不是别人，是刘格平夫人丁蕾，而且她还当参谋长。”

“我们邀请这些派别的头头来北京学习，但是要使山西各派互相合作非常困难，最后我们不得不重派一支部队，接替旧部队。在党的

九大会议上，代表们把刘选为中央委员、张日清为候补委员，但是九大以后他们仍然争吵不休，直到他们失去政治上的支持。这次我们召开山西党代会时，没有人再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尽管一个是中央委员，另一个是候补委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他们留在省委内。这就说明了文化革命的力量。无论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会垮台。”

“最后，我们把刘和张调出了山西，分配他们到其他地方工作。后来这个省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山西问题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拖得长，争吵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70年形势才开始有所好转。因此，无论谁去山西，都应该首先过问一下基本形势。”

总理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忠告，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

晋东南支持刘格平的是“红字号”组织。到1971年时，晋东南地区的“红字号”及其在省府的同盟，都遭到了彻底的镇压和失败，敢于为他们讲话的人是找不到的。渴望给我们反映斗争情况的大部分干部，都属于“联字号”组织，都是张日清的支持者。本不应该参加武斗的部队军官，有的暗地，有的则明目张胆地支持张日清。因此，我耳闻目睹的一切，都是偏袒一派，令人愤慨。我们从未听到有人批评军人张日清，但却听到许多有关刘格平的令人迷惑、难以置信的描述。刘似乎是众矢之的，与其说是由于轻蔑，倒不如说是出于仇恨。1967年他掌权时，已68岁了。他心神恍惚，听力不佳，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讲话时总是突然冒出短短数语，然后便是长时间沉默不语。

一位名叫田怀保的高傲自大的军官，把刘主任描述成半死人。他断断续续，一边讲话一边咳嗽，可以用“活气死烟”来形容他的精神状态。每说一句话或一个词之前，总要至少用一个“这个”。有一次他听刘讲话时，十分钟内竟数了86个“这个！”首先来个“这个”，然后清清嗓子，而且每说半句话都要说个“吗”字(表疑问的词)。10分钟讲不了四五句话，没有讲稿时更是这样。听他讲话总使人感到焦急不安，枯燥无味。

我们的朋友范机灵喜欢模仿这位老人的讲话风格。

“有些人叫丁蕾这个老破鞋，同志们……喏，喏(清嗓子，长时间停顿……)。这个，这个态度不好。喏，喏……(长时间停顿)。你们不应该这个，这个像这样说话，喏，喏……(长时间停顿)。丁蕾是我的

妻子……啐，啐(清嗓子)……(长时间停顿)。”

或者：

“有人说这个，这个程首创是个坏人……啐，啐……(长时间停顿)。他不是坏人，他是这个，这个好人……啐……(长时间停顿)。如果他是坏人，我会支持他吗？……嗯……啐，啐……(长时间停顿)……如果他是这个，这个坏人，他会自己垮台的……啐……你们不需要打倒他！”

甚至“红”和“联”两派的名称也说明刘缺乏某种才智。一开始这两派都有一个很长的革命称号，反映了他们组织来源的复杂性。刘没能记住这些名称，或甚至连两个组织也区分不清，但是他的确注意到，一派的大多数下属组织名称都有个“红”字，而另一派的大多数组织都有个“联”字。所以他说，按照他们的标志，咱们叫他们“联”派和“红”派吧，这样就搞不错了。

于是全地区上下都知道用“联字号”和“红字号”三个字来称呼他们两派。

1971年，人们想起刘主任吞吞吐吐而且冗长的讲话，和他那枯燥单调的思维方式，都喜欢公开模仿并嘲笑他。然而，1967年刘领导省府太原的组织夺权后，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1月14日的夺权成功和刘1月28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几乎立即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并把山西当作其他省仿效的楷模。刘即刻赢得了一批狂热的支持者，把他称为“刘未老”。这是根据毛的一首名诗《会昌》中，描写在郁郁葱葱的江西山上漫步，永远不会衰老的青年人而命名的：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当刘扬名之时，他的崇拜者模仿林彪编辑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甚至发行了记载刘最精辟格言的“语录本”，他们出版了数千册，广泛进行发行。他们从刘的晋东南之行吞吞吐吐的讲话中，选录了《刘主任语录》。刘的讲话全力支持严阵以待的“红字号”，因此这一派成员都竭尽全力赞颂这些语录。

我1971年访问闻名的平顺县西沟大队时，劳动模范李顺达给我看

了一本《刘主任语录》。他认为那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神化人的行动，是可怕的骄傲自大的，也是愚蠢的例证。他不愿意让我保存一本，以便我有时间时抄录语录，或者甚至欣赏一下刘主任语录的风格。直到今天，在中国一旦一个人失宠，污蔑他的人，必定会把他的影响彻底消除得一干二净。他们认为必须掩埋失宠者的错误言论和所作所为，以防毒害当今和未来。书面文字尤其是这样，一经编辑成册，就会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一些人把它奉若神明。大部分人都不敢抨击现实，也不敢谈论任何明显有害的毒书，只能谈论能取悦“上天”的那部分书籍——如“不听邪，不看邪，不说邪”，邪恶就会消失之类东西。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源远流长，流传甚广。如果任何事情当时受到抨击，人们很难对所发生事件进行研究，即使事件的亲自参与者也是如此。

刘老声大名震主要是由于他大搞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在30年代，刘是国民党在天津关押的杰出年轻共产党员之一。据报道，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威胁逐步升级，约65名⁷因徒遵照其党组织者刘少奇的劝告，签署了反共宣言，因此获得释放。这种宣称的所谓“叛变”使他们能开展革命活动，发动中国人民奋起抗日。被释放的最著名人士是薄一波。受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邀请，薄组织大批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成立了“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后来这支队伍成为阎锡山抗日“新军”的核心力量。当日本人进犯山西，军阀阎锡山南撤时，薄一波带领“决死纵队”的五个分队，进入深山老林，与刘伯承将军率领的从延安东渡黄河，著名的长征幸存者——“老红军”部队合并。这次合并促进了庞大的30万八路军的发展，最终解放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以及更广大的华北地区。

1966年，全面控制中国新闻媒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突然攻击薄一波和他的64名同伴为叛徒。据传他们曾签署了反共宣言书，从而一笔抹杀了他们一生忠心耿耿从军征战，为组织、设计和建设革命的新中国立下的丰功伟绩。

他们全然不顾在那危险复杂的情况下，薄一波就在阎锡山的鼻子下缔造了进步的武装力量。不顾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北方人民解放军的

⁷译者注：原文如此，实际上文革里所提出涉及刘格平和其他人政治表现的是华北“61人叛徒集团案”。

主力军，不顾这支部队以及薄一波本人在抗日战争、解放山西、解放华北以及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不提他们各自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把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命令，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签署反共宣言谴责为脱党，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叛变行为。这种做法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把英雄打成坏人，并使他永世不得翻身。阿门！最后一个歪曲，是指控这65个叛徒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害怕被揭露出来，紧紧抱成以刘少奇为首的罪恶集团，一旦时机成熟就帮助刘搞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整个“华北叛徒集团”诬陷案的背后，是毛要争回在庐山会议上输给刘少奇及其同盟者对共产党的控制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彻底清除刘少奇30年代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运动所建立的非功伟绩，使他名誉扫地。尽管毛在老苏维埃根据地领导早期游击活动，领导长征和巩固延安边区的斗争，但是刘在敌后承担创造党和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这是一种缓慢危险而复杂的任务。1949年后，掌握全国的统一的党，来自这两种独特而不同领域的混合体。跟随刘少奇搞地下工作的人逐渐承担了组织部工作，在党内生活中占了支配地位。1966年，毛在林彪的帮助下着手重新确立自己对全党的控制权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从刘少奇本人开始，到对所有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的历史进行怀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在白区生活和工作的，其社会背景、组织关系和工作履历肯定复杂，而且没有完整地记录在案。他们的生平经历，往往包括适合调查人员的偏见，进行诽谤中伤解释的空间、活动和关系。被国民党监禁过，特别是被监禁又释放的人都背上了包袱——即证明他们自己没有叛变。在那种条件下，往往没有证人可找，或者所有的证人都已死去。毛的追随者们，也许没有毛的明确批准，趁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诽谤和歪曲，捏造罪名来证明受害者为叛徒，可谓欣喜若狂。受害者发现，要为自己进行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著名的“华北65人”案件开始，党的监察人员确实起草了数以千计的起诉书，对被起诉人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内，对他们的亲朋好友、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然而，乌云朵朵，仍有蓝天，有人欢乐有人愁。审查“华北”叛徒案的一位著名受益者，就是刘未老。刘未老和薄一波被监禁在同一

座监狱，但是刘拒绝签署，或者，至少没有签署任何反共宣言，所以可以免遭千古指责。究竟在那种情况下，刘未老是如何出狱而幸存下来，并且最终获释的，仍然是一个谜。山西没人谈论这件事。1967年，只有他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之一没有陷入刘少奇的“恶魔般阴谋”之中就足够了。他在被揭露出的“叛徒”所控制的政府部门工作，而历史清白，刘自然被作为“造反派领导人”而受到欢呼。

刘未老还有其他享受盛名的资格。首先，他是位回民，是河北中部一个小居民点的穆斯林。在汉人占统治地位的革命运动中，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屈指可数的。作为回民，他曾担任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曾担任过黄河西側河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其次，刘未老获得声誉，是因为他有一位比自己小28岁，丰满漂亮的妻子——丁蕾。在这个省的派性斗争中，她挺身而出，发挥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她的崇拜者称她为“山西梅花”，“迄今为止银河系中尚未被发现的明星”，只有到“文化大革命”才当权的被埋没的人才。丁蕾和毛夫人江青的政治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所听到的有关丁蕾的故事，其数量之多是可与其丈夫相比。她的美貌，她的虚荣和追求她的人，为她的传奇故事提供了材料。据山西人说，她摆出一付上海大商人太太的架子。由于肤色过黑，她猛往脸上涂脂抹粉，并且撒上好多香水，人们从12码外就能闻到她的气味。她还会抽烟，她把香烟装在长长的烟嘴上，一根接一根地抽。在北京参加山西问题学习班期间，她每隔三天乘车去东安市场购买肉和蔬菜，每次都花四十多元，相当于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她经常向左右施舍毛像章，讨好市场服务人员。她心爱的狗也随她去市场，但是不允许狗上车，让狗跟在车后在大街上拼命奔跑。中国人很少把狗当作宠物，所以狗一出现，就会引起敌意。

丁蕾根据需要，对他周围的男人施用种种诡计，尤其是对有助于提升她丈夫，促进其丈夫事业的人更是这样。晋东南反对派的军队司令李英奎，长着一副扭曲的脸，但是丁蕾对他真可谓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而声名狼藉。她不失时机地奉承他，为他点烟，千方百计讲笑话，讲故事，暗送秋波，以此来争取他的支持。

然而她个人更偏爱年轻小伙子。北京居民经常看到她和一个姓杨

的山西学生领袖四处游荡，杨即使参加重要集会也是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这个姓杨的在大街上带着墨镜，嘴角上叼着烟斗。看看这对人从东安市场回家，就令人忐忑不安——一辆伏尔加轿车，杨身穿汗衫，膝上放着西瓜，他身后坐着丁蕾，脸擦白粉，香水扑鼻，香烟在长长的烟嘴上摇来摆去，心爱的小狗跟在车后，在大街上奔跑。

丁蕾宠爱的另一个同伴是杨成效，他是太钢工人，臭名远扬的号称“敢死队”的司令，他自称“老敢”。正如周恩来告诉我们的一样，丁蕾在这个著名的“打、砸、抢”专业队担任政委。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期间，她经常不参加下午会议，要和杨成效一起，去郊区一个不对外的高级游泳馆游泳。杨勇士坐在丁蕾时髦的大型豪华接送车上，和姓杨的学生一样，戴着墨镜，但是他对服装的兴趣不是衬衣，而是最时髦的线条简单、腰身合体的衬衫。游完泳后，两人习惯去为部队高级干部修建的京西宾馆休息，并在那里与刘未老一起品尝准备好的晚餐，共享美食。京西宾馆的经理习惯选择漂亮的女招待和服务人员，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也从来没有像这些部队宾馆的经营者们，会集中如此完美无瑕的姑娘们从事服务工作。刘未老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欣赏这样的选择。

相对照之下，山西另一派的头头张日清，却没有值得记录的恶习，或那种美德。暗中掌握实权的他，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徘徊。是因为他无法与刘未老，他的“梅花”以及“杨老敢”相匹配吗？或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对传播他的流言蜚语不感兴趣吗？我无法得知有关张的私生活，张的容貌，或他的作风情况。由于记载的遗漏，他似乎保持一个模范司令员的形象。因为对手傲慢、欺诈和十足的天性，他才违背自己准确的判断，被迫参与了派性。这位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多次使用双重标准，暴露出他们的派性和偏见。他们说，1967年7~12月张日清和山西的派性斗争毫无关系，因为他被派往北京参加学习班，这几个月期间太原发生的一切事件，张是不负责任的。可是1968年刘未老和程首创去北京学习期间，他们却指责说，刘和程在宾馆通过电话、电报、信件，以及私人信使，操纵山西的斗争。可能张日清在北京学习期间，没有插手山西事务，但是如果情况属实，那就不是因为他发现千里迢迢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干涉，别人却能设法把事务处理得

恰当周到，似乎史无前例的武斗就是在这些人的煽动下，为了他们的私利而激发的。

据了解，情况是这样的。山西的斗争是以比较抑制的方式开始的。那时，领导这个山区省份的被称为“卫、王、王”三驾马车，省委书记兼省长卫恒，副书记兼副省长王谦和王大任。1948年，王谦曾担任过总部设在长治的太行第三区党委书记，曾在潞城县领导过土改运动，而且不止一次去张庄解决问题，尤其是王雨来、王文则和申进财的问题。这三个人都是因为嫌疑攻击小全儿遭到诬告。王谦根据晋东南地区的统计数字，撰写了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情况的文章，因而蜚声全国。他对山西的研究结果，帮助说服毛泽东，在两极分化导致富农主导农村经济之前，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但是，王谦被指责在60年代——尤其是社教运动中，追随刘少奇，犯了走“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1977年，他向我承认了这些错误，但是他机警老练，不情愿谈论自己，没有详细谈及犯了什么错误。

1966年，党内某些有权势的人攻击“卫、王、王”，把他们三人称为“走资派”，指责他们是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刘少奇集团的走狗。他们指控说，这些山西籍人长期控制其家乡的政治运动，把山西变成了反动的独立王国。

党内第一个向“卫、王、王”挑战的是名叫袁振的一位干部。他在中国东北著名钢铁中心——辽宁鞍山工作数年后，调往太原工作。那时袁振已是闻名遐尔的钢铁工业创立者，并声称自己负责起草了著名的“鞍钢宪法”。这个宪法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目标，反对从苏联引进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⁸宪法。1964年这部宪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组织工作典范，在全国上下广泛宣传，因此，袁振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大批追随者。

他来到山西后，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能在若干政策问题上向省领导挑战。1966年5月开始的华北局会议上，义愤填膺的省领导反过来向袁振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说袁是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夺权分子、山西省委的反党阴谋家。

1966年11月，当“文革”使中国的几个大城市陷入危机之时，山

⁸译者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城市，位于乌拉尔山东南部，以钢铁、橡胶、化工等著称。

西省在晋祠附近中央所建的综合渡假胜地，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晋祠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精美绝伦的庙宇，迄今仍然是山西最引人注目的著名建筑之一。晋祠周围的现代化建筑包含有别墅、宾馆设施以及会议厅，富丽堂皇，雄伟壮丽，设施奢华。原以为中国领导人节俭朴素的来访者，看到如此豪华奢侈的设施，感到震惊。如16英尺高的天花板，漫铺地毯的地板，特大的弹簧床，每套要人住处都配有三种可选择的卫生间。因此，这些建筑获得来访者“反修舞厅”的讽刺美称。60年代，人人都指责刘少奇这种堕落行为，但是70年代，人们纷纷断言说，毛享用的更加豪华壮观。

袁振在晋祠向“卫、王、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并且一举成功反败为胜。山西省领导作了自我批评，企图勉强蒙混过关。然而袁振又再次发动进攻，直到迫使他们三人暂时辞去职务，停职接受审查。那年秋天，袁振所以有那样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得到了太原两大学生组织强有力的支持。这两个学生组织都是首都北京学生创立和领导的。清华大学著名的红卫兵，一名姓肖的学生，长期住在太原第一宾馆，帮助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团”，选定刘浩为头头，而北京敌对组织的其他学生住在太原第二宾馆，成立了“红色造反联络站”，选择段立成为头头。

只要这三位省领导“卫、王、王”以斗争对象身份出现，两个宾馆的敌对组织或者各自行动，或者联合一致，竭尽所能来对付他们。他们组织数以千计的群众反复歌唱，昼夜把晋祠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墙上大字报铺天盖地，空中的大喇叭震耳欲聋。返回太原，他们又发动包括大批工人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学生们自信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时代精神，相信他们有毛主席的支持，发动了势不可挡的政治攻势，从而最终彻底推翻了山西领导。他们迫使“卫、王、王”辞职，使山西省委省政府陷于瘫痪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接管了政权。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推翻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市委、市政府后，山西太原采取更加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月14日，没有共同利益，只想夺取更大权力的老干部、军官组成的松散联盟，奋起造反。这个联盟把刘未老当作夺权领袖，把刘推

入引人注目的中心，因为他级别高(十四级⁹)，而且参加革命长达数十年之久，然而并没有把他当作幕后的推动力量。他从宁夏到山西仅数月之久，完全是个陌生人，很少有人听到过他的名字。相比之下，袁振倒是众所周知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刘浩领导的学生和钢铁工人中都有大批追随者。山西籍副省长刘贯一和太原市委书记陈守忠都站在他的一边。

原先的其他文职人员包括政协常委会主席何英才，省委农工部主任刘子兰。刘子兰是山西闻名遐尔的“白毛女”(中国最流行的革命歌剧中的女英雄)，因为她长了一头白发。这群无足轻重的人如此神通广大，并赢得中央支持，是由于有山西省军区政委、长征老战士张日清的支持(和平时期，部队政委任正职，司令任副职)。

中央放弃了巴黎公社式民选政府的原则，山西成立了由老干部组成，有部队撑腰，有好几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组织支持的新生革命委员会，似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倡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央和文革小组几乎立即就批准了这个委员会。这个新委员会是这样合法成立的，所以山西的局势似乎是稳定的。

关键的群众支持来自钢铁工人，或者至少是由杨成效领导的那部分钢铁工人。这位来自东北鞍山的冒险家，认识袁振已好几年了，然而钢铁工人杨老敢是毫无原则性的。决定夺权的那天，他把卫恒和袁振都扣押起来，等着看这两个谁能“站得住脚”——哪一个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因此，事实上他成功地控制了山西的领导权。当和刘格平有联系的袁振明确得到中央支持后，杨就把他的兵力投入袁的一边。但是他决没有让他们忘记，群众运动领袖的实权由他自己掌握。当中央最后批准刘未老为山西新生革委会主任时，杨成效对老刘说：“别忘记是我们给你的这个地位。如果我们不要你在里面，我们可以把你赶出去。”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杨如此自信呢？似乎完全凭他的勇敢果断，因为他的历史很不清白。他养父是曾为日本人效力的满洲伪警察。他年轻时在鞍钢工作，1958年调到太原13冶金公司当三级技工。这是为了支持首都建设，在太钢组建的单位。1966年，他在自己所在单位

⁹译者注：原文的说明显然是笔误，文革前夕，刘是三级高干。

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但是，一开始就被省委支持的该单位主任有力地镇压了。直到那年8月“十六条”发表后，他的造反组织才成为合法组织。因此，杨成效和清华著名学生造反派副大富一样，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50天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当毛最后揭露并粉碎这种镇压行动时，杨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英雄，靠他的勇敢无畏和他偏爱的粗暴策略，夺取了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的领导地位。他的“核心小组”对那些挡道的人，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疯狂毒打，甚至把他们迫害致死。

杨没有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养父在东北的历史不清白，他甚至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然而，他把这种弱点化成为力量，在激进派揭露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声称对他历史的任何攻击，都是非法镇压。他成功地让当局承认陷害了他。后来对手们说，杨手下的人迫使知道杨底细的一个公安局同志，从办公楼的窗户上跳下去摔死了。

在全盛时期，杨的工人纵队约有三四万人，组成了160个兵团，有的兵团就有1000多人，有的只有100人左右。这些兵团掌握数以千计的汽车，机动性很大。他们集合召开群众大会时，几个小时内能把数十万人集中到他们一边。杨自称“老敢”，但是他的敢死军团失宠后，人们学会称他们“敢匪”。有一次，“敢死队”看见反对派在墙上张贴不受欢迎的大字报，便用狙击步枪朝他们逐个开枪射击。另一次，他们用手榴弹和步枪袭击解放军哨兵，打死1个，打伤4个。

有些人认为，杨使刘未老成了政治上的俘虏。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非只对单方有利。刘需要钢铁工人杨成效带给他的群众支持，尤其是1967年4月后发展成为派系混战的形势下。而杨则需要这个得到中央支持的经验丰富，声名显赫的领导干部承认。作为刘未老集团的成员，杨获得了靠他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合法地位。因此这种关系是互助互利关系，两个人不管谁失去对方都不会干得这样出色。

在夺权之后不可避免的争夺交椅游戏中，争取同盟是头等大事。刘未老知道他可依靠杨成效的敢死队和刘浩的学生造反兵团，但是与“红色造反联络站”的段力成的关系发展的并不那么顺利。刘未老以“夺权”联盟头目身份出现的那天，段力成没有给予支持。段和杨不一样，甚至当中央批准了新的领导核心后，段依然拒绝改变立场。刘未老谴责段及其“红色造反派”对他们进行了报复。他命令段的所有

成员，成群结队去太原中心广场，在毛主席画像前低头认罪。这种羞辱暂时解决了归属问题，但是新政权的支柱，部队司令张日清批评了这种做法。段和他的追随者对此当然十分恼火，因此，刘在“文革”初期就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只是等待有利时机发芽、生根、成长了。

七十五 文攻武卫

沉浸在一片盛赞上海式夺权的呼声中，刘未老被公认为是代表“真正的左派”的干部。他指挥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政府长达一两个月之久。接着，他的山西“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崩溃了。导致分裂的因素有几个，但最重要的可能是领导班子的组织涣散，似乎，这些人竟然能组成一个领导组的主要原因是，当旧政府垮台时，他们恰巧在场而及时跳出即将崩溃的组织机构，避免了与其同归于尽。他们中间没有人胸怀改造山西的实际计划，他们以革命的华丽辞藻而闻名的夺权大字报，只对“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刘少奇一起垮台的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其他山西老干部发动了笼统的抨击，只是号召群众奋起反抗，但是并未提出明确具体的行动纲领。在他们突然采取行动进行夺权前后，这些男女们都没有严肃认真考虑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任务。在太原也只有一部分群众参加了组织，全省人民就更不用提了。这些领导人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而是和所有出现的群众组织作交易，结果使自己落入最初出现——并获得成功的造反派控制之中。

3月，山西文联的副主任刘贯一发表讲话，呼吁基层所有的组织，进行大联合，以便消除争斗。到7月份能结束“文化大革命”，其他组织领导人立即谴责他的号召是反革命的。在不怀任何偏见的观察者看来，刘的讲话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对多数群众，或干部组织的小头头们来说，就是极其讨厌的东西。大概，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职位和权力。那时，传来“文化大革命”可能仅仅意味着永远保持这种现状，对所有有关的人来说，幸运的是，有人揭露出——或更可能是制造了刘贯一有叛变行为的历史。4月14日，在华北仍然是杰出的“清白先生”的刘未老遭受了对他副指挥的指控，用一系

列刺耳的大字报，把他指责为暴发户，这种突然袭击使顶头上司革委会和基层的群众运动发生分裂。直到那时，杨老敢已领导一个称作“夺权司令部”的联合运动，由于公开攻击刘贯一，这场运动分裂为“批刘邓红色联络总站”——通称为老敢领导下的“红总站”，以及学生领袖段力成领导的“红色造反联络站”。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两派组织都奋起谴责刘贯一。他们的意见分歧发生在如何评价刘未老的问题上，杨老敢和“红总站”一派的追随者，拥护刘而反对一切中途加入者。而段力成和“红色造反联络站”派的成员们则仍然为在广场遭受的羞辱而懊恼痛苦，他们感到山西的新主任对自己历史有些方面也应进行调查研究。

如果部队司令张日清保持中立，这种分歧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如果没有张的支持，任何革委会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张站在了“红色造反联络站”一边，全力支持那些怀疑刘未老的人。张所以这样做，似乎出于纯洁革命队伍的考虑，但是当利用这种不断加深的分裂，去发展忠于自己的群众运动，发展能同杨老敢的钢铁工人相抗衡的力量并争夺对太原大街控制权的运动时，他的动机就值得怀疑了。

就在这时，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三位最著名的激进分子插手干预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突然支持了刘未老和“红总站”，因此从上面煽起了分裂。1967年7月是王、关、戚三人的顶盛时期，这一小撮人后来被指控对极左的“5.16分子”阴谋负责，并且即刻被解除了职务。他们1967年的计划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谴责张日清是反动军人，企图夺权，扭转山西“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局面。

7月20日，与武汉部队司令陈再道的对抗结果对他们有利。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分析来看，说他们可能去那里制造事端并不是牵强附会。

在《中国的转折点》一书中，我这样描写了武汉事件：

“武汉和在其他地区一样，造反派组织与已确定的党委当局及其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冲突。湖南省省长陈再道¹⁰受到武汉“三钢”的造反派学生和工人组织的猛烈批斗，他帮助组织了另一个叫“百万雄师”的工人组织。当造反派强大到足以形成真正的挑战时，陈不仅怂恿“百万雄师”使用武力镇压他们，而且还命令他指挥的当

¹⁰原文如此，这里作者有笔误，陈再道当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三支两军”掌管湖北政事与生产，而非湖南。

地驻军第八二零一独立师，制止造反派游行示威，并逮捕了造反派头头。两派群众动用武力保卫自己，因此爆发了严重的武斗事件。”

在这个时期，北京中央文革小组派出谢富治和王力两名成员，赴湖北调查纠纷的原因并制定解决办法。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后，这两位领导严厉批评陈动用部队反对造反群众，劝告他促成“百万雄师”组织和反对派组织的大联合。¹¹ 陈不但不接受这个建议，反而逮捕了这两位代表，把他们单独禁闭起来，王力甚至还遭到毒打。

在这种僵局之下，周恩来亲自飞往湖北，试图解决这起事件。当他乘坐的飞机接近机场时，他看到机场已被“百万雄师”组织派遣的大批武装成员和装备有装甲车、自动武器的部队所包围。周恩来决定不在那儿着陆，以免他自己被扣押，而继续飞往另一个驻有忠于文革部队的机场，然后在部队的陪同下，周乘车去对付陈再道。在这次会面时，周安排释放了谢和王。后来，海军部队沿长江北上，并在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战略要地派出空降兵后，陈本人才投降，去北京接受批评和再教育。

在以后数月内，新闻电台报刊一致谴责陈再道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军人。当王力返回北京后，他警告大家，到处都潜伏着“陈再道”、“李再道”，正在伺机对抗毛泽东，镇压群众运动。

在北京接见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领袖时，王力说，毛泽东面临着多层包围的危险性。第一层包围圈是由保守的农村农民组织组成的，就像控制张庄那样的组织；第二层是像山西部队支持的具有右翼倾向（张日清领导的运动）的组织；第三层是由全国大军区的掌握重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员（其中有武汉的陈再道、福建的韩先楚、南京的许世友）；第四层是台湾反动分子，他们的后台是日本、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北部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形成的包围圈——至少可以说是一支庞大的阵容。

“包围说”的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是毛泽东夫人江青。1967年夏，她四处游说，煽动学生，揭露军队领导，鼓励学生武装组织袭击军事基地。“文攻武卫”是她赞赏的口号。但是，在这混乱的数月期间，攻击和防卫几乎无法区分，每个组织都声称自己是自卫行动。在幕后策划这场运动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他发现这是瓦解对立军人集团，

¹¹ 译者注：本书作者不知道，实际上是周恩来亲自劝告陈再道，而非谢、王两人。

巩固他个人对全部武装力量进行控制的办法。

到7月底，鼓动性运动达到顶点，群众组织和各个部队及司令员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对抗事件。晋东南军分区门口“复仇军”的游行和一个兄弟组织攻击太原省军区司令部，发生在同一天，而且一个类似的组织试图冲进部队的京西宾馆。这些事件仅比武装夺取辽宁“沈阳解放军接待中心”，“清华井冈山兵团”学生袭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家，造反群众反对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事件早几天时间。

每起事件都为全国已熊熊燃烧的派性斗争火上加油。它们使激进派从理论上更加坚信：革命确实受到了反动军人的危害，使得军人和群众中的支持者更加坚定他们的对抗性理论，决心抵制军方和革命危险的极左阴谋，在大陆十分盛行。

随着袭击部队和部队反袭击的继续进行，敌对力量以暴力相对抗的事件增多了。8月“热”武器开始取代拳头、棍棒以及石块之类的“冷”武器。很快，漫长的战线开始传来了死伤的报道。山西最初死亡的人中，有死于张庄打谷场的长治学生，有死于张庄机务段附近、十字路口的工人，两人都是著名的“8.24”铁路机务段战役的受害者。

几天后，又有两个人在山西的暴力冲突中死亡，这是参加太原激战的受害者。

9月5日开始的伤害行动，在省革委会主任刘未老情绪激动地给省军区打电话时达到高潮。他说，他的汽车被砸、秘书被抓、文件被抢走。为了阻止事态变化，司令部派士兵去保卫主任住处，军用汽车一开来，一群愤怒的人群就包围了它，并向军车投石块。刘的支持者指责，这次袭击是反对派“红色造反联络站”操纵的，但是，“红色造反派”却是另一种说法。“红色造反派”头头说，刘的“红总站”组织一手策划了这起事件，以便挑衅他们进行武斗。

无论这起事件的真相如何，杨老敢把它用作为动员10万忠于他的人员的借口，他们手持棍棒、石块、铁棍、自行车链子，以及50公斤炸药包，向位于市中心第十中学的“红色造反派”司令部挺进，准备炸掉它。

山西军区司令员张日清，仍然在北京接受再教育，即使他在太原，也会发现难以采取任何行动。他已经和红色造反派在政治上建立了联

系，放弃了中立的立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命令部队出动，就暴露了他自己是愚蠢的、未经改造的军方干预平民事务的人。幸亏中央担心山西混乱，已迅速派遣一支新部队——由谢振华、曹中南指挥的北京军区第六十九军赶赴山西。尽管这两位将军和张日清仍然是老战友，但是，他们声称不参与武斗行动。

曹司令连续三次召集刘未老和“老敢”，每次都要求他们取消进攻“红色造反派司令部”的行动。他们拒绝这样做，但是，遵照新司令的要求，老敢决定不对中学大楼使用炸药，而是让他的力量用“冷”武器发动人海战役。在随后的混战中，一个17岁的女学生和一名工人丧了命。“红色造反派”把这些伤亡者作为采取反暴力行动的合法借口，动用他们所能召集的所有力量，围攻了“红总站”。两派都召集增加支持者，哪个地方发生对抗，就让他们参与哪里的斗争。当工人们上街支持某一派时，一个又一个工厂都关门停产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月5日城市派性武斗开始之日，正是在毛的坚决要求下，江青公开完全改变立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之时。她说，攻击部队是“5.16”阴谋集团发动的摧毁军队、推翻总理、损害毛泽东领导的极左阴谋的一部分。江青不否认，一命令部队干预群众斗争，部队就犯了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决不能当作攻击军人，从他们队伍中揪一小撮走资派，或盗窃武器的借口。“如果没有解放军，我们能来人民大会堂，进行这次谈话吗？”她问。

在江青这种令人吃惊的大转变之后不久，毛泽东发布了他著名的反对派性斗争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巡视华中、华南回京后，9月14日报刊、电台公布了这些话。他说，文化革命总的形势“大好”，因为亿万人民群众从政治上发动起来了，他们在积极参加改造世界。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毛对他在各地发现的对抗和冲突感到痛惜，但是，当如此众多的群众，如此充分地显示出热情和信仰，能与对抗和冲突相均衡时，他就倾向于不太看重此事，甚至不理解的是，自相残杀的殴斗，似乎使他感到有些满意，因为武斗是经过勇敢地构想，巧妙地进行的。显然，中国人民不是消极的奴隶，不是没脑袋的“装置”，而是敢于攻击“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富有创造性

的活跃分子。

无论战斗的积极方面可能是什么，1967年9月，毛泽东几乎经不起再让其继续下去了。武斗中断了生产，转移了部队的政治任务，更糟的是，好战者集中力量猛烈地进攻部队这个目标。这种倾向是任何政府都不能长期容忍的。部队是全国所剩的唯一由中央指挥和组织的力量。如果部队解体，或部队陷入内战，部队互相对抗起来，只有一种结果——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的战乱。

考虑到离心倾向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旦中央指挥失灵，没人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国家去继续存在。对毛来说，中国的统一，是压倒一切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公开利用他的政治权威，全力以赴，奋力阻止群众运动无休无止的分裂，阻止武斗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鼓励各派的民众力量大联合起来，也可联合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中来填补权力真空。

不幸的是，到9月，全国派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任何级别的领导都不能执行毛的指示，无论如何，大部分人并不认真注意这些指示。他们已相信，进行中的斗争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数十年斗争的继续，并且确信反对派就代表国民党。尽管他们都学习了1966年8月的《十六条》，并且记住了所有冲突应该通过讲道理，不能动用武力解决的禁令。然而他们认为，在局部形势下，这种禁令不适用，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辩论和妥协来处理，而是面对只能动用武力来解决的敌我矛盾。所有一切规章制度，一切习惯的行为标准，必须废除，因为他们在发动人民的全部力量，使用一切现行手段，去击败腐败的阶级敌人。即使从内心深处，他们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们确实相信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敌手有资格执掌大权，任何有助于实现那个目标的辩论都是正义的。归根结底，任何的论证，都没有一种声明更有重要意义——反对派就是事实上的阶级敌人。

在山西的第六十九军、省革委和省军区通过了响应毛泽东号召的提议。谢、曹司令员、刘未老和杨老敢，张日清司令和段力成，都公开广泛宣传中央指示，领导组织猛烈抨击派性的学习班，鼓吹组织大联合，但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一方面，一起起暴力事件使群众群情激昂，并引起了同样的暴力报复；另一方面，所有的负责人，不管

是军职，还是文职官员，继续大搞他们所严厉批评的派性。当张发动由他指挥的部队和广大民兵为基础的群众运动时，在每次对抗中，谢、曹都按照事情发展常规，跟随“支左”的同一部队的指挥员，不言而喻都支持北京军区、他们的战友张日清。为了反击这支令人生畏的阵容，刘未老组织了虽不太强大，但相当可贵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平民小分队，他们竭诚奋斗、有难以克服的派性网络，十分好战。他们为了某种原因，也和当地驻军发生了分歧。

由于这两大网络组织，在全省上下剑拔弩张，相互对抗，武斗先后蔓延到全省各地区。但无论在任何时候、全面内战都没有立即蔓延到全省东西南北。尽管如此，武斗几乎触及到全省各地，一开始这里爆发了武斗，然后那儿又爆发了。迫于种种压力，武斗以某种形式，从一个县波及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市传到另一个市，而无人能够加以控制。一个地方解决了的冲突，又在另一地方突然爆发，或者，怒火在心中暗暗燃烧，为人所忽略一阵之后，在同一地区更加猛烈地爆发开来。

山西只有一个县没有大规模的武斗——模范的大寨大队所在地昔阳县。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造反派选定陈永贵为昔阳县委书记，取代了与他长期不和的张润怀。周恩来因派性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惊慌失措，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任何人把昔阳和大寨拉进派性斗争中，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采取措施调解那里的冲突。周请来陈永贵，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陈已经公开站出来支持刘未老。但是，在这次谈话过程中，总理使著名的大队领导相信，刘格平和张日清之争，并非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冲突，而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的斗争，陈和昔阳县应该避开，周鼓励陈本人别插手冲突，而且尽可能使昔阳县避开派性斗争。在“文革”中靠一个领导能引起多少冲突和骚乱，来判断他是否参加“文化革命”的年代来说，这种立场可是不得人心的，但是，陈坚持了这一立场，至少按照他给我们介绍各种事件时是这样的：

山西许多地方的资产阶级派性十分严重，武斗接着就发生了，有些人为他们打、砸、抢而骄傲。他们向我们施加压力，“你妈的——”他们说：“你们县不搞武斗，怎么能搞文化革命呢？”

“这对我们来说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回答说：“文化革命不应该

动武来搞，你们听谁的？听毛主席的，还是其他人的？毛主席说要摆事实、讲道理、不用武斗，他是说全国。你们说我们错了，实际是说毛主席错了。我们坚决主张用讲道理方式，不用武力。”

这段时间，整个昔阳所有的民兵枪支仍然在老百姓手中。我们没有收缴任何枪支，也没有人使用枪支。没有外地人抢我们枪，我们的人也没有出去打斗。我们不仅没有丢失任何枪支，事实上还得到一支。有些想尽办法挑起武斗，我们对付他们时，他们都拼命逃跑，结果他们丢了一支枪。一些人经常来想法挑动武斗，我们不和他们打斗，我们只是派人和他们进行辩论，说服他们离开，我们发动了全县所有的四百个大队做这种工作。一有人来想挑动什么，我们就号召社员们出去说服他们离开。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看到武斗造成的损失，其他地方的一些干部还挨了毒打。

随着山西武斗蔓延越来越激烈时，有些没有武器的人，来这儿避难。我们拿当地粮食让他们吃，于是，有人说：“昔阳是个防空洞，是坏人的老窝。”

哪儿能有这么多坏人呢？

我们不知道谁是从哪个组织或派别来的，我们只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和学生。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坏人，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也是少数。我们不能说一般人在这儿避难就是坏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路线。

来避难的人中间，有一些要求我们镇压另一派，但我们拒绝了，只给他们饭吃，我们不愿帮他们去武斗。

凡是来的人都是惊慌失措，他们受了重伤、哭着、衣服被扯破了，我们给他们吃的食物，让他们在这儿安安静静地生活。

因为这种情况，外地人给我们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玩弄肮脏卑鄙的手段，有些人穿上军装来搜查他们的对立派别。

有好几万人在这儿避难，中间有人要在当地开展斗争。有时他们挑动打架，或向过路人开枪，有时，我们的社员离开本县到外地走亲戚，搞派性的人就毒打他们，甚至向他们开火。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昔阳挑起武斗。外地人希望我们有所反应，进行报复，但是我决不许可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一旦这儿武斗开始，几百人就要受伤。

由于所有的武器掌握在民兵手中，谣传说所谓的“反军派”抢走

了昔阳的武器，那是假话，我们怎么能拒绝武斗而供应别人武器去武斗呢？

诽谤陈永贵的谣言也传开了，他们说我把武器和粮食交给了“反军派”，因此说我家是“反军”的。可是，我们能让难民饿死吗？不行。他们所以叫我“反军分子”，是因为有些属于被叫做“反军”的派别逃亡者在这儿避难，我们给他提供粮食，就说我们一定反对解放军，这合乎逻辑吗？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支持刘格平（省革委会主任），还是支持张日清（省军区司令）。我们只知道这些人不能回家，一回家，反对派就会毒打他们。

最后下来一个中央指示说，所有的避难人必须回家去，他们不应该害怕回家。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单枪匹马离开这儿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团体。他们回到家时，有人问他们在昔阳中了什么流毒？人们指责说，我们毒害了他们，然后派他们回来捣乱。“你们中了陈什么毒？陈给你们分配了什么任务？”糟糕的是他们第二次逃跑时，不敢来昔阳了，他们害怕给我们带来坏名声。

后来，有人说陈是个坏家伙，谣传说我是河北的地主，是逃跑到大寨落户的。这儿确实有个阶级敌人，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姓陈的不是河北，而是在河南出生的。于是，我又成了河南的恶霸了。因此，说起阶级斗争，我自己成了阶级敌人了。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要去省城太原，派性头头总会得到消息的。他们就命令他们的亲信，用上好剃刀的枪和手榴弹监视公路。他们告诉大家，一个阶级敌人要来了，每当一辆车开来时，守卫就跳出来大喊“站住”。

他们朝我喊“停住”。

“我不动，”我说：“我不是阶级敌人。”

他们打开车门，看见是我一个人时，他们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原来是老陈一个人。”

于是，我叹口气，继续赶我的路。

我怎么能说这些人在搞反革命活动呢？

我只能说他们是受坏人的骗，搞一些不好的活动，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他们会用刺刀捅我的。

有时他们向我的车开几枪，但是，不管他们给我施加多大压力，我绝不会支持任何一派。就是冒死的危险，我也决不动摇。如果他们执行毛泽东政策，我就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不，我就反对他们。

在山西夺取，成立革委会时，中央支持刘格平当省革委会主任，所以我也支持刘格平，后来他犯了错误，但那是后来发生的事。刘刚掌权时，我们跟着中央支持他，我们怎么能支持反对派呢？但是，由于那时支持了他，现在有人叫我们是坏人，犯了错误。反对派说，从一开始就应该反对他，而不是和中央一起支持他。这一切引起了谣言，什么陈永贵支持了刘格平，因此陷入了派性之中。

他们向我施加了种种压力。在一次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山西革委会召开的两派组织群众大会)，整个人群包围了我六七次，他们想办法让我说支持哪一派，但是我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支持错误的一派，没关系，只要改正就行了。”但我说：“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哪一派。”

于是，我被叫做山西的“顶门棍”。

最后，天黑了，一辆车来接我，但是我拒绝离开，因为和我一起来的有二三十人，不能丢下他们走了。

一旦陈有了中立的名声，他就成了非常有用的和平使者，派别之间的仲裁人，经常被派去困难重重的地方，其他人在这里都失败了，陈继续叙述开了：

有一次，中央派我到平遥县，设法结束那儿的武斗。一个全副武装的派系包围了我24——不，36个小时。他们把城门关上，不让我出去，他们切断所有的电话线，然后通夜吹号，并喊“冲啊！”“活捉陈永贵”！

在我去平遥前，派晋中的一个人去那里，宣布中央派我去检查，设法解决派性冲突。可是，这个人却报告说，我去支持一派，镇压另一派，他没有说我是中央派去设法阻止武斗的，而是说我去支持一派，反一派。那些害怕镇压的人非常担忧，由于随我去的有12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有担心的那派成员包围了我，包围了我住的房间，城墙四面八方都有人把守。城墙外面聚集的人更多，这些人并不真正反对我，只是他们的一些头头反对我，陪同我的战士们都很害怕，仿佛斗争会非常尖锐。

当城外群众听说我在那儿被包围了，他们派人请求帮助，给中央拍了电报，中央派了一个营的解放军去救我，把我接出来。战士们驱散了包围我的人，同时，两派全省性组织都动身来救我，他们派出1200辆卡车去平遥。两派的卡车都有，都派人去救我，这就证明我不是派性头头。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几乎把这个城压扁了。其他地方的人也打电报说去救我。那时，我只能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七十六 刘老出访

如果1967年夏秋两季，昔阳县仍旧保持相对平静的话，长治市周围郊区，以及诸如潞城、黎城、平顺、高平、沁县等附近县，不能说同样是平静的。由于陆军支持“联字号”，海军支持“红字号”，整个地区都在进行激烈论战，指控与反指控频频发生，几乎天天都有武斗事件。全面蔓延的骚乱使工业生产接近停顿，农业生产也无法幸免。在秋播、秋收和秋耕季节，推迟行动就会对当年的粮食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来年的收成就更不用提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不顾他们的农活，去持枪操练，参加抗议游行，与对立派别发生冲突。

晋东南的对抗，迫使太原的省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考虑省府本身混乱以外的问题，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长治。8月29日，刘老老在北京进行了长期和谈后返回太原的当天，就召集了省核心领导组扩大会议，并起草了针对晋东南的七条方案。李英奎司令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七条包含的内容是什么。他对第三条和第七条十分恼火。第三条批评他的部队在“红字号”失败后支持“联字号”进行突然袭击。第七条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支持地区革委会主任程首创。据李司令讲，所有的七条归结起来就是这最后一条“支持程”，这是他忍无可忍的一个建议。

“红字号”的支持者把这个省革委会方案叫做“红七条”，他们把七条印成上万份，到处慷慨陈词：“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省革委支持我们。”当群众组织打着“坚持执行七条”的标语游行时，海军派人保护他们。宣传队到处演出有关七条的节目。“红字号”组织司令部把“七条”印在大幅传单上，就像双方起初印刷毛的《二十三条》一样，他们在农村各地散发“七条”，就像通常宣传毛的指示一样告

诚人们，“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忠实执行“七条”。“红字号”怀着这种兴奋的心情，组织了有关“七条”的学习班，号召尚未表态的工厂、公社、政府部门所有干部参加学习班。那些劲头十足的与会者得知“七条”绝对正确，部队支持的“联字号”组织错了，因此，一切优秀革命者都应照办不误。

由于这种攻势受到半官方的支持，有些加入“联字号”的领导干部受到威胁，退出“联字号”转入“红字号”。有些坚决反对“七条”的人，则发现到处有大字报点名攻击他们。“红字号”指责他们反对毛的好学生刘未老，反对“七条”就是反对刘未老，既然刘是党中央主席的忠实学生，反对刘未老，就是反对毛泽东。显然，任何反对刘未老的人都罪该万死。

宣传“七条”运动，恰好正逢刘未老声望最高之时，并且也加强了这个时期。1967年秋天，新的省革委会主任达到他生涯的顶峰，八九两月，太原及其周围的激战，杨老敢领导的可怕的新型敢死队的节节胜利，广泛宣传刘语录的运动，创造了他的“黄金时代”。他的支持者希望用十月份出版的两本书，来巩固并使他的“黄金时代”长盛不衰。第一本书是在他夫人丁蕾的指导下，由一个小组在他自己家里撰写的刘的传记，主题“证明”刘一生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第二本是颂词，书名叫《剥去玉宫千里雾》，“玉宫”原来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干部——刘未老自己，“横扫迷雾”是以正视听的委婉之词，为现在领导山西“文革”斗争，但不断受到反动分子攻击和诽谤的“伟大天才”澄清问题。

60年代，林彪在大部分地方刮起的对毛泽东崇拜之风，变成了省和地区设法搞当地领导个人崇拜的楷模。他们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个人崇拜，可能部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残余，在人民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长期的大肆宣传之下，人们放弃了自己的推理、见解……而听任别人对天才问题所作的先验论的判断，尤其是对级别高的人更是这样。汉语中“天才”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天上的人才”、“上天派来人才”或“来自天间的人才”。他们相信按照上帝的意志，根据出生时辰的星象，或根据祖坟风水宝地而赋予被选定的少数人的天才，可以满足许多人的需要，可使他们在动乱变迁时代，对他们效忠的对象胸有成竹，确信无疑。

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加强宣传“天才”，说得到北京中央批准的省主任是合法的。他的支持者把“合法性”作为他们的第二大主题来渲染，最后用似乎可疑的毛泽东语录进行补充论证：“山西六十九军的立场非常重要。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们，他们必须和刘格平保持一致，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自1967年7月到12月，“红字号”在全省各地广泛宣传了这条“语录”。群众组织聚会时，都要学习，反复学习，甚至逐字背诵这条语录。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干部站在了刘未老一边，当各组织召开会议，听刘的讲话时，他们在墙上到处张贴这条“语录”。当刘格平讲话时，他甚至大声朗读它。“联字号”一派指责说，这条毛语录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毛从未说过这样的话。然而，这并不能减弱那些愿意相信这条语录人的热情，尤其是对自己的事业有利可图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联字号”的支持者，把刘宣传的省方案叫做“黑七条”。他们以强烈的诽谤和嘲弄来回敬“红字号”，他们希望把“七条”连同程首创一起加以否定。“七条”变成了地区斗争围绕的中心。随着一周周过去，对抗程度日趋尖锐，省决议远远没有解决晋东南地区问题，而是把大部分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10月中旬，刘未老决定巡视晋中和晋东南部分地区。省报刊电台把他的巡视宣传为和平使命，为使敌对派系聚集一起进行谈判，促成太原和北京所有会议，以及上级机关颁布的所有指示都不能实现的难以捉摸的大联合。

由于所有军区、军分区都表态支持他们的司令张日清，大部分村级民兵组织也同样支持张日清（因为他们的武装部顾问是张日清部下的军官），因此，刘未老召集一个军人护卫队都有问题。到外地巡视，他需要的不是一两个警卫员，而是一支足以维护省革委会主任的声望和独立自主的武装护卫队。只要他呆在太原，刘没有问题，可以使战斗员拥满大街，一经通知，敢死队可能集中并开赴到太原的任何地方。但是，他一旦离开太原，兵力比较变得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在乡村。没有自己的枪和部队，实际上他会成为当地任何掌权人的俘虏。

作为省革委会主任，省一切武装力量的政委，按照惯例，两个职位合二为一，刘有权要求省军区的一个分队护卫他。但是，由于他们

的忠诚程度是他最不能信赖的，所以他向太原的军区仓库要了 500 支步枪。他用这些枪的一部分武装了空军学院的 200 名军官学员，其余的保存下来，在最需要的地方分发。他把军官学员组成精锐的私人护卫队。他们是军校学生，不是正规部队的战士，不必服从教室以外任何部队的指挥官命令。他们有权使用“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还有权利成立群众组织，参加联合、造反、夺权，一句话，可以像中国其他任何学校的学生一样自由行动。自刘未老和张日清闹翻的那一刻开始，学校的多数派都站在刘的一边，并控制了校园。当他决定巡视时，他们欣然组成了忠实的护卫队。张日清和第六十九军的谢振华对此都无可奈何。

刘出访的第一站是山西中部的煤城阳泉，这座城市有 5 万人口，其中 1 万人在煤矿工作，1967 年秋，经过玩弄了一段复杂的派性花招之后，根据各煤矿、车间达成的一些脆弱的联合协定，正式解散了工业系统和市范围内的敌对派系，匆匆拼凑了一个“大联盟”。这种进展是根据贵州省工人的经验取得的。贵州按照这种方式形成大联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并在全国广泛宣传。事实上，阳泉的大联合进一步确立了张日清对这个市的控制。刘未老和他的武装军官学员一到达阳泉，另一派就壮起胆来。由矿工梁宝奎领导的四矿上的一群工人，联系前军官安科领导的一群化工工人，向令人忧虑的现状发起挑战。“大联盟”组织垮台了，少数派从刘剩余的备用库里获得 40 支步枪，把多数派共数千人统统赶出市外。被赶出家园的人残存在山沟里，尽最大努力，依靠他们随身携带的粮食和当地农民的施舍度日。不必说，煤矿的生产急剧下降，阳泉呈现了一派武装军营的景象。

刘未老一从阳泉归来，就立即动身前往晋东南地委所在地长治。和以前一样仍由他的“宫廷护卫队”——武装的军校学员，几个象征性的战士护卫，以及一卡车备用步枪。全市停止生产，中断办公和学习，去欢迎这位从省府来的史无前例的代表团。10 万人涌上街头，他们的欢迎，打乱了派别界线，双方都去欢迎刘主任，许多人争辩说，这位“大人物”亲自出马，就会很快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可使大多数人团结一致，把革命推向前进。

然而，两派的期望大相径庭。每派都希望刘能支持自己的观点，

而使另一派回心转意，即使他不能把所有的领导争取过来，也一定能争取过大多数群众来，从而解决问题。“红字号”一派已经得到他的公开支持，指望刘能创造一种使他们欢心鼓舞的舆论高潮。忙于准备程首创档案材料的“联字号”组织，原来以为刘一旦了解了案件的真相，认识到程确实是个国民党分子，就会改弦易辙，谴责这位“红字号”领导，并使群众转向自己一方。

包括范机灵在内的“联字号”研究小组，希望刘一下榻驻地，就召集他们汇报。然而，刘却分别从双方召集了30人，给他们发表了长篇演说号召他们执行“七条”，在程首创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会后，一位灰心丧气的“联字号”成员说：“刘格平不需要我们汇报，他认为他已了解了情况。一个派去直接向刘呈送材料的二人代表团，只不过见了他的秘书。”他们把书面报告交给秘书手里，期望刘阅读并立即作出反应。刘是否曾阅读过这个报告，人们不清楚。他所做的不是邀请30人，而是邀请两派500人到地区礼堂开会。

程首创本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向与会者介绍刘。他一出现，所有到会的“联字号”成员，就开始大喊“打倒程首创”！而“红字号”却回敬道“支持程首创！支持刘未老”！

在二楼后面的范机灵，积极提议并带领“联字号”呼喊反程口号。空军学院的学员负责会场秩序，当有人通知他们范机灵在指挥怀有敌意的喊口号者，负责二楼的学员说“抓住他”。这正符合范的心意，他认为“如果你们抓我，我们会更有理由反对你们，我们的不满就更有根据”。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喊“我叫范文，来抓我吧”。

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联字号”的支持者喊“去把他抓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去呢”？

“红字号”的人站起来呼喊：“你们扰乱大会，应该抓起来。”

刘未老看到大会一片混乱，就走到主席台中央说：“同志们，请坐下，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开会，请看我，请看我的脸……”

他三番五次重复这些话，只是用略有不同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直到人们平静下来为止。

接着，程首创又一次走向前说：“欢迎刘政委作报告”，然而，程刚出现，“联字号”的人就又开始第二次指责他，整个下午都是这样，

刘未老开始作报告了，但是，不断被口号声、呼喊声和楼上楼下的混乱声所打断。

刘慢条斯理、吞吞吐吐地讲话了。

“你们要打倒程……这是错误的……他没有问题。如果他有问题，我是不会为他做主的……你们必须执行‘七条’……有些人说我们应该执行六条半，打倒程……同志们，这不好……我们必须执行‘七条’而不是六条半……这是我的立场……程是你们的革委主任，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打倒他呢？……‘红字号’一派很好，他们首先在1月夺权……你们‘联字号’的人们一开始反对夺权，但是，现在你们贴出这么多大字报，要打倒程……你们甚至把大字报贴到太原……然而，一个人不会只用大字报或口号就能打倒的。如果大字报能打倒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纸糊的。”

“有人说程夫人有问题……我本人就认识她，她以前有个丈夫，是个特务……我们镇压了他。这就是你们用来说明程有问题的根据吗？同志们，正好相反……如果他是个坏分子，即使我们不把他打倒，他也会自己垮台的。”

这位老人整整讲了一下午，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据‘联字号’的支持者说，他所有的内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支持程。

“红字号”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大部分都是刘的不同姿态的照片。当程首创看到拍照时，小心地站在旁边。后来，报社在全市布告栏上贴出60公分高、45公分宽的放大照片，程首创和刘肩并肩，沐浴着刘的荣耀，非常神气。

“红字号”一派的宣传人员，还把刘的讲话录了音，后来，在市内无休无止地向人们进行广播。他们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他的一部分讲话内容，并从中为后来泛滥全区的《刘主任语录》选了一部分。这些语录甚至包括刘未老和李顺达两人上厕所时发表的评论。

有关李顺达利用自己的崇高声望，支持“联字号”组织的部分，引用刘未老的话说：“他是个农民，他知道什么？他一窍不通。”

刘对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说：“你们应该支持程首创，如果你们不支持程，就是路线问题。”

关于他的对手张日清，刘说：“有人说张日清政治觉悟水平高，实际上他犯错误水平高。另一方面，人们说我的政治水平低，但是，我

像支持程首创一样支持革命干部。”

“红字号”一派支持刘未老最后一项举动，是派宣传人员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刘格平小像章。在山西，他们的确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上，又增添了对刘未老的崇拜。

“联字号”的头头，有点被纷至沓来的刘的材料所淹没，他们加倍努力，奋起反击。由于无法把程的材料从刘的秘书手中取回，他们开始继续着手整理刘未老本人的档案材料，共30万字，他们收集了刘的所有25次讲话内容，语录、数张刘的照片，以及一套刘的像章，寄到北京中央，设想这些材料本身即使这个人彻底名誉扫地，一切都经过精心考虑，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王牌是程首创的档案材料。他们派劳动模范李顺达去刘司令部将其取回，然后，李英奎参谋长亲自送到北京，供中央领导阅读。

从客观上讲，刘未老的来访，给晋东南带来的是灾难，他的讲话非但没有使两派团结起来，反而使这个地区的分裂更加严重，以致引起最后摊牌。刘来访之前，双方阵营都各自有自己内部分歧。“联字号”队伍中，包括要打倒程首创的团体和仅仅要严厉批评他的团体，“红字号”包括要打倒武天明的团体和只想“炮轰”，即要批评他的团体。除了这些“大”分歧外，许多小分歧也使两个联盟的许多派别发生分裂。许多人尚未看出泾渭分明的两派本身，已经开始走向分裂的轨道。但是，刘一经加入到程的行列中，提出“红”“联”字号名称，他便很快使局势两极分化。他使两派中那些只想炮轰和想要打倒的人团结了起来，因此，两个敌对阵营内部，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变得更加巩固了。

平心而论，刘未老并没有制造任何分裂，大小分裂都没有。他们的做法，也没有促进相反的过程。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范围最广泛的大小的组织，往往趋向于合并成两个（不是三个、不是四个、只是两个）对抗司令部。如合并这样有规律地持续地发生的事物，不得不被认为是某种政治定律，就像波义耳化学定律或牛顿物理定律那样，具有普遍性。一旦造反摧毁了原有的权力结构，摧毁政权结构的联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首先分裂为许多小团体，但是，以后这些小团体经过合并，改变地点，分裂，重新组合，往往最后合并为二个组织。如果某种外部力量不阻止他们，他们会一决雌雄，直到一方当家作主，而另一方失败。尽管刘未老的来访，成了晋东南

两个对立中心支柱的催化剂。但是，全中国各地都显示出了这种相同的基本过程，并且具有同样的结果。

现实地讲，军分区所持立场：程首創是国民党特务，“联字号”支持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红字号”支持错误的反革命路线；比起刘未老所采取的立场来，要起着大得多的刺激两极分化作用。部队指挥员往往要两面派，一方面他们极力装作是从外面派进去解决问题，促成团结的公正仲裁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完全玩弄派性政治，拉一派打一派，充当一派反对另一派的事实上的领导人。李英奎不但没有充当斗争局外的公正仲裁人，反而充当了晋东南地区“联字号”一派的首要挑动者。然而，他参与派性斗争，并不是简单作为一派表演者，而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作为拥有崇高声望和荣耀的一名解放军干部。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强调林彪后来在九大所表达的观点，“文化革命”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存在。在他看来，部队是无可批评的，程帮助该地区制造批评部队领导，就是制造反革命的气氛。批评部队、反对部队领导，事实上就是反对革命。1971年，在和李英奎和曹中南谈话时，他们都承认部队犯了错误。即他们原则上承认这一点，实际上都不承认“联字号”方面有什么实际的、具体的错误，也不承认“联字号”有什么重大错误。在他们看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由“红字号”所引起的。他们要摧毁革委会，对部队不满，到处打、砸，并夺取武器，引起暴力冲突，使冲突不断升级。而且“红字号”选择国民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当头头，他们在被召往北京接受为期数月的教育和学习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在家乡煽动派性。

当“联字号”反对革委会，包括其主任在内的重要成员并要求驱逐他们时，部队领导人不把这叫做反对，说只是要求进行合理调整；当“联字号”动用枪支时，他们并非把这叫做不正当的升级，仅仅是为了自卫；当“联字号”调动民兵，投入武斗时，他们叫做并非凭借武装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群众；当“联字号”的头头千里迢迢，去北京接受教育和学习时，他们争辩说，不能指责他们在家搞派性，因为他们远离家园，阻断了他们对事件施加影响的途径。

似乎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很清楚，他们在这里使用着双重标准看两派：“联字号”绝不错误，“红字号”绝不正确。

七十七 围城

一开始，军分区司令员指责“红字号”煽起了晋东南所有的冲突，后来又指责刘未老晋东南之行后发生的冲突，是由于省革委会主任坚持要“红”、“联”两派组成某种形式的联合。他们指责说，刘来访的具体结果，就是武装了“红字号”，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开内战。尽管刘在长治仅呆了一周，但他还是想方设法给“红字号”的各团体分发了110支自动步枪，并安排他们又盗窃了1500支枪。原来部队从各民兵组织没收了1500支步枪，保存在海军军官学校。海军战士故意睁只眼闭只眼，“红字号”好战者趁机袭击了校园，带着足够发动进攻的武器逃之夭夭。此后，他们袭击了反对派团体，甚至正规部队，夺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不管“红字号”是否就这样直截了当地解决了武器问题，事实上刘未老动身回太原后不久，“红字号”确实开始向“联字号”提出挑战，开始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了。这是一次由地委革委会主任程首创本人所领导的一次令人莫名其妙的行动。他清楚地意识到，第六十九军指挥员们正在整理他的材料，他不得不抓权，否则就会大权旁落，11~12月，“红字号”动用武力，摧毁了“联字号”在长治占据的所有要塞。作为报复，“联字号”力量联合行动，除掉了在郊区以及乡村里所有残存的“红字号”的阵地。双方永远也未能完成这种扫荡过程，因为无论那一派都无力彻底粉碎另一派。但是，“联字号”大致夺取了郊区和偏僻乡村，而“红字号”则夺取了城市。在“红字号”控制的长治市区内，“联字号”仍然控制着手工业品大楼，建筑公司二队大楼，医专校园和红星机械厂。“红字号”在市区外仍然控制着小宋大队、太行锯条厂，以及“联字号”尚未能发动足够力量进行对抗的若干基层公社和工厂。然而，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无援孤军，无法改变全局。“红字号”控制着市区，“联字号”掌握着乡村，并把农村这个非常的阵地作为向“红字号”发动进一步攻击的基地。他们说，控制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是遵循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而

另一派控制城市，从城市进攻农村是追随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

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证明这场斗争确实是国共两党数十年斗争的继续呢？

随着相互继续扫荡对方孤立、零星小块地区的抵抗力量，使用重型武器已屡见不鲜了。“联字号”控制的“红星机械厂”和“红字号”的重要基地“淮海兵工厂”，都开始生产重机枪和大炮。到12月，所使用大炮口径已从80毫米，增大到160毫米。重炮轰击导致坦克的出现。工厂工人把链式拖拉机的钢板焊接起来制成坦克，这些行驶缓慢的坦克一在街上出现，阻击坦克的反坦克火箭就应运而生。

1月初，市里“红字号”成员控制了手工业大楼，击毙了一名守卫者，并抓获了数名其他人。1月6日，这支队伍又占领了建筑公司二队大楼。在那次战斗中，另一位“联字号”的保卫者死亡。比战场上这些胜利破坏性更大的麻烦是，“红字号”作出决定，控制全市所有粮票，阻止把粮票分发给仍然忠于“联字号”的人员。这就意味，分散在孤立零星地区的大批人员，无法再得到粮食，最终将无法生存下去。驻扎在张庄村马路对面机务段地区“联字号”司令部的头头，不得不派出侦察员进市里，帮助他们处于困境中的追随者逃跑。“红字号”的一帮人抓获了部分逃跑者，因此，设法封锁了所有的逃路。他们的行动基本成功了，很快，“联字号”在市里行动就非常困难了。

长治师专的一位干部，是“联字号”的同情者，决定回老家电留一趟。他刚出去上了大街，一些穿制服的人就走上前去和他答话。他想他们一定是“红字号”的，就说：“我是‘红字号’。”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原来这些人是袭击长治市的“联字号”的突击队，他们把他打得躺在街上，扬长而去。他勉强站起身后，又动身走开了。迎面又遇上了一群穿制服的人。

为了保险起见，他说：“我没有字号。”

“不可能。”他们说。

“嗯……我是‘联字号’。”

这回这些人却是“红字号”的，他们又痛打了他一顿，比“联字号”的袭击者打得还凶。

当他回到老家电留时，沮丧地说：“走了他妈的一里路，就挨了两次打！”

不少“联字号”的人不顾频繁的巡逻，确实设法逃出了市区。在铁路机务段登记后，他们就被分配到张庄中部的踏安中学所在地。很快踏安中学就变成了地区“联字号”司令部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此司令部起重要作用的市委干部有范机灵。尽管他创建的党政干部组织的成员从未超过32名，但是他被看作是群众领袖，因此升任了“太行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这个数万人组成的联盟，后来发展成“联字号”的重要组成部分。1967年秋，由于他当过记者，参加了调查地区革委会主任程首创历史的“专案组”。在李英奎司令收集所需材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市内形势危及“联字号”一派的支持者时，专案组成员转移到张庄的铁路机务段，占据了机务段南部的一些宿舍作为他们的生活区。范机灵除了承担调查任务外，还负责所有“联字号”头头的日常生活事务。1968年1月10日，他决定进市一趟，看仍然滞留在那儿的百性的生活情况。下面就是范机灵叙述的他从张庄去市上的经过：

我决定进市内一趟。情况非常危险，许多人劝我别去，但是我说：“我去看一看。”何波文说：“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两个人扮成普通工人，身穿黑色棉袄，头戴黑棉帽子，戴上白口罩和墨镜，这样可以掩饰我们的面孔。

为什么那样穿戴呢？几乎所有参加武斗的人都是那样的穿戴。穿上这样的衣服没人能分清你是哪一派的。

穿戴好后，我们骑着自行车进市里了。我们不得通过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这就是“红字号”的一个根据地电业局。但是，我们必须从前面过去，没有其他路能绕过去。

当我们走近电业局时，何说：“我先走。”

我说：“不行，让我先走。”

我前面走，何跟在我约50米后的地方。

如果我被抓住，他会有时间返回去，他们不会把我们两个人都抓住。

当我骑车路过那个楼时，我看见卫兵端着自动步枪，严阵以待准备射击，我慢腾腾地骑着车，仿佛一心想去干正经事。

“下来。”一个卫兵命令说。

“如果我停下来你会抓住我，如果我不停住你也会抓住我”，我想。

一直继续往前走似乎比较安全，我骑着车过去了。守卫也没有反应，甚至没有再喊一声。于是我们俩顺利地通过了那个地方。不过，我紧张得冒了一身大汗，我的心确实跳得很厉害！

一进入到市内，我们决定先在大街上走一走，我们不知道胡同小巷会是什么样子。大街上糟透了，市里好像经过一场日军的“三光”扫荡——到处是垃圾，所有的窗户都被砸烂了。所有的宣传栏都倒了，或是摇摇欲坠，而且上面也没有大字报。我们很难理解这是何种破坏活动，想一想我们的市容就是这个样子！

在大十字街口，我们看见了街道兵团头头何小更，带着五六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他手持自动步枪由西往东巡逻。

这下我们可完了，我想。

幸好他没有看见我们，正当他从西大街出来走到我们所在的街上时，我们往南拐，朝医专走去，所以他没有注意到我们。

当我们路过南大街食品商店门口时，我们听到十字街口响起了枪声。后来我们走到医专时，听说就在那一刻，何小更抓住了属于“联字号”的一名二中学生。

“联字号”仍然控制着医专，而且我们在整个武斗期间，一直控制着这个学校。1968年1月10日，当我进去时，仍有150人住在那儿。我中午到了那儿，跑到食堂想吃些东西。我发现食堂顶上有五六个大洞，这些洞是被炮弹打穿的，因此根本没有吃的东西，于是我去了宿舍问能做点什么饭。

“我们无法使用厨房，”宿舍的人说：“烟囱一冒烟，淮海兵工厂的大炮就轰击开了。所以我们只得在宿舍里用喝水杯做饭。如果你想吃饭，也得这样做，食堂有肉，自己拿吧。”

果然，我发现食堂大厅里有已经宰杀，但是没有去毛的四头肥猪。如果你要，就可以割上一块生肉。

看一看这个地方就够吓人的。院内弹坑累累。而弹壳在垃圾堆里直立着，就像地里的玉米秆儿一样。

“我最好离开这里。”我说。

“别担心，”其他人说：“你不必害怕火炮。炮弹每天击中校园五六次，但是还从没伤过人。噢，确实他们伤过两个人，那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小心。”

“怎么回事？”

驻守这里的两位“联字号”老战士解释说，炮弹的爆炸部分是弹头，炮弹一击中大楼，爆炸了，大部分爆炸力是向后向外，一座两层楼房，楼顶和二楼承受了炮弹的冲击力，因而一楼下面的人是安全的。

于是我留下来用一个大茶缸开始做饭了。大约下午一点钟，“红字号”的人开火了。一些炮弹击中我上面的楼顶，有些落在院子里，或会议室，可是，在一楼的屋子里人们仍在做饭，打扑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十七八岁的女学生们也面无惧色，我怎么能害怕呢？窗户全用砖给堵死了，所以院内的弹壳飞不进来，楼顶的弹壳也飞不进来，于是，我在炊火旁经受炮火的洗礼。我一开始怕得要死，后来就只是害怕了。

下午，我设法去了地区水利局，找到一位朋友，我借了点钱，就决定尽快离开市里。可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当我走到长治师范时，发现道路被“红字号”的人封锁了，我不得不返回医专住了一夜。由于没有电，院子里一片漆黑，一些人有几支蜡烛，可是，点蜡烛就意味着邀请“红字号”进行袭击，所以到处一片黑。只有几个人有被子，其余人用黑棉衣裹住自己，设法睡觉，但是没有人能睡好觉，天寒地冻，我冷得不行，当然主要还是害怕。我闭了一会儿眼睛，但是没有用，还是睁大眼睛睡不着。我觉得天总是亮不了，那是我的第一个漫长的黑夜。

第二天，我发现路仍然被堵着，因此我不得不再住下来。我在日夜的炮火之下，在医专一直呆到15号。然后我设法去了部队的地区宾馆，“红字号”控制的各个工厂和公社的民兵头头住满了宾馆。由于“联字号”头头无法返回自己的单位，就住在部队司令部。其中有两个人是我的朋友，交通局民兵头头和“五四三”厂的民兵头头。和他们呆在一起，因为换了环境，我睡得很香。

就在天亮前，我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阵非常猛烈的炮轰开始了，朝医专校园看去，我能看到灰尘和脏物在飞舞，我担心里面的人都被炸死了。我跑出部队司令部，顺着墙边来到医专对面，那儿有一堵墙遮蔽着一块平地。我刚到了这块地方，几辆坦克从南面开来了，进了医专大门。大门是用钢棍做的，但是坦克直接冲过大门进入院内，朝主楼开去。

我想，如果那辆坦克撞倒主楼，里面的人全部都得被活埋。

但是坦克没有开到主楼前停住了，调头开始往回返。正当坦克到达大门口时，两个人手握手榴弹，从后面跑上来，拉响了手榴弹，在坦克旁爆炸了，但是，没有什么损失。坦克沿着大街开走了。我看见一个袭击者头上流着血，他被手榴弹弹片击中了。

从大街对过有利的位置上，我能从医专大门看到校园的后面，校园外到晋东南地区医院和旁边的印刷厂。我看到“红字号”占领了医院，但是医专内我的同事们还不知道此事，我便要去告诉他们，但是我害怕我一离开隐蔽处就被抓获，所以我呆着没有动。

炮弹落在医专主楼的南北方向，并逐渐将火力对准他们的目标。一群袭击者集中在南面，开始向大楼移动。突然一发炮弹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炸伤好几个袭击者，他们撤退了。我们后来听说，这些袭击者回去后，咒骂那些后方的炮兵，自己炮轰自己一方的人了。

那天早上六点到八点之间，兵工厂向医专发射了一千多发炮弹，不过没有一发炮弹杀伤了人，因为“联字号”成员都藏在大楼内。那天他们的人死了一个，但不是被袭击者炮火打死的，而是被一发步枪子弹击中的。尽管其他的人都呆在隐蔽处，他却在慌乱中朝院子跑去，地区医院楼上的“红字号”枪手把他击倒了。

自15日至21日，大规模的武斗继续进行着，毫无减弱之势。15日晚上，我返回医专并在那里一直呆到21日。为什么我走不脱呢？唉，每次我出来上了街，就发现人们手握步枪、头戴钢盔巡逻。他们持有手榴弹，许多是自制的，就挎在他们的腰带上的。他们把医专的路都堵住了，马路往南通往淮海兵工厂，我不能走那条路，通往地区革委会的路，要经过军人宾馆，也由“红字号”的人控制着，通往北边的马路要经过防疫站中心，也是“红字号”的堡垒。唯一的出路就是偷偷往东溜到古城墙，可是，“红字号”成员昼夜在墙外巡逻，所以走那条路也不行。

21日半夜我被叫醒了，段晋文从长治北站派人来找我，他要我马上回去，给我分配紧急任务。

“可是我怎么出去呢？”我问：“我已想了好几天办法了。”

“只要下了床，我来带你。”传话人说。

时间是21日清晨三点钟，他带我出去，在黑暗中朝东走去。通过

东城，我们走上农田中间的一条小路，最后回到了长北站。我们至少走出市里10里地才敢在大路上行走。

我于十点钟回到长北站，段晋文告诉我，许多新部队已来到，是来搞“支左”工作的，他们需要粮食和蔬菜，我们的头头要我处理供应问题，于是我承担了 this 新任务。

从11日到21日，在长治的10天时间里，我在武斗气氛中生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进市里是为了联系，借钱，并了解情况。但是，我一到了那里就巴不得插翅飞走！

当范机灵溜进长治市里时，尽管武斗激烈，不过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两派仍然只是在互相试探对方，为争夺阵地玩弄花招。设法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对抗，使整个地区处于极端紧张的派性斗争中，为争夺武器，引起了袭击和反袭击。迫使各方面稳固自己的地区，工厂开始着手生产重型大炮、坦克，甚至火箭。最后决战尚未开始，双方都在为决定最后谁掌权而发动所有的力量。这个地区就像有无焰的闷火在慢慢燃烧，像燃烧的森林，只待一阵风吹来，就会使整个地区燃起熊熊大火。

此时发生了两件事，使局势达到危急状态。1月底的中央一次会议着手处理晋东南问题，根据李英奎司令提供的材料，会议公开宣布程首创是“坏人”、“反革命”，中央命令“红字号”组织的头头逮捕他，把他交给第六十九军，以便把他送往北京进行审讯。

“红字号”组织答复最后通牒的时间为期不远了。1月16日范文还在医专躲藏时，“红字号”的成员伏击了前往市中心的载着老干部的车队，并在枪口威逼之下绑架了其中的125人。

“红字号”巡逻队绑架了地区革委会六名成员，他们都是“联字号”的成员，几个县领导也与“联字号”有关系，几十名基层活跃分子，也有几个是“红字号”一派的。地区领导中最有名的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他在大寨得到承认之前，就因为生产上创造了奇迹而举国闻名了。其他的包括当地知名的各群众组织的煽动者，包括贾茂亭、李四远（不寻常的长鼻子素食者）、常三毛，地委秘书长、青云直上的记者戴晋中。

地区和县领导干部刚在太原参加晋东南问题的干部会议归来，这些积极分子已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在部队护送下返回长

治，李英奎参谋长指挥的一连军分区战士开路，独立师的一个连殿后。除了李英奎乘坐自己的吉普车指挥外，其余战士都坐着卡车。积极分子和县领导乘公共汽车，他们后面是乘坐卡车的独立师的战士。这支护卫队共有17辆车。他们一直沿北大街而下，这是去军分区最近的路线。由于他们这样气势浩大，并有部队护卫，“联字号”的领导认为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通过由“红字号”组织严密控制的大街。这是一次严重失算，部分也是因为李英奎和地方武装力量，在公开场合伪装成中立的面孔而造成的。据他们自己讲，他们是一支外部力量，要竭尽全力使两派团结起来，从而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谁敢干涉这样崇高的行动？

确实，除了“红字号”，谁会为他们的政治生涯，在某种情况下，冒生命危险，反对这样的与“上天”有牢固联系的攻势呢？（1971年李英奎多次向我们保证，他的战略战术已获得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的认可）。

当17辆车的车队，在黑暗中沿北大街向南行驶的时候，时间是隆冬凌晨一点钟，突然一辆拖拉机从路旁把一个四轮拖车横在马路上。李英奎意识到有伏击，命令他的司机加速，指挥吉普从拖车和左侧墙之间的小空隙飞速而过，猛开到军分区。几辆军车跟在后面勇猛冲，但是，第一辆载着积极分子的公共汽车擦墙而过，灭、熄火停住了，把大街完全堵住了。

当护卫队的队伍停车后，屋顶的阻击手朝大队伍开了枪，从上面扔下的手榴弹在大街上爆炸了。在背后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噼啪声，转而响起了沙哑的呼喊声：“欢迎六十九军来支左”，“可耻的‘联字号’罪犯发动武装袭击”，“‘街道兵团’‘公社兵团’和‘鬼见愁’的！”当这些呼喊声充满天空时，“红字号”成员把一个大管子滚到拖车后面的空隙，结果大街更堵塞了，然后他们在护卫队北端又放置了一个路障，什么车都倒不出去了。大街上的呼喊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忙乱的动作，把护卫队牵制住了。直到“红字号”的增援部队从东关到达为止。接着大批武装人员沿街而来，砸碎汽车玻璃，把车上的人拉了出来，进行毒打。

独立师的战士严格执行不还击命令，劝说地区领导离开他们的汽车，和战士们一起藏在卡车后面，再用大衣盖上，设法营救他们。可

是袭击者看见了，有人爬上卡车，坚持要搜查每一辆汽车。他们在第三辆卡车里发现了常三毛，粗鲁地把他拖了出来，打倒在街上。接着他们又找到了贾茂亭和李四元，最后在第一辆卡车里他们发现了整个行动的主要目标李顺达，下面是他给我描述后来几个小时的情况：

他们把我头上的大衣扯掉问：“这是谁？”实际上不用问。他们很清楚我是谁。他们把我推下卡车，但是我用手抓住了马槽板跳了下来。然后一伙无赖手里拿着手榴弹，端着步枪围住了我。他们脱了我的帽子和大衣，开始用枪托打我。几个人用手榴弹打我。一个人把钢带当鞭子。我的脑袋受了伤开始流血，于是我抬起手用手摸摸伤口。正在这时，一个家伙挥舞着手榴弹打在了我手上。手榴弹砸着的手指头疼痛不止，不过，大部分是打在我的背上和肩上。

第一次袭击后，他们把我们赶进第四运输公司办公室，把我们绑了起来。他们把我脖子上血浸湿的围巾拿了下来，紧按在我头上，把一个口罩塞进我嘴里，然后把我的双手从背后用麻绳绑了起来。接着，他们把我们从这里推到几排大楼之外的地区运输公司。他们把大部分人锁在了一个菜窖里，因为我流血流得很厉害，大衣都被血浸透了，他们把我和一个头上同样开了口子的司机推进了门房。

一位医生来看我们，我头上仍然流着血。于是他去找捉我的人，他回来后给我拿掉蒙眼布，并给我松开绳子。他发现我头上的一个大伤口，足以伸进一个手指头。他往伤口上敷了点药并包了起来，他也为司机包扎好。然后他说：“老李，他们确实毒打了你，但我不能给你应当得到的治疗。”

门房的守卫也不坏。医生走了以后，他问我：“老李，他们打你什么地方了？”

“浑身上下都打了。”我说：“可能他们把我的骨头打断了。”

他把我全身上下摸了个遍，得出结论说没有打断骨头。于是我躺在床上，他给我盖好，可是我睡不着，我浑身疼痛……不断颤动。

一个人来了，他要我声明支持程首创，我没有理他。

接着一起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用手电筒打伤了我印堂穴，第二个人用枪托打我的肚子，第三个人朝我脸上打了几十个耳光。

突然远处响起了爆炸声。

“谁打的炮？”

“我不知道。”

“把他拉到落炮弹的地方。”

“不，毙了他。”

他们又蒙上我的眼睛，把我紧紧捆了起来，带到院子中间。我想他们要开枪打死我，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抓住我的腿和胳膊把我推上一辆卡车。我脸朝下俯在车厢底的钢板上。天气很冷，我能听见他们把人从菜窖里拖出来，全部把他们押在卡车上。后来我听到三毛在我旁边，他的嘴里没有塞上东西。他们坐在他身上，使他无法呼吸，他叫喊着，就那样的姿势再也支持不住，于是坐在他身上的人稍微放松了点，让他吸一口气。

卡车开得很快，从地区运输公司朝南向淮海兵工厂开去。当我到了淮海兵工厂时，他们把我从卡车上拉了下来，拖到技术楼的二层。我仍然被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经过好长时间的讨论后，又把我带下楼推进一辆轿车。这辆车转了好几个弯，然后停下来。他们让我下了一个地下室，一直走到顶端，把我扔进最后一个满是灰尘垃圾的房间里。我倒在地板上，我的衣服、头发、脸、双手沾满了我无法洗净的灰土。

在以后的几天里，“红字号”突击队轮流毒打和审问李顺达，以及他的同伴们，并要求他们背叛张日清，转而支持程首创。

李顺达和其他地区领导被绑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晋东南地区，“联字号”头头在张庄的机务段召集会议，决定集中力量进攻长治，“解放”长治市，解放俘虏。消息传出，所有忠诚的民兵在长北站集中，准备参加武斗。同时，头头们采取措施，加强了“联字号”司令部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命令大伙，公社领导拘捕和审问被怀疑过去效忠或与“红字号”组织有联系的所有的人。

当“红字号”保卫小组在淮海兵工厂地下室折磨毒打李顺达和他的同伴们时，企图迫使他们支持程首创的声明时，“联字号”组织把郊区和乡村的所有“红字号”一派的嫌疑分子赶在一起，折磨毒打他们，逼迫他们坦白交待他们效忠反革命的罪行，揭发他们的图谋，如果可能，促使他们转而效忠于武天明和李英奎。

与此同时，“无理”绑架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到北京。中央军委1月28日作出反应，命令第六十九军的肖宜劲将军率领一支新部

队进驻晋东南地区。中央也劝告省领导要求释放被绑架的人质。2月5日，直升飞机在长治上空投下数千份传单，这是省军区司令谢振华将军和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签发的命令。命令指出：除非“红字号”组织立即释放16日晚抓获的人员，否则中央将宣布整个“红字号”一派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将承担全部后果。

所有的这些活动，只是进一步激化了局势，当“联字号”组织领导下的民兵集结一起，为日期确定在2月20日的全面反击作准备时，“红字号”组织随时随地都进行了反击。他们包围了肖将军指挥下的向长治挺进的部队的十二个连，两个班，并夺取了他们的武器。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打伤了第六十九军一名部长和许多普通战士，他们杀死了军分区指挥的独立团一个大队副指挥和一名班长。部队仍然严格执行不向市民开枪的命令，也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反击这样的袭击。

长治西大街的战斗，引起了“红字号”武装人员炮击一个贮存有大批粮食的粮站，在这次战斗中，粮站的一些建筑物着了火，等把大火扑灭后，600万斤小麦和玉米被熊熊大火烧毁了。李英奎指责“红字号”蓄意烧毁大量的粮食。

2月4日，淮海兵工厂大门外发生了一起更加严重的事件，一些“红字号”成员，把满满一车未爆炸的炸弹，经过大街推到了工厂驻军的营房，毫不警告便点火引爆，炸死42人。¹²

大爆炸过后，出现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场景，老人、妇女、儿童蜂拥而至，围在手推车周围看街上躺着的死人怎么处理，有些躯体躺在一起无法辨认。附近的树上挂着撕裂的胳膊、腿、肌肉，一片片衣服，血迹四溅，几个小时后，难闻的气味令所有围观的人作呕。

李英奎把这次事件作为“红字号”组织袭击驻淮海兵工厂部队的阴谋，是一起意外的阴谋，因为炮弹在零点前爆炸，没有炸死战士而炸死了平民。他命令把产生大屠杀的可怕细节都写出来报道、广播，并用小册子形式散发到本地区的边远地带，进一步强化刺激，如果已在准备中的大规模的反击行动还需要激发的话。

市内情况恶化了，首先“红字号”组织切断了部队司令部以及“联字号”成员坚守的诸如医专之类单位的电、水、食品，后来又逐步扩

¹²译者注：实际是“红字号”把“联字号”生产、发射未爆的炮弹送给支队的部队军官查看，指责对方搞武斗，这种自产的超性能炮弹发生突然爆炸。

大到全市。部队指责“红字号”要对此负责，但是没人能解释，为什么“红字号”头头竟使他们自己遭受如此严重的灾难呢？

七十八 部队强制 实现和平

2月17日，中央发布命令，号召晋东南对立派系实行停火，进行和谈。中央对两派都不抱任何幻想，认为他们不会讲理服理，就进一步命令第六十九军曹中南和肖宜劲将军强迫实行停火，安排和谈，并在本地区实行大联合。¹³为了确保这些将军有足够的兵力和支持他们的要求，中央军委安排，从附近3个省调动若干补充部队。几天后他们又增派3个师，一共命令有7个番号的部队进入上党地区。

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曹中南将军。他于下午三点到达长治机场，并立即着手协调新派部队的行动，不管他们是乘火车还是卡车，都预定下午六点前到位。因此，有效地阻止了“联字号”一派的民兵大军，他们集结在长治市北郊，信心十足、整装待命，准备进行全面反击。

部队指挥员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整个军事调动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山西省核心领导小组任何人，都不得知道有关要发生情况，也得不到任何暗示。刘未老和张日清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预先警告，结果双方都无法命令该地区各自的兵力处于警戒状态，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或牵制中央的行动。

曹将军下达命令，成立长治司令部，但是因为那里的战斗已非常激烈，数百门大炮在不断地轰鸣，而且还因为怀有敌意的平民百姓，可能反对部队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所以他在张庄以北三华里的马厂，成立了临时司令部。他在那里把每支新到的部队部署到指定的位

¹³译者注：1968年2月16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为解决晋东南武斗问题，发布《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中发〔68〕28号）。《通知》说：“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

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第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作者韩丁这里介绍的就是执行《通知》时的军事行动。

置，把整个城市围了个水泄不通。部队部署就绪后，他开始了一个宣传攻势，公布了中央2月17日命令。

曹的部队把命令印成成千上万份传单，分发到市郊各地，并用直升飞机把传单空投到市中心。他们还通过数十辆宣传车沿路游行，大声宣读传单的内容，尽可能深入到市内。考虑到战斗的激烈程度，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当天，步枪、手榴弹的攻击就使几位战士负了伤。

他们广泛宣传的一条，是号召两派头头去机场候机室进行和谈。第一天“联字号”的代表团去等候，但“红字号”的代表团没有到场。最后，曹政委派人进市内直接找“红字号”的头头谈话。第二天，“红字号”也派去一个谈判组。

中央的传单有三点要求：一、停火。二、上交所有武器。三、交换所有俘虏。但双方都不肯首先执行任何一点要求。

市内的“红字号”代表争辩说，他们已被重重包围，是大反攻的目标，而且他们已完全处于自卫状态，因此另一方应该停止火力进攻，交出武器以表示诚意。“联字号”代表则反击说，首先开火的是“红字号”，他们应该首先停火放下武器。由于双方都不肯屈服让步，会谈紧张地拖了两天。

部队坚持要求停火，由于集结了足够的兵力，迫使参与武斗的人员服从，冲突双方别无选择，最后只好同意。在曹中南的坚持下，他们口头达成八条协定，呼吁同时停火，双方交出武器，并且任何违反协定的人都要承担全部责任。即：违反协定者理亏。

然而，轮到签署这个协议时，又产生了另一个绊脚石，“红字号”的谈判者不接受1月25日夺权总司令徐士鱼为联署人。徐来自河南铁路局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组织——铁路机务段。他在当地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力的人。“红字号”的代表拒绝和任何河南人进行谈判。“联字号”代表团谴责这种立场是荒谬的。徐士鱼是他们的司令。怎么可能禁止他参加谈判呢？在整个斗争期间，他发挥领导作用，而且“红字号”一派把徐士鱼卷入地方冲突之中，他们怎么能拒绝和他解决问题呢？

可是，“红字号”仍然拒不妥协，他们拒绝承认河南人，并从机场撤走他们的5人代表团。两派继续开火，在全市进行攻击和反攻。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不仅互相竞争的各派里有人伤亡，而且来阻止武

斗的战士也有伤亡。

最后，曹分别和双方进行了谈判，劝说“联字号”从他们代表队中取消一个人（徐士鱼），条件是“红字号”也从他们代表队中也减少一人。代表各派的人数减少到四人，重新谈妥八条协议，并最后签了字。

双方签订协议后，武斗或多或少停止了，但是仍然没有人上交武器。一整天过去了，机场的部队司令部仍没有人上缴一支枪、一发子弹或一枚手榴弹。

曹政委和肖军长在马厂“联字号”的司令部成立了办公室，依靠“联字号”组织所提供的食品和其他供给，事实上，他们把“联字号”队伍当作可靠的联盟对待。曹建议“联字号”头头，在上缴武器问题上采取主动。他们应该首先采取行动，放弃一些武器，并开始采取和解步骤。

经过一段认真劝说，“联字号”组织把几门大炮，200支步枪，数千发子弹交给控制机场的部队。他们上缴武器时，敲锣打鼓，手持红旗，列队浩浩荡荡游行到接管点，大力渲染了一番。

接着曹转向“红字号”头头，要求他们做出类似的友好姿态。既然“联字号”的人已采取了行动，你们也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为你们争点气。这时“红字号”组织几乎无法拒绝，他们也敲锣打鼓，大肆炫耀一番，把一些武器上缴机场部队。

实际上，这种解除武装与其说是真心诚意，倒不如说是搞表面文章。双方上缴的都是破损的武器、废枪支和有毛病的弹药，凡是发现能用的，他们都精心保存。双方都不敢轻易相信对方，都不想一旦战事再发，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不管上缴武器是装门面也好，还是象征性也好，武斗骤然减弱了。事实上的停火也渐渐扩展到全市。随着武斗的停止，士兵们渐渐深入市内，和群众面对面，鼓励他们交出剩余的武器，恢复必要的供应和服务。那时，由于生活用品供应严重短缺，整个长治苦不堪言。市内除了自用水井外，停水、停电、食品也严重短缺。由于好几个月没有理发员，大部分男人是长发过耳，胡须满腮。

部队把粮食和蔬菜运进市内，开放了公共集市。部队派出小组恢复水电供应，而且还派出理发小分队给市民理发，但是尽管如此，许

多人仍不欢迎部队。“红字号”派一开始曾反对过军分区领导，他们把部队现在的干预，看作是一种镇压行动。他们散布消息说，战士们要对全市居民执行军事管制。所以许多偏僻街道、院落，战士们一出现，市民就回避了。战士们挑水扫院，千方百计争取朋友，但是进展非常缓慢。

他们发现“红字号”成员控制的校园非常难进。尽管战士们进市内没有带枪，但是，校门口群众组织的步枪、机枪严阵以待。官兵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劝说，学生才放下武器，让战士进入校园。

几周之内，部队在学校、工厂、街道、甚至家家户户组织数以千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但是许多人拒绝参加。有些人派他们的妻子坐那儿，有些人派儿媳汇报情况，如果部队指导员能赢得年轻人的信任，这一家的其他成员就渐渐到场参加了。

经过持久耐心的说服，上缴的武器逐渐增多了。一开始，各处只交出几支枪。于是一个人和另一个谈论，这消息就传开了。有些人带领战士走门串户，“我交出我的枪，你交出手榴弹吗？”于是，这场运动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几周之内，大部分人都交出手中的武器。部队大略估计一下所收的武器总数，因此能计算出什么时候大批武器能完成上缴。尽管如此，大批武器还未有着落，一千多名“红字号”的积极分子，没有交出武器，而是撤退到高平县，进入大山之中，准备进行游击战。部队让他们走，暂时把武器转移出市内，他们也就满意了，对游击队可在以后处理。曹司令没有分散兵力，未使部队过于分散，而是集中兵力抚慰市内——全地区武斗的中心。

曹将军一旦确信人们手中的大部分武器已上缴或带走，就坚决努力让双方释放俘虏。双方抓了许多俘虏，只有互相交换俘虏后，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红字号”承认拘押着70名“联字号”俘虏，而“联字号”拘押了50名“红字号”成员。实际上，双方开始时扣押被俘人员要比这些数字多得多，但是由于杀害俘虏，由于受了致命伤和晚期病症未经治疗，所以拘押的实际人数减少了。

协商被扣押人员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各方都声称对方至少扣押了他们100人。因此不能接受对方承认扣押的大为减少的数字，经部队代表彻底核查后，显示双方交出的有争议的人数，确实大致和仍生存的人数一致。由于对已死亡的人无法处理，曹司令坚持两方释放一切

仍扣押的人员。

最后，2月26日在市革委会办公室前互相交换了被扣押人员。双方都是用卡车把他们运来的，并在大街上相距100米处的两条线上停车，根据一定的信号，被扣押人员爬下汽车。走过两条线隔开的空地，再爬上自己的卡车。当信号一发出，“红字号”扣押的“联字号”人员下了车，开始步行，但是“联字号”扣押的“红字号”人员拒绝走动，他们声称遭受了毒打无法行走，要求部队用担架把他们抬过去。因为这个问题他们延误了交换，直到下午五点钟才交换完毕。

队伍派出一个排的战士去监督交换人员行动。这些部队拒绝运送任何人，指挥员说：“我们是服从命令来这儿的，你们也都应该服从命令。这次交换行动必须在下午五点前完成。凡是呆着超过这个时间的人，后果自负。过了那时以后，我们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概不负责。”

下午4点50分时，指挥员说：“我们十分钟后就要离开这儿了。”当他们听到这个警告，“联字号”一方扣押的“红字号”囚犯最后屈服了，从车上爬下来，慌慌忙忙拼命地爬过空地。最后，由于他们大部分人主动行动起来，旁观者开始笑起来，“红字号”甚至在自己支持者中间也有失身份。

在交换人员后，气氛有所缓和了，部队加强举办学习班，加强搜查武器，战士们在“红字号”一派的保垒——长治宾馆房梁之间找到了一个大秘密点。他们还在地下室和院子下的隧道里又发现一些秘藏处，从沙发和软椅子里搜出手榴弹。当部队把长治及其收缴的武器合计起来，总数是300门大炮，6000支步枪，400—500枚手榴弹，32部收音机（有的是从政府部门拿走的，有的是自制的），以及400多万发子弹。

在平定和解除长治的武装后，曹将军派出一个团去高平县，围攻逃往东山的逃跑者。战士们出奇不意地包围了这座山后，就要求对话。在高山上的上千名自称为游击队员的，不知道实际去了多少士兵，也不知道在炫耀武器的战士们根本没有带弹药。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已被包围，陷入绝境，因此同意和平投降，他们投降后又交了1000支步枪。

部队阻止了武斗，但是并没有终止派性。“联字号”成员以征服

者的姿势返回市内。中央还没有宣布“红字号”头头程首创是坏人，是否是国民党分子？部队还没有逮捕淮海兵工厂副司令赵干远，指控他是否犯有杀头之罪。部队还没有指控任跃新和高可共，以及其他著名的“红字号”指挥员犯有严重罪行，部队还没有公开说“联字号”执行了支持“1.25”夺权和支持军队的正确方针。

所有这一切，都为以为自己所作所为，几乎完全正确的“联字号”成员，严厉镇压“红字号”奠定了基础。

“联字号”成员返回自己曾是少数派所在的工厂和单位，想到他们曾被拒之门外，拒发工资，拒发如棉衣、安全镜之类劳保福利，以致最后市内都无权进入，他们便千方百计钟冤复仇。“联字号”联合队伍，抓住“红字号”的活跃分子，毒打他们，好几次他们把“红字号”的人打死。自行车厂“联字号”工人杀死一名属于“红字号”的工友，然后设法掩盖事实说，这个人从窗户跳下去自杀了。自行车厂另一群“联字号”的一个工人，把一个在壶关县隐藏的“红字号”工友带回去，然后毒打，使他内脏受伤死去。公安局的“联字号”成员，闯进他们的侦察员“同事”，在著名的“红字号”成员家中把他打死。

部队曾企图逮捕那些犯了严重暴力罪行的人，调查所有此类事件，试图阻止这种报复性打人杀人行动。但是，大部分军人对他们原来“联字号”的同盟都有偏心，便草草了结了这次运动。为在五阳煤矿确立“联字号”一派出人头地的地位，勇敢奋斗的张庄煤矿工人申仲堂，叙述了停止武斗协定生效后，他们进到市内的情况：

武斗一结束，我们就进城贴大字报，庆祝程首创的垮台——“推翻程首创”“打倒程首创”“联字号必胜”“红字号必败”。

市内“红字号”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已被解除了武装，不再有大炮、机枪、步枪、手榴弹了，甚至连根棍子都没啦。而且部队在各处维持秩序，因此我们在街上没有看见武斗场面，但是在偏僻街道上以及小胡同里，殴斗仍在继续。如果你参加辩论，“红字号”的人会抓住你，把你抓进胡同毒打。我们参加了一次被“红字号”成员骚扰的庆祝会，当我们看到士兵睁只眼闭只眼时，我们就把捣乱分子拖进胡同猛揍一顿。

大家都说部队要逮捕闹事者进行监禁，但是通常他们只是把我们拉到一旁，耐心教导一番。部队平定长治所使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

疏远了“红字号”一派及其支持者，军官们不仅对“联字号”的闹事者宽大，对“红字号”成员严惩，而且他们还宣传一系列官方对“红字号”主要头头的指控。他们每天指控程首创犯有严重罪行，直到他成为全区闻名的叛徒、卖国贼、现行反革命——全省最大的“要案”为止，由于程逃跑了，他们进行了大力搜查，同时逮捕他的主要帮凶。他们围捕了去机场参加会谈的代表，前“红字号”战地司令曹成远，司令部高可共，前市委干部霍小更。这三个人立即被因为谋杀罪刑而受审。

一点也不奇怪，许多“红字号”的人决定逃跑，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便携带武器逃到河北石家庄、山西中部的太原或阳泉，或去其他和他们派系有联系，仍然存在的并愿意接受他们的群众组织。

在部队干预阻止了晋东南的武斗后，曹司令把注意力转向成立两派大联盟，一方面，他们在基层组织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另一方面，派主要领导到北京参加学习和协商会议。北京会议倒像一次马拉松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从5月份开始，到9月份才结束。

北京会谈构成了解决山西问题的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刘未老、张日清各自领导的力量之间公开爆发冲突之后不久，于1967年4月召开的，周恩来把这两位主要领导和一些重要的助手叫到北京，经过几周的学习讨论之后，他们同意合作。但是他们一回到山西就也更加起劲地重新对抗起来。7月份周总理还是把这些人召进北京，进行教育和协商，这一次，中央把大部分指责集中到张日清身上。周恩来让他呆在北京，让刘未老一个人回到太原。但是尽管张日清不能返晋，派性斗争仍是高潮迭起。前几章描述的发生在长治、阳泉的武斗是在刘未老前往该地之后发生的。于是12月周恩来谴责了刘未老，并把他召回北京，接受继续教育。以前，张日清审查是主要对象，但是，这一次主要集中批评刘。到年底刘第三次和张言归与好，两个人都返回山西“执行毛主席的团结和大联合政策”。但是，他们的归来，对缓和山西的冲突无济于事，相反，双方都集中力量进行自我武装。张日清匆匆忙忙给支持他们的工人或农民组织下发民兵的武器，而刘未老的人却攻击民兵单位，哪里能找到武器就去哪里抢夺。在这次由竞争引起的拉锯战中，许多人遭到毒打、负伤甚至死亡。武斗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山西中部、西南部的一些县用尽了粮食，部队

呼吁中央政府支援40万吨粮食，帮助人们度过严冬。由于派性斗争和公开交战，动用了省内大部分卡车，部队还要求调拨100辆卡车，把这么多吨粮运送到需要的地方。政府发出了粮食和卡车。但车辆都未能到达目的地。各派抢走了靠近他们路段的满载粮食的卡车，太原工大学生一次行动就抢走了40辆卡车，把汽车和货物用来搞派性斗争。

如我们所见，山西局势最严重的是晋东南。只有在大批部队强制干预后，才恢复了长治市及整个地区的秩序。由于高达8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中央寻求一种政治解决途径。周恩来把山西省和地区领导再次召回北京参加学习班。

周恩来要求各派首先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可以说进行组织整顿，然后与另一方团结起来，继续革命。

但是，各派的头头们没把这种精神带到北京，他们认为，学习班是揭露对方为自己辩护的地方。对“联字号”一派的头头来说更是这样。他们由于得到部队的支持，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他们以为会议的目的，是让“红字号”一派的人承认错误，允诺改正错误，许多派去参加会议的军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晋东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田怀保。这是一位信心十足、能言善辩、勇敢而仪表堂堂的青年人，1971年他给我们讲了这些情况，他参加了2月在长治机场谈判的全过程。“表面上我是部队主要干部，设法议和，实际上我是‘联字号’参加会谈的顾问。”他自豪地说。

长治市委秘书长范机灵同样自豪地说到他的作用：当我们“联字号”领导发现“红字号”选定的一位代表曾在我办公室工作过时，我被选定赴北京参加全国会议。我去首都不是去检查我自己的错误，或作自我批评，而是去对付这个人。我去那儿的目的是，一旦开始摆事实，就开始反击他歪曲事实，并加以纠正。我们估计他不会抓住我什么，因为我的工龄才10年，而且我也没有犯过什么非常严重的错误。文化革命中我没有犯过任何罪，所以我可以有效地对付他。

田怀保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议的：

我们的伙食费每天一元，“红字号”的人没有吃胖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负担很重。尽管他们不愿承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犯了错误，

而且有的因犯了严重错误，感到内疚。

“联字号”的人个个都心宽体胖，特别是毛培春，他吃得那么胖，人们都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赫鲁晓夫——他的眼睛、鼻子看上去很像赫鲁晓夫，过去他一直很消瘦，但是在北京他的体重增至190斤。

毕竟会议和一天一元的伙食补助费延续了6个月，罗有文胖得无法忍受盛夏的酷热了。

范文的体重也增加了好多，主要是腰围变粗了。他原是一位工人，人年轻，过去习惯运动，突然静坐上半年，又一直吃每天一元的伙食。

由于“红字号”的人不愿承认错误，“联字号”成员避免设法刺激他们，他们每天吃了睡觉、打扑克、游览北京，然后回家再吃一些，作息表要求学习到十点，休息到午饭时分，然后都出去散步、游泳，六点回来吃晚饭。

至于我，我吃不好，我承担的责任重大，我必须搭座桥把人们团结起来。晚上很难入睡，所以许多人吃胖了，而我的体重却减了4斤。

没有人在我的脖子上挂什么牌子，没有人逼我们“坐飞机”。但是会议仍然触及到了我们的灵魂。

第四次会议可能触及一些人的灵魂，但是触及不够深，“红字号”或“联字号”的人都没有承认错误。

同时，返回长治后，“联字号”的人开始着手教育“红字号”了。“联字号”的头头在五阳煤矿组织了一个学习班，叫5位“红字号”头头去接受再教育，市领导也逮捕了5位“红字号”头头，捆绑起来用卡车运到五阳，参加学习班。

当他们被拉到学习班时，“联字号”成员毒打了他们。

范机灵在北京监视的那个“红字号”头头，一天找到他们问：“你们计划抓我们办公室多少人？”

为了显示他的强硬，范回答说：“只要有坏人，有多少就逮捕多少。”

“好吧，王安徽是坏人吗？曹雪中怎么样呢？有强呢？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听到这些话，范机灵知道市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情况。次日清晨，他乘第一班公共汽车去市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在电话中找到一位“联字号”的人。

“有人抓住了‘红字号’吗？”他问。

“我们把5个‘红字号’送到了五阳矿学习班了。”

“怎么样送去的。”

“用卡车。”

“你们打他们了吗？”

“如果群众动了怒，可能对待他们粗暴了点，我们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送到了学习班。”

“你们不能那样做，”范机灵抗议说：“那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这会给在北京代表你们的所有人带来好多麻烦，我们难于开口讲话了。如果你们继续我行我素，你们最好自己来这儿，我不能再代表你们了。”

“那么，他们已经在矿上，我现在怎么办呢？”

“保证再不发生这类事情。”范机灵说。

保证很难实施。在1968年2月武斗结束后，“联字号”的支持者三番五次毒打“红字号”成员。当他们有机会报复时，“红字号”反过来毒打“联字号”的人。于是暴力冲突继续发生，但是不像12月，1月那样公开进行，而是秘密在黑暗偏僻的胡同小巷里进行。军人们很难维持局势，因为部队本身曾给成千上万的人贴上反革命的标记，每次出现新问题，“联字号”的胜利者总是把这些人指责为阶级敌人，把他们拖去审问，要他们承认，如果他们拒绝就毒打他们。

1968年2月以后，在晋东南地区，很少能发现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红字号”的成员。他们也否认曾参加过“红字号”组织，或声称他们事实上一直就是站在“联字号”一边的，因为那么多组织发生了分裂，转变立场，或一次、二次改换组织，所以回避和否认是容易得到承认的。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人可以不顾实际履历如何，总是声称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他能显示始终如一的话。

考虑到长治的这种气氛和北京形成的僵局，似乎在学习班上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然而6月之后，他们最终同意了。这是因为达成妥协对大家都是利害攸关的。北京当局告诉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回家，除非他们签订一份互相同意的文件。这可确实是一种威胁。他们离家在外的时间越长，得到的支持就越少，这种情况对“红字号”一方来讲，更是如此。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几乎一开始就认为“红字号”组织理亏。如果“红字号”的头头不能迅速返回长治，重振旗鼓，他

们的组织是会土崩瓦解的。各方的压力很大，当传来消息说，山西忻县地区两派达成了协议，已经离开北京了，山西晋东南代表，决心作出最后努力，以便赶上忻县。

8月21日，双方各自三位代表，在主任田怀保的主持下举行会议。田怀保这位“公正”的调停人，认为“联字号”是正确的革命群众组织，而“红字号”是国民党分子领导的阴谋集团。

田怀保描述协商情况如下：

我们一边谈一边把同意的条目写出来。与会者就每句话都进行激烈斗争，由于我们只能写下大家都同意的内容，所以我们一句一句地写，进展非常缓慢。武惠丰为“红字号”一方写，韩海成为“联字号”一方写，我的办公室王秘书为部队执笔。

首先我们必须找到总结本地区全局和评价两大组织的原则。我建议这样一句话，“程首创钻进革委会，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阻挠执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破坏晋东南地区的大好形势”。

“一小撮”这个词引起了麻烦。“联字号”代表同意使用这个词，但“红字号”代表不同意。

“‘一小撮’这个词包括我们大家，尤其是在这儿的人？”“红字号”的人问道。

我们就这一点辩论了好长时间。

“它的意思，只有几个人。”我说。

可是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我们是被包括在内的。”

因此我建议用这样的句子开头：“诸如程首创以及其他的坏人。”

“你们又把我们包括进去了。”武惠丰说。

我们就这句话争辩了两个小时，我们不休息、不吃饭。

最后，我建议写成“坏人，程首创等人”但是他们不肯同意。

我们说“等等”意思是，并不仅仅是程一个人，“有薛良、有高可共、裴奇伦和任跃新，只提最重要的坏头头就行了”。

“那么，你们得把他们都点出来。”他们说。

“这样的名单太长。”我们回敬道。

我们三番五次解释，这只是指程和其他坏人，但是他们说：“在我们看来，里面也指我们。”

“联字号”的代表说，在这一点他们不再作任何让步。我们只得

体会。我们分别找“联字号”的代表谈了话，阳泉县政委郭厚良和“红字号”代表谈话。我们最后说服“联字号”的代表，写“坏分子程首创”就行了，不用其他任何词（由于中央已点名程为“坏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没有人能直接反驳中央，导致结果对抗“老天爷”），来这个解决方案。“红字号”接受了，于是我们接着讨论了下一句。

我建议，“双方都应支持军队，军队在晋东南地区‘支左’工作中，基本上是正确的，反对军队就是反对我们的‘钢铁长城’”。

但是“红字号”代表不肯同意“基本正确”，他们否认我们部队的伟大成就，反对这个关键性的句子。

武惠丰站起来讲述了他的家史。他原来是从沈阳来的。因为他父亲不能容忍日本人的压迫，带着全家去了黑龙江，他父亲给人当雇工，母亲给人当佣人。后来，毛泽东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解放了武家人，武才有了上学机会。在此之前他过着苦难的生活，吃野菜和南瓜。“我小时候，吃过很多野菜和南瓜，现在，我再看一眼就无法忍受，因此，我怎么能反军呢？从我内心上我不反军。”

“那么，你们怎么能夺部队的武器呢？你们派别的人怎么能杀害、打伤58名战士呢？”我们问。

“那些人是无用的废物——豆腐士兵。”他说。

“当我们夺军人武器时，我们眼睛里含着泪水。”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意思是说，由于我们不支持他们一派，我们错了。如果我们支持他们，我们是会正确的。否则我们就错了。

接着又是一番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当种种事实不可否认时，“红字号”的代表就勉强同意了。

我们一直坚持到写完协定为止，一份3000字的协定写了20个小时，最后结束时，只有三五个人没有睡着——我、武和韩。我和他们谈话、争吵着。

胖子毛培春在我床上睡着了，鼾声如雷，使我们十分烦恼。李松年斜靠在椅子上坐着，就睡着了。裴东林起来走了，孟怀壁睡着了，嘴唇大张，下巴上口水直流。他不时地突然惊醒，脑袋连连撞在墙上。

“联字号”的代表整整一个通宵都感到很厌烦。他们一直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他们已经给返回家园的人们写好了祝贺信，并为庆祝活

动购买了鞭炮。

1968年8月22日凌晨7点，我们最终签定了协议，我们跳舞，燃放鞭炮，十分喧闹，来庆祝协议的签订。

在北京当局的巨大压力下，红、联字号双方代表于8月22日签订了协定，但是返回晋东南十天后，才举行了庆祝和平大会。在此文件公开宣布之前，省革委会主任刘未老必须进行研究并签字，但是好几天人们都找不到他，最后，9月1日他才在京西宾馆露了面，9月2日他批准了。然后，代表们胜利地回到了长治，所有地市领导，率领一万人的队伍，到长治火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他们带去足够的小汽车，供30名谈判人员乘坐，让他们驱车通过市内，欢迎他们的归来。但是讲完话后，官员们开始上车时，结果除了一名“红字号”代表外，其余的人都无影无踪。他们已经爬进淮海兵工厂的汽车，开往“红字号”司令部。他们害怕受到武力伤害，当然并非毫无道理。他们作为武斗分子和派性分子的“罪行”，已经被大肆宣传，因此只在同伙当中他们才有安全感。

汽车的行列应该在群众集会的体育场停车，但是因为大部分“红字号”的代表已经逃走，负责接待的组织者，把集会推迟到第二天。9月3日，一万人在体育场出席了大会，但是，整个事件不得不进行低调处理，因为大部分“红字号”代表和头头还不露面，尽管“联字号”头头逐一邀请了他们。他们仍担心遭到肉体攻击，成群结队离家出走。

部队坚持指定“红字号”的头头和“联字号”相应的人物，一起参加“执行联合协议委员会”，但是，两天后，“红字号”主要代表孟怀璧逃之夭夭，而且半年多杳无音信。

新的“大联合”一开始就是摇摇欲坠的。

七十九 刘、张的垮台

当和谈在北京继续进行之时，第六十九军谢、曹司令千方百计劝说“红字号”的其余成员返回长治。曹估计外逃人总数超过了6000人，人数最多的一群寄居在省府太原，但也有许多人在未发生过武斗

的昔阳县，或在食品和工作都充裕的河北石家庄躲避。人数可观的另一群在天津散伙了。其大部分成员是太行锯条厂“红字号”的头头和活跃分子。太行锯条厂是60年代初，从天津迁往长治的，大部分职工都随厂迁来了。少数代表各厂矿单位“红字号”的人呆在北京附近，反驳中央对程首创的裁决，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分散在同一派单位和刘未老的公开支持者仍有势力的各个县。李英奎指责他们阴谋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制造或夺取武器，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向晋东南地区发动他们的大肆宣称为“解放”的反击。

1968年仲夏，谢、曹派出李英奎司令和劳动英雄李顺达，进行了一次行程漫长的出访，去寻找并和被“流放”的“红字号”成员会谈，规劝他们返回家园。与这两个人同行的有20名工作人员，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把这次远征称为“欢迎返乡特别工作组”。

特别工作组取得了一些成功。他们见到了逃到各地的“红字号”头头，分发了粮票、食品、钱、火车票，并保证所有返家人员的人身安全。但是，往往在关键时刻同意回家的人又拒绝了。

在太原就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二李分发了约五万斤粮票，四万元现金，数以百计的免费火车票。一大批人聚集在火车站，但是就在火车开动前，他们突然变了卦，“别上去”！他们互相呼叫道，“那儿还武斗，如果我们回去肯定会被杀死的。”他们扔掉车票，匆匆离开了车站。

后来，军官们看到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参加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打倒六十九军的曹中南。李司令把他们不妥协让步的罪过，加在反叛的“红字号”头头身上，他们仍然能把天真无邪的人引入歧途。

当特别工作组到达北京时，李司令和劳模李顺达安排长期和谈的两派代表会面。

他们试图向代表们报告晋东南地区的团结安定局势，催促他们迅速消除分歧，尽快返回家园。报告会永远也没有成为事实。当“联字号”代表聚集一起迎接李司令时，“红字号”代表却拒绝走出他们的房间，崔股长去叫他们，这些人也不肯出来。一位姓王的秘书试着进行了劝说，但是仍不见效。后来田怀保亲自和每个代表谈了话，但是他们都不肯走出房间。最后李司令和李顺达各自分别和“红字号”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段插曲，结果以相对抗而告终。

田怀保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

二李和我在一个房间里会见了所有的代表。淮海兵工厂的小学教师武惠丰直率地发了言。他是个矮个儿，长了一副老鼠眼，只要他眨眨眼，他嘴里一定会冒出一些鬼主意来。他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但是总能讲得有条不紊，逻辑性极强，他具有利用演说来鼓舞人心的才能——非常有说服力。

他说：“我们远离家乡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想念家乡，想念家人，我们担心我们同志们的命运，我们感谢你们带来了家乡的消息。但是，我们无法参加任何会议，我们被指控犯了那么多滔天罪行，我们承担不了，我们承受不了扣在我们头上这样大的帽子。”

李司令对此严厉回敬道：“反革命帽子不是军队、革委会，或‘联字号’给你们戴上的，是由你们的行动得到的。毛主席说，如果你犯了错误就改正错误，那么一切就都好了。由于你们过去的恶劣行为，戴上了‘帽子’，但靠将来的实际行动，你们是可以摘掉它的。”

他们对这种说法沉默无言。

第二个大胆陈词的是王章义，1968年春，他的单位袭击了一个邻近大队，夺走2万元现金。从裁缝店抢走了新衣服，抢走1千斤粮票和杀掉准备过年的两头猪。当他们带着战利品逃跑时，大队民兵追了上来，用机枪打死了王的弟弟。

“你指挥了全地区的武斗，”王谴责李司令说：“你们的人杀死了我弟弟，而且他们还杀死了小姚和大尚……”

王讲话时，大发雷霆，大叫大嚷起来了。所有的15位代表都跳了起来，把他们三个人团团围住，他们诅咒着，大叫大嚷，唾沫星都溅在了我们的脸上。他们不给我们动嘴的余地，我们只好告辞了。

在北京“红字号”代表激烈的反应，各地“红字号”活跃分子不愿返回长治，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晋东南“联字号”组织有部队撑腰，坚持要把“红字号”的支持者当作被征服的敌人对待。“红字号”签订了和平协议，不是投降书，但是似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当武斗在继续进行时，部队指责他们挑起武斗，现在武斗结束了，部队指责他们拖延了武斗。武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他们要把罪名加在“红字号”一派的头上，部队就认为是犯罪，而“联字号”一派引起的相同的行为部队却视而不见。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涉及到

“联字号”里大名鼎鼎的杀人犯，一个叫班文红的人，两派一宣布和解，李英奎控制的革委会就任命他在地区任职。当数千人抗议时，李把他调到发电厂。那里的抗议一旦平息下来，厂委会就吸收他加入了共产党，并让他当了管理干部。普通工人抱怨也毫无用处。在提拔班的问题上，厂委会执行了上边的命令。

在党领导忙于吸收提拔班，到工业局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他们却至少开除了100名“红字号”头头的党籍，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并把他们送到农村劳动，在山区大队当普通社员。他们不允许这些被驱逐者在长治市管辖的大队落户，或以任何借口返回市内。他们不得不在边远的县寻找家园，并待在那儿——一种局部流放。

这100人是幸运的人，地区革委会指控大部分著名的“红字号”头头为反革命。1968年8月16日，在山西举行的全国钢铁生产和兵工企业大会，变成和“红字号”高层头头算帐的大会。这些人大部分在淮海兵工厂当工人或干部，会议组织者命令六位“红字号”的头头参加群众批判大会，然后命令他们停止一切派性活动，否则要对后果负责。在大会散会后，他们把这6个人留给地区法院审判。大部分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兵工厂干部薛长，发誓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程首创，上面对他既不判刑也不释放，而是无限期的拘押审查。

淮海兵工厂前任党委书记高可共，“四清”期间被免职，然后又被任命到新的领导岗位上。他的最大错误是他和著名的山西领导人薄一波的养女结了婚。不管他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何，这一点就使他成为主要的斗争对象，被谴责为叛徒，并判处20年徒刑。

从一名工人跃居淮海兵工厂主任的郝成祥，被判处终身监禁。

从前的工人，本厂群众运动的头头赵成园，在程首创1968年12月隐藏后，指挥整个“红字号”组织，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

侯小根，以前为干部，曾因偷盗被监禁，整个武斗期间“红字号”的活跃分子，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

刘周娃，被指控用炮火击中小麦起火，烧毁粮食局仓库，被行刑队枪决。

法院只对那些坚持不肯改变观点的“红字号”头头进行了严惩。但“宽大处理”了那些公开认错的“红字号”头头，其中之一就是武

惠丰，8月16日会上，他把矛头对准了他车间的同事，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因此在新政府里获得了一个职位。

另一个变节者是张天才，他曾当过程首创的私人秘书。他对程的历史了如指掌。程逃走之后，他看到了光明，谴责了他以前的上司，使他自己成为对检举揭发有价值的人，从而在地区财政局获得了副局长的职务，他还当上了地委常委。李英奎谈到这个姓张的时候，说：“他悔过自新了，他向程首创发动了进攻，因此我们信任他。”

李英奎学会了信任几位检举“红字号”组织的其他头头。他分配一名医科学生王中杰当了医生，另一位医科学生郭天青在襄垣任职，分配铁三局工人张职仁去铁路建设指挥部3202楼任职。

李英奎说：“犯错误不是犯罪，只要改正就好。凡是转过我们方面的就可以了。这是毛泽东的路线，它有利于发展生产。”他谈论起这种事情来，好像他在解释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意义深远的无产阶级道德原则，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则是沉迷于资产阶级的卑鄙道德行为，只知道惩罚，而不懂得宽恕，只知道消灭，而不懂如何利用过去的敌人。

由于李英奎对指控他的政府有派性倾向十分敏感，他不厌其烦地证明，他执行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他引述了高平县臭名远扬的“联字号”参谋长的一起案件。这个人曾在阎锡山直属部队中任职。他利用他这种从军的经验，在席卷高平的武斗中当上了头头。他亲自杀死了好几个人，所以受到审判，并根据他的罪行处决了他。李司令还回忆了一两个未指名道姓的“联字号”部分成员受到惩罚的“打、砸、抢分子”的案件。但是除了这些仅有的例外，似乎只能证实了他的原则是重点惩罚“红字号”一派的人。

为什么那时大批“红字号”的人宁愿远走避之，甚至扔掉李英奎和李顺达分发的免费车票，四处奔波不愿返回家园呢？

1968年晋东南地区数以千计的人，能到省内其他地方找到临时避难所，主要原因是他们所到之处，派性斗争都在升级，老盟友都把她们当作增援力量来欢迎。只有六十九军镇压了所有的武斗，晋东南才实现了和平。雁北在稳定的领导群体的领导下设法保持了团结，昔阳县，由于劳动英雄陈永贵事先得到周恩来的警告，从未发生过武斗。而与刘未老和张日清有联系的其他地方组织之间的对抗却发展成了公

开的武斗。支持刘未老的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年轻人，如长治“红字号”残余成员，对杨老敢为首的太原“红总站”一派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保证他们得到食品、衣服和武器。

当以鞍山宪法活动闻名的袁振抛弃了刘未老和杨老敢时，刘、杨不得不担心他们的队伍将受到孤立。袁是在1967年10月抛弃他们的，当时刘格平出访晋东南，设法宣传他自己的七条团结纲领。由于刘主任在出访途中，袁振提出了省内大联合的十条计划。对此刘感到十分震惊，谴责袁的计划为“反动大杂烩”。这种谴责使袁振大为恼火，他立即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张日清，并且带去学生刘浩的“革命造反团”。

这次大转变，使得山西两个主要的学生领导组织，自从他们1966年从晋祠别墅胜利回家以来，第一次走到了一起。1967年11月8日，他们成立了新的联合组织叫“兵团联络站”，并选定袁振夫人作为他们的政委。三者的联合给张日清一方带去了大多数有声望的学生，因为他们在全国有广泛的联系。如刘浩所说：“兵团的正确策略，再加上联络站巧妙的小杂文（联络站以其杰出的文才和有造诣的大字报而著称），来对抗‘红总站’的砸和抢。”他没有提及大联合也首次给张日清带来了可以在大街上显示的人数上的优势，尽管这一点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六十九军镇压了刘格平在长治唯一的拥护者“红字号”组织，仅几天，刘就失去了太原主要学生组织的支持。中央在北京召集的山西干部新的学习班，构成第三个严重的打击。1968年5月，周总理把两派所有的主要干部召到首都，参加旨在结束派性的学习班，并且要他们一直呆到9月中旬，几乎5个月之久。在学习班期间，周把山西的大权交给六十九军司令员谢振华和曹中南。两人声称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为团结而工作，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完全同情他们北京军区老战友张日清政委的。他们控制山西的时间越长，刘未老和杨老敢挽回局面的机会就越少。

当山西学习班在北京重新开始时，武斗仍然侵扰着太原大街，曹副司令把杨老敢和学生领袖段力成召回太原市，匆忙拼凑敌对群众组织之间的停战协定。经过几周学习和协商后，老敢和段力成签订了休战协定，以后他们又回到北京。曹司令印发了成千上万份中央反对武

斗的两个命令（“7.23”命令针对山西，“7.24”命令针对贵州），并派出一万名战士向各个偏僻城镇的骚乱点散发。

曹的战术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武斗开始减缓了，一些竞争者也开始上交武器了。晋南、晋中省府参加武斗的市民向部队交出了1万支步枪、100门大炮和10万发子弹。全面上交武器是解除刘未老队伍的武装，把武器交到张政委军方的手中，当局认为民兵组织手中的武器是合法的。

老敢发现静坐北京，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两次翻越宾馆围墙，赶回太原重组他的势力。第一次，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派专机随后追踪而来，把他带回北京，第二次康生威胁如果他抓住杨，要把他捆起来，于是他自己回去了。

据曹司令讲，到9月末，部队几乎成功地平定了山西武斗，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暴力已感到厌倦。他们逐渐懂得，武斗基本上是由别有用心的人，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挑起。当基层单位——公社、工厂和学校签订了联合声明时，吹起一阵大联合之风，仅太原地每天就有30个单位签订条约进行联合。

10月，刘未老、杨老敢、张政委以及学生煽动争端要段力成和刘浩都返回太原。他们在北京签订了一系列避免发生暴力的条约，但是，他们回到太原还不到20天，山西许多地方再次发生了武斗。

1968年末，双方再也得不到初期各方认为理所当然的群众支持了。过去刘浩曾一度一个电话集中1000辆卡车的同情者，现在只能唤起数百辆，杨老敢过去能唤起三四十万示威者，现在只能指望三四万人。由于老敢和刘未老感受到支持急剧减少，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铤而走险的行动来重震声威，以图恢复影响力。

行动之一后来被称为“山西日报”事件。

1968年9月28日，杨的“敢死队”带领“红总站”一万名备用成员，包围了山西日报印刷厂，冲进大楼，抓获了少数派去保护报纸和监督社论内容的军人。由于山西日报已经掌握在刘未老手中，这次行动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那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据他的敌手讲，老敢所考虑的是抓住部队小分队，虐待其成员，并以此引发市内六十九军的反击。那时他的队伍就能作为部队的受害者呼吁民众支持，从而重振1967年人民奋起向“枪杆子政权”挑战的精神，由于有一万名

武斗的忠实的追随者，老敢还希望用自己的突然反击挫败军人的反击。

究竟这是不是杨之意图，事件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挑战行为没有能激怒部队。和部队的对抗没有实现，学生段力成的“红色造反派”反而全力以赴，在报纸印刷厂周围的大街上包围了他们仇视的对手。当这种对抗发展到爆发全面武斗的边缘时，部队急忙派进几个指挥员去调停。经过十天的紧张协商后，双方开始撤退了。老敢同意撤出山西日报大楼，段力成的人也同意不再向他们发动反击。于是双方勉强地避开了当年早些时候席卷长治的武斗。

老敢所讲的全面袭击报纸总部的理由是异乎寻常的——“排字错误”，山西日报的大部分内容只是重印了北京人民日报的内容，在这特别的一天，北京报纸标题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山西日报重印时略去了“和”字。于是，把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人放在了同等地位上。报纸正文中第二个排字错误取代了另一个意义含糊的字。据老敢说，这两个印刷错误，构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他认为26个军人监督者应对此负责。

报社的一些人是怎样在排字时做这样微不足道而又严重的改动，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中国的印刷文字却有一种持久不衰的盲目崇拜，能导致对职位安排，健康状况，以及任何字的真正含义和意图进行离奇的解释。仿佛白纸黑字之间拥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似的。的确，在数千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几乎是一成不变地对待文字的。任何读者理解一个字的方式，都要受到以前惯用的词义形成的几十次文化共鸣的影响，而且所有这些共鸣，都具有政治含义，可详细阐述为——甚至作者从来绝无能力想象到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生命之中的象征力量。

仅仅几天以后，同样还是在报社前互相对抗的两个派别之间爆发的真正的武斗，是由异国情调的象征引起的。这次冲突是由于一件从北京运往太原途中的蜡制芒果而引发的。

对山西人来说，芒果的到来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芒果是由巴基斯坦大使赠给毛主席的礼物。毛在北京三万多工人宣传队员成功地平定了清华大学校园的骚乱后，收到这些芒果的。在这次事件中，宣传队员当中有5人被这所大学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杀死，750人负伤，

毛把芒果当作纪念品以感谢宣传队。他们不顾极端的挑衅行为，不使用暴力手段，最终依靠持久、具有说服力的辩论，以及纯粹数量上的优势征服了校园。

从此以后，芒果成了敌对派别之间休战、和平、团结和大联合的全国性象征。不论什么地方的派别结束武斗，设法匆匆达成群众组织之间某种联合，中央就把原芒果的蜡制模型——象征性的成果送到那里。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祝福”，山西日报事件发生后，大联合成了太原人的话题，双方草拟了一份协议，并确定了群众集会的日子，因此中央及时从北京寄出了一件蜡制的芒果。

不幸的是，刘未老的势力，尤其是杨老敢对提议的协议中规定的条件大为不满。老敢决定抗议这个协定，破坏集会，而且通过拦截芒果，夺取毛的“祝福”。他及时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去通往山西入口，主要联接点的石家庄，去伏击北京列车。但是部队得到了即将遭到袭击的风声，用优势兵力包围了蜡制芒果，然后一支强大的武装护卫队把芒果护送到太原，移交给举行群众集会的省革命委员会，成千上万的人拥到街上参加集会，好像是过盛大节日一样。

石家庄夺取芒果失败后，老敢决定在太原再作一次尝试。他动用了数百辆卡车，没有事先警告便派出队伍去包围和袭击大会。本来宣布为联合庆祝会，成了在太原街头全面争夺芒果的武斗。在武斗中，至少有一百人受了重伤，老敢没有夺走象征性的果实，但是成功地摧毁了果实到来所要庆祝的大联合。

诸如此类铤而走险的袭击，播下了人们对刘未老大失所望的种子。尤其是对刘的军事指挥，杨老敢的“砸和抢”更是如此。群众对张日清政委已经大失所望，他总是力图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反对与人分而享之，至于袁振，他把自己的队伍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越少越好。无数人已经清楚，这些人并不是为任何原则而奋斗，只不过是為了争夺个人权力而已。

有句俗话说：

刘格不平，刘正义不正义。

张日清不清，张清白不清白。

袁振不振，袁能无能(指不生气勃勃)。

流传的这些说法，都是把人名中最富有赞美意义的成分，变成反

面意义，从而来发泄人们心中的不满。

当然，民众幻想的破灭，对这些人周围好战的核心力量，没有多大影响，正如1968年7月清华校园一样，仍为夺取自制坦克和火箭的最高控制权而继续争斗。1968年晚些时候，少数狂热分子，尽管他们只能召集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群众支持者中的一部分，还是继续在街上考验自己的力量。他们纠集了各种各类的闹事者、流氓、玩世不恭对什么都不满的人，以及惯犯，对他们来说，打架斗殴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正是抢劫、强奸，以及毒打人，甚至最终成为英雄的好机会。哪里出现决战，双方头头就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伯爵一样，通过雇佣兵扩大自己的队伍，为武装服务的农民，他们每天付给两元钱的报酬，另加配给一份饭菜，这至少是年轻人在地里干活所挣工分的二倍，有时甚至是三倍。

在处理俘虏时，中世纪的残暴精神又抬头出现了。1977年，太原仍流传着有关审讯者的故事，他们用刀割妇女的乳房或用火烧，或者把男性的两个手掌用大钉子钉在围墙上折磨他们，让他们在那儿死去；另外一种缓慢死亡法，叫做“热牛排”。派性虐待狂，把受害者放在两块钢板之间，拧紧连接两块钢板螺栓上的螺母，慢慢使两块钢板靠拢。一旦钢板拧紧，其压力几乎难以忍受时，再用乙炔喷火把钢板烧热。虐待者用现代技术，发展了古代流传下来的技艺。

1969年初，传闻即将举行全国党代会，更加激发了派性对抗。谁要控制了全省，谁就能控制党代会的选举权，因此也就巩固了将延续数年的政治派别网络系统。1月5日，刘未老的势力发出推翻山西革委会的号召，成立由“革命家”——刘的铁杆分子组成的新委员会。因为在旧革委会里，他们必须和张政委及其副官们分享权力。杨老敢敢于革命，并发了这个声明。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六十九军两个司令员谢、曹，指责他们搞新的“二月逆流”（重演1967年2月质疑的反革命“逆流”），并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粉碎他们的阴谋。

中央对老敢已怀有戒心，谴责这次1月5日夺权声明是反革命的。中央的谴责相当于称杨老敢为反革命分子，因此，严重地损害了刘未老以及整个运动名声。毛夫人江青曾公开谴责矿工梁宝奎和化工厂总经理安奇为“捣乱分子”和“坏蛋”，而刘在阳泉把武器分给了他们。此时她暗示，省府刘的势力和臭名昭著的“5.16”反革命阴谋有牵连。

刘未老的势力采取军事反击，以回敬这种挑衅行动。当山西党的干部选举“九大”代表时，几个中心地区爆发了武斗。4月1日，当山西代表参加北京党代表大会正式会议时，武斗蔓延并加剧了。

反对派指责刘挑起武装冲突，向大会施加压力。而刘则猛烈地进行了反指责，许多普通民众希望，“九大”被宣传为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能找到解决山西问题的途径，但是，参加进攻和反击的力量似乎在说：“你们在北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们必须在这儿和我们交易。”

大会有开会、有休会，但是，山西的武斗却不受节制地猛烈进行。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震惊，要求山西代表继续留在北京，直到他们消除分歧分止。他要求他们在首都起草一份协议，然后一返回家就实行停火。总理的努力再次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双方说得娓娓动听，他们答应回山西进行大联合。但是，他们回到事件现场后，没有实现联合，而是发生了更多的冲突。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介休县和梁都煤矿。在这两起事件中，正如他们在晋东南一样，都是刘主任的势力控制了城市，而张政委势力则掌握着山区。周恩来要求调查组成员一起奔赴产生争执的地区，现场休战，签协定。把刘未老、张政委和袁振召回首都，暂时停止了他们的职务，并任命七名新成员组成山西省核心领导组——四名军人和三名文官。表面上，重新组建核心组加强了中立力量，而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易，迫使刘未老的势力靠边站，而用张政委的公开支持者或同情他的联盟充塞了核心组。四位军人——肖宣劲、王治平、徐修恒和罗寇平，都是北京军区的军官，因此都是张日清的同事，其中三位是支持张的第六十九军军官。

至于三位文官：西沟劳动英雄李顺达，是晋东南众所周知的“联字号”组织的支持者；阳泉矿工王力，有一个独立派的名声，但是都强烈反对刘未老；大同煤矿干部韩英，从未支持过任何一派，但他和谢、曹合作密切，没有纠纷，因此帮助把张日清的观点强加给了全省。

由上级强加的重新组建的山西省核心领导组，1969年7月23日收到中央针对山西的特别命令的支持。这个命令和一年前阻止陕西和贵州武斗所发布的命令类似。它以党的最高机构的名誉要求结束一切武斗，并交出所有的武器。六十九军把这个命令印刷了数十万份，通过

各种途径向全省分发，并用直升飞机在冲突地区进行空中散发。

“7.23”命令收到了成效，两周之内，部队收缴了六万多支枪和五百多门大炮。形势逐渐好转了。中央8月20日发出指示，号召中国人民准备对付北方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起到了团结作用。到1969年10月，有可能自下而上开始进行大联合。新的核心领导组成员都倾向一派，彼此配合默契，在他们领导下的解放军部队，实行并有力地支持了停火，然后作为各级大联合的领导成员进行工作。

免去刘、张、袁在山西的领导职务后三个月，部队成功地平定了全省的武斗，几乎被关闭数月、甚至数年的矿山工厂，开始恢复了生产。到1970年春，山西省委重新组建时，刘未老、张政委和袁振三人没有获得一张选票。下次全国党代会取消了刘的中央委员职务、张的候补委员的职务。

当刘未老失去崇高地位后，杨老敢失宠了。他首先失去了山西省革委会常委的职务。数月后，部队逮捕了他，并把他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最后于1970年10月，他在通往太原西南著名庙宇晋祠的公路上乱石滚滚的果园里，被行刑队处决了。在经过全山西地方领导讨论后，中央批准了对杨死刑的判决。99%的干部投了赞成票。

“有些犯了轻微错误的人，可以被改造，”曹司令说：“但是这个人人双手沾得血太多了，只有极少数亲密的追随者要求缓期执行，因此我们立即执行了死刑。”

这些话是1971年讲的，但是由于整个平定过程是明显的一边倒，因此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案子都不得不进行平反。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我听说谢和曹都被指控搞派性而调离了山西，于是我再次问及杨老敢，他是被陷害的，还是罪有应得？甚至那时，回答仍是敢死队司令杨成效罪有应得。

这个姓杨的是一位令人神魂颠倒的人。一个技工，一小帮打手的头头，依靠他的才能，大胆和残酷无情，突然跃上一个大省的显赫地位。在省政府垮台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把一小撮敢死队发展成为四万人的大军和四十万人的群众运动。他动用数千辆卡车，为武装小队提供机动车辆，配置司令部工作人员，和能监听全国的通讯中心，雇用秘书，介绍情妇。必须承认，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曹操。把巴拉兹描写“推翻汉朝，把中国从一个强大帝国变为一

大公墓”的那种野心家的话稍作改动，就完全可以用来总结这位钢铁工人的生涯：

“现在掌权的是军人、冒险家、恃强凌弱者、雇佣兵，以及形形色色的军官。由于有一群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雇佣军，流浪者、罪犯、无地农民、无业文人——既没有信念，也不懂法规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和一群群强盗，四处漫游，时而抢劫一个省，时而掠夺另一个省。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们成功地占领某些剩余的要塞或城镇（此处用“工厂”来代替），把它作为争取进一步胜利的跳板。”¹⁴

回顾杨的一生，头脑中就闪现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形象：

杨，手端步枪，瞄准张贴大字报的对手，逐个进行射击，一枪一具尸体。

杨，大发雷霆，下令把一个反抗的俘虏从三楼窗户上扔下去。

杨，头戴体育墨镜，身穿样式时髦、做工考究的衬衫和夏季短裤，乘丁蕾的豪华轿车，从北京宽阔的大街上飞驰而过。

杨，醉心于奢侈的生活，在北京高级专用游泳池游泳，然后在京西宾馆品尝为高官们预备的鱼翅和海参。

杨，翻越围墙，逃出学习班，返回太原，重振自己的私人队伍。

杨，忧心忡忡，乘坐中国安全部门核心人物康生随后追来的飞机，返回北京。

如果他要是站在取胜的一方，现在他或许在山西，甚至可能在全中国身居要职。一旦失败，他成了卑鄙的歹徒，只配在脑袋上穿颗子弹了。

芸芸众生之中，是哪种中世纪力量造就了这么一种人呢？他们的影响有多深远呢？如果杨成效之类冒险家是任何象征的话，他们的影响必定是渗透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因为“文化革命”一旦爆发，众多“老敢”就像流星一般闪亮，划过黑暗混浊的太空，每颗星都辉煌灿烂，令人惊叹不已，然后在太空中逐渐消失或烧毁了。

这种人的非凡经历植根于1949年以后幸存下来的，省、地、当地家族、宗派之间的强大离心力。尽管中央为镇压和消灭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些离心力仍然不断滋生。派性就是凭借这样

¹⁴ 原书注：引自 Etienne Balaza，《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New 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p194。

的冲动，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对抗和不满，以及家族之间的仇杀，得以生存，并逐渐蔓延。然而，从山西的历史来看，似乎很清楚，每次事件不是从下面煽动起来的，更重要的是从党中央内部最高层执掌大权的人，为争夺权力，不断地挑拨煽动和推波助澜。来自下面的冲动，是不会酿成如此大难的。因此，也绝不会使全省上下陷入事实上的内战之中。极少数人玩弄手段，严重地破坏了一切正常的管理秩序，和一切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无论是国家的中心，还是最边远的地带，一圈接一圈，一层连一层，他们把中国大多数人拉入他们制造的，又无法控制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大漩涡之中。

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简史，由于是由李英奎和曹中南等“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描述的，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是不完整的，混乱和抱有偏见的。1967年到1968年，张庄村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件：“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帮助抓获和毒打人，并迫使“海燕”和“上甘岭”两派的头头离乡背井。如果我们不能宽恕这种做法的话，那么这些事件，最终还是为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根据。我们一旦了解了张庄作为晋东南地区“联字号”司令部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且了解地方派性斗争所引起武斗的规模和残忍性，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父母都是贫农，都是在相邻的胡同里长大成人，同样被一群赞美他们的公民吸收进一个党支部，而且被相同的朋友选为干部的年轻人，结果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结果在一个寒风刺骨的严冬夜晚，在当地中学昏暗的屋子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少数审问者手中的蒙眼囚犯，而另一派是审问者，他们面色严峻，充当帮凶。

第九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人说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看不是那么酷爱吧！中国人还是好斗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



八十 处理小申

1968年1月，冬天的一个傍晚，太阳落山时分，武装小分队在张庄中心的踏安中学操场集合。安阳和五阳的青年民兵，铁路机务段的工人以及张庄村的农民，静静地从人行便道上穿过，他们肩上乱七八糟地背着步枪，佩带装满子弹的子弹袋，以及一袋袋手榴弹。心甘情愿的人们把一挺挺机枪和一箱箱弹药抬上了卡车，有些卡车上已经装上了能作三百六十度旋转的机枪。天一大黑，至少三十辆车发动了起来，把负载沉重的汽车开到通往南方的公路上。半个小时后，长治边缘地带一阵断断续续的枪声突然响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散乱的回击，一阵不连贯的枪声，接着又是一阵时间更长的回击声。霎时，战斗的声音汇集成了轰鸣声，只有当地水泥厂的巨型粉碎机才能和它相比，时而又在喧嚣中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

在张庄南头牢固的房子里，几个男人静静地坐着，倾听远方传来的不愉快的声音，互相很少讲话。突然，门被步枪托砸开了，三个男子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猛地冲进了屋子，后面还紧跟着五个人，另外全副武装的十二个人，在外面黑暗的院子里转来转去。

“谁是申晋财？”一个对张庄不熟悉的头儿问。

“我”，小申说着站起来。他站起身时，认出两位张庄干部李快腿和秦贵宝，以及大队民兵营的几位其他成员。

“把你的手放下”，头头命令道。

小申放下了手。

民兵们用铁丝把他的双手倒绑了起来。

他的同伴们也放下双手时，这些闯入者用铁丝把他们一一捆了起来，然后把他们当作俘虏押往小学，分别关在几个房子里。当小分队的头头和其他人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两个人站着岗。这些人回来后，用毛巾蒙住被捆绑人的眼睛，然后把他们从街上拖到了中学操场，再把他们蒙上布的眼睛，加上纱布和胶布。几个人把小申带到一个隔离的屋子，开始用卡车的三角带毒打他，直到把他打得晕过去，然后才把他半拖半推，关押在院子西侧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由两个陌生人一直看守到凌晨。

第二天，几位中学学生，来带被打伤的副业队干部。这些中学生用纱布和胶布加固了副业队干部脸上的蒙眼布，然后，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拖进了一个大门廊，随后许多手持步枪的男子将他团团围住。他们用枪托把他打过来打过去，直到他晕过去为止。当他苏醒过来时，他们让他站起来，用几股八号铁丝扎起来做成的鞭子，从上往下抽打他。铁丝把他身上薄薄的棉上衣抽打成了碎条，鞭痕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脖子和肩膀里。尽管他听到唯一的声音是学生的声音，但是，从四周粗鲁的喘息声中，他知道在场的还有其他人。

绑架他的人要求他把手枪交出来。

“什么手枪！？我从来没有手枪，怎么能交出我从来没有的东西？”小申呻吟着。

他越否认他有枪，他们就越毒打他。那天晚上他三次失去知觉，凌晨两点钟，他们把他又拖回原来的那个冰冷的小房间，把他留给看守，让他睡一会儿，如果他可以睡着的话。

张庄这起自相残杀的对抗事件，是1月16日长治伏击事件激发起来的。当“红字号”武装人员绑架了劳动模范李顺达和他的同事以及数十名其他干部，并把他们当作囚犯押往淮海兵工厂时，“联字号”对长治市发动了全面袭击以示报复。当“联字号”的头头动员起来采取行动时，他们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保证他们司令部的安全。他们命令公社和大队干部扣押和审问任何过去忠于“红字号”，或与该派有联系的人。他们在张庄村有力地执行了这个命令，因为潞安中学早就并入位于长北机务段的“联字号”司令指挥部了。

1月24日，尽管采取了进一步的安全措施，中学还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进一步证实了人人最担心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下午时分，一枚手榴弹从北面的高大围墙上飞了进来，落在食堂附近。对里面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这枚手榴弹是一枚哑弹，没有爆炸，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甚至没有人受伤，然而这枚异常的手榴弹把大家吓得魂飞魄散。“红字号”的人就住在“联字号”司令部的旁边吗？如果是真的话，这可是清除他们的时候了。

“联字号”的头头把张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快腿和民兵队长秦快嘴召集到一起。

“张庄有‘红字号’的人吗？”

“有。”

“谁？”

“‘海燕’和‘上甘岭’的成员。”

“最好把他们抓起来带到这儿，我们要审问他们。”

“你们不能派人和我一起去吗？”李快腿问。

“我们派八个人。最好赶快行动，以免发生更糟的事。”

“联字号”司令部迅速组织了一个武装小队，由“联字号”八个男子和张庄“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十二个人左右组成。后者包括李快腿、秦贵宝、臭名昭著的流氓申大胡子、街痞子郑八字脚，和其他当地民兵中的忠实支持者。

这个小分队直接去了小申家，并把在那儿发现的人都抓起来了：小申本人、“海燕”派头头郭民恩、“上甘岭”派头头周来富，以及两组织的普通成员怀登可、杨玉才、陈万田、申奇昌和纪玉兴，长治市内武斗的难民李红年。他们还把屋子从上到下搜了个遍，发现了8枚手榴弹。

“联字号”的骨干成员把所有在张庄扣押的人关押在中学院内，一连拷问毒打了三天三夜。由此往南走60华里，“红字号”的活跃分子在淮海兵工厂一座隐蔽大楼的地下室里，毒打李顺达和他的地区革委会的成员，千方百计地逼迫他们说几句支持程首创的话。“联字号”成员在张庄毒打申晋财和他的“海燕”、“上甘岭”的同伴们，想方设法逼迫他们承认他们是危险的“红字号”成员，死心踏地支持程首创和他在晋东南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最后，1月27日，三位认识小申的人——一位长治运输公司干部和两位铁路机务段的工人来找他，并把他带出了中学。他们是“联字号”的成员，以此他们使扣押小申的人相信，被扣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于是“联字号”司令部放他走了。“这是一个误会。”姓朱的负责人说：“是大队的一些人把你带到这儿的。你现在最好回家吧，想办法找个医生看看。你被打得不轻，如果再有什么麻烦，来找我。”

小申几乎无法走路了。他跌跌撞撞地往家去，一次才能走几步远。当他回到家时才知道，被捕的九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被释放了。他立即叫了两个年轻朋友，一个人挽一只胳膊回到中学抗议。但是那天他四处找都找不到朱队长，无奈他又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朱队长派人找小申，当这位遭毒打的村干部在另一个人的帮助下翻一拐走到中学时，朱传话说，他太忙，没时间谈话，当小申和同伴们要走时，他们发现门已被锁住了。

几个小时后新守卫才放了这些被扣押的人。但是当它们往外走的时候，张庄民兵拦住了他们。小申大声抗议，经民兵和“联字号”司令部协商后，最后才放走了他们。条件是解散他们的组织。“如果‘海燕’和‘上甘岭’继续进行任何活动，小心你的狗命。”他们警告说。当小申那天最后走进家门时，他终于倒下了。他疼痛难忍倒在了炕上，甚至不能起来去小便，他在家病了两周时间。

大约五天以后，“联字号”司令部释放了和小申同时被抓的人，但是之前都遭到了看守的毒打。同时设法张贴大字报，抗议扣押他们同伴的“海燕”和“上甘岭”成员也遭到了其他“联字号”活跃分子的毒打。

正当小申开始觉得身体恢复，可以下炕时，怀登可、周末富和申奇昌忐忑不安地来找他，李快腿和秦快嘴命令他们去小学参加会议。他们确信又要挨打了。

小申劝告他们去水泥厂找他的一位朋友李先庆，让他帮助把他们的案子呈送著名劳动英雄李顺达。他现在是地区的“联字号”头头，有权也有声望来处理张庄的问题。“红字号”依从了北京的最后通牒，刚刚从淮海兵工厂地下室释放了他，现在正在水泥厂“联字号”的办公室休息。

那天下午，三位“海燕”派成员偷偷地溜出村外，穿过公路和铁路去了水泥厂。由于他们没有按照命令去张庄小学参加会议，张庄民兵背着步枪去追赶他们，那天晚上带领这个民兵小队的是郑八字脚。

好几个月以前，郑八字脚和十二个左右张庄农民曾在水泥厂当过合同工，并在那儿参加了后来和“红字号”有联系的一个群众组织。水泥厂守卫不知道张庄人收到水泥厂解雇通知后，他们已改变了派别，和“联字号”挂上了钩，并且继续在秦快嘴手下当忠实支持者。

当郑八字脚端着步枪走上去要求把那三个人交给他时，守卫问“你是谁？”

“我是张庄民兵的指挥。有些‘红字号’的人跑进了水泥厂，我们要他们回去。”

“我们这儿是‘联字号’的人，”卫兵说：“你一定是‘红字号’。”

说罢，他让水泥厂内负责安全的突击队保持警戒。一队武装人员冲了出来，缴了张庄民兵的枪，然后，告诉他们赶快逃命。

为了使张庄民兵一直奔跑，水泥厂的卫兵用机枪开了火。他们把机枪瞄准高空以免击中人，但是逃跑的人不知道。机枪的火力把被解除武装的民兵吓得魂不附体，同时也使他们恼火万分。他们一边跑，郑八字脚一边发火说：“咱们拿些炸药把那个地方炸掉！”他们一到达安全地带，就直接赶到马厂公社司令部，找到武装部长杨秀山和公社副主任张长福。他们说服这两个人立即去水泥厂和那儿的头头谈谈。他们要取回武器并要把张庄的三位逃亡者带回去。

经过长时间协商，公社领导反复保证避难者的安全后，水泥厂的人才把夺走的步枪交给张庄民兵，并把三位“海燕”派的积极分子也交给他们。当郑八字脚把扣押的人押回村后，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释放他们，而是把他们带到了小学校。等杨、张，两位公社干部一掉头动身回马厂之后，张庄民兵就残忍地毒打起怀登科、周来富和申奇昌来。他们打断了登科的胳膊。民兵们为他们自己在水泥厂门口所受的羞辱、不光彩的逃跑，以及可怕的机枪扫射而指责这三个人。“因为你们我们差点吃了子弹。”他们咆哮着说。他们还要求他们承认小申事实上曾企图“翻土改的案”。最后，三个“海燕”派的成员由于无法忍受痛苦，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抓他们的人要求什么，就承认什么。

这三个少数派成员在小学惨遭毒打后，决定最好逃出张庄。小申、郭民恩和齐玉兴决定和他们一起逃走。小申从水泥厂李先庆和机务段陈泽文那里给他们所有的人搞到了介绍信。他把这些人介绍给住在公路沿线的一些铁路工人。他们拉上平板车去张庄，把这些毒打致残的人拉出了村子，带到他们铁路医院治疗。那儿的几位医生给登科接好胳膊，并打上了石膏。他们安排周来富和申奇昌卧床观察。铁路工人把小申和他的两位其他同伴带到他们家里。因此，这6个人都在离张庄仅有3华里远的马厂附近，待了6个月。在此期间，张庄没人敢去搜寻或袭击他们，因为曹中南的六十九军司令部就设在隔壁。部队还成立了接待站，平民可以诉苦，可以请求帮助。小申经常去汇报张庄的情况。六十九军干部面对争夺长治市控制权而引起的派性武斗、乡村的争端无论多么激烈也无可奈何。但是他们向小申保证，一旦主要武斗结束，

任何犯有暴力罪行的人都会因破坏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受批判。

六十九军二月份制止武斗后，部队司令部南迁到离市区较近的一个地方，于是秦快嘴带领一个民兵分队去了马厂，希望抓住那里的“海燕”和“上甘岭”这两派的头头。

“你们最好跟我们回去，”秦说。

“我们怎能回去呢？你们会把我们送上西天的。”

“当然我们要揍你们的，”秦说：“揍坏人没有错。”

一位铁路工人的妻子看见民兵们去了，跑去通知仍待在附近的一个部队政委。他来的正是时候。

“我是六十九军的董政委，我的职责就是阻止一切暴力行动。既然休战协定已经生效，如果任何人继续在张庄武斗，那就是违背毛泽东的明确指示。”

“可是这个人是我们村的反革命分子，”秦快嘴抗议道：“他应该挨揍。”

“怎么可能到处有这么反革命分子呢？”董问：“我们认为他根本不是这种人。”

“好吧，如果你们要保护他，”秦说：“你们就最好保护到底。”

说完这位民兵营长就走了。董政委也走了。

“如果你们要揍了他们，你们要负全部责任。”他一边走一边喊。

对抗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小申和“海燕”的头头仍然不敢回家，于是他们派人去征求董的意见。董告诉他们最好一起离开那个地区。如果他们待在张庄附近，没人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决定一旦武斗停止，就去加入到外逃长治的人流里，这股人流几天内吸收了六千多人。

一天晚上，天黑后，这些张庄人一个接一个悄悄地溜下楼梯，以免惊动他人，动身朝长治方向出发了。由于他们都不能独立行走，铁路工人给他们找上棍子或拐杖让他们拄上。他们步履蹒跚地消失在茫茫黑夜里，结果发现长治附近又发生了武斗。他们不愿冒生命危险待在武斗区，又害怕他们一旦在张庄附近逗留，被张庄民兵抓住，只好在地里找了一个废弃的砖窑钻进去睡觉。次日早晨他们决定去怀登科的老家平顺。因为周末富疼痛难忍，第二天他们只步行了十里地。他们最终摇摇晃晃走进了杏树凹，小申的一位老朋友招待他们住了一

夜。因为周末富病得厉害，不能继续行走，第四天，他们总算去了王村，才开始放心了。第五天他们往东石灰走去。这条路他们要路过郭民恩姨家杜街，把郭留在那儿后，他们一瘸一拐往平顺县的马家山走去。结果发现怀登科的母亲再婚后搬到西坡了。登科就到了西坡，找到母亲，然后派人找到他的同伴们。他们都聚集在他家里打算呆下去。

然而，他们刚到，当地公社武装部就派人去盘问他们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张庄。”

“你们来这里来干什么？”

“张庄那里有武斗，反动分子打断了他的胳膊，因此我们把他送回家来。”

“你们是‘红字号’的吗？”

“不是，是‘联字号’的。”

这些民兵不相信他们。申不得不点出“联字号”著名头头的名字，如水泥厂李先庆和机务段陈泽文司令。民兵们并坚持他们派人核实了情况，最后才相信他们的话。

这些民兵相信了他们的话，就马上说：“好呢，如果你们是‘联字号’的，你们最好马上就回去，在家抓革命，促生产。”

显然，他们不能和怀登科呆在西坡。小申和同来富就去了潞城县乡庆村，供销社有小申的一位老朋友杨富山，他同意去张庄一趟，了解一下形势，当他去了那儿时，小申弟弟奇才告诉他群众情绪仍然激烈，让他们先别回家去。奇才给了富山二十元钱以及一些粮票让他带回去。小申带着这些钱和粮票，动身前往300华里之外的河北石家庄。申的姨姨和一位老红军结了婚，另外一个叔叔在解放军的一支建筑队工作，住在石家庄。由于他们两人一起行动，似乎总容易引起怀疑，所以周末福动身前往方向不明的林县，他的姥姥在那儿，可以指望在那儿躲避几天。

小申1968年3月20日到达石家庄。他和他姨在一起住了50天，然后又同他叔叔住了三十多天。六月中旬他的钱和粮票都用完了，他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回家去。他借了足够买去长治北的火车票钱，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一上火车，他想：“如果我下午四点正当社员下

地干活时下车。他们一旦看见我沿公路回家，甚至不等我进门就会把我再抓起来”。于是他在火车通过大岗山隧道前上坡时就提前跳下车，藏在地下，然后，晚上十点等一切安静后才走回家。

他回到家就派人找到他弟弟起财，起财说：“这里不安全。他们毒打了其他所有的人，设法让大家指责你，你最好出去，在外面待着躲过这一阵子。”

“如果只是打几顿，我倒是可以待在家里。”申说：“我能忍受过去。”

“并不是挨一两次打的问题，”起财说：“有生命危险呀。”

于是小申再次走上了路。凌晨两点钟，他找到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工人，他们帮他逃到他姥姥家电留。他们还年幼时，他姥姥曾抚养过他们。现在小申又再次请求她怜悯。时间已是1968年6月10号。

8月26日，起财和他叔叔骑车去电留找小申。起财报告说，四七三三部队一支新的分队，来到马厂地区，正在宣传中央“7.3”和“7.24”的布告，号召人们停止武斗，并号召所有外逃人员返回家园。据起财讲形势确实有了转机，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最后小申总算可以安全回家了，他们用自行车带着小申，当天就返回张庄。

小申患了重感冒，他一回到家就在炕上睡着了。

晚上十点钟，他又听到拳头和枪托“砰砰”敲打院门的声音，是申胡子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民兵。

“开门！”他们喊着。

“干什么？”

“干什么？我们来带你参加群众大会。”

还没等小申下了炕，他们就破门而入。他刚刚有时间告诉在院里租房的一位铁路工人记好谁抓了他，接着申大胡子抓住他把他硬推到大会议室。

他发现自己站在台子中央，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大纸牌。

李快腿和秦快嘴严厉审问他：“晋财，你好长时间不在家，上哪儿去了？你在太原参加武斗了吗？”

“我根本没去太原，怎么能参加太原的武斗呢！”

“你去哪儿啦？”

“屯留、石家庄。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自己核实去。”

“你是‘红字号’？”

“不是，我是‘联字号’。”

“可是你和‘红岩’的张连英有联系。”

“对，因为武装杨部长反对我们时，张支持了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字号’组织。”

据小申讲，李快腿开始大喊“你他妈的，你这个反革命！为什么你从来不讲实话？”但是喊叫毫无用处。一个部队观察员和被派往张庄做政治工作的四中一位教师参加了会议。这位战士和老师都反对高压手段，他们认为他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禁止毒打或“坐飞机”体罚。张庄干部都感到灰心丧气，暂时散了会。

然而那并不是那天晚上议程的结束。据小申讲，当他步行回家路过大队办公室时，申大胡子和张宽心抓住了他，把他推了进去。他们把他扣在那儿一直审问到天亮。李快腿和秦快嘴以及十位民兵，用十二号铁丝在他脖子上挂上一块沉重的木板，并在上面压上了从长治城墙上弄来的两块大砖。铁丝勒进他脖子里时，申开始冒汗了。他感到越来越疼痛难忍。他们要求他在一封声明上签字，说他企图“翻土改的案”，并举行了会议掩饰自己的罪行。

当小申实在疼痛难忍时，说：“我来告诉你们一切。”

审问者立即从木板上取掉砖，减轻了他脖子上的压力。

然而，申反悔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们又在木板上放了砖头。

这次对抗一直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但是由于申拒绝讲话，拒绝签字，李快腿在清晨五点放了他。

第二天，他找到中学的那位干部，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民兵们再次把他带到大队办公室参加会议。这次，审问者在木板上先加上了砖头又加上了石头。他们揪住他的头发迫使他低头，并用枪托不时打他。

他们要他讲出新东西，并要他在指控杨起旺和靳天水对“翻案”事件负责和隐蔽真相的纸上签字。

“你如果不签这个字，你就活不到明天。”他们说。

看见没办法，小申最后只好签了字。他们放了他，他浑身疼痛不止。当他躺在炕上时，就起不来了。

9月1日工作队撤走了。小申亲自去长治请求市革委会另派工作队。几天后，市医院一组干部去当新工作队。那时对小申的指控纷至沓来。他在故驿偷过枪，炸桥赚了500元钱，并威胁要抓住公社武装部长杨秀山和他算帐。

新工作队调查了这些指控，发现与小申毫无牵连，于是9月13日就又撤走了。14号张庄大队社员成立了新的革委会，确定李快福和秦快嘴继续任职。24号党支部开始了整风运动，把小申这个斗争对象定为敌人，并重新指责了他以前所犯的种种罪行。九天后，支部成员就投票开除了他党籍。

小申去市委抗议了这一行动。市委领导告诉了他，地区整党还没有开始，他的党籍问题应由公社处理。但是当他回了家，大队支部不仅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而且还命令他和大队受监督的“分子”们一起上街打扫卫生。当他拒绝监督劳动时，民兵们又把他带到了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三次大会上，当他仍然拒绝监视劳动时，举行群众大会批判了他。他们猛地把他的头按下去，以致于一束束头发都掉了下来。他们把他双臂使劲勒到背后，致使他的双臂一度失去了知觉。他几乎神智不清了。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后，他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往医院治疗。

由于长北火车站医院，没有空床位，那儿的医生把他转到长治人民医院。他在长治呆了一周。

最后，当他仍然拒绝作为人民的敌人接受监督劳动时，张庄干部把他送到专门为批判对象举办的学习班，大约总共有七十余人，在学习班他继续挨批斗。那时已是1969年1月，公社党委不仅没有撤销开除小申的决定，反而批准了当地支部拒绝他交纳党费。在一次万人大会上，马厂公社党委书记史昭盛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并开除出党。

前面几段概括地叙述了小申的经历，他所讲述的经历要更加冗长详细得多。有些细节似乎有些离题，但是甚至不相干的材料也有他的用途。看来使小申似乎通情达理——一位勤劳甚至勇于承认错误、关心他人的干部，渴望和一切愿意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一道工作。

轮到自我批评时，小申至少承认两个严重错误。

在公社办公室抢写大字报的白纸是一个错误。这是违反省里和中央反对打、砸、抢的“6.6”通令精神的。但是我们长期受到压制、封锁，而且得不到公社的帮助，我们的年轻造反者非常气愤，拿走了我们看到的一些纸。我没有让他们这样做，这是他们自己要拿的。我也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去拿纸时，我本来是应该设法来阻止他们，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我是党员。

我还拿了一些钱，这是我的第二个错误。1967年4月，新的革委会停止了我副业队长的职务。他们来通知我必须停止工作，我停止了，但是我停止工作的那一天，我拿了副业队的一些钱把它交给了“上甘岭”组织。没有多少钱——共137.58元，但是我把它交给了我的组织，因为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我们把一些钱花在向市委告状上，买纸和笔大约花了二三十元。他们打我后，我们把其余的钱也花了，我们把它用作医药费，和躲避他们抓住再打我逃跑时的车费。我每笔都记了帐，并向工作队长了汇报。我写了检查，并详细汇报了所有的情况。

我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来源，进一步证实他的叙述。1971年李快翻，以及更晚些时的1977年，郑八字脚否认张庄民兵曾在肉体上虐待过小申。有人在中学毒打过他——是真的，但是，那是“联字号”的学生头头干的。他们担心，说他可能是堡垒内部最危险的“红字号”。

张庄民兵把他当作斗争对象时，只是给他脖子上挂上一块木牌子，逼他低头认罪，把他双手勒在背后，但是，根本没人毒打过他，没有人揪下他的头发来，也没有人扭过他的双臂。

这是干部们讲述的情况，但是他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在街上闲聊时，讲得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一位老头告诉我，至少在一次大会上，民兵在申的脖子上挂上木牌子，然后使劲把他的头压到木牌子上，他的门牙在木牌上碰得砰砰直响。讲故事的人重新给我模仿那种动作和声音。

我自己的结论是，尽管小申有夸大其词，但事实上，他的确受到了非常粗暴的对待。不是外人，正是张庄同村人，敲掉了他的门牙，连根拔掉了他的几绺头发(他头皮还有伤疤)，扭他的双臂扭得脱了臼，而且他们至少粗暴对待过“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十名或更多的活跃分子。当我和郭民恩谈话时，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们对我们干了绝不应该干的事，”他说：“现在，我们像弟兄一般一起干活，但是他们所干的事本来是不应该的。”

周来富的遭遇甚至更加悲惨。他逃跑后，妻子和他离了婚，他们两个孩子也死去了。由于害怕性命难保，他在河南躲藏了整整一年。

李快腿尽管否认他本人曾毒打或虐待过任何人，仍然说：“当我们现在回想起过去，我们真感到害怕。尽管没有人员死亡，大家都幸存下来了，但是我们本来是可能轻而易举杀害一些人的，而且可轻易犯下无法纠正的错误。我们不愿去想这件事了，一想到这些事我就害怕，这都是搞派性的结果。”

小申避而不谈他这一派所犯下的暴力事件。一开始，1967年冬春时节，“海燕”和“上甘岭”两派所依赖的成员还不算少，他们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正义的，并对他们一派发动的夺权运动的逆转极为忿恨。在大辩论大字报斗争中，当两派在大街上为此而武斗时，“海燕”、“上甘岭”两派的成员经常处于攻势，他们有时也能获胜。晚上他们派出小组搜查李快腿和秦快嘴，并威胁如果他们找到他们，要毒打他们。正因为这种原因，据郑八字脚说，李和秦有时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

开始时，两派实力相对来说十分接近。各派都把对方看作是反革命，或至少是反动的，而且各派都感到毒打对方的成员是正义的。只是后来，“毛泽东思想”派提出有关“翻土改的案”的指控，其成员开始把周来福、郭民恩以及其他其他人叫做“地主和国民党分子”，公社委员会把“海燕”和“上甘岭”组织开除出夺权司令部之后，只是那时许多人才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才决定他们既不想当作这种辱骂对象，也不想中途退出或改变派别。于是“毛泽东思想”派孤立了“海燕”和“上甘岭”两派，缩小它的规模，把他们当作少数派来迫害，使他们处于绝境。后来当全地区和长治市“红、联字号”组织成立，部队指责“红字号”一派为反革命，而确认“联字号”一派正确时，大多数人才开始把“海燕”、“上甘岭”看作是“红字号”的。于是人人开始把他们谴责为地富反坏阵线，并当众蔑视他们。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无论“海燕”还是“上甘岭”的人都很难抬起头来。

当我问李快腿他是否认为小申和“海燕”是反革命时，他说：“现在我们不相信，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我们定了案，似乎一切都

有可能。想到或许会发生的后果我就感到害怕。”

其他人并不那么开明。1977年，即事件发生几乎十年后，郑八字脚说：“小申发动地富反坏翻土改的案。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他，但是他该打，坏人是该打的。”

八十一 天降新娘

1968年，迫害和毒打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他们粉碎了“造反派”政权，并使李快腿和秦快嘴取得了对张庄村毫无竞争的控制权。那时他们所效忠的派别——“联字号”同样已经获得了对全市、全地区的无人竞争的控制权。无可非议的权力，再加上他们深信自己一贯正确，是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胜利已冲昏了头脑。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英雄，并开始认为人们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他们渐渐开始滥用他们的声望和职权，至少，后来有许多爱挑剔的人提出了这种指控。

滥用权力的领头人是秦快嘴，他比李快腿年龄大，更谙于人情世故，更擅长投机取巧为己谋利，更喜欢享乐，尤其是他当民兵还是光棍时，曾热烈追求肉欲享乐。然而，1968年，秦快嘴已不是光棍了。在向他寡妇嫂子求婚竞争中的失利，与其说伤了他的心，还不如说伤了他的自尊心，当小申与秦快嘴倾心爱慕的女人结婚后，被任意抛弃了的秦快嘴就参了军。

在他远离家乡服役期间，他商定和一位临汾姑娘结为夫妇，他似乎很不情愿这位新娘。把她娶到张庄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他却在外面见缝插针，乱追女人，或是在隔壁院子里，在长治小客栈里，或是在乡下遥远的路上。如人们早就注意到的，与他私通者，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马厂百灵”、“张庄的村花”——20岁的歌剧明星师桂香。

作为一位戴了三顶官帽子的复员军人(大队革委副主任、大队支部委员、民兵营长)，秦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根深叶茂，敢于向师求爱。尽管她父亲是圣母军成员，接受监督改造，作为臭名远扬的天主教反革命分子，她的神父叔叔被终身监禁，但是他不仅不掩饰这种关系，似乎故意进行炫耀。当他去长治出差时，带上师桂香一起同行，请她在

饭店吃饭，俩人同去看戏，并和他在客栈同居。

当秦快嘴的老朋友晚上串门时，师桂香就过来招待客人，就好像他自己是返家的女主人。

尽管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仿佛在舞台上扮演角色一样，但是她却亲手为主人烧菜、上菜、斟酒。据传，秦十分喜欢她做的饭菜，其他人做的饭菜，他都不乐意吃。

当师不在秦家招待客人时，她就把自己的住宅当成大队部，或至少可作为秦的心腹们的接待中心。他们这些人包括李快腿、治保主任王文则、郑八字脚、林跃龙和齐永福，都是民兵，最后，但并非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郊区臭不可闻的流氓申大胡子。师的丈夫，水泥厂工人裴齐发不上夜班时，也参加这类聚会活动。

几年后，当宣传队指责李快腿在师桂香家大吃大喝时，他否认说他根本没有那种习惯。

“我在那儿喝过一次酒。”

“但是大家都说，你和秦快嘴经常吃师做的饭菜，喝她亲手倒的酒。”

“在秦家是喝过多次酒，但是在师家没有，我只去过她家一次。”

师桂香盼子心切，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她向公社申请收养一个女儿，同时也喜欢照看秦家的小儿子。有一天她把他带到地里挖了一些土豆，点着玉米杆烧烤。结果挨了一顿批评，但是秦快嘴不愿让人诋毁师。“这不是她的错，如果你们一定要批评人，就批评我好了。”说完他出去，找了几个土豆切开，埋在地里说，“好了，我还土豆了。”

秦快嘴和师桂香私通，对秦的好处，村里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对她有什么益处呢？第一是保护作用，因为她是“反革命”的侄女，受监督改造分子的女儿，她在社会上的地位显然是不稳固的。谁能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次反“四类分子”运动，可能突然会责骂并确定她为运动对象呢？她和民兵营长以及通过他和大队支书的关系搞得越好，在风暴中她就会越安全。虽然秦快嘴丑陋难看、笨拙、年龄又大，但自卫本能驱使她对她的求爱作出积极反应。此外，师的丈夫几乎无法反对，在这反复无常的年代，这对夫妻在这个乡镇的生活权利，会随着这种非法私通的命运而沉浮。队长裴良顺也和这种后果利害攸关。毕竟他和师的堂妹师桂贞结了婚，如果这种事情败露出来，

当局可能利用他的联姻关系而玷污他的名声。

秦快嘴和师桂香的风流韵事，使人联想起1948年土改时，村支书张兴发和富农寡妇被宠坏的女儿补巧的私通。那时，补巧尽管已嫁给了一个贫农，她也一并被划为贫农，但还是害怕当作最后运动的对象，没收分配给她的财产。她不得不迎合大队最重要干部的关注，这一个人有保持他贫农成分的权力，也有完全推翻所有以前作出的决定，再叫他富农的权力。张兴发既英俊又富有魅力，只能使她更乐于同他私通，这是她个人利益促使她接受的。

秦快嘴的恋爱成功，对李快腿的影响很深，这是他工作和玩耍的老伙伴。尽管李是恋爱结婚的，而且已经骄傲地做了几个可爱孩子的父亲，但他一当了支书，他对其他女人的兴趣，就开始超过了他妻子。这个事实很快就传开了成了村里主要公民私通的谣言。尽管谣言惊动了一些人，但是也使另一些人摇头不相信。毕竟李快腿既不十分魁梧也不怎么英俊。他几乎不能像秦快嘴那样，惯于诱惑乡村美女与其苟合。由于他身体稍显驼背，双眉隆起，头笨拙地伸向前方，和女人在一起，他常常显得腼腆而略感不自在。一个妇女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个姿势，常会使他面红耳赤，难以自制。然而富有魅力的妇女，多半是已婚妇女，突然开始争先恐后引起他的注意。谣传说，他曾一次至少与八个妇女私通。村里人是如何掌握了这些线索的就很难说了。但是人们设想，有火必有烟，无风不起浪，由于一次与八个女人玩可谓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一个不善于与女人交往，又不怎么漂亮的、社会活动频繁、体力劳动繁重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有些人开始叫他“昏王”——这是为最腐败的皇帝，对一千位妃妾也不满足的统治者保留的一个绰号。

李快腿所以能突然对妇女们产生吸引力的秘密，当然是主宰她们日常生活的权力。常言道“厨房有人好吃饭，朝里有人好做官”。他一旦当了支书，凡是乐于得到特殊照顾优待，凡是需要偏袒的人都开始奉承他，利用他年轻容易受人影响的特征，以及秦快嘴开创的沉湎于寻欢作乐的生活作风。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张庄，青年妇女会要求或需要什么特殊待遇，什么恩惠呢？

首先，当然有像师桂香这样的，由于其亲戚声名狼藉，或历史不

清白，而在政治上身处困境的人。尽管师桂香臭名远扬的亲戚住在马厂，但是张庄给分配粮食。有的人甚至揭露，作为阶级敌人接受监督，名声最坏者之一是被划为反革命分子，曾当过土匪的武国凡。他那美貌的女儿住在家里照顾他。究竟是她挑逗李快腿，还是李主动追求她，人们并不清楚，但许多人开始注意到的是，李去她家里和她在一起花费那么长时间。如果你在村里其他地方到处找不到李快腿，你去姓武的家里，很可能，你不会失望的。那些日子里街谈巷议的就是这些事情。显而易见，这样的约会对武老头有利，他怎么能不慎重对待大队支书呢？

不过，并不是只有阶级敌人才能从“朝里”的朋友身上获得好处。如果一个姑娘想上地区中学，参加训练班，或被委派去市里开会，大队支书的推荐是必不可少的，有些甚至靠他的话来吃饭。村里有许多年轻妇女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一月才赚三四十元，这些妇女既不参加劳动，也不为挣得基本口粮而多干些活儿。他们从大队分得平均口粮，但是在轮到挣工分付口粮款时，像齐忠纪这样的人总是拖欠负债。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困难，大队也许会给他分配救济款，但是由于像齐小偷一样，她们自己具有劳动能力，而且由于她们的丈夫确实身强力壮，最后，大队希望她们自己支付口粮款。如果她不肯，负责供应的干部应该停止供应口粮，然而，如果大队支书说“给这个妇女分上口粮，让她以后交款”，那么毫不费力，粮食立即就会继续源源不断而来。利用什么更大的刺激，来对这位负责人表示热情呢？

非法私通的流言蜚语使李快腿的妻子关秀英好生烦恼。她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毕竟与她丈夫争夺大队领导职位的有很多对手，尤其是他帮助镇压的那些派头头（其一般成员就不必提了），自然而然会把他当作用形形色色流言蜚语诽谤的对象，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来损害一个男人的声望呢？然而不祥的谣言不绝于耳。李快腿在家待的时间很少，经常在外面过夜，一两天不归家。1967年，他的借口是“海燕”和“上甘岭”的忠实支持者在搜寻他，如果他们发现他一个人，就会毒打他，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家里里睡觉，正好像日本人占领期间，伪村长尚石头得知八路军要找他算帐时的情况一样。那时地下积极分子用尚放纵女色的故事来烦扰他的妻子，她丈夫不得不回家安慰她。他一回家就被八路军抓住处决了。¹

1968年，为安全起见在外过夜似乎是正当的，但是有关李快腿的谣言仍然不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一天，一个邻居家的女人告诉秀英，她看见她丈夫和一个年轻妇女单独在一个附近的房子里。秀英偷偷走近那个屋子，从外面把门锁上，然后去叫邻居帮忙。但是她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李快腿说他和那位年轻妇女只是在谈论村卫生的工作情况。

那时的村副主任张贵才，有一次找遍全村各家，结果发现他在黑暗的工房中躲在炕上。当张打开电灯时，李快腿和一个年轻妇女面红耳赤地坐了起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张问。

“谈谈青年团的工作。”两个人马上说。

谁能证明不是这样呢？

最后，有关李快腿的事件和谣言，使秀英对她丈夫的信任降低到绝望的地步。她决定进行无声的抗议。她爬上她家的阁楼，躺在那儿好几天不作声。李快腿不知道去哪儿找她。他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甚至查看了村里的水井，担心她的尸体可能会在一个水井里漂着。当搜寻无结果时，他派人去关家院子里核实一下，想到他可能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但还是徒劳无益。

他还请求她母亲(不是养母，而是亲身母亲)帮忙。他确信秀英已经死去，害怕他自己可能得对此负责。“你知道，下一件事就是把我拖上法院。”

最后，他去找他妻子的姨姨，秀英最受戴的老太婆。这位姨姨在李快腿家痛苦难忍，不禁哭了起来。秀英在阁楼上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听见哭声，也开始哭了。她爬过楼口，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她姨姨把她扶起来，她们互相抱着哭了好久。

于是，“天降新娘”在张庄流传开了。1971年我们听到的故事所说，秀英在阁楼上八天，既没吃饭也没喝水。

一方面由于“马厂百灵”给干部斟酒，一方面由于“天降新娘”，张庄的道德风气不断下降。由于领导干部未能为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他人发现很容易找到拉干部下水的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¹译者注：这个故事在杨丁以前写的《翻身》里，有过细腻的描述。

秦快嘴指挥下的越来越骄傲自大的某些民兵来说，更是如此。作为被宣称“正确”的伟大“联字号”组织的成员，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坚持毛泽东路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勇士。

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站岗放哨，搜查可疑分子，维持会场秩序。给大队领导跑腿办事，提高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技术，作为对他们服务的报偿，他们看不到有求必应地给烟抽，给酒喝，在大队免费吃饭，在城里免费理发算什么错误，由于在他们看来，至少他们显得勇敢无畏，他们也希望赢得女人的欢心，因此，大胆地追求女人。

张宽心和一位21岁的女人交往甚密，弄得满城风雨。这位年轻的女子的丈夫在铁路上工作，大部分时间离家在外。宽心年已四十，好几年身体一直不佳，很难理解，一位21岁的女人竟对他感兴趣。但是随着一周周过去，宽心的身体明显恢复，体重增加了，气色红润了，显然恢复了他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负责管理大队库房的宽心，私拿大量干人参，定期熬制饮用大量的人参茶，众所周知人参具有滋补功能，宽心追求少妇的成功秘诀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大家都为此而捧腹大笑。他是否给大队补交了他所消耗的这些昂贵的滋补品，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谈到诈骗，宽心可不是内行。他无法与像申大胡子那样的职业流氓相比。四年之久的夸夸其谈，没有给申胡子留下任何印象，恰恰相反，秦快嘴授于他监管反对派，惩罚“坏人”的自由权力，只使他更加鲁莽，更加肆无忌惮。“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动乱和“左”“右”摇摆，有益于他精心调整进行政治操纵的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即玩弄普通老百姓蒙蔽他们思想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致于这些平民百姓发现，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在免费分发自己的东西——通常会索高价，否则是决不会出卖的东西。

申大胡子找了一件耀眼的军装，每当进城，他都要穿上。他穿着整洁，扮成执行紧急任务的战士，站在村口向长治开的公共汽车招手，当汽车嘎地一声刹住，他就热情自信地爬上车，可司机从未问过这位不速之客是否是真正的战士，对军装信以为真，从未要申买过票。

在市里活动，申的神通更加广大，选择余地很广，但首要任务总是找东西吃。春节集市期间，他走近一位从其他城市来的漂亮少女，邀请她去来自远方公社腊肉小贩的摊上去共享美餐。他们俩吃饱后，

大胡子申说声“请原谅”就要走开，说他会马上带钱回来。当然他没有再露过面，于是这位少女不得不为两人自掏腰包了。

申大胡子不能完全脱产时，他参加了平车运输队。只要有人同意付钱，他就赶毛驴去任何地方。有一次全队被雇去给马厂合作社拉饼干，在经过张庄途中，大胡子设法在他自己家卸下几箱饼干，然后换上几块砖头以保持原来的重量。当合作社发现砖头时，申假装大吃一惊，并暗示可能是罗水长干的。申的诬陷和以后的调查，在好长时间内使运输队中的关系十分紧张。

仅几天以后，申大胡子偷了铜，给1971年宣传队带来很多麻烦。他偷的是用旧的黄铜轴承。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宣传队一位干部去卖轴承的合作社，说服那里的店员开了一个证明，说申大胡子拿去一个新牌号轴承从未付过钱。这个证明，永远也无法为案子提供炮弹，因为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诬告的基础上的。

仅次于流氓和饭桶申大胡子的，是光棍民兵郑八字脚。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郑八字脚为民兵班长，领取口粮，但是部队镇压派性斗争，在地区强行稳定恢复秩序后，所有的民兵都要承担一些普通活儿。然而普通工作不太适应八字脚的性格，他就选择了学做买卖。1968年，干红薯片最赚钱，做红薯片投机生意，意味着要跳上单行的、开往河南的、几乎是满载工业用煤的货车。进入河南北部，用一角五分就能买到一斤干红薯干，再用返回的空车装上红薯干片，然后在张庄以一斤红薯片换一斤玉米。一斤玉米在自由市场可卖到四角钱，几乎是原价的四倍。

红薯片在河南是粮食的代替品，不用粮票就可以自由买卖。红薯片属于新鲜蔬菜之列，农民可以在城镇搭棚公开出售，或带着麻袋从当地市场到其他地方出卖，外地人整批购买红薯片是非法的，但是没有人反对任何个人在各地零买。八字脚在河南习惯四处漫游，在哪里碰上就在哪里稍买一些，直到至少收集200斤为上。然后，他把红薯片装进两个盛一百斤的麻袋里，晚上运到火车站。北行货车通常要在这儿停车十分钟，八字脚使尽平生力气，把这些一百斤重的麻袋扔上空煤车里，随后跳上去。火车司机很少能抓住干这种事的人，因为每列火车上只有四个人，两位火车司机，一位司炉工，他们守在车里了望。他们几乎无法有效地监视长长的运煤车，即使他想这样做，也似

乎不可能的，有漫游癖好的农民几乎想带什么，就随身带什么，随心所欲周游中国。

这个地区像八字脚那样狡诈、灵活、走路快的人极为罕见。如果有人确实碰到了他，他总能扔了麻袋，转眼间逃之夭夭。当我问他是否有许多人乘火车时，他说“没有，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极少数人需要干这种事，人数很少很少。我就是极少数人中的一员，还没有爬乘货车的‘群众运动’”。

由于没有多少人爬车，每当八字脚去一趟河南，李快腿就听说了。他找到这位浪漫者批评他：“为什么要干这种非法活动呢？”李问：“为什么要往粪堆里钻呢？回来在大队老实做些工作不好吗？”

李快腿朗读毛泽东选集，提醒八字脚，他父母曾是饥荒的受害者，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只为一斗粮就把他卖给了别人。他不是在其他贫农之危吗？他不是可耻地背叛了他过去的组织了吗？听收音机时，八字脚也听到过受苦受难的故事，收音机里说，过去的贫困户现在辛勤劳动改造社会。他决心要为大队做些事情，作一些贡献，承担一些工作，并放弃投机冒险活动；当他81岁的继母去世后，他要求大队给他分配工作。

“我要干活，”他说：“可是我不要任何人当我的上司。我不要别人对我指手画脚，我要自己做主，我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个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李快腿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分配八字脚去副业队去赶马车，负责长途运输。从第一天开始，这个工作就确实适合这位爱吵架的农民。

“我负责一辆大车三匹好骡子，我喜欢这个工作。很不容易，不管是什么天气，你天天得上路，可是你可以走南闯北，去各地漫游。这个工作适合我，我是说我确实喜欢这个工作，我拉煤、拉水泥和许多别的货物，因此我一年能挣四百多块钱，除了挣工分，一天一块，我每天还拿路途补助六角，这比一个城市工人挣得多得多。”这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而且八字脚又说这工作确实吸引他的方面：“我能四处漫游，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可惜，这工作并不久长！

八字脚赶马车赶了将近三年时间，当他需要钱买货或往来时，只去找到大队会计就能提出五六百元，沿途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当他

返回来后，他交上他的收入和花费单据。然而由于没有监督，他对帐目漫不经心。有一次他给一个人拉煤，人家给了他钱，但是没有向他要收据，八字脚就把十四元三角的运费塞进自己腰包。当大队会计给他结帐时，暴露了这笔“收入”，结果大队取消了郑八字脚的赶车资格。就因为这区区十四元，他失去了自己选择的职业。

从此以后他又重操旧业，又开始去河南找红薯片了。

尽管郑八字脚是臭名远扬的贪污犯、投机分子、有点儿小聪明的无赖，但是至少还有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更坏。这个人就是贫农出身的社员李玉根，在日常生活中他和一首老顺口溜很相称：

吃、喝、嫖、赌、抽，
捎带当小偷。

他因为当头一掌将他妻子打死，蹲了四年监狱，刚出狱回到家，他的女儿掉进他院内厕所被淹死。他的名声很坏。许多人相信这一次他杀害了他女儿。李玉根伺机想谋害张贵才书记，因为是张敦促指控他杀人，而把他送进监狱的。

张庄其他声名狼藉的人，包括李玉根的儿子李锁平和陈良田。后者的臭名远扬，部分是因为他母亲和妻子装饰过分艳丽的而引起的。

当陈良田的父亲死后，他母亲再没有嫁过人，封建礼教规定一旦结婚，寡妇应该守寡并且永远保持贞洁，以便为儿子的大门面，获得一块为他歌功颂德的牌匾。在这种情况下，这块匾从来也没有被挂起来。陈良田母亲接待过许多男人，尽管孩子对她没用，她还是时常怀孕。有一次她用一条布裹好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扔到厕所，陈良田在黑暗中发现了这个包裹，并挖了出来，结果挨了一顿臭骂，说他干涉与他无关的事。人们叫他妈是“坏碾上累坏的毛驴”。

陈良田的妻子，以美貌而著称，却玩弄着一套与众截然不同的把戏。她开创了一种的确获利的“转门”婚姻。在他最后和陈成家以前，她已嫁过三个男人。每次她都索要大量现金的办法来答应成婚，并信守婚约一二月，然后诉讼离婚，去寻找出价更高的求婚者。

当我问到她玩弄这一连串花招后，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娶她时，人们告诉我，即使你在长治四个城门上都贴上标志，指明她是怎样的一个“烂苹果”，也仍然有人会娶她的，因为他没有看见她脸上有什么不好的标记。在这种婚姻自由竞争之下隐藏着严酷的事实，晋东南地

区男人自然比女人多，诱人的年轻新娘总能得到丰厚的礼金。

党领导整风运动、再教育运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监督的压力总有可能使一些恶棍流氓改邪归正。但是，从长远来看几乎无法解决在过渡阶段如何制止这些人的问题，尤其是许多不守规矩的男人就是秦快嘴领导的民兵，他们晚上站岗、抓人、维持大会秩序，当大队领导说服教育失败后，他们聚集在师桂香家吃、喝、唱，而且在与人交往时不按照传统礼仪，甚至连头都不点一下，不法之徒怎么能维持社会秩序呢？这些自我放纵的人怎么能“先公后私”，带头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些问题如果人们不公开提出的话，至少也会私下提出的。回答当然是他们不可能。阻碍深入调查这一问题的总是派性。李快腿和秦快嘴和他们所有的支持者及其随从，只能说他们站在了“文革”运动的正确路线一边。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要自我批评呢？为什么他们应该严肃认真对待自己的缺点呢？尤其是当反对派尽管被击败，但是尚未被彻底粉碎，仍然继续存在，并在张庄和其他地区进行抗战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说，给“红字号”一个最小的机会，他们也肯定会充分利用的。

八十二 集体利益见鬼去吧

武斗结束后，要在笼罩着奇特政治气氛的晋东南，进行名副其实的整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都没有权威可言了。1966年前，共产党总能确定大政方针，无论怎么样辱骂，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偏差，党中央迟早会产生一种纯净之风。尽管庐山会议的行为奇丑古怪，毛试图摧毁彭德怀，但是基层人民对党的事业仍然充满信心，致力可使一些了解现实的人，大胆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确信真理终究要得到支持，社会主义终究胜利。但是，现在整个党组织已经瘫痪，一半党员在忙于证明另一半党员是反革命。无论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党仍然未触动的唯一的地方，党的权威仍然有影响力的唯一地方，就是部队，他们也正忙于拉一派打一派。这是一种不讲道德，善恶颠倒，并使整风显得不合时宜的做法。高级官员的虚伪使人们变得

玩世不恭。由于人们依靠的中心不复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规章制度和已有的形势，任何人对行动的后果都没有把握。

一位记者对可能发生无休止夺权反夺权，搞得不知所措，他用诗的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大致翻译如下：

转呀转，
 摇纺车，
 恶魔猖狂，
 百姓遭殃。
 造反派奋起，
 打倒一切。
 工作队来到，
 造反派完蛋。
 造反派重振旗鼓，
 工作队垮台。
 造反派强大了，
 打倒一切。
 部队支左，
 受害者起来，
 奋起反击，
 受害者迫害造反派。
 造反派奋起，
 受害者倒台。
 士兵奋起，
 控制了一切。
 转呀转
 转纺车。
 恶魔猖狂，
 百姓遭殃。

1966年开始的十年政治动荡期间，张庄以及周围乡村单位的许多人，不仅在个人道德，而且在谋生方面都别无他途，只得各行其事。当政治风潮减弱后，物质刺激惹人注目，这种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

其中之一，是大队招待费用之类预算项目剧增。去大队服务的人如果款待不周——主要是指没有受到盛情款待，不强迫他们饮酒、抽烟，他们就会消极怠工。

1968年，张庄大队还没有自己的拖拉机。马厂公社有两部75马力大型履带式拖拉机，每小时能深翻10亩，深度达到30公分，是马拉犁或用锄头翻地的三倍深。拖拉机耕地犁得快、翻得深，对大队有利，尽管要花费现金，大队领导还是邀请拖拉机进了村。然而，大队很快就发现，公开的价钱仅仅是请拖拉机花费的一部分，还有招待拖拉机手的问题。如果给司机吃普通农家饭菜，他们就草率粗心，耕出的地凹凸不平。如果款待比较好，耕地的质量就有所提高。如果用大队最好饭菜招待司机，司机犁地就仔细认真，深度达到最大限度，犁沟覆盖的均匀平整，并把地头地尾全都犁遍，甚至，难以耕种的边头角落也可以设法耕过。

好客程度与工作质量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已成为臭名远扬而又普遍存在的事实，从而流传开一首具有讽刺意义的顺口溜：

吃稀粥，耕的是稀粥地；

吃面条，耕的是面条地；

吃烙饼，耕的是烙饼地。

所谓“稀粥地”，有凸有凹，起伏不平。“面条地”，看上去好，但是机手没有控制犁地深度，忽略边角地带。“烙饼地”符合所有的要求，麦饼是在非常旺的火上炙烤的一种大而扁平的饼，厨师用油烙麦饼，并经常掺和上碎肉片和各种蔬菜。给司机们吃这种饼，他就会竭尽全力地干，当然庄稼就会长好了。

要求好饭菜、专门厨师和高级烟酒的，不仅仅是机耕手，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有同样的要求。尤其是电工和卡车司机，他们的要求太苛刻。农民们把他们和拖拉机手一道划为“三害”。为了让他们去做靠普通工资就该做的事，村里人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贿赂，他们就是这样的害虫。技术工人架子大，要求特殊。因此，农民们创出一种新术语叫“工人架子”，“工人架子”指习惯高傲自大，自认高人一等的架势。60年代后期，当有人粗暴对待或轻视大队社员时，他们就说：“他对我摆‘工人架子’。”

当然技术工人并不是要求特殊款待的唯一特权人士。大队领导不

得不欢迎和慷慨大方地招待采购人员。如果大队干部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会代表大队作有利可图的生意。地市干部偶尔到了乡村逗留时，也是如此。由于他们都执掌权力——既可以帮助大队也可以损害大队，所以大队干部不得不热情款待他们。1967年到1971年，李快腿和秦快嘴主管张庄事务时，招待费用猛增了，由过去的几十元增到1970年的八百元。干部们把这些钱花在了购买白面、鸡蛋、豆腐、猪肉和烟酒上了。

群众说为了应酬外面行政和商务要员，很有必要准备一枝二十响手枪(一包好烟)，一枚手榴弹(一瓶酒)和一个炸药包(一包蛋糕)。

大队干部把作交易，即解决问题称作“研究”。字面意思是研究解决问题，而其谐音是烟酒，因为，除非交易的主要受益人能提供名牌烟和酒，否则是研究不出任何结果来的。主持任何协商会议的负责人，为了解决具体细节问题，都要长时间讨论，都要消耗大量的高级烟酒。

据说，大队干部必须把两个衣袋里都装上香烟，左衣袋装上普通牌号的烟，供自己抽，右衣袋里装着一包北京“大前门”，供来访的干部和采购货员抽。

招待费用从烟酒之类小恩小惠，到彻头彻尾的贪污挪用，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在“两宝”领导张庄期间，至少有两个人各自挪用一千多元公款，而其他十多人，各自拿走一百元至五百元不等。最严重的指控涉及到二队会计申中福，据说他挪用1641元，副业队会计陆河海挪用了1193元。所有被指责贪污的人，不是会计、进货员，就是仓库保管等人，他们都和物资或现金打交道，大队干部自己的帐目上，从未有过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但是，据说秦快嘴曾警告过申中福，提防对他的帐目进行调查，因此被人怀疑是同谋。

1971年整党期间，被认为是李快腿最严重的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是用大队的钱购买了一斤二两鸡蛋，给集体拉饲料的卡车司机在路上食用。有些证人说，李快腿自己把鸡蛋吃了，但李说都是卡车司机吃了。因此，应该作为正常“招待费”给予报销。

由于缺乏意义重大的贪污指控，宣传队指责李快腿接管大队时，有2万元，五年期间因为管理不善，致使大队负债1.7万元。这也是假的，李1967年当了党支部书记时，张庄欠银行1.7万元，1971年

债务仍是如此。大队没有还过债，但是也没有再借过款，从经营管理观点看，事情本来可能会更加糟糕。

对李快腿最严重的指控，是在他的领导下，粮食生产连年下降。即使这是真实情况，数字似乎与此不相符，人们也不得不问，他对这个指责应负多大责任。为了取得控制别人的某种专横和理所当然的权力，以及无情地陷入随之而来的贿赂、腐败的现金交易关系，数年的分裂、斗争、迫害、逃跑、返回、进一步迫害，似乎对保持60年代相对不足的生产水平，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更不用说发展生产了。但是尽管派性斗争十分严重，毕竟只是涉及到大队全体社员中的少数。此外，大部分的对抗、全地区的武斗是在冬季发生的。在整个下种季节，大部分人照常耕地、下种、除草、收割、晒粮食，奇怪的是，生产甚至有所提高。

1965年，“文革”开始前，粮食产量自1960年以来首次降到每亩180斤以下。1966年，中学的冲突蔓延到大队之前，生产再次提高到每亩180斤以上。1967年是张庄政治运动最激烈的一年，夺权反夺权，南北分裂，大街上拳打脚踢，晚上斗争会接连不断，生产有史以来首次提高到亩产270斤左右。尽管，在1968年，由于气候恶劣，粮食产量剧减，但是，1969年粮食产量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亩产近300斤。

粮食产量的波动都没有什么重大意义。1963年，张庄农民的产量每亩仅在270斤以下，八年后的1971年，他们几乎收了270斤。在此期间，产量曾三次剧减，但是其余年份都是徘徊在270斤左右。加起来计算，产量稳定在相当于解放前平均产量3倍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停滞不前，因为大寨在山地的不利条件下，粮食产量每亩已达到900斤的水平，马厂公社最好的大队已超过550斤，而张庄的产量仍然停留在50年代270斤的水平上。大队每年都响应上级的号召，召开无休止的生产会议，提出一连串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但是最后核实产量时，结果却和前几年相差无几。

这些令人沮丧的粮食产量数字，作为政治上的炮弹，在1967年的派性斗争中猛烈爆发，并在以后的几年期间慢慢燃烧。1967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攻击第四队忽视生产，从事反革命活动。他们以诡辩的方式，提出了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指控：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因此，生产搞得不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然结果。既然是这样，反

革命分子就是小申，他曾被停止了副业队长的职务，因为社员们拒绝王文则的领导，他后来接管了第四队，取代了王。

然而，当第四队最终收割完后，粮食数字并没有证实指控正确。社员们每亩收了300多斤，创大队最高纪录，完成了国家粮食定额，并且每个社员分到370斤口粮。此外，他们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质量高，脱粒干净。事实上，国家粮站要求公社对四队进行表彰，但是，当权者固执地继续诽谤四队“海燕”的人。他们是无法扭转大方向的。李快腿和秦快嘴所宣扬的反革命破坏的指控，继续在全公社流传。被人们称为“两宝”的李和秦，反复指控四队废弃土地，忽视生产，全力以赴搞反革命活动。面对四队按定额交给国家的粮食，“两宝”说，交给国家的粮食质量差，加工又不干净。

“让他们说吧！”小申说，“关键问题是看我们打下粮食了没有。”

“我们的人确实辛苦，甚至中午都不回家吃饭，他们随身把饭带到地里，所以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抢收任务。接着我们边打谷子边扬场，我们获得了大丰收。但是，我们的打谷场在村子的隐蔽处，风力不足，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在粮站借了扇车。我们用电力把谷粒吹得干干净净的。当我们把粮食交给国家时，他们说我们是马厂公社交送粮食的第一家。其他生产队交去的粮食，得用扇车重新加工，但是我们的不需要。”

“因此，”小申说：“1967年四队执行了毛泽东的政策。我们很辛苦，从落后变为先进，这应归功于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群众。四队人很高兴，他们除了交公粮，还分到了足够的口粮。”

四队的形势是否真的那样好，值得怀疑，面对与指控相反的许多证据，似乎可以肯定，对四队的诽谤继续流传。“‘小台湾’上什么能搞好呢？”（王文则这样称呼四队）。他是由于四队拒绝他的领导，出于恶意这样说的，但是许多大队社员从他身上得到暗示，事实上也开始用同样的观点来看问题了。

又一年过去了，全大队的生产仍旧停滞不前，人们开始认为李快腿应该对此负责，于是对四队的政治压力减轻了。尽管，李快腿仍然不时地把小申当作抨击的对象，但是，因村里的事态而指责他却越来越难了，因为他在村里不掌任何权力，好长时间内，他甚至连村里都不敢回，毫无疑问“两宝”在张庄全面负责，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

们理应获得赞扬；如果事情进展不利，不责怪他们责怪谁呢？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千方百计地依靠扶植大寨的样板来推动生产。他们强调大寨最典型的东西是大寨精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相信集体的力量。以集体自力更生为自豪，对人们艰苦奋斗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

党的领导人说，一旦人们掌握了大寨精神，确立了大寨世界观，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巨大变化。每当一个村成功地改变了自己，首先就是因为思想改变了。于是，不是客观现实，而是精神决定了未来。

他们用富有诗意的比较反反复复地向张庄农民这样提示过：

大寨山高石头多，

出门就爬坡。

大寨人，

亩产高达一千多。

张庄，地平水又浅，

出门，五里平展展，

张庄人，

亩产仅达二百多。

据说，大寨人下地干活儿时像一堵墙，然后分散成一群蜂。而张庄人下地是一群蜂，然后扩展成一堵墙。

“上地一堵墙”描述大寨人如何准时，并且有序地一起下地干活儿。“分散一群蜂”，描述他们如何在地里各行其事，人人都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儿，个个竭尽全力，不管别人干多干少。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大寨是根据个人劳动的数量，按照大家共同遵守的标准而记工分的。

另一方面，张庄人下地劳动是按他们的意愿，有些人准时，而大部分人则迟到。他们干活时，构成了横穿田地的一条坚固的作业线，这条线适合于干活速度最慢的人。由于他们的工分并不充分反映个人劳动量的差异，没有人想超到前面，也没有人想落到后面。难怪收成不好，工分值仍然低下。

描写张庄人在地里干活的另一种方式是说，他们活像一条龙，把所有的人全都集中在一起。由于张庄人对他们工分值大为不满，如果没人监督，他们就敷衍了事。因此，领导们回避合理分工。他们不是



把人们按小组或个人派出去完成明确的任务，但是互相补充做工作，领导把一群人集中在一起，以便领导能比较容易地监督他们，但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良策。

由上所述，产生了张庄人学大寨的要求。

八十三 沃土丰收

大寨确实取得了值得学习的成就。有一个月，韩琼和我曾看到了农业特大丰收——每亩玉米产1270多斤，高粱1700多斤，他们推土山造梯田，大寨农民利用丰富的黄土，用优质土壤填沟造地，然后修筑石堰，把这种土壤固定在适当的地方。所有的石堰都呈弓形，像马掌一样都弯向山的方向。弓形石堰有足够的强度，经得起七月暴雨造成的洪水冲击。修筑这种梯田需要大量的劳力，每亩高达三四百个劳动日，结果充分证明，这种尝试是合算的，特别是冬闲季节，人们没有事可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氮肥厂把大气中的氮和一氧化碳气混合，能帮助保证新造的土地夺高产，这是大寨人民自力更生开山造地，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后，县政府利用中央的拨款，修建了这座化肥厂。充分显示了现代技术一旦和强大的集体力量相结合，所发挥的作用。如周恩来总理告诉我们的一样，大寨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力生的典型，而是自力更生为主的典型。

昔阳县各大队和公社，在改造完集体大面积土地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规模更加宏大，尚未开发的全县五条河谷和荒山荒地上。

我们看到了绵延数公里的拦河大坝，把一条大河拦到河滩南侧，而用人力运土，填平北侧乱石滚滚的河滩。这样造出的大面积平坦的土地，可以用河水灌溉，种植玉米、谷子、高粱甚至大量水稻。

我们看到一条隧道穿过悬崖绝壁，使河流从原来整整半英里长的环形河道改道，大队的农民用炸药开通了数百米长的石山，建造拦河大坝，然后把土运到环形河床上，另造新地。仅这一项工程，就可使他们大队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一倍多。

我们看到昔日贫脊的山顶上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为了确保树

木生长，大队严格控制牧区和造林区域。石灰刷白了砾石，标出了牧区和林区，数里以外都清晰可见。

除了大寨大队修筑梯田外，大部分工作，是1967年陈永贵担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后开始的。

陈认真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劝告，避免在困扰山西的派性冲突中选择派别，集中力量发动全县学大寨。他帮助一个又一个大队成立核心领导组，像大寨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相信政治挂帅，先公后私。那样，通过自力更生，大搞基本建设，充分发挥集体的潜力。这种重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促使全县的生产显著提高。

农民把注意力转移到改造山河后，工程的规模很快超出了个别大队完成工程的能力。这些工程需要集中几个大队，全公社或几个公社共同协力合作。因此，陈建议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由这些专业队在公社和县所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展示了向更高一级的通力合作，更高一级的核算和分配单位过渡的可能性。

把全公社组织成有效的生产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的服务中心，突然变得切实可行了。甚至把所有生产单位合并成一个大型县农场，最终跨入国营农业的问题成了令人瞩目的中心，这是这一代以及在不远的子孙后代，可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当陈永贵谈到他的希望和打算时，洋溢着一般具有感染力的激情。参观的人们，通过短暂亲眼目睹这些情形，可以看见在富有创造精神的农民手中，中国农村具有的强大的潜在力量。

他兴奋地憧憬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将释放出尚未发掘的生产力，而新的生产力反过来必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不断地螺旋式上升，把生产力推向前进。

“这些年来我确实感受到的，”陈说：“是乐观主义。”

我们在倾听他谈话时，发现很容易和他共享乐观主义精神，而且把乐观主义看作中国农村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力量。

1966年前，全县的粮食产量从未超过七八千万斤，无论哪一年的年产量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我们20万人民耕种着40万亩土地，亩产200斤，人均400斤。这些粮食还得提供种子、饲料和食品，销售给国家和粮食以及积累资金。如果一个人除去所有必需的粮食，每年就只剩下200斤了。由于粮食产量低，卖给国家的粮食很少。1966年

仅达到700万斤。实际上我们那年卖了1400万斤，但是为了帮助人们过到第二年收获季节，不得不向国家返还要回700万斤。1967年，情况开始改变了。1967年，我们成立了新的革委会，制定了改变全县落后面貌的计划，开始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工作。1967年以后，生产逐年上升，而且是直线上升的。从1966年的全县亩产200斤到1971年亩产650斤。你一作比较，就能看到这说明了什么。

到1970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2亿斤，即人均千斤。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四年中发生的。我们可向国家交售5200万斤粮食。每年卖的粮食都在增加，人均口粮也随之上升，现在每人消费530斤。1966年只有大寨大队给国家制作粉条，现在全县有三百多家粉坊，消耗1200多万斤粮食。我们把所有的粉条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发展工业。这是按标准交给国家粮食以外，额外的东西。1966年前，我们总是扣留粮食定额的5%，来加工这些粉条，但是现在我们不扣留一斤一两，我们用各大队的额外粮食制作粉条。这个数字比我们过去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得多，多好几倍。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我们的盘余粮食在增加，我们的消费也在增加，都是由于我们的产量增加了。只有产量增加了，我们才能说，我们确实支援了城市，支援了新兴工业，支援了国防和世界革命。

今年如果没有严重灾害的话，我们应该收2.6万斤，人均1300斤。我们将把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卖给国家，人均400斤，总计8000万斤，相当于1966年我们县的总产量。即使卖这么多粮，每人仍剩余900斤。就是他们吃600斤，还有300斤粮食。我们能命令每个农民吃600斤吗？无论如何要把600斤吃完吗？几乎不可能。说实在的，没人能吃完600斤，甚至500斤也吃不了。只是因为他们家庭有剩余粮食，就应该让人们去自由市场出卖吗？不行，我们应该教育人民积存粮食，我们粮食很多，就应该多积存一点。我们会命令大家把600斤带回家去。他们吃不完，就必须积存起来，把粮食保存在自己家里。我们大寨这里不太会背毛主席语录，但粮食实实在在的在人们家里积存着。

在斗争过程中，人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私自利的个人观念。如果你只是空谈毛主席路线那么好，但是农民没粮存，没钱花，你什么事情也证明不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非常尖锐，路线斗争到处都很尖锐。凡是那些信口开河，高喊无限忠于而不肯苦干的人，其实并不那

么忠诚。

矛盾总会产生的，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县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之间的矛盾。先进单位往往变得更先进，而一些一般单位却遇到困难找不到出路。

一个解决办法是把小集体合并成大集体。但是干得不好的落后单位觉得他们应该走相反的路：试试搞小型组织。他们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差距太大，发展不平衡。他们想前进，但是又有忧虑，害怕其他人走得太快，他们落后得太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提出新想法，制定新计划。我们在考虑利用高级组织机构解决问题；我们还考虑如何帮助落后单位赶上先进单位，让全县平衡发展。我们也在考虑把增加集体储备作为基本投资的手段，但是有人说，集体储备过多，违背“六十条”。

我们正在县、公社和大队试验成为专业队，1968~1969年这种专业队非常流行。现在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专业队，因此有人说，我们在刮“共产风”。这种谣言在山西流传很广，但是这的确不能叫做“共产风”。我们已经经历过那种东西了，除了虚报浮夸外，共产风还包括把个人财产无偿转给集体，或从低级形式的集体单位无偿转给高级形式的集体单位。正如养猪的情况一样。首先把猪转移给公社，然后转调饲料，首先要求大队劳力修公社猪圈，然后占用大队土地修猪圈。

由于我们成立了专业队，人们就说“共产风”又刮起来了，但是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

专业队集中劳力是为了搞土地基本建设，修水坝、建水库。各地大队提供一些东西，当年就可马上见效。他们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生产力，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平二调”。这些专业队不是转调财富，而是在创造新的财富。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是从基层单位派到大队、公社甚至县属工程的人员组成的。现在在河边县农场干活的专业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都参加了。

1976年，我试着把某些大队10%的劳力分配给集体工程。我们不知道这种分配会对大队本身的生产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不敢大规模的这样做，只是动用了几个大队的人力，效果不仅不坏，而且大队的产量也提高了。他们减少了10%的劳力，却干得更加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把人力转调入专业队呢？我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山沟、



河流。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安排好呢？如果你真正想把他们安排好，就必须找到一种可以作为样板的可行的办法。当我们抽调大队劳力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剩下的90%的劳力比以前更加苦干实干，工作做得更好了。大队劳力多时，他们认为劳力没问题，时间充分，劳力充足，但是我们一调出一些劳力，大队领导就警惕起来了，他们不再感到信心十足了。劳力缺乏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尽管10%没有多大意思，但是这一抽调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一减少劳力，大家就都警觉起来了！大家都开始问：“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才能动员普通群众呢？怎么才能发展新技术呢？”干部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了。人们每年出勤天数也增多了。

首先，我选定两个可以淤滩造地的点，一个点在风竹，是个公社工程；一个在界都河，是个县级项目。这两个试点工程不久顺利竣工了。人们看到用这样短的时间集中劳力完成了这样大的工程，他们承认了专业队的优点。我们抽调的劳力越多，他们在家干的越欢，产量也就越高了，从而推动了全年的生产，因此这两个工程为全县树立了榜样。

我们在界都河修了一座很长的拦河坝，造地3000亩。我们在风竹淤滩造地1000亩。一年时间内，我们在修筑拦洪坝、水坝、垫土，并收割庄稼，在全县分配的劳力的帮助下，界都河收了40多万斤粮食。风竹动用全公社劳力，收了14万斤。

我们总结了经验，并组织参观学习了这些地方，然后，我们要大队讨论劳力短缺的问题。于是，这两个样板的经验传开了。全县人民开始了重新安排改造河山的工程。如果人们仅数数河滩的水坝、拦洪坝，就知道我们修了200万立方米的石方工程，填土造地5万亩。单从这些新造的地上，今年我们就能收大约3000万斤粮食。我只计算了已经种上庄稼的土地，还有更多的土地正在修造，还没有填造好或没有下种。

但是，像这样的工程，能堵住批评者的嘴吗？

没有。1968年和1970年，一些人仍然设法诽谤我们又刮起了“共产风”。从许多地方来参观的人都说，他们听到了这种说法。就我们而言，我们下定决心坚持我们的计划，顶住这种诽谤。但是，尽管我们站稳了立场，我们也确实不能放松警惕。迟早这些说法一定会传到

中央的。我觉得，如果中央领导同志能来这儿看看就更好了。如果我们做错了，可以纠正，如果我们做对了，可以进一步得到肯定。去年，几位中央委员终于来了。他们对看到的事情很高兴。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组织的是“专业队”。

中央委员们说：“你们有了‘专业队’。没有他们，大建设项目是搞不成的。”

我们感到有党中央的全力支持，于是站稳了立场。我们不相信那种“共产风”的说法，如果分不清什么是“共产风”，什么是“一平二调”，什么是稳步发展生产力，我们就不能搞这样的大工程。

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是县从公社，公社反过来又从大队无偿调拨物资。他们把财力雄厚地方的财产，调拨去填补财力贫乏的地方，这是把繁荣地方的财产转移给贫穷落后的地方，这决不能增加任何财富，而只是重新分配已经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坏典型，不敢从下面调拨劳力，你就无法大于任何大型工程。那些指责我们刮“共产风”的人是不现实的。如果那是我们干的事情，我们的产量怎么能提高得这样快，而且更快呢？那些不敢集中劳力的人，只是把人力压了起来，他们害怕解放生产力。

大寨人生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随着思想转变，土地改良了，产量也就变了。如果你要增产，你就得解放思想，改造土地，提高产量，你不能只坐在那儿吃老本。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集体不敢搞任何工程，不敢改造山河，改造土地，怎么能谈到集体的力量呢？这就正好像大集体单位搞单干一样，去搞小农经济。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吃老本、搞单干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必须树立起体现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典型来。

当这种做法受到攻击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想干的事我们就是要干。后来，压力很大，我们心烦意乱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干我们想干的事。他们越是攻击，我们就越批判。我们批判谁呢？刘少奇。我们把这一切叫作“刘少奇的流毒”。这使那些人非常气恼，所以我们到底还是取胜了。我们赢得了新阵线，制止了错误的东西。

现在我们打算修建 800 个水库。以前我们打算由县和公社干大部

分工程，现在大队就能完成。400个大队每个大队修两座水库，还包大、中、小型水库，但是甚至大型水库，也没河流上的重点水库大。至于大寨村山上的蓄水池，那不是水库，只是一个池塘，即水坑，我们叫它蓄水池。

我们开始搞这些开发工程时，我们就从哪儿着手发生了争吵。应该选在河滩上造地，还是应先修水库蓄水呢？

我们根据一切行动首先要符合老百姓心愿的老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必须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造地。我们在每个河滩上都造一些新地，当庄稼长出来时，大家看见都感到心满意足，只有一个忧虑，洪水会把一切冲跑吗？他们不得不为此而担忧。人人都开始谈论洪水的问题了，这是县领导激起的话题。他们宣传开了这样的看法，新造地迟早是一定会被河水冲掉的。结果，建水库的要求从下面提出来了。所以现在到处都在修水库，而且修得又快又好。

当群众的热情激发起来时，我们帮助制定了修水库计划。起初，大部分都是县级或公社一级的工程，我们要求各大队都出人出力，但是很快大队就把工程接管过来了。现在他们在自己修水库。如果人们看不到河滩上的好地，他们是不会懂得修水库的重要性的。

这一切都有助于证明，要解决次要矛盾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一造地人们就开始担心洪水了，如果没有地要保护，你叫群众去堵水建工程，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你就无法动员他们。

怎样给专业队报酬呢？他们主要靠自己在大队挣工分，因此大队就为工程提供了资金。我们给各大队分派改造工程的劳力时，附近大队多出人力，而远的大队少出人力，如果离得更远的大队则不在本队挣工分，而从县里挣工分，从公共税收资金中付给他们报酬。

实际上，我们用这种办法为界都河工程筹集了资金。那些离家在这项工程中参加劳动的人，第一年在自己所在大队挣工分，当这项工程开始产生效益时，就由县里偿还大队的支出。

直到现在，县农场的工人仍然算各自所在的大队的社员，在家里挣工分。但是当农场得到巩固后，可以把他们转调到农场当工人，中断他们和所在大队的关系。然后，他们会根据相互评议来确定各自的工分。他们的工资从农场收入中支付。数目不再按通常大队分配方法，

根据收入的比例来分配。但是，他们会得到比全县平均工资高的收入。如果按农场收入比例分成，他们的工资就会过高。

通过搞公社一级的工程，解决了公社积累资金的问题，尽管经常要求大队提留2%~3%的收入，归入公社积累资金，但是从来没有人上交过。大队从来都不愿意把钱交给公社。另一方面，他们倒是愿意分派些劳力。他们派出劳力，就不再欠钱了。有了劳力，公社就可以发展生产力，淤滩造地，开办牧场等等，因此公社就有了收入来源。

尽管公社是很久以前成立的，但是只要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公社所发挥的作用就不明显。现在公社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社饲养家畜，种庄稼，既有粪肥，又有收入，就可以帮助贫穷大队了。这不能叫做“共产风”，贫穷和受灾的大队可以享用公社财富，这的确是一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形式。即使这样，穷队也不是享用其他大队辛苦劳动的财富，而是公社自己的集体财富，是他们自己帮助创造的财富。

这些事情必须进行恰当分析，不能把所有的共同分享与共产风混为一谈，现在无论这些贫穷大队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需要钱，他们就可得到钱，需要粮食，他们就能得到粮食，需要耕畜，就可得到耕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援助和国家救济非常相似，但是这样做不需要国家负担。当一个公社能这样救济其他成员时，所有社员都会感到公社好。

当然，公社帮助一个穷队时，要设法利用生产资料，而不仅仅靠救济。这样，公社可以帮助大队把生产搞起来，而不是只给大队社员吃的、穿的

我在这一点的想法是抓公社一级。当一个公社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时，就能帮助落后生产队缩小他们和先进队之间的差距。在某个时候所有的大队可以在公社一级合并起来，而不把较富裕的生产队拖垮。通过帮助穷队前进，公社为向公社所有制和公社核算过渡铺平了道路。如果我们都这样在公社一级进行合并，富裕大队是不会反对的。

可是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该何时和如何实行公社所有制，人们会开始抱怨你刮“共产风”，要穷队分享富队的财富。因此即使你脑子里有个好计划，还是别说为好。

我们大寨公社(大寨所在地)已经有钱买机器了。我们不需要国家和大队的钱,我们已经创造了这种物质基础。但是核算仍然是按大队进行,甚至保持大队核算,我们都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全国都在学大寨。当人们知道,我们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时,他们也会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如果一个集体不创造适当条件,就过渡到大队核算,最终会搞得一团糟。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进行小队的合作生产,更不用提生产队核算了。因此当我们采取这样的步骤时,不得不偷偷干。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我们山区大队规模小的事实,大部分大队还不到一百户。如果这些大队分成生产队,是不可能完成我们现在这些工程的。我们大队的规模确实相当于河北平原上的一个生产队。

我们还为自留地和个人开小块地问题展开了争论。

我们大寨不需要自留地。维持生活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集体地里种植。我们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所有的人,所以取消自留地是毫无疑问的。

1963年,洪水冲走了集体的大块土地,更不用提自留地了。为了恢复生产,我们必须先修好集体用地,先修自留地是会犯错误的。在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集体生产后,一切就开始好转了。所以我们说:“咱们修自留地吧。”可是那时社员们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渡过了灾难,克服了这样的艰难困苦和饥荒,全凭的是集体力量。如果依赖个人自私自利思想,我们怎么能经得住考验呢?”

社员把自留地等同于自私自利思想、个人主义,既然山地沟地、大块小块地的庄稼都长得好,我们就决定取消自留地,如果你现在在这几分自留地,社员是不会要的。

参观的人们看到我们所有土地的庄稼都长得一样好,感到吃惊。“在我们家里,”他们说:“自留地里的庄稼看上去长得好。”有些人回去后就收了自留地,想用这种办法让所有的地长出最好的庄稼,但是他们这样做,结果集体地里的庄稼比以前还要糟。阶级敌人立即大肆散布:

“我不学大寨,学大寨是灾难,越学越糟!”

问题是这些参观的人只看到了我们大队的表面,没有看到实质,因此自己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我们是物质条件成熟后,社员不愿意要了,才放弃了自留地。可是当其他地方的群众仍然需要自留地,甚至

还想要大块的地时，他们却把自留地没收了。因为条件不成熟，社员的政治觉悟不够高，集体生产也就搞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取消自留地，社员还觉得自留地不够大哩。

因此，现在我们不谈进行大队核算，或取消自留地。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只能挨批。我们只是说，我们大队和其他地方的小队大小差不多，我们不能再分成更小的单位了，因为那样做行不通。

昔阳普遍进行大队核算吗？我们只说有好多单位是这样做的。重要的事情是集体意识传播开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集体富裕了，大队、小队、家庭和个人就都富裕了。

实际上我们碰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生产发展得很快，劳力缺乏了。我们把山地和羊群交给了公社。我们无法自己把一切都管理起来。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机械化，由于公社已经积蓄资金，与其等大队的机器还不如让公社先走一步购买机器。一台大型拖拉机，一台大型脱粒机就可以干好几个大队的活儿。

水涨船高。由于生产逐年提高，收入也年年增加。现在全公社每个劳动日值一块钱，等到一个工达到三块钱时，消费品可能就要短缺了。人们会排队一直排到太原。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收入分给社员们，却和不太先进的单位搞平均，那不又是搞“一平二调”了吗？那不又是“共产风”了吗？那不是我们自己刮起“共产风”来了吗？

大寨大队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每个劳动日一块五毛钱的水平。人们没有发牢骚抱怨这个固定工分值，因为我们的积累资金剧增了。他们知道我们在筹集资金，积累经验，向公社核算单位过渡，等所有的劳动日都值一块五，而不是五毛或甚至一块时，就可以实际公社核算了。

我们可以一个劳动日给大寨社员分三块钱，但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过渡到公社核算单位，因为我们领先得太多了。在公社的帮助下，落后大队现在平均一块钱。等他们达到我们的水平，平均一块五，进行公社核算的条件就成熟了。

一旦我们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能重新制定整个生产计划了。我们就可以在该种树的地方种树，在最适宜种庄稼的地里种庄稼。我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机器，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现在公社已沿河滩造地 300 亩，总数可达到 3000 亩，可以全部连

成一片，你这一块新地就等于三个大寨大队。公社能应付得了吗？可能我们大寨人得拔出几个人去那儿种树，其他人下河滩去平原种。光靠我们大队无法管理所有的新造地，公社也照管不好。我们可能得和其他大队联合起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共同管理一切东西。如果有人这样说做错了，应该重新分开，让他们解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共享繁荣，我们的财产太多了，必须共同享用，这和共同受穷不一样。

这一切产生了种种问题。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们必须跨入更高级的组织，我们被迫通过发展生产来这样做，但是社会上就全国的形势而言，条件还不成熟。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实行县级所有制（一种全民所有制的形式——承认全体人民的财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就蕴含这种想法的萌芽。当这种想法实现后，我就成了包含全县的大农场的头头了。

到那时山上长满了树木，沟沟长满了粮食，通过开山修建水库，为造平原准备条件，通过人造平原为实现机械化准备条件。

几年后你回来，我们不仅让你看庄稼，而且要看水库。昔阳会看起来像江南一样。我们不仅不必南粮北调，而且我们还要在北方造出南方式的良田来。南方气候可以一年两三熟，加起来每亩达到800斤。当然那儿也有大队亩产1000多斤的，但是不多，甚至达到800斤标准的产量也不多，就像北方一样达到400斤的也不太多。

如果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们一季收成就可以收他们三季的收成。他们那儿劳力缺乏，一年收三季人手非常紧张。他们得挤时间下种、锄草。我们只收一季，节省一半劳力还多，所以我们有人力搞新的基本建设。他们能种水稻，我们也能种，他们有地下水、水池、水井。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山上修水池；南方山上长满树木，我们也能种树、伐木、收果子。如果我们不发展林业，就无法赶上去。

“文革”前，我总想去南方亲自看看。我们的产量跨过了长江（亩产800斤），但是我们自己从没有过长江，看看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文革”期间我仍然无法去。今年我终于去一趟。我看了南方，有了新的想法。我还得知南方有它自己的缺点，我是冬天去那儿的，白天不是大雾就是阴天，阳光很少，他们说夏天情况更糟。我心中暗想，至少我们那儿有阳光。一旦我们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们生产的粮食比他们不会少，因为我们这儿阳光充足。我回想起毛主席和他

的改变南粮北运的号召，使北方不再依靠南方的粮食。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干革命。不搞革命什么也干不成。

八十四 学大寨

由于张庄陷入派性冲突中，粮食产量无法超过 300 斤的水平。至于大规模基本建设，专业队，公社核算，或把北方变为江南之类问题，如果不是不着边际的话，似乎也是条件不够成熟。然而，大寨是在比张庄还差的条件起步的，而且大寨农民完成大部分工作用的是双手加炸药。的确那儿有些经验值得张庄人沉思。无论如何，党的领导人鼓励张庄人学大寨，所以他们开始进行那项工作了。

学大寨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大寨参观。去大寨路途并不遥远，乘汽车越过一些巍峨的石灰岩大山，只用一天时间就到了。1969 年，公社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给张庄留下了 10 个名额。

由于有 11 个人渴望去大寨，党支部书记李快腿就主动让一位小队队长去了。他并不是不想学大寨，他是想把第一次机会让给别人，但是后来批评者攻击李快腿逃避参观，说他不喜大寨，有机会也拒绝去参观。

秦快嘴去参观了大寨，但是后来有人批评张庄方法时，秦反驳：“只要能多打粮食，大寨路、张庄的路就是好路！”

人们利用这种言论攻击他，把它当作对抗公社、市、地区、省以至对中央的证据。可是他们从没有把这些说法的原委搞清楚，可能秦的话还没有王文则关于去见毛主席的话更具破坏性：“即使你们能去北京，如果不在地里苦干实干，张庄的庄稼也长不好。”

不过，去大寨和取回真经是两码事。参观模范集体，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宣传模范农民和劳动英雄形成的一种习惯。短短数年，就有数以千万计远近各异的人们去参观过著名的生产和创造的光辉典范。参观大寨往往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但一无所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即使一个人被他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打动，但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所在大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人也曾就此写过一个顺口溜：看看激动，听着感动，回家不动。

我们在张庄听到当地一个农民参观红旗渠的故事。他被看到的情景感动得简直等不及回家了。“我们修的那条小渠微不足道，比用脚指头在地上挖个小槽强不了多少。等着看吧，我们会完成大工程的！”

可是在归途中，家务事开始挤进他的脑子里。他回家一开门，发现他妻子在朝着孩子们大声嚷，原来孩子们和往常一样互相对着喊叫。面对现实，修渠的宏图大略，顿时烟消云散了，他再也没有搞过什么大工程。

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人们在另一首顺口溜中作了总结：会上全心全意，路上半心半意，到家忘得一干二净——无心无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先进大队往往太先进，落后者无法迎头赶上。要一大步赶上显然不可能，小步前进根本不可信，因此很快就畏缩不前了。人们所需要的是长远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计划来提高生产水平，即具体措施，扎扎实实地工作。通过召开群众大会，高喊激动人心的口号，进行个人动员来制造一种热烈气氛是应该有帮助的，但是这样的动员往往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成效。于是热情很快烟消云散了，这样组织者要再次鼓动群众就难多了。

这正是张庄人去大寨参观时发生的事情。大寨小队早上既不需要摇铃叫人们起来，也不用挨门挨户去敲门。人们就自己主动下地劳动了，而且不需要别人监督。大寨的庄稼一片墨绿色，反映了他们的土地肥沃，管理精心。他们把高昂的士气，茁壮的庄稼归功于分制度。这种制度是全大队社员采用会议自报形式，每年互评一次，然后根据出勤记录，相互确定各自的工分。这种工分不变，不需要任何记录，只要出勤就行。

然而，张庄人设法试用这种工分制时却失败了。张庄人互不信任，彼此不讲真话，他们自报工分是本着争取朋友，影响他人，避免激怒别人的精神，他们的会议也由于同样的缺点而失败，总体结果是，他们平均了工分，消除了正常的差异。这样，迫使一些挣工分永远比他们应该挣得多的人处于守势，而又迫使那些挣工分总比应该挣得少的那些人，处于攻势。最后大家都半饥半饱，粮食减产了。

如一个农民总结说：“大寨绿油油的庄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能懂得这是因为人们的心是红的。大寨是政治挂帅，我们这儿常常是工分挂帅。”

第二次参观大寨后，张庄农民带回了改善住房条件的决心。大寨人为大家都修了坚固的石窑，预计能用两千年。张庄人倒不致于如此生搬硬套，为自己修建窑洞，毕竟他们不是住在黄土山沟里。他们决定修盖许多新房子，尤其是给新婚的青年一代。他们盖的这些房子比旧房子高大宽敞而又漂亮。新房子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因为这种做法并不是增加生产，使张庄更加繁荣兴盛。

大寨的口号是：先治坡，后修窝。

而张庄人盖了几十幢新房子，土地却没有改进，产量也没有提高。实际上新房子减少了生产量，因为房子占用了大队周围上好的耕地。

参观大寨容易，赶超大寨难。去参观虎头山上七沟八岭的人们，几乎总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当他们回到村里应用时，结果往往走向极端。没有大寨大队社员高度的团结和政治觉悟，而效仿大寨工分制，几乎总是导致极“左”的“平均主义”、“按劳取酬”原则的分配制度，走上极端平均主义的方向，不是“按劳”而是“按需”分配。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因为漂亮住宅而感动，回到家仿效大寨大量投资建设住宅，这就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这是在生产不能维持，不能保证这样消费的条件下，过早强调消费。哪里的产量仍然很低，哪里集体的人力物力就必须集中于提高产量，解放农业生产力。把资金转入住宅建设，只能使生产永远停滞不前。

大寨的主要经验，可能就是首先集中精力发展农业生产，把副业放在次要地位。但是甚至这个显而易见的经验，张庄的参观者都没有学好。并不是张庄领导没有在口头上讲清楚，人人都很清楚，加强农业是首要任务，农业以粮为纲，但是在实践中，大队最大的精力，大部分创造精神和最强的劳力几乎总是放在副业上。无论人们是不是重视副业，副业发展了。那是因为搞副业总比下地劳动得到报酬更加直接而可观。中央的方针把从事副业的劳力限制在总数 15% 以内，而张庄有时竟有 40% 的劳力从事副业。

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张庄都不再是偏僻的乡村了，而是座落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中心的一个郊区村庄，公路、铁路、机务段、水泥厂、铁三局工人正在建设的东西方向的长邯铁路线、太行锯条厂、往北三华里的长北站的综合企业，这些都标志着都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交通网，狂热的建设速度，都需要技工和非技工劳动力。

此外还需要各种产品，尤其是附近大队可以轻而易举提供建筑材料。比方说，砖的需求量很大。上党平原的土壤非常适合制砖，烧砖用煤又便宜，因此几乎每个大队都建起一两个砖窑。这些砖窑既提供家用砖，也为四面八方的工业建设大规模供应砖。

张庄砖窑一年到头雇用10~12个人。更多的人外出赶平车搞运输，这个队可以召集20辆平车。他们包工拉货，只要能拉得动，就什么也拉，往水泥厂拉石子儿，从水泥厂拉水泥，在长治北站来回拉货，如：煤、生铁、钢条、钢筋、砖、许许多多的砖瓦以及其他产品。一个备有骡拉大车的小组，3个骡子一套，长途运送类似的货物，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装卸小组在长北卸货，按装卸吨数计酬。其他人员短期包工干各种各样的工业方面的工作。同事们去长钢截钢条，去轧钢厂切钢筋。

包工最挣钱，1970年民兵林耀龙带领5个人去长钢用焊枪切钢筋，他们干了3个月，六个人挣了7041.75元，电石气费用1311.85元，交给大队3538.9元，每人各分181个劳动日（工作一天挣一个劳动日），然后他们平均分成了2191元，每人分365.17元，整风运动期间，批评者指控他牟取暴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上述工程都属于大队副业范围之内，参加者集体参加劳动。他们可以上交现金记工人或每天交一定数目的现金，剩余的钱个人分配，当林耀龙去长钢时，他结合了这两种方法。

张庄的其他人出外，当所谓的“临时工”，不是以小组为单位，而是个人单干。雇佣他们的厂家把工资付给大队，他们在自己所在大队记工分。大队为附近工厂提供合同工，他们的工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临时工”，而是相当的“长期工”合同有效期长达两三年。这些工人叫作“临时工”，是为了把他们和正式的工人区分开。正式工人有被称作“长期”的资格，享有正式雇员全部权利，特权及附加津贴，临时工没有什么权利和特权，没有附加津贴，因为他们不属于所在的工厂，而是属于他们来自的大队，这就是说，市里把他们划为合作社的居民，而不是工厂工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粮食供应，在工厂诊疗所没有免费卫生保健，没有送子女上工厂学校的权利，他们注册是村民，他们根据所挣工分在当地领粮食，他们支一小笔合作医疗费，把孩子们送到乡村学校，无论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去找当地大队

领导而不是去找厂方。工厂对他们的福利事业不负责任。作为工人，他们是二等公民，但从大队观点看，他们是可靠的稳定的现金收入来源。其他农民是个人搞副业和私人企业。有几户仍然在家织布，通常是在空余时间织布，然后零卖出去。秦中义继续开办一个修理铺，生意兴隆，最终他拥有了自己的焊接设备，开始生产手推车并远销邯郸等地。王老太的儿子王任保单枪匹马在公路旁搭起一个自行车修理铺，生意非常红火。当大队再不能忽视这些“生意”时，作为让步，大队把他们合并入综合合作组织。于是秦和王每天向大队交好多钱作为特许费，超过这个数目归他们自己所有。

当社员把各种各样的非农业活动工作加在一起，这些项目经常吸收多达大队全体劳力的40%。由于中央发布的“六十条”提出的最高限额是15%，张庄显然不符合“六十条”精神，而这还是仅仅计算了合法从事副业和工业的人数。各种各样的其他买卖投机倒把，和委托经济活动发展起来了，如果不是明显的非法行为，那么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已经描述过郑八字脚的红薯生意，还有许多其他人。林耀龙多年来在太行山收购银元，然后远销开封甚至上海。小申通过努力成为合法的副业队长后，进行各种各样的私人交易，为他赢得了经纪人的资格。这样流入张庄大队的收入总数是没法计算的。因为这种收入全部是私人的，是未经申报的。

根据合法副业收入约为总收入的45%。副业收入在张庄大队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它的规模不成比例，因为它代表一笔稳定的现金收入，可以用在如种子、化肥、杀虫剂之类生产开支上，因此就保证了主要农作物稳产丰收，同时，在一年一度的秋季交易会 and 逢年过节之类重要事件前，大队有现金给社员们分发，最重要的是这一大笔现金收入，使大队能给社员每个劳动日分配近一元钱。这个收入水平并不比本地区工人的收入低多少，从而使张庄成为吸引外地人安家落户的好地方。如果单靠农业收入，张庄一个劳动日只能值五六角钱，这就大致相当于偏僻乡村许多农民种庄稼获得的收入。大部分人以为这样的收入低得太可怜了。

显然尽管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但是副业却使张庄兴盛富裕。不用开展任何运动，副业就自行发展壮大，而为发展农业所开展的各种运动反而收效甚微，因为副业吸引了那么多的精兵强将，张庄又没有

多少人力、精力去搞农业生产了。

60年代张庄农业停滞不前，但如果过多地责怪副业，那就错了。尽管搞副业转移了农业上的劳力，但是还存在许多其他问题，既有技术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使得在农业收入水平很难提高。

从技术上讲，大岗、二岗、小山下周围的土质问题最大。上党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是由数百万年前沉积在巨大的山西湖盆的粘土构成的。张庄附近山岭底部的粘土泥泞而含碱量大，特别难以耕种。夏季水分大量蒸发，产量比附近任何土地都低，而且更容易遭受碱害。此外，没人懂得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张庄面临的粘土难题比大寨要更加复杂、顽固，大寨丰富的黄土，有些地方厚达10米，覆盖着虎头山。由于多年来剧烈的洪水的严重侵蚀，丰厚的黄土已被冲击成犬牙交错的深沟尖岭，数千万吨黄土被水冲走。同时，剩下来的黄土，无论是表土，还是一直深入到岩床的土壤，都特别肥沃。如果任何人把黄土覆盖在地上，黄土全部是肥沃的，或很快可以成为肥田沃土。因此从一开始大寨人的任务就很清楚，他们必须平整土地，修坝筑堰，然后用水灌溉这新造的田地。如果他们这样做，就能轻而易举地逐年提高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成为全中国的榜样。

但是张庄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大部分土地是一片平坦，平展展的土地从张村前向四面八方延伸，一望无际，只有南面的土地缓缓升起，逐渐和大岗山和二岗山的山坡融为一体。“土地平，水位浅，出门五里见不到山。”唔，那么张庄的产量怎么超不过大寨呢？

答案是明确的，土质黏、渗水性差、春天易遭盐碱害，他们称作“秋发地”。

公社、长治市、地区和省农工部等上级单位的建议都是灌溉。毛主席不是把灌溉水利称为农业的命脉吗？灌溉不是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加倍提高产量吗？上级干部鼓励张庄农民灌溉，灌溉，接着还是灌溉。1958年“大跃进”以后，农民们修好了漳泽水库，灌溉突然变成了现实，茫茫无际的一片大水，在西行几里的地方，绵延数十里长、三里宽。地区筹集资金在这座人工湖上修了抽水站，唯一需要的就是修一条干渠，把水引向东边张庄的地里。通过和其他附近大队的协作奋战，1965年张庄就修好了这条干渠。数千人一共花了几周时间，挖

通了一条由黏质土上穿过，一直通到公路上的渠道。当地农民仍需要做的就是修筑渠道，把水引向各生产队地里田间，再把地一块一块平整好，以便进行灌溉。

当张庄又开始这项工作时，结果发现问题比原来出现的要复杂一些。主干渠里水渠太低，流不进张庄的地里，必须修建一座二级抽水站，第二次提高水位。由于最好的土地位于铁路的东边，大队领导决定首先在东边修抽水站。他们订购了水泵、管道修建了抽水站，修了1000多米的二级渠道。张庄又为灌溉系统投资约6000元，两万个劳动日，预计能灌溉东面约1800多亩土地。

但是这项工程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市里派的工程师犯了一个测量上的错误。当水泵最终投入使用后，却无法把足够的水抽到足够的高度，只能浇一小部分土地。在庄稼生长高峰期最需要水的时候，为干旱困扰的晋东南地区和水库的水位下降到一级抽水站的进水口以下。正当进入关键时期，水泵没水了。当水库的水位恢复后，其他村就把水用光了，总之，剩给张庄的水所剩无几，或干脆一点也没有。就是水流到地里的效果也很不理想。灌溉使土地形成了泥浆，当太阳把地晒干后，又深又宽的裂缝使地表形成了一个立方块，结果把试图伸根的小植物的根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着季节的逐渐过去，灌溉过的土地含碱度升高了，白花花的盐晶粒遍布整个地表层，损害或杀死了勉强幸存的少数植物，接着，还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市里就决定把有缺陷的灌区正中划给太行锯条厂。新锯条厂使整个工程全部报废，抽水站和全部水渠不得不被废弃。锯条厂为拆除抽水站和把水泵移到另一侧付了费用，但是没有为修筑其余水渠全部用工付款。仅仅几天时间，张庄又失去两万个劳动日，数百亩土地，和两千亩可灌溉的土地。

在张庄黏质土上兴修水利的效果令人怀疑，因此丧失了土地的村民也容易忍受。如果这个灌溉系统设施合理，确实起作用，如果事实上水使粮食产量加倍提高了，在铁路东部修建锯条厂对张庄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了。而事实是整个工程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次出师不利的试验，至少锯条厂给张庄积攒粪肥，而粪肥对提高产量比水的用处大。粪肥并非鸡毛蒜皮小事。太行锯条厂计划招收约5000工人，连上他们的家属，这个新厂会成为一个一万多人的单位，是张庄人

口的5倍。由于这么多人，积存的大部分粪肥必定会使张庄受益匪浅。

铁道东的灌区和抽水站的惨败，对公社或市级领导却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他们仍然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并鼓励张庄大队尽快进行灌溉。每年冬天鼓励兴修水利，在村里的议事日程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春天达到高潮。在这过程中，全村动员起来，打新井修新渠，严整土地，以使来年收获季节灌区扩大一两倍或普遍进行灌溉。目标的规模随着负责干部头脑的欣然程度而起伏不定。

每年收成都达不到原订计划，原因很简单，只要含盐度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不相信灌溉。口头上他们从未反对过灌溉计划（谁愿意反驳毛主席的教导呢？），他们只是远而避之，以不苦干实干落实计划来表示不满。结果，灌溉面积如果有增长的话，也非常缓慢，张庄村变成了地市闻名的落后地方。这并不新奇，张庄历来就是老大难，此时只不过是历史又重演而已。

如果含盐度提出了一个不可解决的技术问题的话，那么土地丧失和对土地丧失的威胁，同样提出了无法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连，因为没人愿意竭尽全力，去改良无论如何会很快转让出去的土地。由于土地所有权不肯定，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法的动机往往消失了。1958年后，张庄总计丧失二千多亩土地——占全部可耕面积的2/5。这些地规划给公路、铁路、机务段、水泥厂、铁三局，最后是锯条厂。尽管市里干部不断向大家保证，他们不会再把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并明确声明，决不会再动用铁路西部的土地，农民们仍然对前途忧心忡忡，对是否真有足够的土地再满足一二年，缺乏信心。

有人预见，如果工业像过去一样继续发展，他们将会惨遭市内农民的厄运。他们无法种庄稼，只能在旧城墙内仍属于他们的小块耕地上种植蔬菜。但是，张庄人没有种菜经验，对种菜一窍不通，因此很担心。他们是庄稼汉，是种植玉米、谷子和豆类的专家，改用耕地，对传统的威胁日日夜夜烦扰着他们，这种烦扰几乎为1971年秋发生的一切打下了基础。

好几次，当我们和郭真宽下地干活儿时，他在铁路调车场中间停住脚，环顾四周，悲叹而深情地说：“这些过去都是我们的地，都是用来种粮食的，都是最好的地，最好最好的地！”

荒谬的是，在农业生产处于停滞不前的关键时刻，一种生机勃勃

的，同总趋势相反的领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蔬菜生产，长北站地区非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使新鲜蔬菜需求量大增。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市政府指示张庄把种粮食的地转入蔬菜生产。为了保证张庄服从，市政府取消了他们一些公粮定额，而用蔬菜来取而代之。尽管社员对经营商品菜园知之甚少，但张庄农民只得服从城市的需要。这样做，他们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由于他们土地占有面积在不断减少，他们不得不加强农业生产，把劳力集中在剩余的土地上。新居民区积存的大量粪肥，使得加强生产、集中劳力，既切实可行，又有利可图。由于蔬菜价格不固定，而是随着供求关系和季节变化而上下浮动，如果种植者管理有方，提前或者推后种植，就可卖个好价钱，有合理的市场浮动价，这对提供淡季蔬菜是一种刺激，这样可以从中获得额外收入。

面对这种压力和刺激，张庄每个生产队都抽出36亩地种蔬菜，种菜又把灌溉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如果不定期满足供水，就无法保证蔬菜生产。这样就又重新提出了张庄进行灌溉的实用性，和供水的可行性，以及水对盐碱地造成损害的问题。

实践证明，张庄人不能依赖水库进行灌溉，所以必须打水井，在周围修筑菜园。由于修了水库，水位升高了好几米，现在一般季节，水位就在地表下几米的地方。农民们学会了修造大口径，而深度不超过6~10米的水井，装上水泵就能灌溉十几亩地，这样他们解决了水源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盐碱的问题，张庄人逐渐发现，在精耕细作的园地里，盐碱度就降低，并在几年内全部消失。这与大量施用人粪尿和持续不断用“卫生肥”有关系。“卫生肥”主要是由煤渣、打扫的垃圾构成的。而且和经常用人力精心耕作土壤有关。当太阳把地晒裂缝后，锄地可以消除裂缝，每当需要时，可以在小面积菜园里锄地，过一两年后，地就不再会被晒裂了。

显然，种菜为张庄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由于有稳定的市场，有不断增加的自然肥料，地面几米之下，垂手可得的水源，以及苦干就能改良的土壤，把越来越多的地转入蔬菜生产是不可避免的。进行这样的精耕细作，没有出现劳力不足的问题，除了人口自然增长提供的新劳动力外，电力、电力设备把劳力从日常琐事中解放了出来。

粮食加工、饲草切割、抽水都用上了机器，一旦人们需要，就可以拿到现场去。

60年代末70年代初，蔬菜生产上的突破，并没有改变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某个时期，大队虽然拥有了1000多亩耕地时，只有180亩种蔬菜；某个时期强劳力有1000多人，种菜只雇用不到60人，而且这种雇用还是季节性的。人们指望前途光明的副业——蔬菜经营能从整体上得到发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盐碱地产量低、令人悲观的局面。除了小规模改良土壤外，迄今为止，尚无人找到改良盐碱地的方法。

没有人把大寨经验用于张庄的问题，或将它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就是说，如何发动张庄人民改造大自然，使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能充分发掘周围环境的潜力。上级扩大灌溉面积的总体方案已经明确证明是不适用的，但是，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其他任何替代方案，“谁应掌权”，“为什么掌权”之类的政权问题，占据了重要议事日程，而且仍然吸引着各级领导的全部注意力。

尽管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仍旧是富有战斗精神，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往往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即倾向走个人主义。因为没有明白的领导，没有真正的团结，而且也没有一致意见，鼓舞集体共同努力。

八十五 “六六六” 污染稀饭

尽管，和平解决晋东南地区争端方法片面而不完美，但一旦部队强制实现和平，各级政府部门都迅速恢复了运转。史昭盛恢复马厂公社书记的职务后，就决定集中精力，解决由于“文革”冲突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这一尝试，立即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张庄村，这个自1948年土改以来就是著名的“老、大、难”单位，只要详细查阅粮食产量一项，就不难知道张庄处于困境之中，因为那时，马厂亩产近400多斤，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华北地区标准，而张庄亩产只有300斤，甚至更少。史昭盛得出结论，张庄大队需要特殊帮助。为了推进张庄的工作，他拼凑一个以他为首的四人工作组，于1970年6月8日动身前往张庄村。

马厂公社党委书记还带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长福、公社武装部长陈小关，以及治安主任申安怀，即我们1971年在张庄见到的那位治安主任。这四人煞费苦心想解决张庄问题，最终还是令人扫兴地失败了。他们无法理解村里的问题，更无从解决问题。史昭盛要考虑全公社问题，很快就撤走了。几天以后，他叫回了张长福。9月，陈小关离开张庄，带领公社代表团去大寨参观。治安主任老申，也没有心思独自呆在那儿，也与代表团一道去大寨参观了。

申从昔阳县返回来时，长治市农工部已组成了另一个张庄工作组。小组领导要求申参加。在一起研究两周后，这个称为宣传队的小组，10月突然来到这个村里。为首的称作政委，是潞安矿务局局长张广胜，13级干部（在晋东南认为是很高的级别）。市委任命申主任为宣传队长，1971年我们见过面的长治剧团团长李晋东为副队长。

宣传队一到张庄，就成立了由宣传队员和他们所信任的唯一本地人、大队主任张贵才组成的整党小组。正如申主任说，“每当考虑到家史，张贵才就不会在竞争中失败。他是贫农，他亲戚也都是贫农，可能只有他岳母例外，他是老党员，现在玉门油田工作的妹妹也是党员，他二妹和妹夫都是党员，住在枣臻村。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由‘基本群众’组成的可靠家庭。”

贵才和他的家庭一样可靠。权力使一些人腐败堕落，但腐蚀不了他。请客送礼收买不了他，为此他甚至作了首诗：

不为地富放个屁，
偷盗诈骗不沾身，
糖衣炮弹打不中，
你能管了这个村？

“每次分救济粮，即使他家有资格分一份，他也从来颗粒不拿。他确实热爱大队，总是公私分明，总是保护贫农的利益。”

但是，宣传队一表示支持张贵才，他的声望便开始下降了。群众贴出大字报，攻击他是暴君，谴责他谋害了裴小四。这本来就是熟悉张庄历史的人所预料到的。裴小四在1963年偷水泥厂的工具和铁件，后来发现死在水井里的。在张庄似乎总会这样，不管谁掌了权，迟早会被指控对裴小四之死负责。张兴发执掌村政大权时，有人认为他应对小偷惨剧负责。当陆进军代替他时，陆也受到指控，现在罪名加在

张贵才头上了。

正在此时，一个叫三毛的青年人被马车轧死了。就在两天前，他告诉宣传队，他不愿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运动中充当积极分子。他刚说完就被轧死了。主要送葬者之一是民兵陈良田。陈的母亲——就是那个“坏碾子下累坏的小毛驴”，突然精神恍惚，尖声大叫，双手乱抓，说三毛的鬼魂缠住了她，要通过她和世人讲话。三毛抱怨说，他是被非法杀害的，要贵才负责。陈良田之母一说起鬼魂，地头政治学习就立即停止了。无论哪个队的社员一休息，就讨论开鬼魂，而不谈毛泽东思想了。

死人的声音变成了陈母消除烦恼、报复张贵才的手段，其实和可伶的三毛毫无关系。她真正怨恨的是大队领导扣了她儿子的工分。陈良田曾是郑八字脚所领导的副业队成员，在长治北卸过货。这个副业队干得很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铁三局为此非常不满。此时，张贵才在复员兵李光清的支持下，从货车站召回大部分人，让他们回村干农活儿，但陈良田拒绝服从。作为惩罚，大队拒绝给他记工，尽管他自己声称赚了70个工。贵才坚持要他作自我批评，一旦他承认了错误就可得到工分，陈拒绝承认错误，于是贵才扣了他的工。接着，陈和他母亲都诅咒开大队领导了。

在铁路停车场同样遭到失败的郑八字脚，那时在向陈良田的妻子求爱。他愤愤不平地宣称：“如不把张贵才赶下台，我就搬出张庄”。他不是说说而已，而且用二尺大的字写在村里的墙上。两个月后，贵才不但没有下了台，而且爬上了大队书记的宝座。

有人在八字脚写的气话之上批道：“贵才没下台，你计划采取什么行动？”

“搬出去。”郑八字脚说。

第二天，他就出售他的房子。

此时此刻，张书记和德高望重的党员周增禄不幸发生了争吵。争吵是在张书记妻子和他弟弟周增禄之间引起的，但是由于亲戚关系张也被卷入其中，结果，不合时宜的争吵，使他自己与全村的关系搞得很不愉快。争吵涉及到属于周老五的一条被子，周老五是周家六弟兄中唯一没有孩子的。他向周老太要了一个女儿，后来成为贵才的妻子，向周老三要了一个儿子叫周增福。作为孝子，周增福本应该在他

上了年纪时照顾他，并负责料理后事，但周增福是个“八毛”，意思是“精神不正常”，几乎连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更不用提年迈的“父亲”了。周老六之子周增禄——贵才妻子的亲弟弟承担敬老的义务，条件是指定他为周老五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然而，在周老五弥留之际，他又重新商议了这桩交易。他要周增禄同意给他姐姐一个箱子、炕上的一床毛毡及一条好被子。老人死后，周增禄不履行诺言，只给了他姐姐箱子和毛毡，没有给被子。张贵才告诉他妻子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她不肯善罢甘休。好几个月，她从不谈论其他任何事情，把他弟弟告到大队，当大队干部无法解决问题时，她告到公社。经过两周调查、争辩后，公社命令周增禄交出被子。当他拒绝后，公社指示大队从他年收入中扣除70元，并且拒发布票。面对这样严厉的经济惩罚，增禄最后屈服了。他退出了被子，但把被子里优质棉花拿掉，换上了破破烂烂的旧棉花，贵才妻子发现这些破烂不堪的东西后，勃然大怒，她向长治法院提出起诉。

贵才千方百计安慰她，一床被子就是做得再好，也不值得损害家人和村里关系。但他妻子觉得原则违背了。对着全村指责他弟弟“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她说。她的指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和反感，给他丈夫的所作所为投下了阴影，结果，使反对派更加轻而易举地对他进行百般侮辱。

诸如对张贵才发起的攻击，威胁着工作队设法合作的每一个人。匿名大字报指责李保安和曹东明是“中农”（是张庄永远受怀疑的人），而且还是“坏分子”。他们指控陆光汉，娶了一个其叔父历史不清白的妻子。宣传队有点对王雨来、王满喜、陆太成、申许文、申起才、陆河仁和孙晋福有点兴趣，他们就都遭到诽谤。

如果只是口头攻击，工作队还是能够对付的，但口头攻击似乎往往为不寻常的人身攻击铺平了道路，可能会改变对抗的整个性质。在陆玉生当众证明张贵才和裴小四之死毫无关系后，他发现有人把粪便倒在他家大门口。几天后他报告说，有人把剧毒杀虫剂“六六六”倒在他做饭锅里。就在同一天，他报告一个蒙面陌生人袭击了他的女儿芳林。原来这个姑娘为了上厕所，婉言拒绝了和她朋友们玩扑克。当她在黑暗中蹲在院子一角落时，一个头蒙麻袋的男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试图把她拉走。芳林尖叫了起来。攻击者

越使劲拉，她越是大声尖叫，最后，他只得放她走了。

一天晚上，小中的弟弟起才，和工作队干部谈了好几个小时话。当他走进自己家院子去睡觉时，飞来的砖头击中了他的头和肩膀。

有人用一根攻城槌似的檩条，猛击李光清家的院墙。他的几位邻居发现他们家充满了驱蚊剂的气味，有几个人甚至声称他们晚上听见了“黑枪”声。第二队打谷场附近外面的一座小庙，也不可思议地被一把火夷为平地。

杀虫剂、攻城槌、纵火以及枪声，一切都意味着确实存在严重的对抗。

那时，宣传队指责所有的事件都是李快腿和秦快嘴干的。“我们认为他们并没有具体策划这些事件，”申主任说：“但是他们牢骚满腹、冷嘲热讽，所以造成了这种结果。”

“这个集团的成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李快腿和秦快嘴无法公开支持这样的行动，但是他们也没有进行制止，因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我们成立起学习班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只是中级干部，高级干部绝不会支持我们的行动。”

“当我们为有贪污、投机倒把之类问题的人举办学习班，并要求他们出去和一些支持我们的积极分子一同劳动时，他们不肯干，他们只是围坐在地里诅咒。”

“他们诅咒的人之一就是我。毕竟我曾和李快腿同属一派，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他。但当他和秦快嘴发现无法把我拉过去时，他们便开始攻击我了，他们甚至指控是‘红字号’一派来张庄‘翻文化革命的案’。”

1970年中央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叫做“一打三反”。打倒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但这次运动也变成了反对自留地、自由市场、私有企业运动，中央把这一切都谴责为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倾向。7月份来的公社工作队，和10月份来的市工作队都特别注意个人副业，他们没收了从事各行各业所必要的工具，如修表匠秦和武用的手钳和小改锥，以及秦申义用的扳手、焊接喷灯，这是十年之内第二次压制他们。农民强烈反对压制私人手工业，就在10月份新到工作队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上，几个人指责申主任和公社赵书

记砍掉副业，搞乱了经济，他们说“没有副业收入农业怎么发展呢”？

大队领导利用类似的问题，责问新工作队并提出了毫不相干的要求：既然不允许个人搞副业，他们靠什么活呢？我们的缝纫组没有会计，给我们找一个。

“我们感到很奇怪，”申说：“我们说，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解决日常琐事，你们的革委会可以安排工作，找到会计。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解决像整党这样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人对那样的回答感到满意。

“二宝”的忠实支持者之一王文则，开始散布各种谣言了，据他说，宣传队连一个简单问题也解决不了。王说：“没盐——鸡蛋换，没煤——去机务段。”王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由于工作队无可奉献，我们农民就必须尽量利用它，顾及我们自己利益。

张庄反对整风的人似乎来自各方面。宣传队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深入调查所有问题。他们相信农民的话，轻易相信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难道不是毛主席指出的吗？由于大部分公开反对他的人，显然都来自他们的主要斗争对象——大队掌权的党支部，因此，他们继续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李快腿和秦快嘴，并准备进行严肃斗争。

同时，工作队中三个主要领导之间也发生了分歧。来自矿务局的高级干部张广胜、长治剧团的李团长和马厂治安主任老申，发现就最简单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也达不成一致意见。他们不得不三番五次把他们的争执交给上级裁决。最后，3月中旬市委把工作队全部撤走了。经过4天深入的政治学习，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张广胜以及其他三位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治安主任和李田长接着又被派回张庄，和他们一起去的，有石圪节煤矿治安主任刘庭洞以及几名新任命的成员，其中有我们那年晚些时候混得非常熟的王腊肉、白头发的曹福贵。我们从未见过煤矿来的人。他去张庄之后不久就病了，不能继续工作，5月就被高法官所替代。

当高法官来到张庄时，宣传队和“二宝”之间的关系也陷入僵局。工作队在张庄提出许多问题进行批评，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领导班子身上，而“二宝”也发现了工作队的许多问题，并进行了批评，把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外部干涉。尤其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个工作队主要都是由“红字号”一派组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迫不及待地挑剔“联字号”组织忠实支持者的毛病，显然计划不择手段地搞垮他

们。如果在整个晋东南地区“联字号”彻底镇压了“红字号”的话，那么在张庄似乎“红字号”却反败为胜，能进行报复了。这对依附于“联字号”的任何人来说，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

其实，工作队队员并不全是一派的。尽管高法官、老八路王、回民齐以及白发的曹福贵都是“红字号”的人，而王腊肉却是“联字号”的人，治安主任老申是杂牌货——即开始时他是“红字号”的造反派，当“联字号”统治郊区的大局已定时，他才投靠“联字号”。²

然而，少数“联字号”的人和变节者无法保持工作队的平衡，显然“红字号”的人支配并控制关键职位。可以认为，长治新生革委会用“红字号”充塞工作队，是反对派性的一种手段，是为将来团结一致奠定基础，是争取和解的姿态。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这种举动纯粹是一种权宜之计。“联字号”队伍里只是没有足够的老干部充实市直各部门，同时为大规模的整党运动配备所需要的政治工作队，由于没有他人可派，市革委会就派出了“红字号”的人。

“联字号”的人在占据市、地区所有关键职位后，感到大权在握，可以使用被击败的“红字号”的人当地方工作人员了。许多“红字号”的干部长期被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干校同事可以借用到宣传队。尽管失败的“红字号”一派的成员由于“犯错误”而长期在农村当体力劳动者，做长时间的定额工作，相当于接受惩罚，似乎他们也可以作些必要的组织工作。

让“红字号”成员负责由“联字号”成员占统治地位大队的反常现象，以及经历过长期复杂斗争之后，这样做，几乎肯定会对张庄农民的观点和情绪产生影响，但是，似乎并没有烦忧市政当局。谁在本地当权，对张庄人来说往往是生死攸关、值得为此激战数年的大事，而在市领导看来是无关宏旨，甚至是无意义的事。对他们来说，事关重大的是掌握好地、市大权。只要原“联字号”的人控制着要害部门，“红字号”的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执行“联字号”成员的指示。因此，“联字号”的人肯定会牢牢地控制所有市外地区。

由于缺乏一个更恰当的词，把“红字号”的人派去整顿张庄可以称为“阶级团结”。在中国这样的等级制度的国家里，无论出身如何，

²原注：显然，派性和政治立场没有关系。最激进的是后来才加入“联字号”的申治安主任，最保守的是老“红字号”的曹福贵。

国家干部构成了一个高度重视其成员共同利益的特权阶级。不管他们的派别如何，国家干部绝不想与普通工人农民为伍。当需要做行政工作以及有国家大事时，被委任干这种工作的人，是高级领导干部而不是别人。他们愿意容忍少数工农党员干部作为助手，但是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清楚地承认谁是负责人。国家干部之间可能为谁支配他们工作、谁——哪一派发号施令，而互相进行严酷激烈斗争，但是他们会拼命地保护他们同类垄断管理事务的权利。在一个等级不太森严的社会，胜利者总会从支持他们的下属中吸收新生力量，但是中国的传统既然如此，占上风的“联字号”的正常举动就是让失落的“红字号”当下手。普通党员的联合加强了同行休戚相关的团结。

一名国家干部几乎必须是党员(回民齐例外)，这两种身份只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互补方面。然而应该搞清楚，反过来却不适用：一名党员不一定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决不允许数百万乡村工厂的党员忘记这一点。

如果市领导派“红字号”成员去领导张庄是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处于险境的“联字号”活跃分子，现任张庄干部接受他们领导就反常了。他们把这样组成的宣传队看作是一大灾难。李快腿和秦快嘴感到走投无路，甚至感到被出卖了。他们不相信宣传队会用任何客观标准来判断他们，也不相信会听取他们的任何解释。至少一开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出所料的。

两度受挫离开张庄的治安主任申，尤其渴望第三次能有所作为。尽管他效忠于“联字号”组织，他也不得不试图对“二宝”进行彻底调查。

首先，申安排了群众大会，把李快腿、秦快嘴和其他18位成员拉去“斗争”。人们呼喊的口号之一是“打倒李快腿”，站在台上的李也举臂一起呼喊，但每次却喊的是“李快腿永远打不倒”。

那一天，李肚子疼得很厉害，所以当齐大夫走近他时，他问他要药。齐大夫取回药，走到“斗争对象”行列的后面，把一些草药塞在李的手中。

当会议结束，申宣布散会后，李快腿冲上讲台说：“你们可能完了，我还没有发言呢。”他倒了一杯水，把药塞进嘴里，然后喝了一大口水，把药送服下去了。这是一种无需解释的挑衅姿态。

由于“二宝”集团成员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他们顽固的领导周围，申

主任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分化瓦解他们。如果没有几个缺口和裂隙，他是无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的。明显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突破他们队伍中最薄弱的人物，如申大胡子和林跃龙之类的无赖。他希望向他们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讲出并揭露过去四年里的阴暗面——贪污、贿赂、无耻之事——任何把“二宝”说得一塌糊涂的事件。

施加压力意味着“车轮战”——晚上6点钟开始，一直审问到次日天亮。而且还意味着，受监督的人及其所有亲戚和子孙后代都面临着可怕威胁。由于各方面都承担牵连罪，全家人都会想当然认为，如果他们家任何人触怒了官方，他们就会受苦受难，归根到底，施加压力意味着滥用武力，因此，宣传队进村不到一个月就受到毒打的“二宝”的几个支持者指控。

愿意谈论此事的人说，无论申主任还是工作队员都没有亲自动手打过人，而是当他们所管理的“修理工”在毒打几个受害者时，宣传队员们作为审问者在场。从未有人揭露过这些“修理工”的身份，只是暗示这些人属于小申的集团。煤矿保卫申仲堂显然是一名选手，因为他自己承认他是一名“打、砸、抢”专家。仅凭他在煤矿为“联字号”组织武斗，没有理由认为他会拒绝向张庄占统治地位的“联字号”的人报仇，他们曾压迫自己的亲戚。

被“修理工”毒打得最狠、伤得最重的是林跃龙，他一连三天无法吃饭，不得不进行静脉滴注。

一个穿大皮靴的支持者照着申大胡子的脚一踢，踢得他一周都不能走路，有人说这一脚踢断了他踝关节，也有的说只是骨头错了位。

一天晚上，秦快嘴领导的民兵副队长齐晋义走进工作队住处，几个男子以图谋偷听为由将他抓住，把工作队叫出来，据说这次工作队和农民们一起把齐晋义狠揍了一顿。

“二宝”及其支持者把与工作队对抗，看作是他们数年进行派性斗争的继续，只由于这次命运异乎寻常地逆转，他们进入了防御地位而不是进攻地位，这个团伙的成员在压力之下不但没有分裂，没有告诉工作队想听的事，反而团结得更加紧密，并重申了对“二宝”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忠诚，充分显示了老八路军王认真意识到的一种倾向：工作队越是批判“二宝”，“二宝”就越能得到村民的支持。

李快腿获得支持的一个原因，是他保护他的朋友。当宣传队开始打人时，李就失去了耐心，决定带领一个代表团去市委抗议。和宣传队告诉我们的恰好相反，李快腿、秦快嘴、郑八字脚和王文则五月的一天，半夜三更溜进市内，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回答对他们的指控，而是因为气愤地抵制他们及其朋友们所遭受的旷日持久的、日益粗暴的审问。

后来李快腿谈起了此事：我们感到来自外面的压力很大。宣传队和村里的压力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我们不得不组成了小组。我们小组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首先我们都很顽强。我们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那一次我们四个人动身去长治，我们准备了六七十个窝头，背上被子，沿着铁路出发了，时间是清晨三点钟。郑八字脚告诉一位老朋友，他要把他的房子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卖掉，他要去长治、太原，如果有必要，还要去北京告状。

王文则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为他也无法忍受在四队干活儿了。他说那是一个“敌占区”、“小台湾”。他发誓如果不允许他转出四队，他就决不回去。

走到张庄至长治的中途，我们找到了王文则妹妹工作的汽车修理站。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早上7点进入市内。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已经忘了，没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办公。

我们只好分手，计划第二天再会面。八字脚和我去了东关炸药厂，我那里有几个亲戚。秦快嘴和王文则又返回汽车修理站。我花费一天时间把我们的一些冤屈写到纸上，与此同时，所有的张庄工作队员和几个公社干部也出发去找我们了。

星期一早上8点钟，所有的办公室一开门，我们就出现在市政府大门口。范机灵正站在那儿等候我们，宣传队干部猜到我们可能去哪儿上诉，所以他們要范提高警惕。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我们来是为了告诉你张庄发生的事情，”我们说：“我们不在乎工作队是不是调查问题，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白天黑夜打人、审问人？我们不应受这种做法。”

范机灵简单问了我们一些情况后，接着说“现在你们最好返回张

庄，如果不回去，会影响春耕生产的。”

但是我们都说：“不回，我们要先进法院。”

我说，“如果你不把我送到法院，就得给我个粮本，让我在长治工作。我在张庄开会时，他们连坐都不让我坐。”

但是，范机灵说：“你们最好马上就回去。如果不回去，我们就不讨论你们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我们出去，找了一棵树坐在下面拒绝离开。我们一边坐着，一边交换意见，一边交换意见一边争吵。一个通讯员出来说，市委崔副书记要见我们。八字脚和我也不去，于是僵局继续着。过了一会儿我们坐得厌烦了，于是我们动身去逛大街去了。当我们下午回来时，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决定上去见崔书记。

他很同情我们。他赞扬我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并说，我们在“文革”中都干得很好，但是批评我们领导农业生产不力，重副业，轻农业，不重视学大寨，招待费用太多，在整风运动中闹事。

在经过一阵长时间谈话后，我们决定回去。回家后我们都下地干活儿了。

两天后，宣传队在王玉梅家院里召开会议，高法官宣布秦快嘴和我被免除职务，留党查看。

李快腿重操旧业，干起他小时候跟他生身父亲和叔叔们学的本领——做木工。他既懂如何修房盖屋，又懂怎样打高质量的桌椅、箱子和柜子。李快腿从不为失业而担忧，需要他技术的人太多了。人们要修房盖屋就去找他，不仅因为他懂得如何设计坚固耐久的房子，而且还因为他在木料和砖瓦上雕花刻画来装饰房子，与其他房子相比他盖的房子特别引人注目。

可以说，经他盖的每座房子上都留有他的特征，而且人们也自豪地夸奖李快腿为他们盖的房子美观，结实。

尽管他辛辛苦苦地干，可以挣到足够的现金养家糊口，但却无法搞到足够的粮食。7月大队收获的小麦远低于预期产量，许多家庭分到的人均口粮还维持不到秋天。一条出路就是坐火车去河南自由市场购买红薯片。于是许多家庭的主人都是为此而离家在外，结果在锄草大忙季节，生产队却缺乏劳力，庄稼地里杂草丛生。为了尽量控制人员外出，大队领导停止了开介绍信，河南当局要求所有外省买主都要持

有介绍信。只有证明是遭了难的人可以例外。当村委违反规定给陈万田和齐龙飞开了介绍信时，李快腿也提出了要求。他养活的人比陈或齐要多，但村委却拒绝了他。他气坏了，去掉移公社，说服那里的干部给他开了介绍信，然后他和三个伙伴，随身携带了一些为讨价还价之用的土产麻皮动身前往河南。

原来，麻皮是不必要的。在河南林县，只要有钱就行。但是李快腿和伙伴们一到达目的地钱就被没收了。当他们坐在火车站餐厅吃面条时，市场管理室的一位代表走到他们桌前问他们去干什么。

“我们来买红薯片。”李快腿说。

“有介绍信吗？”

“当然，给。”

“这是漳移公社的介绍信，你是马厂张庄大队的，这不行。”这位干部说。把他们叫到市场管理办公室，收缴了他们的钱，让他们回家去。他们找到李快腿嫁到林县的一位老同学，把麻皮留给她，两手空空回家了。市场管理办公室把他们的钱寄回张庄，分文未少，但他们粮食还是不够全家吃。

还是同一个干部拦住了陈万田和齐龙飞，也让他们回家去，说河南红薯片不外卖，但是由于他们持有盖着张庄公章的合法介绍信，所以没有没收他们的钱。他们无视他的命令，挨门串户，这里买一些，那里买一些，最后他们都是满载而归。

如果需要进一步描述的话，这一事件说明，各级当局对市场及整个农村人口的管理非常严格。折磨失宠人的事例数也数不清。惯于行使大队领导权力的李快腿，对这种限制尤其感到气愤。此外，工作队干部还指责他非法下河南，用麻皮投机倒把，他气得快要发疯了，但是他孤立无援，只得默不作声。

最后由于许多家庭的粮食都很紧张，张贵才与土改期间曾任踞城区领导的河南一位官员取得了联系，通过这位老朋友，他安排了一车皮干红薯片通过铁路运往张庄。这节车皮在小麦吃光之前及时运到，所以张庄农民并没受什么苦就度过了夏天。

尽管免除“二宝”张庄大队职务的决定，发生在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派性斗争的非正常时期，但是回想起来似乎很清楚，在他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是阔别17年之后，我突然再访中国。我和我全家到达

北京时，正逢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24日周恩来总理邀请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赴宴，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谈话过程中他说：“我知道你们要去张庄村访问，但是我不清楚是否能这样安排。你知道，我们不清楚那儿是哪个阶级在掌权。”此后不久，周总理通知说，我们终于可以去张庄了。由于宣传队承受双重压力：面对稳定形势和拿不准“二宝”和大队群众之间矛盾性质，宣传队决定免去他们的职务，在本地提升了工作队更加信任、并确信代表贫下中农的一些人。这种严厉措施，是宣传队中公社、市领导间经过激烈争论后采取的。这是五年内第二次推翻李快腿，1948年以来第十二次重新组建村政府。

所有这些人都已经知道我从美国而来，周总理要我重访《翻身》一书写的乡村。

7月8日张庄大队支部举行大会，重新选出一名新书记和四名副书记，这个五人小组不仅自动接管了党支部，而且接管了大队革委会。整个重新组建工作是根据宣传队提议在党支部内进行的，尽管新成立的革委会应代表大队普通百姓，但是他们既没有参加协商，也没有参加选举。

如果要进行选举，李是可能会重新当选的。尽管这样，事实上，党员们选定在李快腿手下当大队主任的张贵才任新支部书记，曾在伞兵部队任指导员的复员兵李光清、原大队会计申起财（小申弟弟）任副书记。陆河仁取代秦快嘴任民兵营长，申许文取代申起财任大队会计。

于是，大队为我的归来作好了准备。

显然，不改变亚原子相互作用的条件，就不可能测量亚原子运动的这条粒子物理学原理，在社会学领域内找到了相似的情况。一个外国人详细考查的村庄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四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不可避免要进行干涉。

八十六 鸡蛋变成鸡

老八路王通常开会去得很早，甚至早晨学习时候也是如此。等人时他就讲故事。他通常要阐明的观点是，解决不同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9月末的一天，他开始讲起宋家庄经常闹事的粗暴无礼的年轻人

的故事。如果邀请人去村里放电影或演戏时，他们总是一拥而进，千方百计占据最佳位置，他们推拉拥挤、打架、呼喊、没完没了地吵架。

一天，大队领导把他们召来，问他们在公共场所破坏秩序的行为怎样处理。这些年轻人环顾四周，意识到请来的人都是闹事者，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微笑着站着默不作声，他们说对这种事毫无看法。

于是大队领导决定用一种新策略。第二次剧团去镇上演出时，确保了这些人不抢占前排座位，“这些好位置是给小王、李忠……留着的。”他大声宣布，接着很快念完所有捣乱者的大名。这些年轻人感到局促不安，纷纷退缩回去了。

“别念我们的名字，”他们请求：“让我们坐到后边。”

但是，大队领导坚持让他们全部挪到最前面，坐在显眼的一排中间。当他们坐下时，领导对他们一一作了介绍。

后来他第二次把这些捣乱分子召到办公室时，他们都表示歉意并答应改正。自从那以后，在宋家庄公共场所演出时，会场总是井然有序。

老八路讲完故事后，俄文教师小李再次通读了8月27日北京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次她集中精力读第三小段，论述要求党员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社论号召所有干部每天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从而和普通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工作队员们说，张庄的普通农民一走向领导岗位，就很快变化了。以新会计申许文为例，他是两个月前承担这项工作的，因此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读书，一次也没有下地劳动过。他是党员，应该更清楚带头定期去积极参加劳动。同时，大队应制定并执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标准。大忙季节，包括大队医生、护士、药剂师和会计，都应全天下地参加劳动，躲避劳动很容易使人蜕化堕落。

“会计怎么能整天埋头忙于办公，连锄头都不拿呢？”王腊肉说：“会计确实不需要全天办公，凡是必须办的事晚上就可轻而易举办完。学校高年级学生和城市高级干部都来参加劳动，为什么会计能例外呢？”

“有些人总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申说：“不仅仅是干部，长治钢铁厂附近有一个生产队，在大忙季节要求钢铁工人和管理干部去帮忙，但当外单位的人在地里出力流汗时，大队很多身强力壮的后生却

继续在公路上拉钢材挣大钱。”

“张庄这些年轻会计随心所欲，大大咧咧，”高法官摇着脑袋说：“有一天，他们带着4000元现金回来，街上电影正好开始，他们把钱砰的一声扔在大队办公室桌子上，就匆匆忙忙去看电影了。后来，我路过，看到钱摊在那儿，不得不去人群中找这些财神爷。我批评他们粗心大意，但是不是有效果，仍有待观察”。

当小李开始读第四段时，张书记出现在门口诅咒。

“怎么回事儿？”

“铁三局那个家伙……他妈的！……”

“什么事？”

“他对我摆出一付‘工人架子’，那个王八蛋。我穿过铁路去那儿看他们要接收的地，这位干部正在那儿拔软谷苗”。

“天哪！你在干什么？”我问。

“只是检查一下土质，”他说：“我们要在这儿制砖。”

“可你不能在这儿制砖，这是我们的谷地。”我告诉他。

“马厂公社说我们可以占用这块地。”他回答道，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人，好像我没有在那儿。

“喂，你们还没有占了这块地，”我说：“你最好别动我们的庄稼。”

“你妈的，你是谁，敢教训我？最好叫你们大队主任来。”

“我就是大队支书。”我说。

“这可使他有些为难了。他不再假装看不见我了，开始看开地了。于是他说‘既然如此，你最好找你们的上司，最好找公社的人来。’”

“我没有时间，”我说：“等我跑到马厂返回来，你就把这些谷子连根拔完了。”

“好了，那个人不再拔了，骂了我一顿扭头走了。我一路跑回这儿，你们最好赶快采取行动！”

宣传队员感到十分震惊，有人竟敢在收割季节前一二周拔掉谷子，他发什么疯竟干出这种事来？地还不是他们的，依照法律，如果三局需要土地，必须在大队办理手续，然后是公社、市，最后是地区，只有地区政府才有权批准耕地转为非耕地。如果经地区批准，铁三局

也必须付给大队一笔相当于三年亩产粮食平均价值补偿额。即使支付了土地费，如果铁三局不马上使用土地，大队仍有权耕种。一旦种上了庄稼，任何人不得损坏。如果有必要损坏庄稼，必像以前一样从大队开始，逐级向公社、市和地区提出申请，而且庄稼的全部价值——种子、化肥、劳力投入都必须进行赔偿。

但是既然土地还没有转让，怎么就能拔谷子呢？

“我们甚至连他们是否需要土地还没有搞清楚。”贵才说。

“有些工厂总是多占土地。”高法官皱着眉头说。

“确实是这样，”贵才说：“铁三局来这儿时占用了2000亩地，并都付了款。可是一开始他们只使用了200亩。有一天他们来要钱，我告诉他们必须通过各个系统才行。如果他们买上土地占而不用，就必须归还，但是没有规定说大队必须退钱。他们的想法不同，于是我说，好吧，把地给填平，收拾成我们耕种时的老样子，我们才归还那些钱。这可把他们难倒了，他们看看那些坑坑洼洼，看看他们筑铁路路基挖去土及制砖的地方，只字不提钱了，他们只大踏步走了。”

在市法院，铁三局一个人抱怨说，他去征地时，差点在那儿揍了他。高法官说：“市委书记告诉他活该，‘你们不能只是到处宣布没收人民土地。你很幸运，他们没有用扁担揍你’。”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是做了桩最糟糕的交易，”贵才说：“当锯条厂代表来协商时，我们决定必须交出一些土地支援工业。可是，他们怎么做的呢？首先他们砌起砖墙不让我们进去，接着在地里种上了庄稼。你倒愿意！他们可以修房盖屋，可以修建车间，但是如果种粮食，应该由我们来种。我们的口号是‘你们一天不用土地我们就种一天’。所以你最好派人和我去铁三局。如果我们不赶快去那儿，他们还会连根拔起谷子苗的。”

高法官要管道工黄和贵才一起去。

工作队员接着又开始讨论面临的主要问题——“二宝”问题。

正如老八路王所预言的那样，把两位干部和小偷拉在一起进行批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把所有的对象更加逼入绝境，切断了所有退路。由于他们无法接受给他们贴的标签，也看不到任何出路，他们就团结一致进行反抗，不愿接受批评，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进行自

我批评了。

我要求安排和李快鼐谈一次话，范机灵和林冬同意了。但当他们去问李时，他坦率地拒绝了：“为什么我要和他谈话呢？这有什么用处呢？你们已得出结论我镇压人民，破坏生产，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什么可说呢？”

他们威逼他时，他有点优柔寡断了，“如果我和他交谈，我可以说人的真心话还是说你们教我的话？如果我得说你们要我说的话，那我就不说。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同意谈话呢？不谈，绝对不谈！你们有资格谈你的看法，我也有权利谈我的看法。”

“好吧，如果我们同意你想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样呢？”

“我要考虑考虑。”李快鼐说。

负责调查所有“专案”的退役军人老王，一直在调查粗暴打击报复三名宣传队员和与他们的合作人的指控。诉讼“二宝”案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发动人们骚扰接近宣传队的人，但是老王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分析问题必须全面，”老八路王说：“我们首先要重证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以陆玉生案子为例，谣传说某个破坏分子把“六六六”投在他饭锅里。这似乎是一个清楚无误的案子，但是当我们从各方面进行调查时，就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起事件了。事实是陆玉生女儿芳林一天晚上在厕所遭到一个头戴麻袋的人骚扰。当她叫喊时，他逃跑了。她立即去找某个宣传队员说，一个蒙面人攻击了她。当我们开始询问此事时，他们家有人说：“我们的锅里还有‘六六六’”。我们设想，这两件事有关联，那个蒙面人应对此负责。

“但是，第二天当芳林母亲从故仪走亲戚回来后，她家人的口气就都变了。他们不是谴责往锅里投放‘六六六’的夜贼，而是说他们自己在门楣上保存着‘六六六’，可能是不小心掉进锅里了。近邻们说陆家屋子里从未保存过‘六六六’，似乎没人愿意谈论细节”。

“那么你怎么知道锅里有‘六六六’呢？”我问。

“稀饭里有一股奇怪的杀虫剂味道。”

“是锅里先有‘六六六’还是粮食里有？”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还有粮食吗？”

“有。”

“但是他从没有拿出一斤一两受污染的粮食来。”

“当我设法问芳林时，结果一无所获，每次我问她问题，她母亲都说‘千万别说’，每当提到此事她就失去知觉。”

“芳林自己捂住脸拒绝回答。”

我马上意识到这里必定有鬼，立即想到一种说法，这个蒙面人可能是陆河海(副业队会计，被指控挪用公款 1193 元)。过去他曾追求过芳林母亲，这次当他发现他的情妇不在家时，就来袭击她的女儿。

“为什么他竟然追求起她的女儿呢？哼！这种人缺德透了。”

“至于锅里的‘六六六’，很可能是这一家偷了一些种籽，而为了保证发芽率，种籽已经用‘六六六’处理过了。当他们做饭时，这种气味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所以，两起事件并无关联，而且这一家对这两起事件都毫无兴趣。芳林受到袭击时去叫人帮忙，但她母亲回家后却设法把一切都平息了下来。在他看来，宣传队根本就不应该插手这件事。”

“因此，”老王说：“罗玉升案子几方面情况都有问题，一方面是秦快嘴手下的一个民兵李守平，就是他作了不利于贵才的证明，指责他应对盗贼裴小四之死负责。证明贵才无罪，反驳李守平的证据是陆玉生，因此使李守平显得丢了脸，因此有理由设想，李存有某种敌意、某种报复的动机。是他把‘六六六’投到锅的吗？”

另一方面指陆河海，他追求玉生的妻子由来已久，或许他曾企图占有玉生的女儿芳林，但是为什么他要往锅里投“六六六”呢？

“其他的方面是指玉生自己。可能他应对‘六六六’事件负责，可能他在什么地方拿了一些麦种，而不想坦白承认？”

“首先我们只看这一方面。我们怀疑李守平，他和秦快嘴狼狈为奸，因此就使这一案子变成了旧领导班子反对新领导班子，‘黑帮’反对‘红帮’，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全家那样不情愿坚持指控，甚至不愿谈论这个案子时，我们不得不重

新考虑这个证据。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把他一方面放在首位，那一边放在第二位，再一方面放在最后，那么你就有了一个全面看法了。”

可是，申仍然决心控告“二宝”，申说：“你自己说你必须有可靠证据才能怀疑别人，而你所说的证据只是捕风捉影，猜测而已。”

“如果我有可靠证据，我就能了结这个案子，”王说：“我的怀疑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陆家千方百计回避这件事。一开始他们要揭露对他们女儿的袭击，所以他们不得不向我进行控告——夜晚袭击的蒙头男子，还有粮食里的‘六六六’。他们到处声张，但是我们一开始进行调查，他们却把整个事件看得无关紧要。所以我判断其他的方面应放在首位。”

陆玉生似乎从申大胡子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遇到麻烦，就归罪阶级斗争。”这是一个转移对事实真相的注意力的可靠方法，要不是老八路王沉着冷静地追踪“各个方面”，他或许是会逃避惩罚的。

“旧庙起火似乎也与政治无关，”王说：“我和二队几十个社员交谈过。原因可能是史会芳死了猪。原来，大部分山西人不吃死猪肉，但史会芳是山东人，嗜猪肉如命，珍贵的小猪夭折根本吓不住他。他决定在没人知道的偏僻地方给小猪退毛、烹调，再吃掉。当然由于猪大，他请了一些朋友共同享用，而没有告诉他们令人悲伤的非自然的早死。他以为选择二队打谷场北面的破庙，是他举行宴会万无一失的地点，但他没有注意那儿存放的干芦苇。火星把芦苇给点着了，不等人们来救火，这座庙就被一把火夷为平地了。当然大火必须得到解释，有什么能比阶级敌人纵火的说法更加可信呢？”

当王老八路淡化对“二宝”一个又一个最严重的指控时，他比以前更加相信他是在处理一对心怀不满的干部，是和阶级敌人或阶级斗争无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当他淡化指控的同时，李快腿和秦快嘴，尤其是秦快嘴在不断制造新的火上浇油的事件，诸如李快腿说：“我的小猪还不够给我的‘黑帮’喂呢，为什么该把猪卖给这种人喂呢？”秦快嘴说：“我们‘黑帮’分不到救济粮，你们‘红帮’不应该有任何麻烦”和“如果你把手放松点，就能种60斤。”这些话为治安主任申、管道工黄、中央来的林东和范机灵提供了证据，一个阴谋集团正在夺取大队权力。当郑八字脚醉醺醺的半夜三更回家高唱“骂殿”时，他的行为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是正

确的，而且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他们一直在搜寻的证据。难道“骂殿”不是抗议当朝皇帝，不是对夺权的谴责指控，不是被剥夺掉继承权而自认为是合法继承人的主张吗？难道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进一步证明迫在眉睫的夺权吗？如果迄今为止尚未发生任何事情，难道不只是因为宣传队还在这儿吗？如果工作队撤走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谁能保证张庄的未来呢？”

在调查“二宝”历史后，林东得出结论，他们本身可能不是阶级敌人，但是她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如师明星的叔叔或历史反革命分子武玉父亲之类阴险狡诈的天主教阴谋家。“二宝”和一些女人关系密切，林东总是这样争辩。怎么能不怀疑阶级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些荡妇把这两个轻信的干部拉下水呢？一个人怎么能不问是否存在幕后策划的暗藏反革命集团呢？即使“二宝”事实上并没有进一步操纵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他们执行的政治路线符合地富反坏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做阶级敌人做不到的事，在起阶级敌人无法起的作用。怎么能解释一个人甚至被免职并交给群众进行调查后，虽经过几个月的耐心帮助和批评，不仅仍然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仍然毫不悔改，而且继续到处发牢骚，并且反复念阴险的顺口溜呢？

赵匡胤打天下，

赵匡义坐天下。

林东习惯说：“密切注视，看他们如何和他们的集团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说他们要推翻新的领导班子，他们天天在领导班子内煽动分裂，千方百计想把领导班子搞垮，千方百计为他们自己重新上台制造机会——这就是他们的美梦！”

林东在范机灵的帮助下，提出了中国农村已经成功地建立合作社15年后阶级斗争形式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出身于贫农家庭、才华横溢的两个青年人，掌权仅几年之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危害了革命。

根据林东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阶级敌人再不能公开跳出来，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而逍遥法外(当然，不能说这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创造了一种“拉出来利用”的方法，影响党内干部，利用金钱美女和特权，腐蚀并把意志薄弱、阶级斗争经

经验缺乏的朴实善良的青年人拉下水。她断言，在1970年代的乡村和基层单位，这可能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她提出的对策是要求当权者不断改造世界观，重视毛泽东的路线，动员普通大队社员监督批评领导的行动。教育和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林东扭伤了踝关节不能参加会议的那天，申治安就成了阐述她观点的主要发言人。在他看来，“二宝”案子现在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或是改变态度，听取别人意见，开始作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或者继续违背市领导、宣传队、大队委员会和革命群众，最终成为反革命分子。

这种观点王老兵不知听了多少次，今天早上他对此提出质疑，理由是这种观点轻视了如工作队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老王一点也不相信一切问题取决于“二宝”本人。他根本不相信工作队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觉得一个人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需要外部的大力帮助。

“任何人都不能说今天我是一种人，而明天我就变成了另一种人。”老王说：“确实内部因素是变化的基础，而外部只是变化条件，的确外部只有通过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但是……。”

“但是外部因素只能进行帮助，”申打断王的话说：“他们自己必须改变态度。”

“我想要说的是，”老王继续说：“你们不能抛去外部因素，它是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鸡蛋可以变成鸡，但是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行——温度、湿度、各种条件必须适当。如果你给鸡蛋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它就会变成鸡而变不成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变化，在适当的条件下，石头可以变成水泥。”

“但是，鸡蛋变不成石头。”申说，仍然强调内部条件。

“对，鸡蛋和石头没有共同之处”，王说，仍然设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分析判断上。

我所想的是李快腿可能朝两种方向变化。他可能仍旧无精打采，停止为革命工作，集中精力摆弄他的斧头和瓦泥刀。那样的话，他可以挣好多的钱，让他和其他人一起见鬼去；或者他能变好，和其他人一道干革命。这是可能的，这种条件是存在的。他的思想上在进行斗

争。

“难道他真的决心再不干革命了？我怀疑。他的脑袋里反反复复有此两种选择——有统一也有某种矛盾。”

“好吧，那么摆弄斧头和瓦泥刀这是什么思想呢？”王腊肉问。

“我要技术挂帅，走‘白专’道路，就是这个意思。不革命了，政治见鬼去吧。我要拿起我的木工斧头、泥刀修房盖屋赚大钱，空余时间我要四处闲逛。这一切意味着丧失了革命意志。”

“不错，有些屠宰技术所需要的是某种外部影响，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干得好，如果群众采取正确方针帮助他，他仍然可以回心转意的。为什么不呢？”

王描绘的一幅图画，与林东所描绘的大相径庭，这是一幅我能理解的图画。我猜如果李快腿外出盖房子，而不把张庄革委会推翻，那将是一个残酷的时期。如果把他打成反革命就更不可能了。张庄村面前的真正选择，似乎是一方面使被免职的支书生活困难重重，被迫外出做木工；或者别无限上纲上线，错误就是错误，不要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对别人的优点有所了解，给人以出路。无论怎么说，阶级斗争在这个方程式中不起什么作用。真正的问题是派性。如果李快腿承认这点，他自己是会采取主动行动的。

八十七 范机灵改变方针

大喇叭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那庄严颂歌的最后乐曲渐渐减弱了。我们几乎从来不听随后播送的毛语录，好几周时间内都是千篇一律地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开始，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结尾。但是，9月20日未作任何解释，第一条语录突然变长了。开始还是以通常的三句话“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但是，令各位听众惊奇的是，这条语录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加了一条新奇而长期被人忽略的句子“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这句修改了的口号立即使韩琼警觉了起来。“有重大事件发生了”，

我们一见面她就说，我们擦擦眼睛，准备去院子中间唯一的水龙头上洗脸。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听到那句口号了吗？他们加了一句话。”

“听见了，”我说：“额外的句子使我感到刺耳，可是，我几乎没听清具体词是什么，因此并没有太在意。”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什么意思？”我问：“不是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是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现在改变了语录？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韩琼说：“但是，我知道事关重大，无论你怎么看，这是对部队的批评。几年来我们一直学解放军，现在突然要解放军向我们学习。”

那天早上韩琼不可能再补充什么。新闻报道中也没有包含什么特殊内容——农业上一些自力更生的模范，工业上的一二项突破，全运会一些项目比赛结果，有关整党的长篇社论。

“吐故纳新，并不是吐故纳亲信——纳侄子、侄女、叔叔和阿姨。”

国内新闻报道广播完之后，大队副主任申起财的声音播进来，通知召开另一次全村社员大会总结整党情况。他规定大会8点在大队会议室举行，但是人人都清楚9点以前开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太阳落山下地回来后，人们还得做晚饭填饱肚子，除了张庄剧团再次进行演出外，只有流行的新电影或地区剧团才能通过那种方法催促他们，而且1971年这两种机会都不多。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统治了舞台和屏幕，人人都看过，听过好多次，不可能受骗上当或放弃休息再去专心看她标志的“革命浪漫主义”，无论如何，起财那天也没有提出文艺节目，只是喋喋不休讲了半天话，唠叨了半天。如果人们来，那是出于习惯，出于责任感，出于对大队及其前途的关心，尽管前途渺茫。

韩琼和我，和其他人一样，出于习惯去参加了会议。我们所期待听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充塞会议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词，使观众感到既冷淡，而又更多的迷惑。我的心情非常低落，远远不仅仅是冷淡，而是绝望。毛泽东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曾说过，“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到了一起，很难加以区分。”确实难以区分，一

个人越是深入集体事务，矛盾和冲突似乎就越复杂。然而，那些负责人不是设法区分矛盾，而是一有人反对，就把所有矛盾说成对抗性矛盾，把他们批评的对象谴责为阶级敌人，仿佛全村和他外来的朋友，都被扫进了巨型“阜氏转轮”³，把一些人降下而另一些人升高，然后把上面的人投入深渊，而把下面的人又升入了天堂。

先升后降，然后再上升，巨大的转轮转啊转，对抗者在上下翻腾，越来越怒不可遏，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转轮转动，也没有人能走下转轮。转轮究竟要转向何方呢？怎能免遭劫难呢？

那天晚上，会议厅似乎特别的破旧不堪，一组木工在这个地方制作新房的桁架，有些人把他们刨下的刨花，随便扫在舞台前堆成堆。有几个农民发现这些刨花柔软舒适好休息，但是他们坐着闲聊时，身子扭来转去把刨花撒得到处都是。其他人带着往常的厚木块子、砖头和小马扎作座位。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和会议厅周围的人聊天。木匠的工具、板凳、一两张桌子乱放在舞台后面，甚至部分地挡住了后墙中央的大幅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两侧各挂着油漆得鲜红胶合板，上面用白字写的标语——右面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面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9点钟，会场的人似乎已相当满了，但是高法官迅速数过人头之后，告诉我们，好几个生产队只是象征性地来一部分人装装门面而已。他看到第六队只有36个人，五队只有50个人。五队有70多户，所以，每户屈尊参加会议的还平均不到一个人。

一开始，申主任作了人们预料的冗长、乏味的报告，还不等他讲完第一点，许多人就默默地站起来溜走了。其他人把座位拉到更加适于交谈的位置，开始低声聊天了。仍在场的人群中许多人开始打盹儿了，一些打盹儿的人很快就睡着了。当申兴致勃勃地讲到第三点时，整个大厅里的人都睡着了。一两个人不小心从高处滑到地板上，呼呼打起呼噜来了。

申起财接着老申讲话，他的讲话形式主义严重，人人皆知，他把一连串口号胡乱拼凑在一起。由于他深知没人喜欢听他讲话，他发言非常简短，这个策略竟为他赢得一阵零落的掌声。

³译者注：阜氏转轮，一种巨型电力驱动的转轮，转轮缘有悬吊着的供乘客乘坐的座位。一般都安置在公园，这是根据美国工程师G.W.G.Ferri命名的。

范机灵接着申起财讲话，他一出现在台上，整个地板上就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些人暂时停止聊天了，有些人醒来了。这位杰出的市干部，有一个煽动性演说家的名声，农民们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他的开场白简直不受欢迎。他开始例行公事似地回顾了整风运动，表扬了在生产队会议上提意见的群众，并保证张庄干部会认真对待那些批评意见。他们会设法克服在生产、批判坏人坏事或政治教育工作中发生的时松时紧的工作作风。接下来范机灵赞扬新领导班子胜任工作，“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以前领导班子那样自私，工作吃苦，因此他们的主流一定是好的，人民对这种领导反映良好。市委、公社委员会信任依靠这些干部，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缺点，他们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扬长避短……”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小心谨慎，老调重弹使人厌烦。

范文接着问大家在考虑的问题：推动张庄的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这个问题使几个胡思乱想的人注意力集中起来了，但是问题的答案又使他们漫不经心了。“首先大队社员必须把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第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韩琼和我互相交换眼色表示绝望，我们知道范机灵的立场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会讲得这样单调，这样糟糕。难道他要在我们中间发表有关阶级敌人的长篇演讲，把剩余的与会者从大厅统统赶走吗？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是这样的，因为当年轻的市干部从容镇定继续讲话时，下面的讲话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热烈，几乎把他的声音都淹没了。有人很快会不得不要么保持大会秩序，要么休会。

突然范文走到主席台最前面，提高了嗓门。

“现在张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么样呢？”他问。

听到这里，地上坐的大多数人都竖起了耳朵。

“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在幕后惹事生非，一些人破门入室，进行盗窃，客观上就是在破坏大好形势，有一些免职干部心怀不满，千方百计纠集一些落后分子，甚至一些坏人，反对新领导班子，向大队新的领导班子挑战。”

突然，听讲话的人比聊天的多了，底下的谈话声减弱，睡觉的人也醒了。

范文用一句话，向一开始就支配整个整风的前提提出挑战。存在阶级敌人，也存在小偷，存在阶级敌人，也存在心怀不满的干部。立即打动听众的是范文区别开了阶级敌人、小偷和不满的干部。他没有把小偷和阶级敌人混为一谈，也没有把“二宝”和其他两类人混为一谈。这是令人感到新奇和吃惊的，人们不住门外溜了，而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会议厅。

范机灵立即回顾了李快腿、秦快嘴以及他们的一些亲密合作者的种种活动，他指责他们翻出“裴小四”案件，企图使张贵才名誉扫地。他们高唱“骂娘”诅咒新领导班子，极端虚伪地嘲弄领导班子，甚至在大街上向领导打招呼时用“当官儿的，你好吗？当官儿的，你去哪儿？”他们散布谣言说，大队革委会公开为李快腿和秦快嘴保留两个席位，损害了宣传队的声誉。他们挑动人们为救济粮争吵，让“黑帮”和“红帮”对立，为买猪而争吵不休。

“尽管如此，他们没有能损害新的领导班子，”范文说：“如果95%的人支持你，5%的人辱骂你有什么关系呢？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心怀不满？为什么他们这样怀恨在心呢？是因为他们被免去了职务，再不能对人民为所欲为吗？如果我们放松警惕，允许他们重掌大权，我们能学大寨吗？我们能有足够的粮食吃吗？我们能向国家卖粮吗？”

“请注意，我不是说，这两个人不会变化了，我是说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承认错误，更不用说改正错误了。人民千方百计对他们进行帮助，而他们却仍然怀恨在心，仇视对抗。”

这和王老关于“二宝”的理论接近。心怀不满的停职干部，远远不是企图破坏国家的反革命分子，韩琼忍不住笑了，至于我，我几乎等不及听取范文接着会说什么了。

范文开始分析“二宝”为他们的反抗行为辩解而一直利用的论点。理由之一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在村里仍然有广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得到公社和市里上级领导的支持。

“说这些话的秦和李只是在设法自我安慰罢了。他们表面装得无所畏惧。我们干部支持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当‘二宝’办事正确时，当然可以得到上级支持，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拒绝承认错误时，怎么能得到支持呢？”

“二宝”提出的另一个借口是，他们对大队这么多人，尤其是对小田和他的“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同伙们采取的严厉措施，是在夺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所进行的过度行为。镇压手段是搞派性的结果，是可以原谅的。他们争辩说，这些过度行为在“文革”高潮中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我们能以派性为借口原谅打人吗？”范文问：“几乎不能。群众组织起来互相争斗是一回事，那可以叫作派性。但是，你们‘二宝’那时拿着大权！你们执掌大队的权力。作为大队民兵的营长，你们抓人、打人。更严重的是，你们抓的、打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贫下中农。难道说这是简单的派性吗？决不是！这是资产阶级对群众的专政，这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一旦执掌了大权，整个形势会从性质上根本改变。你们负责执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如你们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抓革命，促生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大搞少数人的特权，分裂群众，压迫群众。”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在“文革”一切混乱之后，唯一需要阐明的一点，但是，这正是范文肯定会发现难以与他自己的履历，地市“联字号”一派的记录相符合的一点。

当范文解释自己的观点时，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安静得连人们的呼吸声，甚至四肢挪动位置和衣服发出的瑟瑟声都能听到。我回头看到，和他开始讲话时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大厅里人挤满了，绝对满了，有些人无法挤进大门，从窗户上探进身子去，尽力倾听所说的每句话，就好像台上的演出刚刚开始。

至于范机灵，他已放弃了刻意演讲来追求激动人心的姿态，追求由弱到强，最后达到高潮的那种方式。他用一种平静、实事求是的姿态讲话——没有狂热的神态，没有“嗨”，没有喊叫，没有威胁，而是靠合理的分析，让听众心服口服以论据取胜。用毛的话来说，他在设法“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

范机灵揭露“二宝”及其“集团”的种种活动，驳斥了他们自我辩护时仍然引用的主要论据，之后，他阐明了宣传队和市委对他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是为革命挽救他们，是‘治病救人’。但是，至今他

们都不这样看问题，他们的态度仍然是对抗性的，仍然把我们当敌对势力看待，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喂！”范文直接向在听众中坐在他面前的李和秦说：“如果你们拒绝像我们一样看问题，我们就只能和你们作斗争。只要需要，我将把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谁会在张庄呆下去。”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关键不是你所犯的错误大小，而是对错误的态度。长治有一个妇女干部贪污了300元，她不但承认，而且盗窃了更多的钱，还掩盖罪行。由于她行为恶劣，我们开除了她的公职。另一个例子，一个男干部坦白交待挪用公款2000元，但是由于他态度好，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处分。”

“‘二宝’愿走什么道路？他们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这使范机灵又回到党的基本政策问题上——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犯错误的人不一定是阶级敌人，”范机灵说：“我们必须设法教育他们，挽救他们，决不排斥任何可以团结的人，决不树立不必要的敌人。”

现在这些话本身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表达了毛泽东三番五次解释和提倡的众所周知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土改、合作化运动，以及自开始革命以来成功地开展的历次整风运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范文突然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张庄村，暗示1971年整风运动发生了剧变。他打算力挽汇聚数月，即将淹没犯错误干部的巨浪狂澜，一夜之间把他们拉回和缓的水流之中。回到原先的比喻，范机灵在对“阜氏转轮”进行刹车，希望减慢飞轮的速度，以便有几个人，至少有几个人能走下转轮。

在他对极端主义进行抨击后，他决心坚持到底，他谈到了自1945年土改以来，困扰张庄的几次严重违背人所共知的团结原则的情况。“我们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地主、富农。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张庄仍然没有真正执行这条路线。我们仍然有极‘左’的倾向。”范机灵说：“当我们谈到各种中农时，即使他们有的甚至是党员，我们也说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好，在使用他们当干部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这是那一种宗派主义呢？”

“在处理土改期间被非法斗争和没收财产的问题上，直到今天我们

仍然不称他们是贫农或中农，甚至错斗贫农或中农，我们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还是认为他们的出身不好！这是那一种宗派主义呢？”

“另外还有地富子女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根据基本情况来对待他们，即根据他们实际思想、感情和行动。如果他们赞同社会主义，我们就应该和他们一道工作，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但是在张庄，我们把他们拒之门外，不给他们出路。”

“还有，有些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像一个年轻人，他父亲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但是他母亲后来嫁给了一个贫农，这个人愿意当贫农的儿子，自从一岁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然而，有些人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不允许他做贫农的儿子，而只能让他做反革命的儿子，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团结这种人的办法，怎么能团结95%的人建设社会主义呢？”

范机灵的话，其作用是惊人的。从他把“二宝”和阶级敌人区别开来那一刻开始，我突然感到如释负重。随着他批判一种又一种极“左”倾向，我的思想倒感到越来越轻松了，仿佛我又回到了1948年，那时陈书记在踏城大庙里，揭露并谴责严重违背土改政策的极“左”的贫雇农路线。当陈那天讲话时，光明似乎照亮了黑暗的隧道。我们曾被禁锢在这个黑洞里，弓着腰，两眼一摸黑，摸索着向不断远去的出口行进。突然我们发现自己挺胸昂首地，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迈步，能够朝着合理而统一的目标自由迈进了。

我再次强烈感受到的自由空气显然震撼了会议室的全体群众，农民们全神贯注地坐着静听，有些人在静静地微笑，有些人在点头，没有一个儿童呜咽，也没有一个婴儿在哭闹。

最后范机灵着手处理小申的案子，“二宝”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公社党委说他“领导一伙地、富、反、坏夺权”。把他开除出张庄支部。

“根据最近几个月的调查结果，我们了解到对小申的指控大部分是假的，”范机灵说：“我们要求公社党委重新考虑这个案子，我们愿意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中充分讨论这个问题。”

范机灵再次违背了长篇大论讲话时要笼统的原则，抨击起一个具体案子。他作出了不但会震惊张庄现状，而且会震惊马厂公社现状的大胆的政治见解。因为，如果公社党委要推翻有关小申的决定，当权

者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对误判负责。当权者就不得不承认参与了长达四年多的诬陷活动，承认这样的事实严重性非同一般，这不是一种孤立的事件，诬陷小申几乎可以肯定牵连着一系列的诬陷和一系列残忍的政治决议，所有这一切都要由于翻这个案而受到质疑。

范机灵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公开怀疑开除小申的决定，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它可能在公路沿线激发起一系列爆炸事件，下自长治市行政区北端的黄碾，上至市委本身，而且肯定也会触及到地区的。

这个宣布非同一般，人们对待它的反映也是非同一般。尽管天色已晚，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会议室。人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倾听范机灵下面要讲的话。

这个年轻的市委干部前额突出，手指被烟熏成了黑色，以朴素的演讲风度，号召学大寨而结束了他的讲话。

“这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市委决定三年建设大寨市，但是张庄种小麦取得一点成绩就开始自满了。我们下种小麦干得很漂亮，因此，我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彰，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自满自足，放松警惕……解决张庄的问题，不能只是慢慢地向前爬行，必须跑步才能迎头赶上。由于现存状况，我们的土壤和粪肥都无法满足‘过黄河’的需求，更不用提‘跨长江’了。只有我们充分具备了‘过黄河’的条件，我们才能保证‘过黄河’。因此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

“张庄现在是世界闻名，但是，老韩阔别二十三年回来，结果发现我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你感到脸上光彩吗？我认为不应该！”

范机灵讲话结束后，他的听众鼓掌欢迎，他们拍手拍了好长好长时间，我也拍手喝彩。我想做的不仅仅是拍手，我想冲上讲台拥抱这个人，因为他一个晚上就消除了数周之久的愚民政策和不良的气氛。不仅仅如此，他为消除笼罩全村数年的不公正行为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举动，我真不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可能是宣传队进行了辩论吗？可能是过去几天内卡玛和我坚持不懈地极力反对范机灵和林东的结果吗？或者是市里发生了什么事，引起这种基本的重新评价？

在张庄逗留期间，我从未对这些问题得出一个接近的答案来。但

是，当我们10月返回北京，我们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不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不是在市里、地区，甚至不是在省里，而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张庄宣传队把“二宝”当作阶级敌人的9月初和9月24日范机灵改变斗争策略期间，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出逃，坠毁在外蒙古大草原的某个地方。图谋夺取最高权力反对毛主席、阴谋家林彪的背叛和自我爆炸的消息被彻底封锁了，但是，作为小道消息，通过内部途径一直传到小学生。这消息震惊了共产党、政府官员，以及上上下下的人民。表面上看这种大动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似乎不可能影响到张庄的基层政策，然而，林彪的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极‘左’的教条主义的象征，长期以来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林彪垮台不到两周，左倾教条主义在张庄首次受到迎头挑战，能仅仅是巧合吗？

范机灵最终对当地“文革”的主要决议提出质疑，和北京新闻广播突然补充一句“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日期都在同一天，难道是纯粹的巧合吗？

巧合是不可能的，可能是林彪逃跑和死亡后，在全国施放出一种缓和的信息，这已足以向他名义强加于人的阶级斗争进行挑战，这股潮流在上党地区势不可当。像范机灵这样的干部，对政治潮流的最微小的变化都是极其敏感的，他已经在为适应这种气候的转变见风使舵了。

八十八 深翻，耨玉米， 精彩戏剧和平反昭雪

我们74名社员个个身强力壮，人人扛着一把大寨铁锨，走向村西大平原上。这种铁锨是大寨人为了深翻设计的，是在一根粗壮的木柄上，楔上一个长而扁平的钢铲子。一个深翻者，把一只脚蹬在铁锨的突出部分，可以使铁锨入地八九寸深。用双臂把直立的铁锨柄猛往后一压，他就可以翻松一整块地表土层或一块草皮土。他可以把表土层完整无损地铲出来，放在左侧前一下挖好的土沟里。然后，后退一小步，再重复这一动作，用脚猛一蹬，翻动并挖掘起——另一块6英寸大的土块。

用人力把土层移动到左侧挖出的长沟，为这一过程的后半部分作了准备。深翻者完全扭过身子，站在沟底，再用一只脚的协助，把钢锹猛蹬进坚硬的下层土，这层生土有多厚就踩进多深，其深度通常大约是表层松软土壤深度的2/3。把木柄再往后压，可翻松一块草根土，熟练地把土地翻转过来，打松打碎，重新放回原来的坑里。通过一步一步逆向后退，可以把脚下所有的生土按顺序翻过来，于是在地里深翻出一大锹宽的狭长地带(约8英寸宽)。

深翻者一旦最后到达地边缘(地表层一端)，他再次转身，踩在他右侧未触动土层上，并接着继续把土块一块又一块移到翻过的新土旁边。整个过程对土层的作用和一把好犁的作用一样：把表土层正好倒翻进相邻的犁沟里，对新土的作用相当于一把好农用耙子，把从未犁过的死土层搅动并弄松软。用一把好的大寨铁锹，一个精力充沛的农民，可以把地深翻14~16英寸深。一天在地里干上10小时，每个深翻者可深翻1/40英亩，在40天时间内深翻400个小时，一个人可以深翻1英亩(6.07亩)地。1971年10月给72名成员的深翻突击队规定的目标，刚好一天不到2英亩。如果保持这种速度劳作70天，大队可以为1972年粮食大丰收，准备800亩(133英亩)土地。

人们设想深翻土地能增产，地翻得越深，产量就越高。人们希望翻地能使地表土透风透气，增加雨水渗透，加速无机物分散，这样对来年春天耕种庄稼非常有利。据我所知，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科学的对照实验来充分检验过这个理论。它所以被人接受完全是凭信仰，深信耕地是农业的关键和灵魂。深耕细作，是大寨农民解释他们庄稼丰收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从大寨传遍全国四面八方。

事实上，深翻热潮在大寨闻名全国之前就开始了。“大跃进”时，深翻土地从河南开始兴起，当一个又一个县领导，为了千方百计互相赶超对方，要求修整高质量土地时，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走上了极端，在兴奋高潮里，雄心勃勃的农民把一些地深翻3英尺，甚至4英尺深。但平平的收成，得出了“不合理”的深翻(三至四尺)，是劳民伤财，甚至可能有害的，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普遍信仰的“合理”深翻(一至二英尺)。1971年，党委突然又把深翻列入了山西的议事日程(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省份)。

马厂大队全力以赴，开展深翻运动后，张庄领导开会讨论了这件

事。公社何书记把这种方法介绍给大家。他们决定作出特别努力，并提出25岁以下身强力壮的男女民兵，成立突击队。每个生产队民兵从自己队伍中选出12名最佳成员，派他们参加10月11日的动员大会。在这次会上，他们要制定他们的“战斗”计划。突击队员决心尝试每天每人深翻1/40英亩地，每季每个民兵排深翻22英亩。从早到晚深翻，早饭午饭运到地头，饭由生产队准备，而不是个人准备，而且每天在各排之间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看哪个民兵排深翻得最多最好。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是我们8月到达张庄以来，参加的最活泼热烈的一次会议，青年人喜欢挑战，知识青年作为特殊单位一起干活儿，共同承担这项伟大任务，尤其是姑娘们更是如此。她们看上去大约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她们确实已十七八岁了。她们穿着机器缝制的鲜艳多彩的短上衣，三人一团五人一组地紧紧挤在一起。她们手拉手，一个斜靠着一个，互相紧抱在一起，有的大笑，有的哧哧地笑。她们向小伙子们提出了挑战，走过来开始和小伙子们进行讨论。他们每一班能翻多少地？他们应该向那个排挑战？他们应该做什么饭？谁有铁锹？等等。相比之下，小伙子们似乎显得缺乏经验，有些紧张。不过，会议快结束时，他们也眉开眼笑，跃跃欲试了，显然是姑娘们使他们产生了兴趣的。

高法官在开场白中避开对深翻的价值进行讨论，把支持深翻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当我们设法深翻时，阶级敌人出来说，这里的土地不好，耕作不能改良土壤，他们说，你越深翻越糟糕；另外的人说，只是那种活儿太苦了，搞深翻得不偿失，这是懒堕怯懦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那些试图破坏“三秋”工作的人，我们必须开展批判运动，我们为革命而深翻土地，深翻是一种革命，实际上这是阶级斗争。”

经过那种介绍后，没人敢提是否承担任务的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问如何进行深翻，人人都要高产。公社说，深翻会为高产铺平道路，因此咱们赶快干吧，此外，谁想被打成阶级敌人呢？

第二天，地头一切进展顺利。民兵队长陆向仁要求每个排保证带一面红旗，他把地分开，72个人可以同时一起深翻而互不影响，而且在整个地上不留沟槽痕迹。韩琼和我向郭真宽借了铁锹，参加了“战斗”。天空阴云密布，一股强烈的西风朝我们吹来，把丝制的红旗吹

得乱舞，啪啪作响，宛若赶骡人挥舞鞭子一样，每当风势减弱，我们才能停下来透透气，但是没有人感到天冷，用那样的速度翻地，他们怎么能感到冷呢？一铲、一压、一提、一推、一挺、一扔，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如果我们花时间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深翻过的地在不断扩大，而布满茬子的地在逐渐缩小，首先随着小方格扩大，然后方格迅速连接在一起。我们发誓要坚持下去，至少是那一天。但是从未有人说，我们完成了1/40英亩的任务，即使我们又去参加了两个下午。

我所以参加深翻，是因为我们要尽一份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深翻。我深翻的距离越远，我就越对整个工程感到扫兴。公社拖拉机可以轻而易举地耕九英寸深。用一个镢子可以再破开五六英寸的土层，而几分钟内翻完的土地，这群人几天也完成不了。这是多大的浪费啊！多大的浪费啊！但是没有人有拖拉机牵引的镢子，甚至没有人听说过，据我所见，没有人对镢子感兴趣，因此从早一直到晚，猛铲、翻、举起，猛推、举、扔。天黑时，大队会议室上的大喇叭，那天第二次震耳欲聋地广播着“东方红”。这次喇叭公布了深翻结果。风从我们身旁吹过，朝大喇叭刮去，甚至“东方红”乐曲雷鸣般地播放声听起来显得微弱而遥远。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后，去五队打谷场去看分配秋粮。电杆上高挂的度数很大的电灯泡，把整个空地照得通明。空地的北面，堆放着齐肩高的一捆捆谷草挡风。正中间是两堆扬净的谷子，较大的一堆谷子呈淡柠檬色，是普通的谷子；较小的一堆谷子，金黄灿灿的，是高质量的“黄”谷。只是为了开玩笑，我们轮流估计大堆的重量，估计数字在8000~28000斤。过了称后，库房保管告诉我们数字是15586斤。很容易理解“大跃进”期间，用估计的方法，是如何夸大产量的。公社干部看了谷堆，进行了相当准确的估测，并说出了估测结果，很快政府来寻找没有在那儿堆放的粮食。就农民而言，他们几乎总是低估产量，他们上报的粮食越多，上交越多，而且向国家出售的合理份额也就越多。

复员军人老王说，有一年故义大队就少报了5万斤小麦，但是公社书记发现了，因为几个社员说漏了嘴。一个故义妇女嫁到了外村，但是拒绝搬走，她只分到了普通的平均份额，而没有额外隐藏的小麦。

她去公社办公室发牢骚。

“我没有分上额外的粮食。”

“什么额外粮？”

“他们不记账的粮食。”她说。仿佛整个骗局是大家都知道的。

于是，公社书记请大队主任去吃饭，他确信倒了许多高粱酒后，大队主任一时没留神，就夸耀起庄稼大丰收来。

“我额外分的小麦就有五百斤。”他说。

第二天，公社书记随便去闲聊。

“那五百斤怎么处理？”他问。

“谁说过什么五百斤？”

“你说的，昨天晚上你喝酒时说的。”

“噢，我记不清昨天晚上我说什么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儿没有隐藏的小麦。”大队主任愤慨地说。

后来，马厂公社召开了大队干部会议。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大队隐藏粮食。”书记说：“无论谁，问心有愧现在就报告，坦白出来，我们不会作为问题，但是如果现在不报告，我们可不能保证将来。”

没有人吭声，但是当休会时分，故义大队干部转来转去，犹犹豫豫不想离去。

最后故义大队的主任说，“给我们粮食数字加上五百斤。”

于是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那天晚上，在第五队打谷场上，按规定平均分配，不论男女老幼，每人80斤普通谷子，20斤“黄”谷子。前一年就是按这个数字分配的。这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最后份额，只是完成收割任务之前的预分，还有大量的玉米仍然需要风干并过称。最后的分粮数不会是一样的，但是会反映一年期间所挣的总工分数。同时，生产队干部免费分发谷子，使每个人都能生活下去。

查对者把谷子倒进像泥瓦工用来混和灰泥的泥斗样的木箱子里，在台称上过称，钉在箱子两侧的木板，每一端都突出来当把手用，记好重量后，两个人可以抬起箱子并运到一边，把粮食倒成堆，代表某家的一份粮食。然后，家庭成员把粮食装进口袋。有时家庭成员当谷子倒出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口袋，他们设法撑住口袋，以便把粮食直

接倒进松软的口袋里，但是由于箱子是方形的，不圆滑，好多粮食还是撒在地上，因此不得不扫起来。

为了保证过称公平合理，负责管台称的人是另一个生产队的。第五队核查者为第二队称粮食。理由是，外单位的人和所分配的数量无利害关系，因为不会影响自己的份额，所以不可能有偏爱和作弊现象。

五队队长郭真宽十分满意这种分配粮食的办法，谷子产量比较高，亩产比前年高70斤，因此，份额量看上去很充足。真宽喜欢集体收割、集体分配。这比过去的传统做法要简单得多。过去家家都得自己打扬粮食，并把不同的粮食分隔开，然后，小堆粮食堆满了打谷场，因此很难保证互不掺杂，他要确保我们懂得了这种区别。

当不同的家庭装口袋时，我四处转来转去，看他们是怎么装的，并和他们进行交谈。他们情绪高涨，因为谷子充裕，会把每家装谷子的坛坛罐罐装得满满的。但是，当我们提起玉米的问题时，人们都摇摇头，那时，正在收割的玉米看起来收成一点也不乐观。8月份，人人设想每亩玉米会产三百多斤，因此可以打破张庄所有的粮食记录，把全村的坛罐都装满。然而下大雨期间，叶子枯萎了，阻碍了庄稼生长。正好像严重的霜冻袭击了地头一样，许多玉米穗儿未能成熟，许多柔软的玉米颗粒随玉米的枯萎而干瘪了，远远没有长够正常的高度。受害最严重的品种是，吹捧很高的单交品种南单15号，这是花费很大的代价由专家引进上党的新杂交品种。张书记千方百计要打破过去的保守主义，极力把这个品种作为科学上的突破，当作革命者应该热烈欢迎，并付诸实践来推广。他自己所在的二队，大面积土地播种这个品种，而此刻由于阴雨天气，造成了叶子枯萎，他们为这个品种严重减产而痛苦。另一个单性杂交品种“文革1号”（文——文化，革——革命，——显然政治统帅着种子培育）生长得比较好，然而，所有品种抵御自然力量强的还是老牌自然传粉的“金皇后”和“白马牙”。这是多年以前从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引进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靠得住的品种，1971年的庄稼可就接近灾年了。那么，大队就得像小麦减产后，他们曾呼吁国家帮助度过夏季一样，向国家呼吁救济粮过冬了。

容易导致这个新杂种叶子枯萎的原因是，培育该品种时掺合了得

克萨斯雄性不繁殖的基因，这种技术，可使美国大种子公能不用人力去掉玉米穗状雄花以杂交，而培育出新杂种玉米。

他们没有用人深入地头，把可用作雄性穗状的产生者的雄花切掉，因为得克萨斯雄性穗状雄花不产生花粉，他们没有意识到，携带这种不繁殖性能的同种基因也携带着抗枯萎力低下的特质。1970年，他们的错误威胁到全部美国玉米的收成，得克萨斯玉米雄花，带来1971年威胁中国大部分玉米的收成的问题。

南单15号的失败，不仅对优良杂交玉米是个灾难，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声望也是一大灾难。许多农民无论如何，再也不愿种单性杂交品种了，他们不相信这些品种。他们所以能说服这样做，是因为这是“科学”。当单性杂交品种失败后，科学实验失败后，需要好几个丰收年，好几个新优良品种，才能克服那个季节科学自己本身获得的坏名声。

宣传队不顾所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不能认真对待南单15号的失败。高法官拒绝把二队的灾难怪罪在玉米种子上，而是指责工作草率、组织松懈和保守思想。他争辩说，既然各个队分到都是同一种改良品种，而且各个队播种的数量也一样，如果收割季节收成有区别的话，就是因为管理不善，二队只能怪罪自己。他提出对分配种子问题进行调查，发现是否新品种确实进行了公开分配。但是，这次调查没有所获，因为尽管每一个队领到各个品种数量相同，但是大部分生产队没有把所有领到的种子全部种上，当然没有把单性杂交品种全部种上。尽管他们有权怀疑过分依赖未经试验过的品种，他们又重新求助于自然传粉的“金皇后”和“白马牙”。对这两个品种，他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自己保存的玉米穗上的颗粒脱粒下来就行。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上级干部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被指责为“保守主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指控可以轻而易举被宣扬为反革命。

有幸的是，1971年后，仍然有足够的“保守主义”来确保了大面积粮食丰收。所以公社、大队和支部领导设法大力使用新品种的生产队，招致粮食歉收，那些不暴露自己意图的生产队，只象征性地种了一些新品种，还是相信老牌靠得住的品种，结果获得粮食大丰收。这对任何有种田经验的人来说，本来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不幸的是，宣传队干部都不清楚，他们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它的本质。

他们如此渴望现代科学，现代化玉米育种和新技术，去取得突破性进展，去战胜盲目的保守主义，以致于他们拒绝承认这一次科学实验失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失败完全是由于气候变化莫测造成的，如果那年气候正常，收成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干燥季节新杂交品种的产量也许可能会超过老牌品种。科学本来就应该以一往无前的胜利姿态载入史册的。然而那会是一种可疑的胜利，因为面临叶子枯萎的新品种暴露出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潜伏着，等待着未来的阴雨之年，到那时，农民会在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上种上易倒伏的玉米，那么，庄稼大面积歉收很容易导致大的灾难。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民的独立性。他们一次又一次自己拿主意，勇敢着手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而不顾上级的过分指示。当事情不起作用时，或半信半疑时，他们就退缩不前，避而远之，用自己的方法去办事。关于这一点，说得越少越好。干部们不懂得的事不会伤害他们。有时干部之间的隔阂，确实导致扩大为重大的分歧。

当干部们坚持己见时，经常导致灾难性的打击。农业局官员坚持要在去长治路上的李村沟种植果树，他们把这项工程叫做国营果树场。许多农民说这个地方土地太潮湿，不适合种苹果树，但是市里干部反对保守主义，无论如何要坚持干，结果树上从来未结过苹果。许多年后，干部们把果园改名为“新乐村”。究竟乐在哪里，他们从来未清楚解释过。至少“乐”（幸福）不能像苹果一样放在台磅上称一称，因此谁能说那儿没有幸福呢？

壶关北面的农民，很久以来，就在最后一次锄地后，在玉米地里种豆子，收成挺不错。然而公社干部命令他们种谷子，农民们说“长不出谷来，”但是干部说：“在长治能长出来。”于是1971年他们全部种上了谷子，结果都是一无所获。他们没有市内菜农能得到的浇地用水和粪肥，以及化肥。

老八路王为农民的无所适从很开心。“有时候最落后的人最聪明，辨别力最强。”他说，一个生产队或大队，一旦成为先进单位，社员们就感到要保持荣誉。于是，如果他们锄地，他们要确保锄马路附近的庄稼，以便大家能看到他们锄杂草的质量。凡是不明智者费力拨开庄稼进了地中心，可能会发现杂草丛生。落后队没有荣誉要保持，在最关键的事关产量大局的地中间，辛辛苦苦锄地，如果地边沿角落有

些杂草谁会在乎呢?说他们落后,他们同意。

“好吧,我们是落后。”他们会爽快而令人讨厌地说。

范文公开改变立场,突然不把“二宝”称为阶级敌人了。那天后,随着伟大的收秋运动的促进作用,人们惯于把半枯萎的玉米穗堆放存放起来风干,方便脱粒,直到把玉米剥下来压成面,以及为夺取来年大丰收开展深翻运动。那次关键性的群众大会,成了整党的最后一次大型活动——至少是收割任务完成之前的最后一次,在田间开展新的运动动员。第二天早上已开始了第一件事,但是,有些队仍然在完成小麦下种扫尾工作。

大队干部分配15%的劳力来结束麦地下种,85%的劳力收割谷子、高粱、豆子和玉米。他们鼓励大家全部出动。砖窑的副业队工人答应,上完白班后,晚上参加收割,面粉加工人员派出两个人全天参加收割,只有一个留在家加工面,一直工作到深夜。六名会计全部自愿全天下地,答应以后平衡帐目。甚至卫生所的医生,药房的药剂师也自愿下去,并随身带上急救包,供应急之用。学校教工临时停课,所有的小学生或者参加收割,或者捡拾收割人员落下的粮食。长治市农村工作部传来指示,停止一切建设项目——不修建任何房屋,不修建任何库房,所有的人员必须报到参加收割。另外一项指示命令所有的拖拉机不准上公路,不准拉任何东西,直到秋耕结束为止。任何拖拉机一旦在公路上被拦住,将一律扣押,直到有新通知为止。第三项指示命令,所有市干部和学生,全部去郊区帮助秋收。当解放军的崔司令和长治市革委会副主任在张庄停留,和我们聊天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至少还是有些人会响应号召的。崔风尘仆仆、汗迹斑斑的军装证明,他在东边部队的稻田里度过了一天。官兵们在那儿已经提前完成了收割任务。

张庄副主任申起财在大喇叭里通知各队、各小组注意先进事迹,并报往大队办公室,然后通过喇叭表扬先进人物,鼓励继续做好工作,这样可以激发其他人迎头赶上。此后,每天中午广播期间他表扬几十个人。

当大部分庄稼收割完成以后,深翻动员已经开始。72名青年男女民兵,在每个队地里每次集中力量轮流深翻两天,而其他劳力继续完成收割剩余的庄稼。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再次感到这个相互协作的村庄的巨大的集体力量。每当有了重大任务，每当方向明确后，张庄有能力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动员群众的脑力、体力和热情。由于面临着挑战，张庄此前存在的长期不和、满腹牢骚和怨恨不满等现象正逐渐消失，任性失去了刺激，人人精神抖擞，上阵帮忙。观察这种场面令人激动，亲自参加进去也令人激动。

当然，如第六队队长陆玉发发现的一样，甚至收割高潮，也不可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他派一组小学生去豆子地里干活儿，他让每个男孩割三行，当他返回豆子地里时，发现地里一个人也没有。年喜的儿子把手指割破了，由于他不能再干活儿了，他说服所有的男孩放下刀和他一起玩起球来了。当陆玉生找到他们后，批评了带头的：“你把手指割破了不参加收割可以，可是为什么把其他人都拉走了？”

年喜的儿子生气了，“你不但管我们的日常工作，而且把我家人的命捏到你手里。”他说着大踏步地走了。

就在那天下午这个男孩不见了。

年喜的妻子来到队部辱骂起来了。她指责陆玉生把她孩子赶跑了。她甚至声称“我们的命捏在他手里”。这是她孩子的话，不是玉生的话，但是利用这些话她把队长说得哑口无言。他感到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从大队借了80元钱，去看望了那个孩子。

第二天，年喜的儿子自己回来了。原来他的失踪是个意外。他离开地里后，去铁路大院玩耍，他爬上一节货车坐车挡板上，突然火车开动了。火车走得很快，这个男孩不敢下车了。货车把他从长治北一直拉到新乡，货车挂火车头时才停住。他去了那儿，既没钱，也没吃的东西，他用了整整一天才回到家。

他的母亲丢尽了脸，他曾把队长臭骂了一顿，责怪他赶跑了她的儿子，然而错误在她的儿子，而不在队长。当陆玉生找不到孩子的任何踪迹，心烦意乱地最终回到家中时，她不得不向他道歉了。

当离我们规定起程的日子接近的时候，地里的活稍有放松，剧团决定为了我们而演出最后一个晚上。预料观众要大大多于挤满大队会厅参加整党的人数，这个剧团决定，利用仍然占用在旧北庙地址南边的露天舞台。庙院里残存着一切，凭自己的质量，仍然像一座小庙，

坚固的竖梁结构，砖砌的平台，砖墙和向上翻起的铺瓦屋顶。这个平台前是一个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一个遍布碎石头的院子。这套布局是当地演出的理想场所，只要天气晴朗，任何时候都可演出。而且10月20日夜晚天气的确很好，只是空中有许多蚊虫，因此，人们必须保持警惕以防被蚊虫叮咬。

演出还未开始，早就聚集了的大量的人群，把整个空地围得水泄不通，一直到最后一名演员退场，人群才散去。不仅几乎所有的张庄人全部到了场，其中包括在村里租房住的工人和家属，而且还包括住在村南的解放军坦克部队的所有战士，以及住在旧天主教育婴堂的卫校师生员工。此外，铁三局建设公司的许多人也穿穿越铁道来观看了。

按照习惯，大队为坦克兵保留了空院子里最好的地方，他们在舞台正前面紧紧地占了一块地方，只有为韩琼、我自己、中央来的林东，以及我们地区随行人员安排座位，插在这方块之中。作为贵客，我们不仅享有为我们留下的位置，而且也还有坐的板凳。

张庄表演者面对前面如此众多的观众，他们穿着鲜艳夺目的戏装，化了妆，全力以赴演出了以前未演过的两个长剧。在我看来，化妆并不一定十分成功。我认为当地的姑娘，平常自然状态下就够漂亮美丽了。每个人的特征、相貌各有千秋，美丽动人。他们脸上擦上香粉，涂上胭脂，眉毛和眼睫毛画成黑色，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像一排色彩瑰丽的时装模特儿，只有一种表情——一种凝固的、无意义的微笑。但是，不进行化妆算什么戏剧呢？没有矫饰算什么剧场呢？因此，在长治市剧团邀请的戏剧顾问的帮助下，张庄的演员化了妆，披挂上鲜艳的服装来装饰自己，如果不是包装需要的话，他们也准备再现他们非常喜爱的农村剧团演出的悠久传统。

尽管我不喜欢化妆，但是化妆对他们的舞蹈及表演并无影响。由于受到那么多观众的鼓舞，自从庙会以来认真紧张的排练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演出的节目十分精彩，把全场观众都迷住了。青年妇女们跳的踢头舞，真是炉火纯青，无可挑剔。青年男子热情地在欢快、雄浑的合唱下演出了大寨讽刺剧。但是，那天晚上真正的明星是负责药房的药剂师王玉梅，陆家受压迫的媳妇，宣传队每天早晨就在她家进行学习活动的。

玉梅在两个表演非常出色的节目中担任主角，一个是《兄妹开荒》新的改编本，这是延安革命早期的一部小歌剧，另一个是《给解放军献礼》，这个小组演出的这个小短剧似乎主要角色是张庄农民。考虑到新的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这个小剧已经有些过时了。讲一个名叫小红的姑娘，她爷爷试图想方设法说服当地部队在“八一”建军节时，接收百姓礼物。由于清楚地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不能拿人民一针一线，部队无论是官还是兵，都不能明知故犯，接受人民群众的任何礼物。两个人练习了各种计策，希望通过善意“欺骗”方式完成通过正面途径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轮流担任警觉的军人角色，和真心诚意的送礼者。小孙女在把当地十年制学校学生制的肥皂，放到她爷爷手里，没有成功。他三番五次提醒她，军人不拿人民的任何东西，但是，当爷爷担任送礼者的角色时，他开始一段活泼的独白，赞扬部队的功绩和人民的感激之情，他的孙女完全被吸引住了，不经心地把放在她手里的肥皂牢牢抓住了。

“看，这就是你要的东西。”爷爷得意洋洋地说：“你已拿住了。”小红完全明白任何军人都绝不允许其卫兵消沉到那种程度，她垂头丧气地说：“是。”

“但是毕竟只是我接受了礼物，而不是任何战士。”

“说得对，”她爷爷说：“他们是不能轻而易举糊弄了的。”

最后，小红决定偷偷混进营房，携军人们的脏衣服走了。和一伙朋友一起在村头麻池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以那样的方法，军人将不得不接受当地土制肥皂，而没有把任何有形物质拿到手中。受到这个主意的鼓舞，小红和她爷爷愉快地分手了。

王玉梅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倾注到这个角色之中，当她发现自己受愚弄，牢牢抓住肥皂时，沮丧、失望和惊愕的表情深深打动了人心，而当她想到已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后，她喜悦的表情，富于强烈的感染力。玉梅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以前表演中，她的歌声曾激动过我们的心弦。

她拥有一副朴素的面容，但是，有一种吸引人的美，微鼓起的眼球使她的眼睑略向外突出，而凸出的牙齿又使她的嘴唇向前伸。和向后缩的面庞结合在一起，这些容貌使她有鱼一样的外观，但这是一副生气蓬勃的脸。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使她显得丰满，稍嘟起的嘴唇，

配上她那双闪亮的眼睛，相互映衬，而融为一体的带着酒窝的面庞，表现出难得的热情和活力，一根粗壮而乌黑发亮的辫子，从她的后背一直垂到臀部，交替地抚弄并跳离她那苗条的身体。通过她的运动和她面容或手势的作用，更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她的心情。

玉梅的身材特征尽管惹人喜欢，但是，这并不是她舞台演出成功的秘诀。秘诀是她把自己和所演的角色融为一体，使每句台词、每个招式都有助于恰如其分地表演，而要领悟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由于扮演和她自己十分相仿的年轻姑娘的角色，可能有人会这样争辩说，演这种角色不需要多高明的演技。然而，具有同样身材天赋的其他人，也是扮演他们自己，却不能与她在舞台上塑造的令人可信的、被解放了的乡村姑娘的形象相媲美，至少我轻而易举地被她吸引住了。

在这个短剧中扮演爷爷的男子也表演得非常出色。在中国至少在工人学生中，有一种把农民，而且尤其是老年农民演得过火的倾向，把这个角色变成滑稽可笑的模仿，而不是真实地塑造乡村老大爷这种人物。但是，这位青年演员远远没有把这个角色演过分，他非常尊敬地处理这个角色，因此，提供一个完美的陪衬角色，这样玉梅可以用她的才华来与其竞争。我后来听说，这个演员曾是个贪污犯，受到接受“群众监督的”处分，在村里仍然不得志。这种监督决没有影响他当一名演员。这个事实并不仅仅是临时的兴趣，原来他不仅能在张庄舞台上扮各种角色，而且每当剧团外出演出，当地剧团演出剧目，需要一两个短剧来使他们的节目更加丰满时，他也能参加，他还在长治大剧场演出过呢！

节目单已经用宣传的语言介绍了《礼物送给解放军》这个节目，“我们张庄大队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王玉梅退下舞台时，范机灵把她叫到旁边提了一个建议。当范讲话时，她站在旧瓦屋顶旁边的投影中，背斜靠着石造的建筑，一只手梳理着头发，由于她扮演这个角色心情激动和长时间的掌声，她的脸涨得通红，看上去显得尤其动人、娇柔，甚至有些卖弄风情，因此，使范机灵很难保持他的矜持。

“为什么这个节目一开始用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不适当的词？”他问：“这不是浮夸吗？”

“嗯，是，”玉梅承认：“说张庄，人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十年制学校也不制造肥皂。”

“那么，你们为什么自称演的是我们大队呢？为什么不说这是演某个其他大队呢？”

“那……”玉梅犹豫地说，她的眼睛看着地上，“我们想假设事情就发生在这儿，这样可以使一切显得更加生动，而且我们十年制学校的确炼铁，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肥皂来。”

“好吧，”范文耐心地说——除了她婆婆外，谁会不对这位腼腆的青年妇女彬彬有礼呢？——“如果你们必须假装这确实是张庄，至少要把‘翻天覆地’的说法改成像‘巨大变化’之类的句子。”

王玉梅同意了。范机灵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转向站在旁边的治安主任老申，问这位市里干部是否比他年龄大。

“我是小指头，他是大拇指。”申说：“他领导全市造反派哩！”

关于这个问题——夸大“文革”的影响——范文试图完成他在总结整党运动的群众大会上作的讲话，一旦他谴责起极“左”的事物，就发现有无数的攻击目标，而且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几年来，夸张法已经代替了各条战线的基本常识，别在意实际形势如何，既然毛主席认为形势大好，我们也就认为大好，既然“文化大革命”应该改造我们，我们就赞颂改造。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呢？最高标准不就是看当时所刮的“风向”，并构想出与之相适应的言词吗？

我发现了范文突然喜欢有节制地陈述问题了，或准确地说是适度地表达而不是蛮横地夸大事实。这是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口号突然改变以来显示重大动向的又一迹象。

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欣赏表演是有代价的，似乎是如此，而且代价还很大。韩琼和我不得不上台表演节目。

我犯了个错误，在某些随便场合，我为一些朋友，特别是儿童唱了一些美国歌曲，并跳了几下木屐舞。现在全村都认为我能歌善舞，观众坚决不答应用“不”来搪塞他们。有人硬把一个手风琴塞在卡玛手中，并坚持让她演奏手风琴，她父亲配上动作表演。

最后我们没办法了，不得不接受挑战，否则这个晚上的剩余时间都只好一直对抗了，因为观众在治安主任申的总愚下没有显示出放弃

的迹象，一点迹象也没有。当韩琼最后答应表演时，我唱了一首爱尔兰移民的铁路工人在 Alleghenies 一个地方开岩礁的歌曲：⁴

老板来了说山脚依然如故，
猛击铸铁钻。
钻呀钻，拖延者，钻呀钻，
磨洋工者，钻呀钻。
整天辛劳只为一点糖，
铁路后，钻呀钻，磨洋工者，钻呀钻，
开炮，爆炸了。

新老板名叫吉姆·麦坎，
天哪，他是个该死的吝啬鬼，
上周打炮提前爆炸，
大吉恩·高夫被炸飞上半空一英里，
钻呀钻，磨洋工者，钻呀钻……

第二周轮到领薪水，
吉恩·高夫少了一美元，
他问为什么，老板说，
扣你工资，因你飞上天空耽误了时间。

钻呀钻，你这拖延者，钻呀……
开炮！爆炸了！

观众非常喜欢，特别是韩琼翻译了这首民歌以后，农民非常了解这种雇主的自私性。张庄曾有一个地主，不愿雇用在他附近村的人力。因为附近的雇工，经常愿意在雇工自己家的厕所解手，因此，就使地主丧失了粪肥。一个镇外雇工，通常住在地主家里，必须上地主家厕所，这样既提高了产量，又谋得利益。

我模仿大吉恩·高夫被资本家欺骗，用脚步沉重的快步舞表演了一个古老的佛蒙特木屐舞，激起了长达几分钟之久的猛烈的掌声。毫

⁴译者注：Alleghenies，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系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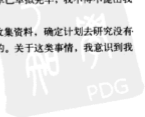
无疑问，的确这并不是地道的舞蹈，我笨手笨脚进行了表演，但是，因为它新鲜、特殊，所以也就美妙无比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我们在张庄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邀请所有大队领导干部赴宴。由于我用林东发给的中央的资金为宴会付了款，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折扣的姿态，但是符合外交礼节，使村里凡是参加宴会的人都感到高兴。

确定客人名单证明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为我熟知的所有人都提供座位和饭菜，包括喜欢交谈的、欠有人情账的人，或只是为了故旧起见的人。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则是，经过长期考验确实可行的，中国人认为当然的惯例，根据地位高低，从上到下，一直到客人名单填满为止。在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方案，因为我最敬重的许多张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如果我违反这个原则，我是无法保证给这个镇留下永久性记忆的。如果用他们容易理解的的传统礼节来限制我们所做的决定的话，那些被删掉的人，只能接受我的怠慢了。

然而，当林东提出客人名单时，她本人却违背了这个原则。她邀请了她喜欢的妇联副主任杨莲英，却删掉了她不喜欢的妇联主任陆书云。尽管我同样偏爱莲英，我还是对她的选择表示疑问，并建议她邀请两位，或者两个人那一个也不邀请。因为某种原因，我的不同意见使林东勃然大怒，她把我诅咒了一顿，称我是她所打过交道最难相处的外国人，说我是个惹是生非的人，而且还是个讨厌的家伙。一顿臭骂，她和我以及我的家属一起旅行6个月，其间所遭到的所有挫折，都以责难的形式统统倾诉出来了。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突然袭击。由于她被长期禁闭在这个文化落后地区，也因为我不遵循事先确定的某种合理安排，而是临时随机应变，哪条途径走得通就走哪条。因此延误了重要的个人及国家的计划和安排，为此她感到极度痛苦，而且，我们显示出突破现实的最大潜能。林东问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任何明智的作家按计划写一本书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事情都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旅游、工厂建设、种庄稼、教育、生孩子都是如此，为什么我的写作要例外呢？当时客人名单已草拟完毕，我不得不提出我的一套可笑的标准，来自找麻烦了。

我想说，书不能像建大桥那样来收集资料，确定计划去研究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困难的。关于这类事情，我意识到我



们的基本设想的相互差距如此之大，一个月的谈话都不会使我们能言归于好。于是我只是重新提出了我邀请人的建议——一个直截了当的按等级列出的客人名单，一个名单就会使一切迎刃而解，其他任何办法都无济于事。

林东骂骂咧咧，抗议着离开了房间。

那天晚上，当客人到场时，妇联主任、副主任双双出席了宴会。另外，大队所有的男性领导干部——生产队长、青年团支书、党支部班子、农协主任、学校校长、乡村医生、大队会计全部出席了宴会。我们频频举杯祝福，吃着大块肥肉，再加上高粱酒佐餐，这是一个活跃热烈的场合。韩琼和我不太喜欢肥肉，但是对张庄农民来说，这正是任何宴会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天天、月月、年年都是以粮食、白菜和土豆为生，食物中正缺乏脂肪，一大块3英寸厚的猪肚子肉在他们看来远比海参、鱼翅好多了。然而干杯四五次以后，我无论如何也分不清什么肥肉、瘦肉了。

宴会过后，张书记在大队会厅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告别，这次会议最重要的部分是范机灵当天接到通知，立即宣布公社党委已经给小申平了反，并恢复党籍和大队干部的职务。

这是一个好消息，极其好的消息。当范文宣布以后，大厅里的人都立即议论开了，我认识了二十多年的申起民——小申的父亲，走到我们跟前，深深鞠了三个躬，感谢我们救了他儿子的性命和他家的好名声。他似乎认为要是没有我们的出现，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清理这个案子，没人会给他儿子平反。确实在1971年是不可能的，可能他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出现使山西各级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张庄，因为我们计划写山西的历史，历史性的事件必须公正处理。

我们设法告诉老申起民，这次他儿子的平反并不是我们做的工作，而是负责任的党委，但是，他就是不肯听，他抓着我的手，对我是千恩万谢，深深地鞠了一个又一个躬。对我来说，这是令人为难的事，对他而言则是不明智的。因为公认的行为方式本来应该感谢毛主席，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他儿子才得以宣布无罪。但是老申似乎不在乎，他三番五次感谢我们，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小申高出他父亲一筹，不断用肘轻轻碰他父亲说：“幸亏毛主席，我才被无罪释放，我的问题才被澄清，才宣布我无罪。你最好记住毛

主席。”但是老起民不理睬他，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愿放下。

八十九 再见吧！张庄

我们于10月20日离开张庄村。中途在长治逗留了两天，以便会见李英奎司令员，进一步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乘吉普车前往京汉铁路的大站邯郸。我们的路线是向东穿过群山，再往下行驶。1947年我第一次访问上党时，乘卡车向上行驶时走的正是这条路。1948年我离开张庄前往北方大学新校址——河北正定，与教职工们会合，我和威云、谢虹时而步行时而乘骡车，那次走的大部分还是这条路。

这几年，公路系统职工大幅提高了高原公路的质量。那铺上厚厚一层砂砾的路面，坚固的桥梁和涵洞，维护良好的排水沟，昔日的土路已变成风雨无阻的通衢大道。长治与邯郸之间每小时对开一次长途汽车。在往南行的路上，随处可见正在繁忙施工中的新的东西铁路线——桥梁与石栈架已安置停当，一段段路基即将完工，还有一堆堆砂石、一排排枕木，各种形状与尺寸的推土设备。驶过涉县后，我们想辨认出1948年修的那条顺山沟而行的窄轨铁路，那是华北解放区的第一条铁路，但是加宽的公路和新修的铁路已经把它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尽管公路有了改善，但是农村风貌依然和23年前差不多。还是那么一个奇妙的地方：高耸的石山，黄土覆盖的丘陵和无穷无尽的沟壑低谷。几个由石块和土坯盖成的房屋构成的山村，巍然如中世纪的堡垒。其余的房舍或隐藏在无边的深沟之下，或附着在陡壁的斜坡之上。这些山村有的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从来没有破坏或侵扰过大自然。相反，它们似乎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就像那被溪流冲刷形成的黄土峭壁和株株杨柳一样，都是当地自然气候和地形的固有产物。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在果树的环抱之中。春天鲜花盛开，美丽得不可思议。此时是秋天，棵棵树上则是硕果累累。当我们向前飞驰行驶时，后面卷起了滚滚黄尘。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柿子树。那些伸出枝杈的巨树，足可与美国古老的苹果树试比高低，或比它们更加高大。此时，柿子树上正结满了颜色像桔子形状如“西红柿”的柿子。看到

这样的丰收景象，我们不禁恍然大悟，难怪中国人把我们的番茄叫成“西红柿”，因为洋柿子和中国柿子确有不同。紧挨柿林的便是核桃树。如果说太行山有什么特产的话，那就是核桃了。在我们飞驰而过的大部分村落的小摊上，到处都有出售的核桃——去皮的，带皮的，染上红颜色的蜜饯和核桃仁，真是应有尽有。

这些山村的诱人魅力总是令人难以描述。山村的颜色就是岩石和泥土的本色，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由岩石和泥土构成的。山村的结构布局是复杂的、多层次多平面的，是由当地的高原地形决定的。每家住宅都有自己的院子、猪圈、找弃食吃的鸡、癞皮狗，和壮观的山景构成一个独立王国；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互相依存的社会团体，远不是一个个单家独户简单相加所能比拟的。我真想不出，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加情愿欢度晚年的地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和我有类似的想法。当胡宗南大批部队从南逼进，她被迫撤离延安时，她哭了，而且谁也无法安慰她，因为她心里明白她不能再返回去了。延安的黄土丘陵和黎城的黄土丘陵之间没有多少差别。⁵

在“政治挂帅”的口号鞭策下，共产党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新农村”运动。破旧的、乱盖的住宅统统被拆掉，代之以一批批整齐划一的兵营式的排房。每堵墙、每个屋顶、每个院子都一模一样。每家前门朝南、后墙朝正北。大寨农民修建排房式石窑，因为他们的黄土窑洞倒塌了，而且在他们的山沟里修房盖屋只能朝一个方向扩展。可是其他山村模仿大寨，竟在各种各样的地形上修建起排房式住宅来。武家坪农民甚至宣称，沟沟坎坎土地上盖的小群传统住房不时兴了，不惜毁掉良田，在河滩地上修筑一排排新房。

我简直搞不清各地的这股“整齐划一”之风是从哪儿刮来的。难道这是新领导干部对控制农村人口问题的一种直觉反应？难道是幻想通过实行标准化、机械化，来发动群众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难道是农民激进分子采取强硬措施，搞平均主义，以便为每家每户创造完全均等的物质条件下的公平正义？难道它反映了对孔子以前井田制“正方直线，座北朝南”美学观的继承？不论原因何在，这股风严

⁵原注：斯特朗小姐的照相当然也和毛主席，党中央都在延安有关。

重地威胁着中国农村和自然美景和乡村生活的特色。

大家只能希望这股风尽快消散。

我们顺太行山脉的宏伟阶梯疾驶而下，从踞城到黎城、涉县、武安和邯郸。每个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前一座县城更接近海平面。途中我试图了解曾经耳闻目睹的一切，但无论如何煞费苦心也摆不平一些问题。有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遗产，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时，他好像已被贬为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厮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能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残酷竞争，那么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话)就像在政治上相互残酷倾轧。似乎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权力。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仅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唯一活动。在资本主义西方，那些拥有最多资本、最大股份工厂、机器和资源的人掌握真正的权力。他们支配国家，在政治舞台进进出出，或者狡猾地互相任意轮换职务。谁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就支持谁上台执政。他们既然继承自己的财富，其权力就相对稳定。总统可以换来换去，但是洛克菲勒们、福特们、杜邦们，麦伦们则代代相传。在“无产阶级”中国则不然，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领导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没有其他夺权场所，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没有判断谁能够、谁应该掌权的客观标准。“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者们5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谁该掌权要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据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果区分两条道路却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吗？“大队核算”就是社会主义吗？李英奎说程首創是叛徒，他就推动了革命了吗？程首創叫李英奎反动军人，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李快腿鼓励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小申吸收富农儿子秦根寿为新成员，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吗？

那时候最使我忧虑的是李英奎司令员所作的分析。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呆了1个月，然后在清华大学住了3个星期，我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证明中国的派性斗争是无原则的。周恩来总理

和毛泽东主席都把派性斗争看作是过度的行为。在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派的地方，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坚持和谈，说服双方不要夸大对方眼中之刺，而看不见自己眼中之梁⁶。各派应该把从前的不满和仇恨放在一边，互相伸出友谊合作之手。尽管晋东南执行和谈计划，但事实上，只有武装对峙和劝降的最后通牒，才结束了这场战斗。于是唯一剩下的命运仲裁者，就是人民解放军。军官们宣布一派是革命的，而另一派是反革命的。一派授以权力以资奖励，而另一派送到干校监督劳动或去农村“蹲点”以示惩罚。军官们跟踪一位被指控为反革命派的头头，在邯郸郊外的一个公社把他逮捕，并押回长治当作国民党代理人进行审判。军官们对他施加刑讯，逼他招供，把他腿都打断了。这一派其余的次要头头少说也被枪毙了六个，被毒打和监禁的更多。然而李英奎仍旧坚持，他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坚持捍卫社会主义道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改造中国的。

我曾回去深入地向李探询过三次，每一次都得到同样的和更加认真、详尽的答复。由于我不相信我听到的情况，一再坚持向他发问。因此，我被攻击为右派分子。中央来的林东对我说，她看不出我和其他资产阶级反动记者的观点和做法有什么区别，都对在中国听到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你不是把这次斗争的罪过统统推给‘红字号’组织了吗？”我们第三次见面时，我问李英奎司令员。

“文化革命中，派性斗争、封建氏族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都混在一起了。”李司令说：“我们晋东南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斗争的核心围绕着一人转——就是程首创。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他是掌握大权的阶级敌人。1967年夏天，在他成立‘红字号’组织以前，晋东南地区不存在派性斗争。一些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夺权之后，差不多快要解散了。后来程打起大旗，夺了革命委员会的权，还从部队拉出一小撮人，这样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那些不赞成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组织起来自卫。他们成立了反程的组织，支持革委会，支持部队。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里只有路线斗争，没有派性斗争。”

⁶译者注：源出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刺”指别人的轻微瑕疵，“梁”指自己的严重缺点。

“把一个领头人的性质问题，当作判断整个群众团体的准绳，而且仅凭一项指控就判定他是敌特，我想未必合适吧？”我仍然迷惑不解地问。

“在战争中，我们必须看准敌人阵线的弱点，进行突破。我们知道这是路线斗争，但是其他不懂。文化革命期间各种人都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要识别一个人的路线是否正确，首先要看他支持好人还是坏人。这是判断任何路线的标准。错误路线支持走资派，支持资本主义复辟，支持坏分子。”

“农村也一样。贫农走集体主义道路，也就是勤俭朴素、吃苦耐劳、改造大自然的社会主义道路。地富反坏却妄图走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道路。判断一个党支部书记是否正确，要看他支持什么人。如果他支持坏分子，他走的是错误路线；如果他支持真正的贫农，他就站在了正确路线上。”

“因此我着手证明程首创本人是国民党分子。他手下的人也都是坏人，或犯有前科的人等等。整个集团的目的就是反对解放军，反对革委会，反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代理人、叛徒、反革命分子。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因此突破口就在这儿，就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将来还有很长的大文章可做，可是我们集中对准这个靶子，我们就有力量。这就是斗争策略。”

李司令在结束他的陈述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程首创这个代理人是关键因素，是全地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搬掉这块绊脚石，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个人无论进行什么斗争，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点，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以这一重点为基础，我们就能战无不胜，就能紧跟中央，站稳脚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政治原则的丧失。原来夺权之道在于通过谴责反对派，在于对对方主要人物进行政治迫害，把他们一下子推向极端，打成阶级敌人、国家的敌人，一下子说成罪犯。中国的这种传统和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小说、诗歌，主要是在戏剧中反映了出来。梁山好汉，水浒山寨上的起义军，不都是因为遭到某种诬陷而被迫造反的吗？当皇帝的钦差大臣刘大人微服私访山东时，不也因遭诬陷而下监狱了吗？他不是发现狱中的难友大都和

他一样，同遭被诬告的厄运而感到震惊吗？在中国，夺权的第一步就是败坏前面挡道人的声誉。如果必要的话，就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指控。另一位水浒英雄林冲不也是受人诱骗，带刀撞入高太尉的白虎节堂，被诬陷为图谋行刺当朝重臣的吗？

令人胆寒的是这种手段带有普遍性。李英奎在地区这样干，范机灵在市里这样干，史昭盛在公社这样尝试，“二宝”在大队如法炮制。他们都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词——原则、矛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革命、反革命等。而每件事却按照古老的官僚传统行事，不能和任何多重状态，任何基层的主动精神、任何下级的不同意见相容并存。非专制的政权必然变为不稳固的政权。不论地区上下概莫能外。刘未老主任和张日清政委在太原诬陷“卫、王、王”，同时又千方百计相互拆台。他们都希望得到北京的指示和支持。那时在北京的大部分首脑人物，都忙于在全国范围内窥伺伏击他们的对手，而尚不清楚的是，核心人物毛泽东本人，在他反彭德怀一案和反刘少奇一案中，给别人示范的方式是什么？由于毛泽东主宰中央，无论他采用什么手段，都可以把自己的行动表白为合法的。但每当他为了权力斗争采取行动保卫政权时，不论他主观意图如何，其结果总是导致派性斗争。

1971年，我觉得毛确实为“文革”的派性问题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场灾难。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显然已不足以制止那些激发和激化派性的活动。派性是个人、团体、帮派以及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无原则的权力斗争。一旦由于中央发动，就会急速蔓延，很快失去控制，就会根据本身法则按指数曲线扩大，横扫一切障碍，使全国陷入困境。我无法从理论上对派性进行阐述，也不了解其规模大小，更没有真正感受到它所预示的灾难；然而我确实看到，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无理性的对抗，那里的整个区域就会遭殃，生产就普遍停滞而出现萧条。

“停止”和“僵持”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张庄当时的形势。这个村似乎在和自己作对，在漫长的季节循环中，显然缺乏一种驱使它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动力；但是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这个村庄的集体潜力。我看不出它的组织形式有什么根本错误或致命的问题。1971年的张庄与1948年相比，其变化是不寻常的，而且几乎是完全应该加以肯定的。无论用什么发展标准来衡量，张庄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以教育为例：——学校现有学生480名，专职教师20多位，整整一代人都有了文化。这有什么错误呢？旧社会整个张庄一年培养不到8~10个学生。土改后，个体农民无钱供子女受正规教育，组织起合作社才把办学校当成一回事。他们说，用一个指头办学校，用九个指头忙别的重要事务。

或以卫生保健为例：这个村有一个配备两名医生，一名专职药剂师、人员齐全的医疗所。还有一个合作医疗计划，保证所有的人每人享受一元钱的医疗保健费，是每一年吗？这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一个单干户能发动人们，一个早晨把全村的蚊蝇消灭干净吗？从物质角度上或有可能，但从组织上讲肯定是不可能的。

或以植树造林为例：为全村服务的林业小组，建有一个中心苗圃，每年可种植几十万株树苗。这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集体组织用其他方法能组织起来吗？

或以种菜为例：大队有六个菜园，每个十来亩大小，每个菜园都有几口水井供抽水浇菜地，都有几个行家管理。这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统一购买菜籽，成批定购化肥，还有统一销售蔬菜的市场。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没有一个这样的集体，这些菜地几乎是无法存在的。解放前，张庄只有神父种菜，其他人则去山上挖野菜。

或以住房为例：尽管张庄的住房是私有财产，修房盖屋是个人私事，但是大队制定了建房标准，并在村周围拨出土地供修新房。因此实质上是以全村最大利益为基础，有计划地发展住房建设。如果是合作化以前，地是零散的私人财产，这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当然，集体化的威力还是在生产领域里充分显示了出来。张庄村有能力动员大量人力完成，提高粮食产量，或进行新的副业规划等一切必要任务。上级提出深翻土地，72名青年人就全力以赴干了起来。在一场持久的深翻运动中，他们深翻土地800亩，深度达1尺多。不论深翻是否有益，这场运动本身证明，集体化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每当一项工程需要集中劳力，它就可毫不费力地做到；若一项工作需分散劳力，如上山采集草药，或沿路拾粪积肥，也一样可以完成。经常出现，也是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公社或市级领导瞎指挥，命令搞不合理工程，或提出不切实际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队也一概积极响应上级口号，就难免做出荒唐事来。但这不是集体化本身的错

误，而是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大队自主权太少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风潮造成的，因为上级动不动就把地方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当作违法乱纪去批判，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信任。

当时领导把灌溉说成是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时，张庄农民走出家门，组织起来修筑了一条主干渠、一个抽水站、一条辅助灌溉系统。但是结果证明，灌溉造成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起码同样多。兴修水利的尝试失败了。张庄的“盐碱地”继续侵蚀庄稼。如果能找到改造“盐碱地”的方法，张庄有大量的人力使之付诸实施。他们在生产上永远具有突飞猛进的潜力。同时，如果稍加指导，大队在工业上也能取得成绩。它可扩大砖瓦生产、修建水泥厂，还有机会向邻近新建工厂承包工程。无论做什么，大队的集体力量是一定会成功地显示出来的。

在我看来，张庄已经具备了迅速发展和繁荣昌盛的一切必要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平坦、有潜力的肥沃土地；忠诚坚定、吃苦耐劳的老一代；朝气蓬勃、有文化的青年一代；还有许多能工巧匠，许多经验丰富的干部。这个村所缺少的是团结和政治远见。张庄农民需要选择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确定一些共同目标，然后着手去实干。

前景会怎样呢？

从全省和全地区的政治状况来看，前景不容乐观。正当上上下下的敌对派系各自忙于加强公开的党羽组织，把成千上万的人打成反革命或受反革命蒙骗的人；同时又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奉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英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庄人怎能团结一致共同劳动呢？“红字号”一派蒙受了奇耻大辱，以致那时，原来那些斗志十足的“红字号”的积极分子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有些宣传队干部本来是“红字号”的，但就是不敢提及此事。他们一面尽力缓和基层对普通“红字号”成员的压力，一面又附和“联字号”一派，公开谴责“红字号”是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这样，他们促使晋东南的善与恶、天与地、上帝与魔鬼之间冲突的荒唐神话继续延续不断。

张庄的两派都声称他们自始至终忠于“联字号”组织。这反而使情况更复杂化了。但无论小申和他的“海燕”、“上甘岭”的成员怎样解释，大多数“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成员仍然坚持谴责他们是“红字号”的，并且按“红字号”对待他们。当转机到来时，给小申彻底平反，恢复职务、恢复党籍，本来是一重大胜利，可能为消除派

性扫清道路。可是与此同时，“二宝”和他们的“黑帮”却顽固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握手言和，严重地威胁着这场胜利，使人们对这条已扫清的道路是否能永远畅通无阻，产生了怀疑。

在我离开张庄的前几天，李快腿终于同意跟我谈话了。这是因为他得到保证，可以说自己心里话，不必说宣传队要他说的话。我想弄明白，他认为张庄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听了他的回答，很快就明白了。张庄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手小申本人，特别是这位干部为了要王文德对中农王小南之死负责，所作的令人怀疑的努力。在李快腿看来，这是对土改运动和整个民主革命的严重的反攻倒算，是反革命的“翻案”行为。他严厉批评宣传队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不尊重事实，你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翻案行为是个大问题。如果你不承认这点，你就是不要阶级斗争。……后来我们没有领导好生产，不等于说我们反对翻案是错误的。”

为了强调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暗示小申是阶级敌人。

和李快腿谈话后不久，我再次和小申去交谈，试图搞清他对张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的。他同意李快腿的看法——主要问题是阶级斗争。但是他颠倒了其对手扮演的角色。他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二宝”及其代理人，与小申和他同事们之间的对抗。他认为，“二宝”一伙全都背叛了自己的贫农出身，而小申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则坚持保护了贫农的利益。

“毛泽东教导我们，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小申说：“但是‘二宝’身为大队干部，办事情却像是人民的主人。人人都害怕他们，他们怎么能深入群众解决问题呢？捣乱分子，行凶打人、诬告，把件件事搅得一团糟的人只是少数（主要指秦快嘴的民兵），总共不到20人。大多数贫农都没做过那些事，没有违反“十六条”。

“要是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打我，或相互打起来，那不是这类问题。‘二宝’他们尽管年轻，可都是干部，他们应该执行党的政策。他们不这么做，那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这里的问题不是派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

怎样才能协调这些观点呢？双方都是青年人，都是贫农出身，都是党员，都聪明能干，吃苦耐劳，他们怎样才能找到共同立场一起为集体服务呢？怎样才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呢？

截至1971年10月，答案还不清楚。由于全地区陷入派性困境，由于定下政治基调的一位将军，本人实际就是一个派性头头，要在基层农民中进行团结，其前景肯定渺茫。单是派性就把“文化大革命”给断送了。在政治大混乱中造就出来的人们发现，自己甚至不能认真思考，更不用说为毛主席六年前满怀希望和热情，发动这场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找答案了。我们怀着迷惘与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张庄。我对张庄和整个山西农村的未来忧心忡忡，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

在以后的十年里，我试图在那非凡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有条理的解释。当千百万中国人在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从谨慎的肯定逐渐转向彻底否定。

毛还在世时，评论就已开始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称是“为了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必要的运动”。毛逝世和“四人帮”垮台以后，新闻喉舌开始批评某些过度行为是极“左”，并把这些归罪于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帮”。1979年10月，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最终谴责整个“文化大革命”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浩劫”。评论界则称为“失去的十年”，这一表达和千百万人民的亲身经历相吻合（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他们长期在乡下劳动，甚至被当作政治犯惨遭严刑拷打，并且诛连到亲友，导致亲朋好友的死亡）。

叶的宣告，给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开辟了道路。一些文章和讲话把这场“假”革命直接了当地归咎于毛，并把他晚年的政治活动判为极左。当他们逐渐展开这个主题时，毛的批评者开始探究起“文革”前的历史来。于是他们把毛的极左路线向前推，首先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立，一直到农村全面成立高级社，和50年代中期城市轻率的合并手工业和服务行业。

这次历史的修正，把解放后约1956年作为革命的转折点；前进与后退，正确政策与左倾政策之间的分水岭。在指责毛后来的一切做法时，他的批评者避免以任何具体方式提及毛在那时经常强调的问题——关于发展和巩固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既然他们否定了各种关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产队都看成是不成熟的东西，那么巩固这些创举的“文化大革命”，自然轻而易举地予以否定了。“失

去的十年”也就无需再解释了。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是由一种新的激进的合作化与公有制构成，并没有新思想、新文化，或新制度作为复合物，起配合和支撑作用。在革命过程中，毛一直认为，只有把革命推向上层建筑，只有改造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只有通过教育改革、文艺改革、社会组织的改革，而且最主要的是通过政府机构的改革，才能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相支撑的新型社会组织结构。没有这样一个新型结构，没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文明，新生的经济基础便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持久生存。

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后来的经验证明，毛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革命以后的政体，把大部分工业、农业置于全民或集体的管辖之下，但显然没有在其他方面建立起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再加上各种矛盾的困扰，官僚机构的压制，这些政体就存在不稳定性，经常危机四伏。

尽管如此，毛的反对者仍然抵制住对50年代现状的一切严重挑战。他们认为，土地分配给农民，国家接管了工业，内部革命就完成了。所剩的大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他们说，国家迫切需要的是技术现代化、专业技术和教育，协调的工业管理以及从国外——亚洲华侨团体、日本和西方大量引进资金和科学技术；而不是进一步造反，进一步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造。

五六十年代，毛谴责这种主张为修正主义，并强有力地推出他自己的继续革命理论。他的观点曾一度压倒一切。他对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作了精明的估价，尤其是对农民，指望他们释放出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农村，改造国家，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越过大多数党政官员，一次次直接号召亿万人民行动起来，向权威挑战，蔑视传统，摧毁一个又一个障碍。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分子们成功地创造了新的社会、经济和政府机构。土地合作化本身就是伟大群众运动的产物。之后即产生了一个民主选举的集体代表大会。“大跃进”点燃了人民公社的生命之火。

这是一个区域性集体单位，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民、政、军、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以及所有的生产活动，集于一个统一的、半自治的领导之下。“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组织推翻了所有的掌权者，

用群众组织、部队和被罢免的干部⁷三方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这是一次大换血。

然而毛激起的群众运动远未达到预期的最高目标。无论高级干部还是低级干部，都把合理的指示变成了无理性的教条。实实在在的成就，反而为采取破坏一切成就的那些极端措施，铺平了道路。年轻的官员们像他们取代的老年官员一样滥用职权，猖獗的地方主义威胁国家的统一。生产下降，热情衰退，运动一个接一个逐渐停止了。基层的新设机构既定形式继续存在，但是没有保留多少革新和民主的内涵。上级施加压力，要求实行统一的、集权的、等级制领导，因此实际权力往往落入多半搞“一言堂”、被任命的党委书记手中。虽说比以前人员充实得多、讲求实效、工作周到，但是，很快就重新制定出和传统体制极相似的规章制度来。

当毛的超级尝试——“文化革命”陷入无原则的派性斗争的困境，当毛不得不命令部队去阻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时候，很清楚，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四人帮”挑战的痛苦和愚蠢，以及华国锋政权真空阶段的不稳定状态，显示了长期演出的戏剧以凄惨收场。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受害者、斗争对象、旁观者和勉强合作者，结成反动派联盟执掌大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他们不仅摧毁毛领导下建立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等上层建筑，而且还摧毁了曾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山区工人进行集体生产，商贩进行合作贸易的经济关系。通过重新恢复毛十分激烈谴责过的一切实用主义和利润挂帅的政策，中国新的领导人为那些人力充足精力充沛、资源丰富的大部分人，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发家致富开通了道路。

毛进行的斗争虽然被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扭曲了，但它显然不仅仅是为解决权力斗争问题，而是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因此没有人能轻易调和对抗者相互抵触的政策，或是由此而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毛的创造被击败，能够证明批评者的正确吗？毛的纲领是十足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极左的唯意志论吗？

相反，最有力的证据是三十年间大寨大队所取得成就，以及大寨

⁷译者按：当时针对性的说法是“革命领导干部”。

作为样板在陈永贵家乡昔阳以及全国农村产生的影响。⁸ 提倡先公后私，通过扶植强大的集体单位，和强调自力更生精神，全国各地农民在各自的乡村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征服大自然，改造旧山河，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并不像现在的批评者责备的那样只管粮食，牺牲其他。他们执行的是毛的全面纲领——以粮为纲，兼顾林、牧、副、渔及各种小工业，并全面开发资源。他们的创造力、生产率和高标准生活震惊了全世界。

70年代，张庄学大寨相当快地解决了观点、领导和生产问题。马厂公社的“老大难”单位，在学大寨道路上走在了前头，并且在副业、土壤改良和机械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向全国农民提出了挑战。我写的这部历史的最后一部《分山》，就是讲述张庄农民如何打破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停滞局面，创造出适合他自己的特有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反映一个村庄发生迅速和深刻变化的故事。

张庄农民在改造他们的经济生活时，全国的大寨追随者并没有把他们的活动局限在乡村，而是进而组织全公社、全县的人力，展开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群众运动——“大会战”（现在已被斥为“一平二调”）洼地排涝、引水上山、淤滩造地，以肥土覆盖贫瘠的沟沟梁梁等。70年代中期，每年冬季，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农业大丰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数多达3000万。如今的新闻报道充满对单干户所取得进步的赞誉之辞；但几乎闭口不提，这些单干户欠了修整土地的集体劳动者的债，也不见他们解释；既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止，怎样去创造和开发更多的资源来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

当然不能无视所有那些零散的极“左”的愚蠢现象，极端平均主义，“瞎指挥”导致连根刨起果树去种粮食；为了加强田间生产限制手工业；为了杜绝投机倒把禁止集市贸易——这一切都是以学大寨为名进行的。也不能无视由于干部无能，许多村庄不能沿着大寨路前进，而变得漠不关心；或是党的领导专制，使人们陷入新封建主义僵化状态。人们可以怀疑：解散集体，分田到户，个人承包，放弃全民经济杠杆，是否就是挽救失败的良方？

⁸原注：尽管应该承认昔阳官员从1973—1977所报产量有极大水份，那正确的产量还是可观的。如果在最近10年全中国能接近昔阳的产量，粮食问题就可以认为完全解决了。

许多落后大队的群众，倾向于把土地个人承包当作一次解放，一种摆脱高压统治的方法，而承包合同制则把每个农民和国家置于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威胁要摧毁成功的集体社员们团结一致而获得的自主权。不幸的是，这种自主权——由管理良好的民主集体显示的自力更生的持久力，他们有抵制干涉，独立前进的能力，对所有的上级官员的权力都形成了威胁，使他们失去安全感。肯定是这种原因，使许多官员如此卖力地推动每个大队停止集体生产，并把大队资源承包给个人进行开发。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任何从管理不善的生产队“小暴政”中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又把自己置于更普遍、更多的“暴政”支配之下，如：大自由、市场以及上级政府的专横霸道。一旦全体农民返回到先前“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个体农民再度发现，要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多么软弱无力。

新时期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亿万人民开始响应这一口号时，两级分化使乡亲们走上背道而驰的道路。早已隐没的紧张的阶级关系复活了。为之掩护和辩解的盲目崇拜和宿命论随之也复活了。一切被遗弃和压制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像野草一样突然有力地暴发出来，想把大崩溃中幸存的集体幼芽扼杀掉。雇佣劳力和放高利贷的农民不断增加。收割季节，农民们发现有必要在地里搭起棚子，让家人日夜看守庄稼，以防不太幸运的农民偷盗。肥沃的田地中心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坟墓。翻身农民几乎在一代人以前，就清除了土地上的这些障碍物，死人用多长时间会把刚刚分给活人的土地重新占用完呢？树木、电话线杆、电力线杆，甚至学校和村庄的其他房屋的门窗等，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翼而飞，成为最先图谋宝贵木材者的掠夺物。当然还有集体的机器，为了分掉机械零件或废料，竟然把机器拆毁。

猛涨的新娘彩礼，铺张的婚礼，为了保全面子，夸耀孝心而更加铺张的葬礼，和农村大兴土木盖房一齐迸发出来。这些现象可能反映了收入增加，更确切地说反映了从积累、投资向消费的重大转移。随消费品市场的扩大，由于受十分偏向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刺激，财富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加快了。以北京为首的一些城市，爆发了兴修高消费的高层住宅和宾馆热，这种狂热只能扩大城乡的鸿沟。同样，恢复高考制度使城市优秀人物的子女涌进大学，只能扩大脑力与体力劳

动、专业人员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这两类人因此会更加脱离仍不可改变地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五年以后，这些倾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紧张关系，什么样的对抗呢？十年以后又将如何呢？

基本问题是，既然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纲领，既能防止两极分化，又能保证继续发展，为什么会如此惨遭失败呢？

答案只能是多方面的。而且迄今为止，其答案也远不是圆满的。有几点似乎相对清楚。有些方面应归咎于毛及他的支持者的主观缺点，有些方面与他们试图改造的文化具有稳定性这个客观现实有关。

毛的纲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不情愿或无能力发动一场对左倾路线或左倾政策的群众运动。

毛每次发动群众，大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总是一成不变地把运动推向极端平均主义，总使人联想起土改时期的贫雇农路线。在以后的年代里，毛不但不开展全国性教育运动，教育亿万人民懂得极端行为的反动性和破坏性本质，鼓励他们抵制极端倾向，而是采取行政手段，主要是在最高统治集团把人们调来调去。这样就使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变本加利，即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左，无论如何是革命的，右则是反革命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曾经多次发动反右倾群众运动，试图最广泛地发动人民，从政治上教育他们，鼓动他们行动起来。这种战术的差异导致了1973年陷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绝境。那时毛把已死的臭名远扬的“左”倾分子林彪作为右倾分子和孔子拉在一起批判。这种差异也促成了政治上的瘫痪，它长期阻碍党内外对“四人帮”种种明显的倒行逆施和暴政作出一致的反应。总之，毛未能有效地处理左倾暴行，使反对派有极大的可乘之机，利用左倾政策打击革命，再把罪名转嫁给损失惨重的地方。

危害性最大的过激行为的根源，恐怕来自毛反复重申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口号。尽管这些口号揭示了总体形势的实质，明确指出了各个发展阶段困扰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没有多少用处。干部们把一切矛盾都当成阶级矛盾，矛盾被人为地夸大为极其荒唐的对抗，制造根本不存在的“阶级敌人”，其结果是进行本来绝不应该进行的斗争。

尽管毛不断教导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和“我们团结的群众越多越好”，用此去平衡他那些

富有斗争性的言论。然而下面的人们却发现，阶级斗争对他们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加有利(如果没人倒台，我怎能爬上去呢?)。因此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那些口号。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任何人不抓“阶级斗争”，不仅会丧失发言权，而且会被佯装格外好斗的人当作攻击目标的危险。这些策略最后有效地歪曲并搞混了毛最关心的事——严格区分敌友，狠抓根本的阶级问题。

毛本人进一步搞混了阶级问题，因为他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这个敌人身上。毛把刘少奇的农村政策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为刘辩解是困难的(个人发家致富，家庭承包，唯利是图，市场第一，还有什么标签比这更恰当呢?)，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执行和落实上述政策的人，都是走资派。无论他们出身什么家庭，一旦获得政府高位，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举止，与其说像现代企业家，倒不如说像传统的达官贵人。称他们资产阶级，低估了他们精心磨炼的、操纵政治的手段和玩弄阴谋权术的能力，高估了他们管理企业的专业知识和责任感。他们对保持地方法规和等级制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本职工作的关心。他们很少根据生产和市场的客观因素进行经济决策，而是根据某项目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有利，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而决定。

上海的领导说服国务院批准上海和日本签订合同在上海建设钢厂。结果这个钢厂既不能烧中国焦炭，又不能冶炼中国矿石；而且在长江三角洲的泥滩上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庞然大物。尽管如此，他们不惜代价照干不误，因为这个厂会提高他们在工业战线上的领先地位。任何必须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都不会作出这种决定。为了恰当地评价这些人，对中国的阶级状况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似乎是必要的。

当毛集中火力对付党内“资产阶级”时，他自己却渐渐陷入帝王传统的泥坑。我在本书中通称之为封建传统。他选中北京这个曾经久不衰的官僚政治基础的消费城市，为革命首都。他决定居住在旧王宫墙下的中南海。他豪华的住房、私人服务，以及私人来往旅行的安排等，都得到了他本人的默许。他培植起超越古代帝王崇拜的毛的个人崇拜。他任人唯亲——信赖妻子、侄子、外甥女；当他权力受到威胁时，他有玩弄权术的癖好——这一切必然导致他成为孤家寡人、信息不准和判断失误。这样做必然削弱中国争取进步，实行民主以及建设

社会主义的斗争。

由于毛的最高统治集团为封建主义体制所包围，他未能有效地支持基层的民众机构迅速发展自治。基层的民主不管多么有限，都有很大的发展机遇。从理论上讲，大队的农民都有选举管理自己事务的领导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如本书所示，党组织总是要设法干预，把经过选举产生的人予以否决，用下级，甚至干脆用团体之外的人选来取代。所以说，本来经过选举而产生的村民代表大会或革委会的自主管理权，上级经常将其剥夺。由于“领导”无孔不入，尽管他们通过自力更生，集体经济繁荣，成就很大，也从未行使过本来属于他们的自主权。显然没有人，甚至毛都不愿把地方实权托付给农民。因此没有党中央发起的、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根本不可能向官僚机构挑战。运动一退潮，传统统治又卷土重来。

主观错误和失职行为还可列举很多。在毛的晚年，不知不觉的衰老更加剧了他所有的缺点。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其缺点的重要性就错了。客观因素——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复活、重新组合以及再生的顽强能力，恐怕起了决定性作用。只要80%的中国人仍然是农民，只要他们仍旧被束缚在田地上用锄头种地，重建极权和精英统治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就会继续盛行不衰。

过去我想当然地认为，旧中国政府的产生是为了保护和服务于地主阶级的。现在似乎明白了，这一传统的国家机器成为一个自治实体，它的合理存在，它的命运不同于缔造这个实体的地主阶级。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并剥夺了地主的所有权，摧毁了这个阶级，但是它却重建了一个官僚基础结构，使人不可思议地产生一种联想，即这个新机构和建立在地主阶级所有制上的旧王朝结构相似。共产党官员轻而易举地把欧洲工人运动的民主集中制，嫁接在他们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上。不用说，前者的民主成分保留下来的不多了。这些官员们完美地扮演现代官僚的角色，表现了他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机动灵活、能操胜算和狡诈难斗。尤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更是如此。总的来看，这一国家机器像一个自我更新的多细胞的珊瑚块，牢固地依附于海底的岩石上；又得到上面有弹性的、多层的掩蔽物的保护。任何外力胆敢向它进攻，它可首先躲开，然后把进攻者包围，使其失去活力。60年代尽管毛发动大规模的反官僚主

义运动，但是他们以某种方式和手腕成功地阻止、粉碎并最后缓和了所有的运动。至少部分是因为乡村百姓既没有受保障的权利，又没有从制度上规定的权利。毛不能单靠发动年轻工人、农民和学生取得多大进展。他不得不利用国家干部反对国家，下级反对上级、青年干部反对老年干部，外单位干部反对本部门干部。当然，已经获得声望和影响力的干部，极少有不设法利用传统方式维护自己的地位的，因此事实上，他们所要强化的制度就是他们本来要着手改造的制度。

大部分国家干部，即使口头上赞扬“文化革命”，也看出毛对现存组织机构、文化和政治随心所欲地进行挑战，正是对政府有条不紊行使职权的挑战，更糟的是对他们自己事业的致命威胁。他们感到震惊，并提高了警惕。先是故意拖延，阻止开展任何群众运动。这种战术失败后，他们一致而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这样当形势稳定后，能确保自己的一些实力。狂热的追随者把一些人推向极端；另一些人从事极端行动是为了转移目标或搞分裂活动。他们懂得谨慎地制造混乱，可以保证恢复旧秩序，并且能够保证维持他们在旧秩序中有一席之地。当革命结束，当不可避免的大崩溃时刻到来时，他们又携手同归，和谐地恢复“正常”秩序。

这一种具有强大自卫力量的社会心理，是不容易诱导或哄骗使其改变的。只有经济上独立、组织严密、觉醒的人民大会，才能把变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总之，解放后的中国在一系列前进与后退的波浪中得到了发展。毛三番五次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当人民群众奋起威胁到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时，也就危及到无数官员们的特权和事业。这些官员利用传统指望同僚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群众的冲击，或躲避、或封锁、或转移目标、或收买拉拢。毛还活着时，每次对抗都最终陷入僵局。毛去世之后，则逆流泛滥。

回想起毛时代那些接二连三的僵局，有点像海涅在他的诗中描述的关于上帝与魔鬼的对话：

“你不会创造。”上帝轻蔑地对魔鬼说。

“我是不会，”魔鬼答道：“但是我能摧毁你创造的一切。”

大概如此，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尽管毛激起的群众运动远未达到其预定目标，尽管这些运动未能

创造出各种新体制，以便培育毛认为至关重要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以及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但是把亿万人民推向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促使他们去研究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并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在，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上面传达下来的指示，不再盲目轻信了。他们要刨根问底问个为什么。这样就制造了一种崭新的舆论气氛。这种气氛必定会震撼未来，甚至可能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



附录：

周恩来总理接见韩丁一家 时的谈话记录

交谈者：韩丁、卡玛丽达·辛顿夫人（韩丁的母亲）、雷州安（韩丁的妻子）、寒春（韩丁的妹妹）、阳早（寒春的丈夫）、卡玛（韩丁的女儿）、史克（卡玛的母亲）、阳和平（阳早、寒春的儿子）

时间：1971年11月14日清晨1:30~7:30

地点：人民大会堂

（据阳和平的中文原始纪录，参照韩丁在美中英协杂志上发表过的英文报道整理补充。未经当事人审阅，仅供参考）

周总理：我还没去过晋东南，只去过大寨。长征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东征时路过一些地方。现在山西妇女计划生育还不好，还是旧习惯。（问卡玛在山西几个月，觉得怎样？卡玛说没注意。）卡玛你没调查。

韩丁你不是在张庄住过吗？那里生孩子有个很坏的习惯，你们不知那习惯，妇女生下孩子后，不许睡觉，只许坐在炕上，不许吃硬东西，只能喝稀的，腰也坐坏了。本来生孩子要消耗很多体力，但是山西的妇女不让吃带营养的，连豆浆都不让吃，更谈不上吃一两个鸡蛋了，只吃小米稀饭，需要营养不给营养。可能大寨改了。

（总理问我们改了没有，我们说不知道。）你们也没问。所以，山西省人口增长最慢，一直没过两千万。过去福建、江西、云南、贵州、陕西等省都没过两千万，现在都过了。河北、河南是大省，就连邻居的陕西都过了，就是山西上不去。这不是计划生育好，而是成活率低，生得多，活得少。

旧习惯很难改。晋东南还好点，晋西还差。有个县的一个大队全是河南移去的，他们没有山西的习惯，他们的人注意卫生，孩子们活得多，都很健康，周围的人却看不起他们，说是河南人，别的地方的。

我们这些年派了很多医疗队去，有的是解放军的，有的是政府的，向他们宣传医疗知识。宣传时他好像是听，但给药不吃，有病请巫婆。这种人在山西还有。晋东南可能好一点，老解放区，八路军一直没丢掉那里。

你们（指我们家的这几个人）这里女的占多数，男的三个，女的五个。男的不好调查，女的可以嘛。

你们调查了没有？

卡玛：人家会说我们在找黑暗面。

总理：你们不要那么敏感！中国的落后你们还不知。在中国农村、城市，落后的事千千万。但总的还是在前进，我相信你们也同意。几千年的习惯，阶级烙印，不易改。在农村，贫下中农占多数。地富占少数7%。但人虽少，影响还存在。所有制已改变。

（服务员端给总理和辛顿夫人一张桌子）为什么光给我们，不给他们，不平等嘛。

大寨那样的村子是少数，沙石峪的人都是逃荒的、要饭的，这两个地方地富很少，但不能说阶级不存在。全国土地改革是在1950—1951年（韩丁的记录是1949—1952年）。才二十年的时间，这些地富还在嘛。他们的子弟有的是学生了，有的工作了绊脚石，但是他们父母的影响还很深。7%的人口，六亿农民，四千多万地富完全改造好是不容易的，很少的，就是一半改造好了也有两千万。

张庄还有吗？

韩丁：张庄的地主很少，他们扫地、打扫卫生。

总理：阶级在农村还存在，虽然他们无权了。

城市你们清楚，资本家还拿定息。“文化革命”前是利用、限制、改造，是我们过渡的路线（1949—1955年）。后来1955年、1956年敲锣打鼓，共同进入社会主义，有的把企业交公了，有的公私合营了，有的小手工业成立合作社了。同时农村合作化，走向了高级社。

我们估计了资本家的资产。我们无产阶级没有估高资本家的财产，估了22亿元，近9亿美元。我们给他5%的利息，4500万美元一年。从1956年到1966年正好十年，十年利息直到“文革”，四亿五千万美元不多不少。

解放初期我们对资本的赎买政策不多说了。我们多方援助他们。

我们给他们加工订货，纺纱的棉花不够我们还补助，这样工人能就业，有工资。所以，资本家得到很大好处。十年利息还了他们一半的投资。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有些民主人士不好意思拿利息，也有人领了工资不愿意要利息，还有的利息很少就不要了，省得捞一个资本家的称号。所以，每年利息给不全。

“文化革命”开始，红卫兵不让给，资本家不敢拿。这些人还在，人数不少，可能比农村地主的比例高。我们估计全国资本家和家属共一千万人左右。

另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地虽没被分，自食其力，合作化了，但还总有富农思想，中农也有这种思想，个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公社里的贫下中农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前没地可以叫做半无产阶级。分了土地有了私有，合作化、公社化以后，还有自留地。像大寨一样，一点自留地没有是极少数。

张庄有吗？

韩丁：张庄自留地集体种。

总理：西沟有、沙石峪不知有没有。就是说没有的是少数先进的，多数是有的。但不像苏联，大部分是自留地，集体种得很少，公粮老完不成，自由市场东西却很多。自留地还是要有的，这点积极性还是要保留。除了集体，个人也有收入。除了集体养猪，个人也养。除了粮、棉、油不许自由买卖，但一两个鸡蛋还是可以。赶集国家管，但还是自由市场，只是有些东西不许自由买卖。

（总理问其他在场的中国同志“昔阳有自由市场吗？”，无人主动回答。）

在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很多。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虽然城市里的小商贩合作了，还是有人从国营企业那里卖批发货而后挑着担子零售。城市里还有夫妻老婆店。妻、老婆，不是一回事吗，这名字怪。摆小摊子的还很多。

这说明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数量。相反的，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不超过三千万，总数连职员、教员、医生等共是五千万拿工资的。真正的产业工人，按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商品生产者不过三千万。美国比我们多得多，日本工业发展很快，可能超过我们了。要加

上家属和孩子们，我们工人阶级的人数就多了。

在中国人人有工作，有的在家工作，丈夫养活，也有双职工，所以五千万拿工资的不等于五千万个家庭。我们估计一亿城市人口，六亿农村人口。

当然五千万拿工资的不都在城里，要不就占城市人口的一半了。

我说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有些人不同意，但具体分析，又反驳不了。

以上数字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说是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如果说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多数人专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但是工农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很多。

所以一方面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制是全民和集体所有两种，都是社会主义所有，是个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意义上说是多数专了少数的政。另一方面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一切，那是少数专多数的政。

所以说中国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内因受外因的影响，国际上更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包围，说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我不同意陈永贵的说法（有人在总理与我们会见前向他反映说陈永贵认为以后的斗争将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阳和平注）。在政治斗争上他是对的，但在思想分析上是错了的。他从他的觉悟出发。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从他那里可能没有地富（大家说那里有地富，陈永贵是肯定阶级斗争的）先进落后的斗争还是阶级斗争。劳动人民自己也有落后的思想，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解放任何大城市以前，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打败蒋介石后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那时起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毛主席在民主革命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卡马这时想起来了，说问陈永贵时，是问他地富全死了，不在了，阶级斗争还有没有。）

韩丁：那么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所造成的走资派呢？光看着地主会不会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失去警觉？

总理：我正要说这个问题。第一我列举的数据说明阶级的存在，第二是反动阶级影响着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第三是还会有新生的

资产阶级。列宁说小农经济每日每时大量的产生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如果工业里掌权的人，像会计，工程师，管理干部等等，巩固和发展特权的话，也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成为你所说的走资派。在修正主义国家，这样的人数量很大，如不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经常侵蚀无产阶级思想。

总而言之，一有原有的剥削阶级，二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三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旧社会习惯势力侵蚀得相当广。

列宁很痛恨这种习惯势力。山西妇女生育就是旧习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旧习惯就很少，我们经济落后，这些就多。

承认不承认存在阶级斗争是个关键的问题，是个政治原则问题。

刘少奇在工商业改造以后，说阶级斗争没有了。这不止他一人，陈伯达也有这思想。二十年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承认的话，用阶级斗争指导我们的工作。不承认，用什么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呢？

那些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就只有唯生产力论了。刘少奇说我们解决了生产关系上的问题，剩下的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也就是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的问题了。这完全违反马列主义。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一是生产关系，二是上层建筑，也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行动规则、行政机构和文化传统等。

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上提出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矛盾的理论。根据他这种思想，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非常先进了，生产力已经被解放了，也就不能靠进一步的改变生产关系来发起一个大跃进。他认为不可能有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因此他提出形“左”实“右”的口号、办不到的口号来破坏大跃进。

他不赞成改革上层建筑，不同意改造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反对大跃进。

彭德怀虽是军人，也反对大跃进。他从外国回来就反对。1957年去的，1959年回来。

这思想跟陈伯达是一样的，和刘少奇也是一样的。

长征以后，刘少奇到北京，陈伯达也从莫斯科到北京，他们在一起。

毛主席在1963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

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全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城市工厂里的干部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拿公家的纸写封私信。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那一条道路的问题。

韩丁：你前“十条”、“二十三”条都看了吧。

韩丁：没有，我要了好几个月，他们不给。

总理：前“十条”、“二十三”条都可以送给韩丁。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评了后“十条”。但是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已经到桃源蹲点去了，搞得完全是刘少奇后“十条”的那一套，而后她到处讲演，也不经过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和他们的斗争是从“八大”以后，一直到1966年8月才结算。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看了吧。不光和刘少奇的斗争，别人也犯了错误，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

第二个问题，公私问题。公私是对立面，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大就没有小。像王杰、雷锋、欧阳海都是些很好的同志了，在关键的时候想的是公，但没有私他怎么会想公。大公无私是很难讲的。

资产阶级笑我们共产党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是不对的。没有个人哪有集体？集中个体，才有集体，集体为先吗。今晚我们这几个人不是个体吗？大家在一起，意见不一致，最后达成几点，但行动时，各有各的见解，一致是暂时的，差别是长期的，或一致是大方向，差别是小方面。

韩丁一家的意见一样吗？老母亲和她儿子韩丁的思想不一样，韩丁和雷州安的想法不同，年轻的卡玛和她妈妈的看法能一样吗？个性总是有的，有个性，才能有集体。

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走极端，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

污水变得可养鱼，可浇地了。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几个大湖和沿海的鱼死光了，所以到秘鲁沿海抢鱼。为了自卫，秘鲁和邻国一起说二百里是领海，我们支持，作为建交的条件。垄断资本不光是污染自己的领海，还要掠夺别国领海的财富。

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都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东京都市长是个非党派的进步人士，横滨市长是社会党。他们到炼油厂参观了。我问他们公害怎么办。他说日本的制度下，他毫无办法。幸亏东京都的工业多是老的和小的，污水不多，还没问题，也没大的炼油厂，但是汽车很多，废气很多，东京都的居民对此毫无办法。东京都市长羡慕北京市的自行车，但他说他毫无办法。垄断财团要卖车，为了利润他们要大的市场，要人们用几年得换新车。

横滨不行了。大炼油厂污水很多，近海鱼全死了。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的是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的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大寨，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保卫大寨我支持，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第二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先进落后的斗争是将来的。共产主义是这样，方向性可知，时间性不可知。到那时还有左中右。阶级思想的痕迹要逐步下去。这有几千年的影响。我讲的是中国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我回到“公与私”的问题。我们不是取消私光有公，而是私服从公，把私与公一致起来。

大寨是公私结合好的，没有自留地了，住的集中了，行动一致了，早上大家一起起床。但也不能人人如此，病人、小孩、老人，刚上完夜班的还不能一样起床，这是私的差别。只不过原则是先为公，再为私。

辛顿夫人：有的农民家门前种的是一种花，别人家是另一种花，还有的人家门前没有花。

总理拍手：对了。大寨人家门前种了不同的花。有的人喜欢一种

的，有的喜欢另一种的。雷周安你的孩子习惯喝牛奶，你应该给他们。我要在哪里的话，我就保证他们有奶喝。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受苦。

红军长征到陕北，南方来的战士不习惯小米。加上枣吃，就慢慢习惯了。陕北人杀猪杀鸡不吃心肝肠等，很奇怪。南方人吃，把这给南方人，和小米一起吃，就慢慢习惯了。但是你要让陕北人吃这些，他不干。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习惯了喝奶的小孩子一下子不喝奶了。

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是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陈永贵是大公无私，所以大寨人一时骄傲起来了。另一些人说大寨人口号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到大寨后反对两种观点，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同意。谢振华说的时间地点是不对。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秋收后，先把公粮拿出来，再把种子拿出来，再把集体储备留下来，再把卖给国家的粮拿出来，然后第五才分口粮。口粮每年增加一些，这就了不起。在全国作了模范，先公后私，全国公社都像你们，工作就好作多了。所以，别人学得到的作榜样，学不到的怎作榜样？

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说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如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谢振华说话的时间地点不对，不要生气。陈永贵接受了先公后私。

韩丁：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总理：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次灾年他们向国家只借了一次钱，第二年就还了。一年后，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见了毛主席。1963年先是旱灾又遭洪灾，以后还经常受灾，但是陈永贵不要国家的一分钱，自力更生救灾。

他们很缺水。1965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我去了发现问题。梯田都修在虎头山的北坡上，但是没有水库，没有灌溉水源。我问陈永贵不下雨，旱了怎么办？他说每年总要下些雨的。我问要是有一年一点雨都不下怎么办？我问他能不能搞个抽水机抽水，他们就搞起来了。先是将河水抽到山上。河水不多了就打井。自从他们用自

己打的井，国家的抽水机（当然付款了），他们的情况就好多了。我们不能说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援助，国家还是给的，比如化肥也是优先卖给他们的。

所以说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把问题不能说绝对了。这样别的地方就能学了。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是说大寨没有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我去了几次大寨，如果我们能看到它的缺点，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才能，只是因为我到别的地方去得多了。别的地方树多。一到大寨，就看出来了，树少。离大寨不远的大队，有的有树，可以看出大寨对这个问题注意得不够，如果早点注意，多种些核桃或枣树，收入会比现在还大。现在种了很多，核桃树种了不少。

辛顿夫人：我看北方很多地方都没有树。是缺少劳力吗？

总理：劳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风俗习惯。中国有一个老的坏习惯，人们砍树砍得比种的多。改变这一习惯，培养种树的习惯很难。我们只是提了个方向，向大寨这样的榜样，一个别人学得了的榜样。一旦你有了一个好榜样，你就需要去宣传它，鼓励人们去学习它。但是要灵活的，因地制宜地去做。我们只是提个方向，办法各地自己办。否则大家都跑到大寨去，如同去“取经”，那么只有栽跟头。

比如，大寨是大队核算。80多户，450来人。但是河北平原很多小队都有这么多人。在那里也变成大队核算就不好了，那就是平调了，生产多的倒不如生产少的了，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影响。

有些地方正好相反。如西南部的山区，有些队只有几户到十几户。如把这些小的核算单位像大寨那样合到一起，天天为了记工分上山山下的来回跑也不好。云南山很高，山上山下是一个大队。山上冷，山下热，上下差别很大。虽是一个山，还是分成两个小队好。

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的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学的不是大寨的核算单位或居住方式那些具体的内容，而是要学大寨人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实地把它贯彻

到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去。我们要学的是大寨先公后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沙石峪也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张庄、沙石峪、西沟都有优点。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我都讲的是你们碰到的事。我讲些别的。卡玛与韩丁回美国。青年人是希望。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

韩丁：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是什么意思？

总理：斯诺走后写了很多文章，你们看了“生活”杂志里刊登的和毛主席的谈话吗？里边说的基本上是毛主席说的，有的是斯诺理解错了，如他说什么孤独的和尚打着漏雨的伞。

主席说“和尚打伞，无发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所以没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那是去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的斯诺，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政治工作领导一切了，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群众，全国都在备战备荒，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负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搞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他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毛主席说要一个教员就行了。扭转时很费劲。扭转这个用很长时间。按主席的意思，伟大两字也不要了。但群众不同意，只要导师不行。亿万群众天天讲，不容易改。

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怎会有绝对权威？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还要考虑将来。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吗？说绝对权威是社会停止论，是不对的，是消极的。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

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也不分时间、地点，这是不对的。把好事走到反面了，太多了。毛主席看了讨厌。这样不真实，也不尊重。所以，毛主席和斯诺说笑话，‘外面的像风吹雨打，多可怜’，斯诺回答说‘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顶着风，太孤单了’。

在北京饭店一入门的柜台两边上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毛主席还替你们看柜台！”。饭店的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

这些都要取消。你们可以看到，大礼堂里面也取消了。

韩丁：现在还是可以到处都看到它的。

总理：是的，雕像立得太多了，要取消。一开始，说不服群众，就只好下令取消。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毛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说过阶级有他的群众、政党和领袖。无论哪个阶级的群众都需要有自己的领袖，但是这个被赫鲁晓夫否定了。它把所有的问题都统统认为是“个人崇拜”。他的目的是想否定斯大林的影响。虽然斯大林犯过错误，但是他功大于过。我和赖斯顿（James Roston，纽约时报评论员）谈过这个问题。当然他是不赞成斯大林的。我问赖斯顿，如果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没有斯大林行吗？没有斯大林这样的领导，苏联人民能联合起来吗？赖斯顿无法否定这些。

斯大林之所以能起这一作用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批判了很多错误的倾向，他建设了社会主义，使党有了力量，进行了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斯大林思想上和领导作风上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先说斯大林是他父亲，死后“二十大”又作秘密报告，结果被美国公布了。抛开党性，就从个人的品德来讲这都是很差的。

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不崇拜一个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树起来的。美国内战时，华盛顿是个领袖，这个无法否认。没有他，你们美国人能在1976年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吗？尼克松要当美国独立200周年时的总统，如果华盛顿没有活着过，他能吗？要说个人崇拜，

美国多了，市名、州名都叫华盛顿。这不能否定是涌现出来的，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是以后美国革命胜利了，也不能否定华盛顿所起的作用。如法国1789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他后来被杀了，但他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也不能否定他。

毛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实事求是，讲的就是这话。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是实事求是。

党的50年每个历史关头都是毛主席纠正了错误路线，先后大致有十次。

第一次是陈独秀，他虽是党的发起人，但他断送了革命。毛主席主张深入群众，农村搞土地革命，当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带着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这路线是对的。

同时，瞿秋白却杀地主、烧房，反而发动不起群众，把群众吓跑了。这是盲动主义路线。毛主席主张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波浪式的发展，逐步扩大根据地。陈独秀不光把革命断送了，他本人还成了托派。

第三次是李立三，路线也是盲动主义。当时根据地有几万人，他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要打大城市武汉、长沙，封锁长江。他是极“左”路线。毛主席在江西反对打大城市，而要搞游击战争，结果打武汉等城的计划失败。在农村，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几次“围剿”，推动了革命的高潮。

当时有个右派叫罗章龙，他们不赞成李立三，另立中央，但没人走，又失败了。

第五次是王明路线，他比立三路线还左。他是从1931年到1935年初，他要打好几个大城市，全国总暴动。他是苏联回来后的，更左了。因此，他的影响大。结果许多根据地保不住，红军要长征。所以，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事，但也是个严重的教训。毛主席在遵义开了个会，扭转了错误，这样领导长征走向胜利。三个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推动了抗日高潮。

抗日以后，王明又从苏联回来，提出右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毛主席说是在统一战线内又斗争、又联合，要掌握领导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纠正了王明的路线，推动了抗日的高潮。

在这以前，出现过张国焘分裂中央，另立中央，一时说不服他，耐心等待他。最后，团结了大部分的军队，剩下他一人，逃到武汉，向敌人投降了。抗日战争时，经过整风，开了“七大”团结的大会，打败了日本，进行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基本上结束了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国内矛盾转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没有斗争。刘少奇就是总代表。但也分阶段。先是高、饶的反党集团。

第二次是反右。1957年，卡玛你还记得吗？经过反右，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最后是彭德怀跳出来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这是在反右以后。

然后从1962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1963年毛主席为社教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当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毛主席于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同时，江青提倡京剧革命，造就了今天的样板戏，文艺革命开始。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这个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是长期的。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你们在地方上也发现了问题。但斗争的主攻方面是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修正主义要分裂党，党的路线是反对任何分裂党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办法是公开向群众讲明党内的斗争，宣传主席的路线，开展“四大”。而修正主义不敢公开分裂党，而是造谣、破坏。在这里，坏人、走资派暴露了，被群众批判了。有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再立新功。有些人不甘心于失败，他们藏起来，不改正错误，搞阴谋。

“五一六”集团就是最大的阴谋集团。“五一六”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公开发表是在1967年5月16日。阴谋家利用这日子，组织了“五一六”集团。美国的进步劳工党下面也

有个“五一六”兵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是个阴谋集团，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是唯心主义的，奴隶创造历史。大讲天才。他们就造谣，分裂党，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这样阴谋破坏，这事，卡玛、和平都知道一些。

人民大会堂是很少的几个红卫兵没有冲击过的地方。当然我们经常邀请他们来。我是说他们没有强行进来过。1967年8月11日，外事口开大会批判陈毅，史克（也）在大会上，我都上当了。

一外造反派的宋远利主持的批斗会。批判陈毅可以，打倒不行。

开会时，我的左边是宋远利，一外的红旗造反团，他现在证明是“五一六”分子。他的右边是谢富治副总理。我的右边是刘令凯，“六一六”兵团的头儿，也是“五一六”分子，他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同意参加这个会议的先决条件是批评陈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为刘令凯要打倒陈毅，他是不应该到会的，更是不应该发言的。

当我发现刘令凯到会了，我问宋远利为什么刘令凯也在主席台上。

宋远利说：“刘令凯在主席台上好，这样他就不会捣乱。”

但是这些学生说话不算数。大会一开，大标语从三楼上下来写着“打倒陈毅”。当着那么多的群众公开地反对这种做法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没有说什么。

就在这时，他们说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刘令凯发言，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个，他保证不让刘令凯发言。但是他又违背了。当我出去休息了一下，刘令凯发了言。

当时还在场的谢富治副总理生气了。他走出会场来找我。正当我们两个都不在场的时候，一些极端分子跳上讲台，开始揪斗陈毅。但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思想也很好。他们一看有些学生跳上讲台要打陈毅，马上就把它包围在他们的中间，保护起来了。学生们骂他们，可是他们说：“你们不能把陈毅带走，毛主席要保他。”

没人敢抓他。

今年“五一”当陈毅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美国的情报机构大吃一惊。陈毅有病，他是从医院去的天安门。他是新一届的中央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不光是美国的CIA摸不清，蒋介石的情报组织也摸不清。当蒋介石得知陈毅上了天安门，他把他的情报组织大骂一通。

据说，造反派里还有人企图抓（阳和平记录的是用刀子杀）我。我不信。他们连陈毅都没抓成，还想抓我？当然不行。那里解放军很多。这可能是吹牛，瞎说罢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露手。只有在夜里，在无人之处，他们才会搞阴谋。外文出版社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去年才发现有几个好的同志被暗杀了。

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支部书记要当外交部长，姚登山要当外长，王力要当总理或副总理，因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毛主席发现了这事。姚文元发表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指出他们揪党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军里虽然有坏人，但不能乱军，那就不好了。

军队是个集体力量，党领导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文化革命”中，军队保卫“文化革命”。不管那些错误，但还是保卫了“文化革命”。军队的“五不”就是从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来的，有纪律的军队，说不打就不打，人家骂就骂，还有被打死的，这样还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当然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

为什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不”是从哪来的？第一条说话和气，不动气。头一条听指挥。有人就是要破坏纪律。这个斗争一直到现在。但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还是胜利了。只要把事向群众讲清楚，绝大多数群众是会站在主席一边的。要团结，不要分裂，凡是分裂的都失败了。最后总是团结起来了。这说明了群众的愿望。斗争虽没结束，但可看出胜利一天比一天大。

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正确路线是斗党内走资派，不是群众。但是修正主义分子要分裂党，就挑起群众斗群众。

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都是支持“文革”，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军队，拥护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暗中是反革命的，但也可看出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反对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但常常被发现了。

“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坏人要破坏就得用一些口号。坏人从两面挑，“文化革命”总是路线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走资派要惩前毖后，如不改就要打倒。

1967年“7.20事件”后，主席要陈再道改正错误，那次我也在。主席说服陈再道，要让“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群众合作。谢富治也在场，王力也在场。毛主席让他先到“百万雄师”那里。谢富治到了汉阳。他是个很好的同志，病了，比较严重。当时王力到后挑起来的群众斗群众。以后，群众把他抓起来了。我也去了，飞机下不去，最后想了个办法下去了，把他们救出来了。天安门还开了会，欢迎他。

8月7日他又胡说八道。武斗基本上是路线斗争，把群众分裂起来。群众都是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的。毛主席在南方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你们去的山西是最杂的地方。山西我没去，我只到武汉去了两次。不怕乱，乱是乱了敌人。整个“文化革命”还是个路线斗争。头头里有坏人，或是一边有坏人，或是两边有坏人。把群众说成是右派是错误的，有的保守一点，稍微一讲就觉悟了。是头子里有坏人。

你们在山西很好，但不要强加于人，要走马观花的可以让他们走马观花（这时韩丁说他不同意分裂，他讲了一些美国的情况和青年代表团的情况）我可能不了解美国情况，但不要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事实。他们是从自由环境来的，不要使他们觉得有压力。

毛主席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的办事就是可以先各干各的，最后错了的认识了错误，改正了就团结起来了。（以后大家讲了美国青年团的实际情况，不是青年里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中国的陪同同志在里面造分裂，使黑人、白人不团结）过去的参观办法是走马观花，青年们的观点或是没有全面反映上来，或是反映上来了，但还是按老一套办法办事。

总的还是一句话，第一，愿意团结一致到一个地方蹲点，很好；第二，不愿意蹲点的可以多看看。这是个新事物。过去我们接待的都是走马观花的。要多蹲点我们欢迎，事先说好可以。从乒乓球队来中国只有不到一年时间，我们的经验不够。

韩丁：先把这事放一边，不要让它占了过多的时间。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谈林彪的问题。现

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总理：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线讲清楚，我们要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年的历史说明路线对了就会胜利，即便是像我们的党1921年成立时那样人数不多，我们的党也会成长壮大。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我们的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收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斗争一直要继续，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个军队，你的路线错了，你的军队就没了。长征以前我们有30万红军，但是到了陕北，我们只有3万人。路线是根本。除了王明路线以外，还有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当张国焘和我们会师时他有10万人，是我们党领导下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以后他分裂党，带领一部分人西征到黄河以西去。结果他是大失败，军队也没了。领导军队的人路线错了，本人要垮。

朝鲜战争中，彭德怀不是英雄吗？其实每个命令都是毛主席发出的。有几个命令他没执行，结果打了败仗。但是他还是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支持他。他从朝鲜回来后还当了国防部长。但是他后来反对大跃进，当了右派。如果你改正错误，主席的办法是治病救人，还可以当党的领导，人总是犯错误，只要不坚持错误就行。

卡玛要回国了。青年人有帮助，犯了错误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关键还是路线，阶级斗争坚决不坚决，马列主义从不否定阶级斗争的发展。他们是在他们的时代。毛主席总结了全党五十年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我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总是向各国人民说要按本国的情况处理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了的马列的话，就是马列主义不能照抄、照搬，要按本国具体情况。像卡玛在中国住了整整21年，经过了中国的革命，到山西去证明了这个真理，用看到了的事实认识真理。

山西这五年变化很大。刘格平起来联系群众，在张日清的支持下，打倒了走资派卫恒，所以，他们成立革委会，中央批准。但这两个同志马列主义不多，群众起来不是拥护他们两个人，而是拥护“文化革命”。个人是渺小的，人民是伟大的，群众总要想找一个正确路线得到

胜利。

但刘格平、张日清两个人有了权，野心就发作了，结果把群众分成两派，发生武斗，钻进了坏人。刘格平下面有坏人，张日清下面也有坏人，只是刘格平的坏人多些。

刘格平在太原有个组织的头头是坏人，叫杨成效，和他谈了多次。他是个伪警察的儿子。刘格平让这个人当头头，搞武斗。中央找来批评，他们成了两面派，当面说不打，背后还打。如果张日清执行正确路线就好了。而他不是那样，而是打。

在晋东南刘格平支持程首创。陈永贵支持刘格平是因为他是主任，是中央委员。陈永贵也没武斗，张日清就派人到昔阳县搞武斗。我们告诉陈永贵两派都是错误的，他接受了。我们把刘格平、张日清撤职了。谢振华任主任。陈永贵、李顺达和一个旧省委的干部，解放了的，叫王谦。他在解放初期反对刘少奇。在省里搞了几个初级社试点。刘少奇没和主席讲，就写了个批示，批评了初级社的试点。说是一种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但王谦顶着了。以后毛主席纠正了。

这说明不管你多大的官，只要不按主席路线办事，只有自己失败。群众军队都不跟你。山西是很好的例子。大同“支左”的军队搞得很好。昔阳陈永贵搞得很好。离昔阳很近的阳泉是在刘格平的人搞得不好，换了人就很好了。老工人王体，反对两派，搞大联合。大同煤矿有个书记叫韩英，到处执行正确路线，群众跟你。

在晋东南专区，反对程首创的军队就犯了错误，换了就好了。派性是头子，群众没有。但也不是头子都坏了。张日清那边的谢振华站出来了，刘格平边的陈永贵站出来了，李顺达是张日清一边的，也站出来了。派性是头头搞的。

整个“文化革命”是路线斗争。全国的很多问题在主席路线下解决了。陈伯达是个唯心主义者，自称小小老百姓。

请你们相信，我们党错误路线总是要失败的。正确路线总是占上风的。张国焘反党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连警卫员都不跟他了，都跟着主席了。因为他逃跑了，只有他一人。后来，我们把他老婆送去了。他在党内只有17年。我党已50年了。他在加拿大，拿美国的津贴。他能说的事不多。王明是在解放后到苏联。他在党内工作不到20年，他只好作个卖国贼，一个是军队里的，一个是和国际上有联系的，但

路线错了，全完了。

请美国的同志相信，我党要一直高举马列主义。

尼克松来华是因为他是总统。我们不拿原则作交易。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是两个中国。我们坚决反对。结果美国总统都要来中国，别国就不能和中国和好了？从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以来，一系列国家和我们建交。联合国里 59 票反对美国的提案。这里有 10 个是没和中国建交的，这是美国没料到的。但投弃权票的有 8 个是建交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太大。像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弃权也好。半数就少了。

这次表决出乎美国的预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提案失败了。亚非拉人民很高兴。联合国里没有鼓，但可以跳舞。有的人就在会场上跳起来了。表决阿提案时，形势就大变了。76 票对 35 票，超出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原来 59 票的支持票没变，又加了 17 票。其中过去弃权票里有 12 个变了，支持阿提案，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也转过来 5 个支持阿提案，包括以色列、葡萄牙等。我们对这一些国家都没怎么注意，他们却投了我们的票。这就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

我们都不想理的，亚非拉人民要我们去，我们匆忙地组织了个代表团。有的人还劝我们不去。这次胜利是大的。但以后的贡献有限。我们决不做超级大国。

（卡玛问总理关于林彪事件的问题）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完）



译校后记

《深翻》原著，系作者韩丁根据上世纪70年代现场采访的记录资料，以及他在当时和后来研读的有关材料写成的。在两次翻译和反复校订中，我们认为韩丁通过直接交流或英语翻译的中介，十分真实，乃至原汁原味地记载下他所关注的张庄几十年的社会变化，记录了当时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语言，这是本书最珍贵的地方。我们也认为，毕竟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和口述历史的巨著，韩丁在采访当时以及后来回到美国写作，直至1983年用英文出版，都只能以他当时掌握的资料和人们当时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来叙述。如果有些观点与后人的不同或记录与事实有出入都是难免的。

为了尊重作者本人当年的劳动与认识，也为了尊重业已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我们对于某些可能的偏颇，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文句和意见，对于原著中一些干部、群众口头语言，涉及到的当年的习惯说法、政治口号、文件精神，也基本上保持原著的风格。相信读者能够自己对于这些内容与文字，对于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做出客观的理解和科学判断。

鉴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翻译和校对、校订中的问题一定不少，错漏也不少敬希读者谅解。

《深翻》译校组

2008年5月